

# 纳粹女人

Die Frauen  
der Nazis



[奥]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 著  
班玮 曲俊雅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纳粹女人

Die Frauen  
der Nazis



[奥]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 著  
班玮 曲俊雅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粹女人 / [奥]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著; 班玮, 曲俊雅译.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2-0699-0

I. 纳… II. ①西… ②班… ③曲… III. 纪实文学 - 奥地利 - 现代  
IV. I52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1502 号

Die Frauen der Nazis, Die Frauen der Nazis II

By Anna Maria Sigmund

Copyright: 1998 by Verlag Carl Ueberreuter, Wien

Obtained by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  
many

本书国际中文简体字版由北京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1-1856

纳 粹 女 人

NACUI NÜREN

[奥]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 著

班 玮 曲俊雅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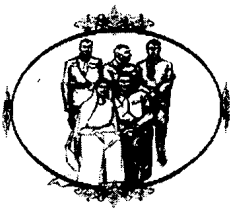
787×1092 16 开本 22.5 印张 315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302-0699-0

1·684 定价: 29.00 元



## 让理性重返人间

### ——序中文版《纳粹女人》

李建鸣

我曾答应过隋丽君女士，要为这本书写序，可真要履行诺言时，深感下笔之难。对上世纪80年代的回忆，书籍留下的强烈印象，一些国人对希特勒时代的认识，都使我有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受。我想，还是跳出这本书来谈的好，一来自由，二来也许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最早印象，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的苏联电影和《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书。后来学了德语，看的原版书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对第三帝国的揭露和深刻的谴责。书虽然看得不少，可是实际上对希特勒时代并没有什么感性认识，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去西柏林生活后，才有了不少体会。

当时，我接触的德国人多数与我年纪相仿，也就是出生在二战期间，他们的父母当然都经历过希特勒时代的兴衰。我的这些熟人职业不同，经历也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曾对自己的父母在第三帝国的经历和行为有过一番个人的调查，并且以此来决定他们与父母的关系。

我的第一个房东在政府部门工作，人非常踏实可靠，心地也很善良，但与住在汉堡的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他也从来不谈起他的父母。有一次，出于好奇，我问起了他父母的事情。他才告诉我，他在上大学的时候（60年代学生运动期间），曾花了很长时间和精力去弄清楚父亲在第三帝国的作为，他发现父亲曾给希特勒当过兵，从那以后，他就无法面对和原谅他。我对他说，父亲这么做也许是出于无奈。他的回答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原谅。

我还有一个女朋友告诉我，她的父亲也参加过二战，回来以后，也许是精神受到刺激的原因，整日沉默寡言，无法与人交往，也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两个孩子的成长。我后来去过这个女友的父母家，发现她父亲确实老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不看人一眼，也不说一句话，似乎不存在



什么外部世界，完完全全地生活在自己的记忆中。我的女友告诉我，像他父亲这样失去精神平衡的老兵在德国大有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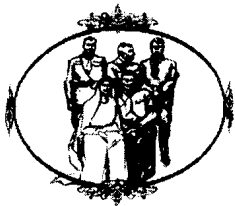
我的第二个房东是女的，出生一年后，父亲在服役的舰艇上战死，不久，母亲又在盟军发动的一次轰炸中被炸死，她是同外祖父母一起生活长大的，但就是这样，她仍然无法理解和原谅父亲参战这一事实。她还告诉我，他们这一代人没有过快乐的童年，而且都因为自己的父母有一种集体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既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绝对的反战态度，也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那种无法摆脱的困惑和孤独。

到了德国，我才真正感受到，希特勒不仅滥杀犹太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而且对本国人民也犯下了滔天大罪，他和他的法西斯统治，使整整两代德国人失去了正常生活的可能性，而且也给无数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在西柏林时，我有意无意地想了解一下犹太人在希特勒时代被迫害的经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小的时候接触过犹太人。那是在上海，我们住的那座公寓里也住有一些犹太人和白俄。我家住在六层，每天早上上学下楼时，总会看到他们的住所门前放着商店送来的一个长条面包和一些牛奶。住在三楼朝西的是一对犹太老夫妇，听我母亲说，他们因为没有什么收入，所以生活非常俭朴，每天就靠着这点面包和牛奶过日子。也就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些流亡到上海的犹太人产生了同情心。大约1955年或1956年，楼里的外国人都走了，白俄去的是巴西和澳大利亚，但我始终不知道那些犹太老人去了哪里。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到了西柏林以后，很长时间我没有遇到过一个犹太人，只是常听说有关犹太人的一些趣闻。有一次看完一场戏，我和几个比我年长的朋友闲聊，我说西柏林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城市，有那么多的剧团和电影院。没想到的是，一位长者对我说：“柏林的风光早没有了。柏林最辉煌的年代是二三十年代。”我问他为什么，他的回答是：最有才华的艺术家都是犹太人，是他们创造了柏林的艺术氛围。希特勒上台后，一部分犹太艺术家流亡到了国外，另一部分犹太艺术家进了集中营。他们不在了，柏林就不一样了。

我的一个德国女友在科隆生活，她任职的学校专收那些有各种问题的



学生，所以工作十分繁忙，除此之外，她还要照顾年迈的父母。然而，她把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献给了天主教办的一个帮助犹太人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工作就是要在全世界寻找曾经在德国生活过的犹太人，邀请他们重新到德国来访问或度假，算是对他们所受苦难的一种补偿吧。她告诉我，在以色列还有一些从德国流亡到那里的犹太人或是集中营生还者。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愿意再回德国，他们惨痛的经历留给他们的恐惧是那么深，使他们无法面对曾经是他们故乡的德国，基金会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说服他们中的一部分重新踏上德国的国土。这位女友在休假时，曾陪过一位七旬老人。老人是在德国出生和长大的，她的家庭并没有保持犹太人的生活习惯，而是接受了德国文化：她的母语是德语，她酷爱巴赫的音乐，她最佩服的作家是歌德，她一直以为德国是她的故乡。可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犹太血统不仅使她家破人亡，而且使她永远失去了故乡。她这次回德国没有几天就病倒了，不是因为旅途劳累，而是因为儿时的回忆使她心力交瘁。

后来，我有了认识一位犹太老人的机会，他是我一个女友的公公。老人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逃到法国，又从法国去了美国，现在美国定居。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德国，直到儿子到德国上大学并工作后，他才回来。他虽然一直无法融入美国文化，但也不愿在德国生活，因为他一辈子无法摆脱被德国、被自己的故乡抛弃的痛苦。他一直在写书，主要是反战的内容。用他的话说来说，这是他可以对这个世界所做的惟一贡献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幸存者还是幸运的，他们还能看到理性重返人间的一天，而那些在集中营死去的犹太人、共产党人、同性恋者以及被法西斯杀害的残疾人，是永恒的牺牲品。他们被法西斯的“纯血统论”夺去了生活的权利，夺去了一个人经历和体验生命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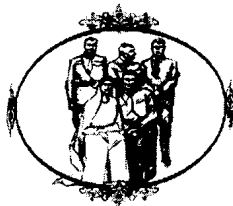
虽然第三帝国已经成为历史，但德国出版社每年仍然要出版大量这方面的书籍。其中有两类书籍特别引人注目，一类是有关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另一类则是有关法西斯头目的。《纳粹女人》应属于后一类。从各种角度去研究这段历史是必要的，因为大量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悲剧发生的前因后果。不过，不能忽视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比较大的距离感，有的时候，单纯的好奇会超过理性的判断，还有，商业因素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对纳粹头目和纳粹女人产生一

定的好奇心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好奇心可以源于对罪恶的憎恶，也可以是一种消遣，当然我更希望是前者。

说起“纳粹”，一些国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两个字的原意，因为这是按德语的缩写翻译而成的，其原文是“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就是靠这一主义上台的，也是靠这一主义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统治。当时，德国很多纯日耳曼血统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是支持希特勒政权的，因为这一政权从理论上给了他们心理上的优势。法西斯理论使他们认为自己的血统高于犹太人，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优于知识分子。希特勒政权初期还给了他们一些实惠，例如给他们提供免费旅游的机会，每家送一台收音机等。此外，兴修高速公路和发展军火工业，也给大量失业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纳粹”使很多德国人有了一种兴奋感，这种兴奋感使他们产生了要重新称霸欧洲的梦想，也使他们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狂热之中。在这群狂热的人当中，当然也有不少女人，她们确实确实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负有振兴德国的历史重任，所以心甘情愿地支持“纯日耳曼血统”的邪说，并愿意为保持纯日耳曼血统而生儿育女。她们全然看不到灾难正在身边发生，因为她们太热衷于眼前的利益，也太相信希特勒“富国强民”的承诺了。当战争使她们成为寡妇，使她们的子女成为孤儿，使她们居住的地方成为废墟时，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才明白过来，可为时已晚。

希特勒时代那些颇有名气的女人都被写入这本书了。我们在知道她们的经历、性格，甚至一定的魅力后，一定不要忘了这些女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与权力结盟。她们在选择人生伙伴和生活取向时，起码在下意识里选择的都是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决定国家、民族和百姓命运的权力。她们不可能对周围发生的残暴行为浑然不觉，否则的话，戈培尔夫人也不会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下毒手，因为她非常清楚“恶有恶报”。当然，她一定也不会想到，胜利者对孩子是不会妄加罪名的。不过，即使她想到了，她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活下来，因为她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他人的命运，包括自己孩子的命运。我想，这就是法西斯的本质，也是我们万万不能忘记的一点。

集中营的出现使很多人对人类产生一种不可遏制的沮丧，也对上帝的存在产生怀疑。半个世纪过去了，人类吸取了一定的教训，但悲剧还在不



停地重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洗牌的是上帝，玩牌的是人。我们既然扮演了如此重的角色，就应该在自己的信仰上多下点工夫。也许，恶魔会永远与人类做伴，但如果我们有了人性，有了如何做人的素质，恶魔打出的牌就不会令那么多人晕头转向了。

2003年6月



## 作者前言

“她们并不盼望担任公职或者做议员，而是更愿意有一个舒适的家、一个可爱的男人，还有一群幸福的孩子。”阿道夫·希特勒曾如是说。纳粹理论家又给“元首”这番不合时尚的描述补充了内容，创造了纳粹理想的女性形象：金发碧眼、亭亭玉立、乐天开朗、勤劳能干，整天守在家里围着一大群孩子忙活。

事实上，只有极少的纳粹官员太太、女伴和情妇符合这些高标准，这一点当时的人都被蒙在了鼓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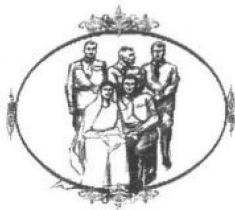
约瑟夫·戈培尔有效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保证了保密工作的万无一失，完全杜绝了对当权者私生活不受欢迎的窥探。所以，人们能够了解的实情极少，知道的不过是一些私下里的传闻，而传播者则往往冒了生命危险。希特勒的“宫廷侍臣”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与世隔绝的群体，鲜有内幕为外人知晓；而纳粹当政者的女人们那常常不同寻常、颇富戏剧色彩的命运，人们知道的一直多是猜测而已。

这些女人在纳粹精英的圈子里到底怎么过日子？她们在官方场合扮演什么角色，私下里又是什么面目？那些被希特勒视作“女能人”的女艺人、女资助人和女政客究竟是何等样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媒体就对那些接受审判的纳粹名媛做了大量报道。但当时许多引起轰动的揭秘材料，以及当事人颇动感情的自我辩解，事后证明都是失实的。

而今人事俱往，尘嚣已息，我得以冷静从容地重翻历史。另外，我还参考了学术界研究第三帝国史的最新成果，查阅了事后公开的保密档案，并且比较了大量当事人和第三者的描述，最终完成此书，力图再现当时纳粹社会颇有影响的一些女性的生平。

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  
维也纳，1998年夏



## 目 录

让理性重返人间

——序中文版《纳粹女人》/李建鸣 1

作者前言 6

希特勒与“德意志妇女” 1

戈林的第一任妻子——卡琳·戈林 13

戈林的第二任妻子——艾米·戈林 35

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玛格达·戈培尔 57

纳粹的“御用”女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 81

纳粹妇女领袖——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 99

希特勒“惟一爱过”的女人——吉莉·拉包尔 109

希特勒的幕后情人——爱娃·布劳恩 133

希特勒的“女门生”——亨里埃特·冯·席拉赫 163

一夫多妻制的倡导者——格尔达·博尔曼 189

盖世太保头头儿的妻子——莉娜·海德里希 219

希特勒的英国女武神——尤妮蒂·瓦尔基里·米特福德 251

第三帝国的传奇女飞行员——汉娜·赖奇 287

Die Frauen  der Naz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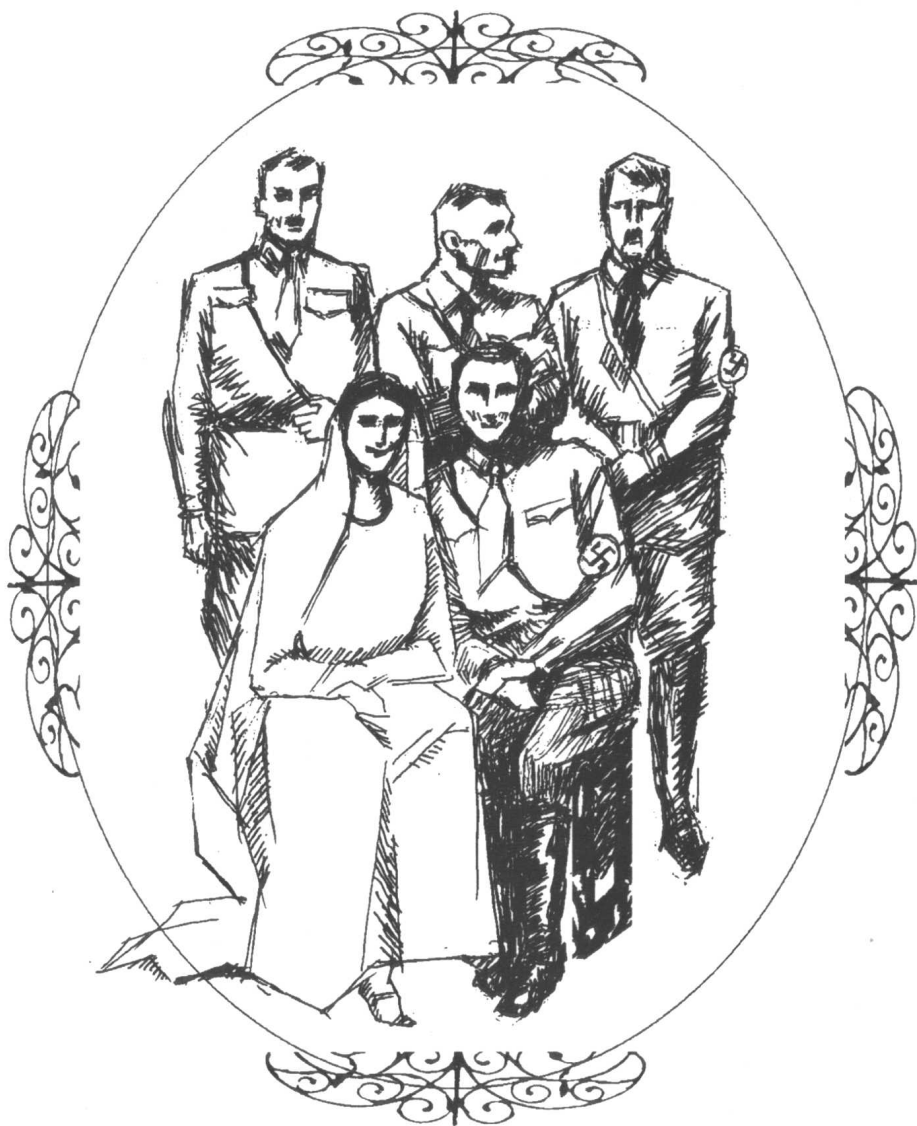
纳粹女人  
2

拜罗伊特女王——温妮弗雷德·瓦格纳 313

盗婴高手——卡罗利妮·拉舍尔 337

译后记 / 班玮 曲俊雅 347

希特勒与“德意志妇女”







1923年4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办的报纸《慕尼黑邮报》撰文评论那些“热恋希特勒的女人”，通篇嘲讽之言，说无数赞助和追慕希特勒的女人聚精会神地听他演讲，激动得热泪盈眶，事后纷纷典当首饰，借钱捐给希特勒。为报复此文及其他类似报道，希特勒命人于1923年11月8日捣毁了这家报社的编辑部。

事实上，从第一刻起，女人们就确实充当了希特勒的忠实帮手。她们为他牵线搭桥，向他提供资助。1926年，纳粹党濒临破产，希特勒急得要寻短见——“破产受不了，不如子弹穿大脑”。希特勒事后说：“最后关头，我们亲爱的布鲁克曼太太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让我结识了埃米尔·基尔多夫（大企业家），我们谈了四个小时。基尔多夫偿清了我们所有的债务，使我党起死回生。”（纳粹军械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施潘道狱中日记》）埃尔莎·布鲁克曼婚前是坎塔库济内公主，其社交沙龙在慕尼黑很有名气，她经常邀请希特勒参加，把他介绍给所有有名气、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士。应太太的要求，大出版商雨果·布鲁克曼不仅为希特勒付房租，还经常让希特勒用自己的豪华公馆招待客人。每逢此时，布鲁克曼太太便会握着双手坐在一边，聚精会神听希特勒说话，像被施了催眠术一般。她对希特勒出奇地慷慨：

“亲爱的希特勒先生！我还有块手表附赠与您，或许您能派上用场……请您明天或周四来一下，看看家具什么的哪些对您有用。”（埃尔莎·布鲁克曼书信）

希特勒并不觉得害臊，他什么都拿。希特勒把从女性崇拜者那里拿来的贵重物品都派了什么用场，是有据可查的：“作为借款担保……阿道夫·希特勒先生留下了……一个镶有白金和钻石的祖母绿项坠……一枚钻石戒指（独粒钻石）……一个威尼斯浮雕烟嘴……一块红绸三角钢琴罩……”（维尔纳·马泽尔，《纳粹党早期历史》）

钢琴制造商贝希施泰因的妻子海伦妮·贝希施泰因，把希特勒介绍给柏林的上流社会，还为其偶像买了一部豪华轿车。“沃尔夫（希特勒的别名），您一定要有一辆世界上最漂亮的汽车。您当之无愧。”希特勒回忆道。她想给他买辆“迈巴赫”，但他喜欢“奔驰”，后来真的得到了一辆，价格高达两万六千马克。（《希特勒秘密谈话录》）贝希施泰因太太在巴伐利亚的上萨尔茨贝格山上有座庄园，希特勒能在那里买下他的瓦亨费尔德



乡间住宅，她做了相当大的贡献，为此希特勒还给她颁发了一枚金质党徽。但是，这并不足以使她免遭肆无忌惮的掠夺。纳粹党办主任博尔曼后来需要在上萨尔茨贝格征用地皮，为“元首”建造避暑山庄<sup>①</sup>，因而没收了贝希施泰因太太的庄园。

纳粹党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女人是党最好的宣传员，她们说服丈夫与希特勒交朋友，空闲时间积极投身政治……为党的利益无私奉献。”比如在班贝格，一帮“典型的德意志妇女”就经常组织茶会，津津有味地谈论希特勒及其随从的事迹。

希特勒懂得如何巧妙地利用女性追随者对自己的好感。在粗野的基层纳粹党人策划巷战，通过残忍的恐怖手段清除对手的时候，他们的“元首”则在各种多由女人参加的文化沙龙里施展奥地利式的魅力，大行吻手礼，为纳粹党开辟新天地，招募新成员，特别是有钱人。然而，一些头脑比较简单的纳粹党人并不能正确评价党主席的所作所为，党内甚至有人指责希特勒“只顾与漂亮女人周旋，忽视了党主席的责任”。

沃尔夫先生——希特勒有时会学着女人的腔调这么称呼自己——“慈母般的女友”中还有一位名叫莉莉·冯·阿贝格的男爵夫人，希特勒时常与她一起散步。这位贵妇不仅捐钱和艺术品给希特勒，而且，据1923年4月3日《慕尼黑黑邮报》报道，连自己的房子都让纳粹党使用。

追随希特勒的女人不仅为这个政治煽动家牵线搭桥，给他提供极为慷慨的经济援助，还对他大搞个人崇拜，而希特勒特别善于利用这一点。他曾得意扬扬地说：“我想，连‘我的元首’这个词都给女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希特勒秘密谈话录》）如同对男人一样，希特勒同样能把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让她们每个人都为他的利益效劳，全心全意听从“元首”差遣是成为纳粹女精英的一个基本条件。在德国政坛，惟有纳粹党推行轻视妇女的纲领，而由于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一些女人连这一点都淡忘了。

纳粹党非常欢迎妇女成为其普通党员，特别是愿意出钱的党员。但是，正如纳粹理论家罗森贝格在《20世纪的神话》一书中所宣称的那样，“有一点必须明确：法官、士兵和国家的领导者必须是男人，现在这样，

<sup>①</sup> 这座山庄名叫贝格霍夫，希特勒经常住在那里。本书中也常用上萨尔茨贝格指代希特勒的山庄。书中常说起某人去了上萨尔茨贝格或贝格霍夫，指的都是去那里见希特勒。——本书底注均为译注，下同。



将来也是”。“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是纳粹运动的一个基本教条，振兴德意志被认为是“男人的事情”。早在1921年，纳粹党全体党员大会就一致决定，“纳粹党领导层和党内主要委员会不得接纳女性”。因为上述领导岗位直接关系到挽救德国人民、种族以及文化免遭衰落和沉沦，纳粹不相信妇女具备这种能力。

希特勒把话说得更简单明了：“我最讨厌女人干预政治。1924年，有那么两个好搞政治的娘儿们出现在我眼前：那个冯·特罗伊恩费尔斯夫人和那个玛蒂尔德·冯·基姆尼茨（婚后随夫姓鲁登多夫）。她们想当国会议员！真叫人受不了！将来牵涉到军事问题怎么办？党的任何基层组织中，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职位，也不能让女人担任……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九的讨论议题都是男人的事务，女人是没这份儿判断力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尽管如此，希特勒心里明白，许多追随纳粹党的人，比如纳粹党总统候选人埃里希·鲁登多夫将军，是受太太的影响才变成了激进的政客。身为医生的玛蒂尔德·鲁登多夫经常发表煽动性的文章，在家里也是说一不二。

希特勒早在1922年就有机会在柏林国民俱乐部向众多社会名流发表讲话，这得感谢维多利亚·冯·迪克森的政治活动。她丈夫后来当上了德国驻英国大使。同样是由于冯·迪克森夫人以及该俱乐部代表的引荐，希特勒才与德国北方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进行了非常关键的初步接触。就是以后，柏林的维多利亚·冯·迪克森政治沙龙也一直都是纳粹政权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经常有各国外交官、贵族、企业界巨头出入。

1935年，希特勒想通过一位英国贵族小姐对英国政治施加影响。希特勒对英国民主制度运作方式的了解非常肤浅，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对缔结德英联盟抱有幻想。古怪的英国里兹代尔勋爵育有六千金，尤妮蒂·瓦尔基里·米特福德是其中之一，和姐妹们一样，她也爱好政治。姐姐戴安娜同情英国法西斯政党，妹妹杰西卡倾向共产党，尤妮蒂则对希特勒如醉如痴。1934年，尤妮蒂去慕尼黑列席了纳粹党代会，最终还与偶像见了面。很快，尤妮蒂便成了希特勒的陪同，身穿英国法西斯制服，在自己车上插上卐字旗，并在英国为纳粹政权游说。希特勒指望通过尤妮蒂与丘吉尔建立直接联系，但这一想法最终并未实现。

尤妮蒂·米特福德命好苦。她曾说“我有两个祖国”，当一个祖国向另





一个宣战时，她于1939年9月3日坐在慕尼黑英国花园的园椅上向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但她自杀未遂，子弹留在了脑部，没有一个德国外科医生敢动这个手术。于是尤妮蒂被送回家乡，十年后才死去。

很长一段时间，纳粹所描绘的理想女性蓝图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潮流和理想格格不入。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里，妇女担任了重要职务。在魏玛共和国<sup>①</sup>时期，德国妇女首次行使了选举权。妇女解放运动的口号开始深入人心，特别是中产阶级很重视女子教育，因为人们看到了现代妇女从业的希望。

纳粹提出了不少关于妇女的主张，比如“男女自古即为两类不同之生物，职责亦不同”，“同男人相比，女人世界小”，这些引起了大多国人的不满。就连在党的最高领导层里，不合时宜和不得人心的纳粹妇女观也遭到了非议。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就妇女和她们的任务进行了激烈辩论。这方面我完全是个保守派。养育孩子是一辈子的事儿。我非常尊重我的母亲，她离理性那么远，又那么贴近生活。如今，女人什么事儿都爱掺和，就是不愿意生孩子，还说这叫妇女解放。不，尽管舆论的力量可畏，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辩论一直进行到凌晨快两点钟……”

纳粹党觉得，只要他们还需要选票，就不得不纠正过激的妇女观。希特勒很快做出了反应。

“元首阐述了关于妇女地位的全新思想。这对下一轮竞选很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在首轮选举中受到了攻击。女人是男人的性伴侣和工作伙伴，过去这样，今后也永远是这样。即使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她们也应该这样。以前是在田间地头，现在是在办公室里。男人是生活的组织者，女人是他的帮手和执行者！这些观点很新潮，把我们高高置于德意志民族的种种怨恨之上。”在1932年3月23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兴高采烈地对上司的随机应变发表了上述评论。

直到纳粹掌权后，戈培尔才满是虚情假意地宣布：“议会民主的阴谋诡计左右了德国政治，我们让妇女远远避开，不是因为我们不尊重妇女，而是因为我们太尊重她们了！”

1928年间，戈培尔还在日记中写道：“不和女人打交道，我就会完全

<sup>①</sup> 指1919年—1933年根据魏玛宪法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共和国。



变成白痴！”一年之后，他又坚定不移地认为：“女人的任务是保持漂亮和生孩子。这话听上去很粗鲁，不合时宜，其实不然。雌鸟为雄鸟打扮，为它孵蛋；雄鸟则外出捕食，不然就是站岗放哨，把敌人赶走。”

1933年纳粹上台后，德国妇女仍然拥有选举权，但在一个极权国家里这是毫无用处的。除此之外，纳粹政权开始肆无忌惮地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排挤妇女。为此目的，早在1933年4月25日，纳粹政权就颁布了《防止学校和高校人满为患法》。这项法律为各类学校规定了犹太人和女性在校生的额度。大学里，犹太学生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一点五，女大学生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纳粹妇女观源自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up>①</sup>，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理论权威又通过他们的论著使这一学说死灰复燃，最具代表性的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20世纪的神话》。瓦尔特·达雷<sup>②</sup>，人称“党的血统和土地神秘主义者”，也以《农民是北欧人种生命的源泉》和《源自血统和土地的新贵族》这两本书为此做出了贡献。

纳粹德国从未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妇女观，所谓“德意志妇女观”，可以说是在纳粹世界观和强权政治的实用考虑基础上自行产生的。纳粹政权提出的“妇女是种族和家庭道德风尚的守护人”等口号掩盖了其真实目的，那就是消灭失业，为战争并向东方移民繁殖人口。

希特勒知道怎么浅显易懂地向追随者说明这一问题。他在1937年11月23日的一次演讲中说：“以往那些自由主义、理智主义的妇女运动……以精神为出发点，而我们的纲领只包含一项内容：生孩子。”这个独裁者持这一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相信，“如果为德意志民族的利益着想……那么每十五年到二十年就应该打一场战争”。

1936年出版的《国家社会主义启蒙》一书给纳粹妇女观罩上了一层浪漫的面纱：“我们要重新拥有真正的女人，而不是打扮得华而不实的玩偶……德意志女人如葡萄美酒。爱她们，大地将鲜花盛开。德意志女人如家庭里的阳光。她们应该保持体面，不与异族嬉戏。我们的民族应该保持纯洁，这是元首的崇高目标。”这样的女人可不好找，于是一个纳粹党人就

<sup>①</sup> 19世纪后期搬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现象并把历史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学说。

<sup>②</sup> 农学家，纳粹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



在《慕尼黑新闻报》上登出了以下这则征婚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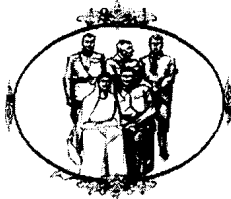
“五十二岁，医生，纯种雅利安人，参加过坦嫩贝格战役<sup>①</sup>，拟卜居乡下，欲觅健康、雅利安血统、不挑剔、节俭、能干粗活、不穿高跟鞋、不戴耳环、最好无财产之年轻处女为妻，婚礼于户籍登记处办理。中间人恕不接待。绝对守口如瓶。”

妇女解放事业当时在德国已取得长足进展，深入人心，不可能说停就停，说改就改。所谓“政治化的女人”，并不像纳粹认为的那样只是“战后现象”。当时妇女从事什么职业的都有，她们珍视由20年代赶时髦的上流社会所塑造的那种新时代妇女形象。比如当时就有女子赛车、女子滑翔比赛和跳伞比赛，“现代妇女”已不仅仅是个流行语。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女飞行员和工程师梅利塔·席勒（婚后是施陶芬贝格伯爵夫人）为代表的一群新女性，根本不可能像纳粹所希望的那样去“纺纱织布”。席勒女机长冒着生命危险做过大约一千五百次俯冲飞行，测试飞机重要部件的性能。她还取得过“女滑翔运动员耐力飞行比赛”的冠军。取得亚军的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贝娅特·克斯特林。后来在二战期间，贝娅特先是在一家飞机制造厂当试飞员，1943年时，她已是德国空军上尉，又被编入运送飞行大队，负责把世界上首批喷气歼击机（梅塞施米特 ME-262 型）送往前线。贝娅特后来嫁给了自己的飞行教官汉斯·乌泽。1944年，身为飞行中队长的乌泽在一次行动中丧生。1945年4月底，寡妇贝娅特带着儿子和保姆逃出了被包围的柏林。战后，贝娅特·乌泽开了一家性商品邮购公司，她的理念和行动对60年代的性解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希特勒本人的妇女观看上去自相矛盾：一方面，他经常言简意赅地发表一些看法，比如，“女人一旦开始思考关于存在的问题，那就糟了”；另一方面，他又给一些女人的事业发展创造机会，比如，他曾委托拥有一家大建筑事务所的女建筑师格尔蒂负责设计上萨尔茨贝格的“元首”山间别墅，还让女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拍摄纳粹党代会纪录片。

汉娜·赖奇（1912—1979）也毫不费力就侵入了男性的领地，成了第三帝国最著名的女试飞员。1937年，希特勒亲自给她颁发委任状，任命她为世界上首位女机长。同年，汉娜又成了世界上驾驶直升机的第一人。

<sup>①</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著名战役。



1938年，她在德国展览大厅开着“福克”直升机完成了世界首次室内飞行，并因此获得了飞行员军功章。1942年11月5日，希特勒又给汉娜颁发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德国最高军事勋章之一），以表彰她“一贯为德国飞机研制事业舍生忘死”。1943年，汉娜首飞火箭推进式飞机。1944年，她成了第一位驾驶喷气机的飞行员。1945年4月26日，汉娜又冒着苏联红军的炮火，驾机飞入重围下的柏林去见希特勒。

希特勒虽然在公开场合总把女人等同于弱智者，私下里却说：“人们常说女人没有创造力，但也有很伟大的女人，男人们在这一点上有失公正，让我很生气。安格莉卡·考夫曼就是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希特勒秘密谈话录》）他还总结道：“如果齐格弗里德·瓦格纳<sup>①</sup>身边没有……母亲科西玛以及与母亲同样重要的妻子温妮弗雷德，他会成什么样子？”他给出的简单答案一定是：一事无成！因为齐格弗里德一直生活在妻子的影子里。他死之后，生于英国的妻子温妮弗雷德在瓦恩弗里德公馆<sup>②</sup>就像一个未加冕的女皇一样，不光将四个孩子抚育成人，还亲手操办了一年一度享有国际声誉的拜罗伊特音乐节。希特勒把她看成自己心目中的“女能人”之一：“这位瓦格纳太太将拜罗伊特与国家社会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她伟大的历史贡献！”（《希特勒秘密谈话录》）

“淑女”作为点缀，在第三帝国总理府的招待会上和希特勒的“宫廷侍臣”中是很受欢迎的。其他情况下强调的则是“妇女在田间，在纺车旁”，纳粹权贵的夫人并不认为这些口号与自己有什么关系。说什么“女人的武器是锅铲”对她们也不起作用，因为大部分官太太都把做饭这种事交给佣人去做了。实际上，最不符合纳粹理想妇女形象的就是那一帮纳粹高官的太太、女伴和女友了。爱娃·布劳恩（希特勒情妇）根本不想放弃名牌时装和化妆品，她还练健美和拍电影。护士出身的玛加丽特·希姆莱非常瞧不起丈夫，根本不把他的意见当回事。艾米·戈林（戈林的第二任妻子）做演员事业有成，卡琳·戈林（戈林原配，病故）则是女政治煽动家的楷模。亨里埃特·冯·席拉赫积极主张活跃维也纳的文化生活。不怎么有名但总是忙忙叨叨的纳粹妇女领袖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也很少围着锅台转。

① 音乐大师理查德·瓦格纳之子。

② 瓦格纳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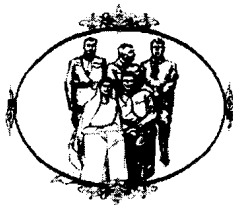


连玛格达·戈培尔这样的纳粹党形象代表都背离官方路线，极力主张尊重女权。戈培尔夫妇因妇女问题常常大吵。1931年8月15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最后就女人和女人的能力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玛格达盛怒之下把我骂了一顿。最终不欢而散。”有一次希特勒还搀和了进来，“（希特勒）说我是对的——女人不该抛头露面”。玛格达并不甘心认输，告别“元首”回到旅馆后，夫妇俩又吵了起来。“原则问题上是没有情面可讲的。”戈培尔在1933年7月22日的日记中得意扬扬地写道。

纳粹权贵中也没有几家按要求养一大堆孩子，只有博尔曼和戈培尔家完成了生育指标。博尔曼是纳粹党书记，权力很大。在那些有名的纳粹官太太中，惟有博尔曼的妻子格尔达·博尔曼各方面都符合纳粹妇女观的要求。她是老党员瓦尔特·布赫的女儿，长得高大健壮，1929年与参与谋杀被判过刑的马丁·博尔曼结婚，婚礼是典型的纳粹式。格尔达共生了九个孩子，对丈夫和“元首”充满幼稚而狂热的信赖，为“事业”愿意做出任何牺牲。她还进行纳粹式的祈祷，并想出了一个可以让自己与丈夫的众多女友在一个屋檐下和平共处的方案，“……把所有孩子都送到湖边的房子里一起照看，我们中没怀孕的那个就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格尔达写给丈夫的信）

纳粹党人一开始还是尊重婚姻制度的。有意思的是，希特勒经常得向人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结婚。早在1920年10月，他就写信告诉一个年轻时候的友人：“至于我的家庭，目前只有一只绝妙的德国牧羊犬和我做伴儿，还没有找到更好的伴儿。我过去是个爱领头闹事儿的人，现在也是，现在和过去一样，我在各个方面尚不具备建立家庭的能力。”1928年，他又在一封信中说：“……我生活不安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才不能下决心结婚……”

纳粹当时提倡婚姻并非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而是认为婚姻是一种理想的“生育制度”。不过，他们算过一笔简单的账之后，就不这么想了，“可惜我们这里的女人比男人多两百万。虽然目标仍然也必须是让姑娘们结婚，但是对找不到男人的姑娘来说，在她人老珠黄沦为老处女之前，能让她生个孩子更好。女人生孩子是自然的天性。有些女人不生孩子就会生病……因此，不如让她有个孩子，从而让生活有点意义，这比让她孤苦伶仃地过日子要好得多。”（《希特勒秘密谈话录》）



有一次，希特勒在戈培尔家当着许多艺术界客人的面谈未婚生育问题，一直谈到凌晨三点。戈培尔在1935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思想很开放，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玛格达则持极端保守的立场。她这样既不聪明也不策略。客人一走，我们就吵了起来……”

纳粹的种族和妇女观念最终导致希姆莱推行被称为“生命之源”的北欧—日耳曼人种养育计划。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向其医生和按摩师透露说：“我建立‘生命之源’家园的出发点是首先满足一种迫切的需要，这就是让那些在人种方面无可挑剔而未婚先孕的妇女能够免费分娩……我让人私下传出消息说，每个想要孩子的未婚单身妇女都可以放心地求助‘生命之源’。由我这个党卫军领袖充当孩子的教父，被派去帮助妇女怀孕的都是在人种方面无可挑剔的男性……”<sup>①</sup>

纳粹自诩解决了妇女问题，自以为非常了解妇女的愿望。希特勒曾在纳粹党代会上说：“德意志妇女总的来说还是想做妻子和母亲。她们并不想当同志，而那些赤色的为人民造福者却试图使自己和她们都相信这一点。她们并不盼望去工厂当工人，并不盼望担任公职或者做议员，而是更愿意有一个舒适的家、一个可爱的男人，还有一群幸福的孩子。”这种想通过极端保守的方式把握当代和未来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纳粹德国放弃利用女同胞在经济和智力方面的潜能，最终只能自食其果。同样，第三帝国在科学研究方面所持的反动态度也很快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对严肃的科学研究，纳粹头面人物不是横加阻挠就是仅仅半心半意地支持，对奥地利工程师汉斯·赫尔比格值得怀疑的大冰河说<sup>②</sup>，他们却很感兴趣。与此同时，被他们赶走的物理学家却在为核战争做准备。同样，纳粹要求妇女甘当“炉边蟋蟀”<sup>③</sup>，也是自作自受。当德国人正小题大做地向口红和指甲油宣战，并禁止妇女在公开场合吸烟的时候，同盟国的兵工厂却把妇女用做了主要劳力。二战期间，德国劳动力匮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

<sup>①</sup> 希姆莱于1935年12月下令实施“生命之源”计划，第一个“生命之源”产妇家园于1936年在慕尼黑附近开始运营，后来又在德国和被占领地区建立了很多。在种族和遗传学上被认为优秀的妇女可以在这些家园里生育。“生命之源”家园常被人讥笑为妓院或“人类种马场”。

<sup>②</sup> 认为宇宙由冰的作用而生成。

<sup>③</sup> 指只知做家务、不考虑自身发展的女人，源自英国作家狄更斯同名小说。



重，而希特勒为自己的观念所囿，迟迟不愿下令强征妇女去工厂做工。

负责军工生产的军械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抱怨说：“1941年年中，希特勒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让部队的装备水平提高一倍……只要确定与英美同样的雇用女工标准就行。当时大约有五百万妇女可供军工业使用，而且希特勒手中还可以多出三百万士兵，可以组建很多师……”尽管事实表明纳粹提出的理想妇女标准根本行不通，但有些人还是一意孤行，策划一些打算在战后实施的计划。这些计划比“生命之源”还要偏激，因而被认为只宜在“最终胜利”后公布。

纳粹精英妇女中的狂热分子格尔达·博尔曼曾怀着满腔热情写信对丈夫说：“最好能在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制定一项类似三十年战争<sup>①</sup>结束时的那种法律，允许健康、优秀的男人娶两个太太（马丁·博尔曼在旁边写了个批注：元首也有类似的想法）。能在这场决定命运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优秀男人太少了，注定无子女而又优秀的女人太多了……我们需要让这些女人也有孩子！”

在征得妻子同意的情况下，马丁·博尔曼除了最要好的女友曼妮娅·贝伦斯之外，还有其他女友。对妻子的上述高论，他自然会举双手赞成：“考虑到决定民族命运的战斗即将来临，你说的绝对没错。”

1943年前后，纳粹政权还真的考虑过要采取大众生育措施，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按照有关计划，所有妇女在三十五岁以前都必须与纯种德意志男性至少生四个孩子。一达到“4”这个幻数<sup>②</sup>，做丈夫的就有义务随时准备另派“她用”。

随着二战的结束，纳粹的这项大众生育计划，连同拟议中的“大众非常婚姻”以及用一夫多妻制取代一夫一妻制等措施，终于未能付诸实施。

<sup>①</sup> 指 1618 年—1648 年在欧洲以德国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

<sup>②</sup> 此处作者借用了物理学概念，幻数指的是原子和原子核结构的壳层模型里表明稳定结构的数字系列。

戈林的第一任妻子——卡琳·戈林









1934年6月20日，纳粹德国举行隆重典礼，把1931年去世的卡琳·戈林的遗体从瑞典迎回德国。这独特的一幕由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负责导演，而创意则来自死者的丈夫——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

葬礼在戈林位于绍夫海德的避暑豪宅卡琳宫举行。他在那里专为爱妻修了一座陵墓。第三帝国国会议长戈林非常关心这次安葬仪式，他巧妙地将其与自己的政治计划结合在一起。选择此时举行葬礼绝非偶然，而是冷静策划的结果。十天之后，发生了所谓“罗姆暴乱”，在这次莫须有的“暴乱”中，冲锋队领袖罗姆被谋杀了。此前，冲锋队领导层已经起了疑心。利用这次“国葬”，戈林和戈培尔巧妙地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此外，为卡琳·戈林举行这次“虔诚的”葬礼——纳粹认为她是早期纳粹运动的女英雄，理应在德意志土地上安息，葬礼也为突袭行动的参与者碰头提供了可信的理由。卡琳·戈林生前为纳粹党鞠躬尽瘁，死后三年，她又为党做了一次贡献。

卡琳的遗体是装在锡制棺材中运往德国的。尽管没有神职人员参加，但运送仪式隆重非常，让人联想起古埃及法老的葬礼。戈培尔办任何事情都很精细，也许这回他真的借用了古埃及人的祭祀礼仪。

仪式开始于瑞典德罗特宁霍姆附近的勒弗，一艘德国鱼雷艇上的全体指战员以及一群瑞典纳粹党人立在卡琳敞开的墓穴旁耀武扬威，以展示他们之间亲密团结的友谊。随后，按照事先周密策划的送葬程序，卡琳的遗体被送上一列经过特殊布置的专列运往德国。此行终点是卡琳宫附近的埃伯斯瓦尔德火车站。沿途建筑物均下半旗，教堂敲起丧钟，一派国葬气氛。列车每经过一站，均有希特勒青年团列队致敬，此外，还有群众聚在站台上向卡琳·戈林表达最后的敬意。专列抵达终点站后，卡琳的棺木被移至一辆敞篷车上，棺木两侧竖立着数根黑色的方尖塔柱，柱上插着熊熊燃烧的祭祀火把。在骑兵护送下，车队穿过绍夫海德前往目的地卡琳宫。12点整，葬礼在卡琳宫正式开始，希特勒亲自出席。在瓦格纳《众神的黄昏》<sup>①</sup>的葬礼进行曲声中，众人抬起覆盖着卐字旗的卡琳棺木，穿过仪仗队列，进入地下陵墓。卡琳的亲眷、外国使节和纳粹政权所有高官都参加了下葬仪式。最后，希特勒和戈林再次下到墓室内向死者告别。

① 瓦格纳歌剧名。

1934年6月,《民族妇女报》为此事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今后每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sup>①</sup>,以及团结在其旗帜下的德国纪念死者的时候,希望人们也会到卡琳·戈林的墓前献上一个花圈,以表达对她的感激和默默的颂扬。德国有像她这样的女人为之生活、奋斗和献身,是一定会长盛不衰的。这位北欧女人的一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样一位真正的女人所表现出的无限忠诚和内在的伟大让我们肃然起敬……”

赫尔曼·戈林和他第一个妻子卡琳(卡琳娘家姓福克,后随第一个丈夫姓冯·坎措),被认为是纳粹时代的模范爱侣,具有重要的宣传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戈培尔博士的“理想家庭”几近比肩。这段北欧女神和日耳曼飞行英雄发生于纳粹早期,即所谓“奋斗时期”的罗曼史,被渲染成了一部讲述一对恋人为年轻的纳粹党勇做开路先锋的英雄史诗。卡琳的姐姐范妮·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伯爵夫人总结说,这对情侣献身纳粹运动的患难之旅包括受伤、逃难和寄居海外,并以1931年卡琳早逝告终,其时正值纳粹事业“进步和上升”之际。卡琳的姐姐自称是德意志-瑞典人,她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一部关于妹妹的传记。

这本关于纳粹运动早期积极分子卡琳的传记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道成了畅销书,并且多次再版。尽管销售市场仅限于希特勒统治的德国,但截至1943年,卡琳传记总销量仍超过了九十万册。人们之所以渴望读这本经宣传部长戈培尔(约瑟夫·戈培尔1933年3月13日开始担任人民教育和宣传部长)审查而获准出版的,是因为可以从中了解赫尔曼·戈林鲜为人知的私生活。戈林是一战时期最成功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后来当上了大德意志帝国的元帅和空军总司令。范妮围绕她妹妹的生活编造了许多纳粹的传奇故事。实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一切要从瑞典说起。1920年2月底,卡琳的姐夫——瑞典环球旅行家埃里克·冯·罗森,回到斯德哥尔摩,刚刚完成对大查科<sup>②</sup>的一次伟大的探险活动。令他极为沮丧的是,他一到斯德哥尔摩便获悉,由于暴风雪呼啸,天气状况极为恶劣,他很难返回自己的住所罗克尔施塔德城堡。由于不甘心离家这么近还遭到阻隔,这位富有而又行事怪异的伯爵便向私人开办的瑞典航运公司求援,希望包租一架飞机返乡。有三个飞行员愤怒地拒

① 即纳粹运动。

② 南美中南部的大冲积平原。



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飞行等同自杀。然而第四个飞行员，一个德国人，当时手头非常吃紧，连冬天穿的大衣都当出去了，再加上对自己高超的飞行技艺非常自信，便答应了伯爵的要求。

这人名叫赫尔曼·戈林，曾经获得过最高无畏勋章——普鲁士荣誉勋章，并指挥过富有传奇色彩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战斗机联队。一战结束后，按《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空军被解散了，私营航空运输也受到严格限制，造成飞行员大量过剩。时任空军上尉的戈林被迫退役，沦为失业者。此外，他还遭受了与女演员凯特·多施恋爱失败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戈林来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开始，他靠代销飞行器具为生，后来他被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前身瑞典航运公司雇用，担任首席飞行员。此外，他还经营一架出租飞机。1920年2月20日，戈林用这架飞机把罗森伯爵送回离斯德哥尔摩大约一百公里远的城堡。这是一次有生命之虞的冒险之旅。戈林在暴风雪中一度迷失了方向。后来他经常说，这是他一辈子最可怕的一次飞行。好在最后他终于把飞机降落在城堡前的博文湖冰面上。

罗克尔施塔德堡有高大的圆形塔楼、厚实的砖墙和宽阔的庭院，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坚固的中世纪古堡。实际上，其主建筑是17世纪造的。直到19世纪末，百万富翁埃里克·罗森伯爵为了实现自己浪漫的骑士梦，才将这座乡间城堡改造成了瓦萨时代<sup>①</sup>骑士堡的模样。看到这样一座建筑，戈林很激动，他想起了自己在纽伦堡附近的费尔登施泰因堡和萨尔茨堡城内毛特恩多夫堡中度过童年时光。费尔登施泰因堡和毛特恩多夫堡当时都是戈林母亲的医生兼情人埃彭施泰因伯爵的房产。1938年，费尔登施泰因堡转为赫尔曼·戈林所有。

罗克尔施塔德庄园内有个摆着兵器和盔甲作为装饰的狩猎小屋，戈林也很喜欢。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朴素的林间小屋总让戈林浮想联翩。最后，当钱对他来说不再成问题的时候，戈林干脆在绍夫海德仿造了一座巨型的林间小屋——卡琳宫。

1920年2月20日，戈林走进罗克尔施塔德城堡时，壁炉里火烧得正

<sup>①</sup> 指1523年—1560年瑞典瓦萨王朝的创立者古斯塔夫一世的统治时期。

旺。巧得很，堆放劈柴的那几根熟铁条上竟然刻着卍字符<sup>①</sup>。这一巧合后来被纳粹利用做宣传。环球旅行家的太太玛丽·冯·罗森以及同名的女儿上前问候，她们还友好地向戈林表示欢迎。后来当大家坐在壁炉前闲聊时，客厅一侧宽大的楼梯上忽然走下了个金发高个儿的年轻女子。见过她的人称她“娴雅高贵，妩媚动人”。她拥抱了冯·罗森伯爵，并向陌生的来客微笑致意。戈林一向认为“最纯粹的日耳曼人出自瑞典”，这个女子在他看来就像是北欧-日耳曼女神。用戈林自己的话说，看到她那对蓝蓝的眼睛，他感到“如同触电一般”。

这个美貌女子名叫卡琳·冯·坎措，当时正作客罗克尔施塔德堡，给姐姐玛丽·冯·罗森做伴。初遇时，卡琳三十二岁，戈林二十七岁。

随后便是一个动情的夜晚。戈林聊起了战时的往事以及自己如何流落到瑞典。喜爱北欧英雄传说和热衷浪漫主义的罗森伯爵激动地唱起了爱国歌曲，两人一直聊到天光放亮。宾主都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崇尚老派的骑士理想，并珍视“北欧-日耳曼文化传统”。两人谈古论今，非常投机。只此一晚，戈林和罗森伯爵便结下了终身友谊。

1920年2月21日上午，戈林驾机，带着伯爵的儿子卡尔-古斯塔夫·罗森上天转了一小圈。卡尔-古斯塔夫对飞行很感兴趣，后来他帮助埃塞俄比亚创建了空军。在一次执行红十字会的慈善任务时，他被人杀害，此是后话。当天，戈林还在伯爵家的留言簿上写道：“1920年2月21日——赫尔曼·戈林，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战斗机联队指挥官。”随后，卡琳带他参观了整个城堡，还领他看了她姐姐的“雪绒花祈祷室”。之后，戈林告辞，不过他与卡琳已约好再见。毫无疑问，这个儿子已有八岁的有夫之妇对戈林也很有好感。

1920年2月时的卡琳·冯·坎措对她与戈林即将开始的热恋可以说是求之不得。这个瑞典美人当时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非常渴望能遇上的一位英雄和冒险家。她与职业军官尼尔斯·古斯塔夫·冯·坎措男爵结婚已经九年，丈夫按部就班的职业生涯让她备感无聊。将来他无非是从一个省的部队驻地换防到另一个省的部队驻地。一想到丈夫的未来如此单调，卡琳浪漫的感情世界就充满了空虚。

<sup>①</sup> 东方古代文化中象征太阳、吉祥等的标志，与纳粹卍字标志方向相反。两个符号的英文都是“SWASTIKA”，在德语里也是同一个词。



卡琳爱幻想的脾性源自其母胡尔丁内（娘家姓比米什）。她满脑子都是富有宗教色彩的浪漫念头，几个女儿都受到了感染。

卡琳的父亲卡尔·冯·福克男爵是上校衔，后来当上了团长。他出身于19世纪移居瑞典的一个威斯特法伦没落贵族家庭。卡琳母亲的原籍是爱尔兰，因为其母是瑞典人，她便嫁到了母亲的祖国。夫妻俩共有五个女儿，卡琳排行第四，1888年10月21日生于斯德哥尔摩。

福克家的女人都比较专断、古怪。不过更主要的是，她们都很浪漫，而且拥有接近世纪之交之人常有的那种深沉而高贵的气质。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玛丽、范妮、埃尔莎、卡琳和莉莉几个姑娘照相时，总爱微微侧着头，一副感伤而陶醉的样子。和母亲一样，她们也乐意逃避平淡无奇的现实生活。幸好家里很有钱，她们可以不问日常琐事，安心生活在她们那个叫“雪绒花社”的奇异的精神世界里。“雪绒花社”是早年她们的外祖母创立的，在自设的祈祷室内，姑娘们经常坐在一起沉思冥想，默默祈祷，此外还举办所谓与亡魂交流的“招魂会”。玛丽对这些活动太感兴趣了，所以她与百万富翁埃里克·冯·罗森结婚后，让人在罗克尔施塔德城堡的一间塔楼小室内设了一个圣坛，为自己也布置了一个“雪绒花祈祷室”。而卡琳，她被认为是斯德哥尔摩最漂亮的姑娘之一，也一辈子与这个家庭宗教小社团保持着联系。

离开罗克尔施塔德不久，戈林就给卡琳写了封信：“我想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因为您让我在‘雪绒花祈祷室’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您无法想像我在那种奇妙的氛围中获得的感受。它是那么安详、美好，让我完全忘却了尘世的喧嚣，抛弃了所有烦恼……”这正是卡琳爱听的话。2月24日她就返回斯德哥尔摩，为的是接近那个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戈林。

两人经常见面。卡琳对姐姐范妮说：“他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那种男人。”后来她又表白说，“就像特里斯坦和绮瑟（瓦格纳同名歌剧中的一对恋人），我们喝下了迷魂酒，一下子就心醉神迷，六神无主。”很快，卡琳就成了赫尔曼·戈林生活中的决定力量，其影响前后持续了十一年。

1920年夏，两人的恋情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卡琳居然随戈林到慕尼黑去见他的母亲，根本不管丈夫、孩子和自己的家人会怎么想。

戈林守寡的母亲弗兰齐斯加过去生活就很放荡。她曾长年与丈夫和情



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丈夫住在费尔登施泰因堡的二楼，而她与当医生的埃彭施泰因伯爵就住在古堡的三楼。尽管自己有这段往事，弗兰齐斯加还是把与一个瑞典有夫之妇恋爱的儿子狠狠训斥了一顿，并要儿子中断这种不道德的关系。从小经母亲行为耳濡目染的赫尔曼对她的警告置若罔闻。

整个6月和7月，这对情人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四处游览。卡琳根本无意隐瞒自己的婚外恋，相反，她不断给焦虑的家人写信或明信片，汇报最新情况，有时还给他们寄相册，以便更形象地再现自己激动的爱情之旅。卡琳是个特爱写信的人，平时一有什么事情就爱写信向瑞典的家人汇报，特别是她母亲，两人感情很深，卡琳把自己与戈林爱情的曲折经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

在巴伐利亚—采尔附近上克罗伊特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山里，这对情侣从一个名叫胡贝尔的农民那里租了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小木屋，还给它取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姜饼小屋<sup>①</sup>。1920年至1923年间，两人时常到此小住。后来，戈林流亡归来后，两人住在柏林，再也没有光顾这幢租期直到1930年的小木屋。小房子至今仍在。

和戈林住在山里的时候，卡琳一面做饭一面给正在法国圣西尔军事学院受训的丈夫写信，说自己离开瑞典来到巴伐利亚，是因为这里有对她“至关重要的新鲜空气”。1920年8月夫妻俩见面时，卡琳又信誓旦旦地对丈夫说，母亲、丈夫和儿子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内容。然而随后她就与戈林一起搬进了斯德哥尔摩卡拉大街5号的一套公寓内，接着又与情人一道去德国南部路德维希二世建的几个王宫游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与这个巴伐利亚国王的精神世界有相通之处。

回到瑞典后，戈林要卡琳尽快离婚。因为担心失去儿子，卡琳一开始不同意。她儿子托马斯放学后经常偷偷溜到母亲和她男朋友那里，兴致勃勃地听赫尔曼叔叔讲飞行员的故事，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尼尔斯·冯·坎措仍然想挽救自己的婚姻，他安排自己与太太和戈林共进了一次午餐，结果三人都觉得很别扭。

不久，这对情人又去了巴伐利亚山区。直到卡琳因为缺钱写信向遭背叛的丈夫求助时，人们才又听到了他们俩的音讯。尼尔斯很快就把钱寄去

<sup>①</sup> 西方圣诞节时特制的一种小房子模样的糕饼。



了，他误认为太太还是愿意回到自己身边的。卡琳却谎称生病要接受治疗，仍和戈林待在一起。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巴伐利亚真是个美妙的地方，如此富饶，如此温暖，和德国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我在这里感到很幸福，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有时我也想家，那只是因为我很想念妈妈、尼尔斯、小儿子以及那些我所爱的人。正是由于这种痛苦的、难以抑制的思念，我几乎总是很难过。噢，亲爱的妈妈，要是我没有疯狂地爱上这个男人就好了……”收到这封信后，卡琳的父母试图说服女儿搬到他们家的夏季别墅去住。这幢别墅在德罗特宁霍姆附近的恩斯霍尔姆，卡琳很喜欢那儿。

然而卡琳却提出了离婚申请。1922年12月13日，她正式与丈夫离婚。尼尔斯·冯·坎措写信告诉岳父岳母：“对她我只有爱。”虽然获得了对儿子托马斯的监护权，已然心碎的冯·坎措此后一直深居简出，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主要是因为处境尴尬，而不是出于兴趣，戈林于1921年开始半心半意地在慕尼黑上大学，读的是历史和经济学专业，当时他只是朦胧地想着将来去从政。然而，第二年就决定了戈林以及卡琳的命运。赫尔曼·戈林认识了希特勒，后者用把祖国从耻辱的《凡尔赛条约》中解救出来，以及与共产党人和犹太人做斗争等口号，一下子激起了他的兴致。对希特勒而言，把这个普鲁士荣誉勋章获得者拉入纳粹党，显然有利于提高党的声望。他立即把一项任务交给了戈林：组建一个他们称之为“冲锋队”的打手队。

1946年，戈林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交代他与希特勒的关系时说：“从见到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彻底被他迷住了。我伸手握着他的手说：‘我将与您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即使人头落地也在所不惜。’”

卡琳见到希特勒的反应与戈林也没什么两样，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她强调的是“这项事业的神圣”。1923年希特勒策划反对魏玛共和国和总统艾伯特的政变失败后，卡琳颇动感情地说：“创造了这些英雄的这场运动是永远不会衰亡的。”她还强调说：“赫尔曼和我愿意为此（希特勒和纳粹党）去死。”

从此之后，卡琳和戈林开始狂热地献身纳粹运动，一直到死。

希特勒本人在谈到戈林、卡琳这对德国-瑞典情侣时倒没那么感情冲



动。有一次，他在靠近东部前线的“狼穴”“元首大本营”里说：“北欧国家的男人真是太不中用了，所以那儿的美女一看上我们这儿的男人就会离开那儿。戈林和他的卡琳就是这样。”（《希特勒秘密谈话录》）

卡琳和戈林分别于1月25日在斯德哥尔摩和2月3日在慕尼黑奥伯门岑他们同居的那套公寓里简单地办了婚事。婚礼上，戈林当年那些里希特霍芬战斗机联队的战友组成了仪仗队。卡琳穿了一身白，头上插的玫瑰也是白色的，手中拿的则是福克家传统的绿白双色花束。两人蜜月之行首先去了意大利，随后又乘车去了巴伐利亚-采尔，路上用了几天时间。抵达后卡琳给儿子写了一封信。

卡琳在信中力图以恰当的方式向十一岁的儿子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为此她并没有完全讲真话：“亲爱的托马斯！玛丽姑妈（卡琳的姐姐）一定已经告诉你，我已和戈林队长结婚了，并且和他住在这里的一幢别墅里。你知道，我的健康状况受不了瑞典阴冷的气候，因此我不得不待在这儿的山里。你一定还记得，戈林队长是我们早在斯德哥尔摩时就认识的。妈妈一个人待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巴伐利亚）时，他待我那么好，那么体贴，因此我发觉自己很喜欢他，希望和他结婚……你要知道，亲爱的，他让妈妈很幸福，你用不着伤心。我们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受影响的。你知道，我爱你胜过世界上的一切……”卡琳还给一位女友写了封信，谈到自己的新夫时，她写道：“上帝啊，能找到一个不用花两天时间就能听懂一个笑话的男人真是太好了。”

被描述得如此不堪的前夫，又不得不出钱为前妻和她的新夫买了一幢体面的房子，还要外加佣人，他们在结婚之前就时常为他们掏腰包。戈林夫妇的新居是一幢新建小别墅，位于慕尼黑郊区奥伯门岑德贝赖纳街30号，离纽芬堡宫不远。特地选择这个到处都是绿地的地方是因为卡琳身体不好，不能长时间住在城里。当时才三十五岁的卡琳患有心绞痛和呼吸困难症，有时甚至会因此昏厥。此外，她还有哮喘、严重风湿、潜伏性肠胃病和贫血等毛病。新房子离市中心很远，当时还没有建直通市里的快速路，乘公交车也很不方便。但这些对卡琳来说都不是问题，因为尼尔斯·冯·坎措为他仍然爱着的前妻买了一辆“奔驰”轿车，还为她专门雇了司机。

卡琳觉得这个多棱多角、部分屋顶用木瓦装饰的迷人小屋正是她理想



的安乐窝。这幢房子至今仍在，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模样完全没有改变；房前的小花园也养护得很好，老树婆婆。小别墅与周围那些朴素的后期建筑构成了独特的比照。

卡琳立即着手布置她的童话之家，并写信向母亲详详细细地描绘了自己努力的成果。玻璃窗都漆成了玫瑰色，在屋里灯光映照下显得格外温馨。家具，包括卡琳那架白色的管风琴，都是从瑞典运来的。地上铺着淡粉色的地毯和白色的兽皮。写字间里也铺着粉色的土耳其土麦纳地毯，与古色古香的桃花心木家具相得益彰。卧室的墙上贴着白色丝质墙布，床顶上配有蓝色织锦华盖。靠背椅、化妆台和窗帘也都是粉色的。戈林的工作间里摆着沉重的橡木家具，铅框玻璃窗上绘着反映骑士生活的各种画面。

餐厅地上有个暗门，下面是这幢房子真正的中心——一个拱形地窖。里面装有壁炉，摆着乡下式样的家具，墙上挂着织花壁毯和兽皮。戈林想有一个自己宫殿的梦想在这里得到了初步实现。这个像个地下墓穴的地窖是早期纳粹信徒理想的聚会场所。大家都很喜欢光顾这里，尤其是戈林这个新党员和太太都很好客。卡琳的姐姐范妮，当时也住在巴伐利亚，在为妹妹写的传记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她（卡琳）还自己下厨为那些忙得筋疲力尽、饥肠辘辘的纳粹党员做饭！她做的那些美味、新奇的饭菜，对一连开几小时会的元首和那些来找他的人来说，真是再妙不过了！”

此时的戈林则在冲锋队的训练方面充分显示了组织才能。他在很短时间内就把一帮“乌合之众”训练成了一支富有战斗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私人部队。1923年4月15日，冲锋队接受了希特勒的检阅，卡琳兴奋不已。她在给儿子托马斯的信中写道：“将来你会为这个我所爱的人，也就是你的继父，感到骄傲的。今天，他让他那支由忠诚的德国小伙子组成的部队接受了元首的检阅，我看见他脸上充满了自豪……他们在他们身上下了很大工夫……把这帮乌合之众真的调教成了一支了不起的部队。只待元首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奋勇向前，重新解放这个不幸的国家……阅兵式结束后，元首拥抱了赫尔曼，并对我说，他现在不想对我丈夫的成就发表评论，因为如果他说出真心话，赫尔曼一定会乐昏了头。我对元首说，我现在已经骄傲得快晕过去了。他上前吻了我的手，然后说，长着这么一个美丽的小脑袋的女人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这也许不是我听到的最文雅的恭维，但是我还是很高兴。”



在卡琳和戈林一门心思为年轻的纳粹党忙碌的时候，尼尔斯·冯·坎措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1923年年中，他在出差的路上袭击了一名同事，因为后者由于同情他而把戈林骂了一顿。他使劲地掐同事的脖子，吓得对方大喊救命，随后不假思索地从正在行驶的列车车窗中跳了出去。当年他就被解除了教官的职务。此后，他的情况越来越糟，最终死于精神错乱。他生前总是尽可能地向卡琳和戈林提供慷慨的资助，使他们能过上奢华的生活，还不时地给他们寄食品。

1923年7月15日，戈林的母亲去世。尽管得了感冒，卡琳还是参加了葬礼，因此得了严重的肺炎，数月之后才痊愈。她写信告诉正在斯德哥尔摩的儿子：“我稍微有点儿感冒。信是在床上写的，因为最亲爱的坚决让我卧床休息……他很忙，事业正在发展……”

当时希特勒和其他一些右翼准军事组织正在准备组建一个战斗同盟，打算效仿意大利法西斯搞一次政变。1923年11月8日，政变真的发生了。卡琳当时因病还躺在床上。她姐姐范妮却一直跟着示威的队伍，目睹了一队冲锋队和突击队队员如何在旁观者的欢呼声中向奥第昂广场进发。希特勒、鲁登道夫将军<sup>①</sup>和戈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快到陆军统帅部时，巴伐利亚警察开了枪。有不少人被打死或打伤——政变失败了。戈林臀部中了数弹，冲锋队的人把他拖到了犹太人巴林的家中。巴林虽然知道受伤者的身份，还是毫不犹豫请来了医生为戈林疗伤，并对他进行了精心的护理。这个犹太人很有可能因此救了戈林一命。

政变之后，纳粹党被取缔，但仍受到其成员的全力拥护。戈林也仍然忠于纳粹信仰。他偷偷越过边境潜入奥地利，从而逃过了惩罚。卡琳在陪同戈林流亡时期写的信充分说明了当时躁动的政治气氛。

1923年11月13日，卡琳写信告诉母亲：“……我们经历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时光，虽然如此，我们活得很高兴！赫尔曼腿被打伤了，创口位置很高（在右股），子弹横穿了过去，离动脉只有半公分。弹洞里进了好些小石子和脏东西，造成伤口严重发炎化脓，并引起发烧和剧痛……赫尔曼真好，他不知道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啊，可他还一个劲儿地为我担心。我们从慕尼黑乘车到加米施去找他的几个好朋友，在他们的别墅里住了几天。

<sup>①</sup> 一战时德国的著名将领。



但是我们发现，他待在那儿，总是要招来好些人在别墅外面欢呼游行。我们觉得最好还是离开，越过边境到奥地利去。于是我们又乘车出发了。在边境附近我们被捕了，荷枪的警察又把我们带回加米施。周围一下子聚了一大群人，到处都是‘戈林万岁’的喊声和对警官发出的‘嘘’声、嘲笑声，激动的人们差一点儿把几个警官给打死。在整个回程中，赫尔曼坐在车上一定难过极了。尽管他自己身心都在经受痛苦的煎熬，却一个劲儿地担心我是不是吓坏了。他的护照被当局没收了，我们被送进一家医院，医院周围布满了看守和岗哨。尽管如此，我们却奇迹般地得救了。赫尔曼被人从医院抬了出去……不到两个小时就利用假护照混出了边境……妈妈，你不要以为希特勒的事业已经彻底无望了，已经被放弃了，不，恰恰相反，现在大家的干劲儿比任何时候都大。我觉得，我知道，他会胜利的，我们还没有走到尽头……初战失利将会使大家为最终的胜利做出更深入、更成熟、更认真的努力。”

到达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后，冲锋队领袖赫尔曼·戈林受到众多希特勒支持者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他住进医院后，前来探视者如潮水一般，从早到晚一刻不停。电报、鲜花和捐款也纷纷而至，还有人为他组织募捐。戈林当时伤情相当严重，体温一再攀升，充满污物的伤口还在流脓，必须对右臀部和右腿做手术。为了给他止住剧痛，因斯布鲁克的医生经常让他服用吗啡，从而使他染上了吗啡瘾。直到他在美国人的监狱中自杀前不久，这一毛病才被治愈。

在此期间卡琳很少离开他的身边。有一次她在去医院的路上被共产党人用石头砸了，断了一个脚趾，于是她干脆就搬到丈夫的病房里住下了。1923年圣诞节期间，戈林的伤情已明显好转，于是他离开病房住进了因斯布鲁克最好的饭店——蒂罗尔霍夫饭店的豪华套间。

卡琳在1924年2月20日写给母亲的信中对他们在因斯布鲁克的近况做了一番描述：“我们住进了一个很棒的、因斯布鲁克第一流的饭店。饭店老板是‘希特勒的人’，他让我们享受的是成本价。我们有间很大的卧室，还带浴室，甚至还有一间舒适的大起居室。吃的也非常好，可以点菜，而且所有东西都打七折。跑堂的都是突击队的人，非常崇拜赫尔曼！……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尽管点菜，不必想着付账的事儿，否则他们会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侮辱。即使我们每次都不付账也没关系，他们愿意为赫尔

曼做出这么一点小小的牺牲。而且赫尔曼在饭店里花的所有的钱，他们绝对是要赠送给希特勒运动的。怎么样，他们做得棒不棒？……”

圣诞之夜，因斯布鲁克的突击队员给戈林和太太送来了一棵小圣诞树，上面装饰着绘有黑红金三色德国旗的蜡烛。戈林当时已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了。不过，鉴于他行动不便，夫妇俩也就没有互赠礼物了。除夕之夜，用卡琳的话说，饭店经理把“所有愿意聚在一起共祝希特勒和戈林‘健康’、‘万岁’的人”都请到了餐厅，大家在德意志旗下兴高采烈地共度了一个良宵。

戈林夫妇平时的生活可就没这么有滋有味了。卡琳的健康状况相当令人担忧，她几乎总是病着，动不动就卧床不起，很难适应一个流亡政治活动家的生活。有时候她还会昏厥，必须注射樟脑才能恢复神志。先后有三个内科医生断定她患有无法医治的心脏病，活不了太久了。在这种情况下，卡琳对自己也就不抱什么幻想了。

有一次卡琳过生日的时候，戈林送给她一个小小的便携打字机。她平时就用这台打字机写点东西。在一篇文章中，她说冬季的因斯布鲁克“就像一盘装得过满的搅奶油<sup>①</sup>”。有时她也给当时还在世的前夫尼尔斯·冯·坎措写写信。此外，她还收集外国报纸上有关已被取缔的纳粹党从事秘密活动的报道，并把它们寄给希特勒。这些剪报都是她亲戚给她寄来的。返回慕尼黑在当时还根本不能指望，因为戈林和卡琳两人都受到了通缉，到处都贴着印有两人照片的通缉令，想越境返乡就得冒着被捕的危险。后来戈林打算向警方自首。他通过经常往返于慕尼黑和因斯布鲁克之间的纳粹党律师罗德博士给希特勒带口信，想征得同意。结果希特勒拒绝了他的请求。他所盼望的大赦也一直没有成为现实。

“我们在慕尼黑的别墅被没收了，账户被封了，那辆汽车（一辆‘奔驰’）也被没收了……当局对我也签发了逮捕令……”卡琳写信告诉母亲。但她并没有气馁，因为她接着又写道：“尽管如此，希特勒一切都极为顺利，他的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纳粹党取得一些小小的成就时，她也要自豪地向瑞典的家人汇报。一旦遭受挫折，她又会安慰家人，她知道他们的看法和她是完全一致的。她姐姐范妮关心纳粹事业简直到了

① 用奶油搅打成泡沫状的一种甜食。



歇斯底里的程度，连戈林都说：“我觉得她太纳粹了！”而卡琳有时也是忙政治忙得把自己的一身病都忘了。除心脏病外，她还患有严重的风湿病。

1924年2月22日，赫尔曼·戈林在写给岳母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处境以及他和卡琳的未来打算：“在审判期间（指审判希特勒和政变头目，1924年2月26日至4月1日），我还想留在这儿。此后，如果暂时回国无望，我们想坐船经意大利去瑞典，因为住在瑞典毕竟更便宜一些，而且比在奥地利要舒服得多……也许我还要在瑞典先找份活儿干，直到我能回德国。我只想返回一个德意志人的德国，而不是如今这个犹太人的共和国。我随时准备再为祖国的自由而战……”

卡琳也赞同戈林的反犹思想。她曾写信向妹妹莉莉谈起她以前的司机舍尔斯霍恩的情况：“他现在没有工作，身无分文。有个犹太人曾表示想雇他当司机，被他拒绝了。当时他说：‘谁如果曾有幸为希特勒或戈林干过，再让他从一个犹太人那里得到份工作，他一定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我宁愿饿死也不伺候犹太人。’瞧他话说得多狠，多绝！但这么穷的一个人竟然还这么自尊，真是了不起……把这事告诉爸爸妈妈！”

1924年2月26日，对希特勒的审判在慕尼黑开始。戈林夫妇让罗德爾博士把审判情况详细地告诉他们。卡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心里慌得很，大部分时间都在想希特勒的事，愿上帝保佑他。我得给母亲写信，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些……”事后证明，卡琳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在陈述案情时，有关方面就对抢劫钞票以及纳粹分子在向陆军统帅部进军过程中杀死四名警察的情况避而不谈。巴伐利亚的司法当局表现得极为宽大，仅判希特勒五年监禁，而且他只需要服刑六个月便可以申请假释。希特勒原来还担心会被驱逐出境，因为他有奥地利国籍，但最后这种事也没有发生。

在希特勒被宣判后不久，卡琳于1924年4月代表戈林前往慕尼黑，想办法弄点钱。她先找上了鲁登道夫将军，请他资助“为祖国做出那么大牺牲”的丈夫。鲁登道夫却说，为祖国做牺牲的人不应该要求回报。随后卡琳又去兰茨贝格要塞监狱找希特勒。希特勒也没有给她一分钱，倒是赠给她一张自己的照片。同样的照片兰茨贝格要塞的大门上也贴了一张。在希特勒服刑期间先后前来探监的大约五百人中，有很多人都得到过这么一张照片。送给卡琳的照片上有希特勒的亲笔题词：“赠给尊敬的冲锋队指挥

官太太卡琳·戈林女士，作为1924年4月15日访问兰茨贝格要塞的纪念。”希特勒还想让戈林完成一项任务——去意大利与墨索里尼建立联系，请他资助德国纳粹党。

希特勒的愿望对戈林夫妇来说就是命令。尽管他们在慕尼黑的那幢住宅已经被卖掉了，口袋里的钱也所剩无几，他们还是很听话地立即动身前往意大利。然而墨索里尼既没有接见戈林，也没有出钱拯救纳粹党。此行失败后，失望、疲惫且又囊中羞涩的戈林夫妇绕过德国，经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来到瑞典。这对夫妇此时一个患有不治之症，另一个则有吗啡瘾，他们在卡琳娘家得到了帮助。两人在欧登大街23号租了一幢小房子，戈林随后便开始寻找工作。开始戈林还不想让人知道他有毒瘾，但有一次他实在熬不住了，竟当着岳父母面要从窗口跳下去，这下就再也瞒不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戈林去找了福克家的一个姻亲、矫形外科医生尼尔斯·西尔弗舍尔德。但医生拒绝给他吗啡，并建议他去戒毒。戈林先后进了三家医院治疗毒瘾，费用由卡琳的父亲冯·福克上校承担。在阿斯普登斯疗养院，有一次他毒瘾大发，竟然撬开药品柜，并威胁工作人员。据病历记载，医生后来还是把吗啡给他了，因为“她（卡琳）担心上尉急了会杀人的”。经卡琳同意，院方给戈林穿上了约束衣，将他转往卡塔琳娜医院，又从那里转入了兰布罗精神病医院。医院的病历上写道，“此人憎恨犹太人，是个粗鲁而又优柔寡断的瘾病患者，对人总是怀有恶意，但对自己的家人却一往情深。”1925年10月7日，医院以为戈林已经痊愈，放他出院了。然而很快戈林又旧病复发，不过他把毒瘾掩饰得很好，只有太太卡琳他瞒不过。她的心脏病在迅速恶化。

1927年，戈林独自一人返回德国，以恢复与希特勒的联系以及以往在党内的地位，当时他已被纳粹党除名。他回国后不久，仍留在斯德哥尔摩的太太给他写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目前情况下，说真话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而且你有权知道我的真实想法，因为你爱我，做什么事都为我着想。所以你也得知道，我并不怕死……我只是希望上帝能够显示他的意愿，因为我知道，上帝的意愿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最亲爱的，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死亡也就是安息，就像永久的长眠一样，一切都忘却了。但我坚信，我们在天上会重逢的。我当然愿意活着，为了不让你伤



心，也是为了托马斯。因为我爱你和托马斯胜过一切，所以我愿意，是的，非常愿意一直和你们俩在一起……最亲爱的，你的健康是我最大的忧虑。实际上你的健康受到的威胁比我要大得多。最亲爱的，我一直在为你担心。你是我的一切，我求你，趁早尽一切努力把毒瘾戒掉。现在有那么多事情必须由你去做，你得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工作压力，你不可能说戒就戒，这我完全理解，但是要有节制……能忍多久就忍多久。你一定会很遭罪，一定会不舒服，但是为了我你还是戒掉吧！我是那么的爱你……吸毒无异于自杀，你每天都要丧失一部分肉体 and 灵魂……你将被恶魔和邪恶势力所左右，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救救你自己，也救救我吧！”

范妮在为妹妹卡琳写的传记中当然没有提及戈林的毒瘾。她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卡琳对纳粹党的忠诚，她还叙述(编造)了一些希特勒逸事，详细描述了戈林如何成功地重新入党以及他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希特勒推举戈林为纳粹党参加1928年5月大选的主要候选人后，戈林要他生病的妻子到柏林来，好与他分享胜利的喜悦。卡琳不顾长途旅行的劳累，于大选前三天抵达柏林。她在戈林位于贝希特斯加登街16号的那套小公寓里，立即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旅行挺顺利，就是有些劳累……戈林到火车站接我……然后又坐车到了这里。赫尔曼在这儿有一间带阳台的大房间，位于房子的拐角处，阳台上阳光明媚，丁香花盛开。我洗了澡，休息了一小时……然后就一连坐了三个小时的车，中间还上过一条赛道，时速竟达每小时一百一十五公里！整个柏林一片大选气氛，选举星期天举行。他们已经开始相互残杀了。每天都有共产党人打着红旗，手里拿着点着的《圣经》在城里游行。他们总能碰上希特勒的人，他们也打着红旗，上面印着卐字。于是双方便会发生争斗，互有死伤……”5月21日，卡琳给母亲拍了份电报：“赫尔曼昨天当选了。你的卡琳。”

纳粹党共获得了百分之二点八的有效选票，共有十一人进入国会。新一届国会开幕那天，卡琳在场，当时她觉得自己已是个十足的纳粹党人。她注意到了共产党人的强大，但认为他们不过是“几个彻头彻尾的罪犯”。她还觉得，除希特勒党的议员外，许多议员显然是犹太人。1928年秋，戈林夫妇坐飞机去了趟苏黎世。当时他们已经不再为钱发愁了。回柏林后，夫妇俩在巴登申街7号租了一大套公寓。

有一次卡琳和戈林到慕尼黑让纳粹党的“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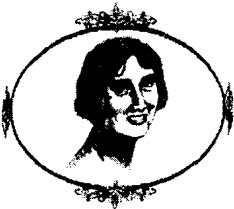
夫曼拍照，从而认识了他的女儿亨里埃特，并邀这个小姑娘到柏林去玩。亨里埃特在回忆录中谈到她访问戈林家的情况时写道：“……虽然住的是一套面积不大的公寓，而且在楼上，但戈林却经常请客人到家里来……普鲁士亲王、黑森亲王、瑞典的朋友……对这位议员感兴趣的大企业家……卡琳特别迷人，赫尔曼则是个天生的东道主，他自己搅蛋黄酱，还把啤酒给冰上了。他们一直让我玩到最后一个客人走。然后我就睡在长沙发上……”（亨里埃特·冯·席拉赫，《辉煌的代价》）

虽然已病入膏肓，但卡琳还一直在柏林社交界不知疲倦地为纳粹党做宣传，劝人入党。她在一封信中写道：“……然而我觉得这么做值得，我们的队伍在不断壮大，我们为希特勒和他的事业招募了很多人。奥古斯特-威廉（·冯·霍亨措伦）让我们以及维德夫妇（维德亲王）认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

有时候卡琳的瑞典亲戚也会来访，比如她的未婚姐姐埃尔莎。她在给朋友写信时对柏林的纳粹气氛深表惊讶：“卡琳和赫尔曼带我们一起去体育馆参加某项活动。我们刚走出几步就见到许多年轻人高举手臂狂喊。我吃惊地四下张望，然后问：‘怎么了？谁来了？是哪个王室成员吗？’天啊，原来他们是在向赫尔曼致敬。看来他深受这帮人爱戴……”

戈林夫妇对他们在慕尼黑的那幢房子被没收仍然耿耿于怀。如今戈林虽然已经当上议员，他还是得考虑到自己在为纳粹党工作过程中干过不少违法的事，随时可能受到起诉，并被勒令赔偿他人的财产损失。于是1930年10月2日，退役上尉赫尔曼·戈林和太太去拜访了一位公证人，申请取消丈夫对财产的管理和使用权，并将此注册到财产法律登记处。妻子随嫁带来的财物都详细开列了清单，戈林家书房、会客室、餐厅、卧室、客房以及佣人住房内的所有值钱东西都被列在清单上。那时的戈林就对收藏波斯和中国的地毯、老式家具、油画以及各种各样的小装饰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卡琳的风琴、吸尘器和各种铝锅也被列在财产清单上，以防将来被没收。1930年10月13日，身患重病的卡琳再次来到柏林参加国会开幕式。当时国会中已有一百零七名身着褐衫的纳粹党议员。

戈林夫妇的社会活动非常繁忙。威廉王储、奥古斯特-威廉·冯·霍亨措伦（人称“奥威”）及其弟弟艾特尔-弗里德里希、维克托·维德亲王及其太太玛丽·伊丽莎白、冯·迪克森夫人、弗里茨·蒂森，还有纳粹党的头



面人物，都是他们家的常客。卡琳通常只能躺在长沙发上欢迎他们。假如她病得特别重，那么就像她1931年1月4日在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客人们只好将就着吃些简单的不太精致的饭菜，比如豌豆肉汤和瑞典苹果蛋糕加香草汁。

1930年圣诞节期间，卡琳病情再次恶化，她知道自己活不长了：“……12月24日我发烧到了三十九度五。白天我忙着装饰圣诞树，想想最后还有什么事儿要做，后来又把礼物包了起来。8点整，戈培尔来了，他将和我们共度圣诞之夜。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一包礼物，它们是那么可爱，而且考虑到了每个人的特点……突然我浑身冷得直发抖，从沙发上倒了下去……”

戈林的毒瘾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戈培尔在1931年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冯·迪克森夫人（维多利亚·冯·迪克森）告诉我，戈林又开始吸毒了。真是太可怕了。不能再生他的气了，因为他脾气不好都是毒瘾造成的。我得对他留点儿神……”2月20日，戈培尔又在日记中抱怨道：“……他（戈林）患上了自大狂。都是吗啡瘾造成的……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得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不能让他再这么堕落下去了……”1931年1月29日，戈培尔在日记中还提到了卡琳：“……戈林告诉我，他太太病得很重，看样子活不长了……”2月中旬，他又谈到卡琳情况有所好转：“……到戈林家喝咖啡。漂亮的卡琳仍躺在床上，不过气色挺好，有我在她很高兴。我非常敬重她。”

此后一段时间，戈林几乎总要代表纳粹党到各地发表演讲，而他太太则时常住进疗养院疗养，比如在巴伐利亚克罗伊特的那家。疗养期间，她爱刺绣，为丈夫设计式样奇特的衣服，还看很多书。别人都说，只要她在柏林，就会对丈夫产生很好的影响。尽管戈林平时说话很粗鲁，但当着夫人的面，他一般还比较心平气和，比较理智。

戈林家那辆“奔驰”已于1923年11月被没收了。作为补偿，希特勒于1931年7月又送给这个手下忠实干将一辆新的“奔驰”。“元首的关心和爱护”让戈林夫妇很受鼓舞，他们立即开上这辆车开始了穿越德国、奥地利，最终目标是瑞典的观光旅行。卡琳当时身体非常虚弱，为了节省体力，她尽量少离开车，连饭也坐在车里吃。经过德累斯顿时，他们见到了希特勒。根据范妮·维拉莫维茨的记述，卡琳一瞧见希特勒就情不自禁地



说：“一旦整个德国都认识到希特勒的重要性，一个新的时代就到来了！”

1931年9月25日，也就是他们抵达瑞典的第六天，卡琳的母亲胡尔丁内·冯·福克病逝，她走得很突然。母亲之死使卡琳深受打击。1931年10月17日，她本人也死于心脏病突发。当时戈林已返回德国。灵柩在“雪绒花祈祷室”里停放数日，葬礼是在她四十三岁生日那天举行的。卡琳被安葬在福克家夏季别墅德罗特宁霍姆宫附近的勒弗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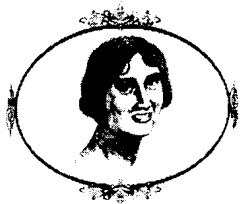
戈培尔在日记中从同志的角度对痛失爱妻的戈林作了一番描述：“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刻得悉爱妻已经永远离开了自己，他表情一下子就呆滞了。但是他一刻都没有彷徨。他坚定地、一丝不苟地继续走自己的路，做元首的坚强卫士。这个有一颗童心的正直的战士……”

戈林与亡妻的瑞典亲属一直保持着联系。每逢有什么纪念日，他都要给他们寄去插满红白两色鲜花的卍字形花盘。1932年，戈林参加了布里吉塔·冯·罗森的婚礼，并在婚宴上提议大家为新德国和纳粹党干杯。

纳粹夺取政权之后，跟随丈夫来到异国他乡，和丈夫一样对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满怀热情，并且总是给予丈夫鼓励和支持的瑞典女子卡琳，成了纳粹政权的偶像。纳粹政权准备在“最终胜利”后编纂一部详尽的第三帝国史，并在其中对卡琳的一生做官方评价。这一计划没有实现。想了解卡琳的读者能找到的材料，除了范妮·维拉莫维茨编的那些故事外，也就是埃里希·格里茨巴赫为戈林写的那部拙劣的传记了。

一向以其庞大而高效著称的纳粹宣传机器也充分利用了这个发生在德国飞行员和瑞典女贵族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它或多或少为纳粹宣传提供了一些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素材，而这恰恰是被主要从事煽动和蛊惑的官方新闻媒体所忽视的。卡琳和赫尔曼·戈林的浪漫史，为开创新型的“宫廷”新闻报道提供了依据。在这些报道中，占据主要位置的通常是那些新近得到提升的纳粹精英们。当时那些充满虚情假意的出版物中，有一本题目就叫《德国式爱情的赞歌》，其目的显然是试图用纳粹党的思想鼓动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且其欣赏水准只停留在阅读库尔茨-马勒<sup>①</sup>小说的读者群，同时，也可以取代已经在德国销声匿迹的马路新闻。可以说，卡琳和赫尔曼·戈林的故事弥补了已经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德国人民思想体系

<sup>①</sup> 德国当时红极一时的通俗小说女作家。



的一个缺憾。

卡琳本人把纳粹主义视作一种替代宗教，就像她外祖母的“雪绒花社”一样。她觉得所有好的、理想的、高贵的东西都融合在这个运动之中。她以她那夸张而又充满宗教幻想的方式把希特勒奉为救世主，认为他将把德国从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并将带领德国走向光明的未来。卡琳在1931年1月4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个体在这一切面前是那样的软弱无力。在此和其他一切事情上，我把希望寄托在惟一一个人和惟一的事业上，但愿希特勒有朝一日能夺过这艘正在下沉的航船的舵轮……”

对卡琳来说，希特勒是个“对真理充满热爱的人才”，她钦佩他的“豪侠”与“正直”。不管遭受什么样的挫折，她始终坚信纳粹运动必将取得成功。卡琳是纳粹帝国中那帮“理想主义者”的化身，他们对纳粹主义的盲目热衷使自己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1933年10月“国会纵火案”正在调查之际，戈林来到瑞典凭吊亡妻，在她的墓前献了一个由鲜花和绿叶组成的卐字形花圈。11月8日，花圈被人毁了，带有卐字标志的墓碑上，有人用瑞典文刻了几句话：“我们几位瑞典人对德国人戈林来亵渎墓地感到很愤怒。他的亡妻自可在地下安息，但请不要在她的墓碑上为纳粹德国做宣传。”戈林当时正在风景秀美的绍夫海德建造豪华的乡间别墅卡琳宫，这起毁墓事件使他决定在别墅内修建一个地下陵墓，然后把妻子的遗体迁过来。

然而卡琳宫的地下墓室也并非卡琳·戈林最后的安息地。1945年春，苏联红军越来越逼近绍夫海德，戈林下令炸毁他的夏季别墅，卡琳的地下墓室也一并被炸毁了。而在此之前，人们已经把卡琳的遗体从锡棺中移出来，埋到了附近的林子里。1945年5月，红军士兵为了寻找戈林匿藏的财宝，对有关地区进行了一次彻底搜查，并把卡琳的新坟也毁了。当地的守林人把卡琳的尸体转移到一个安全地点埋了，并且通告了死者的亲属。而此时东德已经建立了共产政权，福克家要是正式向东德当局申请把卡琳的遗体转运回国，是绝对不会获得批准的。在这种情况下，范妮·维拉莫维茨便去找住在柏林的瑞典牧师埃里贝特·扬松帮忙。两人共同拟定了一个完全可以给侦探小说做素材的行动计划。首先，扬松说服那个守林人，让他悄悄掘开墓穴，把卡琳的遗体放进一个袋子里，并绕道把尸体运到柏



林。随后扬松牧师自己参与了行动。他为死者编了一个假名字，并伪造了有关身份证明，于1951年2月3日将尸体在维尔默斯道夫火葬场火化了。

不久之后，扬松带着骨灰盒前往瑞典。中途他在汉堡稍事休息，当他回来准备开车重新上路时，发现车子已经被撬，这位乐善好施的牧师放在车上的所有不值钱东西都失踪了，惟独骨灰盒幸存，因为它对窃贼来说显然一点用都没有。牧师因而能在不久之后把骨灰盒连同火化凭证一并交给了福克家。卡琳的家人在家里为她举行了追悼会，随后把她的遗体葬回了勒弗公墓中她原先的墓地。这是卡琳第五次下葬。

戈林的第二任妻子——艾米·戈林







中世纪向贵妇人大献殷勤的骑士，常称对方为“高贵的夫人”。在与普鲁士总理——后又成为帝国元帅的赫尔曼·戈林结婚后不久，艾米·宗内曼竟也得了这么个夸张的称谓。用这种过时、高雅的方式称呼艾米，让一些演艺圈子里的人尤其觉得好笑，他们在她还是地方小演员的时候就认识她了。维也纳的女歌剧演员海伦妮·冯·魏因曼曾讽刺道：“上帝啊，大家居然这么称呼艾米！她还不是这么高高在上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那时谁用一杯咖啡和两个半先令就能把她搞到手。”如此侮辱戈林的夫人，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由于一个“正直的”纳粹党人把她告发了，魏因曼女士因侮辱“帝国第一夫人”立即被捕，在审问时遭到了残酷虐待。她最后被判三年监禁，在施塔德海姆服满了整个刑期，1943年出狱时已经病得快死了。

虽然的确有很多写给帝国第一夫人的文件、申请和书信都用了“高贵的夫人”这个称呼，但第三帝国灭亡后，艾米·戈林在法庭上作证时却说，并非她本人或她丈夫想要人这么称呼她，她认为这个称号是在民众中自发产生的。究竟是谁把这个称呼安在艾米头上已无可考证，但这一称号的始作俑者却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他曾计划为“高个儿、健壮、高雅，在生理和智力方面出类拔萃的女子”设立专门的纳粹学校，并让其毕业生获得“高贵的夫人”的称号。

按官方的说法，艾玛·约翰娜·亨妮（艾米）·宗内曼生于1894年3月24日，实际上很可能是1893年，甚至更早。她的出生地是汉堡。父亲很会做生意，在汉堡开了一家巧克力工厂，买卖兴隆。艾米长得很像父亲。她在回忆录中谈到父亲时写道：“他是个真正的乐天派，高高的个子，金发碧眼，极富幽默感，典型的北德人！活到八十二岁，身体一直很棒！”

艾米在家行五，一直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十二岁时，她看了一场莎士比亚的话剧《威尼斯商人》，于是狂热地爱上了演戏，而且除此之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女儿雄心勃勃地想当演员，做父亲的却坚决反对。“你长大了应该结婚，好好伺候男人！”父亲说。她母亲年轻时就想当演员，因而很愿意成全女儿。她向女儿保证将支持她，但有一个条件：艾米必须先学会做家务！巧得很，1911年春，母亲在《汉堡外国人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汉堡塔丽娅剧团的导演利奥波德·耶斯纳计划开办一所戏剧学校，并将为两个特别有天分的人提供奖学金。根据艾米回忆录，母亲当





时对她说：“如果你能争取到这个免费学戏的机会，那你父亲也就会同意你去当演员。”于是小艾米便学着演歌德名剧《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格雷岑，当着导演面朗诵了台词。结果导演很满意，艾米因而获得了她渴望的免费学戏的机会。十八岁时，艾米在地方上开始了演艺生涯，受聘于奥西希市剧院。后来她又到慕尼黑演戏，在那里认识了年轻的同行卡尔·克斯特林。两人于1915年夏订婚。1916年1月1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两人在的里雅斯特举行了婚礼。战争结束时以及奥匈帝国解体后一段时间，艾米在维也纳人民剧院当演员。此后她又受聘于斯图加特和威斯巴登的剧院。她与克斯特林在战乱时期缔结的婚姻在和平时期没有经受住考验。此时两人只是形式上的夫妻，在事业上却各走各的路。20年代初，这对已然分居的夫妇正式离婚。

1922年，艾米请求魏玛德意志国家剧院总监弗朗茨·乌尔布里希给她一个演“年轻女主角”的机会，结果应邀在席勒的《皮科洛米尼》（席勒的戏剧三部曲《华伦斯坦》中的第一部）一剧中客串华伦斯坦将军之女泰克拉一角。她演得很成功，因而与剧院签了长期合同，本人也顺理成章地移居魏玛。此后十年，艾米一直生活在这座歌德和席勒生活过的名城，一门心思演戏。她先后演过《浮士德》中的格雷岑、席勒诗剧《唐·卡洛斯》中的王后，还有莱辛<sup>①</sup>的悲剧《爱米丽雅·伽洛蒂》和弗里德里希·黑贝尔<sup>②</sup>的散文悲剧《阿格妮斯·贝尔瑙厄》。她不仅有演剧院所有传统剧目中的重要女角，还演过赫尔曼·巴尔<sup>③</sup>、奥斯卡·王尔德<sup>④</sup>、亨利克·易卜生<sup>⑤</sup>等人的戏。这段时间，艾米每天都过着平静而有规律的生活：上午排练，中午在金锚餐馆吃饭，下午和几个同事一道在凯撒咖啡馆愉快地聊天，最后便是一天的高潮——晚上的演出。

接近三十八岁时，艾米意识到自己的事业已经发展到顶点，或许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无论如何，将来她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意外之喜了。

这她可就大错特错了。1920年至1940年，作为图林根首府的魏玛，

① 1729—1781，德国戏剧家、评论家、哲学家。

② 1813—1863，德国戏剧家。

③ 1863—1934，奥地利戏剧家、小说家。

④ 1854—1900，爱尔兰诗人、戏剧家。

⑤ 1828—1906，19世纪挪威最重要的戏剧家。



不光是个戏剧名城，而且是纳粹运动的一个据点，1926年纳粹党还在这座歌德之城举行过党代会。魏玛的纳粹党人很早就喜欢搞个人崇拜，党内的头面人物来这里总会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很愿意来，也经常来。

于是1932年初，艾米·宗内曼遇见了赫尔曼·戈林。当时他是陪同希特勒参加完一个纳粹党活动后找上凯撒咖啡馆这个戏剧界人士聚会场所的。希特勒平时总爱找机会与艺术家接触。据艾米在其回忆录中称，尽管戈林当时已被认为是纳粹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但一开始她还是错把他当成了戈培尔。

当年春天，艾米和戈林又在魏玛邂逅，两人一道在拜尔维德尔公园散步。戈林与她聊起了他1931年去世的妻子。当时艾米的母亲刚过世不久，戈林对亡妻的一往情深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这位鳏夫深表同情，这又使戈林对艾米颇有好感。出于感激，他赠给她一张亡妻的相片。艾米以前见过卡琳一次，但两人从来没有说过话。这次有关卡琳的谈心一下子拉近了戈林和艾米之间的距离。艾米事后对一位女友说：“我终于认识了赫尔曼这样一个和我的想法比较一致的男人，真是幸运……”不久之后，戈林前往直意大利旅行。他从卡普里给艾米拍了一封电报，向她表示爱慕，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明朗。后来戈林又利用到魏玛纳粹党集会上发表讲话的机会与艾米进行了一次深谈。艾米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独自一人送我回家。这段路不长，却决定了我未来的生活。”

1932年7月31日大选后，戈林爬上了国会议长的宝座。这个纳粹党政客与女演员之间的频繁接触，成了小城魏玛每日议论的话题。艾米也时常到柏林戈林家做客，这当然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戈林当时就已显露出追求奢华的倾向。前妻还在世的时候，他那套位于巴登申街的公寓就已经布置得很舒适了，但1932年8月，戈林又将公寓整个改造了一番，面积也进一步扩大，占了整个楼层。原先挺温馨的五个房间的隔墙被打掉了，内部重新间隔。巨大的房间里布置了一人高的哥特式立灯以及老式家具，墙上挂上了名贵的圣母像。起居室的墙上有一幅织花挂毯，戈林常爱指着上面用红丝线绣的几个古堡对客人说：“这些都是我祖先的城堡和宫殿！”

来戈林家做客的人都知道他爱吹牛，他有吗啡瘾也不是什么秘密，唯独艾米还不知道这一点。有时她会在戈林的夏季别墅卡琳宫小住，客人来时戈林就会告诉他们，这是他的女秘书。不过这两个年近四十的人演的这



出喜剧骗不了任何人。

艾米身高体壮，一头金发。在戈林看来，她和亡妻卡琳一样，都是那种“日耳曼-北欧型的女人”。她这个知交和耐心的安慰者，对丧妻不久的戈林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在戈林与艾米的关系中，卡琳的影子始终存在。艾米很快意识到，她只有慢慢地通过他亡妻这个间接渠道，才能赢得戈林的爱慕。她没有与死者争风吃醋，对戈林经常变着花样祭奠死去的卡琳，她也能容忍。在这一点上，艾米很明智。

戈林在柏林凯撒达姆街 34 号的新住宅里有一个专供纪念卡琳用的房间，里面按卡琳生前的格局摆着她用过的家具、白色风琴以及其他个人遗物。只有戈林才能踏入这片圣地。在卡琳宫中也有很多死者的相片。卡琳宫附近有个湖，湖畔船屋中停泊的游艇名叫“卡琳一号”、“卡琳二号”。直到 1936 年，戈林才将一个朴素的狩猎小屋命名为“艾米宫”。

1932 年底，戈林和艾米一道过了圣诞节，随后又带着她送的圣诞礼物去了瑞典，他要在罗克尔施塔德城堡与罗森一家共度除夕。他写信告诉艾米：“你送我的收音机正在播放瑞典广播电台的音乐，真是太好了……我们大家愉快地谈起了你。亲爱的，在此我要对你的爱、你为我做出的牺牲和为我做的一切表示衷心感谢。愿我们来年依然幸福安康。”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成了德国总理。为感谢戈林多年来所做的努力，希特勒把他和另外一名纳粹党人拉进了联合政府内阁。艾米·宗内曼立即赶到柏林参加庆祝。她站在凯泽霍夫饭店希特勒套间的窗前，观看纳粹党为庆祝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而举行的火炬游行。当戈林在对面总理府的凸窗前向众人介绍希特勒这个“德国年轻的领袖”时，艾米觉得自己仿佛也置身其间，亲身经历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由于担心共产党在最后时刻捣乱，戈林事先还为艾米准备了一把左轮手枪。

1933 年 2 月 27 日，柏林的国会大厦起火。戈林本来就计划采取行动打压共产党人，国会纵火案为他立即以最野蛮的方式与政敌算账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怀疑火是国会议长戈林自己让人放的，目的是以此诽谤左翼政党，特别是共产党。艾米·戈林却一直认为这绝不可能，并用事发当天戈林与她的一次通话作为证据。戈林当时在电话里对女友喊道：“家人的照片！为什么我偏偏把我珍贵的最宝贵的东西拿到那儿去！”根据经验，艾米知道戈林指的是他亡妻的照片，那是他绝不



会拿出去做牺牲的。艾米为戈林做的这番辩解听起来很可笑，而且摆不上台面，但却完全符合戈林的性格特点。他既是个肆无忌惮的政客，同时又很多情，是个念旧的人。近期的研究成果排除了戈林是纵火犯的可能性。

1933年4月11日，戈林被任命为普鲁士总理，这对艾米的事业发展是有好处的。由于戈林出面说了话，她被著名的柏林剧院聘请担任《施拉格特》一剧的女主角。这部汉斯·约斯特于1933年急就的政治剧是用来为一个名叫阿尔伯特·莱奥·施拉格特的人歌功颂德的。施拉格特是亲纳粹的“大德意志党”的追随者，1923年5月因参与针对鲁尔区占领当局的破坏活动而被法国人处死。纳粹宣布他为烈士，称他是“德意志复兴事业的第一位殉道者”。

没有人将艾米·宗内曼视作天才艺术家，但毫无疑问她是有才能的，在没有戈林提供庇护的情况下，她成功地演了二十年戏。她曾受聘的魏玛德意志国家剧院作为图林根的国家级剧院和德国歌德协会戏剧节的舞台，享有很高的声誉。不过，要是没有有权有势的男友帮忙，四十岁的艾米要想从地方跳到首都柏林，恐怕是办不到的。

被柏林剧院聘用后，艾米又希望自己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飞跃。从德国文化协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1933年9月，艾米就曾要求政府专员欣克尔在电影业维护她个人的利益。1934年，她在根据席勒的《威廉·退尔》改编的影片中出演黑德维希。

1935年2月的一个周末，戈林在魏玛向艾米求婚：“咱们复活节结婚好吗？元首将做我们的证婚人。”艾米欣然应允。3月15日，戈林在一个四十人参加的小型聚会上宣布了他与艾米订婚的消息，法国、日本、匈牙利大使应邀出席了这次聚会。戈林曾对英国大使的夫人菲普斯谈起他与艾米订婚的缘由：“我是遵循元首的意愿才娶她的。他觉得我们这些党内要员里单身汉太多了。”

美国巡回大使威廉·蒲立德对这一时期的戈林曾有过一段描写：“他的身材就像德国的男高音歌唱家一样。臀部的直径至少有一码……为了使肩膀看上去与臀部差不多宽，他在肩膀两边垫了两英寸厚的衬垫……显然他身边总有个美容师，因为他那厚度和长度差不多的手指上，指甲总是修得尖尖的，还上了油。还有他的肤色……说明每天都有人给他保养。”1933年底戈林体重就有一百四十公斤，而且还在不断发胖。那时候，爱打扮、



爱穿奇装异服（有些还是他前妻设计的）、爱奢华、爱吹牛就是他的特征了。

在上层社会，也就是那些百万富翁和贵族的眼里，戈林是纳粹运动的领导人，而他同时又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希特勒很看重他这一点。1933年3月5日大选前，为了囚禁政敌，戈林下令建了两座集中营——奥拉宁堡—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帕彭堡集中营，它们都受到戈林领导的普鲁士内政部的严格监控。其时艾米·宗内曼与戈林相识已有一年，她在回忆录中为戈林辩解道：“当时德国就有集中营……的确，头几座集中营是赫尔曼·戈林还是普鲁士警察负责人时建的，但建这些集中营并不是为了囚禁犹太人，而是那些国家的敌人——共产党人……赫尔曼建这些集中营是为了改造政治犯，这一点没有人比我清楚。有一次，一个在押的共产党人被看守殴打成重伤，他听说后大发雷霆……”

事实上，是戈林于1937年2月17日发布了臭名昭著的枪杀令，指示普鲁士警察部队动用一切暴力手段对付政敌。

同样是艾米的这位男友，于1933年4月26日创建了国家秘密警察局（盖世太保）。1934年7月，盖世太保参与了清洗冲锋队领导层的行动。

艾米应该能从1933年的外国报纸上了解到戈林的真实想法，因为他在接受他们采访时说话相当直言不讳。比如他曾在瑞典对当地报界说：“我并不想让警察沦为犹太商店的保安。警察并不是用来保护骗子、无赖、放高利贷者和叛徒的。别老是嚷嚷着要求公道（他指的是犹太人），也许会给你们一个公道，不过现在还无法预料，反正不是你们的法律条文中写的那种，对你们来说它可能意味着末日。”

1935年4月10日，四十二岁的戈林与公开宣称四十一岁的艾米·宗内曼在柏林正式结婚。戈林二婚时的排场比他头一次结婚时可大得多了。婚礼当天，有八个小乐队在他的普鲁士总理府门前奏乐。这一天还被定为公共假日，大家都不用去上班。婚礼前一天晚上，一千名客人应邀在国家歌剧院观看了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埃及的海伦》盛大演出，随后又在戈林为他们安排的四个丰盛的香槟酒自助餐上大快朵颐。婚礼那天，建筑物上升起了国旗，一辆郁金香和水仙花装饰的敞篷车载着新婚夫妇，在民众的欢呼声中驶向德国总理府，道路两旁还有三万名德国兵列队欢迎。希特勒向新娘献上了一束白色的兰花，并许诺说，她今后如遇上什么个人问题，



随时都可以找他帮忙。此外希特勒还答应满足她一个愿望，不管这个愿望有多么离奇。新婚夫妇的世俗婚礼是在市政厅举行的，随后两人又前往大教堂举行正式婚礼。在此期间，由戈林的飞行员伙伴们驾驶的一个战斗机中队划空而过，好事者还借机放飞了两只鸮<sup>①</sup>。

当时采访过这次婚礼的美联社记者路易斯·洛赫纳在1935年4月20日的一封信中写道：“……那种排场让人觉得似乎是皇帝的大婚。”英国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在一封信中也用了类似的说法：“这几天到柏林来的人会以德国又重新实行了君主制，而自己又碰巧遇上了国王即将举行婚礼。”

虽然艾米是离过婚的女人，但在教堂举行婚礼对她并不构成什么问题。德国新教主教穆勒为她主持了婚誓仪式。此外，新郎还要求他最多只能对艾米进行五分钟的说教，在这一点上主教大人也心甘情愿让步了。婚宴是在德国总理府对面的豪华餐厅凯泽豪夫举行的，三百二十名亲友应邀出席，其中包括黑森的菲利普亲王，普鲁士的奥古斯特·威廉亲王，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女演员克特·多施，戈林前妻的姐夫、瑞典伯爵埃里克·罗森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同婚礼前夜观看歌剧时一样，艾米在婚宴上也戴着极为名贵的首饰。她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一点时写道：“……结婚时赫尔曼送给我一套非常漂亮的钻石首饰，但我并没有像他想像的那样兴奋，这让他大失所望。我从来就不像他那样看重首饰……”1948年7月20日，艾米·宗内曼在非纳粹化法庭<sup>②</sup>上为自己辩护时再次声称，自己穿戴奢侈完全是为了让丈夫高兴。然而检察官却没有吃她这一套，指出1940年10月，艾米曾独自一人在维也纳：“……当事人当时曾身着银鼬皮大衣，戴着非常贵重的首饰去观看了一场歌剧演出，引起观众的不满。”

结婚第二天，戈林恬不知耻地效仿王室的做法，在普鲁士总理府两间戒备森严的屋子里向新闻界展示了他收到的结婚礼品，他还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人民送给我的礼物。”实际上，为了巴结戈林，那些国立博物馆的馆长们把他们最珍贵的馆藏都献了出来，而且事先都得到了戈林明确的暗示。市长们为了送礼，也“洗劫”了当地政府的钱柜。德国的各种社团和机构以及外国权贵也都送了重礼，例如，艾米出生地汉堡的市政府就送

① 西方童话中的送子鸟。

② 二战后四个占领国为清算纳粹罪行而设的法庭。



了一个纯银的船模，那是艾米小时候就很羡慕的东西；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送给戈林夫人一个蓝宝石手镯。

1935年时的德国新闻界是受到严格管制的，他们对普鲁士总理大人与女演员宗内曼的婚事自然都作了正面报道。不过1933年已移居国外的克劳斯·曼，也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作家和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托马斯·曼<sup>①</sup>”的儿子，却给艺术圈内的同行艾米写了一封公开信：“当然喽，您现在已然摆脱艺术圈高高在上了，时下圈内流传着那么多有关您的佳话。天啊！国母大人是多么飞黄腾达啊……瞧瞧参加您婚礼的都是些什么人：您那位时髦的先生还没有干掉的所有老战友全在场——凯尔和施特赖歇尔，他们俩还一个劲儿地在那里说笑话逗大家乐。在婚宴上做祈祷的竟是穆勒先生，也就是那位让人在教堂宿舍里殴打手下牧师的主教大人。在您待过的那家地方剧院里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笑话可讲，可惜我一直无缘在那家剧院欣赏到您的表演……说不定哪一天，您家厚实的门帘后面会冒出几个在集中营里被打死、折磨死、逃跑时遭枪杀或是自杀的冤魂，说不准还会出现一个血淋淋的脑袋？……”

婚后不久，艾米遂丈夫之愿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结束了持续二十三年的舞台生涯。她最后受聘的是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领导的柏林国家剧院，演的最后一出戏是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此后便永远告别了舞台，转而在戈林颇富戏剧性的生活中扮演主角。

走出这一步，艾米从没有后悔。她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夫人”，丈夫对她温柔体贴，忠贞不贰，事后证明他还是个关心孩子的好父亲。艾米的婚姻生活很美满，因而就像移居国外的艺术同行克劳斯·曼所指责的那样，“将其他一切都不放在眼里”。这位演员出身的“第一夫人”还经常替希特勒做些应酬，她举办的社交聚会到柏林的社交界人士和政客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同纳粹领导层的其他夫人不同，她与希特勒的关系并不热乎。虽然他们家在上萨尔茨贝格也有幢住宅，但艾米与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很少私下来往，因而一直没有什么深交。她对“元首”的景仰也是有限度的，更确切地说，她一直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两人间这种比较冷淡的关系在公开场合就能看得出来。1935年11月8日，为了纪念

<sup>①</sup> 德国著名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23年纳粹发动的未遂政变，柏林上演了歌德的《埃格蒙特》，纳粹党所有上层人物都观看了演出。戈培尔事后在日记中写道：“戈林太太看上去像个女王。元首很谦卑地坐在她旁边。后来他在火车（开往慕尼黑的元首专列）上说，他当时坐在那里真是难受。”

很快就有传闻说艾米“并非纯粹的雅利安血统”，传播这种说法的以艺术界人士为甚，而且是此起彼伏。1935年9月，纳粹德国司法部就在一份通报中说，目前民众中流传着“一些对（普鲁士）总理夫人的恶意诽谤，特别是有人捏造说她出身于非雅利安血统家庭，并且还曾与非雅利安人结过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为了保险起见，1936年由冯·东格恩男爵出版的德国名人谱系手册《国社党哥达》中就没有提及艾米·戈林的第一任丈夫。克劳斯·曼在他那封公开信中也提到了艾米的出身问题：“您以前那些同事还揭发说，您不是雅利安人……”戈林对这些流言蜚语立即做出反应，他要求别人绝对尊重他的夫人，并威胁要对任何“恶意诽谤”采取严厉措施。有一个据说污蔑过艾米·戈林的人被判了五个月监禁，戈林得知判决结果后愤愤地叫道：“要我看应该判他五年才对！”战后当戈林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有人曾建议，“为了让戈林屈服，应该问他有关艾米与一个犹太演员曾有过亲密关系的问题”。

连这位肥胖的普鲁士总理本人也是人们私下议论的话题。纳粹司法部长居特纳曾猜测道，“关于戈林私人和家庭生活的不负责任的谣言，是那些对国家怀有敌意的人有计划煽动造成的”。英国大使在1936年拍给伦敦的一封电报中曾对当时有关戈林的传闻做过如下总结：“……我听说，他不能生孩子。”

然而，艾米·戈林在估计超过四十四岁的时候居然怀孕了，这让人大吃一惊。1938年6月2日，艾米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埃达。当时人们认为，戈林夫妇有意给女儿取了个墨索里尼女儿的名字，但是艾米后来声称，女儿用的是自己一个女友的名字。无论如何，帝国元帅戈林的确在四十五岁时首次当爸爸了，夫妇俩收到了发自世界各地的六十二万八千封贺电。“元首”和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亲自担任孩子的教父，德国空军也集体承担了对孩子的监护责任。1938年11月4日在卡琳宫举行的一次大型庆祝活动上，埃达接受了基督教洗礼，这让党内高层人士很恼火。

为了孩子出世，戈林印发了数万张喜帖，上面贴着自豪的父亲和小埃



达的合影照片。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经常拿戈林做父亲这件事开玩笑。有人不怀好意地问：埃达这个名字代表什么意思？答案是：永远感谢副官<sup>①</sup>。滑稽讽刺剧演员维尔纳·芬克则借题发挥说，孩子其实应该叫哈姆雷特：“是，还是不是”<sup>②</sup>。戈林并没有笑，他把芬克关进了集中营。后来，埃达长得越来越像戈林，人们便觉得再谈孩子生父是谁的话题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埃达受洗时卡琳宫收到了成车皮的贺礼。为在卡琳宫果园内修建所谓的埃达小屋，成千上万的空军官兵捐了钱。埃达小屋的规模宛如一个小宫殿，里面还有一个演戏厅，柏林国家歌剧院的儿童芭蕾舞演员在这里为还在吃奶的小埃达作过表演。为了讨好戈林，科隆市政府送了埃达一件最贵重的礼物——卢卡斯·克拉纳赫<sup>③</sup>的《圣母子》。这幅名画是科隆瓦尔拉夫一里夏茨博物馆的珍藏品。战后，围绕此画的所有权问题还打了一场激烈的官司。

戈林夫妇为小埃达感到十分自豪。对他们来说，小家伙便是“他们生活中的阳光”。他们对女儿呵护备至，尽可能让她享受奢华。孩子四岁生日那天，他们让埃达穿上匈牙利轻骑兵式的红色制服，足登黑色小马靴，把她领到那幢玩偶小屋的平台上向众人展示。

艾米·戈林和她丈夫尽情享受生活，日子过得如同18世纪的王侯一般。在柏林以北的绍夫海德，这位“第三帝国的太阳王”<sup>④</sup>花费百万巨资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豪宅——卡琳宫。卡琳宫内有电影厅、健身房、俄式蒸汽浴室以及一个教堂大殿规模的巨大会客厅。其他纳粹高官尽管也都讲究奢华，但他们的住宅没有一个能赶上卡琳宫的。希特勒曾蛮不是滋味地说：“我的贝格霍夫当然是没法比了，或许它可以用做花园小屋。”

戈林还是帝国狩猎事务主管，时常身着皮狩猎服，挎着弓箭出门狩猎。他还有一个巨大的电动铁路模型，这也是他闲时爱摆弄的玩意儿。此外，无聊的时候他还爱把他那个“钻石筐”拿出来把玩一番。艾米·戈林则主办过无数庆典，其中一年一度在柏林普鲁士总理府举办的消夏晚会无

① 德语中这句话是“Ewiger Dank dem Adjutanten”，首字母缩写是Edda，即埃达。

② 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的著名台词“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③ 16世纪德国绘画和版画繁盛期的重要画家。

④ 太阳王是18世纪法国专制君主路易十四的绰号，此处用来形容戈林爱追求奢华。



疑是最出色的。晚会上，柏林歌剧院就在总理府院中演出芭蕾舞，安装在周围建筑物顶上的探照灯将院内照得如同白昼。游泳池里白莲花绽放。晚会的主人及夫人身着专为晚会特制的夸张的文艺复兴式礼服，一身珠光宝气地立在那里迎接嘉宾。高大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条桌，露天晚宴便在这里举行。随后，一面高大的屏风被人撤去，宾客们会惊奇地发现一个由戈林亲自设计的场景：按照维也纳武斯特尔普拉特尔游乐场的模式，场地上摆着滑梯、游戏靶场、老式的旋转木马，甚至还有几个格林青的“当年酒家”<sup>①</sup>。酒家内穿着电影《全场起舞》中人物戏装的女演员向宾客们频频致意。

艾米在卡琳宫先后接待过南斯拉夫王子保罗、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希腊国王格奥尔格、温莎公爵、飞行先驱查尔斯·林白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等贵宾。

对戈林夫妇来说，钱根本不成问题。仅雷姆茨马烟草公司一家每年就要拿出一百万帝国马克（共计一千五百万帝国马克），名义上是为赞助“文化、环保和狩猎活动”，实际上这笔钱进了戈林的个人小金库。此外，德国汽车产业仅为维持戈林家的“卡琳二号”机动游艇的日常开销，就要出资一百五十万帝国马克。

艾米在戈林身边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激动人心。她那个越来越发福的丈夫有个怪癖：爱在家里养狮子。狮宝宝由柏林动物园提供，一般要在戈林家待上一年半左右，在那里它们可以到处闲逛。小狮子个头长到可能会伤人的程度就会被送回动物园。戈林家先后养大过七只狮子。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有一次，几个意大利社交界“名流”，其中有墨索里尼的儿子维托里奥和布鲁诺，在卡琳宫吃茶点，突然门开了，溜进来一只狮子，客人们吓得目瞪口呆。好在艾米·戈林后来把狮子轰走了。艾米在回忆录中也描写过一段有关养狮子的经历：“有一次，因为我们在莱比锡广场的房子要维修，我们暂时住进了国会议长官邸。我们把狮子也带上了，并把它安顿在地下室里。有天晚上，我们突然惊醒了，因为卧室门开了，我们养的一头狮子来到我们面前。从地下室到卧室共有八道门，为了找到我们，这家伙居然用爪子撼动门把手，把这些门一一都打开了。见到我们，这家

<sup>①</sup> 维也纳市郊格林青是有名的葡萄产地，当地专卖当年所酿新酒的酒家，人称“当年酒家”。



伙简直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不忍心再把它送回去，于是便让它和我们一起过了夜……”

戈林可以称得上是 20 世纪最大的艺术品掠夺者，他毫无廉耻地在欧洲各地搜刮珠宝、家具和名画，并据为己有。一旦看上某件艺术品，他便把它记下来，事后再将其没收。戈林曾在一份个人文件中写道：“在国会里试了一下壁毯，看看究竟拿它做电影屏幕好还是挂在会客厅里更合适……”对丈夫的肆意掠夺，艾米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与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约瑟夫·戈培尔不同，赫尔曼·戈林人缘不错。艾米·戈林也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主要原因是她从不在公开场合提出什么政治主张。犹太裔女记者贝拉·弗罗姆对戈林的品性并不抱什么幻想，但她觉得艾米很可爱：“……她不是个阴险狡猾的人，而是个富有同情心、慈祥、女武神<sup>①</sup>型的女人。高大、健壮，但又温柔、妩媚；额头周围拢着美丽的金发；大大的蓝眼睛闪着温柔、愉快的目光……艾米是个挺可爱的人……”

艾米的亲戚对她也做过类似的评价。她的外甥女曾说，“艾米舅妈很天真，待人友善，容易轻信别人”，她不愿意伤害任何人，而且总是把别人想得很好。从 1948 年 9 月 2 日纽伦堡检察官肯普纳博士对她进行的一次盘问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艾米的性格特征。当时纽伦堡国际法庭正在对戈林的国务秘书保罗·克尔纳（昵称“皮利”）展开司法调查，他负责管理“四年计划”<sup>②</sup>。作为证人接受讯问的艾米想为他开脱。肯普纳问她：“可不可以说，您已故的丈夫对克尔纳很放心？或者，他还是得瞧一瞧他事情做得究竟对不对？”艾米很肯定地答道：“不，他不需要这么做。他是一个绝对值得信任的人。”“有些人说他这个人没什么主见，任人摆布，其实他并不是这样，是不是？”“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艾米天真地答道。“您也不会说皮利的坏话，是不是？”“是的，我绝对不会的。我绝对说不出皮利的一句坏话。”由于这次盘问，保罗·克尔纳被判了长达十五年的监禁。

艾米·戈林一再强调，她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特别是纳粹政权瓦解后，她更是强调这一点。根据艾米的陈述，她丈夫和她谈到政治只有惟

① 北欧神话中决定谁该阵亡，并把阵亡的英雄引入英烈祠的女神。

② 纳粹德国于 1936 年开始实施的经济计划，目的是使德国经济能适应战争的需要。



一的一次，时间是1941年1月初。当时她正准备去巴特加斯泰因疗养，戈林惊慌地告诉她，希特勒打算进攻苏联。

1948年，艾米·戈林在第三帝国中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受到仔细调查。非纳粹化法庭在对她的起诉书中是这样写的：“……当事人于1938年以如下方式入党：1938年圣诞节期间，希特勒打电话告诉她，她已被批准入党。她得到了一个已死的纳粹党员的党籍号码，此人于1932年入党。当事人是纳粹妇女联盟和德国戏剧协会的成员。作为戈林的妻子，她一贯赞同他（她丈夫）的世界观，对此她并不否认，尽管她自己并没有从事政治活动。”

艾米·戈林的确没有参与戈林的政治活动。她对戈林扮演纳粹德国经济总管这一角色——戈林是“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感兴趣，仅仅是因为戈林因此可以带她一起出国进行高规格的国事访问。比如1939年4月7日，戈林夫妇就曾前往直意利殖民地利比亚拜访当地总督伊塔洛·巴尔博。他们受到了东方式的隆重接待，骑了骆驼，参观了古罗马遗址，并在总督府出席了隆重的招待会。随后戈林夫妇又对意大利进行了国事访问，墨索里尼亲自到罗马泰尔米尼火车站迎接。

战后，艾米·戈林声称她本人及其夫对为犹太人和政敌而设的灭绝营一无所知：“……在我看来，这些集中营都是用来进行政治改造的，就像赫尔曼一开始所设想的那样……我无法想像他（戈林）会知道奥斯威辛这个设在国外的集中营里所发生的那些可怕的事件……”（艾米·戈林回忆录《在丈夫身边》）

艾米·戈林在艺术界的确有不少犹太朋友。即使结婚之后，艾米也仍然与他们，比如她的授业恩师耶斯纳，保持来往——去拜访他们，或是把他们邀到家里来坐坐，简直像是在有意做给别人看似的。由于她出面说情，不少人得以逃脱纳粹迫害。1948年艾米·戈林受审时，这些人曾在法庭上作证为她开脱。有这么多以前的同事找她帮助，然后失踪或是移居国外，这并没有使艾米产生什么顾虑。虽然希特勒对她一再救助犹太人很恼火，并禁止别人谈论这一问题，但戈林有时却对她表示支持。作为“四年计划”的总负责人，戈林虽然于1938年11月12日颁布了“关于将犹太人清除出德国经济生活的法令”，并亲自制订了大规模驱逐和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但是遇到具体问题时，他有时还是能够通融的。后来在艾米接受非

纳粹化审判时，控方说：“……当事人曾为不少在危难时求她帮忙的原（犹太裔）同事说过好话。但是她这样做绝对不是出于反纳粹的动机……”

从1938年签订《慕尼黑协定》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戈林希望维持和平的外交政策主张，与希特勒的想法并不一致。到1939年德军占领布拉格时，戈林已不再能参与政治决策了。1941年，虽然艾米·戈林又荣幸地当上了“大德意志帝国元帅”的夫人，但是此时的戈林已然命运不济。在他的经济计划失败，以及他领导的德国空军在英伦空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分别吃了败仗之后，戈林的势力和影响迅速下降。夫妇俩经常待在卡琳宫或费尔登施泰因城堡中，深居简出，就像欧洲战场上发生的那些戏剧性事件已经与他们毫无关系一样。随着战事发展，戈林家那些辉煌的庆典也逐渐停办了。

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战线越来越接近绍夫海德和卡琳宫，艾米·戈林于1945年1月31日带着女儿埃达启程前往巴伐利亚，目的地是当时一直没有遭到轰炸的上萨尔茨贝格。戈林夫妇在那里也有幢住宅，就在希特勒的贝格霍夫附近。这幢房子1945年间逐渐住满了戈林的女性亲戚，她们和艾米一样也是来躲避战祸的。

当年4月，戈林搜刮的价值两亿帝国马克的艺术珍品由专列运抵巴伐利亚，其中包括一千幅名画、八十件雕塑和六十幅织花挂毯。这些东西随后又被转运至贝希特斯加登，藏进了温特斯山的坑道里。1945年4月20日，戈林本人还到柏林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给希特勒祝贺生日，随后他便命人炸毁了心爱的卡琳宫，并以“需要完成万分紧急的任务”为由，带着一大帮随从偷偷逃往上萨尔茨贝格。

虽然当时戈林已经坐了很长时间冷板凳，但他仍想伺机重返权力中心。1945年4月23日，他以为时机已经到来。这一天，由于接到错误报告，说“元首已经精神崩溃”，戈林给“元首大本营”拍了一份电报，表示愿意接希特勒的班。希特勒在地下避弹室很快就做出反应，戈林被控犯了叛国罪，全家都被党卫军特别行动队逮捕，并关进了贝格霍夫的地下防弹室。艾米在后来写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第三帝国瓦解前夕，我丈夫、孩子和我本人，于1945年4月25日被阿道夫·希特勒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被捕时，艾米和孩子还穿着睡衣，因而冻得够呛。一个副官曾想为她俩要一个能睡觉的地方，但是一个党卫军哨兵却威胁要立即枪



毙她们。后来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把戈林家的别墅炸成了废墟，他们全家一连几天都被关在昏暗、冰冷的石灰矿井里。希特勒自杀后，他们被遣往戈林从其犹太裔教父那里继承的毛特恩多夫城堡。

1945年5月7日，戈林被美国人逮捕，这是他妻子最后一次在狱外见到他。艾米自己带着女儿、女佣和戈林的护士，好不容易来到纽伦堡附近的费尔登施泰因城堡。他们在那里虽然找到了住处，却发现城堡已被洗劫一空，所有家什都被人运走了，据说用家具运输车运了十二车。1945年10月25日，艾米也被逮捕，女儿埃达托给了一家农户照管。后来七岁的埃达也来到施特劳宾，和母亲一起住在牢房里。

艾米曾对这一时期的生活做过如下描述：“我先被软禁了五个月（在费尔登施泰因城堡），随后又作为纽伦堡审判的证人，在施特劳宾的监狱里住了五个月，1946年2月19日获释……”

戈林被关在纽伦堡军事监狱接受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的审判（1945年11月14日至1946年10月1日）时，艾米·戈林一直带着女儿住在上普法尔茨地区诺伊豪斯附近的萨克迪灵，离纽伦堡大约三十公里。她们住的是林子里的一个狩猎小屋，是费尔登施泰因城堡的产业。她的律师埃里希·埃贝迈尔博士报告说：“……上个冬天，当事人带着八岁的女儿埃达和其他两人分住在两间屋里，卫生间设在厨房里面。那里离最近的居民点也有两个小时的路程，没有水，几乎没有取暖设备。”

艾米·戈林从萨克迪灵写了一封信给纽伦堡军事法庭要求探监：“……我有一年零三个月没有见到（戈林）了，非常想他。不知道怎么办好。如果能让我和他在一起待上几分钟，握握他的手就好了……我和孩子无依无靠，我丈夫非常为我们担心……”

直到1946年9月12日对主要战犯的审判接近尾声时，艾米才获准探视狱中的丈夫。事后她对希特勒的女秘书亨里埃特·冯·席拉赫说：“他们不会吊死他的。赫尔曼吊在绞刑架上，简直无法想像！大家一定是在骗我们……”

宣判前的最后两周，所有被告的妻子均获准探视丈夫八天，每天探视时间是半个小时。艾米带着埃达去了好几次。按严格的保安规定，探视时戈林与一名看守铐在一起，一面玻璃墙和一道细铁丝网将夫妇两人隔离开来。埃达背诵着小诗，父母则在一旁拼命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1946年10月7日，艾米·戈林与已被判处绞刑的丈夫见了最后一面。戈林问她是否希望自己提出赦免申请，艾米答道：“你现在可以平静而问心无愧地走了。你在纽伦堡为你的同志、为德国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你是为德国牺牲的，这一点我会永远记在心里。”戈林却对妻子说：“有一点你可以绝对放心：他们不会吊死我的。”

1946年10月15日，戈林在原定要上绞刑架的前一天晚上服毒自杀，这时候人们才明白他对妻子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到底是谁把那一小瓶氰化钾偷偷送进了戈林的牢房？戈林在不断监视下到底把毒药藏在哪儿了？这些问题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有人猜测戈林是从监狱看守中的一个美国军官那儿得到毒药的，但艾米·戈林也属于被怀疑对象之一。她本人曾直言不讳地说，她事先知道丈夫在牢房里早就把毒药随时带在身上了。

1947年5月29日，巴伐利亚特别事务部部长洛里茨对戈林的遗孀以及所有在纽伦堡被判刑的战犯的妻子下了逮捕令。逮捕艾米·戈林的原因是她从纳粹专制统治中获得了很大好处，而且有必要防止她逃往英占区以逃避法律诉讼。艾米·戈林被关进奥格斯堡附近的格京根拘留劳动营，当时这里共关押了一千多名女犯。这座由五幢矮平房组成的监狱，是纳粹时期为安置从俄罗斯抓来的女劳工而建的。

同被关在格京根拘留营的亨里埃特·冯·席拉赫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在狱中看上去就像学生读本上画的被拐的日耳曼女郎一样，金色发辫扎得紧紧的，一脸怒容。”艾米·戈林的两个律师之一施特罗布尔，把他的当事人被拘押比做中世纪的女巫审判。另一律师埃贝迈尔已于1947年6月提出上诉。

1947年10月31日，艾米·戈林自己给巴伐利亚特别事务部部长写了一封信：“不知您是否允许我向您说明一下我的案情，并请求您提供帮助？根据前部长洛里茨下达的命令，我于1947年5月28日被关进格京根女子拘留营。当时我因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右臂静脉炎正躺在家里，还发着烧。我患坐骨神经痛已有三十五年。那时我正在接受治疗，医生对把我运走提出异议……但是，据说是因为我曾想逃往英占区，当晚12点我还是被抬上担架运到了这里，路上用了七个小时……我待在这里已有五个月，一直卧床不起，疼痛不止……我已经五十四岁了，过去几年经历了无数磨难



……部长先生，也许您熟悉我的档案，我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而且还尽力帮助过一些因种族和政治原因受到迫害的人，已有足够多的人证实了这一点。我惟一的罪名便是我是赫尔曼·戈林的妻子。但是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并与他幸福地结合而惩罚她呢？部长先生，我衷心恳求您帮帮我，让我尽快出庭答辩。如果近期不可能，那我请求您允许我在出庭答辩前暂时出狱。如果这超出您的权限，我就请求您批准在未来这个严冬期间暂时中止对我的监禁。在这个木板房里过冬，会持久地严重损害我的健康，我的身体会彻底垮掉。”

讯问了大量证人后——诉讼过程中共提交证词二十一份，检察官尤里乌斯·赫尔夫于1948年7月20日向设在加米施-帕滕基兴的劳动拘留营非纳粹化法庭提交了诉状，同时他还提出应将艾米·戈林列为主犯，“作为戈林的妻子，她一贯赞同他（她丈夫）的世界观，对此她并不否认，尽管她自己并没有从事政治活动。既然当事人被视为纳粹主义的顽固追随者，而且还从与纳粹专制统治的关系中得到了好处，那么她……就应该算是主犯……作为赫尔曼·戈林的妻子，她不仅分享了丈夫的大量个人荣誉，而且还曾与他共同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远远超过了普鲁士总理通常的生活水准，也超过了任何通常的标准……当事人还从纳粹党处领取‘报酬’，她本人声称这笔钱都用在了公益事业上……”

艾米·戈林1933年受聘柏林剧院一事也受到质疑：“根据艺术工作者委员会作出的专家鉴定，当事人在纳粹上台后立即被柏林国家剧院聘用，完全是借助她与戈林的关系，因为作为艺术工作者，她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才能证明自己有资格得到这一岗位。她在这个新岗位上得到的薪水是以往的二点五倍。德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主席埃米尔·奥托也持同样观点。只有普鲁士国家剧院总监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1933年是她的同事）认为，聘用当事人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

除了正式的辩护律师外，艾米·戈林还找到了一些能言善辩的辩护人。除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还有十五名证人为她开脱。最关键的一名辩护者是柏林教区牧师延奇。他在法庭作证时说：“她帮助过各种各样的人，保护过教区的许多犹太和半犹太教民。”他把艾米·戈林称作“虔诚的斗士”。

最终的判决将艾米·戈林列为纳粹政权的受益者（二类罪犯），决定没





收其百分之三十的资产，在劳动营里服刑一年，五年内禁止工作。法庭认为被告已经服满了刑期，于是将她当庭释放。

这一判决引起了巨大反响和激烈争论。1948年7月27日的《多瑙河信使报》评论说，这是“垂死的非纳粹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判决”。而1948年8月28日的《东南部信使报》在评论艾米·戈林的法庭申诉时却说她“心地善良，天真无邪”。

1948年7月28日，三百名斯图加特妇女举行示威，坚决抗议加米登-帕滕基兴非纳粹化法庭对艾米·戈林所作的判决。愤怒的示威者要求法庭改判艾米为主犯，增加刑期，并没收她在第三帝国时期利用自己地位获得的全部财产。

1949年，艾米·戈林四处打官司，拼命想保住家里很多值钱的东西。许多贵重物品都被她说成是十岁女儿埃达的财产。她对总检察官奥尔巴赫博士说：“这些东西是我丈夫、埃达的监护人和伯伯叔叔们送给（埃达）的，但我确实不知道究竟哪样东西是谁送的。”奥尔巴赫当时受命处理戈林留下的无数艺术珍品的归还问题，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是别人出于自愿送给戈林夫妇的。

这些“东西”里包括克拉纳赫1518年创作的《圣母子》，这幅原先由博物馆收藏的名画是科隆市政府在埃达出生之际送给她的。此外还有克拉纳赫创作的世界名画《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憩》、15世纪的南德圣母塑像、金制餐具、日本地毯等等，数不胜数。

总检察官粗鲁地反驳了艾米的申诉。他说：“元帅先生的‘产物’（埃达）所以能得到身居要职的权贵们的关心和礼物，仅仅是因为这些人想讨她地位显赫的父亲的欢心，引起他的注意。”总检察官要求对未成年的埃达也提起非纳粹化诉讼，争取没收她名下的艺术珍品，供战后赔偿基金使用。

围绕埃达受洗时收到礼品的所有权问题，有关各方打了几十年官司。涉案方除科隆市外，还有联邦德国政府、巴伐利亚州政府，当然还有埃达本人。科隆地方法院将《圣母子》判归科隆市所有，并宣布如果正在大学学法律的埃达·戈林不提出上诉，这幅名画将被送回原先的博物馆收藏。但是科隆高级法院却驳回了科隆市对这幅名画提出的所有权要求。法院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戈林在这件事上施加了压力，应该说当时的纳

粹市长想为科隆市争取些好处，所以他把这幅克拉纳赫的作品送出去了。法庭认为，至少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卡琳宫好讲排场的主人“卑鄙无耻，自私自利”。但是埃达的胜利好景不长，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又把画判给了科隆市。

1954年，法院又裁定巴伐利亚州应将埃达被没收的价值十五万马克的首饰退还给埃达（埃达·戈林认为官方过高地估计了首饰的价值），这些首饰是小埃达在父亲鼎盛时期收到的礼物。

从格京根女子拘留营获释后，艾米·戈林和女儿一道又在萨克迪灵住了一小段时间。后来和埃达迁居慕尼黑，住在一套小公寓里，很少与人来往。埃达·戈林在大学里一开始学的是法律，后来又改学医务技术助理。她一直都没有结婚，除了上班便是一门心思地照顾母亲。

1967年，艾米·戈林开始撰写回忆录《在丈夫身边》。当时第三帝国的真面目早已被揭穿，人们已逐渐了解纳粹犯下的所有暴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五千多万人丧生这些事实。艾米的回忆录实际上是由她的法律顾问、法学家、作家埃里希·埃贝迈尔和阿尔弗雷德·穆尔代写的，但书中对这两个人只字未提。

艾米·戈林在回忆录的前言中说明了写作动机：“我丈夫在纳粹政权倒台以后受到那么多人的攻击。出于对丈夫个性的深刻了解，我感到有责任说明一些有必要说明的问题，以纠正谎言和错误。”

戈林在妻子写的这本书中以一个道德楷模的面目出现。“他总是替别人着想……一贯无私奉献，带给别人的是爱、宽容……欢乐和帮助……”这本“元帅白皮书”中只字未提戈林的吗啡瘾以及他的腐败、残忍，还有他掠夺无数艺术品这些事实。第三帝国被描写成了形形色色的好心人生活的世外桃源。

艾米·戈林以前一贯声称自己是个“不关心政治的女人”。为了不违背这一既定路线，艾米在书中又声称，自己是战后通过与丈夫那些仍然健在的知心朋友交谈才了解政治的。但是后来她又幼稚地探讨了德国在作战指挥方面的失误、敦刻尔克溃败和英伦空战等问题，同时她也没忘记随时为赫尔曼·戈林美言几句。

艾米·戈林在回忆录收尾时道出了她这一生的精华所在：“如今再回过头看，我觉得自己似乎仅仅在1932年春天至1946年秋天这段时间里才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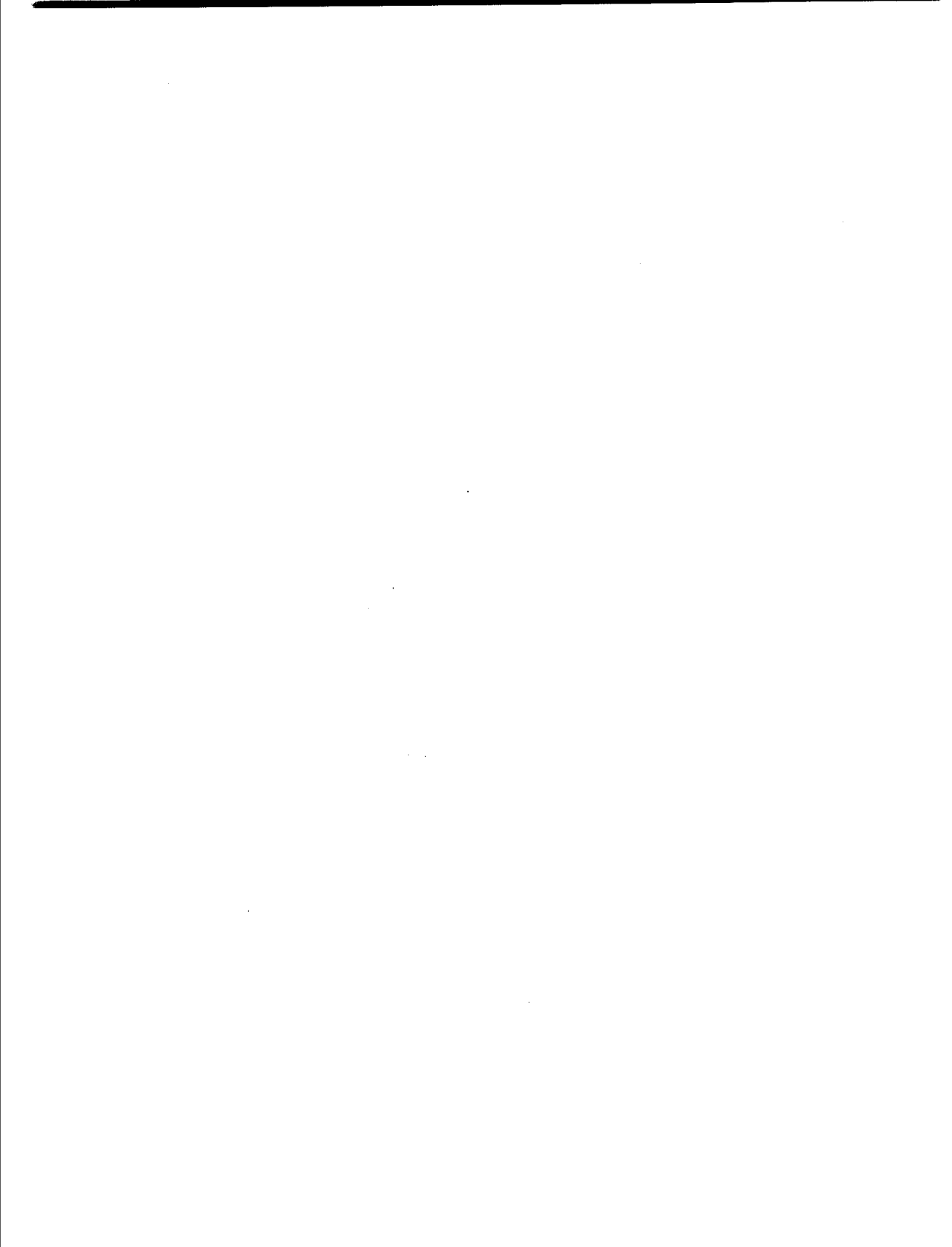
真正地活着……十四年就相当于过了一生！那时我觉得很幸福，希望别人和我有同感……”

德国新闻周刊《明镜》在报道艾米·戈林这本回忆录时用了《过于感情用事》这个标题。1973年3月，《时代》周报报道：“领取社会保险养老金者”艾米·戈林在慕尼黑四季饭店过了八十岁生日。生日庆祝会是由卡琳·戈林的儿子托马斯·坎措筹办的。

1973年6月10日，艾米·戈林在慕尼黑去世。

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玛格达·戈培尔







玛格达·戈培尔，生下后随母姓贝伦特，后随继父姓弗里德伦德尔，后又改用生父姓里奇尔，第一次婚姻从夫姓克万特。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在纳粹精英的女人中无疑最让人捉摸不透。其变幻不定的一生让人联想起古希腊的悲剧，而她主要以“魔鬼的伴侣”形象载入历史，则因其夫约瑟夫·戈培尔乃是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玛格达与戈培尔共同生活十五年，并且赞同他的思想。

玛格达生于1901年11月11日，是非婚生女，母亲奥古斯特·贝伦特当时二十岁，是个女佣。她的父母不久之后结婚，父亲是个富有的建筑商和工程师，名为奥斯卡·里奇尔。玛格达三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很快再嫁有钱的制革商弗里德伦德尔。于是，玛格达有了一个与之感情深厚的犹太继父，虽然自己后来嫁给了一个反犹狂。她的生父和继父相识后都很敬重对方，两人相互比着教育孩子。玛格达五岁移居布鲁塞尔，和生父里奇尔共同生活，继父一家随即也搬到那里。因为没有兄弟姐妹，总是和大人在一起，玛格达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礼数周到、少年老成的孩子。母亲完全沉溺于布鲁塞尔的社交生活，根本没时间照料年幼的女儿，玛格达五岁就去了维尔福德的塞弗兰修道院接受教育。修道院戒律森严，玛格达一待就是八年，只有假期才能回家。但放假期间，两个父亲对她过分关怀，带她去旅游，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宠坏了她。

1914年，德国人侵入比利时，玛格达随家人从布鲁塞尔逃回柏林，她继父在那里可以很快站稳脚跟并继续经商。这个半大的女孩很会来事儿，母亲后来与继父离婚，为报答继父的关爱，玛格达用了继父的姓。

战时四年，玛格达在柏林一所公立高级文科中学念书，并经常去探望生父。里奇尔当时已在故乡巴特哥德斯堡定居。女儿金发碧眼，美丽聪颖，精明能干，领悟力强，里奇尔博士深感骄傲。

里奇尔把女儿视为平等的谈话伙伴，跟她谈起佛教，发现玛格达对这种完全摒弃暴力的哲学思想很感兴趣，他非常高兴。然而，他女儿既能对事事都感兴趣，也会随环境的变化轻易改变信念，后来，玛格达从佛教信众一变成为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再变而为狂热的纳粹党人，这些他都始料未及。

1919年3月，玛格达高级中学毕业，转入戈斯拉尔霍尔茨豪森女子寄宿学校。这所学校收费昂贵，学生大多是富家女。在那里，玛格达处世圆

通，教养出众，容貌迷人，令同龄人相形见绌。她举止大方，从不自卑，年纪轻轻就已处处表现出十分自信。她这种从容自若的风度，后来令许多纳粹党人心仪，他们对玛格达·戈培尔的社交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间，一次玛格达放假乘火车返校途中，与一位相貌端正、风度翩翩的先生共在一个包间。此人三十八岁，叫君特·克万特，德国首富之一，统治着一大产业王国。最初克万特在读信，后来一门心思就都用在旁边这位十八岁的妙龄少女身上。两人话很投机，富有魅力的玛格达很能讨克万特的欢心，对他的事业既表示兴趣，也颇能理解他的想法，丧妻不久的克万特一下子就坠入了情网。

此后发生的一切就像画报上刊登的爱情故事，亿万富翁数月之后即与女学生订婚。遵循其未婚夫的心愿，原本信天主教的玛格达皈依了新教，还把姓从弗里德伦德改为生父的姓里奇尔。1921年1月4日，二人在巴特哥德斯堡结婚。

然而这段婚姻似乎命中注定要出问题。新娘尚不满十九岁，新郎却已三十九岁了。克万特前妻生的两个公子还未成年，只稍比继母年弱。玛格达和克万特这段婚姻的惟一结晶——儿子哈拉尔德，在1921年11月降生于世。从寄宿学校的女生一下变成了仆佣众多的大家主妇，二十岁的玛格达很有些招架不住。现实让她大失所望，先前对豪门贵妇生活的种种设想都落了空，这个感情充沛、酷爱交际的女子所期望的觥筹交错、嘉宾满堂的上流社会生活并未成为现实。柏林弗兰肯大街的别墅、位于新巴伯尔斯贝格的宅院以及梅克伦堡省帕尔希姆的庄园，这些克万特家族的豪华住所最初给玛格达带来的兴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克万特思想保守、缺乏幽默、拘于小节，整天忙着工作，文化嗜好不多，空闲时间就更少了，而且有空儿也是独自待着沉思冥想。玛格达已经有两个父亲，并不希望再有第三个。她看不起冷漠的丈夫，因为他总是一成不变地过日子。他总想对她说教，这也让她受不了。克万特还给过玛格达一个学生用的本子，让她记下个人的每笔开销，而实际上，玛格达得到的零用钱少得可怜。

玛格达好比住进了金丝笼里，虽然身在豪门，却并不自由幸福，另外还得终日操劳。一个生意伙伴因事故死了，克万特把他的三个孩子领回家里，玛格达因而要负责照看六个孩子。不仅如此，她还受到克万特家族的



冷遇。这个家族极为保守，他们觉得，克万特刚服完丧就另结新欢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免处处要拿玛格达与克万特的亡妻比较，结论总是新妇不如旧人。只有同龄的小姑子埃莱奥诺雷（埃萝）成了玛格达的朋友，二人在此后二十五年的风风雨雨中始终相交莫逆。

克万特和玛格达同床异梦。不过，克万特去美国和南美旅行谈生意还是带上了妻子，他们的婚姻外表上还能维持。

在纽约，妩媚优雅的玛格达成了上流社会沙龙的明星。美国总统胡佛的侄子，美国首富之一小胡佛，就公然宣称，他衷心崇拜玛格达。

然而回国之后，克万特夫妇再不必在外人面前装腔作势，他们的矛盾完全全暴露出来。玛格达陷入和一旧相识的恋情，她从前在大学生舞会上认识这人，二人一直保持着泛泛的联系。

从玛格达后来的生活回头看，这段恋情显得不可思议。玛格达后来成了戈培尔夫人，戈培尔最早几本传记的作者，一提到她旧日的这个情人就遮遮掩掩，只说是一个“叫汉斯的大学生”。

思想上的极端主义倾向主宰了玛格达的一生，正是这一点促成了她的这段恋情。她的情人真名叫哈伊姆·维塔利·阿尔洛索罗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戈培尔的传记作家库尔特·里斯与阿尔洛索罗夫夫人相识，里斯写道：“……与玛格达暗通款曲的大学生是个犹太人，我还认识他，他和我在同一所学校。事情往往就这么凑巧……”

阿尔洛索罗夫（1899—1933）生在俄国，父母是犹太人，祖父是犹太教的拉比。为躲避沙皇政府对犹太人的一次大规模迫害，他全家1905年逃到德国。到柏林后，阿尔洛索罗夫上了维尔纳-冯-西门子高级文科中学，里斯也在这所学校就读。阿尔洛索罗夫考上大学后主修经济和哲学。他是特奥多·赫茨尔<sup>①</sup>理论的忠实信徒。受犹太复国主义热情的驱使，他1923年奔赴巴勒斯坦，与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统的魏茨曼密切合作，投身于创建以色列工人党的事业。

阿尔索洛罗夫后来受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委托，重返柏林。在柏林他与玛格达恢复了交往，此时，玛格达已是克万特夫人了。玛格达对她的婚姻生活正感无趣，遂做了阿尔洛索罗夫的热心听众，听他大谈以色列

<sup>①</sup> 犹太复国运动的创始人。





建国的远景。他们很快就从讨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未来转到谈情说爱。二人恋情大约始于1928年底，至少持续到1932年春，以阿尔洛索罗夫的猝死告终。

玛格达看上年纪大得多的大亨克万特，也许不过为了金钱和地位，而对年轻狂热、极富个人魅力的阿尔洛索罗夫，她却是满腔真情。

与玛格达熟识的女记者贝拉·弗罗姆曾设想：如果没有戈培尔，玛格达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她料想玛格达会“……口中念叨《旧约》的格言，扛着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集体农庄基布兹里站岗放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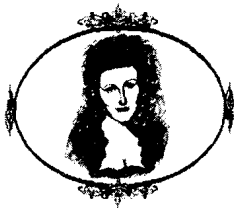
阿尔洛索罗夫曾担任“犹太人代办处”<sup>①</sup>的外交代表，并率代表团参加过伦敦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他1933年6月在特拉维夫被暗杀，凶手身份不详，在政治上可能支持与社民党为敌的修正主义思想。阿尔洛索罗夫遇刺后成了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心目中的偶像，他被尊为以色列的国父之一。

玛格达与克万特的婚姻维系九年，因私情暴露而决裂。克万特因为玛格达不忠，一怒之下把她轰出家门，几乎连行李都不让她收拾。他还嘱咐家人，如果玛格达回来，一定不许她进门。玛格达住到母亲那里，筹划下一步该怎么办。她处境不妙，被看成是造成婚姻破裂的罪人。

然而在克万特家巴伯尔斯贝格住宅的一个写字台里，玛格达曾找到克万特年轻时候写的几封情书，这最终帮她解决了生活费和补偿金的问题。克万特家族担心出丑闻，克万特本人也很干脆地掏了腰包：五万马克供置办新宅，四千马克月俸，两万马克医疗费。儿子哈拉尔德获准跟母亲一起生活。

玛格达这下子有了钱又有了自由身。她为自己在柏林帝国宰相广场2号租了一幢漂亮的大宅。玛格达远在美国的崇拜者，腰缠万贯的胡佛先生得悉克万特夫妇离异的消息，立刻横渡大西洋到柏林向其偶像求婚，结果他竟然遭到拒绝，不禁惊讶万分。但玛格达偏好戏剧性的场面，于是某天晚上，二人在万湖高尔夫俱乐部约会，为此激烈争论了一番。回柏林的路上，胡佛情绪仍很激动，让司机开快车，结果车子翻了。胡佛从撞毁的车里爬出来，安然无恙，玛格达却一处骨折，两处颅骨骨折，被送进了韦斯

<sup>①</sup> 代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国际团体，1929年创立，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海外活动机构，目的是支持和鼓励全世界犹太人帮助建立和巩固以色列。



滕德医院。

玛格达的人生剧变注定会早日到来。1930年夏末，玛格达加入成千上万的激动人群，拥向柏林体育宫，旁听纳粹党的集会。她热衷于交际，本来对政治毫无兴趣，去听会只是出于无聊和好奇。柏林体育宫从约瑟夫·戈培尔1928年9月当上纳粹党柏林省党部头目起，就成了纳粹党经常集会的场所。当晚，体育宫聚集了一万五千人。国会大选在即（1930年9月），纳粹党可望在柏林取得突破，受此鼓舞，体育宫里群情激昂。

一如既往，这天晚上演讲的还是戈培尔。在追随者狂热的欢呼声中，戈培尔身着黑皮夹克和马裤，脚登高筒皮靴，一瘸一拐地穿过一个由行纳粹举手礼的褐衫队员组成的拱廊，登上讲台。

戈培尔那时三十三岁，身材瘦小，脑袋却很大，与单薄的躯体不太相称。他黑发褐眼，幼时罹患小儿麻痹症，一只脚踏下足内翻的毛病，走路不免有些不利索，一辈子病脚都穿着特制的矫正装置。戈培尔在演讲中宣扬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日耳曼英雄理想形象，他自己的外表却大相径庭，因此，他得了个“日耳曼干巴佬”的绰号。

但这个“日耳曼干巴佬”却是个令人生畏、“在街头创造历史”的天才煽动家，他和能争善斗的忠实卫队一道策划暴乱、枪战和政治集会上的殴斗。戈培尔凭借前所未有的煽动宣传和野蛮暴力，短短三年内就使柏林地区纳粹党的选票从区区一百张飙升到十万张。除希特勒外，戈培尔要算是德国纳粹领导层里最有趣的人物了。

1933年夏末的这个小小个子男人，不久之后就被玛格达视若神明。他耽于狂想，同时玩世不恭，奸险恶毒，毫无怜悯之心。戈培尔身上毫不费劲就集中了多重矛盾的性格特征：既有传教士的自信，又常常自卑；既想拯救世界，又有毁灭欲望。他口才便给，极有感召力，做起宣传工作异常出色。

戈培尔只对他崇拜的偶像希特勒忠心耿耿。许多人觉得他阴森可怕，好些人总想躲着他。同代人在排斥戈培尔的同时，也禁不住受他吸引。玛格达感受的是后者。“纳粹思想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她的想像，但玛格达脑中还残留了故友阿尔洛索罗夫灌输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两者混在了一起……”女记者贝拉·弗罗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纳粹的柏林充满了狂热、野蛮和躁动，温文尔雅的玛格达在这里感到



了斗牛场隐藏的魅力。这里才有“真正的生活”！是参与的时候了，玛格达调整了未来生活的航道。

玛格达对戈培尔的演讲印象十分深刻，于是报名参加了柏林-韦斯滕德纳粹地方党小组。这位上流社会知名妇人的加盟，让那里的党徒受宠若惊。玛格达得到指点，很快便埋头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罗森贝格<sup>①</sup>的《20世纪的神话》。

很快，玛格达当上了当地纳粹妇女联盟的头目。但整天和寻常百姓打交道并不合她的胃口，纳粹党的基层组织不适合她。玛格达很快看到，基层发挥不了她的才能。不过，她没有因此背弃纳粹，而是打算向上爬。她来到黑德曼街10号当时的柏林纳粹党总部，报名参加志愿服务。玛格达被分到省党部副主席的秘书处工作，不久就结识了戈培尔，实现了自己计划的第一步。

1930年11月7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一个姓克万特的漂亮女士为我整理了一份私人档案材料。”玛格达会好几门外语，就精心收集了国内外报纸上所有有关戈培尔的报道，她还经常与这位上司交流思想，这自然有益于她的前程。“昨天下午，漂亮的克万特夫人在我这里，还帮我整理了文件。”戈培尔又在日记中注上了这么一笔。戈培尔爱在日记中倾诉一切，从自己的社交生活到各种政治事件，从本人的事业升迁到所卷入的众多浪漫史，林林总总，无所不包。

1930年12月5日，玛格达那天亲眼看见，她所敬重的上司如何终日忙上忙下，一刻不停。事情的起因是电影《西线无战事》举行备受瞩目的首映式。这部根据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小说改编的反战影片感人至深，打破禁忌，反思了英雄战死沙场的传统观念，指出在 frontline 充当炮灰毫无意义。斯特凡·茨威格<sup>②</sup>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在德国，纳粹们几乎绝望了。雷马克这本书……十二个星期里卖出了六十万本，都快要接近一百万了，这真让他们不知所措。这本朴实无华、说真话的书，比十年里能做的所有和平主义的宣传影响都要大……”雷马克揭穿了甘冒枪林弹雨之壮志豪情的虚伪，使之成为笑谈，因而成了纳粹的死敌。戈培尔在《冲锋》杂志上写道“打倒这部烂片子”，然后就着手策划破坏影片的首映式。戈培

① 纳粹种族主义理论家。

② 奥地利著名作家。



尔买下了能买的所有电影票，在首映式上乱扔臭气弹和小白鼠，并威胁观众。六天之后，《西线无战事》“因为有损德国形象”，被撤下了影院的节目表。

四个星期之后，戈培尔已由玛格达·克万特陪伴去魏玛参加纳粹集会。他在会上讲话谩骂犹太人，碰巧他的初恋情人也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讲。戈培尔为两个女人做了引见。1月23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遇到了安卡。她很伤心，去她的吧！终于！终于！我不再喜欢她了，她太散漫了……”戈培尔结识安卡·施塔尔赫尔姆，始于1918年上大学读德国语言文学。他如影随形，忠心耿耿，跟着那个姑娘转了一所又一所学校。为了和她在一起，戈培尔省吃俭用，共换了五所高校才读完学业。他写情诗，任姑娘怎么任性也毫不抱怨，姑娘的母亲是犹太人，对这他也无所谓。而对戈培尔仇视犹太人，安卡也不甚计较，认为他要讲演，就不能免俗地总要提上几句。这段恋情后来告吹，原因很奇怪，并不在于戈培尔极端反犹。安卡虽嫁他人，戈培尔和她仍一直是密友，安卡与丈夫离婚，戈培尔还帮了她。戈培尔在1928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知道过去有多爱这个女人，如今我仍爱她！”只是到了1933年当上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才与初恋情人拉开了一些距离。

要论和犹太人的个人关系，玛格达和戈培尔都经历了感情变迁和前后言行的矛盾。在他们的人生中，犹太人都扮演过重要角色。二人第一次动真情，其初恋者都有犹太血统。1930年二人初识之际，各自都还陷于以往的感情纠葛——玛格达·克万特仍很钦佩哈伊姆·阿尔洛索罗夫，满脑子都是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约瑟夫·戈培尔也还崇拜安卡·施塔尔赫尔姆，仍对她的任性感到苦恼。

1932年，戈培尔在《犹太人有罪！》一文中总结了思想，并开动了庞大的宣传机器煽动反犹情绪。而在1936年间，他仍旧时不时地请安卡喝茶。尽管如此，就像他在11月6日的日记中写的那样，戈培尔认为“犹太瘟疫必须根除”，玛格达则将戈培尔所说的一切视作“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理论的组成部分”，赞同他的想法。

1931年2月1日，戈培尔与这位女秘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昨天下午克万特夫人又来我这儿上班。真是奇妙的女人，我希望她会爱我。”1931年2月15日，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晚上玛格达·克万特来

了，待了很久。这个甜蜜可人的金发美人儿容光焕发，让人心醉。你究竟怎么想，我的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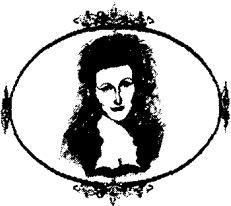
戈培尔将他的爱情历险像记账一样记录下来，事无巨细，还编了号。和玛格达·克万特的此番首次亲密共处，戈培尔编号为（1），然后又转而去谈一些日常琐事：“……和奥纳克一道逛了动物园。丑陋的猴子！这些原始的家伙怎么就变成了北欧人种！”3月10日戈培尔在日记里又写：“……她（玛格达）很晚才回家（2.3）。”五天之后，女友成群的戈培尔先生已在考虑要一夫一妻制了：“我不能再到处用情了，要全心全意追求一个女人……她处世精明也很现实，考虑问题和行事都很大气。我们两人再培养培养就非常合适了（4.5）。”1931年3月26日，戈培尔又写道：“爱情，啊！爱情（8.9）。”

1931年4月2日，冲锋队起来造反，占领了柏林纳粹省党部办事处，企图推翻戈培尔。戈培尔赶紧跑到慕尼黑向希特勒求援，玛格达随后也去了。“她从柏林来了，在旅馆等我，情绪非常激动。真不错！她对我忠心耿耿。”戈培尔终于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然而，玛格达其实还犹豫了很长时间，她和阿尔洛索罗夫仍然关系密切，不知要不要一刀两断。但玛格达没有对戈培尔隐瞒这番心事，反而适度地向他透露了一些，想激他吃醋。就连情敌的身份，她也没打算隐瞒下去，要知道对纳粹柏林省党部的头头儿来说，弄清个把人的身份是不成问题的。4月12日，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戈培尔写道：“我今早打了电话。没人接。后来她终于打电话说：那个她以前爱的男人给了她一枪，让她受了重伤，在她家里。她现在快不行了。从她的声音可以听出，我要失去她了……”

这几行文字真情流露，一派情人间大惊小怪的腔调，说的却并非实情。实情是，阿尔洛索罗夫登门要求负心人作出解释，二人大吵一架，阿尔洛索罗夫开了一枪，但子弹嵌入门框，没人受伤。玛格达的犹太复国主义冒险经历由此而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情史一直为玛格达与戈培尔两人的感情生活戏提供了素材，就像刻意上演痛苦剧情，他们因此吵嘴，旋即又暴风骤雨般地和解。

“和玛格达吵嘴了。她说起过去的事来对我真有点儿冷酷，她还没有斩断旧情……”戈培尔1931年7月23日这样写。7月26日他又写道：



“玛格达的狂热自有其魅力。只有伟大的女人才会像她这样去爱……”几天之后，戈培尔又承认：“我对她的信任动摇了。她过去爱得太深，对我总只肯透露只鳞片爪。我整夜无眠，饱受嫉妒的折磨……”

戈培尔虽爱玛格达，但同时也珍视自己的自由——“我对她的感情过于强烈了。”不难看出，戈培尔对玛格达也会像对其他情人一样，日久不免情衰爱弛。而希特勒的干预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与两个男人同时过从亲密，这种局面总是让玛格达备感刺激，“三角恋”像一根红线贯穿了她的一生。在克万特与阿尔洛索罗夫之争之后，又有了阿尔洛索罗夫和戈培尔，然后又是戈培尔和希特勒，不过希特勒与玛格达之间只能在部分程度上保持柏拉图式的关系。一度还出现过汉克——戈培尔——希特勒的局面！关于希特勒在玛格达的生活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奥托·瓦格纳在回忆录中曾给予答案。瓦格纳1929年到1933年算是希特勒的私人参谋，后来在被英国人囚禁期间，他用蓝墨水在三十六本学生作业簿上孜孜不倦地写下了回忆录。按照瓦格纳的说法，希特勒很快确信玛格达·克万特对纳粹有利用价值。他肯定，玛格达在戈培尔身边露面，一定会提高纳粹党的声望。希特勒驾驭戈培尔总是犹如儿戏，对付玛格达，他则狡猾地耍了一个简单的把戏，从而赢得了后者的热情配合。希特勒偷偷告诉瓦格纳：“即使不结婚，这个女人也可以在我的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她可以在工作中成为我相对的一极，和我片面的男人天性相辅相成……可惜，她没有结婚。”瓦格纳把“元首”的这番秘密表白同样秘密地转达给了玛格达。

这次有目的的泄密，在克万特夫人心里激起了感情的波澜。希特勒放出的这一信息使她相信，“元首”对她有情，然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不便公开表白自己的感情。尽管如此，玛格达兴奋地接受了希特勒交予的任务，通过戈培尔这个中间人，她要奉献自己的余生给“元首”支配。不久之后，党内同仁们就得悉，省党部领导订婚了。

玛格达对纳粹主义表现出不加批评的高度热情，对希特勒的崇拜之心连她的未婚夫也相形见绌。这很能说明问题，因为戈培尔早在1926年就曾写道：“阿道夫·希特勒，我敬爱您，因为您伟大又俭朴……我向您这位更伟大者、政治天才鞠躬……”

玛格达和戈培尔都在希特勒那里争风邀宠，这也是把他们二人维系在

一起的纽带。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听命于希特勒，直到最后自尽赴死，玛格达则更多是为了希特勒而非戈培尔。戈培尔当时却很高兴能找到玛格达这样的人充当合适的媒介，来加强自己在“元首”身边的地位。约瑟夫·戈培尔和玛格达·克万特于1931年12月19日结婚，瓦格纳博士当时的印象是有三个人很高兴。婚礼在克万特家的塞弗兰庄园举行，没有人觉得有必要通知不在场的庄园主人。纳粹的行政事务主管（瓦尔特·格兰措）主持婚礼，希特勒做证婚人，十一岁的哈拉尔德·克万特身穿希特勒青年团制服参加了母亲的婚礼。不久之后，天主教徒戈培尔因为与新教徒结婚被天主教会除名，而同样信奉天主教的证婚人希特勒，仅仅受到了警告。

演员兼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在她半个世纪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声称，玛格达·戈培尔曾很秘密地向她解释了自己的婚姻。“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星期天去海利根达姆郊游的请柬……第一辆车里坐着希特勒以及戈培尔、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和布吕克纳（希特勒的副官），第二辆车里有戈培尔夫人和我。谈了一些琐事之后，玛格达说：‘我当然也爱我丈夫，但我对希特勒的爱更强烈，为了他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可是希特勒除了他外甥女吉莉外不会再爱其他女人了，他一直没能摆脱吉莉死亡的阴影。就像他一再说的，他以后只会热爱德国。认清了这点之后，我才同意嫁给戈培尔，因为这样能接近希特勒。’”据里芬施塔尔称，玛格达还说，她当初是为希特勒跟克万特离婚的。

再婚之后，玛格达不但失去了对儿子哈拉尔德的监护权，还失去了克万特给她的丰厚月俸。哈拉尔德尽管搬到了父亲那里，却仍然每天去看母亲，他很快和戈培尔交上了朋友，融入了母亲的新家庭。玛格达损失月生活费的烦恼很容易得到了解决，希特勒给戈培尔加了一倍工资。

再婚让玛格达最受不了的是与她的亲人决裂。犹太继父对她彻底失望，拒绝与她交往，从此再也没有和她说过话。亲生父亲也公开对女婿表示反感，在收到戈培尔一封粗鲁无礼的信后，愤然离去。只有玛格达的母亲还守在女儿身边，但戈培尔强迫她放弃夫姓弗里德伦德尔，恢复娘家姓贝伦特。她住在女儿家里帮忙养育一群茁壮成长的孩子。

1932年春，戈培尔搬出单身住处，迁入玛格达在帝国宰相广场旁的豪宅，那里遂变成希特勒私人的大本营，纳粹党的内部磋商常在玛格达的沙龙里举行。尽管几乎总是怀着身孕，这位不知疲倦又妩媚动人的女主人从



未厌烦，她给“元首”做素食，还向戈林、罗姆、希姆莱和其他纳粹党大员敞开大门。

希特勒的外事新闻秘书汉夫施滕格尔在回忆录中说：“罗姆中毒（因在柏林凯泽霍夫饭店用餐所致）后，希特勒相信饭店员工中一定混入了共产党。玛格达立即去讨好希特勒，一大早做了素食，用保温桶装着让人送到饭店……”

汉夫施滕格尔还提到戈培尔夫妇向希特勒大献殷勤的其他做法：“希特勒总爱带上我作为‘乐手’（汉夫施滕格尔弹一手好钢琴）。戈培尔很嫉妒，他让人录下希特勒的演讲，在招待希特勒时播放……”汉夫施滕格尔还亲眼看到，“戈培尔夫妇不断想方设法替希特勒找女人做伴”。希特勒住的凯泽霍夫饭店富丽堂皇，在俾斯麦时代是普鲁士乡绅喜欢度假过冬的地方。希特勒在那里虽有一个豪华的套间，但几乎每天都要去戈培尔家，还带朋友一起去。希特勒是个夜猫子，常在戈培尔家里一待就到天亮。戈培尔家在施维洛湖边的卡普特还有幢度周末用的乡间别墅，希特勒也是那里的常客。戈培尔1932年6月20日的日记说：“卡普特——玛格达很高兴——希特勒一直待到半夜……”

玛格达无疑非常喜欢纳粹攫取政权前夕在丈夫身边经历的那段极为忙碌的时期，也就是纳粹所谓的“奋斗时期”。玛格达随戈培尔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和他一起出席纳粹集会。在人群拥挤的集会大厅里，戈培尔以他矫揉造作的特有方式演讲，常常加重单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以造成独特的效果，他的演讲很能蛊惑人心，大厅里弥漫着紧张和暴力的气氛，让玛格达深感陶醉。“在盖尔森基兴对一万五千人讲话，埃森一万五千人，多特蒙德三万人”，戈培尔日记如是记载。

8月初，“元首”邀请戈培尔夫妇去巴伐利亚。戈培尔的日记写道：“乘车从柏林去泰根湖——汉夫施滕格尔夫人，哈拉尔德，玛格尔（不久就要分娩）整夜呕吐……”尽管如此，玛格达仍然兴奋异常，因为大家都感到“政权已唾手可得了”。在上萨尔茨贝格希特勒的山间老巢中，大家和希特勒一起整夜讨论“夺取政权的问题”。戈培尔夫妇最感兴趣的是职位如何分配，戈培尔已把自己当做了普鲁士文化及帝国教育部长。

1932年的德国还有新闻自由，戈培尔充分利用这一点发表煽动文章。而一旦他本人或夫人受到攻击，戈培尔就极为敏感。他会用屡试不爽的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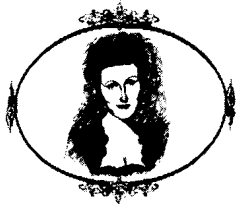
粹方式予以回应：“某个编辑……在某份街头小报上极为卑鄙地诋毁我夫人的名誉。一个党卫军的人到他那里用马鞭狠揍了他一顿，直到他满身是血倒在地上。党卫军的人把名片留在桌上离开了编辑部。那些在场的新闻界可怜虫没有一个上前阻拦……”戈培尔记录了这样一次事件。

1932年12月23日，玛格达流产了，被送进她的妇科医生施特克尔教授的诊所，这位医生本人对她很有好感。玛格达与前夫生的儿子哈拉尔德，每天都和戈培尔去看她，还为她在医院举办了一次小型的圣诞晚会。希特勒给玛格达发去电报，祝她早日康复。12月29日，戈培尔去贝希特斯加登见希特勒，还让玛格达随后也去上萨尔茨贝格希特勒那里参加必不可少的除夕庆祝。但玛格达的健康状况很快恶化，戈培尔遂于1933年元旦返回柏林。他在日记中写道：“噢，上帝，求求你把她还给我吧。没有她我就彻底完了……”

很长时间过去了，玛格达仍然处于危险期，她丈夫却已投入工作了。德意志帝国最小的利珀省马上就要开始议会选举，戈培尔为此设计了一套很有效的竞选策略。其他党派不太重视当地的选举，纳粹党却全力投入，戈培尔派出了成群的宣传员去争取选民。1933年1月15日举行的这次选举中，纳粹党得到了百分之四十的选票。纳粹们将这次选举胜利赞为“利珀奇迹”，暂时忘记了不久之前在帝国国会选举中遭受的失败。

1933年2月1日，玛格达出院，加之一天前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因此有充分理由搞一次小范围的庆祝。戈培尔当时的日记写道：“和埃普、埃塞尔、阿曼以及劳巴尔夫人聚会。汉夫施滕格尔弹琴……”10点，希特勒向公众发表声明，然后，“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戈培尔显得很兴奋。

作为纳粹柏林省党部主席及宣传部长的夫人，玛格达逐渐生出了巨大的政治野心。希特勒在第一次组阁时没有为她的丈夫安排职位，这很让她伤心。戈培尔在2月3日的日记上写道：“玛格达很不高兴，因为我没上去，我被绕过去了……玛格达还在哭。”然而，由于戈培尔在1933年3月的国会大选中做了非常出色的宣传工作，希特勒到底还是报答了他，为他专门设置了大众教育和宣传部。新部长兴奋异常，他宣布，因为要负责德国大众的教育工作，他从今以后“将对人们施加影响，直到他们迷上国家社会主义”。



戈培尔为自己一家置办了新居利奥波德宫。这座宅第位于威廉广场旁边一个风景秀丽的公园里，房子最初是由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建造的。由于“要有很多应酬”，戈培尔决定改建房屋，投入三百二十万帝国马克。房屋内部装饰大多使用了博物馆和国家的藏品，工作间完全装修成红色，家庭主妇得到了水晶、玻璃器皿，还有瓷器、银器及桌布餐巾等物件，可供招待数百人之用，一切开销由国家支付。

玛格达和戈培尔共生了六个孩子，还曾两次流产。黑尔加生于1932年9月，希尔达生于1934年4月，赫尔穆特是1935年10月，霍尔德是1937年2月，黑达是1938年5月，海德1940年10月。除了赫尔穆特显得迟钝，在学校接受能力差以外，其他孩子各个聪明漂亮。他们的名字都以“H”打头是出于母亲的怪癖，玛格达与克万特生的儿子哈拉尔德的名字也这样开头。总的算起来，玛格达在前后十九年里共生了七个孩子，此外流产多次，三次有案可查，其他仅为推测，也就是说，她至少怀孕十次，生产七次。

由于生了一大群孩子“赠与元首”，1938年玛格达成为首位获得“德国母亲荣誉十字勋章”的妇女。希特勒创设的这个奖项，类似授予军人的十字勋章，获奖条件除了要成功生育相应数目的孩子以外（生四个孩子得铜质勋章，六个为银质，八个为金质），母亲还必须符合种族、政治和健康标准，即“有德国血统，没有遗传疾病以及受人敬重”。

平时，玛格达完全按照纳粹理想女性的标准履行女人的职责，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只是在纳粹实现独裁后的第一个母亲节，她才公开亮相做了一次演讲，主题是“德国母亲”。“玛格达今天通过广播电台讲了话……”戈培尔在日记里自豪地记下这件事。不久，英国《每日邮报》的女记者前来采访这位“德国理想女性”，想向她进一步了解纳粹制度下的德国妇女地位。戈培尔夫人对她解释说，英国关于德国妇女被迫放弃工作的报道过于夸张。其实，德国只有三种职业妇女被排除在外：一、军队，全世界都是这样；二、政府；三、司法界。如果一个德国姑娘面临是求职还是结婚的选择，人们总是劝她去结婚，因为这无疑是女性的最佳选择。“我要努力使德国妇女更加美丽！”戈培尔夫人语出惊人地结束了采访。

玛格达自己总是穿戴讲究，涂脂抹粉，为德国妇女做出了好榜样。她曾试图去完善粗线条勾勒的纳粹理想女性形象，但未能成功。1933年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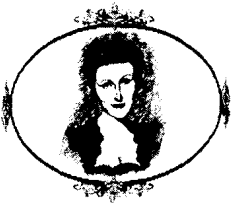


中，玛格达·戈培尔对“时装局”发生了兴趣，一心想当上该机构的负责人，遭到丈夫的坚决反对。1933年7月20日，两人因此大吵一架。几天后，玛格达拒绝与戈培尔一道乘车去拜罗伊特观看瓦格纳的歌剧《名歌手》。戈培尔第二天在日记中愤然写：“我一个人去了……玛格达顽固到底，我就得承担后果……”后来“元首”干预了。“昨天在希特勒那里进午餐，玛格达没来，他很吃惊。我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他，他立即安排飞机把玛格达从柏林接来。她又愿意来了……第一幕（《名歌手》）结束后，玛格达到了。她光彩照人……可情绪很糟……夜里还喝了咖啡。他（希特勒）给我和玛格达调解，真够朋友。”

戈培尔夫妇最初相处得很不错，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戏谑地谈到他在戈培尔家做客的一幕：“玛格达叫了一声‘小天使！’这个地地道道的魔鬼就进屋了。”按照汉夫施滕格尔的描述，玛格达后来体验到丈夫变态的一面：“有一次在家里看完电影，戈培尔脚下一滑差点儿摔倒，玛格达及时扶住了他。惊吓之余，戈培尔掐着玛格达的脖子把她摁倒在地，狂笑说：‘你倒真适合做我的救星！’”

戈培尔当上宣传部长后权势煊赫，家庭生活也变得相当奢华。1936年，戈培尔把家搬到柏林万湖的施瓦嫩韦尔德半岛，住进了一幢华丽的砖结构别墅，那是被纳粹没收的原犹太人房产。戈培尔买房花了三十五万帝国马克，其中八万马克是纳粹出版商马克斯·阿曼支付给他的预付金，以便能在他身后出版日记，戈培尔写日记更卖力了。玛格达从克万特给她的补偿金中拿出了十万马克买房，希特勒也因为“在戈培尔家终年受到热情款待”而资助了七万马克，还有十万马克是抵押贷款。后来，戈培尔还强迫一个犹太邻居卖房，扩大了他的房产，他把那里建成了自己工作和幽会的“城堡”，连玛格达在内的所有其他人都不得进入。这位部长家还有数辆“梅塞德斯”跑车、数艘摩托艇和一艘帆船，供平日享用，以补偿“他们被迫放弃的很多东西”。戈培尔曾抱怨说，自己“没时间上餐馆、泡酒吧、逛剧院，也没有时间散步和照料家人……”戈培尔一旦得闲，就喜欢为玛格达和孩子们读书。

戈培尔最喜欢奥地利作家罗伯特·诺伊曼写的《掠人之美》一书，这本书他几乎能背下来，经常从中得到启发。那作家笔下冷嘲热讽，文风尖刻辛辣，他觉得很是意气相投。尽管如此，戈培尔后来还是毫不犹豫，把



这位 1934 年移居英国的犹太裔作家的著作列入禁书，让人当众付之一炬。

1936 年柏林奥运会期间，玛格达和戈培尔在哈弗尔湖的孔雀岛上招待了三千多名宾客。舞会很精彩，体面高雅，在社交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美中不足，有些从“奋斗时期”混过来的纳粹党徒在舞会上喝过了头。

戈培尔家还拥有一个人“静静湖畔的朴素小木屋”作为乡间别墅——博根湖畔的兰克堡。此处普鲁士后期的贵族房产早先属于玛格达继父的远亲，煤炭企业家弗里德伦德尔-富尔德。柏林市廉价买下此处被没收的犹太人房产，经戈培尔的暗示又将其送给了这位省党部头目和荣誉市民。戈培尔要将这所乡间别墅扩建成一个有五幢楼的宅院，预算开始定为五十万帝国马克。如果花这么多钱就够，或许戈培尔会自己掏腰包，但扩建工程最终花费了二百多万马克。由于房主戈培尔也负责已被收归国有的电影业的运作，乌发电影公司最终支付了这笔扩建费用，并为庄园每年提供高达八万马克的日常花销。戈培尔公馆仅主楼就有二十一个房间和一个电影放映大厅，跟尊敬的“元首”居住的贝格霍夫山顶别墅一模一样。主楼还有先进的空调设备、暖气和很多浴室，此外还有电控窗，这也和希特勒的私宅一样。

戈培尔家庆祝生日总要大摆排场。玛格达三十五岁生日那天，她丈夫在日记中写道：“玛格达得到了很多生日礼物。她如此变幻莫测，一会儿对人好，一会儿又很气人……晚上大型聚会……元首在场。”丈夫过三十九岁生日时，玛格达也安排了一次大型庆典。1936 年 10 月 30 日，戈培尔在日记中充满感情地说：“和玛格达和孩子们一道欢度生日。气氛很好，很热烈。孩子们朗诵了诗歌，然后放了给孩子们拍的电影。他们在电影中可爱极了，就像平时那样。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不断有客人来……元首后来也来了。他很受感动，和我聊得很亲热……在家里吃了饭……贺信、鲜花、礼物堆积如山……随后出门去博根湖……我满心好奇（玛格达让人把房子改造了一下）……房子妙极了……”

不过，玛格达·戈培尔最喜欢的还是在希特勒身边交际应酬。希特勒在总理府举行招待会和宴会，她总能收到请柬，上面写着：“元首和帝国总理有请”。玛格达和戈林夫人艾米·戈林分担第三帝国第一夫人的角色。在这种筵宴场合，她兴致勃勃地履行女主人的职责。大独裁者希特勒的总

理府是由阿尔伯特·施佩尔<sup>①</sup>建造的，二战爆发前，法国驻德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曾将其称为“世界第一宫殿”。在这座“宫殿”里，优雅大方的玛格达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即使是希特勒为少数他所欣赏的演员和艺术家举行小型茶会，玛格达·戈培尔也总在场。惟有1935年秋，玛格达才从希特勒身边消失了一段时间，她因为恶意中伤爱娃·布劳恩，被希特勒暂时打入了“冷宫”。

戈培尔部长绝不是把公务与家庭私生活截然分开的那种人，相反，他时常利用自己的家庭作为制造舆论的工具。为此，戈培尔夫妇和他们那几个出色的孩子总要在德国公众面前摆出一副模范家庭的样子，“希特勒伯伯”也跟他们一道演戏，画刊上刊登了不少表现希特勒喜欢儿童的动人照片。然而，这样诗一般的田园生活却是骗人的把戏。戈培尔是1933年成立的德国文化协会的负责人，统治着德国人的整个文化生活，他操纵戏剧、电影、广播电台和报业，创造或毁灭他人的前程，并且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寻花问柳。

玛格达对戈培尔的风流韵事了如指掌，但很多事情她都忍下了。直到1936年丈夫认识丽达·巴洛瓦，并疯狂地爱上她，玛格达才没有再忍。“下午，不少客人在家里喝茶：埃萝（埃萝·克万特，常在戈培尔家做客）、巴洛瓦、弗勒利希（巴洛瓦的未婚夫）……”1936年11月30日戈培尔在日记里写下这些的时候，还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是《诱惑的时刻》这部意味深长的影片，让戈培尔注意到了捷克女演员巴洛瓦。没多久，戈培尔就利用他掌握的所有手段拼命追求讨好巴洛瓦。年方二十二岁的女演员也没太犹豫就与同是演员的未婚夫古斯塔夫·弗勒利希分了手，与有权有势的部长发生了暧昧关系。戈培尔倚仗自己的地位，并没有对这段婚外恋遮遮掩掩，而是随随便便就和巴洛瓦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不久，戈培尔试图让夫人接受这一三角关系，但后者以离婚相威胁，戈培尔叫苦不迭：“她太顽固，太可恶了！”

玛格达毫不妥协是因为自以为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她本人当时恋上了戈培尔的国务秘书卡尔·汉克，后者心甘情愿做了玛格达的盟友，不仅坚决支持她，并气愤地决定利用平时积累的各种文字材料，要让他的上司把

<sup>①</sup> 纳粹德国首席建筑师。



职位、夫人、女友通通丢光。因此，玛格达得以带着很多复印的情书和一份戈培尔的女友名单等证据，颇为引人注目地跑到贝格霍夫，以一个被蒙骗和被激怒的妻子的名义向她的“元首”求援。玛格达这回却打错了算盘，她的这种敲诈伎俩曾在前夫君特·克万特那里收获颇丰，但在纳粹圈子里却全然徒劳无效。

希特勒暴跳如雷。一般来说，手下干将生活不检点并不会让希特勒烦心，一有了什么新动向，他们的对头总要来他这里打小报告。但这一次牵涉到了政治利益，事情就大不相同了。宣传部长与帝国最著名的“母亲荣誉十字勋章”得主打离婚，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而且戈培尔与巴洛瓦的私情来得也不是时候。那时希特勒正在策划侵占捷克，戈培尔偏偏在这么个时候与一个捷克女人有染，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不合时宜了。另外，帝国作战部长、陆军元帅布卢姆贝格同一个曾当过妓女的女人结了婚，这桩丑闻引起的公众议论还没有平息下去呢。

基于这些考虑，“元首”下了死命令。希特勒禁止戈培尔再与巴洛瓦交往，命令戈培尔夫妇继续和平相处。戈培尔妥协了：“生活太艰难，太无情了。”而那位帝国第一夫人也体会到了第三帝国闪光外表后面那冷酷无情的权力，她意识到，她已把自己交给了怎样的一股强权势力并任其摆布，不管愿不愿意，目前她需要继续扮演自己所选择的角色。她曾设想从纳粹统治圈退出或是退隐家中，但这根本不可能，因为第三帝国是不会容许一个人客串了主角又随心所欲地放弃的。

丽达·巴洛瓦被驱逐到布拉格，她本人回忆往事时对此却有不同的说法：“当时我厌烦透了，想离开德国。”不管怎么样，虽然一直是个很成功的女演员，巴洛瓦优秀的职业生涯突然终结，随后而来的是一段动荡的生活。二战结束后，巴洛瓦因为勾结纳粹在布拉格蹲了一年半监狱。1946年，她嫁给了捷克共产党政府的内政部长，与他一起逃到了奥地利。有段时间她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演电影，也上过德国的戏剧舞台。她写回忆录绝口不提与戈培尔的风流韵事，年届高龄时仍然坚持这一说法：“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938年戈培尔失宠了，但他知道如何做定能赢回主人的信任。这年的11月9日，戈培尔策划了所谓的“帝国水晶之夜”（迫害犹太人之夜），这天晚上发生了大量由上层操纵的反犹暴力行动。次年，这位宣传部长又

采取了越来越极端的反犹步骤，他效仿中世纪犹太人必须自我标识的做法，规定犹太人必须佩戴犹太标志“大卫之星”。他还下令拍摄恶劣的煽动宣传电影《永恒的犹太人》。玛格达的密友埃萝·克万特曾问她对此有何看法，玛格达说：“约瑟夫（戈培尔）给我的解释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第三帝国既然反对犹太人，他只能去完成交给他的任务，通过报纸和电台对付犹太人。元首想这样，约瑟夫只能照办。”

1942年“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被提上日程后，玛格达向埃萝抱怨：“他告诉我的一切真可怕。我简直受不了了……你根本想不到他都对我说了些什么我才如此烦恼，我还不能对任何人说心里话。他不许我对人谈及此事，我已经向他做了保证……”

就像在纳粹早期策划集会斗殴一样，戈培尔又在创作全面战争的剧本。随着战事的发展，“元首”向“他的人民”发表讲话的次数越来越少，其他纳粹党魁们也纷纷逐渐退隐，而戈培尔及其夫人却从来不怕抛头露面。宣传部长去视察轰炸现场时，他夫人也在考虑要做哪些事情达到宣传之效。她自愿承担战时义务，乘有轨电车去德律风根电气公司的工厂参加劳动，在家里，她要求客人定量用餐。

随着覆灭之日的迫近，希特勒的其他手下干将纷纷离开柏林以求自保，而戈培尔和玛格达却在为上演纳粹末日戏剧性的最后一幕做准备。1945年4月22日，希特勒允许他的宣传部长住进总理府的地下室。同一天，“元首”发布了臭名昭著的告全国人民书：“你们要记住！任何宣传或者赞成那些旨在削弱我们抵抗力量的措施的人，都是叛徒！他该马上被枪毙或者吊死！”

戈培尔表白说：“蒙古人的进攻在我们的城墙下必被瓦解。我和我的手下自然要留在柏林，我的夫人和孩子现在在这里，也会一直留在这里。”这可是一次思想转变，因为3月28日他还在日记里说，他夫人正准备把孩子们撤到施瓦嫩韦尔德去。

玛格达带孩子来到柏林的“元首大本营”，住进地下室前部的四个房间里，一日三餐就在地下室宽阔的过道里吃。戈培尔自己和希特勒及爱娃·布劳恩住在更深一点的主地下室里。戈培尔总在发疯般地写着日记，而他夫人一会儿给孩子们读书，一会儿又与他们游戏，显得格外平静。年轻的格哈德·博尔特上尉当时在地下室里做勤务员，他回忆道：“戈培尔夫



人自始至终没有露出丝毫怕死的神态。她常常一步两阶登上螺旋楼梯，劲头十足又不失优雅，对每个人都报以亲切的微笑……她性格如此刚强，真让人佩服，能做到这一点，或许是因为她狂热地相信希特勒。”

玛格达也许不会为自己和孩子的命运哭泣，但当4月27日希特勒从西服翻领上摘下自己的金质纳粹党徽给“帝国第一夫人”戴上时，受奖者还是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她写道：“昨天晚上元首给我戴上了他的金党徽。我很自豪，很高兴。但愿上帝能使我还有力量去做那件最后最难的事情。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至死对元首效忠。我们能与他一起结束生命，是命运的恩赐，这个我们以前根本不敢想像。”

4月28日，玛格达给她与前夫之子哈拉尔德·克万特写了一封信，她并不知道那时儿子已被关进了苏联人的战俘营。玛格达当时已决意要杀死自己的孩子，这封信充分证明了她是怎样的一个狂热分子：

“亲爱的儿子！你爸爸、你的六个小弟弟、小妹妹和我，现在已经在元首的地下室里待了六天了。我们留在这里是为了以惟一可能的、光荣的方式结束我们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生命。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封信……你应当知道，我是违背你爸爸的意愿和他留在一起的。上个星期天元首还想帮我离开这里。你了解你的母亲，我们有同样的性格，我没有丝毫犹豫。我们美好的理想破灭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美好、值得钦佩、高尚、优秀的事物也随之而去了。在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到来的世界，不值得我们为之生存，所以我把孩子们也带来了，让他们在我们身后的世界上活着，可惜他们了。我亲自给他们解脱的时候，仁慈的上帝会理解我的。你要活下去，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忘记，你是德国人，永远别做有损荣誉的事情，要努力使你的生存不辜负我们的死亡。

“孩子们是好样的。他们完全靠自己就适应了这里再简陋不过的环境。不管是睡在地上，还是能不能洗澡，能不能吃上饭，他们从不抱怨，从不哭闹。炸弹爆炸震动了地下室，大一点儿的孩子立即去保护小的。他们在这里还算是一件好事，他们还能时不时地让元首露出笑容。”

接着，这位纳粹政权的第一夫人又向儿子提出忠告：“要忠诚，对自己，对别人，对你的国家都要忠诚，在一切一切时候！……要为我们感到骄傲，要尽量努力自豪、高兴地怀念我们。人总归要死，生命虽然短暂，但活得光荣、活得勇敢，不比在可耻的境遇里苟且偷生更好吗？信得发走



了，由汉娜·赖奇带出去。她要开飞机再冲出去！最衷心、最亲切、最慈爱地拥抱你！我亲爱的儿子，为德国活着！你的母亲。”

戈培尔也在信中对哈拉尔德说，他要树立一个“忠诚的榜样”，哈拉尔德可以为属于这样的一个家庭自豪。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清白、圣洁地面对世人。清白、圣洁，就像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目标一贯的那样”。

这份遗嘱交给了汉娜·赖奇，她又成功地从被包围的柏林城中飞了出去。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和刚刚与他举行婚礼的爱娃·布劳恩向大家告别，准备自杀。玛格达惊恐万分，喊：“元首，别离开我们，没有你我大家都会悲惨地死去！”希特勒的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正在照料戈培尔的孩子吃饭，突然听到希特勒的工作室里传出一声枪响。对于玛格达喊话的意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阿尔伯特·施佩尔认为，“……想到孩子们要被杀死，她实在受不了，但看上去她似乎又不得不服从丈夫的决定。”

戈培尔的两个亲密助手对此持有异议。他们称曾经听到戈培尔建议夫人带着孩子逃到西边去，因为她对英国人没什么好怕的。

但在1945年5月1日，戈培尔夫妇的自杀已成定局。希特勒的女秘书和爱娃·布劳恩的女佣莉泽尔·奥斯特塔格，曾请求戈培尔夫妇把孩子交给她们，她们可以把孩子们带到巴伐利亚躲起来。但戈培尔不同意。报务员罗胡斯·米施描述了当时阴森恐怖的情景：“戈培尔叫了一声：‘孩子们留下来！’地下室立刻出现了悲剧性的一幕。所有的女人、炊事人员和办公室人员都进来向戈培尔夫人下跪，为孩子们求情。女飞行员汉娜·赖奇又来了，她愿意再开飞机把孩子带出柏林。戈培尔夫人拒绝了。天亮了，戈培尔夫人在我的房间里为孩子们做准备。她给他们穿上白衣服，为他们梳头。戈培尔当时不在场，施通普夫埃格医生去了他们那里。璩曼医生告诉我：‘让他们喝点儿糖水，他们就完了。’”

戈培尔请施通普夫埃格医生给他们的孩子黑尔加、霍尔德、希尔达、黑达、海德、赫尔穆特服一种速效没有痛苦的毒药，医生拒绝了。他们最后大概是先吃了安眠药，然后由一名躲在总理府贮煤室避难的医生注射毒剂而死。

大约19点30分，戈培尔下达命令，让人在他们夫妻死后焚毁尸体，烧之前给每具尸体再补一枪，确保他们死亡。20点30分，戈培尔夫妇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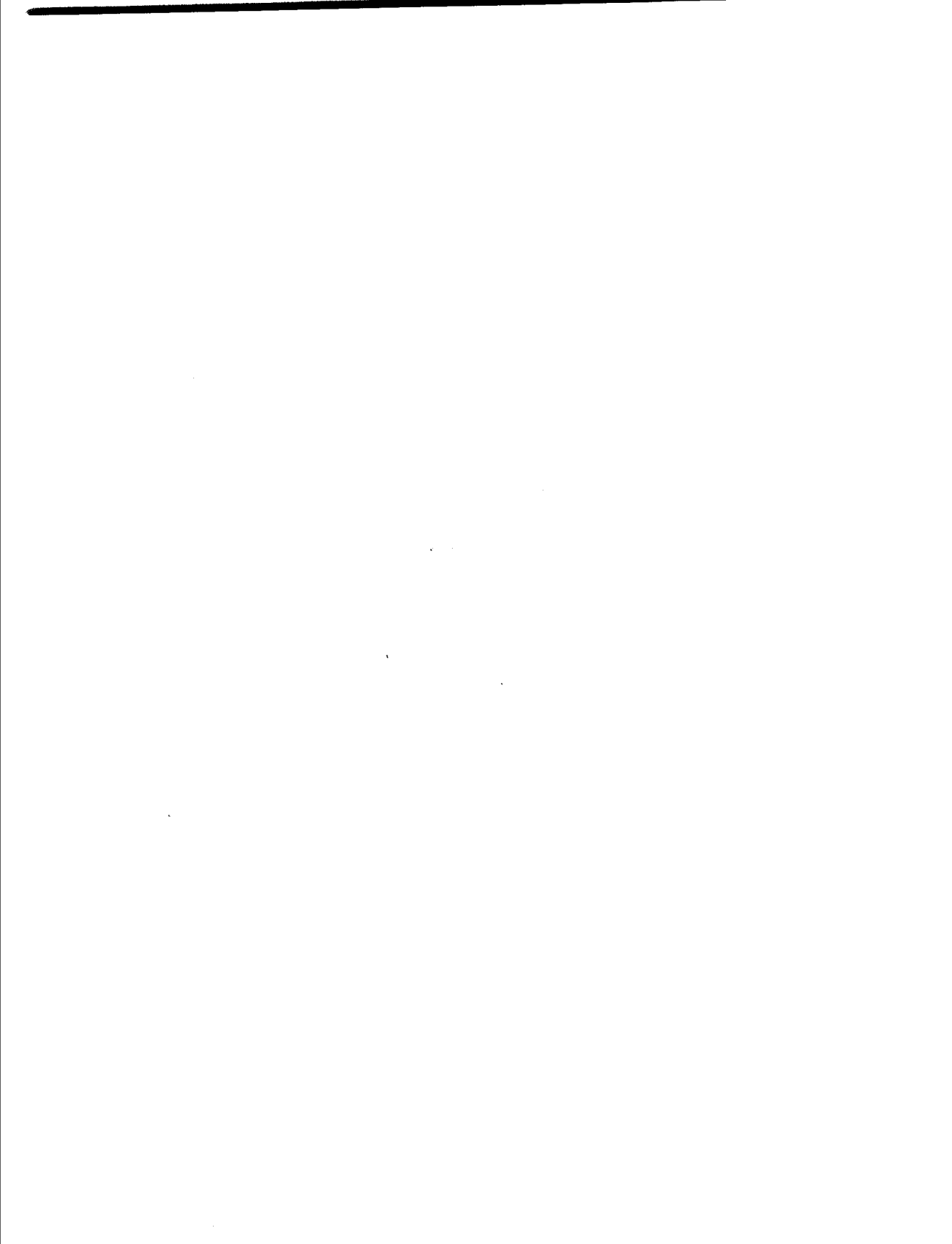
众人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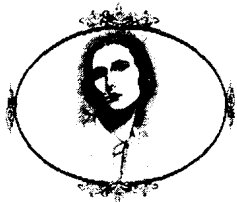
戈培尔像平常一样仔细穿戴好，戴着礼帽和手套，伸出胳膊，让一脸死灰的玛格达挽着，走上楼梯。戈培尔还笑道，这样死就省得让活着的人再费劲把尸体抬出去了。戈培尔开枪自杀，玛格达服毒自尽。



纳粹的“御用”女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







让女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在国际上一举成名的影片名叫《意志的胜利》。这是她1934年拍摄的一部有关纽伦堡纳粹党全国党代会的纪录片。影片名作为她生活的座右铭似乎也挺合适。孩童时期，莱妮·里芬施塔尔就以钢铁般的意志、坚韧、雄心勃勃和兴趣广泛著称。1902年8月22日，她生于柏林一个商人之家。生了这么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儿让其父母大伤脑筋。小丫头太爱说话，太爱问问题了，有一次乘有轨电车时，同车的人不得不要求她父母让他们那个呱呱呱说个不停的孩子闭嘴。四岁时莱妮就喜欢上了戏剧和舞蹈。很快她又显示出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有一次，她在柏林动物园里表演溜旱冰特技，招来一大群人围观，直到警察出面干预才作罢。

莱妮从柏林科尔莫根施高级中学毕业时成绩优异，数学、体育和绘画都是全班第一，但老师给她平时表现打的印象分很低，这使她的总体形象受到了影响。老师认为她表现差的原因之一是，有一次她竟然爬上学校的房顶，想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学校不上课的日子把国旗升起来。

倔强的莱妮后来提出要去学跳舞，但这个要求被同样倔强的父亲断然拒绝。在母亲的掩护下，莱妮未经父亲许可偷偷去上了舞蹈课。后来做父亲的碰巧听说女儿参加了舞蹈学校的一次演出，这件事使莱妮的父母闹得很僵，阿尔弗雷德·里芬施塔尔甚至威胁要和妻子离婚。后来出于无奈，他还是让步了，甚至亲自为女儿在叶夫根尼娅·爱德华多娃芭蕾舞学校报了名。不过他同时警告莱妮说，跳舞没什么前途！叶夫根尼娅·爱德华多娃曾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著名的单人舞演员。她教莱妮学跳古典芭蕾舞时，后者已经十九岁了，通常她的学员都是从六岁开始学跳舞。莱妮成了她最好也是最有抱负的学生，但是莱妮为此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她在短时间内一连三次扭断踝骨，但她并没有气馁。后来遇到风险和艰难困苦时，她同样从不退缩。

1923年10月23日，莱妮·里芬施塔尔首次登台表演单人舞。母亲为她设计并亲手缝制了富于想像力的演出服。里芬施塔尔自己编排了节目，共有十组舞蹈，跳得她筋疲力尽，演出获得好评。第二天晚上，里芬施塔尔又在柏林表演了组舞《爱——火——奉献——解脱》，一举成名。著名戏剧导演马克斯·赖恩哈特邀她加入德意志剧院，接着她又到欧洲各国首都巡回演出，获得巨大成功。然而好景不长。1925年，莱妮·里芬施塔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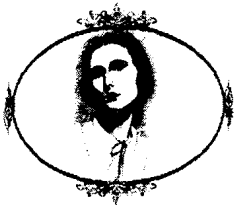
在布拉格为三千名观众表演时膝部受伤，致使她不得不取消预定的巡回演出。所有医生都劝她耐心休养，并让她拄拐杖。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忘却烦恼，里芬施塔尔一瘸一拐地走进一家电影院，观看了由路易斯·特伦克尔主演的《命运之山》，深受吸引。她又先后六次去电影院看这部片子，还亲自去她的“命运之山”——意大利布伦塔河畔的古利亚山实地考察了一番，最后她下定决心自己也要去演一部山岳影片。通过朋友介绍，里芬施塔尔还真的与《命运之山》的导演阿诺尔德·范克见了面，并彻底征服了对方。范克博士职业是地质学家，同时他又是弗赖堡山岳和体育电影协会的创立者。他被称为高山纪录片的先驱，首创了所谓“山岳电影”这一片种。他那具有革命性的导演技巧和巧妙的剪辑技术曾引起很大轰动。

里芬施塔尔的美貌、口才以及在舞蹈方面的成就，给范克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立即答应聘请里芬施塔尔与当时已经很有名的路易斯·特伦克尔搭档主演一部电影。至于里芬施塔尔有点“白眼”，也就是说有点斜视，倒并没有什么妨碍，因为当时人们觉得这样更显浪漫。范克计划拍的这部故事片名叫《圣山》，其中将有里芬施塔尔的舞蹈表演。然而，实现这一计划还遥遥无期，因为莱妮·里芬施塔尔已被确诊膝关节半月板断裂并有软骨增生，走路都很困难，更别说跳舞了。里芬施塔尔最后下决心要做手术。这在1925年时可不是个普通手术。里芬施塔尔一连住了三个月医院，并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因为弄不好会落下关节僵硬的残疾。但是她那种永不气馁的乐观主义精神终于又取得了胜利——手术成功了。里芬施塔尔还在住院的时候，阿诺尔德·范克就开始帮她熟悉她在影片中将扮演的角色。

《圣山》并不是在摄影棚里拍的，而是在瑞士的山里，在瑞士滑雪胜地伦策海德的高山湖上和德国北部的赫尔果兰岛上实地拍摄的。为了演这部电影，里芬施塔尔必须学滑雪，这让她又扭断了踝骨。女主角脚上打着石膏躺在床上的时候，花巨资用冰建起来的十五米高的自然布景也在逐渐融化。此外，其他灾难也接踵而至。两名男演员和一名摄影师也先后受了伤，不得不被送往科尔蒂纳接受治疗。大家都认为《圣山》拍不成了。郁闷的导演只好启程前往柏林，向影片赞助商乌发电影公司作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里芬施塔尔抓起摄影机，主动而且是自费拍摄了六百



米的自然场景胶片，从而挽救了这部影片。乌发答应继续拨款，剧组随即来到赫尔果兰岛上继续拍摄。波涛汹涌之间，但见莱妮·里芬施塔爾在海岸边湿滑的岩石上翩翩起舞，小提琴手站在峭壁上拉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为她伴奏。

影片拍摄过程中，范克博士还将导演电影的秘诀渐渐透露给了他的女主角。最终，里芬施塔爾又将从范克那里学来的技术发展到了极致。

莱妮·里芬施塔爾对范克教她学习导演电影的经历作过以下描述：“他教我必须学会拍好所有的东西：人物、动物、云、水、冰……每次拍摄都要争取超过一般水平，要打破常规，尽量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观察一切事物。他让我透过摄影机镜头看场景，学会挑选合适的片断，还让我了解负片和正片，以及用不同的焦距、镜头和彩色滤色镜拍摄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我觉得，拍电影可以成为我的一项使命，可以给我的生活带来新的内容。同时我也认识到，干电影这一行，个人根本算不了什么，所有事情都要靠集体协作才能完成。”（《冰天雪地里的战斗》，莱妮·里芬施塔爾）后来，里芬施塔爾又到弗赖堡一家胶片冲印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学习冲、印，特别是电影剪辑技术。

1926年12月14日，《圣山》在乌发电影宫首映。首映式上，莱妮·里芬施塔爾和着弗朗茨·舒伯特《B小调交响曲》（未完成）的旋律作了芭蕾舞表演。大部分媒体都对这部在阿尔卑斯山里拍的浪漫爱情剧及其演员大加赞赏。1926年12月16日的《新普鲁士十字架报》评论道：“莱妮·里芬施塔爾以完美的舞姿跳出了大海的韵律，以始终如一的和谐给剧中发生的那些动人以及可怕的事件带来了生气。”12月18日的《柏林地区报》对这部本地产的电影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影片中所有场景都是那样宏大——大自然、群山、人……只有心灵纯洁、天真无邪的孩童才会对生活、爱情和忠诚产生这样的想像。崇尚自然的人们可以从片中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情节中看到、联想到和感受到圣杯<sup>①</sup>主题……”有一家报纸的评论倒是更符合现代人的欣赏标准。12月20日的《星期一早报》有言：“如果是仅仅为了让人打呵欠倒也罢了。这部电影不光无聊，而且虚伪……夸大的自然崇拜，令人无法忍受的矫揉造作——它只能让人联想到

① 圣杯是北欧人顶礼膜拜的一种圣物，象征超自然的力量。



《华亭报》<sup>①</sup>。”这样的影评在欣赏这部影片的人看来只不过是那些“一心只想着赚钱、亵渎民族精神振兴事业”的媒体的产物（保罗·伊克斯为《冰天雪地里的战斗》一书撰写的前言）。

这部影片是里芬施塔尔电影演员生涯的开端。1927年，她又演了影片《大飞跃》。1928年，她离开山的世界，在影片《哈布斯堡王朝的命运——一个帝国的悲剧》中扮演奥匈帝国皇储鲁道夫<sup>②</sup>的情人玛丽·费采拉。但这部影片并不太成功。1929年，她又演了一部山岳片——《皮斯·帕卢的白色地狱》。这部片子由著名导演格奥尔格·威廉·帕普斯特执导，片中的自然场景是阿诺尔德·范克拍摄的。1930年，莱妮·里芬施塔尔专门上了运噪课，并在《勃朗峰的风暴》一片中实现了从无声影片到有声影片的过渡，技巧之娴熟就如同她按照电影剧本的要求，踏着摇摇晃晃的梯子跨越一道深深的冰川裂谷一样。

1931年，莱妮·里芬施塔尔创建了一家电影制片公司，开始实现自己的想法。她执导的首部电影名叫《蓝光》，她本人还在影片中扮演农家少女尤塔。女导演初试身手就在1932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银奖，影片在巴黎和伦敦分别上演了十四周和十六周。

按照莱妮·里芬施塔尔本人的说法，在她到德国各个城市亲自推介这部作品过程中，她首次注意到一个名叫希特勒的政客在公众心目中的巨大影响。为了亲眼看看希特勒到底是何等人物，里芬施塔尔到柏林体育宫去听了一次希特勒的演讲，结果她被这个天才煽动家征服了。尽管当时正在忙于紧张地准备赴格陵兰岛，她还是通过“褐色大楼，慕尼黑”<sup>③</sup>这个地址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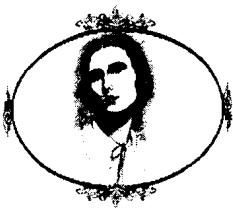
“尊敬的希特勒先生，最近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了一次政治集会……我得承认，您以及听众所表现出的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想见您一面，不知可否？……”

让里芬施塔尔大吃一惊的是，她很快就收到了希特勒的回信，于是就有了这个纳粹政客与女导演的首次会面。她惊奇地发现，平常的希特勒与

① GARTENLAUBE——《华亭报》，是19世纪一种发行量很大的大众刊物。

② 鲁道夫是奥匈帝国伊丽莎白皇后，（即茜茜公主）惟一的儿子，与美丽的男爵小姐费采拉相恋，后来人们发现两人一同死在一个猎人小屋里，死因众说纷纭。

③ 纳粹党总部。



作为政治煽动家的他竟有那么大的区别。在她眼里，希特勒亲切可爱，充满个人魅力。两人一起在北海边浪漫地散步，希特勒详细询问了女艺术家的工作情况和未来计划。

与希特勒会面后，里芬施塔尔随即启程北上，参加一次对格陵兰岛的科学考察。此行还产生了一部影片——《冰山呼救》。她在片中扮演勇敢的女飞行员黑拉，在冰山雪地中寻找失踪的丈夫。著名飞行员恩斯特·乌德特（即后来的“魔鬼将军”）负责为影片制造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莱妮·里芬施塔尔后来描述了在格陵兰岛的历险经历：“他开飞机穿过冰山间的狭窄通道，忽而贴着悬崖峭壁陡然爬升，忽而又陡然向下俯冲……有一次，我吓得都喘不过气来了……当时他正打算从一座冰山上那些高耸入云的陡峭冰塔间穿过去，突然发觉机翼过宽，最后关头，他突然侧转机身，像一道发狂的闪电一般从冰塔间穿了过去，紧接着又突然把飞机掉了个头……拍完这个镜头之后……我们就收工了。”（《冰天雪地里的战斗》，莱妮·里芬施塔尔）为了增加戏剧性效果，莱妮·里芬施塔尔在198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又补充了一段她从乌德特燃烧的飞机中侥幸逃生的情节。

1932年底，里芬施塔尔返回德国。自此之后，她经常出席纳粹高官的宴会和社交活动，比如戈培尔家为意大利航空部长巴尔博举办的招待会她就参加了，而且聊得非常开心。“玛格达和莱妮·里芬施塔尔与巴尔博开玩笑。”戈培尔当时的日记写道。一般来说，里芬施塔尔参加的这些社交活动都可以通过目击者或有关的文字材料得到证实，但是有一些她与希特勒的私人交往是否确有其事，则只能听她的一面之词了。里芬施塔尔在回忆录中称，1932年12月8日，她在柏林听了一场音乐会，回家的路上遇到希特勒的副官布吕克纳，他把她带到了希特勒那里。“他和我握了手，然后便在屋里走来走去。他满脸煞白，散落在前额的头发被汗都浸湿了。突然他开口说道：‘这帮叛徒，胆小鬼！我们就快要大获全胜了。这帮笨蛋！我们都奋斗了十三年，付出了一切……现在可好，目标马上就要实现了，他们却叛变了！’随后他抓着我的手，眼睛盯着我说：‘谢谢您来。’我连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房间。”

此情此景不光听起来像虚构的，而且的确是虚构的。希特勒很少和女人谈论政治，在里芬施塔尔提到的1932年12月8日那一天，他也没有这么做过，因为他整晚都在戈培尔家。里芬施塔尔在回忆录中谈到的其他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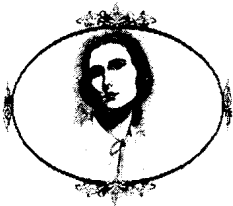
多次与希特勒的会面听上去也不符合事实。据她说，两人会面时，希特勒经常会突然盘问似的拿一些话来激她，比如“您信上帝吗？”或者“您可是有种族偏见”。

里芬施塔尔演的第一部电影希特勒就看过，因为他是里芬施塔尔在《圣山》中的搭档路易斯·特伦克尔的影迷。对里芬施塔尔自己制作的影片《蓝光》，希特勒最喜欢的是其中的群众场面。他曾赞道：“里芬施塔尔自己从村子里找群众演员，这一点她做得很对。”（《希特勒秘密谈话录》）希特勒从里芬施塔尔的处女作中看出了她的才华，他考虑的是如何让这种才能为我所用。主管纳粹党全国宣传工作的戈培尔也伸出触角，对女导演的政治立场进行了一番考察。他在1933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见了莱妮·里芬施塔尔。她谈了自己的计划。我建议她拍一部希特勒的电影。她很感兴趣。”但是里芬施塔尔最终并没有拍这部关于希特勒的英雄史诗片。里芬施塔尔究竟如何推掉这项任务的，人们只能瞎猜了。

实际上，希特勒和戈培尔后来又另有打算了。5月26日，他们把女导演请到波罗的海边度周末。戈培尔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昨天去海利根达姆玩得很好。野餐搞得不太成功，但海边风光美极了！头儿（希特勒）一道去了。还有莱妮·里芬施塔尔……和头儿一起一直待到深夜。”看来，女导演这次露面使希特勒和戈培尔对她产生了信任，于是他们请她为纳粹党拍一部电影。戈培尔在1933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与里芬施塔尔小姐商量拍一部新电影。她是那些明星中惟一理解我们的人。”

两天之后，大家达成协议。据戈培尔日记记载，“里芬施塔尔和希特勒进行了磋商。她答应拍这部电影”。希特勒并没有对女导演施加压力。她为纳粹党拍的第一部片子名为《信仰的胜利》，是有关纳粹（第五届）全国党代会的纪录片。女导演说，这部影片是“胜利之年纳粹运动阅兵式的真实写照”。德国宣传部电影司是影片的制片人。1933年12月1日，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信仰的胜利》首演。

里芬施塔尔在回忆录中经常充满怨恨地谈到戈培尔恨她，干扰她的工作，还调戏过她。戈培尔本人对此似乎一无所知，从他每天记的日记中也一点都看不出他憎恨这位女导演。“晚上与玛格达和莱妮·里芬施塔尔一道看了《蝴蝶夫人》，随后又坐在一起闲聊。”戈培尔1933年5月17日的日记如是记载。



第二年，纳粹党又来找里芬施塔尔帮忙。女导演在《党代会影片幕后》一书中写道：“元首第二次给我的任务是，用电影艺术化地描绘纽伦堡全国党代会（1934年9月4日至10日）。”

里芬施塔尔当即将她的电影公司命名为“党代会电影公司”，随后就开始了工作，“因为完成这项任务的愿望战胜了所有疑虑、踌躇和障碍”。（《党代会影片幕后》）女导演面临的问题是拍一部长达两个小时又没有故事情节的纪录片。只有靠艺术和技术上的创新才能拍好这部片子。希特勒承诺里芬施塔尔可以在创作方面享受充分自由，于是她决定让这部党代会纪录片具有电影新闻短片的特点，用各种方法使党代会上那些无休止的列队游行看上去不显单调。

女导演的工作条件并不理想。首先，只有两周时间供她做全部拍片的准备工作。此外，党代会的组织者只是被迫才答应配合她拍片。不少纳粹党人觉得，党在纽伦堡卢伊特波尔德海因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有这一帮拍电影的在场显得太不严肃，因此他们处处给女导演及其摄制组设置障碍。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在会议现场拍新闻短片的阿尔法、托比斯-梅洛、福克斯和派拉蒙等四家电影制片公司的摄制组，也与里芬施塔尔的党代会电影公司展开了激烈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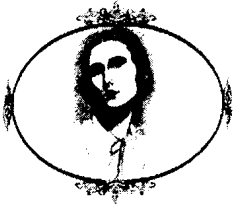
里芬施塔尔的导演风格和在艺术方面的苛求使她得罪了不少人。但是，她利用从好莱坞空运来的一套摄影装备，在摄制组一百二十名成员的帮助下，最终战胜了所有对手，也驳倒了所有非难，并创造了电影的历史。拍摄过程中，里芬施塔尔想出了无数独创性点子，并在技术上不断大胆创新，从而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此后一代又一代电影人都从里芬施塔尔身上获得了启发。她创造的很多特技摄影技巧如今已经成了所有纪录片制作的标准操作模式，比如为了达到移动拍摄的效果，里芬施塔尔让人在旗杆上装上小电梯，有几个高达三十八米，这在当时绝对是创新。此外，她还让摄影师学滑旱冰，这样他们就能用便携摄影机拍摄出效果更好的移动图像。希特勒专机降落的场景是摄影师站在房顶上拍摄的。拍摄游行方队的场面更是惊险，摄影师站在活动的消防云梯上，一面随着方队行进移动镜头，一面从高空一直降到游行队伍面前。里芬施塔尔还让人在讲台四周铺上轨道，这样在拍摄希特勒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和随后其他人的讲话时，摄影师就可以通过不断移动机位，拍摄出特殊的视觉效果，使讲话场

面不显得过于单调。出于同样的目的，女导演还让摄影师把纽伦堡市容、希特勒青年团的营地和冲锋队的篝火等党代会所有的配合场景也摄入了镜头。

党代会上，数十万人排着方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操练步伐通过主席台，向他们的“元首”致敬。摄影师们蹲在坑里不间断地拍了五个小时。主席台上，希特勒一动不动地站着接受致敬；台下则是一片旗帜的海洋，看上去就像一个邪教大祭司在举行精心安排的盛大典礼。这是一部好莱坞式的鸿篇巨制，党代会的组织者戈培尔可以完全满意了。连列席这次纳粹党代会的众多外交官和贵宾（坐了满满一列专列）也深为所动。女导演里芬施塔尔事后编了一本以日记形式介绍这部影片拍摄过程的画册（《党代会影片幕后》），由纳粹埃尔出版社出版。她在书中对这部片子还有她本人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书中共有十六张希特勒的照片，而她本人的照片则有三十七张，拍的都是她在狂热工作的情景。里芬施塔尔后来声称，她多少是出于被迫才拍这部片子的。有了这些照片，她这种说法就显得很荒谬。

里芬施塔尔精心制作的这部影片给人印象至深，任何评论都显得多余：《意志的胜利》这部由希特勒亲自命名的影片是一部独特的时代文献，宣扬了纳粹党的成就，被纳粹党用做名片和广告。影片不仅在德国，在国外也引起极大的兴趣。里芬施塔尔也因此成了国际知名导演。在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她的成就得到了肯定，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亲自向她颁发了金质奖章。

有意思的是，《意志的胜利》这部影片中几乎没有德国国防军的镜头——倒是有“褐衫军在前进”这一片断，纳粹妇女协会的镜头也同样少得很。妇女们对此倒没有抱怨什么，而将军们则提出了抗议。当时德国国防军正在重建，装备很差。直到1935年，这支正规军队才在纽伦堡纳粹党代会上首次正式露面。有人怀疑《意志的胜利》忽略德国国防军是纳粹党领导层事先有意安排的，而将军们则否认有这么回事。里芬施塔尔最后不得不对此予以弥补。1935年，纳粹党出资让里芬施塔尔拍摄了一部有关德国军队的短片，片名是《自由之日》。这部仅用两天时间就拍成的片子记录了部队训练的场面。影片在柏林德国总理府首次公开放映，包括希特勒和一些高级军官在内的两百多人出席了首映式。乌发电影公司后来将这部短



片放在故事片前加映，以宣扬国防军的成就，为其作广告。

不久之后，第十一届夏季奥运会组委会来请莱妮·里芬施塔尔拍一部有关这次奥运会的影片。这届奥运会将于1936年8月1日至16日在柏林举行。女导演一开始很犹豫，因为她知道这项任务的难度。她的老师范克曾经拍过1928年在瑞士圣莫里茨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结果很不理想。里芬施塔尔考虑再三，反复设计方案，最后得出结论：光去拍那一百项比赛的场景一定枯燥无味，她要拍一部反映奥林匹克精神的片子。

“突然，我仿佛看见古奥林匹亚的建筑遗址从团团云雾中浮现。接着，古希腊的庙宇和雕像也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我的眼前，阿基里斯、阿芙洛狄忒、美杜莎和宙斯……后来又出现了米罗的掷铁饼者。我想像他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开始用慢动作投掷铁饼。紧接着，那些雕像又变成古希腊庙宇中的祭祀舞者。她们化成了火焰——奥林匹克圣火。人们点燃火炬，从宙斯神庙一直传递到1936年的现代柏林——在古今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里芬施塔尔对她设想的奥林匹克电影的序幕作了上述描述。

女导演的构想受到热烈欢迎。但她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这部影片让奥运会组委会很难接受。组委会官员指出，这部片子反映的是现时的主题，奥运会结束几年后就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了，而且这样一来为这部影片投资也要承担很大风险。里芬施塔尔最终还是克服了重重阻力。1935年，她就将这部奥运会片登记注册（合伙人是莱妮·里芬施塔尔和她弟弟），开始从电影信贷银行贷款拍片。这家银行属于德国宣传部，它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操纵并控制了纳粹时期的所有制片活动。

为影片《奥林匹亚》的筹资问题，宣传部长戈培尔曾与里芬施塔尔发生过无数次争吵。他在1936年的一篇日记中谈到其中一次争吵的情况：“里芬施塔尔小姐在我面前装疯卖傻。可不能和这些疯狂的女人一起做事情。为拍那部片子，她开口又要五十万，还说要赚二百万。她做事还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了铜臭气。我一直无动于衷。她哭了，动用了女人最后的武器。但这对我已经不管用了。她必须努力工作，不能胡来。”

影片《奥林匹亚》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名叫《民族的庆典》，另一部分叫《美的庆典》。拍摄工作结束后，女导演将自己完全与世隔绝，通过巧妙的剪辑，最终从长达四百公里的胶片中创造出了一部艺术杰作。1937年11月24日，她先在自己家里放映了这部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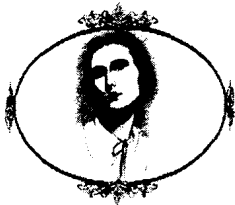
“晚上和玛格达以及冯·阿伦特女士一起在莱妮·里芬施塔尔家，看了《奥林匹亚》的片断，好得难以形容。摄影和制作很吸引人。一个相当伟大的成就。有些地方非常感人。这个莱妮还真了不起。我算服了她了。莱妮很高兴……和女人们又聊了很久。”被里芬施塔尔称为敌人的戈培尔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两天之后，他就把女演员取得的成就告诉了“元首”。

“晚上在元首家参加为匈牙利人举办的晚宴。我向元首介绍了莱妮·里芬施塔尔拍的奥运会片。这件事办得这么成功，他很高兴。我们准备给这个莱妮一个小小的荣誉。这是她应得的。干了这么长时间，她在这方面一直都没有提过什么要求。”

《奥林匹亚》的首映因在时间与德军进驻奥地利发生冲突而被迫推迟。里芬施塔尔为此又编了一段与希特勒有关的故事。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件事太让我失望了。后来我想出一个疯狂的计划，我要在希特勒在奥地利巡视途中，在某个地方见他一面，请他答应一到春天就发行这部影片。我乘火车去了因斯布鲁克。我在蒂罗尔看到的情景现在听起来实在难以置信……因斯布鲁克人简直如醉如痴。他们像遇见神一样疯狂地举起手臂向希特勒致意……我在蒂罗尔霍夫饭店外的警戒线前站了很长时间……”

实际上，希特勒的奥地利之行根本就没有经过蒂罗尔。他先经帕骚和林茨去了维也纳，然后又从维也纳乘飞机回到德国。而里芬施塔尔却说，希特勒的副官碰巧看见她站在蒂罗尔霍夫饭店外面，就像在柏林那段故事里一样，副官带她去见了希特勒，两人商定了影片新的首映期。不管怎么说，《奥林匹亚》在1938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终于上映了。

1939年，国际奥委会给女导演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以表彰她所取得的成就。紧接着，《竞技场上的众神》——《奥林匹亚》的外语片名，就在欧洲各国巡回放映。里芬施塔尔四处奔波，参加了一个又一个首映式庆典。当时她已登上了事业的巅峰。在经历了成功的陶醉之后，女导演于1938年对美国进行的一次私访却给她泼了一盆凉水。刚到纽约，她就被人骂作“希特勒的情妇”，人们将她视为纳粹政权的代表，纷纷就当年早些时候在德国发生的“水晶之夜”反犹骚乱向她提出质问。她那部颇受赞誉的奥运会影片在美国也受到抵制。里芬施塔尔以前在德国艺术界的一些朋友当时已移居美国，在好莱坞工作，连他们现在都不愿意再理睬她了。女



导演失望地返回德国。在一次愉快的晚宴上，她向“水晶之夜”的发动者戈培尔描述了美国之行的遭遇。后者在1939年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里芬施塔尔介绍了她的美国之行。她详尽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听上去一点都不令人愉快。我们在那里已处于次要地位，犹太人实施了恐怖统治，排斥我们。但是这样的日子还会久吗？”

二战爆发给里芬施塔尔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重大转折。女导演试图寻找新的活动领域。经希特勒和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同意，她和几个可靠的摄影师接受了前线作战报道员培训。然而，一到波兰闪电战的前线，她就看到了可怕的现实，目睹了大量平民惨遭杀戮的血腥场面，从此她永远离开了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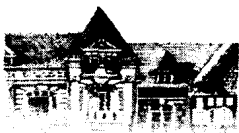
战争期间，第三帝国的电影业受到特殊支持，生产了大量宣传片和纪录片。为了保持民众的士气，第三帝国对轻松的娱乐片需求量也很大。著名纪录片导演里芬施塔尔本来也该为德国文化协会制定的内容丰富的拍片计划做贡献，有关方面曾建议她拍一部有关“齐格菲防线”<sup>①</sup>的片子，但遭到拒绝，当局对此很感诧异，此后便不再找她拍片了。里芬施塔尔被晾在一边，没有人再对她感兴趣。既然如此，女导演便开始筹备她一直想拍的一部片子——《低地》，该片取材于尤金·德·阿尔贝<sup>②</sup>的同名歌剧。1939年至1945年间，她为此投入了全部精力。纳粹德国宣传部虽然容忍她拍这部片子，但一直对她保持监视，同时又不给她任何资助。戈培尔在1940年3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莱妮·里芬施塔尔拍摄新片遇到了困难，但我不想过多插手这件事。”《低地》的拍摄一开始就命运多舛。受战事影响，里芬施塔尔被迫将拍摄地点从比利牛斯山脉移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交界处的卡拉万克山。原先由西班牙人扮演的角色只好改由从萨尔茨堡附近的一个劳工营里找来的罗姆人<sup>③</sup>演。那些乡下的业余演员，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帅一点，错误地把大胡子都刮掉了。后来，那只在影片里扮演主角的温顺的狼又死了。官方机构也总是给《低地》的拍摄工作设置障碍，比如摄制组在巴伯尔斯贝格摄影棚里好不容易搭建起来的格拉纳达“爱尔汗

① 二战前德国在西部边境建的防御阵地体系，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对峙。

② 著名作曲家、李斯特的学生。

③ 吉卜赛人的自称。





布拉宫”<sup>①</sup> 布景后来又不得不拆除，因为有关部门说，他们必须为一部重要电影腾出场地。这部片子名叫《奥姆·克吕格尔》，是一部用来麻痹前线士兵的娱乐片。

尽管如此，里芬施塔尔对希特勒的迷恋丝毫未减。《低地》的摄制工作进行了一年左右的时候，德国在西线又赢得闪电战胜利，迫使法国投降。德国国防军进驻巴黎后，女导演给希特勒拍了一封电报，表示了她本人对“元首”的祝贺：

“阿道夫·希特勒，元首大本营。怀着难以言表的喜悦、感动和热烈的感激之情，我们迎来了您，我的元首，以及国人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德军进驻巴黎。您以非凡的想像力采取的行动，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该怎么感谢您呢？仅仅向您表示祝贺，这太不足以表达我心中的感受了。莱妮·里芬施塔尔。”女导演后来辩解说，她拍这封电报是为了表达对和平即将到来的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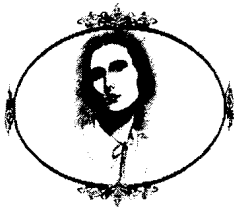
1944年3月21日，莱妮·里芬施塔尔与德国山地步兵上尉彼得·雅各布结婚。当时她已有四十二岁。在此之前她还与几个人有过恋爱关系，持续时间有长有短，但最终都失败了。她与雅各布的恋爱史也是充满波折。四年前两人就订婚了，在此期间，雅各布经常与别的女人一起跑掉。尽管里芬施塔尔对未婚夫的不忠一清二楚，但她最终还是同意与他结婚。人们对她这一决定是否明智深表怀疑。两人在基茨比厄尔举行婚礼后，希特勒曾在上萨尔茨贝格接见了这对新人。这是女导演与希特勒最后一次会面。

第三帝国灭亡后，莱妮·里芬施塔尔被捕入狱，就她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职业生涯接受过多次审讯。人们指控她为希特勒和纳粹党做宣传，是纳粹运动的“御用”艺术家，滥用自己杰出的才能美化纳粹思想。

女导演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以下是美军第七军团审讯中心于1945年5月30日作的一段审讯记录：

“她说，就像世界各国的媒体一样，她也将奥运会视为青春、力量和美的象征。她指出，纳粹当局事先并没有向她下达什么指示，剧组成员是由她自由选定的，影片一直都没有受过审查，也没有突出表现某个种族或国家。美国黑人运动员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影片介绍中还特别夸赞了著名

<sup>①</sup> 格拉纳达是西班牙南部城市，有13至14世纪摩尔人的阿尔汗布拉宫古迹。



美国黑人短跑选手杰西·欧文。报告最后总结道：‘即使她的陈述符合事实，但她以前没有，现在也还是没有认识到，她的艺术替一个残暴的政权做了宣传，帮助美化了这一政权。’”

里芬施塔尔后来还是一再强调，她当时拍的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女导演经历了全部的非纳粹化法律诉讼程序，她起先拥有的可观的财产被没收了，柏林的那幢别墅也住进了陌生人。女导演本人则住进了慕尼黑一幢公寓顶层的一个小单元里，并把守寡的母亲也接来一起住。她和母亲感情一直很好。里芬施塔尔与雅各布的问题婚姻战后未能经受住考验，两人最终离婚了。

与媒体经常散布的谣传相反，里芬施塔尔并没有被禁止工作。1948年，菲林根法院将她定为“随大流者”和“非涉案人”，因为她既非纳粹党员，也不是任何纳粹组织的成员。里芬施塔尔因而没有受到严厉处罚。而她的同行、“元首”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则被判四年监禁，五年禁止工作。战后对霍夫曼的审判遇到的问题也是，究竟应该把他视作新闻摄影师还是积极为纳粹做宣传的人。霍夫曼那里有大量第三帝国的照片档案，后来他把这些照片整理上交了，服完刑后便销声匿迹。

里芬施塔尔在接受非纳粹化审查时就坚信自己不会被定罪，因而她筹划着要重新干一番事业。但是她这么想的时候却没有考虑到公众舆论对她的看法。当时人们普遍指责她是希特勒的情人、戈培尔的女友和纳粹政权的同情者。里芬施塔尔以前的搭档路易斯·特伦克尔，利用公众的这种情绪伪造了一本爱娃·布劳恩日记，说希特勒山间别墅里生活放荡，并称里芬施塔尔曾一丝不挂地在希特勒面前跳舞。这本书后来被查禁，但在此之前它已广为流传。

为捍卫名誉并阻止别人肆意侵犯自己所拍影片的版权，里芬施塔尔先后打了五十多场官司。

经历了长时间的磨难后，《低地》于1954年2月在斯图加特首映。影片并不合当时人的口味，因而没有获得成功。后来有传言说，演这部片子的那些罗姆人过去是集中营里的犯人，此后《低地》便从各影院的节目表中消失了。

回过头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里芬施塔尔的导演生涯，在她1938年推出那部伟大的奥运会纪录片后，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在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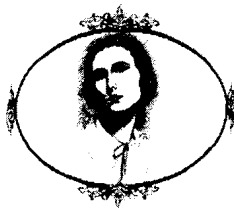
人眼里，里芬施塔尔已是个遭到摒弃的人。她感受到了大家对她的厌弃，但又不愿意接受现实。她仍然不知疲倦地工作，在1950年至1964年间共筹划过十一部影片，但一部都没有拍成。拿里芬施塔尔自己的话说，她当时是生活在“荣辱”之间。1959年，威尼斯电影节举办了里芬施塔尔电影回顾展，观众普遍喝彩。而与此同时，她想创作新影片，却找不到一个制片人。

花甲之年，里芬施塔尔踏上了新的征程。她拿起相机，专心从事摄影，最终完成了一套反映当时鲜为人知的苏丹努巴黑人部落生活的照片。里芬施塔尔独自一人为一次考察做准备的时候，她结识了比自己小四十岁的摄影师霍斯特·克特纳。后者决定参加她的考察。她与这位讨人喜欢的旅伴之间的友谊很快便发展成深深的爱慕。对里芬施塔尔来说，克特纳不仅是一个理想的合作者，更是一个从此之后与她同甘共苦、共度动荡生活的伴侣。

里芬施塔尔对努巴部落的精彩报道，后来被印制成了两本摄影集出版，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人们称赞她的摄影作品“动人心魄，令人大饱眼福”。有关评论还说，从里芬施塔尔拍摄的那些面具、格斗表演和恋舞中，人们看到的“或许是一个受工业文明威胁的原始部落的最后见证”。与此同时，里芬施塔尔通过摄影反映努巴人对健美人体的膜拜，也使一些人想起了她在《奥林匹亚》一片中对运动员健美体魄的颂扬。于是人们又围绕里芬施塔尔在纳粹时期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许多人认为，里芬施塔尔又重操故伎，企图“美化野蛮”。但是德国艺术指导俱乐部仍将她的摄影集评为1975年的最佳摄影作品。七十二岁时，里芬施塔尔又为自己开拓了一个新天地。她迷上了水下运动，学会了潜水，创作了不少给人印象深刻的海洋动植物照片。

八十岁的时候，里芬施塔尔觉得写自传的时机已经成熟。她用了五年的时间，以九百多页的篇幅，记下了自己激动人心的一生。这本自传成了畅销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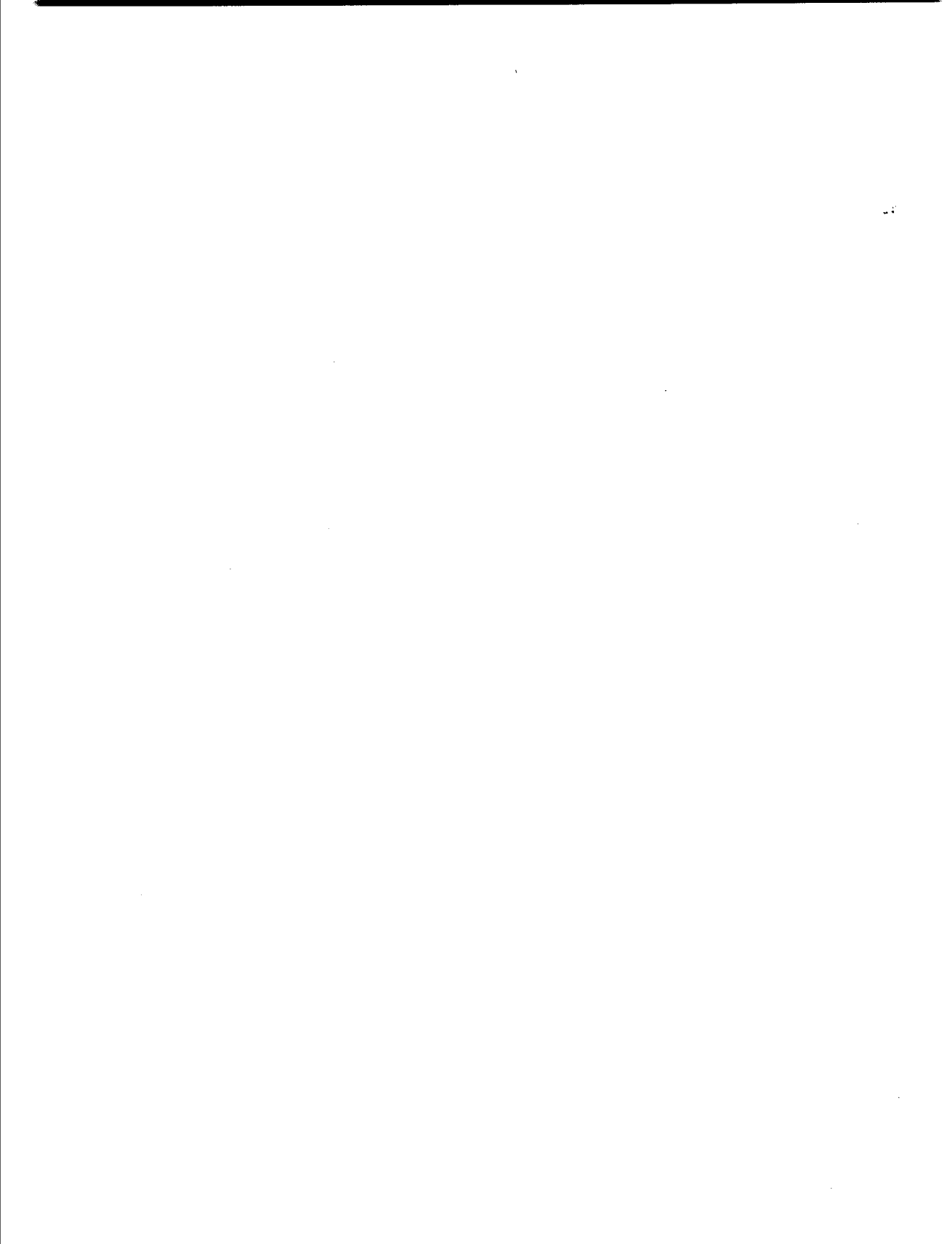
在亚历山德拉·博尔盖塞侯爵夫人的倡议下，意大利米兰市于1995年举办了莱妮·里芬施塔尔作品回顾展。1997年罗马市也决定在著名的罗马展览馆举办里芬施塔尔作品展。展览期间放映了一部由雷·米勒制作的长达三个小时的评论性纪录片。该片通过有关历史文献和对她本人的采访，



对里芬施塔尔进行了一番总结。里芬施塔尔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的一生。她承认希特勒的个人魅力对她造成了巨大影响，并说希特勒就像她的庇护者一样，使她避免了纳粹党内妒忌者的阴谋暗算。她还谈到俄罗斯导演爱森斯坦在艺术方面对她本人作品带来的影响。里芬施塔尔认为自己是個不关心政治的人，并声称，如果别人给她分配任务，她也愿意为共产党人的活动拍摄电影。

即使在1997年，人们对里芬施塔尔和她的作品还是有很大争议，这从媒体和公众对她罗马之行的不同反应中就可以看出。罗马的里芬施塔尔作品展组织者强调，“总是贬低这么一个有重要影响的艺术家是不公平的”。相反，自由派的《晚邮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人们“还是应该让这个第三帝国不幸的圣女待在家里为好”。文章还建议里芬施塔尔去参观一下犹太人隔离区，那里曾有上千名犹太人被流放。左翼自由党办的周报《快报》则登出广告，贱卖里芬施塔尔电影的录像带。

如今，里芬施塔尔已快成百岁老人了。回顾往事，她曾经盛极一时，也曾声誉扫地。不管怎么说，她无疑是20世纪最有意思的女人之一。人们称赞她拍的纳粹党代会影片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宣传片”。她的《奥林匹亚》一片被列入全球十佳电影之列，分析其艺术作品的博士论文有一百多篇。妇女解放运动将她奉为偶像。九十六岁高龄时，女艺术家还与其生活伴侣克特纳合作拍摄了一部水下电影。里芬施塔尔这个名字已经成了传奇的象征。1999年，波茨坦电影博物馆举办了一个莱妮·里芬施塔尔生活和作品回顾展。



纳粹妇女领袖——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







不多的头发，像《浮士德》里的格雷岑一样梳成辮子，盘在头上，雪白的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外面穿着一件整整齐齐的深色上衣，嘴唇紧紧地抿着，嘴角挂着矜持的微笑。纳粹时期有数百万张明信片上印着这个模范女人的形象。她名叫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是纳粹德国妇女领袖。她完全符合纳粹党对女人提出的要求：生了很多孩子，家庭生活从外表看非常和谐。她的生活履历也可以给任何纳粹女人做样板。

格特鲁德·艾玛·特罗伊施，1902年2月9日生于巴登地区的阿德尔斯海姆，父亲是个公务员。后来她在巴登上了高级中学，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辍学了。她后来说这样做是为了“全心全意地做战时劳务”。她在铁路部门当过服务员，还曾在军官家里照料过家务。十九岁时她嫁给了欧根·克林克。他是中学教师，同情纳粹党，也鼓励自己的女人为纳粹党人做一些劳务，比如在冲锋队的食堂里帮忙做饭，替有工作的女纳粹党人照看孩子，到军营里做些针线。很快，格特鲁德·克林克就不再满足于仅仅从事这些简单的劳务工作了。纳粹党宣传和势力的扩张把她弄得神魂颠倒，希特勒的演讲使她获得了“自信和勇气，并对未来充满信心”（《第三帝国的妇女》，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1930年3月1日，她和丈夫一道加入纳粹党。很快她就因热心招募女党员而引起了大家的重视。

同年，已经升任纳粹党区领导人的欧根·克林克，在一次党的集会上因心脏病突发死了。拿格特鲁德自己的话说，她不久就填补了丈夫留下的“空白”，当上了巴登地区纳粹党地区妇女联盟主席。她经常在党的集会上慷慨陈词，号召女同胞们退出社会生活，专门在家里相夫教子。而她自己却积极参政，四个孩子——第五个夭折了——都没有拴住这个寡妇的手脚。巴登地区纳粹党主席罗伯特·瓦格纳曾夸赞道，在格特鲁德·克林克的领导下，巴登地区的妇女组织“在帮助党内阵亡者家属、受伤者和贫穷党员方面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

1932年，格特鲁德·克林克再次结婚，嫁给了乡村医生君特·朔尔茨，她的姓也就变成了朔尔茨-克林克。1933年，朔尔茨-克林克视作靠山的巴登纳粹党主席瓦格纳把她招进内政部，让她当上了妇女协会负责人。她利用这一机会解散了所有相互竞争的妇女协会，非常巧妙地让那些野心勃勃的女对手靠边站了。此后，她又发出了支援“新志愿者劳动服务”的呼吁。这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她的地位，还帮她弄到了女青年劳动服务队负责



人这一职位。德国女青年劳动服务队的任务是对女青年进行纳粹思想教育，并教会她们为所谓的“人民共同体”<sup>①</sup>提供服务的技能。与“男青年劳动者”需要学会“用拳头工作”不同，“女青年劳动者”面临的任務则是“在锻炼身体和精神的同时，学习和思考将来如何承担做家庭主妇和母亲这一伟大任务”（《德国青年劳动服务队建设》，编者：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她们要学习家务和农业知识，还要接受种族学和遗传学方面的教育。

“德国女青年妇女劳动服务队要致力于将妇女从事的职业工作转变为那些在家里和在土地上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垦荒。”朔尔茨-克林克在展望未来时如是说。然而响应者很少。虽然有“劳动服务光荣”这样振奋人心的口号，但只要这种劳动仍是自愿性质的，就只有百分之五的女孩子报名参加。后来纳粹政权规定，所有德国青年都必须在劳动服务队里服役半年。

1934年2月24日，朔尔茨-克林克实现了理想中的目标。她当上了德国妇女领袖，接管了对纳粹所有妇女组织的领导权。她还要求主管各年龄层的妇女工作。

朔尔茨-克林克的职位听起来权力很大，而且纳粹的宣传机器也总是把她描绘成纳粹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对国外宣传时更是如此。然而，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她的级别仅仅相当于一个总局局长，不受纳粹党中央直接领导，而是受纳粹大众福利部的严格控制，后者的负责人是社会福利政治家埃里希·希尔根费尔特。

朔尔茨-克林克与许多部门都有权限之争，同别人争起来她总是吃亏，从中可以看出她政治权力有限。德国劳动阵线领导人罗伯特·莱就坚决认为，所有劳动妇女理应由他来负责组织。粮食和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雷则提出，所有农妇还是应该由他的德国农业联合会管辖。德国全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也根本不想把德国少女队划出他的势力范围。

尽管遇到重重阻力，纳粹妇女领袖一上任就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将纳粹思想付诸实践。她创立了所有女中学毕业生都必须参与的“家务年”制

<sup>①</sup> 纳粹概念中的“人民共同体”指的是所有有雅利安血统的德国人，不包括犹太人以及共产党人、民主党人和抵抗运动成员等反对纳粹政权的人。



度<sup>①</sup>。她希望通过实施“家务年”和自1933年以来一直行之有效的“婚姻贷款”制度，说服妇女最终放弃就业。此外，参加“家务年”劳务还是上大学的前提条件。朔尔茨-克林克希望，通过巧妙的宣传，在“家务年”中能让姑娘们坚信上大学深造毫无意义，从而彻底放弃这一念头。出于这一动机，朔尔茨-克林克极力散布反科学的纳粹口号，说纳粹执政前盛行的那种纯理论、抽象、“枯燥的”脑力劳动，具有某些腐朽、脱离生活的特性，不是源自生活，而是脱离生活，陷于抽象的概念。此外她还声称，科学具有某些典型的阳性特征，男人更适合做“脑力劳动者”；只有在个别例外的情况下，女人才应该去从事研究工作，比如，某女确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而且这样做“符合她的天性”。

一位年轻的女天文学家看来符合这个标准，因为朔尔茨-克林克曾就她求职遭到冷遇一事向纳粹党办主任马丁·博尔曼交涉过：“G博士小姐的情况绝对非同一般。我这么为她说话是因为我觉得，一个极有天分的艺术和科学天才，非但得不到扶持，反而遭到压制，而人们这么做仅仅是因为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是个女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朔尔茨-克林克想向博尔曼讨公道，却没被理睬。

朔尔茨-克林克是纳粹党的忠实奴仆。她把希特勒奉为上帝，把《我的奋斗》视为上帝的福音书，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对她来说都是上帝的启示，“……我们要积极向上，将我们有限的生命献给我们伟大的时代，这样元首就可以借助我们的忠诚创造一个永恒的德国”，朔尔茨-克林克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说，这番话只是她华而不实又偏激的演讲风格的一个例证。在这个德国妇女领袖看来，希特勒是最了解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人，他本人就“代表希望”。朔尔茨-克林克仔仔细细拜读过纳粹头号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所著的《20世纪的神话》，还给他写过信。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领会纳粹治国的目标和纲领。在理论方面，她丝毫没有自己的创见，不过是像传声筒一样，把那些男性党徒轻视妇女的思想立即原封不动地传输给自己的女同胞。她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要维护德意志民族的道德准则和风俗习惯，希望看到德国人在两性关系和社会领域能够保持很高的道德水准。她虔诚宣扬的口号是，通过“为德意志人民服

① 家务年中，姑娘们要到农村去劳动一年，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和干农活。



务”，来“提高全体女性公民的道德水准”。她认为女性心理的一个根本特点是愿意默默无闻地待在幕后尽职尽责。她不仅自己对此深信不疑，还希望别的女人也这么想。朔尔茨-克林克曾经说过：“有一句话说得好：母亲因奉献而取得统治权，一种默默无闻、不事渲染的统治，其意义永远在于奉献。”

朔尔茨-克林克自己却没有默默无闻地奉献。她总是一刻不停地东奔西跑，参加大会，发表演讲，将其简单化的思想诉诸文字。她丈夫抱怨说，她为党承担的义务未免也太多了。朔尔茨-克林克因此于1938年和他离了婚。

在朔尔茨-克林克看来，女人当议员是一种“越界行为”。按照这位全国妇女领袖的想法，普通德国女人应该用“别样的武器”待在家里“战斗”。1933年她在巴登地区妇女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说心里话，一旦进入议会，就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操起男人的武器去贯彻自己的想法，这样看上去的确像个议员，但是女人的形象因此并没有改善，反而被破坏了……还有一种选择是保持淑女做派，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不再为细如发丝的差别和人吵得不可开交……”朔尔茨-克林克这番长篇大论归结起来意思就是：女人大可不必参政，因为按她的说法，“谁只要听过女共产党人或社党人在街头或议会里的尖声鼓噪，谁就会知道，一个真正的德国女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在朔尔茨-克林克看来，为男女平等做任何斗争也是毫无意义并违背常理的。

第三帝国时期，人们的私生活只能悄悄地进行，因为纳粹政权连国民的私事也要干涉。1934年，朔尔茨-克林克曾在一次演讲时说：“亲爱的女同胞们，你们将来会从报纸和广播中了解到应该如何使用你们所掌握的钱，因为你们的先生或你们本人挣的这些钱并不仅仅属于你们自己，它还属于德国大众。”朔尔茨-克林克说话时声音很文雅，但这话听起来却像是威胁。

纳粹妇女领袖很自然地站到了纳粹反犹运动的最前沿。她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告诫德国妇女不要“没有种族观念地空谈全人类”，要讲究“种族纯洁性”，要谨防“自然秩序”被破坏。不仅如此，纳粹妇女联盟的海报上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党内女同胞们，十四年来，大家与褐色阵线肩并肩地同德意志民族的死敌犹太人进行了斗争，戳穿了犹太人的



谎言，避开了犹太人的商店。今后也绝不要再到犹太人商店去买东西，不要找犹太医生看病，德国妇女或德国家庭不要请犹太律师！女士们，请不要对这场决定性的战斗掉以轻心。犹太人会顽抗到底，直到彻底消灭德意志民族；而我们则要坚持战斗，直到彻底消灭犹太人。”

朔尔茨-克林克从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纳粹党代会。开会时人们总能见到她带着一大帮纳粹党的女地方干部列队入场，队列中所有人都有意穿得很朴素，看上去就像进来一帮灰头土脸的寄宿学校女生。希特勒讲完话后，朔尔茨-克林克也要登台说上两句，看上去就像跟“元首”在演双人滑稽戏，因为她总是一字一句地重复希特勒在一本有关妇女问题的书中说过的观点。比如她在1934年纽伦堡纳粹党代会上说：“我们认为，如果形势需要，德国妇女必须能放弃奢华和享受，必须在思想上和身体上都保持健康，必须努力从我们现在被迫遭受的艰难困苦中创造美好的生活……”

1936年9月13日，天下还很太平，而德国妇女却从希特勒对纳粹妇女联盟发表的一番讲话中惊讶地获悉：“只要我们拥有健康的男性——我们纳粹党人会关注这一问题的——德国就不会组建女投弹手分队和女神射手队”。

这句话暗示了战争即将到来。同样在1936年，纳粹政权开始实施“四年计划”，目的是使德国经济能适应战争的需要。朔尔茨-克林克也为战争动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她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说：“如果元首有一天说：我们没有外汇进口更多的肉了，那么我们这些家庭妇女便会拿出证据来证明我们有良好的职业素养。我们会很干脆地说，我们有面包，也有足够的土豆、牛奶和食糖。我对你们说这些是因为你们有一天会看到，说到底，还是我们德国妇女最适合做经济部长……”

纳粹党只是表面上将朔尔茨-克林克算做党的骨干，实际上早在1921年就对妇女在党内的地位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那一年纳粹党全体党员大会做出的决定，纳粹党领导层和党内主要的委员会都不接纳女性成员。这项规定严格限制了这位纳粹妇女领袖的野心。朔尔茨-克林克平时虽然极力向女同胞们宣扬纳粹排斥妇女的思想，但涉及到她本人，她又不愿意接受现实。实际上，她已成了这种政策的牺牲品，连“尊敬的元首”对她的夸赞也无济于事。有一次，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里说：“我周围有四

个女能人：特罗斯特女士<sup>①</sup>、瓦格纳太太<sup>②</sup>、朔尔茨-克林克女士和莱妮·里芬施塔尔女士。”

这四个“女能人”中有三个是希特勒爱与之打交道的，而对朔尔茨-克林克，他尽量躲得远远的。1938年，正当权力巅峰的朔尔茨-克林克抱怨说：“至今我一次都未能与元首面对面好好谈谈妇女的职责范围问题。”她想见“尊敬的元首”，但永远是不受欢迎的。不仅如此，所有纳粹达官显贵也都与她保持距离。大家都不愿意理睬这个打扮得一本正经的妇女领袖，拒绝与她有任何社交往来；第三帝国举行那么多盛大的招待会和宴会，一次都没有邀请她参加。

此外让她伤心的是，连那些党内干部的太太都不愿意听她那些关于妇女问题的讲话，也不看她撰写的有关书籍。1933年至1944年间，朔尔茨-克林克连续撰写和出版了五十多本书和小册子。

尽管纳粹做了很多努力，进行了大量宣传，但以个人名义参加纳粹德国妇女联合会<sup>③</sup>的妇女比例仍只有区区百分之六。联合会号称会员有四百万之众，主要原因是纳粹当权后，很多德国妇女组织被迫集体加入了各种纳粹妇女协会，而且想退出也很困难，因为这会给她们带来不利。

被迫入会的妇女能做的便是消极抵抗。纳粹妇女组织举办了很多旨在进行“世界观教育”的学习班，虽然名字起得冠冕堂皇，但“新德意志妇女”并不情愿参加。相反，大家对那些有关育婴和烹调的学习班却很感兴趣，由朔尔茨-克林克倡议开办的母亲学校学习班甚至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34年至1937年间，共有一百多万妇女参加了母亲学校开设的五万四千个学习班。

1938年3月14日，德国国防军进驻奥地利后不久，朔尔茨-克林克收到一封发自维也纳的电报。这封电报反映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朔尔茨-克林克在纳粹妇女组织中所拥有的权威：“值此元首抵达维也纳之日，奥地利妇女谨向全国妇女领袖表示衷心的祝愿。我们认为自己也是德国人，战后一直盼望奥地利能重回祖国怀抱，并为此做出了努力。希望您

① 建筑师。

② 瓦格纳音乐节主管。

③ 纳粹德国各种妇女组织的核心是“纳粹妇女联盟”，其成员大多是纳粹党的忠实追随者。该联盟负责在政治上同化所有非纳粹的妇女组织，使它们统一在“德国妇女联合会”的旗下。



能早日前来看望我们。”朔尔茨-克林克欣然接受邀请。访奥期间，她四处发表演讲，为在当地建立德国妇女联合会和纳粹妇女联盟的分支机构做准备。

1940年，朔尔茨-克林克第三次结婚，新任丈夫是党卫军地区总队长奥古斯特·海斯迈尔中将。他还带来了与前妻生的六个孩子。夫妇俩有这么多个孩子招致了别人的妒忌。一些党内女干部指责不讨人喜欢的妇女领袖因为照顾孩子而影响了工作。还有一些人则说，她整天瞎忙，根本不顾家。

随着战事的发展，纳粹政权荒谬的思想体系越来越失去吸引力，同时，纳粹妇女领袖一再宣扬的那些理想也成了现实的牺牲品。朔尔茨-克林克被迫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妇女的天职”是“结婚！待在家里做家庭妇女！”这种说法不再提了，整天围着锅台转的观念突然不时兴了，男女问题不复存在了，“重返土地”的口号也消失了。朔尔茨-克林克如今宣扬的是：“人们现在还时常能听到妇女们对到军工厂劳动提出这样那样的反对意见。实际上，有关能不能要求妇女从事这种工作的问题早已过时了。”在这一点，朔尔茨-克林克甚至比她“尊敬的元首”还要开放。希特勒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禁止强征妇女到军工厂参加生产。当纳粹政权1943年1月最终下令强征十七至四十五岁的妇女从事战时劳务时，朔尔茨-克林克立即对此表示欢迎。她说：“那些由妇女联盟教育出来的、被派去为国防军效劳的妇女，不应该仅仅去打字或劳动，她们还应该做元首的战士。”

1943年底，朔尔茨-克林克还为组织战时圣诞节活动出过好主意。1944年，她又呼吁道：“母亲们，你们肩负着拯救祖国的重任！”1945年，她和丈夫潜伏起来。两人使用假名字，逃过非纳粹化司法调查，在美占区生活了三年，一直没被人认出来。1948年2月，这位纳粹德国妇女领袖终于被捕，并因欺骗当局被判十八个月监禁。随后进行的非纳粹化审判仅仅将她定为“从犯”。由于遭到强烈抗议，后来司法当局又再次对朔尔茨-克林克进行了审判，并指控她为“主犯”。法官认为纳粹德国妇女领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应予以宽大处理，所以最终只判她十八个月监禁，而且认为这个刑期她已经服满。联邦德国的政治净化委员会下令禁止她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并禁止她从业。



此后，朔尔茨-克林克仍然没有放弃对纳粹主义的盲目信仰。1974年她仍然认为，议会是最不适合表达人民愿望和意见的地方。她骄傲地说：“当时我们（纳粹妇女）更先进！”1978年，为回应一些分析她在纳粹时期作用的文章，朔尔茨-克林克撰写了《第三帝国的妇女》一书。书中收录了她在辉煌时期发表的一些演讲和文章。

这个前纳粹德国妇女领袖在书中对自己的过去没有表现出丝毫悔过和省悟。相反，她为第三帝国进行了辩护，希特勒也被她神化了：“直到有一天，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进入我们的心目中——一个前线战士，他唤醒了我们的人民，使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不再抛弃我们……”

希特勒“惟一爱过”的女人——吉莉·拉包尔









“……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阿道夫舅舅要我们再等两年。想想，埃米尔，整整两年，得一直待在舅舅的眼皮底下，只能找地方偷偷摸摸地亲嘴……”阿道夫·希特勒的外甥女安吉拉·拉包尔（昵称“吉莉”）在给情人和秘密未婚夫埃米尔·莫里斯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这封信写于1927年圣诞夜，1993年被慕尼黑著名的赫尔曼文物拍卖行拍卖。这份很有意思的历史文献首次让人们进一步了解了希特勒和吉莉·拉包尔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结局是姑娘的自杀。

纳粹权贵周围没有哪个女人能像希特勒的外甥女那样激起后世那么多的想像。历史学家、时事评论家、心理学家孜孜不倦地挥毫泼墨，援引一些纳粹党人的回忆录为证，试图揭示拉包尔一案的真相。大部分猜测都与希特勒的性生活密切相关，吉莉是希特勒的情人吗？她是自杀还是他杀？

安吉拉·玛丽亚·拉包尔，昵称“吉莉”，1908年6月4日生于林茨。此前数月，二十岁的希特勒刚离开奥地利的这个外省城市，去了首都维也纳，准备第二次参加维也纳美术学院入学考试。吉莉的母亲安吉拉·拉包尔，娘家姓希特勒，是希特勒的父亲和第二任妻子弗朗齐斯卡·马策尔斯贝格尔生的女儿，比希特勒大六岁。<sup>①</sup>少年希特勒经常口授自编的剧本让她记录，所有亲戚里，希特勒和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最合得来。

父亲死后不久，安吉拉·希特勒于1903年9月14日离开上奥地利利昂丁的娘家，嫁给税吏莱奥·拉包尔。两人生了三个孩子——小莱奥、小安吉拉（即“吉莉”）和埃尔弗里德。1910年，税吏就死了，留下年轻的寡妇拉扯三个小孩子艰难度日，好在几个亲戚伸出援手，孩子的姑妈玛丽亚·拉包尔尤其帮了大忙。玛丽亚·拉包尔独身，在林茨附近一个名叫派尔施泰因小地方的小学校教了很多年书。1913年，玛丽亚·拉包尔把小莱奥接到派尔施泰因。1915年，快要上学的吉莉也去了那里。不久，吉莉进了玛丽亚·拉包尔教的小学一年级班。

从一张照片上可以看见，拉包尔老师是个个头儿不高，看上去很利索的女人，身后有一大群小学生，双臂交叉胸前，乖乖地坐在教室的木凳上。她有意把面目清秀的侄女安排在第一排，只要吉莉注意力一分散，她就能发现。几十年之后，吉莉当时的一个女同学还忆起了吉莉刚上学时的

① 希特勒是其父第三次婚姻中生的第三个孩子。

情景：“她是个既漂亮又活泼的女孩儿。有一次班级组织去普勒肯施泰因湖郊游，吉莉独自一人跳进了水里，我们大家都站在岸上大惊小怪。”

吉莉在姑姑监督下学会写字的时候，她母亲正在维也纳四处找工作。1915年10月，安吉拉·拉包尔找到一份监管女学徒宿舍的差事，她的收入状况从而得以改善。此前她只能靠亡夫那点少得可怜的公务员抚恤金过日子。当时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人们已经能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街上到处都是贫困潦倒的无家可归者，想找个住处非常困难。安吉拉·拉包尔自觉很幸运，因为她在维也纳第六区贡彭多尔夫街一幢漂亮的“新艺术”式公寓的二楼租到了一套公寓。

1917年10月，安吉拉·拉包尔把九岁的女儿吉莉接到自己身边。当时食品严重匮乏，维也纳经常发生反饥饿罢工和游行。吉莉在那里住了五年，经历了一战结束、哈布斯堡王朝瓦解、经济崩溃以及战后急剧通货膨胀造成的普遍贫困。尽管如此，母女俩后来对这座多瑙河畔城市的印象仍然不错。

读完五年制小学后，资质平庸的吉莉考入玛丽亚希尔夫尔女子高级中学<sup>①</sup>。1918年那时候，很少有女孩子小学毕业后上中学。能送女儿上中学，当时被认为是那些自视在家庭出身、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事方面“较有身份”的家庭才能享有的特权，其中一些家庭的确富有，但也有的家境并不怎么样。

吉莉后来在学业上历经磨难，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希特勒-拉舍尔家族高度重视小孩的教育。安吉拉·拉包尔在女儿上学问题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抱负和永不气馁的精神，后来她又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吉莉在高级中学读一年级时成绩就很差，尽管如此，做母亲的仍然拒绝让女儿换一个质量较差的学校比如市立中学就读。1919年圣诞节前夕，她让吉莉转入了自家附近的实科中学<sup>②</sup>重读一年级，这所学校位于维也纳第六区阿默灵街6号。吉莉在那里勉强读到了三年级。由于拉丁语、希腊语、地理和数学等课目成绩不及格，吉莉又面临留级的命运，当娘的没等成绩单公布就让女儿退学了。经与亲戚商量，她找到了解决办法。姑妈玛丽亚·拉包尔再次承担了教育侄女的重任。在执教三十四年之后，她主动放下教鞭，搬进林

① 高级中学是德语国家专门培养学生升入高校的中学。

② 一种着重教授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的高级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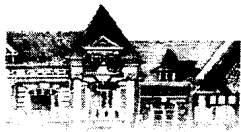
茨市丁豪夫街43号一幢独家住宅，随后把侄女领来和自己一起住，全心全意为她补习功课，其情其景十分感人。对吉莉来说，当时首先得解决上什么学校的问题。好胜心极强的母亲对1889年创建的林茨女子中学并不满意，于是她与玛丽亚·拉包尔一道来到林茨最有名、要求也最高的“学院高级中学”为女儿报名。这所位于施皮特维泽的学校以前从来没有收过女生。她们俩软磨硬泡，终于迫使校领导同意接收成绩不怎么样的吉莉。在姑妈的严格督促下——她同时也辅导莱奥，吉莉的成绩有了起色，比较顺利地读完了三年级。升入四年级后，吉莉学古希腊语又很吃力，要再次参加补考。吉莉为此苦苦补习了整整一个暑假。这一磨难证明对吉莉是很有好处的，此后，她在学业上没再遇到太大的麻烦，即便有些小困难，一个同学帮她补习一下也就解决了。

像吉莉一样，希特勒-拉包尔家的孩子普遍学习压力很大。吉莉上学的经历与她舅舅有明显相似之处。同外甥女一样，希特勒也在上中学第一年就蹲班了，而且他上的还是一般中学。此外，他也经常换学校，参加补考。十六岁时，希特勒没有毕业就提前结束了他那不光彩的中学生涯。他的外甥女本人估计也愿意这么做，但是在母亲和姑妈的督促下，她最终还是坚持到了中学毕业。

在林茨上学的时候，吉莉只有在放假时才能见到母亲。当时她母亲已经换了好几个工作岗位和住所。1919年，她在一个犹太大学自助餐厅当上了厨房主管。纳粹党外事新闻秘书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在回忆录中称，1923年他曾到维也纳去找过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在一幢脏兮兮的简易公寓楼的四层或五层我找到了她。听到门铃响，她把门开了一条缝。尽管如此，我还是看见了屋子里布置得很简陋，一张床垫就放在地上。”

实际上，1920年至1927年间，安吉拉·拉包尔一直住在维也纳第四区内一个相当不错的中产阶级街区，租住着一幢挺讲究的公寓楼里一套最漂亮的带阳台的四居室。移居慕尼黑后，她为了来维也纳时有个落脚点，又在同一幢楼里租了一套较小的单元。

汉夫施滕格尔在回忆录中还把吉莉描绘成了“结实的乡下姑娘，体态丰满，头发金黄，是那种维也纳甜妞型的女孩儿”。而照片上的吉莉却是一头黑发，身体健壮，粗脖子，薄嘴唇，眼睛又黑又大，目光炯炯有神。



在林茨的时候，吉莉因“性格可爱”很引人注目。同学们都很喜欢她那股敢作敢为的劲儿。有一次上宗教课的时候，吉莉突然举手站起来说：“教授先生，您裤子拉锁开了！”逗得班里哄堂大笑。吉莉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马莱塔的同班同学，后来当上了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他在中学时代就同情基督教社会党，是基督教-德意志学生会以及尼伯龙吉亚学生社团的成员。他和吉莉上学走的是同一条路，两人长年结伴同行。“我毕恭毕敬地把她交给了她母亲（实际上是姑妈玛丽亚·拉包尔），她母亲是个很严厉的人，总是用很挑剔的目光打量我。”马莱塔后来在回忆录中这么写道。这位腼腆的政治家忆起吉莉时简直像是在写诗：

“我们不仅上学时同路，假期有时候也一道去散步和郊游。她（吉莉）虽然不能算我真正意义上的初恋情人，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确实对她想入非非。是的，用‘浪漫’一词来描述我们的关系可能比较恰当。同学们对我们俩的关系并不了解。有一天我们在林茨附近的屈恩贝格森林里漫步，下面便是深深的多瑙河河谷，林木葱茏，就像当年尼伯龙根人骑马进入匈奴国，去找贝歌拉姆的吕迪格<sup>①</sup>，队列中有美丽的克里姆希尔特<sup>②</sup>和神秘莫测的哈根<sup>③</sup>……突然远处响起隆隆的雷声，乌云滚滚，一会儿便开始落下雨点……我们赶紧跑……身上湿漉漉的，我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吉莉还时常陪马莱塔去参加尼伯龙吉亚学生社团的聚会。他们班在林茨会馆跳舞厅举行舞会时，常常是他们俩搭档，率先进入舞池。

纳粹党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林茨的中学生里也很有名气。吉莉后来对同学们说起她随母亲和哥哥莱奥于1924年6月17日去兰茨贝格要塞监狱探望因组织政变被关押的舅舅，大家都好奇地听着。但是，吉莉接着又吹嘘说，她舅舅在慕尼黑送给她一幢别墅（希特勒本人当时在慕尼黑也有一间从其他房客那里转租来的小房间），大家又委婉地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吉莉从六年级起就因家里经济条件差而获准免交学费了。

吉莉的哥哥莱奥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了一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哥哥不同，吉莉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对希特勒的政治野心也没有自己的看法。学生时代的好友马莱塔痛骂纳粹党时，她根本无所谓。马莱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真是荒唐透顶，居然一连几个小时给她讲希特勒的理论和

① ② ③ 贝歌拉姆的吕迪格、克里姆希尔特和哈根是德国民间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男女英雄人物。



他的政治运动。当然，我当时话说得很凶……但我相信，她这么个不关心政治的女孩儿根本就没有理解我说的意思。对她来说，希特勒只是她亲爱的舅舅，只不过凑巧又是个很有影响的政客……”

吉莉的历史老师名叫赫尔曼·福帕，是奥地利大德意志人民党主席。该党1921年在议会中拥有二十个议席，主张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大德意志人民党属于奥地利民族主义阵营。在一次选举遭到惨败后，民族主义阵营的大多数成员都倒向了纳粹党。福帕本人也认为未来将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他把这种想法又灌输给了自己的学生。

1927年，吉莉和她所在的8A班的同学即将参加毕业考试，同时她又在筹划搞一次外出旅行，为学生时代画上圆满的句号。福帕想到了当时在慕尼黑的希特勒。他对吉莉说，应该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有意思的上奥地利人，同时参观一下慕尼黑这座城市，不知拉包尔小姐能否安排8A班同学与她舅舅见一面？为了准备这次旅行和可能与希特勒进行的讨论，福帕教授找来了有关书籍讲给全班学生听。马莱塔对老师说，他看过《我的奋斗》《20世纪的神话》，还有兰茨·冯·利本斯费尔斯办的《奥斯塔拉》月刊<sup>①</sup>。他还说，他读这些书是为了弄明白为什么当时在奥地利只有少数追随者的纳粹运动在德国会有那么多拥护者。实际上，纳粹党当时正陷入危机，完全有可能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当局还禁止希特勒发表政治演说，不过这一禁令到1927年3月就失效了。

1927年6月24日，吉莉通过了林茨学院高级中学的毕业考试，名列学校的首批女毕业生。德语考试的三个作文选题中，她选择的是《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上帝赐予我们三大恩惠：理想、爱情和死亡》。从毕业班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一年毕业的女生只有吉莉和另一个女孩。

希特勒同意他们后，吉莉的全班同学在德语老师米夏埃尔·瓦青格尔和历史老师福帕带领下，对慕尼黑进行了八天访问。其他同学们都被安置在不同的膳宿公寓里，而吉莉和马莱塔却住进了大出版商布鲁克曼家富丽堂皇的公馆。一天下午，希特勒和他手下的人在那里和学生们一道喝了午茶。据马莱塔回忆，希特勒进来时一身纳粹行头：褐衫、马裤、短筒皮靴。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列站在他面前。希特勒和每个人都紧紧地握了

<sup>①</sup> 兰茨·冯·利本斯费尔斯，1874—1954，雅利安种族优越论者，《奥斯塔拉》是他主办的鼓吹反犹太主义思想的杂志，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时期深受这一刊物的影响。

手，看对方时目光咄咄逼人。随后，他扯着嗓门开始训话，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回去的路上，历史老师福帕——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当上了区教育总监——对学生们说，无论他们是否情愿，此人都会按照他的想法构筑他们的未来。慕尼黑之行即将结束时，吉莉又带着她的朋友马莱塔在纳粹党的黑克咖啡馆私下见了希特勒一面。咖啡馆陈设很简单，就几张铁桌子和木凳子，希特勒和他的“战友”经常在这里聚会。

1927年秋，吉莉移居慕尼黑，在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报名学医。她并没有把学业当真，她来慕尼黑上大学是为了找个借口与心上人接近。此人名叫埃米尔·莫里斯，是希特勒的司机兼随从，吉莉和他早就认识。1926年夏天，两人的友谊发展成了爱情。戈培尔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莫里斯来了。他跟我谈起了自己不幸的爱情。”

埃米尔·莫里斯（1897—1979）出身于一个从法国移居到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家庭，年轻时做过钟表匠，参与组建了纳粹党所谓的“体育运动部”，即后来的冲锋队，是纳粹党最核心的人物之一。希特勒特别喜欢他，爱亲热地叫他“莫里茨尔”。他把希特勒视作伟大的榜样，总是像影子一样跟在他身边。两人甚至以“你”相称，这对纳粹党人来说可是一种殊荣，因为希特勒一般情况下并不爱对人过于亲热。20年代那时候，莫里斯完全可以吹嘘自己是希特勒最好的朋友。虽然不断有传言说这个长着深色头发的“莫里茨尔”有犹太血统，甚至他的一些亲戚也这么说，但是希特勒与他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1921年至1927年间，他一直为希特勒开车。因参加了希特勒政变，他被判九个月要塞监禁<sup>①</sup>，实际囚禁时间甚至比希特勒还长。1925年，他参加了重建的纳粹党，成为其第39号党员。希特勒还让他当上了初创的党卫军的监察官。

莫里斯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嘴唇上留着一撇小胡子，眼神总是含情脉脉。希特勒带他外甥女去基姆湖游泳和野餐时，他总是在场。每次出游，希特勒那辆敞篷大“奔驰”都由他驾驶。吉莉和希特勒的女秘书，也就是纳粹党摄影师霍夫曼的女儿亨里埃特坐在后排。女秘书战后在接受采访时描述了那时的浪漫情景：“我们带上了方格羊毛毯。藤条编的带盖篮子里……装满了野餐所需的一切东西……莫里斯从后备箱里拿出吉他，唱

<sup>①</sup> 在某个军事要塞对政治犯进行的非侮辱性监禁。



起了爱尔兰民歌……我们几个姑娘到树丛后面一个隐蔽之所去游泳……我们光着身子在水里游，然后躺在岸上把身子晒干。有一次，赤裸的吉莉身上落了一大群蝴蝶……”

莫里斯爱上了希特勒的外甥女。对这位经常能在舅舅身边见到的帅男的感情，吉莉也给予了积极回应。数年之后，莫里斯谈起吉莉来还是如醉如痴：“她就像个公主，在街上遇到她，大家都会转过身多看两眼……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如诗一般美丽……她还有一头秀美的黑发，对此她深感自豪……”

希特勒并不知道莫里斯在打他外甥女的主意。他平时很爱操心别人的婚事，连莫里斯也没有放过。他曾经问莫里斯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结婚，还说：“你结婚之后，我每天都会到你们家去吃饭。”莫里斯错以为希特勒是在鼓励他向自己的外甥女求婚，于是1927年快到圣诞节的时候，这位很听话的党员便采取了行动。他后来对人说：“我听从他的意愿，向吉莉求婚了。我只爱她一个人……她欣然应允。”之后他又请求希特勒同意他们俩的婚事。于是，可怕的一幕上演了。希特勒把莫里斯狠狠地训了一顿，还对他发出了威胁，对方惊得目瞪口呆。1927年圣诞节前一天，吉莉给这个男友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埃米尔！我先后收到了三封你的来信。但是我从没有像收到你最后一封信时那样兴奋，这恐怕是因为最近几天我们遭受了那么多痛苦。不过好事总是多磨，经历些挫折对我们俩一定会有好处。如今我觉得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已把我们两个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永远不会分离。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阿道夫舅舅要我们再等两年。想想，埃米尔，整整两年，得一直待在舅舅的眼皮底下，只能找地方偷偷摸摸地亲嘴。你得努力工作，好为我们将来谋生创造条件。其间我们只能在有其他人在的场合见面……我能给你的只有爱和绝对的忠诚……我是那么的爱你！……阿道夫舅舅要我继续在大学念书……阿道夫舅舅如今对我非常和气。我想给他一个惊喜，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阿道夫舅舅还说，我们绝对不能对外人透露我们的感情……我相信我会非常幸福。也许直到晚上我们才能在圣诞树旁见面，但也许下午就有机会。最最亲爱的埃米尔，阿道夫舅舅答应让我留下来我真是高兴极了。这样我们就能经常见面，而且经常能单独见面，这是阿道夫舅舅答应我的。他待我真是太好了。你想想，假如我



现在要待在维也纳，那该有多糟啊！离开你那么长时间我肯定受不了。在维也纳我会感到很孤单，虽然我母亲在那里。你估计也能留在慕尼黑，这主要得感谢赫斯太太（希特勒秘书鲁道夫·赫斯的妻子）。一开始听说她要到我这儿来，我很害怕，但是她来后待我很好。她是惟一相信你真心爱我的人，因此我也慢慢开始喜欢她了。但愿你晚上就能收到这封信。吻你！吻你！吻你！你的吉莉。我已经等不及要见你了！”

这封很有意思的信使人们得以窥见希特勒的心理，也修正了时下流传的那些有关希特勒舅甥恋的陈词滥调。从信中可以看出，1927年那时候，吉莉根本就没有爱上舅舅。她盼望的是与埃米尔·莫里斯结婚，同时她也很信任舅舅。而希特勒则扮演了一个严厉的监护人角色。在姑娘的母亲没有出面的情况下，他独断地决定了这个十九岁的女大学生和她那个将近三十岁的男友的未来。吉莉和莫里斯两人都没有打算违抗希特勒的意志，从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经过长时间的争辩，她最终还是屈从了“阿道夫舅舅”的意愿，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希特勒的个性不仅控制了纳粹信徒，也左右了自己亲戚的命运。

从信中可以看出，作为监护人的希特勒为他认为尚未成年的外甥女规定了两年的结婚等待期。他还坚决要求党内干部莫里斯为“谋生”创造条件，并希望吉莉继续在大学念书。此外，希特勒还安排赫斯太太陪伴外甥女，以防她与男友偷偷约会。他还不准两人订婚，并说服两个年轻人必须对爱情严格保密。尽管如此，在吉莉看来，阿道夫舅舅仍然待她很好，因为他允许她留在慕尼黑，而不是去维也纳或林茨。老奸巨猾的舅舅采取这一系列战术，目的是尽快结束这段他不希望看到的恋情。1927年底，他解雇了司机莫里斯，撤销了他党内一切职务，把他从身边撵走了。这给莫里斯造成的印象是，希特勒自己爱上了外甥女，他采取这一系列行动的真正原因是妒忌。

希特勒和他的外甥女并没有因莫里斯而决裂。相反，到了1928年初，吉莉已成了舅舅身边固定的陪同。她经常随他一道去黑克咖啡馆聚餐会友。与纳粹党的惯例不同，希特勒在谈论党内事务时并不要求吉莉回避。此外，舅舅和外甥女两人还频繁光顾纳粹顶级人物经常聚会的巴伐利亚酒店。希特勒周围的亲信觉得吉莉说一口奥地利方言挺可爱的，还夸她长得漂亮，尽管吉莉的长相一点都不符合纳粹所推崇的那种北欧-日耳曼型理



想美人的标准。

纳粹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吉莉在场，大家就都围着她转，希特勒从没有打算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吉莉率性自然，从不卖弄风情。她就像个魔术师，只要有她在，在座的所有人都兴致勃勃。大家都被她迷住了。”约瑟夫·戈培尔后来也认识了吉莉。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仍待在慕尼黑，这个有趣的城市。昨天我去见了希特勒，他立即请我吃晚饭，一个可爱的姑娘也在场……”希特勒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他的外甥女。霍夫曼的女儿亨里埃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经常陪吉莉一起去买东西。有一次他陪她进了一家帽店，耐心地看着她把所有帽子都试了一遍。最后她挑中了一个巴斯克无檐软帽……”亨里埃特·霍夫曼比吉莉小五岁，后来随夫姓冯·席拉赫。

1928年夏天，希特勒和吉莉及其母亲还有戈培尔，一起到北德的赫尔果兰岛度假。当时人们在公开场合已不再谈论埃米尔·莫里斯了，但私下里大家对吉莉和莫里斯之恋仍然议论纷纷，褐色字号（指纳粹党）的谣言铺子生意还很兴隆。1928年10月19日，戈培尔与当时的同事，后来当上纳粹省党部负责人的卡尔·考夫曼私下聊天，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说起了头儿（希特勒）做的一些荒唐事。他以及他的外甥女，还有莫里斯。这个悲剧型的女人。难道人们应该因此而感到绝望吗？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要为了女人而饱受煎熬呢？我还是对希特勒深信不疑。一切我都能理解，不管真假。”

在人们印象中，莫里斯是个举止斯文却又我行我素的人。但他绝对无力应对希特勒的阴谋诡计，最终也只有听天由命。不过，对无限期被解雇，他却没有听之任之。相反，他在劳动法庭对其雇主纳粹党提出了控诉，并赢得了赔偿。后来，当过钟表匠的莫里斯自己开了一家店，经营电子仪器。

此后，吉莉·拉包尔和埃米尔·莫里斯这两个当事人都没再说什么。“阿道夫舅舅”胜利了！

莫里斯是希特勒的手下，又是他所赏识的一个知心朋友，为什么希特勒要阻止外甥女与莫里斯结婚呢？对于这个问题，希特勒身边的一些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海因里希·霍夫曼说：“他想防止她所托非人。”希特勒的女管家安妮·温特尔说：“这有点儿像父爱。”莫里斯本人很可能最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1967年接受采访时打破了多年的沉默：“他爱她，但那是一种奇怪的、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爱！”

吉莉1929年是否为希特勒画裸体习作当过模特？如果真有此事，这或许可以说明她已经移情别恋。年方二十一岁的吉莉这样做动机是什么？姑娘真的爱上了舅舅了吗？“阿道夫舅舅”和外甥女之间是否已有性爱关系？希特勒的肖像画习作本身并没有什么艺术表现力，但对想了解作画者的人来说，却意味深长，两幅吉莉的裸体画给人们带来了许多解答不了的疑问。此外，有意思的是，希特勒竟然还毫无顾忌地在这两幅水彩画上落了款。想想这会给一个正在争取上台的政治家带来多大的麻烦！吉莉的裸体画会成为希特勒众多政敌求之不得的武器，至少等到吉莉自杀的消息传出后，它们就会带来严重后果。由此可以推测，如果希特勒真的画了这两幅画，那么它们极有可能是和其他类似的敏感材料一道被锁在了纳粹党的保险柜里（希特勒本人就对人提到过有这么一个保管敏感材料的保险柜），由绝对可靠的纳粹党财务主管弗朗茨·克萨韦尔·施瓦茨亲自看管。目前这两幅画都为私人所收藏，对其真实性人们仍存有很大疑问。不过，这两幅画与希特勒为情妇爱娃·布劳恩画的那一幅裸体画的确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1929年，学医才两年的吉莉决定放弃学业，让人教自己练嗓子，好以后上台表演。“阿道夫舅舅”于是聘请唱诗班领班阿道夫·福格尔和汉斯·施特雷克，专门来给外甥女上声乐课，要不然，吉莉就会一个劲儿地懒惰下去。希特勒曾向一个亲信谈起外甥女的生活习性：“……发型、衣服、舞会和戏院，这些随时都会让她丢下手头儿比较重要的事情。只有杂志和小说她还爱看。吉莉能同时看十二本杂志和报上的连载小说，每天都能看完一到两部，而且还总能记住哪个接哪个，甚至，要是哪个缺了一期，她也能发现。”

1928年，希特勒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我的奋斗》当时成了畅销书，给他挣了高额版税。1925年到1929年间，希特勒的年收入约在一万一千至一万五千九百帝国马克之间，而纳粹党的追随者也竞相满足他们“元首”的所有愿望。希特勒有了一辆专车，配有专职司机，还有一个私人秘书和一个贴身保镖。1928年底，靠崇拜他的大出版商胡戈·布鲁克曼的资助，希特勒离开蒂尔施街那间转租来的小居室，搬进了一套奢华体面的公寓。“元首”新居在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一幢富丽堂皇的公寓楼里，在



三层，共有九个房间，分为自成体系的两排。他还有温特夫妇做他的管家，有“清洁工”安娜·基尔迈尔干粗活儿。有意思的是，希特勒还让以前他在蒂尔施街的女房东赖歇特夫人和她母亲作为房客住进了他的新居。

1929年10月5日，吉莉退掉了在王后大街43号克莱因膳宿公寓租的那间小居室，住进舅舅家里。她是作为希特勒房客的房客，办理住户登记手续的。吉莉住的是舅舅公寓里把角儿那间最漂亮的屋子，房间是按照她的想法装修和布置的。她选了老式的萨尔茨堡农家家具——彩绘的箱柜和五斗橱，配上淡绿色的地毯，为的是突出家具的效果。墙上挂着一幅希特勒一战期间在比利时画的水彩画。11月22日，戈培尔来到慕尼黑。他在日记中写道：“吉莉，整个慕尼黑。夜里两点到了头儿家。他现在住的地方很大。吉莉、埃尔泽·米勒和霍夫曼在场。我们说说笑笑。中午，和他及吉莉一起吃了午饭。”

从1923年起，希特勒一直喜欢到巴伐利亚的上萨尔茨贝格山里度假。1928年，希特勒在那里租了一幢名叫瓦亨费尔德的乡间住宅。这次他同样靠的是别人赞助，钢琴制造商贝希施泰因夫妇为他付了房租。“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住在维也纳的姐姐说：我租了一幢房子，你是否愿意过来替我料理家务？”（《希特勒秘密谈话录》）希特勒说的是他同父异母姐姐，也就是吉莉的母亲安吉拉·拉包尔。

那年，德国和奥地利都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失业人数不断攀升。在这么一个朝不保夕的时刻，有这么一个事业有成的同父异母弟弟发出邀请，对一个寡妇来说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因而她答应了。安吉拉·拉包尔在维也纳舍恩布格街留了一套公寓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就迁往巴伐利亚，以房客的名义住进了上萨尔茨贝格的瓦亨费尔德，负责在那里做饭并管家。尽管她后来不太适应当地的气候，很想回维也纳，但最终她还是在那里一直待到了1935年。纳粹德国的首席建筑师兼军械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回忆录中对瓦亨费尔德作过一段描述：“……一幢小巧宜人的大屋顶木房子，房间布置都很简朴：一个餐厅、一个小起居室、三个卧室。农家家具使屋内充满了舒适的小资情调……一个金色的鸟笼、一只金丝雀、一棵仙人掌……更强化了这一印象。瓷制的小摆设上印着卐字……”

吉莉在希特勒这个安乐窝里度过许多周末。众多照片显示，她还在这里过过圣诞节和生日。1928年圣诞节，戈培尔也在。从一张照片上可以看



到吉莉过二十一岁生日的场景：桌上放着一个插满蜡烛的蛋糕，桌边上还立着一只巴伐利亚山区常见的寒鸦。吉莉很喜欢动物，这只鸟受伤后被她救回家里精心呵护，最后被她驯化了。

吉莉现在至少在慕尼黑已不再有机会结交异性朋友了。不过，希特勒还是允许她经常去维也纳。在那里，吉莉可以会会女友，同时可以暂时逃出舅舅的势力范围。

希特勒很宠爱外甥女，但又不让她与同龄人多接触。有一次德意志剧院举办舞会，希特勒是在有两个党内老同志（马克斯·阿曼和海因里希·霍夫曼）监护的情况下才同意让她参加的。霍夫曼觉得希特勒过于谨慎，后者则说：“她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海因里希·霍夫曼，《希特勒》）

这种特殊的舅甥关系并没有逃过众人耳目。施佩尔在回忆录中转述了大家对这极不谐调的一对儿的议论：“老战友们都说，他一直爱着吉莉·拉包尔。”舅舅和外甥女两人在慕尼黑总是一道去看歌剧演出。戈培尔曾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头儿和漂亮的外甥女在一起，他几乎要爱上她了。和她一起看《莱茵黄金》<sup>①</sup>。”1930年7月，戈培尔还与希特勒和吉莉一道在奥伯阿梅尔高观看了民间耶稣受难剧表演。他在7月21日的日记里写道：“去了穆尔瑙，住在塞豪森。头儿、吉莉、拉包尔夫人和我。一开始和大家在一起，后来就是我们几个。在静夜里散步。头儿谈到战争。早早上床。早上6点出门。早晨阳光灿烂，我们沿盘山小道上了奥伯阿梅尔高。8点整，戏开场了……我失望，可非常愉快。朴实的风格舞台。花花绿绿、粗声大气、闹闹哄哄。高大的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sup>②</sup>、俊美的约翰<sup>③</sup>。有些地方挺俗气……场地上挤满了党员们。在施塔恩贝格遇上雷雨，乘车回家。”1931年1月14日，戈培尔到慕尼黑比格尔布罗伊凯勒啤酒馆发表演讲，“晚上与希特勒和吉莉在一起，又说又笑。”第二天，希特勒和吉莉请他到家里吃饭。“在希特勒那里吃午饭。吉莉、赫斯及其夫人在场。很愉快。头儿像个家长……”戈培尔又记了一笔流水账。

1931年是纳粹党躁动的一年，纳粹的政治煽动在这一年里掀起高潮。比如在黑森-拿骚，一年内共举行了四千场政治集会，其中就有两千场是纳粹集会。希特勒四处奔忙。

① 瓦格纳歌剧名。

② ③ 抹大拉的马利亚和约翰都是耶稣的使徒。



1931年9月18日是个周五，希特勒也没闲着。下午快3点钟的时候，他带上海因里希·霍夫曼和司机尤里乌斯·施雷克，动身前往德国北部去参加一系列纳粹集会。当时马上就要变天了，四周刮着“焚风”<sup>①</sup>。当晚，他们赶到纽伦堡，在德意志霍夫饭店过了夜。次日，希特勒一行乘车离开纽伦堡驶向拜罗伊特，途中一辆出租车赶上了他们，车上的一名饭店雇员激动地直冲他们打手势。他让希特勒立即给慕尼黑打个电话，有极要紧的事情。电话中，希特勒得知外甥女出事了。回慕尼黑的路上，希特勒要司机把车开到最快速度。在埃本豪森的因戈尔施塔特，这辆车以超过限速一倍每小时五十五公里的速度穿过居民区，结果被警察拦下来，吃了罚单。

下午希特勒赶到家时，外甥女已经死了。

9月19日上午10点15分，希特勒的管家格奥格·温特打电话报了警。警长绍尔和福斯特受命调查此案。他们在希特勒家里见到了以下几个人：格奥格·温特和妻子安娜、希特勒过去的女房东玛丽·赖歇特夫人、女佣安娜·基尔迈尔以及纳粹党财务主管弗朗茨·克萨韦尔·施瓦茨。

在场者作了以下陈述：

1. 格奥格·温特：

“我是希特勒的管家。今天早上9点30分，我对我太太说，拉包尔一定出什么事儿了，因为她的房门关着，希特勒的手枪原来放在隔壁屋一个立柜里，但现在不见了。后来我又一再敲门，没有人答应。我觉得这事儿实在蹊跷，于是10点钟我用改锥去撬那个双扇门。门是从里面反锁的，钥匙还插在钥匙孔里。撬门时我太太、赖歇特夫人和安娜·基尔迈尔在场。打开门后，我进了房间，在地上发现拉包尔的尸体。她是开枪自杀的。我想不出任何她自杀的理由。”

2. 玛丽·赖歇特夫人：

“1931年9月18日下午快3点的时候，我听见拉包尔的房门关上了……过不多久，我听见从拉包尔屋里传出一声轻响，就像有什么东西被碰倒了。我没有太在意。晚上快10点钟的时候，我想去给拉包尔铺床，发现她房门还锁着。敲敲门没有反应，我就想，拉包尔大概出门了……为什么拉包尔要自杀，我无可奉告。”

<sup>①</sup> 阿尔卑斯山区的一种燥热的风。

### 3. 安娜·温特：

“1931年9月18日下午快3点的时候，我看见拉包尔非常激动地走进希特勒的房间，然后又匆匆走向自己的房间。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如今我猜想，她当时到希特勒屋里拿了那支手枪……我不知道拉包尔为什么要自杀。”

### 4. 安娜·基尔迈尔：

“……我不知道拉包尔为什么要自杀。”

这几个数年后很健谈的证人当时的陈述如此相似，又都很简短，这一点很引人注目。人们因而猜测，纳粹党财务主管施瓦茨可能事先已经详细教过他们应该对警察怎么说了。这些管家佣人们当然知道希特勒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出于对主人的忠诚，他们都守口如瓶。赖歇特夫人甚至没有听到那声枪响。

警方报告里还介绍了其他一些情况：“房间只有一扇门，还有一扇面向摄政王广场的窗户。尸体面朝下俯卧在沙发前，沙发上有一支瓦尔特6.35毫米口径手枪。法医米勒断定，子弹穿透肺部导致了死亡，而且从尸体已经僵直可以判断，当事人数小时前（大约下午五六点钟）就已经死了。开枪时枪口紧贴着领口的皮肤，子弹从心脏上方射入，没有击中心脏，也没有穿透躯体，但在左背腰部皮下能够摸到。”

据米勒大夫判断，吉莉是9月18日下午大约5点的时候自杀的。由于子弹没有射中心脏，她在死亡过程中一定很痛苦，最终慢慢窒息而死，死时一脸茫然。警方在屋里没有发现绝别信。根据警方的记录，写字台上只有一封刚刚开头的写给维也纳女友的信，“信中没有任何厌世的内容”。

9月19日下午快3点的时候，警察局局长办公室派人通知希特勒说，警方要跟他谈谈，地点就在他家里。快三点半的时候，绍尔警长来了。警方的报告概述了希特勒的陈述：“他外甥女一开始在大学里学医，但觉得没有意思，于是改学唱歌。本来就快能上台表演了，但她又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希望到维也纳一个教授那里继续深造。他同意了，但提出一个条件：她母亲必须陪她一起去，她母亲当时住在贝希特斯加登。但吉莉不想这样，于是他就反对她去维也纳。她可能很生气，但并没有显得特别激动，周五下午他出门时她还心平气和地与他告别。以前她曾经参加过招魂会搞



的‘桌灵动’<sup>①</sup>活动,回来后她对他说,自己将来肯定会不得好死……”

按照法医的鉴定,这显然是一起自杀事件。于是尸体被装入木棺,运往奥斯特公墓。没有人要求剖验尸体,最终也没有剖尸。星期一,也就是1931年9月21日,慕尼黑第一检察院就下令准许尸首下葬了。

同样是在1931年9月21日,《慕尼黑最新新闻报》地方版刊出一则消息:“自杀——警察报告说:博根豪森一套公寓里,一个在家自学的二十三岁女青年自杀身亡。姑娘名叫安吉拉·拉包尔,是阿道夫·希特勒同父异母姐姐的女儿……自杀动机尚不十分明朗……有一种解释说,拉包尔小姐在维也纳结识了一位歌唱家,她的舅舅却反对她去那儿。还有一说法是,这位自杀的姑娘不久将登台演唱,但又自觉无法胜任。”

与纳粹敌对的社会民主党报纸《慕尼黑邮报》9月23日报道了更多的情况。该报在题为《一桩神秘事件:希特勒外甥女之死》的文章中写道:“……本周五,也就是9月18日,希特勒先生又和他的外甥女大吵了一架。什么原因?二十三岁的吉莉生性活泼,正在学音乐,她想去维也纳,还想与人订婚。希特勒坚决反对。两人因此一再发生争吵。在双方大吵一架之后,希特勒离开了家……周六,有人报告说,发现吉莉小姐在家中开枪自杀,手中还拿着希特勒的手枪……死者的鼻梁骨断了……尸体上还能看见其他几处重伤……(发现尸体后)褐色大楼(纳粹党总部,巴洛宫)的先生们开了一个会,商讨应该如何公开解释自杀动机。他们最后商定,应该将吉莉之死说成是她在艺术方面愿望受挫的结果。”

鉴于《慕尼黑邮报》作了上述报道,检察院又让米勒大夫对他的验尸结果作了进一步说明:“死者的面部,特别是鼻部,没有发现任何创伤和出血的情况。面部只有几块比较明显的乌青色死亡斑,起因是拉包尔死时面部朝地,而且这一姿势一直保持了十七至十八个小时。鼻尖稍稍有点压扁,完全是死者面部一直压在地上造成的。因子弹射中肺部,死者主要是因窒息而死,这可以解释死者面部的死亡斑颜色为什么那么深。”

两个市政当局指定的殓尸女工也作了陈述,并被警方记录在案。玛丽亚·菲施鲍尔说:“1931年9月19日下午快2点的时候,我在那套公寓里……清洗安吉拉·拉包尔的尸体,并为死者更衣……除弹洞外,我没有看

<sup>①</sup> 指桌子的非人力移动,招魂术用以表示亡人显灵的一种手法。





见其他创伤，特别是我没有看到死者鼻梁骨受损……”罗辛娜·茨韦克尔说：“1931年9月20日星期天，中午11点至12点之间，我在奥斯特公墓将安吉拉·拉包尔的尸体……挪到锡棺之内。当时我仔细看过尸体，因为我听说死者是希特勒的外甥女。她脸色乌青……我没注意到鼻子上有什么可疑之处。”

希特勒援引新闻法第11条要求辟谣，《慕尼黑邮报》也爽快地发表了他的辟谣信。其内容如下：

1. 说我和我的外甥女安吉拉·拉包尔“一再发生争吵”，或在1931年9月18日周五那天或以前“大吵了一架”，这是违背事实的。真实情况是，我和我的外甥女根本就没争吵或争辩过。

2. 说我“坚决反对”我的外甥女去维也纳，这是违背事实的。真实情况是，我从未反对我外甥女到维也纳去的计划。

3. 说我外甥女想在维也纳与人订婚，或说我反对她与人订婚，这是违背事实的。真实情况是，我外甥女非常担心自己还不具备公开上台表演的能力，因而想去维也纳找位第一流的声乐教授重新给她测试一下嗓子。

4. 说我1931年9月18日“在一场激烈的争吵后”离家，这是违背事实的。真实情况是，当时没人争吵，也没人生气。

慕尼黑，1931年9月21日

尽管警方并没把吉莉之死归咎于他人，但流言四起，常被大众在聚餐会友时津津乐道，也不断被史书炒来炒去：说希特勒盛怒之下杀了吉莉；党卫军头领希姆莱是杀人凶手，因为他想防止发生对党大不利之事；吉莉当时怀孕了，有人说是因希特勒，也有人说是因一个犹太音乐教师或林茨的一个画家。还有的说吉莉是由于绝望而自杀的，说法一：她是希特勒性变态的牺牲品；说法二：出于对希特勒情妇爱娃·布劳恩的无比嫉妒；说法三：吉莉遭到了虐待，鼻梁骨断了，身上多处严重受伤。

所有这些流言有一个共同之处：缺乏证据。按当时一些证人的说法，证据很可能是有的，但已被销毁了。



这些说法听起来很是荒唐，毕竟有警方调查的总结报告摆在那里。法医所完整无缺的档案材料并没有安吉拉·拉包尔的尸体解剖记录，也不可能事后有人把它偷走。警察局的档案中甚至还能找到希特勒当时为赶回吉莉出事地点而超速驾驶遭到罚款的记录，这证明1931年9月19日他并不在慕尼黑。然而，仔细翻阅慕尼黑市的自杀记录，人们确实发现了一个档案号，它证明慕尼黑检察院的确进行过一次调查，但调查突然于1931年9月19日中止。任何有关的书面材料都不见了。匆忙中断正在进行的调查，有可能是那时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弗朗茨·居特纳采取的预防措施，此公总是尽一切可能帮助希特勒。例如，在希特勒政变失败后，他设法让希特勒在慕尼黑受审，而不是在莱比锡，否则希特勒有可能被判死刑。1972年，他又下令中止一项对希特勒涉嫌做伪证所做的司法调查。

不管是否符合事实，在1931年，居特纳的干预以及有关当局那么快就准许尸体下葬，确实让人觉得有人正在卑鄙地打算隐瞒事实真相。党内的朋友都会说，吉莉自杀，希特勒“惊愕万分”。警官绍尔的笔录说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他说，她的早逝让他很悲痛，她是他身边惟一个跟他关系密切的亲戚，而他运气就这么差。”由此可见，希特勒在悲剧刚发生的时候并没对死者表示同情，而只是想着自己以及此事对自身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来，希特勒又利用外甥女自杀为自己做宣传。

吉莉死后，希特勒也没有“一连数周”深居简出。9月19日至23日这三天，他是在一个朋友家过的，因为他不愿意在悲剧发生的现场过夜。

遂其母安吉拉·拉包尔之愿，吉莉的遗体被运到了维也纳。葬礼于1931年9月23日下午在维也纳中央公墓举行。吉莉被葬于左拱门9号临时墓穴，对面是卡尔-卢埃格尔纪念教堂。所谓临时墓穴，是最终葬身地还没有的时候从维也纳市租用的以临时下葬死者的墓穴。

希特勒没有参加吉莉的葬礼，按照吉莉哥哥的说法，希特勒“身心交瘁，无法参加”。实际上他是不想放弃参加党内集会。葬礼那天，希特勒去了汉堡。次日，也就是9月24日，他神爽气足地对一万名追随者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

有人说，希特勒出于对死者的尊敬突然变成了素食主义者。这一说法也过于夸张。1924年希特勒就基本上不沾荤腥了，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身体原因。他曾对人说（《希特勒秘密谈话录》）：“我只要吃肉，就会拼命出



汗。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喝了四升啤酒，但体重却减了九磅。吃素以后，我只需偶尔喝一两口水就行了。”

吉莉的房间此后一直保持原样，再没有人住进去，而说它已成了一个神圣的禁地却并不符合事实。1932年初，亨里埃特·冯·席拉赫婚宴之后想在希特勒家里更衣，希特勒就让她进了吉莉的房间。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说希特勒每年圣诞节期间都闭门不出，待在吉莉的房间里祭奠外甥女和他死去的母亲。但是，只有希特勒那个并不怎么爱说真话的仆人克劳泽在回忆录中这么说过。希特勒和佣人们关系都相当好，但他有一次谈起克劳泽时却说：“……克劳泽总爱编故事，简直有瘾。他并不适合做仆人，总是信口雌黄……”

希特勒在1938年5月2日立的遗嘱里专门提到了吉莉房间里的家具：“慕尼黑家中我外甥女住过的那间屋子里的陈设，要留给我姐姐拉包尔夫人。”

吉莉死后，希特勒于1931年圣诞节给她哥哥寄了一笔钱，并附了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莱奥！今年圣诞节我们大家都非常悲伤。向你和玛丽亚姑姑致以最衷心的祝福……舅舅阿道夫·希特勒。”

吉莉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希特勒去了她的墓地。“元首因私事去了维也纳。没有告诉任何人，免得招来一大群人。”戈培尔在1932年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当时也在去维也纳的路上。

希特勒的副官尤里乌斯·绍布陪着拉包尔夫人已经先行一步。戈培尔与他们俩在维也纳会合。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绍布用的是‘胡贝尔’这个假名。他来替星期一要来为吉莉扫墓的头儿安排住宿……拉包尔夫人……这个善良的人到旅馆来找我，哭得死去活来。我尽力安慰她。可怜的好吉莉。都整整一年了……希特勒现在正在维也纳……”

雕塑家费迪南德·利贝曼受托为吉莉制作了一个半身塑像，后来这座塑像陈列在希特勒的新总理府里。希特勒欣赏的自然主义画家阿道夫·齐格勒，根据一张照片为“元首”的外甥女画了一张肖像。希特勒后来把这幅画供在贝格霍夫山庄里，周围总是摆着鲜花。

1933年11月庆祝慕尼黑政变十周年之际，希特勒碰巧与“老战友”和司机埃米尔·莫里斯重逢。此时的莫里斯已经做了慕尼黑市议员。两人重修旧好，死去的吉莉已不再是他们谈论的话题了。莫里斯向“元首”介



绍了他在慕尼黑狂欢节游行时认识的女友，当时她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骄傲的西班牙女郎。1934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这对情侣也带着鲜花到希特勒家向“元首”表示祝贺。据后来成为莫里斯妻子的黑德维希·莫里斯大夫回忆，希特勒当时表现得非常热情、友好、兴致勃勃，充满了“奥地利人特有的魅力”。听说“莫里茨尔”要和将做医生的黑德维希结婚，希特勒冲口便说：“婚事由我来办！”不过，由于希特勒的住宅正在维修，婚礼最终并不是在摄政王广场举行的，而是在豪华的慕尼黑四季饭店。黑德维希说，当时“整个慕尼黑都送来了礼物”。

人人都知道希特勒如何哀悼死去的外甥女。然而，死者对舅舅究竟有多重要，在他心目中究竟占多大分量，看看客观事实也就一清二楚了。这位“元首和帝国总理”根本就觉得没必要郑重其事地安葬他所爱的吉莉，他并没有为她买一块墓地，立一块墓碑。

装有安吉拉·拉包尔遗体的棺木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放在维也纳的临时墓穴里。刚开始希特勒还能定期寄来墓地的租金，从1938年1月起，他干脆连租金也不寄了。

拉包尔家人并不认为吉莉之死是希特勒之过。吉莉的哥哥莱奥·拉包尔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就曾为希特勒开脱。姑娘的母亲估计也没这么想过，因为吉莉自尽并没有影响希特勒与他姐姐的关系。1931年后，她仍待在希特勒周围，戈培尔在日记中就经常提到：“和希特勒及拉包尔夫人在一起聊天。”弟弟1933年2月1日被任命为总理后，曾在很小的范围搞过一次庆祝，拉包尔夫人也参加了。“帝国新闻记者”、希特勒的朋友海因里希·霍夫曼第二次结婚时，她也出席了婚礼。她还经常到宣传部长戈培尔家走动。只是因为拉包尔夫人自视瓦亨费尔德的女主人，处处刁难弟弟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她与希特勒的关系才闹僵了。希特勒因此不许她再待在上萨尔茨贝格，还雇了一对夫妇取代她做了管家。

戈培尔在1935年11月的一篇日记里谈到了姐弟俩反目的情况：“她谈到了自己所有的不幸，还说，如果元首能与她和好就好了……”1936年，拉包尔夫人与建筑学教授哈米奇结婚，并移居德累斯顿。此后她与希特勒关系和解了。老家瓦尔德费尔特勒那些亲戚们家里有什么事情，希特勒就又让姐姐代表自己去应酬。这位“元首”对住在穷乡僻壤的农村亲戚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仅在1908年自己还年轻的时候回去看过他们一次。对自己



的穷出身，希特勒一点都没有感到羞愧，他在《我的奋斗》中就经常提及这一点。他不愿与亲戚们来往，主要是因为害怕他们找他帮忙办事。他姐姐安吉拉也害怕这一点。1938年8月，她去参加了希特勒姨母特蕾西亚·施密特的葬礼，并以希特勒的名义把一小笔钱送给了希特勒不愿打交道的表兄妹。这笔钱后来造成了可怕的后果。1945年，住在瓦尔德费尔特勒县苏占区的施密特兄妹几个（还包括他们的配偶）均被逮捕。他们平时安分守己，却因为家世受到了指控，希特勒送的那笔安葬费被当做了他们与“元首”关系密切的证据。希特勒在瓦尔德费尔特勒的亲戚中，只有一人活着走出了俄国人的监狱。

吉莉的哥哥莱奥后来成了社会民主党人。他的命运一直是希特勒的一桩操心事。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担任德军工兵少尉的莱奥被抓进了俄国人的战俘营。希特勒曾想用斯大林的儿子雅各布把他换回来，雅各布1941年就被德军俘虏。斯大林虽然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最终还是拒绝了，理由是：“战争就是战争。”

在第三帝国时期，议论“元首”外甥女自杀是不受欢迎的。连维也纳公墓管理当局都不敢犯忌谈论这位著名的死者，虽然她在临时墓穴里安息仍然是完全不合法的。但是，希特勒本人却一再虚情假义地利用外甥女的惨死做宣传。他总是在暗示，吉莉是他惟一爱过的女人，而她死后，他便将爱献给了德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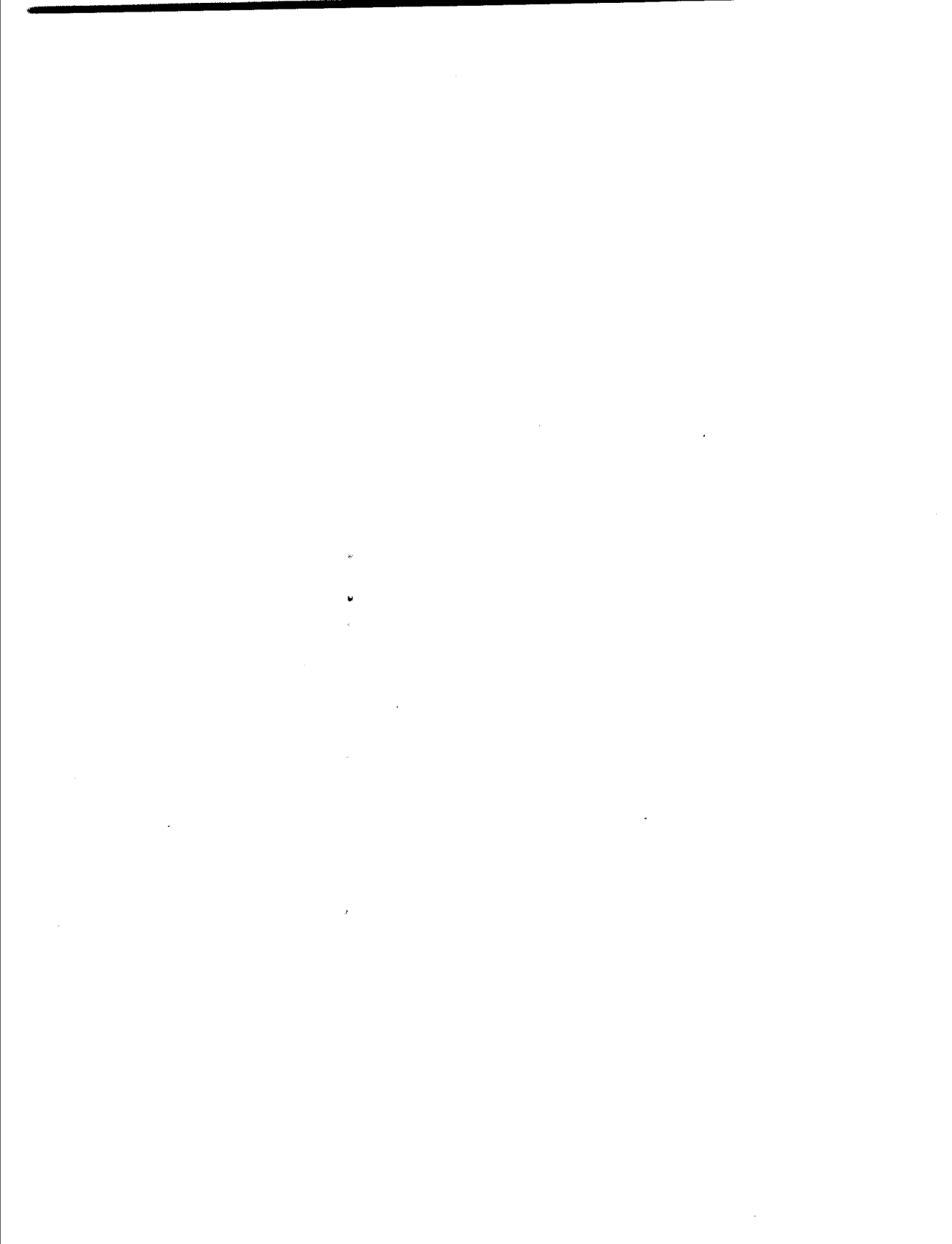
1945年5月，美军士兵进入慕尼黑摄政王广场的希特勒公寓时，他们看到吉莉房间里的情景，一如1931年她死时那样。

1946年3月11日，吉莉的遗体“按规定”迁出了维也纳中央公墓的临时墓穴，改葬在一个集体墓穴中。1967年，一个立志“追踪吉莉·拉包尔遗迹”的记者还发现了一块很可能是1946年立的墓碑，上面写着：“我们亲爱的吉莉长眠于此。她是我们的肝宝贝。生于1908年6月4日，卒于1931年9月18日。拉包尔家人。”

战后，有关吉莉自杀的争论又重新开始，并持续了几十年，但始终没有结果。1985年，维也纳一个名叫汉斯·霍尔瓦特的家具修复商一时兴起，决定采取具体行动澄清吉莉悲剧之谜。他自己出钱聘请了法医，并且购买了准备重新安葬吉莉的墓穴以及十字架和纪念碑。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后，他正式提出掘墓申请，“因为公众有权完整无缺地获悉历史真相”。这一精



心准备的计划最终因有关当局的规定而告吹。公墓管理当局的人说：“这一（葬有安吉拉·拉包尔）集体墓穴就像其他所有的集体墓穴一样，按规定只保留十年，其间原先的墓室早已填平并被改建，想准确查明安葬位置已经不可能了。”



希特勒的幕后情人——爱娃·布劳恩









“元首没有私生活。他总是夜以继日地为德国人民操心。”这是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公开宣扬的论调。

希特勒本人在他多年的生活伴侣周围筑起了一道沉默的高墙。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元首”和这个金发女郎之间的关系。她向官方申报的身份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算是希特勒山间别墅贝格霍夫的职员。她的工资是从纳粹党的财务中支取的。

在第三帝国时期，虽然能听到人们私下里议论说“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但详细情况大家并不知晓，连这个女人的名字人们也是在战争结束时才知道的。有关保密措施和严格的新闻检查确实非常有效，整个纳粹时期只有一张有爱娃·布劳恩露面的照片公开发布，而且连这也是疏忽造成的。

这张照片是在1936年加米施-帕滕基兴冬季奥运会时拍的。希特勒坐在第一排，而他的情人和她的妹妹格丽特尔就坐在后一排。

爱娃·布劳恩1912年2月7日出生在慕尼黑伊莎贝拉街45号。父亲是教师，名叫弗里德里希·布劳恩。母亲是裁缝，名叫弗兰齐斯加，娘家姓克龙贝格。夫妇俩此前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当时四岁，名叫伊尔莎。父亲心里盼望这回能生个儿子，没想到还是个千金。给亲友的出生通知书上写着：荣幸地宣告，爱娃·安娜·保拉顺利降生。三年之后，夫妻俩又得一金，名唤玛加丽特（昵称格丽特尔）。姑娘们接受的都是天主教的洗礼和教育，并参加了天主教的首次领受圣餐和坚信礼仪式，这是新教徒布劳恩先生与天主教徒弗兰齐斯加结婚时不得不答应的条件。在一战结束后的艰苦岁月中，布劳恩一家的境况比普通德国人家要好得多。1925年他们搬进了霍亨索伦大街93号的一大套舒适的公寓，家里雇了一名女佣，还用继承的一笔遗产买了一辆私人轿车，这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爱娃的父母思想保守，拥护君主制度，崇尚民族主义，是当时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希特勒也出身于这一阶层。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是从这个他所亲近又非常熟悉的社会环境中选择生活伴侣的。

布劳恩家三个姑娘所受的教育都考虑到了未来的就业。爱娃是在拜尔恩格里斯乡村修道院办的大众学校读的小学，随后又上了慕尼黑滕街女子中学。她在两个学校成绩都很好。虽然教师经常说她是“又倔又懒的野丫头”，但朋友们并不这么看。大家都挺喜欢她活泼好动、爱开玩笑的性



格。父亲很看重的美术和音乐课，爱娃觉得没意思，她喜欢上体育课。这一点爱娃像她母亲，后者甚至还在1905年一次滑雪比赛中得了冠军。作为慕尼黑施瓦宾区体育俱乐部的一个热心会员，爱娃搞了很多年的田径运动以及健美（按照今天的说法）。至今人们还能在一部1940年前后摄于上萨尔茨贝格的业余影片中欣赏到她在单杠上的娴熟技巧。爱娃·布劳恩最爱看的是卡尔·迈<sup>①</sup>的小说。希特勒也有此好，不过他感兴趣的是“堪称部队头领楷模的温内托<sup>②</sup>”。后来在贝格霍夫，爱娃又经常看第三帝国被禁的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不过，她最爱看的还是电影杂志，以及描写女人为情人献身的廉价的言情小说，而这正是将来她自己命运的写照。爱娃还爱听美国爵士乐和音乐剧。

爱娃多年的老板海因里希·霍夫曼说：“她喜欢泡舞吧胜过去看戏。”此外，同其他年轻姑娘一样，她还是个追星族，爱收集葛丽泰·嘉宝的搭档约翰·吉尔伯特的明星照片，梦想着将来能当个电影明星或舞蹈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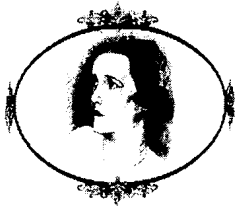
然而，爱娃的父母在她读完女子中学后又让她进了英国淑女学院<sup>③</sup>深造。这所学校位于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边境的辛巴赫。爱娃在那里一直待到1929年7月，学了法语、打字、会计和家政等课程。毕业后她回到父母家，开始在慕尼黑找工作。

有一天，爱娃的父亲偶然听说慕尼黑马克斯福施塔特区舍林街50号一家照相馆要招店员，因为照相馆要接很多纳粹党的活儿。1929年9月的一天，爱娃去海因里希·霍夫曼开的这家照相馆求职，成了店里的学徒兼店员，什么杂事都干，一直干了很多年。

爱娃很喜欢霍夫曼照相馆里紧张忙碌的生活，而且这里还让她浪漫地联想起了电影世界，尽管两者并不是一回事。虽然已不再是十来岁的小姑娘了，爱娃仍在编织着有朝一日当个成功的电影明星之梦，而且这一梦想伴随了她一生。后来在上萨尔茨贝格，她还幻想在纳粹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之后，自己能在一部好莱坞大片中扮演女主角，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了解

<sup>①</sup> <sup>②</sup> 卡尔·迈，1842—1912，德国作家，专写供青年阅读的游记和冒险故事，描写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和美国西部印第安人的生活。《温内托》是其代表作之一，描写的是美国西南部阿帕切印第安人酋长温内托的传奇故事。

<sup>③</sup> 17世纪初由英国天主教修女玛丽·沃德创办的专为女子提供全日制教育的教会学校，后推广到欧洲许多国家。



她与希特勒在一起的生活，当然这是后话。1929年时，爱娃学的是摄影还有冲胶卷，很快这就成了她的爱好。爱娃选择这么一个工作岗位也改变了她的一生，因为1929年10月，她认识了阿道夫·希特勒。

爱娃后来和妹妹谈起了初遇希特勒的情景：“下班之后我还留在店里，因为我要把一些文件整理一下。我爬上梯子去拿摆在柜子上面的文件夹，这时老板进来了，还有一位上了一定年纪的先生。他长了一撮很滑稽的小胡子，身穿浅色的英国式大衣，手里拿着一顶大毡帽。我站着没有动，偷偷地瞟了他一眼，发现他正在瞧我的腿。我有点儿不自在，因为当天我刚把裙子改短，不敢肯定裙边弄好了没有……我下了梯子，霍夫曼介绍说：‘沃尔夫先生。这是我们可爱的乖小姐布劳恩。去到街角的饮食店里为我们弄一点儿啤酒和煎肉饼来。’”

爱娃买东西回来后，沃尔夫先生（希特勒的假名）恭维了她几句，两人聊起了音乐和慕尼黑国家剧院最新上演的节目。据说这位刚从戒律森严的教会学校毕业的姑娘当时并没有认出“这个拿着宽边软呢帽和马鞭的沃尔夫老先生”就是时年四十岁的纳粹党主席，而她平时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卖印有希特勒相片的明信片。

爱娃只向姐妹们透露了她与希特勒的关系，而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来找霍夫曼的时候，希特勒不时给爱娃带来一束鲜花，有时还送她一盒糖果。见面时希特勒总是彬彬有礼地行个吻手礼，说两句漂亮的恭维话。1929年圣诞节，希特勒送了她一张有自己亲笔题词的照片。当时两人拍了第一张合影，照片上的希特勒正微笑着向喜形于色的爱娃彬彬有礼地脱帽致意。她把这张照片收入了自己的相册，旁边还注上了希特勒说的一句话：“……我跟她很熟。”

霍夫曼照相馆里的一切都围着希特勒和纳粹党转。霍夫曼不知疲倦地用相机记录纳粹所有的活动，出版纳粹全国党代会画册，并编纂类似《德国的觉醒》这样的宣传小册子。他是希特勒的“贴身摄影师”，同时也是所有纳粹显贵们的“专用摄影师”，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搞什么活动，这些人都要找他拍照。

舍林街50号的后半部分就是纳粹党领导机关所在地，而纳粹中央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就在附近的41号。希特勒是该报的责任发行人。纳粹党的头头脑脑经常爱光顾的小酒馆巴伐利亚酒店，也就

在舍林街和施劳道尔夫街的拐角处。党卫军成员经常在这里散发传单。因此爱娃很快就认识了纳粹党的诸头目，看得出来姑娘对老板的这些顾客有什么恶感。她很快就习惯了与霍夫曼周围的这些人打交道。不久，她交游的范围也就仅限于这些纳粹党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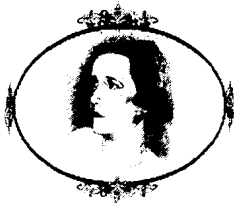
希特勒从30年代初开始就与海因里希·霍夫曼家有了私人来往。没有一个人像霍夫曼那样自始至终了解希特勒与爱娃关系发展的全过程。他还是爱娃的经济代理人，负责处理所有与她有关的数目较大的财务收支。从霍夫曼写的回忆录中不难看出，他并不怎么欣赏爱娃：“……由于长着一对蓝眼睛，人们完全可以说她漂亮，虽然她看上去没什么头脑，就像时下广告画上常见的那些大路货美人一样……”

后来霍夫曼经常爱选用这对情人的照片，不过按照指示，照片上的爱娃·布劳恩都要被裁剪掉。比如在他出的《希特勒山居生活》青年图片册里，有一张反映希特勒独自在格施万登纳鲍恩山野间的照片。本来坐他旁边的爱娃·布劳恩成了霍夫曼剪刀下的牺牲品。

1929年11月初，霍夫曼照相馆迁入一个面积更大的场所。爱娃·布劳恩新的工作地点位于特蕾西娅街与阿马利恩街拐角处的斯特凡妮咖啡馆二楼。《人民观察家报》详细描写了新照相馆面积之大，最后还写道：“连霍夫曼的助手们也都是专业人士……”照相馆1932年开列的一张工资单上共有十七个雇员的名字，其中也有年轻的爱娃·布劳恩。她负责站柜台招呼顾客。纳粹党全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回忆录中对她的工作做了以下描写：“后来她成了总理的情妇之后，仍负责照管霍夫曼的纳粹明信片。希特勒让她定期报告哪些明信片销路最好。他把这当成了一种‘盖洛普民意测验’，用来考察手下谁的人气最旺。”

即使有了工作，爱娃仍住在父母家，受到父亲的严格监护。做父亲的把三个女儿看得很紧，不许她们有越轨行为。他监听她们的电话，拆看别人给她们写的信，时刻留心着她们与别人的交往。晚上10点整，他就让她们熄灯睡觉。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女儿爱娃白天，特别是在工作岗位上，也有结交男性的危险。

希特勒时不时地邀爱娃去听歌剧、看电影，去巴伐利亚酒店，或一起到慕尼黑周围某个环境优美的地方野餐。出行时总是跟着豪华的“奔驰”车队，司机和副官很善察言观色，对希特勒俯首帖耳。爱娃对这一切当然



不会无动于衷。但她父母对此却一无所知，因为爱娃高高兴兴地玩了一天之后，回家总是对父母说，她又在照相馆里无聊地加了几小时班。

与爱娃·布劳恩结识不久，希特勒就让人调查了她的身世。有证据表明，年轻的希特勒在维也纳时与犹太人交往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作为一个极端反犹政党的领袖，他并不希望与一个“非雅利安女子”交往。后来当上纳粹党办主任的马丁·博尔曼，早在1930年就查过布劳恩家的祖先里是否有犹太人。

希特勒地位显赫，广播、报纸上经常有关于他的报道，有这样一个人追求自己，爱娃·布劳恩陶醉不已。能引起这么一个名人的注意，她受宠若惊。很快父母就惊讶地发现，本来并不关心政治的女儿居然在家里挑起了激烈的政治辩论。爱娃的母亲一般与她意见一致，而父亲从一开始，姐姐伊尔莎则自始至终对纳粹思想表示怀疑甚至反感。不过他们全家人都没有受到反犹思潮的影响。爱娃当时和一个学医的犹太大学生关系不错。而姐姐伊尔莎也为犹太专科医生马丁·马克思工作了很多年。尽管后来纳粹政权大肆诽谤犹太人，她仍坚持做他的门诊助理，直到1938年夏天医生移居美国后，她才不再当他的助手了。

当时冲锋队和党卫军经常袭击社民党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政敌和犹太人。冲锋队的人阻止民众进犹太人商店买东西，还刁难那些求助于犹太医生和律师的人。爱娃每天都能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但她认为这些暴行并非主流，并相信这些事是背着希特勒干的，因为希特勒对待女人总是彬彬有礼。

1930年时，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仍然处在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范围，两人总是在白天见面。希特勒到霍夫曼照相馆时，经常把脱下的风衣挂在衣帽间里，爱娃于是把她写的短信塞进风衣的口袋里。这一切她的老板都看在眼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还有其他人没有看到他（希特勒）对爱娃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而爱娃就不一样了……她对女友们说，希特勒爱上了她，她一定能让他娶她……”

1932年初，爱娃在摄政王广场希特勒的家里成了他的情妇。这没有逃过希特勒女管家温特夫人的眼睛。对此爱娃自己曾对妹妹作过暗示。有一次，她看到一张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希特勒家与他共进早餐的照片时格格地笑道：“要是他知道这张沙发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儿，那就有意思了！”

希特勒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他与爱娃关系的游戏规则，他规定两人只能私下交往，并且始终注意严格保密。对希特勒来说，政治，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绝对是要优先处理的。他只是偶尔与情妇见见面，在她身上花的时间很少。他设想的是一种平平淡淡的、有一定期限的关系。有一次副官弗里茨·维德曼问希特勒是否有结婚的打算，希特勒答道：“我在慕尼黑倒有一个谈情说爱的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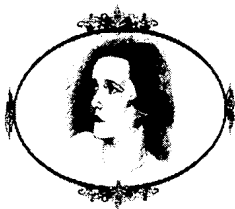
希特勒与被她唤作“小可怜”的爱娃·布劳恩交往，并不是为了找一个事业上的伴侣和政治上的战友。有一次他说：“聪明的男人应该讨个没怎么受过教育、头脑简单的老婆。你们想想，假如现在我身边有一个爱插嘴干预我工作的老婆，那该有多糟糕！闲时我不愿别人打搅……我永远不会结婚！”说这话的时候，爱娃也在场。

结识希特勒后，爱娃·布劳恩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等待中度过的。1932年她仍和父母住在一起，和姐妹们共用一间卧室，每天去霍夫曼照相馆上班，挣钱维持生计。与希特勒的关系在金钱上给她带来的好处微乎其微——几件小首饰，偶尔有个供她买衣服的红包，还有一部专用电话，名义上是供她与照相馆联系用的。电话铃一响，爱娃马上就会跑到床上躲在被窝里接听，因为只有这样她才不会被打扰。

然而希特勒很少打来电话，因为当时德国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希特勒在德国四处奔波，仅1932年7月15日至30日期间，他就在五十个城市发表过演讲；一年中共举行了五次大选，充满了躁动、暴力的气氛。1932年11月6日大选前的最后竞选阶段，姑娘在慕尼黑根本就见不到希特勒的踪影。

爱娃·布劳恩只能接受现实，耐心等待。要让她和希特勒分手，她宁愿去死。1932年11月1日，不堪寂寞的爱娃提笔写了一封绝命书，然后拿起父亲那支总装有子弹的左轮手枪对着脖子开了一枪。子弹嵌在了肉里，差一点就击中颈动脉。尽管失血很多，爱娃总算还能自己给医生打求救电话，她还有意选了老板霍夫曼的妹夫普拉特大夫，因为她敢肯定，后者会把她自杀的消息迅速报告希特勒。普拉特把姑娘送进医院，动手术取出了子弹。

爱娃算得很准。希特勒收到绝命书后立即就来看她了。他还向人打听爱娃是否真的打算自杀。大夫说：“她瞄准的是心脏，幸亏我们抢救及



时。”

爱娃对焦急的父母解释说，她是拿手枪时不小心误伤了自己。希特勒看样子很受感动，如果说他曾有过与爱娃分手的打算的话，那么这次自杀行动的确让他彻底打消了这一念头。1933年元旦之夜，他邀请爱娃一同去慕尼黑国家剧院观看了由汉斯·克纳佩茨布施执导的瓦格纳歌剧《名歌手》。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一并邀请了鲁道夫·赫斯及其夫人伊尔茨、副官绍布和布吕克纳，还有海因里希·霍夫曼和他的未婚妻索菲·施波克（霍夫曼的原配已于1928年去世）。随后众人又一起去纳粹党外事新闻秘书汉斯·汉夫施滕格尔（人唤“普齐”）家“围炉喝咖啡”。这是爱娃首次到汉夫施滕格尔的豪华寓所里做客。大家玩得很开心，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看完歌剧后情绪很好，而他的情绪总是决定一切的。“普齐”用钢琴为大家演奏了瓦格纳音乐。

汉夫施滕格尔在回忆录中对爱娃作了一番描述：“我不是第一次见到她。她是个看上去挺可爱的金发姑娘，长得不错，有一对蓝眼睛，有一种不事声张的、几乎可以说是怯生生的魅力。几个月前我在霍夫曼照相馆里就注意到她了……”

1月4日，也就是在汉夫施滕格尔家度过那个愉快的晚上三天之后，希特勒与弗朗茨·冯·巴本<sup>①</sup>在科隆银行家冯·施罗德的寓所里举行了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双方在会谈中为推翻现任共和国总理作了一笔交易。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这件事让爱娃·布劳恩大为焦虑，因为这意味着希特勒从此以后有很多时间要待在柏林，而那里却是她所憎恨的、自视清高的竞争对手玛格达·戈培尔的领地。爱娃自己直到1935年才应希特勒之邀去过柏林。不过，1934年在爱娃的眼里却是很成功的一年，因为相对来说，希特勒更经常把心思花在她身上。所有其他事情，比如希特勒当上“元首和总理”，还有所谓的“罗姆暴乱”，都与她关系不大。1935年，爱娃仍在照相馆站她的柜台。即便是有权有势的总理的情妇，她也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比如，她当时只嚷嚷着让希特勒送给她一只小狗，而后者并不喜欢小狗。

<sup>①</sup>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保守派政客，曾任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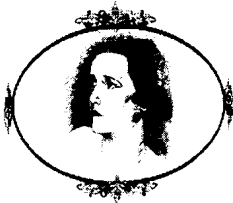
当时霍夫曼照相馆已经发展成了一家大大的连锁公司。爱娃的老板为自己购置了一幢豪华别墅，里面摆满了艺术品。戈培尔说那里就像个“小博物馆”。爱娃对此毫无妒心，虽然她自己不得不经常借债。爱娃在1935年4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拼命地攒钱，所有人都烦我了，因为我样样东西都想买，从服装、照相机到戏票……不过，情况会好起来的，借的债并不算太多……”

对爱娃来说，最重要的是她的老板能直接与希特勒打交道。因此她总是到霍夫曼家里去，有时甚至是死缠着他们。她还同样一再纠缠摄政王广场希特勒家的女管家安妮·温特，向她打听希特勒的行踪。出于安全考虑，希特勒对自己的出行计划一贯保密。霍夫曼夫妇因此处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爱娃是他们偶像的情妇，他们对他感恩戴德；另一方面爱娃又是个必须听他们指示的雇员。正因为如此，霍夫曼夫妇对爱娃的态度也时好时坏。有时他们会给她点小恩小惠——爱娃在日记中曾写道：“今天霍夫曼太太送了我一张戏票。”——但心里又瞧不起她，于是有时也要开导她几句。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提醒爱娃注意自己的处境是多么不牢靠。每逢霍夫曼伙同戈培尔一道安排希特勒与其他女人见面，索菲·霍夫曼，也就是霍夫曼的第二任妻子，就会唠叨着向爱娃发出暗示。“霍夫曼太太出于好意毫不隐讳地告诉我，他现在又另有女人……”爱娃曾在日记中如是写到。

但是姑娘仍在耐心等待。1935年3月4日，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待在霍夫曼家里如坐针毡，心里时刻念叨着这会儿他应该来了。”4月1日，她又写道：“为什么他不到霍夫曼家来吃饭呢？这样至少有几分钟他是属于我的……”

有意思的是，一直没有加入纳粹党的爱娃在1935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完全从自己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史上的戏剧性事件。她的出发点是她的情人是否会有空陪她。没有一个受过政治训练的女纳粹党人会说出她这种天真幼稚的话来：“是的，他目前脑子里装满了政治问题，不过现在是否又该放松一下了？去年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当时罗姆和意大利给他制造了很多麻烦，但他还是为我抽出了时间。”爱娃在这里谈到的是1934年6月30日发生的所谓“罗姆暴乱”。在这一戏剧性事件中，希特勒让人除掉了“给他制造了很多麻烦”的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

1935年初，爱娃试图说服希特勒帮她改善境遇：“……他怎么这么不



通人情，老是让我（在店里）低三下四地伺候陌生人……”1935年2月，爱娃觉得自己的愿望快要实现了。她在2月18日的日记中不由自主地表达了自己的依赖心理：“……最好是他能想着把我从店里弄走……我可不能指望他送我一幢小房子。这我想都不敢想，因为那样的话就太神了。但愿我不用再为我们‘可敬’的顾客开门，不用再做店员了。上帝啊，帮帮我吧！让这一切早日成真……”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3月里的一天，爱娃挤在人缝里看见了希特勒。“我在卡尔顿饭店前足足等了三个钟头，眼看着他为昂德拉（安妮·昂德拉，拳击世界冠军马克斯施梅林的妻子）买鲜花，并请她吃饭……”1935年5月10日这一天的日记，看上去就很绝望了：“……他至少知道如果他突然看上了别人，我是不会拦他的。至于我会怎样，他是无所谓……”

5月28日，爱娃·布劳恩决定第二次自尽。她写了一封“决定性的”信寄给希特勒，但没有收到回音，于是就买了一盒安眠药。显然没有人告诉姑娘当时希特勒有多忙。5月19日，希特勒先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为高速公路开通剪彩，然后又去了柏林。5月25日至26日，他又到汉堡参加德国航海日纪念活动，随后又到梅克伦堡参加省党代会，接着又在慕尼黑出席德国纳粹党中央领导人会议。

“上帝保佑，让我今天能见他一面，明天就晚了。我已经决定吃三十五粒药，这下是‘必死无疑’了。他至少让人打个电话来也好。”爱娃用这几句话结束了5月28日的日记。

然而当晚很晚的时候，伊尔莎·布劳恩来了。她以前为了参加跳舞比赛借了爱娃一件衣服，那天是来还东西的。发现妹妹已经不省人事，她立即给爱娃做了人工呼吸，并且叫来了医生。检查后发现，爱娃一共吞了二十颗安眠药。她身边还摆着打开的日记本。伊尔莎把其中写字的部分，也就是1935年2月6日至5月28日这段时间的日记撕下来藏了起来。后来她把这二十二页日记还给了妹妹，后者把它们带到了上萨尔茨贝格。

这二十二页日记片断——爱娃记的那些详尽的日记都丢失了——虽然短，但足以反映爱娃的心理。没有断句，行文也欠流畅，这位时年二十三岁的姑娘用十几岁小女孩的笔调倾诉了她日常生活中琐碎的小烦恼，同时也表达了对希特勒的真情挚爱。这是一个单纯、幼稚的姑娘的心灵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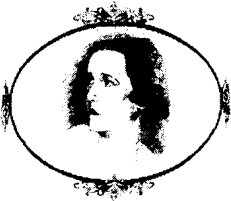
她在日记中自豪地宣称：“我，德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的情人。”她还抱怨道：“他只为某个目的而需要我。”经常有人猜测希特勒根本没有性能力，而爱娃这句话说明事实并非如此。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显然有性生活。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莫莱尔战后在接受美方调查人员审讯时曾说，希特勒最后几年性欲下降，爱娃·布劳恩经常要求医生给他开壮阳药。

爱娃第二次采取自杀行动后，做父母的说了一大堆让她很伤心的话，她觉得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让爱娃父亲反感的并非是希特勒的政策，而是他女儿与希特勒的关系根本不可能合法化这一事实。他经常轻蔑地指责女儿甘做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实在不堪折磨，于是和妹妹格丽特一起搬到维登迈尔街一套公寓里自己过了，那里离希特勒住处不远。这是一套舒适的、设备现代化的三室公寓，有中央供暖。母亲为她们提供了床上用品和餐具。租金和一个匈牙利女佣的薪水由希特勒支付，定期由霍夫曼转交。

爱娃父亲弗里德里希·布劳恩不愿忍受女儿给家庭带来的这种莫大的耻辱。见女儿对自己的话置若罔闻，连太太也袒护女儿，他决定直接向希特勒发出呼吁。他写了一封信托霍夫曼转交希特勒，后者却把信交给了爱娃，她又把这封信销毁了。但信的草稿却保留下来，从中可以看出做父亲的一番苦心。他在信中小心翼翼地暗示希特勒最好能娶他女儿。

“尊敬的总理先生！因为一件私事、一个父亲的烦恼而不得不打扰您，我非常不安。您作为德意志民族的领袖，操心的事情一定比这要大得多……我的家庭目前被拆散了，因为我两个女儿搬进了供您使用的一套公寓，而我作为一家之长却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爱娃经常下班后很晚才回家，我自然要批评她几句，因为我认为，一个年轻人在八小时紧张工作之余，需要和家人待在一起做必要的放松，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此外，我还持有一种或许比较老派的道德观念，认为孩子们只有结婚之后才可以不再需要父母和家庭的监护。这是我的荣誉观。更不用说，我还非常想念自己的孩子。尊敬的总理先生，如果您能对此表示理解，我将不胜感激。在此我还想请求您不要助长我女儿爱娃的独立欲望，虽然她已经成年。恳请您督促她回家。”

1935年秋，希特勒让情妇参加了在纽伦堡举行的第七届纳粹全国党代会。会议通过了旨在“保护德意志民族血统和德意志荣誉”的几项法律（统称《纽伦堡法》），禁止与犹太人通婚，并且规定只有有雅利安血统的



人才能担任公职。爱娃作为希特勒的客人，坐在大会的贵宾席上。

汉夫施滕格尔在回忆录中分析爱娃·布劳恩所扮演的“有失体面的宫女角色”时写道：“不管怎么说，她（爱娃）的忠心还是得到了希特勒的报答。她曾不引人注目地列席了1935年的党代会，不过她当时穿了一件昂贵的毛皮外衣。玛格达·戈培尔自认为是希特勒惟一应该关注的女人，当时她很不明智地说了爱娃几句坏话。希特勒勃然大怒……”

1935年，爱娃不再工作了，而且她想拥有一幢自己的房子的梦想也实现了。应希特勒之托，海因里希·霍夫曼为爱娃找了一个合适的住处。那并不是一所豪宅，也不是一个浪漫的爱巢，而是一幢1925年造的朴素的单户小楼，一模一样的小楼周围还有五座。房子位于慕尼黑博根豪森别墅区瓦塞尔堡街12号，当时几乎算是在慕尼黑城边上了，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步行就可以很方便地去位于摄政王广场的希特勒住所。买这幢房子共花了三万马克，房契是由忠实可靠的霍夫曼签的。直到1938年，这幢房子的所有权才正式转到希特勒“女秘书”爱娃·布劳恩的名下。当时房子四周还有一个大约八百平米带围墙的花园。小楼至今仍在。

爱娃的新居属于一战后俭朴的私人住宅常见的那种装饰派建筑风格，内部逼仄。底层有一个面积很小的前厅，柜子都是嵌在墙里面的。此外还有一个同样小的厨房，以及一个兼作餐厅的起居室。有一个窄梯通向二层的两个卧室和一个浴室。顶层的亭子间用做客房兼秘密吸烟室，因为当着希特勒的面是不许吸烟的。房子虽小，里面的陈设却非同一般，因为这是希特勒亲自操办的。比如餐厅里那套用异国木材制成可供十二人用的桌椅，便是“褐色大楼”<sup>①</sup>的建筑师保罗·特罗斯特设计的。

希特勒不断给爱娃的住处送去各种各样的摆设，包括一张欧比松挂毯<sup>②</sup>；各种值钱的地毯，包括一张古撒马尔罕地毯，还有漂亮的家具。希特勒还送了许多相框、餐具等银器，上面大多刻有他的花体签名。墙上挂了很多画，但水平都很一般。希特勒还把自己的大作也赠给情妇，有建筑速写、城市风光素描和水彩画，都是他从明信片上依葫芦画瓢而作的。希特勒通过这种方法绘制的《阿萨姆小教堂》，是爱娃最喜欢的一幅画。

在希特勒作品旁边还挂着几幅希特勒的肖像油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① 纳粹党总部。

② 欧比松是法国中部城镇，至少从16世纪起就以制作地毯、挂毯著称。

是海因里希·克尼尔画的一幅穿制服的希特勒像，大小如真人一般。这幅画绘于1933年至1934年间，画上的希特勒摆出一副威武的姿态，富有象征意味地站在山巅，长衣飘飘，目光直视远方。这幅油画后来被印制成几百万张在市面上廉价出售，一时成了畅销货，最终每个德国人都必须有一幅“元首”画像。但是同这幅“人民的偶像”画打交道时，人们得备加小心，任何糟践画像的行为都会“因为损害人民对政治领袖的信任”而受到严厉处罚。1936年就有一些人因此吃了官司。毁坏或坚决拒绝悬挂“元首”画像，或看到画像时口出不逊者，最初会被判几年监禁。到了战时，随着人们对纳粹政权怨声日盛，犯有以上“罪行”的人就会进集中营。

对爱娃来说，她的“可爱的小楼”在她父母和朋友面前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增强了她的自信，给她带来了生活的快乐。爱娃的妹妹格丽特尔和她住在一起，另有希特勒送的两条苏格兰梗狗“施塔西”和“内古斯”和她们做伴。但是它们的狂吠打扰了邻居，爱娃只好让人在住宅四周修了一道围墙。希特勒还送给爱娃一台电视机，这在当时绝对是个足以引起轰动的新鲜玩意儿，整个德国还没有几台，电视媒体当时还穿着开裆裤呢！1929年德国才开始试播电视节目，1936年柏林奥运会时才进行了第一次大型电视转播。1939年为祝贺爱娃二十七岁生日，希特勒还送了她一辆具有象征意义和巨大情感价值的汽车，尽管送的时间比生日稍稍晚了几天。这辆车看上去像个甲壳虫，它就是希特勒极力要研制开发的“大众汽车”的原型车，是“大众汽车”的设计师费迪南德·波尔舍于1938年送给希特勒的生日礼物。得到这辆车后，爱娃很少开着它出门，因为怕太招眼。

从爱娃自拍的一些电影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经常有一群快活的朋友在她那里聚会。还有一系列布劳恩家的家庭庆祝活动也在瓦塞尔堡街12号举行。当时父女两人不仅已然和解，而且关系还相当不错，原因是弗里德里希·布劳恩突然变成了希特勒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甚至还加入了纳粹党。1939年11月8日，爱娃的父亲第一次参加在慕尼黑比格尔布罗伊凯勒啤酒馆举行的纳粹集会。那天希特勒早早就离开了，而布劳恩却尽职尽责地待到最后，结果发生了炸弹爆炸，布劳恩身中一枚弹片，成了六十三名受伤者中的一员。这次由格奥尔格·埃尔泽实施的暗杀行动本来是针对他女儿的男友的。

战后一些画刊把在爱娃住所举行的俭朴的家庭宴会描绘成了纵情声



色的聚会，有人还把爱娃说成了女奴。汉夫施滕格尔在回忆录中写道：“赫尔曼·埃塞尔（当时巴伐利亚的国务部长）曾和我谈起爱娃·布劳恩，说他的第二任妻子和爱娃自学生时代就是朋友。在她看来，希特勒越来越沉溺于梦幻世界，而爱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点缀。没有希特勒或博尔曼的许可，她不得离开慕尼黑。有一天，爱娃对埃塞尔夫人谈起她女奴般的处境时甚至流下了眼泪。‘我只不过是他的囚犯，’她抽噎着说，‘作为女人，我从希特勒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完全歪曲了爱娃·布劳恩的形象，根本不符合事实。说爱娃的处境像女奴毫无依据。她经常和女友赫塔·奥斯特迈尔去饭馆吃饭，也常与母亲或男女朋友一道外出旅游。有一次甚至夜半三更，爱娃还参加了慕尼黑市办的一场舞会，当时希特勒刚离开不久。人们还经常在影院和剧院里看见她，此外她还酷爱跳舞。一些现存的电影资料上还有爱娃畅游巴伐利亚境内大小湖泊的镜头。出游时，“女奴”有自己的专用“奔驰”车，还有专职司机。爱娃·布劳恩不仅喜欢外出旅行，而且还经常出门。1938年3月，她使用化名跟希特勒去了维也纳，住进帝国饭店，不过两人不是住在一层。当时爱娃有母亲弗兰齐斯加做伴，在游览维也纳市容时，她将母亲也摄入了镜头。

1939年初，爱娃与母亲和妹妹一道搭乘希特勒的私人飞机去了汉堡，又在那里登上“罗伯特·莱”号船参加由“通过快乐获得力量”运动组织的一次挪威峡湾观光游。现存的一些私人照片上还有爱娃在船甲板上兴高采烈打网球的镜头。1939年8月，她又去参观了威尼斯电影节，她每年都有几个星期在意大利度过。1938年5月3日至9日，爱娃甚至以“元首私人女秘书”的名义混在希特勒随行人员中参加了他对意大利的国事访问。这让她不受外交礼仪限制，仔仔细细地把罗马、卡普里以及拉韦纳逛了一遍，还拍了很多影片。那年秋天，她得意地在贝格霍夫的大厅里放了她拍的风光片，并对希特勒说：“你现在看到了真正的意大利。”

汉夫施滕格尔注意到，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从未对情妇有任何亲热的表示，这一点是属实的。爱娃听到希特勒发表他不愿意结婚的宏论自然生气，但又觉得这是他作为德意志民族领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她只好指望将来能和希特勒一起去林茨生活。据汉夫施滕格尔回忆，希特勒经常在夜里自言自语说：“除了布劳恩小姐我谁都不带，就带布劳恩小姐和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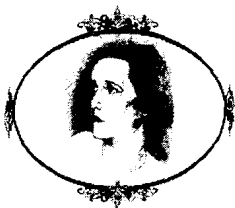
狗……”在实现这一梦想之前，爱娃知足地待在自己熟悉的小圈子里，高兴地注意到希特勒对自己越来越好，有时兴奋起来还自称是“国母”。自爱娃第一次试图自杀之后，希特勒觉得自己对他的“小可怜”负有责任，总是在那些纳粹上流社会高傲的贵妇面前护着她，有一段时间甚至不许玛格达·戈培尔迈入他的家门。

战争期间，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希特勒与年轻的女艺人们那些愉快的聚会再也不搞了。在前线附近的“元首大本营”里，他每天——总是在晚上10点，都要与爱娃通次电话。

爱娃·布劳恩1938年那时候就成了希特勒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特勒于1938年5月2日亲笔写的遗嘱说明了这一点。这份遗嘱是他在德军进驻奥地利之后以及他访问罗马之前写的，遗嘱保管人是他的总理部长海因里希·拉默斯。根据这份遗嘱，希特勒的所有财产都将由纳粹党继承。遗嘱还对安葬方式作了交代。紧接着他又指明爱娃·布劳恩是他的第一受益人，每月可从党的经费中领到一千马克抚恤金，然后才是他妹妹保拉、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以及他生活在下奥地利施皮塔尔的其他亲戚。

1938年夏天，希特勒让人把情妇住所的地下室扩建成一个布置得非常舒适的防空洞。这也表明希特勒对爱娃很重视，同时也暗示了他下一步的政治打算。防空洞里装有通风设备和空气压缩机，还有一扇防弹门，通向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地下走廊，走廊的出口设在花园里。这个防空洞是希特勒亲自设计的。

爱娃还住在维登迈尔街那套公寓的时候，每次希特勒出现都招来一大群人。爱娃搬进新居的时候，希特勒想避免出现类似情况，于是他采取了一些措施隐瞒爱娃的真实身份。不过两人还是更愿意在摄政王广场的希特勒住所里相会。在那里爱娃能看到希特勒早晨面向敞开的窗子用拉力器进行早锻炼的情景。这个习惯希特勒保持了很多年，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一连几个小时伸着右臂行纳粹举手礼。两人另一个聚会场所是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萨尔茨贝格。从1923年开始，希特勒就看上了那儿，而且经常去。最终他在那里买下了瓦亨费尔德那幢房子。爱娃每次造访这所乡间别墅总是循着同一模式。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回忆录中对此作过描述：“……几小时之后（希特勒先到了）跟来了一辆‘奔驰’轿车，里面坐着两个女秘书，还有一个朴素的慕尼黑姑娘。她长得不算漂亮，但活泼可爱，显得朴



实无华，看得出来她就是爱娃·布劳恩，一个统治者的情妇。这辆车从来 not 跟着官方车队走……两个女秘书同车也是为了给这位情妇打掩护。让我惊讶的是，希特勒和她总是极力避免表露出他们俩有什么亲密关系，而一到深夜，他们就会去楼上的卧室……”

从1933年开始，希特勒通过收购的方式逐步侵占了整个上萨尔茨贝格山区。这件事先是由赫斯，其后又由博尔曼经办，后者为此目的还专门建立了“阿道夫·希特勒工业捐款”基金。收购工作完成后，人们用两道铁丝网把这个高地山谷严密封锁了起来，并宣布它为“元首区”。戈林、博尔曼和施佩尔在这里都建了自己的房子。此外山里还建起了宾馆、党卫军卫兵住的营房、一个用来维持日常食物供应的农场、一家医院、一座剧院，还有一个私用茶馆。这座茶馆位于山崖顶上，要想上去只有乘坐建在崖壁里的电梯。希特勒原先住的瓦亨费尔德已被大规模改建，并更名为贝格霍夫。改建后的希特勒山间别墅有三十个房间，包括那间有名的会议厅。厅内装有巨大的电控落地窗，伫立窗前，附近温斯特山的壮丽景色一览无遗。厅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露天平台。在贝格霍夫入口处宽大的楼梯旁，总有两个头戴钢盔的党卫军卫兵像石像一样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昼夜执勤。1936年至1945年间，爱娃·布劳恩有三分之二的时光是在上萨尔茨贝格这个自成一统的小天地里度过的。她被大家视作贝格霍夫的女主人，但又没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希特勒的私人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在贝格霍夫认识了爱娃。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并不像时装杂志上的模特儿。她的美不在于华贵，而在于品位。头发本来是金色的，却又染成了浅黄色。脂粉抹得不少，但妆化得很巧妙，让她看上去更漂亮了。她走路姿势很优雅。”

女秘书初到贝格霍夫时，爱娃亲自领她四处看了看。荣格小姐在回忆录中说：“我的房间在过去叫瓦亨费尔德的那座木房子的阁楼里。走下螺旋楼梯便来到那间装有大玻璃窗的前厅。那里一面通向院子，另一面通向巨大的客厅，客厅里有一个华丽的琉璃壁炉。随后我走进一个宽大的走廊，通过走廊里的大窗户可以看到温特斯山……餐厅是长条形的，很宽敞，正中间摆着一张可供二十四人用餐的大餐桌……正厅给人印象极深，我很欣赏里面的那张挂毯。爱娃·布劳恩总爱让人觉得她很有艺术修养，她告诉我，那可是真正的欧比松挂毯。如果想放电影，挂毯会自动升起





来，同时落下一面屏幕，对面墙上的护板会打开，露出电影放映机。大厅的建筑风格是哥特式的，里面那些饰有马赛克镶嵌画的桌子我很喜欢，据爱娃说，那是墨索里尼送的……二楼还有一些房间。”后来，特劳德尔·荣格又对贝格霍夫的生活区勘察了一番：“……我很想走上通向三楼的那个铺着丝绒的宽台阶，去看看元首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走廊里静悄悄的。别人让我把鞋脱了。两条苏格兰獾狗一动不动地趴在一扇门前……那是‘施塔西’和‘内古斯’正在女主人的卧室前看门呢。旁边是希特勒的卧室。二者之间是一间大浴室，浴缸是大理石的，安着镀金的水龙头。浴室没有朝走廊开门。紧挨着希特勒卧室的是他的大办公室……爱娃侍女用的那个小房间就在楼梯附近……”

爱娃把自己的卧室称为“土耳其室”，因为里面铺着土耳其地毯。房间里看起来相当俭朴，惟一特别之处是那幅希特勒为情妇画的裸体画。爱娃平时待在贝格霍夫也没闲着，常常要起草给希特勒和朋友们的信，然后再把它们干干净净地抄写到一个特制的本子里。此外，编制“衣物索引”也是她的一大癖好。亨里埃特·冯·席拉赫在《希特勒周围的女人》一书中写道：“我很失望，房间里布置得像个普通的招待所……壁橱上绘着黄龙胆<sup>①</sup>……摆着各年的电影杂志……书架上那么许多文件夹是做什么用的？爱娃简直像个档案管理员，她为每件上衣或大衣都编了个小档案，记下衣服是在哪儿用多少钱买的，还画了衣服的草图，并注明穿这件衣服时应该配什么鞋、皮包和首饰……花这么大精力干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常去贝格霍夫的都是希特勒的“宫廷侍臣”，第三帝国领导层中只有部分人属于这个小集团，其中自然包括常住在上萨尔茨贝格的阿尔伯特·施佩尔、鲁道夫·赫斯和马丁·博尔曼，后者是纳粹党办主任，也是上萨尔茨贝格的总管和实际上的主人。赫尔曼·戈林很少待在山里，他的太太艾米有一次很失礼地让爱娃·布劳恩和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一道去她家喝茶，希特勒不许爱娃去，两个女人因此一直没有见过面。约瑟夫·戈培尔和海因里希·霍夫曼常到上萨尔茨贝格做客。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勃兰特和莫莱尔，副官布吕克纳、维德曼和绍布，以及所有女秘书总是待在希特勒身

<sup>①</sup> 一种植物。



边，希特勒有什么社交活动也会叫他们参加。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极少来上萨尔茨贝格，军中的高级将领几乎没来过。贝格霍夫还接待过艺术家和电影演员，但从未请过科学家。

爱娃本人喜欢邀请她最要好的女友赫尔塔·奥斯特迈尔（希特勒第一个女秘书）和马里昂·泰森（出嫁后随夫姓舍内曼）带着她们的孩子一起来做客。爱娃的家人经常大模大样地到上萨尔茨贝格来，而且一住就是很久，这让别人很嫉妒。爱娃的父母已不再为女儿“生活放荡”而烦恼。对有希特勒这样的“准女婿”，他们早就感到自豪了。希特勒待他们态度很拘谨，但也很恭敬。自从在比格尔布罗伊凯勒啤酒馆暗杀事件中“光荣负伤”后，弗里德里希·布劳恩被认为“有资格登大雅之堂”，能与纳粹名流打交道让他扬扬自得。格丽特尔·布劳恩则总是与姐姐爱娃形影不离。1944年她嫁给了有很多女人追求的党卫军中将赫尔曼·费格莱因（希姆莱的副手）。只有伊尔莎·布劳恩与上萨尔茨贝格保持着距离。阿尔伯特·施佩尔曾请她做女秘书，但她没有答应。

施佩尔在日记中从客人角度介绍了希特勒这座巴伐利亚山间官邸里的情况：“我们都在外面的平台上闲站着，女人们则像在疗养旅馆里那样枕着暗红格子农家靠垫躺在藤编躺椅上晒太阳，因为爱娃很新派。从泽普·迪特里希的警卫旗队中精选的党卫军士兵一身招待的打扮，给大家端上各种饮料：香槟酒、苦艾苏打水和果汁。他们的举止无可挑剔，尽管显得有点儿过于亲热……听说希特勒要到了，大家都压低了嗓门儿，喧笑声完全没有了。女人们只是低声在聊着衣服和旅行的事。爱娃·布劳恩从躺椅上取了摄影机，由‘内古斯’陪着，准备拍摄希特勒露面的镜头……所有在场的人都很紧张……在这种场合，希特勒总是希望大家能随便一点儿，不要低三下四的，得刻意表现得像他的客人。而这些人一到柏林，又会变得奴颜婢膝、俯首帖耳……又过了半个小时，希特勒请大家入席。他一个人走在前面，博尔曼和爱娃·布劳恩跟着进去了……”

贝格霍夫每天的活动开始得很晚，因为希特勒起得晚。每天的情况几乎一成不变。午餐很简单，大约要用一个小时。之后，如果是夏天，大家会去散步，冬天则围坐在壁炉前面。贝格霍夫没有人喜欢大吃大喝。以1937年8月9日，就是说还是在和平时期的菜单为例，上面只有大麦糊、香肠、酸菜、土豆泥和蔬菜色拉。吃素食的希特勒当天吃了粗面粉做的面

条加鸡蛋。1943年6月7日的菜单上只有橙汁拌亚麻子糊、香草汁米粉布丁、麸片面包加黄油以及“努克素”<sup>①</sup> 蔬菜酱。

在场的男士们都叫爱娃·布劳恩“小姐”，女士们则称她“布劳恩小姐”。有意思的是，爱娃·布劳恩吃饭的时候当着客人面就敢批评希特勒打的领带与西装不配，有时她还敢拿希特勒头戴之物寻开心：“瞧你戴的帽子，跟送信的似的。”

同其他人一样，爱娃跟希特勒说话时也称他“元首”，随后又亲热地“你”啊“你”的，听起来怪怪的。<sup>②</sup> 希特勒不在场时，她也称他“元首”或“头儿”。希特勒则叫她“小爱娃”或“笨丫头”。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说到爱娃时总是称“女主人”，当人面一般避免提她的名字。山上宾馆里的厨娘特蕾泽·林克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经常见到希特勒的女友，有时还为她做柠檬汽水。她是个清秀可爱的姑娘……”

用完晚餐后，希特勒一般要离开众人回房去与别人商讨军政要事。他再回来时，通常会放一部故事片，所有服务人员也可以来看。希特勒坐在第一排，爱娃坐在他旁边。影片由她选择，她会考虑到希特勒爱看轻松消遣的探险片和美国西部牛仔片。爱娃自己特爱看电影《飘》。大部分在场的人则更喜欢被戈培尔视为“对大众有害”因而禁演的那些美国影片。看罢电影，大家还会在一起就着香槟和茶点听听约翰·施特劳斯、弗朗茨·莱哈尔<sup>③</sup> 和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唱片，一面低声交谈。等希特勒开始说话了，在场的人便只会听他一个人讲，一直到天光放亮。

爱娃并不关心身边的政治活动。她一直没有加入纳粹党，也讨厌别人谈政治。一旦与纳粹圈内的某人交上朋友，她都会立刻使他们的关系成为纯粹的私交。通过这种方式，她与建筑师和后来的军械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和纳粹党财务主管弗朗茨·克萨韦尔·施瓦茨，还有其他许多人有来往。

自己的地位巩固后，爱娃对希特勒的演讲术就失去了兴趣。她曾悄悄对妹妹玛加丽特说，她觉得希特勒的演讲没意思透了。连早期自己陈述的政治观点爱娃也很快淡忘了，而且她还毫不掩饰对政治辩论的反感。当时

① 瑞士食品公司，专门生产以蔬菜为原料的油脂和菜酱等低脂营养食品。

② 德语中很讲究“你”和“您”的区别，关系亲密的人之间才可称“你”。

③ 1870—1948，匈牙利轻歌剧作曲家。



那些面向妇女的出版物，如《纳粹妇女丛书》《纳粹妇女观察》等，她都不屑一顾。对四处宣扬的纳粹妇女观她也无动于衷。只有一次，当听说德国打算禁止女人烫发并停止生产化妆品时，她才激动地提出了抗议。

爱娃·布劳恩不过问政治是她与希特勒关系的支柱和保证。在与希特勒打交道时，她总是避免尝试去做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她对希特勒既没有好的影响，也没有坏的影响。如果有人为爱娃面前诉说一桩悲惨的事情，希望她帮忙说说情，她会“像大天使一样竖起手指抵住嘴唇，表示她不愿过问此事”。（亨里埃特·冯·席拉赫，《希特勒周围的女人》）爱娃的姐姐伊尔莎，即使在贝格霍夫有时也忍不住要骂纳粹两句。有一次爱娃警告她说：“如果元首把你送进集中营，我是不会把你救出来的！”

在爱娃与希特勒相处的十六年中，她只有一次替人说过情。此人是林茨的犹太医生布洛赫，他曾经给希特勒病重的母亲看病，一直到她去世。由于爱娃出面说情，布洛赫大夫未被关进集中营，最终他留下微薄的财产移居国外了。

在日常生活方面，希特勒比较相信爱娃的判断力，愿意听她的意见。比如他在选择私人医生时，爱娃就给他出过主意。她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影响了这个总是疑心自己身体有问题的独裁者的生活，或许还因此改变了历史。爱娃在1937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莫莱尔应该永远感谢我……”

“神医”特奥·莫莱尔曾经治愈过海因里希·霍夫曼所患的一种“很危险的病”，战后大家才知道是淋病。弗兰齐斯加·布劳恩的病也是他治好的，布劳恩一家因此大为折服。爱娃把这位“神医”请进了贝格霍夫，还和他妻子交上了朋友。于是希特勒成了莫莱尔医疗档案中的头号病人。在他的治疗下，希特勒肠部病痛减轻了，医生很快就获得了希特勒的充分信任。莫莱尔不断让护士给希特勒打针，每天都要让他吃整把的药，这让希特勒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病得快死的人了。他相信，实现自己的计划所剩时间已经不多，必须从速采取行动。希特勒的侍从克劳泽在回忆录中谈到有关情况时写道：“他几乎每天都让希特勒打那么多针，岂不把人给毁了！……希特勒简直是成堆成堆地吃药……”

爱娃是个很注意修饰，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人。她的套装是柏林第一流裁缝做的，皮草和上衣购自巴黎，皮鞋则是在佛罗伦萨著名鞋厂费拉加莫买的。她还酷爱名贵首饰，最终积攒了一大堆。照片上的爱娃总是

一身珠光宝气，还戴着钻石手表。希特勒的情妇爱梳妆打扮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有时一天甚至要换七次衣服。她有自己的侍女和美发师（米拉·舍尔莫泽），发型总是做得无可挑剔。爱娃用最贵的法国香水，每天都要仔仔细细涂脂抹粉。她烟抽得很凶，用埃尔富特警察局长的话说，就是“不守德国妇女的本分”。这位警察局长让手下见到在公开场合吸烟的女人就拦住教训一番。希特勒也参与了这场仅对女同胞适用的戒烟运动。他时常提醒贝格霍夫里的女人们吸烟有害健康。一听此言，爱娃会无动于衷地撇嘴吹起流行歌曲《情烟迷人眼》<sup>①</sup>。不过，当着希特勒面她从未吸过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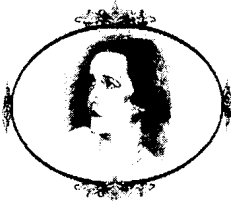
一直到战争爆发前，希特勒有很多周末都是在贝格霍夫度过的。他一般是从柏林乘火车或飞机于周五下午抵达，周一再返回柏林。卡尔·威廉·克劳泽在1934年至1939年和1940年至1943年这两个时间段里一直是希特勒的侍从。希特勒往返于柏林和贝格霍夫之间总有他陪着，当然他与爱娃·布劳恩很熟。克劳泽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想对她发表什么评论，因为肯定会带有偏见。爱娃·布劳恩和我的关系拿俗话说比猫和狗的关系好不了多少。我们在1935年至1936年的冬天曾就一件私事毫不客气地交过锋，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就算完了，见面只是打个招呼而已。”据布劳恩家人说，克劳泽所说的“私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据说在衣着方面很挑剔也很在行的爱娃曾强迫这位侍从——曾经是个专业木匠，后来又当过水手——每天给希特勒熨裤子。克劳泽一直对这件事记恨在心。

克劳泽知道该怎么描述希特勒的情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正式招待会是不让爱娃·布劳恩参加的……希特勒把她看做未婚妻。他倒不是怕她跟别人跑了。贝格霍夫改建后，两人的卧室之间有了一道门。毫无疑问，爱娃·布劳恩要靠希特勒的私人资助生活。”

希特勒对“不让爱娃参加正式招待会”这一点掌握得很严，这让人不免想起东方国家被禁锢在深宫内院里的后妃。希特勒与别人开会磋商军政要事时，爱娃不能待在大厅里。重要人物来访时，她还不得离开自己的房间。如果客人要留住几天，她甚至还要暂时搬到马丁·博尔曼家去住。美国前总统胡佛、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阿瑟·张伯伦<sup>②</sup>、保加利亚

① 美国流行音乐作曲家杰罗姆·克恩创作的一首著名情歌。

② 即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



国王鲍里斯、阿迦汗<sup>①</sup>、红衣主教帕切利（即后来的教皇庇护十二世）以及其他许多要人来访时爱娃就回避了。让爱娃特别难过的是希特勒没有把她介绍给温莎公爵夫妇，因为他们的爱情故事让她非常感兴趣。1939年5月22日，意大利外长，也就是长得很帅的墨索里尼女婿加里亚佐·齐亚诺伯爵，到贝格霍夫来签署有关德意两国缔结军事同盟的所谓“钢铁盟约”。爱娃·布劳恩同往常一样被“软禁”在自己的屋里，但她却站在窗口拍摄齐亚诺抵达的场面。齐亚诺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立即便问那个漂亮的金发女郎是谁。周围人支支吾吾，避而不答。希特勒立即让爱娃把窗子关起来。爱娃虽然照办了，但却换上长镜头躲在窗后继续进行她的“新闻报道”，一边还加上了解说词：“命令：关窗！这下该怎么办？”

爱娃酷爱拍照片和拍电影，并有一套很昂贵的装备：好几架相机，其中包括一架“阿克发”和一架“莱卡”；还有一架可换镜头的“西门子”牌16毫米摄影机，外加一台“阿克发”电影放映机。此外，爱娃还有无数的相册，她不断把新拍的照片插进去，还仔仔细细写上说明。这些相册最终有三十三本保留下来，目前存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爱娃拍的希特勒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比霍夫曼拍的看上去更生动一些。由于希特勒委婉施压，霍夫曼不得不出钱买了很多爱娃拍的这类照片。不过在拍马丁·博尔曼那张冷峻的面孔时，女摄影家失手了。她在这张照片下面写的说明是：“可惜试拍效果不太理想。”爱娃拍的那些有关上萨尔茨贝格日常生活的影片是在德国拍摄的最早的彩色影片之一，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1939年初，爱娃在柏林德国总理府里有了自己的住处。希特勒把兴登堡总统以前的卧室留出来供她用，与自己的住处比邻。爱娃在总理府里同样不得自由走动。她只能从服务人员走的边门出入。饭也只能像灰姑娘似的独自待在房间里吃，而她的情人则在隔壁按俾斯麦时代的方式举行盛大招待会。不过，有时候她也会偷偷溜出来拍几张照片。1939年8月底，爱娃在总理府逗留时就拍下了一组非常有意思的新闻照片，为后人留下了一份记录二战爆发前几天情况的独特文献。

爱娃给这组轰动性的照片写的说明是：“……随后，里宾特洛甫动身前往莫斯科。”有六张照片显示希特勒和手下正在焦急地等待外长里宾特

<sup>①</sup> 即阿迦汗三世，1877—1957，印度穆斯林领袖，1937年任国联主席。

洛甫从莫斯科报回消息，这与那些事先摆好姿势拍的宣传照片反映的情况正好相反。从爱娃的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希特勒在电话里听说已与斯大林于1939年8月23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兴高采烈地抱住了戈培尔和博尔曼。还有四张照片，图片说明是“……元首在听有关消息的广播”，反映了接下去广播里公布这条消息时的轻松场面。

随后几天，爱娃听说而且相信“元首”“千方百计”想避免与波兰交战，而这一战争后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波兰人却不愿意谈判”，爱娃在一张旨在显示希特勒正在努力拯救和平的照片下面写下了这句幼稚的说明。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在国会咆哮着宣布对波兰的进攻予以“反击”，而他本人已于前一天亲自下令入侵波兰。他在国会还宣称：“……这场战争的结果将是犹太人被消灭。这次将首次运用地道的古犹太法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希特勒发表演讲时爱娃也在场。后来战局发展对德国越来越不利，上萨尔茨贝格的田园生活也宣告结束。1942年，贝格霍夫被宣布为“元首大本营”。

到了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已处于绝望阶段。闪电战和闪电般的胜利已成为过去。作为夏季攻势发动的“巴巴罗沙计划”，也就是旨在征服苏联的“日耳曼人东征”，此时已变成一场损失惨重的战争。从各条战线都传来灾难性的战报，连纳粹宣传机器都无法长时间地歪曲事实了。1944年初，苏联红军就已经越过波兰以前的东部边界。他们在6月份发动的攻势德军也无法抵挡。到了7月份，红军已经接近东普鲁士。德国城市遭到了大面积轰炸，柏林也每天都遭到空袭。德国平民百姓的绝望和困苦与日俱增。

在这种情况下，1944年7月20日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附近的“狼穴”“元首大本营”里发生了炸弹爆炸。出于绝望，一些德国军官和政客打算除掉希特勒，推翻他的独裁统治，从而结束二战。然而，这次由德国军官和抵抗运动斗士克劳斯·申克·施陶芬贝格伯爵实施的暗杀行动并没有成功。希特勒虽然受了伤，但却能立即去接见来访的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

暗杀事件发生不久，希特勒给他的情妇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笨丫头，我现在或许有点累，但没什么事儿，你不要担心。我希望能很快回家，躺在你的怀里休息一下。我非常需要休息，但是我对



德国人民承担的责任超越一切……我把出事那天穿的衣服送给你。它证明有老天爷保佑我，我们不用再害怕敌人了。衷心爱你的 A.H.。”

随信寄去的还有一张素描，画的是那个被炸毁的平房。希特勒在那里主持召开军情讨论会时，由施陶芬贝格伯爵藏在文件包里带进去的炸弹爆炸了。希特勒认为这次幸免于难是命运在暗示他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1944年7月20日那天他穿的制服，也被他视作必须为后人保存的历史圣物，因此，他把那件血迹斑斑、破破烂烂的衣服交给了情妇。

得悉暗杀消息时，爱娃和女友赫尔塔·奥斯特迈尔正在柯尼希湖游泳。“元首大本营”与外界的电话联系一恢复，她就给希特勒打了电话。接到希特勒的信后，她立即写了回信：

“亲爱的，我都快吓死了，我觉得都快疯了，太让人担心了。我这里天气很好，一切显得那么太平，太平得让我羞愧……我对你说过，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我也会去死。自从第一次遇见你，我就发誓永远跟着你，即便去死。我只为爱你而活着。你的爱娃。”

爱娃按照希特勒的指示精心保管了那件制服。二战结束时，盟军从奥地利施拉德明一个爱搜集纪念品的人那里查获一批爱娃遗物，其中就有那件制服。

1944年年中，盟军开始猛烈轰炸希特勒的“阿尔卑斯要塞”。希特勒已经很久没有在那里住了。空袭警报一响，所有建筑物周围就施放人造雾，在其掩护下，人们纷纷穿过在岩石上凿出的六十五级台阶逃进巨大的防空洞里。爱娃在里面有自己的一间带浴室的房间。

1944年时，已经没有人再相信希特勒会取得胜利了，爱娃·布劳恩也是如此。她当时经常待在慕尼黑，在霍夫曼照相馆里象征性地服“战时劳役”。1944年4月24日至25日夜，她的家乡在遭受大规模空袭后成了一片废墟，共有一百四十人丧生，四千人受伤，七万人成了无家可归者。然而，让爱娃最伤心的是，她打算与之同生共死的希特勒此时已经出现体力严重衰竭的迹象。

爱娃此时感到前途一片晦暗。1944年10月26日，三十二岁的爱娃写下了遗嘱。她那辆篷式“奔驰”车将留给父亲；一半毛皮大衣、地毯、现金，还有克尼尔画的那幅希特勒大肖像画将留给母亲。希特勒送的那辆“大众”车以及瓦塞尔堡街那幢住宅连同里面的家具将归姐姐伊尔莎·布劳





恩所有。嫁给费格莱因将军的妹妹格丽特尔将继承她留下的所有文字的东西。爱娃还极为精细地将她那些贵重首饰分给了姐妹和女友。

1945年2月9日，爱娃在慕尼黑的住处庆祝三十三岁生日，此次生日庆祝因空袭被迫推迟了两天，这也成了她与所有亲友的告别会。此后不久，她让戴姆勒-奔驰公司把她那辆车刷上一层深绿的保护色。3月底，爱娃独自开车穿越满目疮痍的德国，去柏林与情人会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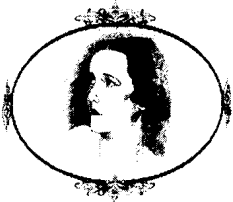
当时柏林的政府区威廉广场已经成了一大片瓦砾场，总理府被一枚炸弹击中，也只剩下了一面墙。希特勒的大本营设在总理府后花园的“元首地下避弹室”。在这个深入地下十六米、被一米多厚的混凝土层包围的空间里，爱娃自愿度过了一生中的最后几周。看到爱娃来了，希特勒显得很高兴，虽然早先他曾命令她不得离开贝格霍夫。

东部作战前线日渐逼近，耳边已能听到炮火轰鸣。地下避弹室里，希特勒手下提出了各种营救方案，但都遭到了拒绝。4月22日，希特勒决定留在首都。爱娃·布劳恩早在4月13日就已向留在避弹室里的格哈德·恩格尔少将咨询了开枪自尽的诀窍。根据许多目击者提供的情况，爱娃当时非常镇静。她还给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写了一封遣散信：“你们不用再待多久了。我想，大概两周左右吧……”

爱娃本来是可以轻易逃生的，但她不愿意离开希特勒。她在4月19日给女友奥斯特迈尔的信中写道：“此时此刻能待在他身边，我很高兴。”她拒绝了乘飞机出逃的建议。

爱娃当时写给姐妹和女友的信显得出奇地超脱。大难临头之际，她还尽谈些鸡毛蒜皮的琐事，读起来鬼气森森的。她在1945年4月18日给妹妹格丽特尔的信中写道：“……你想想，一件衬衣女裁缝居然要我三十马克，简直疯了，这么件小衣服她竟敢张口要三十马克……”随信她还寄上了几张希特勒的牧羊犬布朗迪和它新生的几只狗崽的照片。4月22日，爱娃写信与最要好的女友奥斯特迈尔告别：“……我们要在这里战斗到底。不过，我担心死期已经越来越逼近了……元首如何让我揪心，我不便告诉你。我真不懂，事情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我已经不再相信上帝了……”

爱娃还写信给妹妹格丽特尔，也就是赫尔曼·费格莱因的妻子，向她布置了最后一项任务：“销毁我所有的私人信件，特别是那些谈到公事的……还有那个锁在（贝格霍夫）防空洞保险柜里的信封也要销毁，上面有



元首的地址。元首的信和我的回信（蓝皮本）请用防水材料包好，必要时埋起来，请不要销毁！……”爱娃还在信的最后保证让妹妹见到丈夫赫尔曼。

“元首大本营”的参谋格哈德·博尔特 1945 年 4 月 27 日认识了爱娃。他在战后写的《总理府最后的日子》一书中谈到她时写道：“她和希特勒及其周围的好几个男人在前厅聊得很热闹，希特勒在一旁听着。她跷腿坐着，和每个人说话时都直视对方。第一眼见到她时我特别注意到了她那张鹅蛋形的脸，双目炯炯有神，鼻子长得很古典，一头漂亮的金发。她穿着一身紧身灰套装，展示了优美的身材。脚上穿着雅致的皮鞋，纤巧的手腕上戴着漂亮的镶钻手表。毫无疑问，她是个真正漂亮的女人。不过她那番做派显得有点儿不自然，像在演戏似的。”

4 月 28 日临近子夜时分，爱娃·布劳恩实现了一生的梦想——阿道夫·希特勒与她结婚了。戈培尔和博尔曼担任证婚人。爱娃穿了一件长款的高领塔夫绸外衣，戴着她最漂亮的首饰。在结婚证书上签名时，爱娃犯了一个错误。她先写了一个“B”<sup>①</sup>，后又把它涂掉，签上了“爱娃·希特勒”。这是她一生中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写下这个名字。

1945 年 4 月 29 日凌晨，婚宴还在避弹室的办公室里进行，希特勒已在另一个房间开始口述他个人的遗嘱：“在斗争的年月里，我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尘世之旅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和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几乎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姑娘结婚。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与我一道去死。对她来说，这弥补了由于我从事服务于人民的工作给我们两人带来的损失……我本人和我妻子决定去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

清晨 4 点钟过后，这对新婚夫妇回房睡下了。而此时此刻就在附近，也就是在被炸毁的总理府的院子里，正在执行枪决。按希特勒的命令，爱娃的妹夫费格莱因因企图逃跑被拉出去毙了。爱娃知道此事，她也很喜欢当时快要生孩子的“小妹妹”格丽特尔，但她对希特勒毫无意义的最后的暴行却无动于衷。对个人命运的了解和死期将至使她丧失了情感，麻木扼杀了她的同情心。

① 爱娃娘家姓“布劳恩”的首字母。



4月29日上午，女佣（莉泽尔·奥斯特塔格）向女主人道喜。爱娃·希特勒说：“你现在可以叫我希特勒太太了。”后来她把自己的结婚戒指，还有新婚之夜穿的那件外衣，交给这名女佣，请她转交女友赫尔塔·奥斯特迈尔留作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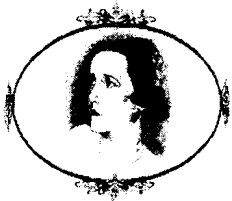
1945年4月30日下午，当苏联红军先头部队已到达离德国总理府仅五百米的地方时，希特勒夫妇自杀了。希特勒的侍从林格和一个党卫军士兵，把希特勒裹着毛毯的尸体抬到花园里。马丁·博尔曼跟着把爱娃没有包裹的尸体也抬了出来，并交给了希特勒的司机肯普卡。后者后来说，他没有看见她身上有一丝血迹。肯普卡在两具尸体上浇上汽油，然后点燃了。

德国民众得到的消息是，“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战斗到最后一息”，死了。1945年5月1日，汉堡广播电台广播了“希特勒和他的妻子”已死的消息。当时广播员迟疑了半晌，好像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爱娃·布劳恩真正有意思的“生活”始于她死之后。当时出现了一些离奇的传闻，那些熟悉情况的人并没有出来辟谣。爱娃身边不久前还备受瞩目的那些人，战后都宁愿韬光养晦，保持沉默。作为“深受纳粹政权影响的人”，他们不是被拘留，就是被起诉了。爱娃那些朋友必须彻底接受非纳粹化法庭的调查，以决定他们的未来。不愿意撒谎或否认事实的人都保持了沉默。以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为例，他做过爱娃十六年的老板和朋友，对她自然很了解。但1945年他却声称，这些年来大多数事情他都记不起来了。

爱好登山的电影演员兼导演路易斯·特伦克尔是希特勒的“宫廷侍臣”之一。战后他隐居意大利，伪造了一本所谓的《爱娃·布劳恩日记》，并且向人保证这本惊人之作绝对是真品。“爱娃·布劳恩”在这本日记中讲述了在贝格霍夫里发生的一些虐待动物的可怕故事，包括一连数周不让公牛喝一滴水，然后把它们关在栅栏里让它们开怀畅饮，直到把肚子胀破，以供希姆莱和希特勒取乐。这个登山迷除了自己瞎编外，还抄袭别人的东西。拉里施-瓦勒泽伯爵夫人1913年撰写的那本有关奥匈帝国伊丽莎白皇后的回忆录，一定为他提供了素材。这本回忆录本身就不太可信。

“爱娃”在这本日记中还说：“他（希特勒）送我的美容品看来不错——每周两次用生的小牛肉敷面，每周一次在温热的橄榄油里泡澡。但我



很不习惯穿希特勒让穿的皮内衣……”特伦克尔炮制的这本日记曾在法国和意大利引起轰动，但好景不长。这本书的原稿共九十六页，都是影印的。特伦克尔称那是爱娃·布劳恩在奥地利的基茨比厄尔亲手交给他的，然而，底稿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是爱娃的真迹。布劳恩家人控告特伦克尔造谣诽谤，法庭调查揭穿了日记的真面目，证明它是一个拙劣的赝品，并禁止继续发行。路易斯·特伦克尔有五年没再敢去德国，但是1953年，他再次抛头露面，在《慕尼黑画报》上发表了《我的心永远为蒂罗尔跳动》一文。

但是“爱娃日记案”远没有就此终结。连作家汉斯·哈贝也插了一杠子。哈贝看了几封爱娃·布劳恩的亲笔信后，顿觉自己是个笔迹专家，因而出面为那本伪造的日记担保。他认为日记中“阿迪<sup>①</sup>从不关心我穿什么衣服”和“不管送花不送花这种事”这些句子证明这本文献的确是爱娃真迹。他在1948年2月13日苏黎世出版的《世界周报》上发表文章，表示赞成尽快出版这本日记，因为“任何人哪怕只读了一页，就会知道德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1954年，哈贝又摇身一变，成了这一伪造事件的发现者。他在《维也纳星期六报》上撰文称：“……当时（1948年）我极力反对出版这本日记……把那些书信……与日记原稿一比较，更让我觉得这是个赝品。当时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揭穿这一骗局。”

还有其他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也禁不起推敲。此外，还有很多报道说希特勒和爱娃根本没有死。有人于1946年在奥地利向盟军报告说，希特勒和爱娃乘潜水艇去了阿根廷，并在那里一个疗养院住了下来。

尽管战后局势乱糟糟，真正的爱娃日记并没有流失。爱娃曾让妹妹格丽特尔销毁日记手稿，但布劳恩家并没有照此办理。战后他们把它交给赫尔曼·费格莱因的母亲保存，后者把日记藏在了滨湖采尔菲施霍恩宫的花园里。偷偷混进一些纳粹名人家庭的美军第三军团情报官员，最终查获并没收了这份日记手稿。几经辗转，爱娃日记最后被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侵吞了。

1945年9月，有一个“密探”（瓦尔特·希施费尔德）拜访了爱娃的妹妹格丽特尔和女友赫尔塔·奥斯特迈尔，从她们口中套出了爱娃首饰的藏

① 阿道夫·希特勒的昵称。



匿处。希特勒和爱娃的一些信件、电影胶片、相册、绘画和记事本则到了一个党卫军大队长手里。此人没有按照命令销毁这些东西，而是把它们连同希特勒 1944 年 7 月 20 日遭暗杀时穿的那件制服一道留作纪念品，私藏在奥地利的施拉德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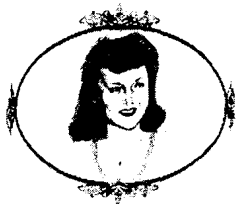
战后布劳恩一家不光为爱娃的名誉而战，还要为她的遗产而战，因为她的遗产有被没收的危险。1947 年 12 月 31 日，弗里德里希·布劳恩写信给慕尼黑国家特别事务部，请求当局不要起诉他死去的女儿爱娃，并退还她的财产。他申诉的理由是爱娃没有担任过任何政治职务，而且也从未表现出有军国主义思想。做父亲的还说，爱娃没有写过遗嘱，虽然他知道实情并非如此。

研究成果逐步驱散了笼罩在爱娃·布劳恩身边的迷雾，但是希特勒情妇真实的、平淡的生活经历，并不能满足公众的好奇心。由于学术研究并没有取得公众期望的新发现，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认为：“爱娃·布劳恩是历史的失望。”

希特勒的“女门生”——亨里埃特·冯·席拉赫







亨里埃特·冯·席拉赫1980年出版《希特勒逸事》时，没有几个人对她表示赞许和理解。德国新闻周刊《明镜》报道说：“一个人们所不熟悉的‘元首’。一本刚刚面世的奇书（根据出版社提供的清样）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别样的希特勒，一个快活开朗、平易近人的奥地利人，醉心艺术，聪明诙谐，富有想像力。”

《明镜》杂志还讥讽地说，冯·席拉赫太太把她记忆的针头线脑翻检了一遍，然后编了一本有关她家这位褐衫朋友的逸闻集珍。一个专门搜集第三帝国珍闻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千年帝国”覆灭后，与许多和纳粹头面人物有牵连的女人不同，亨里埃特·冯·席拉赫（她形容第三帝国覆灭是“辉煌的代价”）并不害怕抛头露面。相反，她总是不遗余力，以传教士般的热情试图使公众了解她本人对希特勒的印象。在她心目中，希特勒是个和善的伯伯，是她父母的恩人。

亨里埃特与众不同的原因大概在于她悲剧性的童年。从幼年开始，亨里埃特就接受了希特勒本人的思想灌输，还没有旁人有她这样的“福分”。当时纳粹世界观已给她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而抑制了她本人后来对世界的认识，无论是客观事实还是逻辑思辨，都无法动摇这一点。尽管后来她稍稍有些醒悟，半心半意顺应了时代精神，但亨里埃特从未与希特勒拉开距离。在她看来，希特勒永远都不是那个可怕的独裁者，而是她慈父般的启蒙导师。亨里埃特是在纳粹的小天地里长大成人的。她在谈到父母时说：“我父亲是摄影师，母亲是个天使。”事实上，她母亲是个演员，经常出入于卡巴莱歌舞厅，唱轻佻的小曲儿为客人助兴。父亲海因里希·霍夫曼，是第三帝国的官方摄影记者、希特勒的御用摄影师，还有人说，他是个“狡猾而危险的早期党员”。

1911年时，摄影师霍夫曼的顾客包括巴伐利亚的王公贵族、俄国沙皇，还有一些艺术家，如罗达·罗达<sup>①</sup>、约阿希姆·林格尔纳茨<sup>②</sup>和马塞尔·杜尚<sup>③</sup>。那些前卫派艺术家尤其欣赏他拍的艺术照，因为它们看上去就像棕色调的版画一样。一天，年轻的特蕾泽·鲍曼（昵称内莉）也来到照相

① 1872—1945，出生于斯洛文尼亚的前卫派作家。

② 1883—1934，德国作家。

③ 1887—1968，法国画家，达达运动的先驱和领导人。





馆，请他给自己拍张身着晚礼服、头戴花帽、双目低垂的艺术照。拍完照后，摄影师与模特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年两人就结婚了。

1913年2月3日，他们的女儿亨里埃特降生了，父母叫她“亨妮”。1916年10月24日，夫妻俩又生了个儿子，名叫海因里希。一家人住在慕尼黑黑施瓦宾区。1915年时，照相馆设在马克斯福施塔特区舍林街33号。这间工作室是弗朗茨·马尔克转让给霍夫曼的。马尔克是当时德国最走红的画家之一，1912年参与创建了“蓝色骑兵”表现派画家协会。父亲去照相馆工作的时候，小亨妮也经常跟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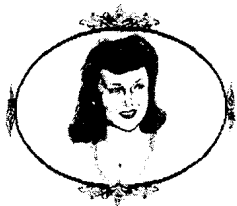
亨里埃特在她写的《辉煌的代价》一书中说：“那幢房子虽小，但很吸引人。楼下那间屋里有个壁炉，一面墙上覆盖着壁毯，那是照相时做背景用的，附近摆着几只代尔夫特陶罐<sup>①</sup>，薄纱窗帘使屋里光线很柔和。父亲拍的人像并非反映被拍摄者的表象，而是揭示他的精神面貌……有一个楼梯通往二楼的暗室，红色的灯光下摆着装满显影剂和定影剂的大扁盆。这幢小房子紧挨着一幢高层出租公寓尚未建好的外墙，墙上爬满了葡萄藤……”

亨妮的童年一开始过得很平静，但八岁那年，她父亲把刚认识的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领到家里，亨妮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巨变。小姑娘对初次见到希特勒的情况记忆犹新：“相互问候之后，希特勒问：‘你都读些什么书啊？’我立即把我的书都抱来给他看……只有骑士和英雄故事……接着他又说：‘你一点都不知道希腊故事吗？’”

亨里埃特父母家是早期纳粹运动的一个据点。早在1919年，海因里希·霍夫曼就是右翼组织民防队的成员。1920年4月6日，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者霍夫曼加入了纳粹党前身的德国工人党，后来又加入了纳粹党。这个矮墩墩、胖乎乎、长了个酒糟鼻的摄影师，很快就被党内的兄弟们视为同道，大家都很愿意见到他。摄影师不拘礼节，喜欢吃喝，酒量很大，还爱说俏皮话，希特勒对他也很赏识。此外，希特勒还很喜欢霍夫曼家那种“放荡不羁”的气氛和艺术氛围，他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亨里埃特在《希特勒周围的女人》这本书中写道：“希特勒每天下午

<sup>①</sup> 著名锡釉陶器，17世纪早期产自荷兰西部城市代尔夫特。



都到我们家来。有一次我父亲正在睡觉，他每天起得很早，而我得在隔壁屋里弹钢琴。希特勒摁了一下门铃，我给他开了门。他坐在我家大写字台旁边翻杂志……我接着练琴……然后他搬了一张凳子过来，给我演奏了一段《安娜波尔卡》<sup>①</sup>。他还给我讲尼伯龙根人的故事，那些沉入莱茵河底的黄金和矮人国王阿尔贝里希的传说。”在那些年里，希特勒非常关心小女孩的成长，先后送了她很多书，包括《欧根亲王<sup>②</sup>的故事》、施瓦布编写的《最美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以及施利曼<sup>③</sup>写的有关发现特洛伊古城的著作。而且这个“干爹”还总要检查她是不是真的看过这些书了。此外，希特勒还要检查小亨里埃特的家庭作业，并教她画画。作为回报，小女孩每星期都献给他一张自己剪贴的图文并茂的“报纸”。

海因里希·霍夫曼是个极有天分的摄影师，他的父亲和叔父以前也是干这一行的。纳粹党后来宣称，霍夫曼出身于“黑森的一个摄影世家”。不管怎么说，霍夫曼的叔父的确拥有“巴伐利亚宫廷摄影师”的头衔。

希特勒多年都没有给予霍夫曼为自己独家拍照的特权。这个政客认为，如此可以增加各方对他本人的兴趣。他向霍夫曼保证说：“将来，我会只允许你一个人随时给我拍照。”不管心里愿意不愿意，霍夫曼还是屈从了“元首”的意志，不过，后来他的确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希特勒强行闯入了霍夫曼家的家庭生活。亨里埃特清楚地记得，只要这个纳粹党领袖一进家门，父母就会变得低三下四。她发现，这个男子的愿望对她父母来说就像命令一样，是一定要服从的。小姑娘还注意到他有一帮忠心耿耿的随从，并听到一些纳粹党人把特蕾泽·霍夫曼戏称为“希特勒妈妈”。

希特勒不光关心亨里埃特的心智教育，她的身体发育也是他操心的事。霍夫曼家走廊的梁上挂着一副吊环，希特勒便在那里教她锻炼身体。星期天，两人有时会一道去看早场科教影片，或者参观慕尼黑的一些博物馆。希特勒还给小姑娘买了第一副滑雪板。亨里埃特领受坚信礼那天，希特勒送了她一只网球拍。十二岁那年，希特勒带摄影师的女儿参加了拜罗

① 奥地利作曲家老约翰·施特劳斯作品。

② 萨伏依亲王欧根，1663—1736，生于法国的奥地利帝国著名将领。

③ 海因里希·施利曼，1822—1890，德国商人和考古学家，发现并发掘了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古城遗址。

伊特音乐节，让她坐在自己身边，一道观看了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

有很多年，这个穿着蓝西装和浅色风衣、头戴宽边毡帽的希特勒先生——尽管和希特勒很熟，亨里埃特对他还是得用这个称呼——一直是小姑娘生活里的中心人物。亨里埃特后来回忆道：“希特勒从未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尊长的派头。他像伙伴一样待我，绝对平等，一点架子都没有，从没训过我。他是很好的玩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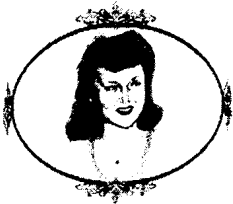
希特勒对小亨妮这么好，让霍夫曼夫妇受宠若惊，希特勒是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其卓越才智是大家公认和钦佩的。“没有比教育人再妙的事儿了！”这是希特勒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1928年特蕾泽·霍夫曼去世的时候，希特勒答应由他来告诉十五岁的亨里埃特其母的死讯。“那天他派司机来接我，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亨里埃特战后在接受采访时说。希特勒还让她做好参加葬礼的心理准备：“我会握紧你的手，你不要哭。”此后，亨里埃特的弟弟海因里希进了寄宿学校，她本人则由希特勒代为照管。这段童年经历给这个小姑娘和后来的少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且塑造了她的世界观。

亨里埃特经历了希特勒事业发展的所有阶段。“我还特别记得蒂尔施街的那个房间。有一天下大雨，我们坐敞篷车到了那儿。希特勒从不愿把车篷拉上。他带着父亲和我进了房间，然后递给我一个手绢，好让我把湿漉漉的长发擦干。写字台上几乎摆满了东西，在一个空着的桌角他烧上了茶水。他有一个蓝白瓷的旧茶壶，茶杯也不成套。所有东西都很简陋。水一热，他便开始郑重其事地沏茶，俨然一个日本的茶道大师……我可以看周围摆着的所有书……有一本书上画着克诺索斯宫<sup>①</sup>的遗迹……”（《希特勒周围的女人》）

1923年间，希特勒开始允许霍夫曼为自己独家拍照。从那以后，亨里埃特的父亲便对这一“近水楼台的优惠条件”大加利用。他把自己的命运无条件地和这位拍摄对象绑在了一起，并且开始利用希特勒的私生活大赚其钱。德国摄影同业公会主席洛伦茨·蒂德曼在1937年出版的《摄影史》一书中写道：“由于和元首私交好，他有机会拍到能让德国人民看到他们伟大元首心灵的照片……”蒂德曼尽管气得咬牙切齿，但他对霍夫曼公司

<sup>①</sup> 爱琴文明古城克诺索斯的著名宫殿。



垄断“元首”拍照权也只能干瞪眼。

跟上“元首”之后，霍夫曼很快便腰缠万贯。他把家搬到了慕尼黑富人区博根豪森的特罗格尔街。

亨妮父母的新家连门环都是艺术品，前厅里挂着一幅17世纪荷兰画家布罗海尔的名画。霍夫曼1937年组织了“大德意志艺术展”，还是主管被没收“退化艺术品”再利用<sup>①</sup>事务的专员。他喜欢早期大师的作品，但是，他家卫生间门上却挂了一幅比利时佛兰芒画，体现了他粗俗的幽默感。画上用哥特体写着一行字：“不要把我翻转。”如果别人真的这么做了，一个光屁股便赫然映入眼帘。

亨里埃特在她一生最易受影响的阶段受到了纳粹教条的灌输。她还被带去参加在慕尼黑勒温布罗伊啤酒馆举行的纳粹集会。亨里埃特在《辉煌的代价》一书中写道：“光是那些旗帜方队进入挤满成千上万人会场的场景就够惊心动魄、壮观离奇的，但也让人感到不太舒服……希特勒登上了宽大的讲台，扯着沙哑的奥地利嗓子开始演讲，一下子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再是那个和蔼可亲的希特勒先生了。他喜欢被人海中不断爆发的欢呼声打断，这些人对他顶礼膜拜、惟命是从。他完全可以把嗓门儿放低一点儿，但是他就愿意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

在舍林街50号那幢小房子里，亨里埃特也能感受到纳粹运动的起伏跌宕。她父亲于1925年把照相馆搬到那里。尽管空间狭小，殷勤的霍夫曼仍然把房子的后半部分让给了纳粹党领导机关，为的是将来在那里设立“纪念堂”。亨里埃特因此得以亲历纳粹党从一个芝麻小党发展成为群众性运动的全过程。父亲在照相馆后院里为扛着队旗的冲锋队员拍照，或在“纪念堂”里为那帮纳粹党地方领导人拍集体照的时候，亨里埃特都在一旁饶有兴致地观看。此外，海因里希·霍夫曼还获准销售各种尺寸的希特勒半身塑像，这桩买卖很赚钱。

那帮纳粹要员还没发迹之前，亨里埃特就认识他们，其中包括小眼睛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一个勤奋的养兔专业户，看上去像个办公室主任；瘦子鲁道夫·赫斯少尉，脸上挂着实习教师一样亢奋的神情，眼睛总是痴

<sup>①</sup> 纳粹政权把所有不符合纳粹艺术观的现代艺术创作称作“退化艺术品”，第三帝国时期曾专门举办过“退化艺术”展，以提醒公众提防这些据说会“玷污”他们思想的作品，此即所谓“再利用”。



迷地盯着希特勒；粗脖子死脑筋的格雷戈尔·施特拉塞；还有脸色阴沉的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脖子上总戴一个吊着的犹太教经师小塑像当吉祥物。给姑娘印象不错的惟有赫尔曼·戈林，这也许是因为他曾送给她一条名叫“威士忌”的瘦狗，有一次在霍夫曼照相馆拍照的时候，他还邀请亨里埃特去柏林。

到了柏林之后，十七岁的亨里埃特亲眼看到1930年10月13日帝国国会在一片喧闹中开幕的场景。当晚她还去了戈林家举行的一次精彩的社交聚会。希特勒、戈培尔和赫斯当时在场，此外还有十来个王公贵族。根据一位在场者日记的记录，亨里埃特是以希特勒秘书的身份参加那场活动的。

亨里埃特在父母家不仅认识了那些经常跟随在希特勒身边的纳粹党骨干，还认识了在希特勒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那两个女人：吉莉·拉包尔和爱娃·布劳恩。她对希特勒那位不幸的外甥女吉莉颇有好感，但对在她父亲那里学徒当店员，经常爱摆姿势让她父亲照相的爱娃·布劳恩，她却很瞧不起。她觉得爱娃人很笨，更深的原因大概在于两人都想争得希特勒的宠爱，亨里埃特本人并不愿承认这一点。然而这并不妨碍两人一道享受生活。她们都爱体育运动，经常一起溜冰滑雪，或者参加慕尼黑狂欢节的化装舞会。

人们并不清楚亨里埃特是不是真的对比自己大二十四岁的希特勒有想法。反正她经常对人讲，希特勒曾在30年代早期向她表露过爱意，不知是真有其事还是她凭空想像：“……门铃响了。我跳下床，跑到门边……是希特勒先生。他站在门厅的红地毯上……希特勒先生穿着那件英国风衣，手里拿着他那顶灰毡帽。突然，他说了句不该说的话，而且说得很认真：‘您愿意吻我吗？’他用的是‘您’。吻希特勒先生，真不敢想像！‘不，真的不行，希特勒先生，我不能这么做！’”

姑娘的父亲认为她说的这段故事完全是瞎编的：“别痴心妄想了，快上床睡觉！”

不管实情究竟如何，吉莉自杀后，希特勒开始眷顾爱娃·布劳恩，亨里埃特也选择了纳粹大学生联盟主席、希特勒最年轻的随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作为伴侣。出于这一目的，亨里埃特出人意料地加入了纳粹德国大学生联盟，帮助该组织捆扎大学生杂志《运动》，做各种办公室杂事。她



很喜欢那种环境，在那里觉得很自在。有时大家会到大学里去散发纳粹传单，有时大家会彻夜坐在一起谈文学，朗诵斯特凡·格奥尔格<sup>①</sup>的诗，引用恩斯特·容格尔<sup>②</sup>的名句。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后来成了亨里埃特的知音。两人都在纳粹的环境中长大成人，都是希特勒的门生，由于对艺术、文化和文学的共同兴趣，他们两人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这位大学生领袖后来承认，第一天晚上见到这个活泼好动、敢做敢言的亨里埃特，他就爱上了她。姑娘也很喜欢这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冯·席拉赫长得温文尔雅，五官柔和，说话拿腔拿调，过于慷慨激昂。他能背诵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准备一辈子都按“元首”的意志行事。大学生领袖自称“纳粹运动的歌手”，他献给“元首”的众多赞美诗令亨里埃特赞叹不已。1931年时，冯·席拉赫已经可以拿出好几本诗集给姑娘看了，其中一首诗是：“我曾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片孤叶，如今，你成了我的大树，我的家园……”

巴尔杜尔·冯·席拉赫1907年5月9日生于柏林，少年时期是在魏玛度过的。父亲以前是普鲁士重骑卫士团的骑兵上尉，后来当上了魏玛宫廷剧院的总监。母亲是美国人，一辈子不会说德语，而且用自己的母语英语教育四个孩子。一战结束后，父亲丢了饭碗，巴尔杜尔的一个兄弟因“德国的不幸”开枪自杀。当时德国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为巴尔杜尔本人接受纳粹思想创造了条件。他中学就读于巴特贝尔卡附近的瓦尔德教育学院，该校采用教育改革家赫尔曼·利茨“用引导代替说教”的教育理念。在那里接受的教育令巴尔杜尔成了一个“正派的反犹太主义者”（自称）。他后来到希特勒青年团传授的基本思想也是他这个时期获得的。后来当上图林根纳粹省党部副主席的汉斯·泽韦鲁斯·齐格勒，是巴尔杜尔纳粹思想的启蒙导师，接下去的导师便是希特勒。十五岁时，他就被希特勒置于卵翼之下。

听从希特勒的意见，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进了慕尼黑大学攻读英国语言文学、艺术史和埃及学。亨里埃特同样也在这所大学学艺术史，她当时还朦胧地打算有朝一日改学考古。

1931年和1932年之交，亨里埃特和冯·席拉赫两人预备结婚。他们偶然读到一份党卫军头头海因里希·希姆莱为党卫军成员订婚和结婚下达的

① 1868—1933，德国抒情诗人。

② 德国小说家、短论作家。

指令。里面谈到“丈夫必须是德意志北欧人种”，“精选和保持种族和遗传方面的优良血统”以及由党卫军种族局对要求结婚者进行检查等内容。这份公告是后来纳粹对“血统不纯”的国民实行强制安乐死和种族灭绝的先兆。当时，连纳粹党人都觉得公告中提出的要求很荒唐。亨里埃特和冯·席拉赫其时已经订婚，两人头发都是深色的。据他们自己说，他们那时也担心能否通过结婚这一关。最终亨里埃特和冯·席拉赫发现，他们认识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头目中没有人完全符合北欧人种的标准。后来冯·席拉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把这一切当做人们在除夕夜开的玩笑那样一笑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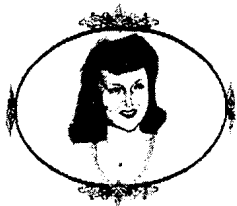
1932年3月31日，亨里埃特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慕尼黑古老的“老彼得”户籍登记处举行了婚礼。阿道夫·希特勒和脸上有块刀疤的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担任证婚人。后者婚礼之后很快借口有“一桩急事”告退了。后来人们才知道，同性恋者罗姆当时受到了别人的敲诈。

参加婚礼的其他人都去了摄政王广场希特勒住处，那里已经备好了婚宴。希特勒只要了番茄酱意大利面和一个苹果。大家给新建小家庭送的礼物中有一本来宾留言簿，里面已经有了极具现实意义的第一份留言：“正处转折时期！阿道夫·希特勒。”这句话暗指留言者在1932年3月13日举行的德国总统选举中赢得了一千一百万张之多的选票<sup>①</sup>。婚宴上的谈话被希特勒垄断了。他很快就要踏上首次“德国飞行”之旅，因而在婚宴上他一连几个小时大谈如何为下一次选举大做文章。为了让希特勒能一天在三个城市的竞选集会上演讲，纳粹党从汉莎航空公司包租了一架三引擎飞机，这在当时绝对是新花样。希特勒还对新婚夫妇说，他担心自己的胃可能会受不了这样的来回飞行。

新娘的父亲海因里希·霍夫曼，当时早就成了希特勒的固定陪同人员之一。希特勒每次公开露面（包括竞选旅行）都有他在场。1932年希特勒的首次“德国飞行”之旅他就参加了。后来在国会开会的时候，他是惟一可以不讲会场规矩的人，可以在场内自由走动，自由拍照，而且没有人会审查他拍的照片。

婚宴结束时，希特勒递给初为人妻的亨里埃特一张便条，上面写着

<sup>①</sup> 希特勒的竞选对手兴登堡得了一千八百六十万张选票，两人都没有超过绝对多数，因而还要进行第二次选举。



冯·席拉赫家以后招待他时的注意事项：“我吃所有大自然自愿献出的东西：水果、蔬菜、植物油。请你们不要为我预备动物被迫献出的东西：肉、奶和奶酪。荤食我只吃鸡蛋！”

希特勒的新婚贺礼送得有点晚，是一只柏林狗展上获得头奖的小牧羊犬。按希特勒的要求，这只狗被训练得很凶，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它动不动就袭击人。后来每逢圣诞节，希特勒送给冯·席拉赫夫妇的都是一束兰花。

靠双方父母赞助，这对年轻夫妇在紧挨着慕尼黑英国花园的王后街31号租了一所住宅。它的希罕之处是曾经按照画家弗朗茨·冯·德弗雷格尔<sup>①</sup>的设计被装修过，画家本人死前一直住在这里。夫妇俩还用亨妮的嫁妆，在巴伐利亚瓦尔兴湖附近的乌尔费尔德购置了一个看林人住的房子，供闲时隐居。

冯·席拉赫可是娶了一个阔太太，因为随着纳粹党的崛起，他老丈人的小照相铺已然扩张成了大出版社和大公司。光出版社1943年就有三百多名雇员，年营业额达一千五百万帝国马克。按当时的情景，成为海因里希·霍夫曼的女婿就如同入赘帝王家一般。做丈人的在纳粹党内地位颇高，而且总能接近希特勒。由于这层关系，冯·席拉赫也挤入与希特勒最接近的“宫廷侍臣”之列，经常和亨妮一道应邀去上萨尔茨贝格做客。在党内很有影响的霍夫曼，在“元首”请客吃饭的时候像个探子一样非常留意各种动向，一有机会就会为女婿美言几句。野心勃勃的冯·席拉赫在党内并没有根基，必须不断讨好希特勒。老丈人的地位对他的发展至关重要。

早在1931年10月30日，冯·席拉赫就被任命为纳粹党的全国青年领袖。1932年6月，他让出了纳粹大学生联盟主席的职位，以便一心一意领导希特勒青年团。1932年10月，冯·席拉赫在波茨坦组织召开了所谓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有七万青年出席。希特勒青年团的队伍迅速壮大，到1935年9月，已有一百九十万男青年和一百二十六万女青年为其成员。

婚后不久，十九岁的亨里埃特加入了纳粹党。她在党内并没有职务，但她除了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与丈夫意见有出入外，基本上完全赞同丈夫的目标，那就是至少要主宰德意志帝国的教育事业。青年的“精神教

<sup>①</sup> 1835—1921，奥地利学院派画家。



育”也是亨里埃特非常关心的一件事。希特勒给青年团员定下的目标是“动如灵猥<sup>①</sup>，坚如钢铁，韧如皮革”。但亨里埃特觉得这还不够，她认为智力方面的要求被忽视了。1933年1月底，就在纳粹党庆祝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亨里埃特在慕尼黑一家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希特勒带了一束玫瑰亲自向她道贺。按照冯·席拉赫家的一项传统，女孩被命名为安格利卡·贝内迪克塔。冯·席拉赫夫妇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克劳斯、罗伯特和理查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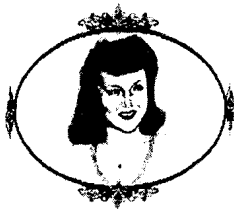
由于全国青年领袖1932年8月又当上了国会议员，冯·席拉赫一家于1933年春迁居柏林。他们在小万湖湖畔的俾斯麦街28号租下了一幢别墅。地段很优雅，邻居那家的别墅周围有个很讲究的庭园，里面放养着火烈鸟。那里曾被用做富人生活片的外景地。冯·席拉赫自家的院落挨着湖边，小楼里有很多房间，门厅也很漂亮，眼光最挑剔的人也会看上这幢房子的。全国青年领袖在这个奢华的环境里写了不少谄媚的诗篇歌颂希特勒。有人赞道，这些歌功颂德的诗“开创了纳粹文学的新时代”。纳粹上台后，这些诗很有市场，所有报纸均予以刊载。

柏林的生活并不像亨妮想像得那样有意思。1934年她又回到巴伐利亚，住在乌尔费尔德那幢看林人的房子里，而原先她和丈夫仅打算周末在那里住住而已。妻子搬走后，冯·席拉赫搬进了柏林凯泽霍夫饭店的一个套间，过起了两地奔走的生活。万湖边那幢漂亮房子被放弃了。

不久后，亨里埃特在瓦尔兴湖畔的科赫尔看上了一幢名叫阿斯彭施泰因的空房子。这座有十一个房间连带小塔楼的巴洛克式小宫殿，位于克塞尔贝格街的尽头，地段比乌尔费尔德那幢房子更僻静一些，原先是附近的贝内迪克特博伊伦本笃会修道院院长们“夏天享受新鲜空气的地方”。冯·席拉赫家买下了这幢废弃的建筑，对它进行了一番精心装修，后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冯·席拉赫夫妇在他们的小宫殿里接待了很多客人，包括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心狠手辣的希姆莱曾参与除掉了他们的证婚人恩斯特·罗姆。冯·席拉赫夫妇对此事倒没怎么记仇，不过他们一直提醒自己可别像当年那样拿希姆莱下达的“订婚和结婚令”开玩笑。

<sup>①</sup> 灵猥，一种善于赛跑的狗。



冯·席拉赫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位阴森森的客人时写道，“他挺开朗，并不拘谨。我们孩子在房前草地上玩耍，引起了希姆莱的兴趣。他说：‘一看他们就知道是日耳曼人，北欧人种。’走的时候他又说：‘我非常乐意送一个圣诞烛台给您漂亮的家。’”

冯·席拉赫夫妇也拜访过希姆莱夫妇。他们的住宅名叫林登费希特，在不远的泰根湖北端的格蒙德附近。这个管辖所有集中营的党卫军领袖人见人怕，本人又不太爱与人交往。冯·席拉赫夫妇到希姆莱家，使他们有机会亲眼看看此公的私生活。冯·席拉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坐下来喝咖啡。希姆莱太太是个一脸严肃、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女人，对丈夫态度也很坏。我还从未见过像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样怕老婆的男人。他对老婆客气得不得了，但越是这样，老婆待他越糟。这个党卫军的头儿在家里简直是个废物，总是得迁就老婆。希姆莱太太老是叫他‘海因里希’，口气凶巴巴的。吃晚饭时，他给自己斟上了习惯喝的淡甘菊茶……一再劝太太吃这吃那，她总是说：‘不，我不想吃那个。’”

戈培尔在日记中说亨里埃特是个非常风趣的人。她有本事在吃饭的时候把满桌的客人都逗得很开心。那天晚上，她虽然也能一再想出一些有意思的话题来活跃气氛，但希姆莱太太却总是不以为然地闷坐着，弄得大家都没了兴致。后来听说希姆莱养了个情妇，冯·席拉赫夫妇立刻就想到了他那个母夜叉似的太太，心里奇怪，他怎么敢这么做呢？冯·席拉赫夫妇与希姆莱交往，个人感情成分很少，更多的是出于切实的政治考虑，因为希姆莱爱从希特勒青年团中招募党卫军的新生力量。

1938年11月10日，如同前一天晚上在柏林发生的“水晶之夜”大规模袭击犹太商店和住宅行动一样，褐衫群氓在慕尼黑也闹腾了一番。亨里埃特当时正待在慕尼黑父亲家里。她给柏林打电话告诉丈夫，博根豪森区有很多犹太人的别墅都遭到洗劫，有一家犹太人已在她那里避难了。

匪徒们袭击犹太人住宅时之所以目标非常明确，是因为自1938年2月开始，慕尼黑就有一本由工商局编纂并印发的犹太工商业者名录，里面有他们的私人住址。作为国会议员，冯·席拉赫1935年对实行《种族法》投了赞成票。后来他在呈交纽伦堡战犯法庭的辩词中写道：“我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但我认为一个人可以以正直的方式做一个反犹主义者。”他妻子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尽管如此，在发生“水晶之夜”事件后，冯·席拉赫

还是向希特勒青年团地方骨干发布了通知，严禁青年团员参加此类“犯罪行动”。

冯·席拉赫立志主宰第三帝国的教育，战争爆发使他暂时抛开了这一野心。1940年冬天，他作为志愿者参加了德国国防军。在他受训期间，妻子只有在周六没有军训的时候才能在凯泽霍夫饭店见到“二等兵冯·席拉赫”。当时希特勒认为冯·席拉赫对青年团领导不力，因而已决定撤换这个全国青年领袖。但同时他又告诉亨里埃特，如果她丈夫能“从法国战场活着回来”，就会给他安排新的使命。亨里埃特希望丈夫能因为有美国祖先的缘故而被派到华盛顿去当大使。1940年8月10日，希特勒向冯·席拉赫下达了委任状：“……新的使命就是去维也纳。”希特勒整整花了二十分钟向冯·席拉赫介绍应该怎么做做好维也纳纳粹党领袖、地方长官和市长的工作。据亨里埃特回忆，她丈夫在那次会见中只记下两句话：“劳工和艺术家要受到同样重视”和“维也纳是颗明珠，我要为它配上配得上它的托座”。希特勒还说，目前维也纳文化领域“存在问题”。实际上，由于1938年后犹太艺术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纷纷移居国外或遭驱逐，当时维也纳已出现了文化真空。希特勒要求冯·席拉赫通过举办文化活动来分散维也纳人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使他们忘记维也纳已从当年奥匈帝国的首都和皇城沦为一个已经失去政治影响的外省城市。此外，作为当地纳粹党领袖，冯·席拉赫还应该筹划和支持撤离流入维也纳的捷克难民和驱逐仍留在维也纳的大约六万犹太人。

冯·席拉赫调任维也纳，表面上看是荣升，只有柏林和慕尼黑纳粹党领袖地位比他高，但实际上是放逐。这一任命旨在掩盖冯·席拉赫已对青年教育失去影响这一事实。

然而，热心文艺的亨里埃特很愿意带着孩子（当时已有三个）一道迁居维也纳。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得承认，一想到可以去维也纳生活，我把战争都彻底忘了。”选择一个合适的住宅本来是件烦恼事，却给冯·席拉赫夫妇带来了乐趣，因为供纳粹地方长官选择的方案实在是太多了。维也纳市政府轻易便许诺可以安排他们住在奥匈帝国皇宫霍夫堡。希特勒则推荐欧根亲王的夏宫贝尔维德雷宫。冯·席拉赫夫妇最终选择了德伯林区上瓦特52—54号，也就是冯·席拉赫的前任比尔克尔住过的那幢别墅（现在是埃及大使馆所在地）。那儿原先是犹太人的房产，后被比尔克尔没收。



房子周围有一个很大的庭园，与罗特席尔德植物园毗邻。植物园当时已经荒芜，因为主人已被迫丢下财产移居国外了。

1940年8月28日，维也纳版的《人民观察家报》<sup>①</sup>发表文章，热烈欢迎新长官的到来。然而，冯·席拉赫夫妇在普遍民众中却遭遇了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幼稚的亨里埃特对此深感困惑，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当地人会憎恨希特勒，而我们则是他的代表。他们把我们视作篡权者、闯入者……”而她丈夫上任后于1940年8月15日采取的第一项行动便是，“使以前被误解为代表民意机构的议会得以行使它真正的职能，那就是将它变成为纳粹党地方党部”。<sup>②</sup>

1940年那时，维也纳人对现实已经非常不满，他们最初对奥地利“并入”帝国所感到的兴奋已经烟消云散。有人在致冯·席拉赫的匿名信中写道：“合并后的最初几天，来自巴伐利亚的援助列车把变质的红烧牛肉（确实如此）施舍给当地民众，同时又把成千成万头牛从阿尔卑斯山区运回了帝国本土。”还有一封匿名信写道：“虽然战争消灭了失业现象，但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当地人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改善，反而下降了。党、政、经济界的权力部门全由来自德国本土的官员把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维也纳已经沦为普鲁士帝国的一个外省城市。

遵照“元首”指示，冯·席拉赫为完成将维也纳变成一个“无犹太人城市”的使命投入了全部精力。自德奥“合并”以来，当局就挖空心思，通过各种刁难和恐吓手段，逼迫犹太人移居国外，目标是首先把犹太人洗劫一空，然后再把他们撵走。在党卫军大队长、“犹太移民局”局长阿道夫·艾希曼的逼迫下，当地犹太人社团领袖勒文赫尔博士茨绝望地奔走于世界各地，请求各国政府收容奥地利犹太人。艾希曼还委托勒文赫尔茨转告“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sup>③</sup>说，如果该委员会答应提供外汇，就不会向波兰驱逐犹太人，“维也纳的非犹太化”到1940年底也就会终止。勒文赫尔茨还参加了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一个会议。会上三十二个国家的代表讨论了难民的命运问题，大家都以各种蹩脚的理由为借口，拒绝接纳难民。

① 纳粹党机关报。

② 《人民观察家报》。

③ 1914年由美国知名犹太人创建的旨在向境外犹太人提供援助的团体。

德奥“合并”之前，维也纳大约有二十万犹太人，到冯·席拉赫上任时，只剩下六万多人。英国参战后，维也纳犹太人的移民潮停滞下来，于是纳粹当局开始逐步实施一直威胁要采取的强行驱逐犹太人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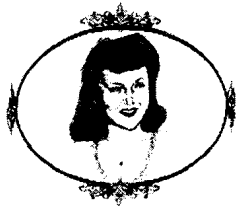
冯·席拉赫不断要求波兰纳粹占领当局的总督汉斯·弗兰克“替他接管那帮犹太人”。犹太人领袖勒文赫尔茨曾试图劝说冯·席拉赫不要驱逐老弱病残者，后者却在公开演讲中把他嘲笑了一番。

1941年1月，艾希曼的移民局制订出第一份驱逐名单，到了6月，已有一万犹太人被赶到了波兰。根据冯·席拉赫1941年2月7日致盖世太保的一封公函，他“在对犹太人采取什么行动以及是否推迟运走犹太人问题上享有最终决定权”。当1942年秋维也纳犹太人的总人数降至七千人时，冯·席拉赫又自夸说，通过采取驱逐行动，他“为欧洲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后来冯·席拉赫虽然部分承认自己的罪过，但同时又否认曾积极推行驱逐犹太人的政策。他将责任推到了希姆莱身上。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冯·席拉赫说，他当时也以为移居波兰的犹太人会被安置到当地的纺织厂做工，“我当时很信任弗兰克博士”。

亨里埃特战后声称，她一点都不了解维也纳当时的总体情况和气氛。后来她一再强调这一点。但一位证人对法庭说：“把犹太人运往波兰完全是公开进行的。指定人员到各家执行任务时，车辆就停在房子外面，任何路过的人都能看见。”

据说这位维也纳纳粹领袖的妻子也不知道丈夫在上任不久就发出通函，要求用“大卫王之星”“无一例外地标记所有犹太人及其住宅”。冯·席拉赫还下令禁止犹太人到维也纳森林、弗罗伊登瑙跑马场、所有的公共花园和游泳池游玩，禁止他们乘坐有轨电车和城市轻轨列车，不得使用公用电话或通过邮政寄信。此外，根据这位地方长官的命令，犹太人每个星期天都要到维也纳森林里去伐木或到市里去扫大街，而且他们只能到指定商店买东西。素以观察力强著称的亨里埃特据说也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连丈夫断然拒绝与犹太人面对面说话居然也逃过了她的眼睛。

亨里埃特并不关心周围人的命运，她更感兴趣的是由“元首”大本营下令进行的所谓“文化攻势”。维也纳的文艺生活当时已深陷危机，到了



再也无法忽视的程度。衰落自“社团国家”时期<sup>①</sup>已经开始，当时的审查和宣传机构“奥地利艺术中心”，为文艺活动设置的种种限制条件，迫使许多奥地利艺术家，特别是电影导演，离开了本土。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又导致犹太艺术家大批移居海外，不愿意走的则被禁止从业，而且面临遭驱逐的危险，性命之虞扼杀了全部艺术创造力。纳粹德国文化协会下设的美术、音乐、戏剧、电影、广播、文学和新闻等七个协会，负责对那些获准从业的艺术家进行严密监控。还有一些著名艺术家为在艺术上向德国看齐，把家搬到了生机勃勃的大都会柏林。维也纳的“堡剧院”和“国家歌剧院”更是人才流失严重。总之，当时奥地利艺术界是一片萧条。

尽管受到战时环境的种种限制——当时对英国的攻势正在全面展开，冯·席拉赫夫妇仍力图恢复维也纳的老传统，而且应该说也取得了成果。他们不顾戈培尔的禁令，在维也纳上演了作曲家瓦格纳-雷杰尼的现代歌剧《约翰娜·巴尔克》。知名艺术家富特文格勒<sup>②</sup>、克纳佩茨布什<sup>③</sup>、克莱门斯·克劳斯<sup>④</sup>、卡尔·博姆<sup>⑤</sup>等均得到了长期聘用。他们还向成就显著者颁发了维也纳市荣誉指环，著名艺术家也受到了礼遇。1942年，冯·席拉赫夫妇在自己家为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庆祝八十大寿。两年后，他们又为同样年届八十的理查德·施特劳斯举办了祝寿活动。

很快，维也纳的文化风采看上去又盖过了柏林。但是与此同时，为奥地利文化遗产操心的冯·席拉赫又以站不住脚的理由，查封了克洛斯特新堡古老的科黑伦施蒂夫特修道院<sup>⑥</sup>。他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要归因于纳粹党办主任博尔曼提供的一份严格保密的专家评估报告，报告说清除修道院不会遭到民众的反对。当时冯·席拉赫已经决定要把这座修道院改为一所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但由于战局变化，这一决定最终并未实施。亨里埃特后来想把责备推到博尔曼身上，她称自己曾经在希特勒面前为保存奥

① 指1934年至1938年奥地利先后受到陶尔斐斯和舒施尼格天主教-法西斯独裁政权统治时期。

② 1886—1954，德国指挥家。

③ 1888—1965，德国指挥家。

④ 1893—1954，奥地利指挥家。

⑤ 1894—1981，奥地利指挥家。

⑥ 科黑伦施蒂夫特修道院位于奥地利东北部下奥地利州城市克洛斯特新堡，是奥地利最古老、最富丽堂皇的修道院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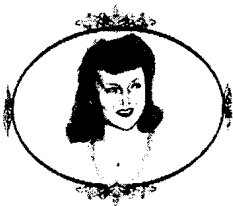
地利的修道院做过工作。

维也纳纳粹党领袖夫妇很喜欢交际应酬。为避免失礼，他们采用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时期的宫廷礼仪举办宴会。侍者都是一身哈布斯堡王朝宫廷侍者的打扮，餐具和刀叉均是以前皇宫里的御用品。席间致辞时，冯·席拉赫常爱说起自己的祖先曾受过哈布斯堡女皇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册封。像当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一样，冯·席拉赫每年也邀请一些人到莱恩策动物园里的施瓦茨和达姆猎区打猎，那里曾是皇家狩猎园。冯·席拉赫夫妇这种皇家派头遭到了非议。一位外交官在日记中写道：“冯·席拉赫带着帝国酒鬼霍夫曼的女儿，像君主一样登场亮相，身佩绶带的副官跟在身后低声报着来宾的姓名……他一脸的虚情假意，虽然此时表现得亲切大方，但一转脸，他又会摆出那副傲慢的党魁模样……”

冯·席拉赫在回忆录中描述维也纳生活时写道：“在维也纳时期，亨里埃特和我很好客。我在上瓦特 52 号的官邸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外交官和艺术家来做客。希特勒把我派到维也纳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前任比尔克尔太不关心这座多瑙河城市的想法了。合并之后，维也纳与戏剧之都柏林相比越来越黯然失色，我努力要改变这一点。”1941 年 2 月 28 日，为了参加接纳保加利亚加入“三国公约”<sup>①</sup> 的庆祝活动，希特勒来到维也纳。庆祝活动结束后，希特勒邀请保加利亚外长、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伯爵、日本大使大岛浩和里宾特洛甫<sup>②</sup> 在欧根亲王的豪华宫殿贝尔维德雷宫共进早餐，亨里埃特也参加了。当晚希特勒在上瓦特冯·席拉赫家里参加了小范围的聚会。3 月 25 日，希特勒又来到维也纳，这次是为了庆祝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公约”。冯·席拉赫为此举办了一场宴会，亨里埃特也邀请了维也纳一些年轻的艺术名流参加。希特勒当时兴致很高，但当他谈到自己在 1907 年至 1913 年生活过的这座多瑙河畔城市时，好心情一下子就没了。他突然破口大骂维也纳，临了还说：“维也纳的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不过，午夜之后，希特勒还是在冯·席拉赫夫妇陪同下，对这座沉睡中的城市做了一次怀旧游。他兴致勃勃地指着卡尔教堂、议会大厦、盖斯特特马利亚教堂等维也纳名胜说，这些都是他年轻时候作画的地方。后来在乌克兰境内的“狼穴”“元首大本营”里，希特勒曾谈到这次维也纳之行。他先是说

① 指德、意、日三国。

② 纳粹德国外长。



冯·席拉赫夫妇“完全被这座城市的气氛”给迷住了，然后又说：“如今我又去过维也纳了，那些脏东西（犹太人）没了，但它已成了一个可怜的城市……”

1943年春天，亨里埃特乘火车去被占领的荷兰途中，亲眼看见了一幕驱逐犹太妇女和儿童的情景。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半夜三更，我被喊叫声惊醒。我奔到窗前……下面的街道上站着几百个手拿包袱的女人，显然是被急急忙忙赶到一处的，一帮穿制服的男人在一边看着她们。有些人在哭，接着有人大喊：“雅利安人留下！”不久，火车慢慢启动，穿过桥消失在夜幕中。第二天早上，没有人愿意告诉我有关这次神秘行动的情况……不过来车站接我的米德尔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是把犹太女人运走呢！’‘是德国人干的吗？’‘还会是谁？’‘希特勒知道吗？’米德尔答道，假如希特勒真不知道，她应该向他汇报。一句嘲讽话，亨里埃特居然当了真。

据亨里埃特说，1943年耶稣受难节那天晚上，她丈夫在贝格霍夫的餐厅里，她本人则把荷兰的经历告诉了希特勒，并问他到底知不知情。希特勒嚷道：“您也太感情用事了！荷兰的犹太女人和您有什么关系！”他还拿手比做两个秤盘说：“您要知道，每天我这边都有上万个最宝贵的人阵亡……他们都是最棒的。这下子就失衡了，欧洲的均势被打破了，因为另一方没有损失多少人，他们都还活得好好的，待在集中营里，那帮劣等人。这样下去，一百年之后欧洲会成什么样子？一千年之后呢？……我只对我的人民负责，其他人我一概不管……”

亨里埃特抱怨说，希特勒后来越说越恼火，而坐在大厅壁炉边的其他人都一言不发，眼睛直瞪着地面，没有人出来帮她。最后她和丈夫逃也似的离开了贝格霍夫，再也没有回去过。后来很长时间，一想到可能会遭到希特勒的报复，她就不寒而栗。亨里埃特还说，自打那次在贝格霍夫与希特勒发生争执后，她丈夫“在政治上就算完了”。

当时也在场的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亨妮当时表现得像个蠢婆娘一样。他还挖苦道，“几乎有六万犹太人差不多是从他们家门口被赶走了。”冯·席拉赫夫妇这才大发善心。

历史学家约亨·冯·朗格对那天晚上的经过进行了详细分析。据他认为，当晚希特勒与手下讨论要对苏联发动一次新的攻势，目标是拿下库尔斯克。这场讨论让希特勒疲惫不堪，情绪很糟。这时候冯·席拉赫又支支



吾吾地表示应该更加人道地对待俄国百姓，希特勒就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后来冯·席拉赫又试图为维也纳和维也纳人说些好话，效果也很不理想。希特勒说：“我了解那帮人。（德奥）合并的时候，他们向我欢呼致敬，但这并不说明什么问题。他们是反复无常之辈，以前也经常在一些最蠢的角色面前这么干过，因为他们是劣等人，是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大杂烩。”紧接着，亨里埃特又央求希特勒把她丈夫调到慕尼黑去。当时的气氛已经很不对劲了，偏偏亨里埃特又提起荷兰犹太女人的事情。希特勒反应很冷淡，但并没有发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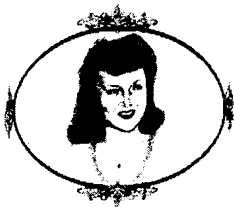
约亨·冯·朗格后来在采访冯·席拉赫夫妇时，提到了1940年至1943年间纳粹为制造“无犹太人”维也纳而采取的措施。从采访中可以看出，“让他们气愤的只是运走犹太人的方式，包括警察赶人时大喊大叫，对走得慢的人拳打脚踢，还有被折磨对象的哀号。这样做违背了他们的信念。他们认为，德国人应该严厉，但同时应该公正地对待犹太人。”（《希特勒青年》，约亨·冯·朗格）

亨里埃特说那次翻脸后希特勒就再也不许他们接近，这也不符合事实。1943年6月底，冯·席拉赫就又到上萨尔茨贝格去吃过饭，还安排挪威诗人克努特·汉姆生与希特勒见了面。

1944年9月10日，美军首次对维也纳进行了猛烈轰炸，主要目标是维也纳内城的西北部。11月4日，有一颗炸弹在离上瓦特冯·席拉赫别墅很近的地方爆炸。亨里埃特对冯·朗格说：“我们家的门窗都被震掉了，家具和书乱七八糟散了一地……厨房里满地堆着餐具，砸得粉碎，电也停了……”

冯·席拉赫从建在加里岑贝格山腰间的席拉赫掩体中看到了眼前的一片荒芜。他曾要求希特勒同意宣布维也纳为不设防城市，遭到了拒绝。于是他让亨里埃特带着孩子去了巴伐利亚乡间别墅阿斯彭施泰因。

1945年4月初，冯·席拉赫从上瓦特搬进了霍夫堡宫下面的地下防空洞。不久后，随着苏军日益逼近，他悄悄逃往奥地利西部。当时他不可能带很多东西，因而就将自己最珍贵的宝贝装进了一个黑色旅行箱里。这个“宝箱”战后还有一段故事。箱内装的东西估计值五十万帝国马克（1958年的估价），包括鲁本斯和雷诺阿的名画各一幅、几本印刷术发明初期的古版书以及歌德写给儿子奥古斯特的亲笔信。所有这些都是冯·席拉赫从



他出身豪门的美国母亲那里继承的财产。

地方长官逃走后，奥地利自由战士于1945年4月底闯入了冯·席拉赫家位于巴登附近海黑勒南塔尔的一幢乡村别墅。在那里他们不仅发现了储量巨大的食品库存，还找到了一大批挂毯和艺术品，都是冯·席拉赫夫妇从维也纳的美泉宫、克洛斯特新堡的修道院和维也纳各个博物馆搜刮来的。

冯·席拉赫后来戴上眼镜，粘上大胡子，化名“法尔克博士”，到驻扎在蒂罗尔地区施瓦茨的美国人那里报名当口译。此前，他的副官赫普克已将那只“宝箱”交给了独住在平茨高附近荒村的一个农户保管。只有在冯·席拉赫的妻子或赫普克派来使者，说出事先约好的暗号“浮士德博士”时，这位农民才可交出宝物。

1945年6月21日，冯·席拉赫与妻子重逢，不过，不是两人还在维也纳时就商量好的约会地点——蒂罗尔地区库夫施泰因附近山里的一个偏僻旅馆，而是在因斯布鲁克附近的鲁姆拘留营。原因是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此前已发誓放弃纳粹信仰，向美国人自首了。

亨里埃特弄不懂丈夫的思想为什么发生了突变。她在俘虏营与他短暂会面时问道：“你为什么不逃走？你是能逃走的。”没有人会怀疑“理查德·法尔克博士”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作家，他所持的伪造证件无可挑剔。再者，人们都以为冯·席拉赫已经死了，是被愤怒的维也纳民众打死的。

让亨里埃特极为失望的是，丈夫忠于那些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竟然胜过忠于自己的家庭。<sup>①</sup> 突然之间，她变得无依无靠，一个人得养活四个小家伙。原先，逃往国外易如反掌，现在只好断了这个念头。

1945年9月10日，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解往纽伦堡。亨里埃特和孩子们充分体验到了“辉煌的代价”。走在街头，大家都骂他们是纳粹，老熟人都躲得远远的。民众把愤怒都发泄在了亨里埃特这个纳粹党魁和战犯的老婆身上。

1945年11月1日，维也纳《工人报》写道：“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如今，他本人（海因里希·霍夫曼）在蹲大狱，女婿也在蹲大狱……”的确，当时亨里埃特的父亲和丈夫都被关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监狱中。

① 指冯·席拉赫没有向盟军交代以前那些手下的下落，却供出了自己的家人。



她本人不得不离开阿斯彭施泰因，搬回乌尔费尔德那幢她用自己的嫁妆购置的看林人小屋。人们盛怒之下洗劫了阿斯彭施泰因。最后，美军第十装甲师指挥官把那里变成了师部所在地。

1945年12月24日，亨里埃特被送进特尔茨女子拘留营。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由人代管。在拘留营里待了三个月后，亨里埃特于1946年春天获释，没有人解释释放她的原因。

当时盟军军事法庭已经开始审判战犯，作为主要被告，巴尔杜尔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亨里埃特极力想为丈夫找到辩护证人和材料，因而经常去纽伦堡。在那里，她还见到了父亲。原先心宽体胖的“酒鬼”霍夫曼已经瘦下去了，而且把酒也戒了。他正在为美国人整理自己大宗的照片档案。有人问起希特勒，他会说自己与他只是泛泛之交，因为受一家美国图片社的委托这一纯职业的原因，自己才找上了希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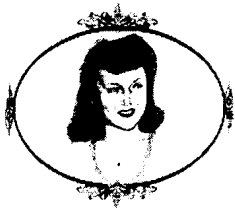
1946年秋，亨里埃特认为应该让人去取那个仍在平茨高由“信人”保管的“宝箱”了。她派了一个女人去，女人和那个农民对了暗号，确实也取到了箱子，然而里面仅仅装着六本不值钱的古典作家文集。

纽伦堡法庭宣判前两周，亨里埃特获准探监。她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与丈夫会面的情景：“随后，我们进了探监室。探监室很小，一个挨着一个。我们和被告之间隔着一道密密的铁丝网，我想塞枝烟过去，但塞不过去。可以握握手吗？不行，禁止这么做。”

前维也纳纳粹党头目最终被判二十年监禁，服刑地点是柏林施潘道监狱。此后不久，亨里埃特再次被捕，住进了奥格斯堡附近的格京根女子拘留营。在她等待接受非纳粹化审判期间，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四个孩子差一点被送进了孤儿院。

1947年12月11日，总检察官终于撤销了对亨里埃特·冯·席拉赫的指控，把她作为纳粹党“老党员”列为第二类被告（纳粹积极分子）。在接下来的案件审理中，有汉斯·卡罗萨、卡西米尔·埃德施米德和瓦尔德马尔·邦泽尔斯等知名的证人出庭为亨里埃特辩护。1947年12月16日，巴特特尔茨非纳粹化法庭作出判决，亨里埃特·冯·席拉赫被视作“轻犯”，理由是除了她1932年入党和是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妻子之外，并不能证明她犯过什么罪。她最终被罚款两千马克，并获得了一年的缓刑。

重获自由后，亨里埃特·冯·席拉赫对当局没收阿斯彭施泰因提出了强



烈抗议。那幢乡间别墅已被美国军管政府判给社会民主党做了培训所。她不断去拍门，要求那些人交出钥匙。里面的人威胁要对她动粗，她便以威胁罪把人告上了法庭。尽管亨里埃特费尽心机，但她一直没有要回阿斯彭施泰因。不过，她最终还是要回了那幢看林人住的小房子，因为她能证明那幢房子不是用丈夫的钱买的。

之后，这位前维也纳纳粹党头目的太太为了维持生计，干过各种各样的行当。给电影和戏剧导演埃里克·沙雷伊做营销顾问时，亨里埃特没有使用有损名誉的姓冯·席拉赫。她在回忆录中谈到此事时写道：“此后一段时间，我仍使用年轻时候的名字，但把姓改了，叫罗贝茨或理查茨。有时候我也会把它们弄混。有一次我在为埃里克·沙雷伊干活，需要他导演的《小白马》剧照。我告诉他我是理查茨，后来我又把自己的姓错说成了罗贝茨。沙雷伊起了疑心，想搞清我到底是谁。我知道他绝不会愿意与纳粹有什么瓜葛，于是就自愿告退了……”亨里埃特在慕尼黑开了一家名叫“巴黎电影”的影片出租小店。她曾打算拍一部有关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事件的影片，但激起了报界的愤怒。1949年，亨里埃特成了新闻人物，因为她与卷入一桩赌场丑闻的影片商彼得·雅各布有染，并申请与狱中的丈夫离婚。

报界当时认为，指望她一辈子守着一个战犯也是不合情理的。亨里埃特立刻在1950年10月10日的《南德意志日报》上否认了这一说法：“……他不是战犯，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而不适合搞政治。”同被关在施潘道监狱中的阿尔贝特·施佩尔在狱中日记里写道：“今天……我才知道冯·席拉赫太太一年多以前就已经变心，与别人发生了关系。说到底，她当初与冯·席拉赫结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看上了他的权，而他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看上了她的钱。孩子们应该站在父亲一边……”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同意离婚，于是两人于1950年11月初正式分手了。一些冯·席拉赫的狱友觉得他对这件事并不怎么挂心。不管怎样，他不希望亨里埃特用冯·席拉赫这个姓出版回忆录，因为这位前维也纳纳粹党头目打算出狱后自己出书。

彼得·雅各布用亨里埃特剩下的钱做的不可靠的电影买卖最终破产了。这让亨里埃特又想起了那只“宝箱”。1956年1月，也就是二战结束十多

年后，以及《奥地利国家条约》签订半年之后<sup>①</sup>，她开始采取行动。1月3日，亨里埃特去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警察局报案，称有人趁战后的混乱偷了她值钱的行李，因而她要状告不知名的窃贼。闻听此言，警官们惊得目瞪口呆。《法兰克福汇报》曾作过这样的猜测：“是不是有当兵的用歌德家书包了面包，或者把那些他们并不知道有多贵重的纪念品卖给占领当局换了一条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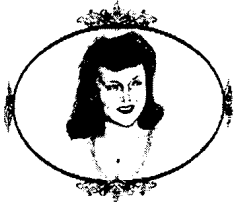
亨里埃特在法庭上宣誓作证说，自己1955年才知道有这么一只箱子，但有证人驳斥了这一说法。最后，亨里埃特因作伪证被传唤到一个陪审法庭受审，并被判罚款三百马克。那只箱子里装的东西至今下落不明。

这场官司当时曾引起轰动，给亨里埃特的处女作做了广告。这本书是她应美国一家出版社的建议写的，书名叫《辉煌的代价》，明白无误地披露了作者的政治态度。同她前夫后来的做法如出一辙，亨里埃特在书中把自己描绘成了一个受骗的无辜青年，很晚才知道纳粹暴行，因而觉悟得太迟。报界当时把亨里埃特这部故事性很强的作品称为“战后之作”，其版权可容作者俭朴度日。1958年，亨里埃特自己申报的月收入是五百至七百马克。

1956年，人们又重新议论起施潘道监狱中的三个囚犯——赫斯、施佩尔和冯·席拉赫。鉴于他们已被关押很长时间，而且因此带来的花费也很高，国际上有些人，特别是英国报界，主张提前释放这些战犯。亨里埃特·霍夫曼-冯·席拉赫（自用名）曾前往伦敦，想向英国外交大臣递交一份要求给被判二十年监禁的前夫减刑的申请。但是此行未果。

《辉煌的代价》一书再版之际，奥地利电视台邀请亨里埃特·霍夫曼-冯·席拉赫到 CLUB-2 节目中参加电视访谈。亨里埃特当时的表现简直无可救药，与别人根本构不成对话。这位前维也纳纳粹党头目的太太呼吁其他嘉宾应该对他们的同乡“奥地利人希特勒”感到自豪。她还把美国人的拘留营比做纳粹集中营。记者们则试图证明她对纳粹暴行是知情的。节目播出很久之后，人们还是议论纷纷。10月31日的《工人报》评论道：“简直是原形毕露，匪夷所思。”而《维也纳日报》前一天就发出呼吁：“别再弄怪了……不应该让那些（纳粹）大人物一再登上煽动讲坛。”

<sup>①</sup> 1955年5月15日，美、英、法、苏与奥地利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结束了四国的占领。



此后，亨里埃特·冯·席拉赫仍在孜孜不倦地出书。1980年，《希特勒逸事》面世；1983年，又有了《希特勒周围的女人》，作者名都是亨里埃特·冯·席拉赫。除此之外，亨里埃特·霍夫曼-冯·席拉赫还非常乐意接受采访。随着年事增高，她的记忆力逐渐衰退，陈述变得含糊其辞，数字和事实越来越少，虚构与实情混为一谈，但只有她对纳粹政权的积极评价一成不变。

1992年1月27日，亨里埃特·霍夫曼-冯·席拉赫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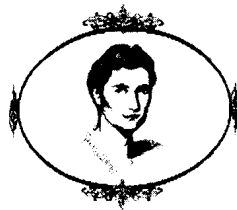


一夫多妻制的倡导者——格尔达·博尔曼









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兼“元首”秘书马丁·博尔曼有权有势，他和妩媚动人的电影女星曼妮娅·贝伦斯一度亲密无间，那时，这个九个孩子的父亲这样跟妻子说：“……你知道，我和曼以前并没怎么着。我不过觉得她挺迷人的……可10月份又见到她，我很高兴。你无法想像我有多兴奋。她太让我着迷了。虽然她躲躲闪闪，我还是吻了她……我疯狂爱上了她，于是做了一些安排，经常和她见面，而且不顾她的反抗，已经把她搞到手了。你知道，我有坚强的意志，一旦我下了决心，她是抗拒不了多久的。现在她是我的了。我这个快乐的小伙子觉得有两个女人真是幸福极了。亲爱的，你对你的疯老公有何评论？噢，我的心肝，你无法想像我有你们俩有多幸福。老天对我真是不薄。”（1944年1月21日博尔曼致妻子的信）

格尔达·博尔曼对具有坚强意志的丈夫表示衷心祝贺，对他的不忠给予了最大程度的谅解，丝毫没有吃醋。她还受丈夫婚外恋的启发，提出了“大众非常婚姻”的具体设想，并立即为她认为必不可少的声明书设计了样本。当时，取消一夫一妻制，对纳粹德国来说还是一种远景设想，而这对纳粹模范夫妻已经开始实施了。他们自认为扮演了先驱者的重要角色，不用理会思想狭隘的公众对他们的误解。格尔达在这方面一直很积极。

格尔达1909年10月23日出生于德国南部博登湖畔的康斯坦茨。她父亲那时在驻扎当地的德皇部队114步兵团服役。格尔达父母双方均出身中产阶级：瓦尔特·布赫祖祖辈辈在当地开药店，太太则出身军官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格尔达的父亲擢升为上尉营长，此外还在士官学校接受了两年培训。战争结束后，布赫在创办一所男童教育学院的过程中与纳粹有了接触。曾任纳粹德国粮食和农业部长的理查德·达雷在回忆录中谈起布赫，说：“……实际上，他本来就是民族主义者。很早他就与慕尼黑那些思想非常活跃的民族主义圈内人士有了来往，并由此结交了希特勒。不久，希特勒就经常到布赫家的乡间住宅去闲聊，那儿虽简陋，却很舒适。”

在战争年代，格尔达仍记得希特勒当年的来访和他说的话。格尔达小时候很喜欢听希特勒说话。1944年8月29日，她在一封信中写道：“……元首在‘奋斗时期’说的每句话仍在我脑中萦绕。1924年，他在我们家的瓷砖壁炉旁说：我看前途一片漆黑，我不想再奋斗下去了。”

布赫家住在慕尼黑附近佐尔恩的一幢小房子里，夫妇俩有四个子女



——格尔达、洛尔、赫尔曼和瓦尔特。外人都觉得这个干瘦、看上去很正派的退役军官布赫家庭生活很美满。瓦尔特·布赫在纳粹圈子里总是彬彬有礼，举止很有教养，但在家却是个暴君。格尔达认为，父母婚姻能够维持，完全要感谢母亲的宽容：“……母亲那么善良无私，若非如此，她肯定会对父亲忍无可忍。她总在让步，放弃自己的主张，家境最困难的时候她完全要靠自己。她又总是说父亲的好话。父亲发脾气，她总能谅解……”

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因素对格尔达的家庭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布赫夫妇自矜为纳粹精英；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虔诚笃信新教的教徒。而在他们内心里，这两点并不冲突和矛盾。1933年，他们效仿许多纳粹党人的做法，退出教会，不过是对时代潮流所做的让步。在纳粹圈内，他们仍被认为是“有信仰的”。无论如何，用布赫夫妇自己的话说，他们要做“正直的纳粹”。布赫夫妇这种自我评价听起来很奇特，但当时很多人都抱有同样的想法。这些人将纳粹主义视作宗教，把希特勒奉为英雄，虽然认同纳粹的目标，但并不赞成纳粹的方法。他们还将自己的盲目称为理想主义。同时，他们仍按传统的道德规范精心教育子女。布赫夫妇也很重视传统价值观，他们教育下一代要勤奋、遵纪守法、诚实，对孩子的微小过失也要惩戒一番，同时却又有意对纳粹主义的极端罪恶视而不见。在家里，布赫绝不容许任何人行为不端，并极为重视待人接物时要讲规矩。与此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子女们宣扬：“犹太人不是人，而是一种腐朽现象。就像细菌侵入朽木破坏其组织一样，德意志民族因为‘三十年战争’<sup>①</sup>失血过多，从内部开始腐败，这以后，犹太人才得以混入德国人中间造成危害……”

布赫家的两个女儿都有意从事社会公益性的工作。布赫让格尔达受了幼师教育，她的妹妹洛尔则当了护士。

1927年，格尔达的父亲当上了纳粹党调查和调解委员会（简称USCHLA）主席。他的朋友达雷对此写道：“……希特勒对党内不断的内讧头疼不已。那些小人物之间的仇怨不断使党内的很多丑事曝光，而且那些敌对党的报纸又总是津津有味地介入这些争斗。没有人愿意掌管调查和

<sup>①</sup> 指1618年至1648年在欧洲以德国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



调解委员会。希特勒实在没办法，就请布赫出头。布赫断然拒绝，希特勒一再坚持，最后布赫暂时表示同意。希特勒当时口头上满足了他提出的所有条件，后来又一个都没兑现……”布赫干仲裁党内争端这项工作，吃力不讨好，树敌很多，他的女婿博尔曼后来就成了他的死敌。

1928年至1929年岁序更替之际，布赫一家到王冠马戏场参加纳粹集会，听“元首”发表讲话。在那里，19岁的格尔达对冲锋队的机关工作人员、普通纳粹党员马丁·博尔曼暗暗许下了芳心。博尔曼那时官小位卑，负责冲锋队救济金管理处工作，该处责任是照顾那些在殴斗中受伤的冲锋队打手。希特勒在场的时候，博尔曼总是十分殷勤，一副讨人喜欢的模样，褐色的眼睛放射着天真无邪的光芒，这些给格尔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格尔达本人长着一副时髦的“格雷岑<sup>①</sup>身材”，身高苗条，相貌迷人，完全符合纳粹理想美女的形象。但她钟情的这个男人，脑袋圆圆的，身材又肥又胖，按照汉斯·君特教授在其纳粹种族经典论著中定下的标准，必属“劣等种族”无疑，而且比她本人还几乎矮上一个头。但这些格尔达都觉得无所谓，让她难过的是，因为自己羞涩腼腆，博尔曼没能察觉这个党内高官千金对他脉脉含情。格尔达随即恳求父亲把这个雄心勃勃的同事邀到家里来坐坐。但布赫是虔诚的新教徒，对此曾有些犹豫，因为博尔曼在党内名声并不太好，大家觉得他举止粗鲁，肆无忌惮，和很多女人关系暧昧。尽管如此，恬静腼腆，经常一个人痴弹着吉他或者读书的格尔达，还是和这个说话大声大气的职业党棍见了面。很快，博尔曼便成了布赫家的常客，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开着自己的“欧宝”车来找格尔达。做父亲的担心女儿的名声，对博尔曼以前的经历做了一番秘密调查，调查结果并没有消除他的不良预感。

马丁·博尔曼1900年6月17日生于哈尔伯施塔特，父亲是军队乐师和邮局职员，儿子三岁时他就过世了。马丁由继父养大，继父是个银行经理。1909年，继父移居维也纳，马丁在那里上了实科中学，但读到八年级还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按马丁·博尔曼自己的说法，他辍学的原因是自愿参军。他确实于1918年在一个野战炮兵团正式入伍。博尔曼后来做了纳粹高官，人们还私下议论，说他那时在炮兵团当的不过是“马夫”，也

<sup>①</sup> 歌德名著《浮士德》中主人公的女友。



就是军官的勤务兵。

博尔曼缺少学校教育和军人荣誉倒也罢了，其准岳父大人更担心的是他在一战结束后的活动。那时，博尔曼在梅克伦堡省帕尔希姆附近的赫尔茨贝格贵族农庄里干活。由于努力工作，博尔曼很快升为不可或缺的监工，他还兼管驻扎在农庄里的非法右翼组织罗斯巴赫自由团。这是一帮退役军人组成的乌合之众，在庄园主冯·特罗伊恩费尔斯先生这里安身立命，平时的任务是守卫开放的边境地带，防范布尔什维克从波兰过境入侵。

当时类似的自由团还有很多。后来纳粹党在吸收新成员时很看重这些自由团的老兵。如果没有“卡多案件”的影响，找一个有这样经历的人做女婿，在纳粹党人看来那是再好不过了。所谓“卡多案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23年5月31日，一群自由团成员，包括后来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官的鲁道夫·赫斯，把他们队伍中有叛徒嫌疑的瓦尔特·卡多引到事先埋伏好的地方，残忍地打死了他。博尔曼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施暴，但人们认为他在幕后策划组织了这一罪行。1924年3月17日，博尔曼作为“造成他人重伤致死案的从犯”，被判一年监禁，那时他二十四岁，在狱中靠糊纸盒子来打发光阴。

布赫这么一个“正直的纳粹党人”兼党内法官，不可能赞成这种政治谋杀。1929年4月，博尔曼正式向格尔达求婚，做父亲的不过是违心地同意罢了。然而，母亲的态度大不相同，由于非常崇拜马丁·路德，她很高兴有一个“马丁”作为家庭成员。

订婚显然也为格尔达加入纳粹党提供了合适的时机。格尔达为成为纳粹党员感到骄傲，她的党籍序号是120112。

1929年9月，格尔达和博尔曼在佐尔恩举行了新教传统和纳粹新花样相结合的婚礼。新娘身披洁白婚纱，头戴花冠。包括博尔曼母亲安东妮在内的在场妇女都身着盛装，轻衫薄裙的伴娘头上插着花朵。出席婚礼的男人则是清一色的褐衫、马裤、高筒靴，臂上佩带卐字袖标。希特勒和秘书鲁道夫·赫斯担任证婚人。希特勒还特示恩宠，提供他自己的大“奔驰”轿车送新人前往教堂。在正式的婚礼照片上还能找到其他几个纳粹名人，其中有在1934年“罗姆暴乱”中被除掉的慕尼黑冲锋队头目施奈德胡贝尔、冲锋队最高指挥官普菲费尔·冯·扎洛蒙，还有担任纳粹党法官的格尔达父亲，以及博尔曼的兄弟阿尔伯特，此人很快就进了“元首私人办公



厅”。

纳粹党内的小宗派对这桩婚事窃笑不已。普遍的看法是，来自魏玛的无名小卒博尔曼入赘这么一个“纳粹名门”，完全是出于个人野心。这种猜疑并非毫无根据。时至1929年，希特勒不仅更加看重布赫，而且还让他当上了国会议员。希特勒是布赫家的常客，成为布赫家的一员，自然就有了一条接近纳粹党主席的捷径。

可这对年轻人选择建立家庭的时机却是再糟不过。1929年11月13日，“黑色星期五”到来，纽约股市暴跌，引发了最大规模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德国也未能幸免。二人婚后头几年一直为没有钱花犯愁。虽然如此，博尔曼庆幸，身为纳粹救济金管理处的负责人，他决不会加入人数已逾三百万的失业大军，但是纳粹党财务主管施瓦茨却有些吝啬，党员们只能领取微薄的薪水。父母资助格尔达接受了良好的职业教育，认为尽完了义务，并没给她嫁妆，博尔曼自己则一文不名。

居住在有“政治运动之城”之称的慕尼黑市内，开销太大，于是博尔曼和格尔达搬到了城南的格林瓦尔德。1930年4月14日，格尔达生下长子克伦齐，希特勒做了孩子的教父。为表示对希特勒的敬意，男孩起名叫阿道夫·马丁。因为新教洗礼要求孩子的教父也是新教徒，所以克伦齐是由希特勒秘书赫斯的妻子伊尔莎抱着受洗的。后来格尔达又生了九孩子，有一个夭折。

克伦齐在博尔曼夫妇结婚七个月的时候出生，这就更让爱相互窥探的党内同事怀疑，博尔曼为了“攀高枝”，诱奸了布赫天真幼稚的女儿。博尔曼自己则称这是一次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早产。“父亲以为（阵痛）是因为得了‘盲肠炎’。”几十年后，儿子自己是这么说的。

格尔达再次怀孕的时候，全家在伊萨尔河谷的伊金租了一幢小房子住。格尔达全力操持家务，博尔曼到慕尼黑舍林街纳粹党总部上班，每天来回奔波。博尔曼因此总是担心他会错过一些重要机会，至少，每天深夜黑克咖啡馆的聚会他是无论如何也参加不了的。在这家咖啡馆里，一帮忠实随从总是围绕着“元首”，从他所说的话里得到慰藉和鼓励，有时还能得到职位，还可以对重要的决定施加影响。博尔曼想邀一些党内朋友到伊金的家里来坐坐，但结果也很不理想。博尔曼总对妻子粗鲁无礼，客人对此很是气愤。博尔曼家的一个客人曾经写道：“布赫的女儿里里外外就跟

她父亲一样正派、内向、有教养，偏偏和一个最粗暴的男人绑在了一起。此人还把在外人面前像对待牲畜一样侮辱自己的妻子当成一种乐趣。我实在看不下去，从1931年起我也不准我太太再到博尔曼家去了……”

一开始，格尔达操持家务的本领相当有限。她不喜欢做饭，于是就托给婆婆。博尔曼的母亲安东妮常常从魏玛跑到儿子家来，一住就是几个月，而且还总爱管事。格尔达的主管领域一直是孩子的教育，并为此投入了火一般的热情。她给孩子讲童话故事，弹吉他，唱民歌，亲自为他们缝制衣服，做手工的小玩意儿。1931年7月9日，格尔达再次生产，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埃伦加德和伊尔莎。

1932年底，博尔曼手下已经管了一百多个干部和职员，自己的家境却没有丝毫改善，好在那时纳粹党部已经把普拉赫纳粹居民区宗南韦克11号分给博尔曼家住。1933年，格尔达又怀孕了，那时希特勒当上了帝国总理，纳粹党正在颁布一系列紧急命令为自己捞权。格尔达快要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家里的佣人要丢下她不管了。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女佣人偏偏要在7月1日辞职。她说到时她必须回家，因为奥地利封锁边境，她父母的山里农宅一下子住满了夏季的游客，需要她回家帮忙……”格尔达只得赶快另找女佣帮忙看孩子和干家务。她给一个求职者回信说：“亲爱的安娜丽丝小姐，非常感谢你从奥滕赫芬寄来信和证明材料。不过，我更希望你本人能在7月1日到我这儿来。给你十五马克零用钱可以吗？如果我丈夫以后能给你更多的工钱，他会这么做的。但是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还不行……”十五马克绝对是当时的最低工资，不过应聘者食宿不必花钱。

格尔达向新来的女佣仔细说明了各个孩子的特点，交代了应做的家务，还诉说了双胞胎女儿之一夭折等等几年来内心的苦楚。格尔达性格真诚，受到大家的赞扬，连她婆婆安东妮·福东博恩都和她挺合得来。这位守寡的婆婆可是个霸道的女人，还总爱直截了当地发表意见，孩子们都怕她。纳粹讲究尊重母亲，但马丁·博尔曼对母亲的态度，从他给“最亲爱的妈妈”的一封信里就可以看出来：“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要操心我们的家务、孩子教育这些事情……管家务、怎么待女佣和教育孩子，得让格尔达按我的指示办。你动不动就爱批评别人！此外，让我吃惊的是，过去这几年，你说话和写信竟如此贬低绍克尔（纳粹劳动力分配全权总代表）和



戈培尔！我迫切请求你，恰恰在目前这个时候要克制一下，不要再这样批评人了！也不要再对我本人、我的指示、我的房子，还有我的家务事，再说三道四了。”

战争期间，纳粹提出了“先胜利，再游历”的口号，于是博尔曼便粗暴地要求母亲待在家里，不要外出旅行，那时博尔曼夫妇已经能雇得起很多佣人了。母亲虽然顺从了儿子的旨意，但又让儿媳转告他说，反正她也走不动了，因为“普拉赫单调无聊的生活已经让她生病了”。身为纳粹党法官的退役少校瓦尔特·布赫也被专横的女婿气得半死，几年内两人不断发生争吵，而格尔达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丈夫一边。她在给丈夫的信中说：“我对父亲在工作上给你制造麻烦，总让你生气感到惊讶。”她认为，自己必须为父亲道歉。格尔达还强调：“虽然有时我也挺同情父亲，但从1932年起，我和他的关系已经变得很不自然了，这也是因为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我（给父母家）打电话也总是找应该能单独找到母亲的时间，因为我对母亲非常依恋，这是很自然的……”

1935年发生了一桩事情，布赫和博尔曼从此成了死敌。作为纳粹党法官，布赫头脑过于简单，没有认识到他的职责实际上是掩盖党内的弊端。他控告东普鲁士纳粹党头目埃里希·科赫贪污和搞恐怖活动。这件事让希特勒很不高兴。对希特勒来说，只要对纳粹党有好处，他倒乐意任凭手下干将搞阴谋诡计。博尔曼受命告诉他的岳父以后不要再这么干了。博尔曼写信告诉妻子：“如果1935年和1936年那时候你父亲能听从我受元首之托向他传达的指示，他自己和别人就都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快了。但他偏偏怀疑元首是否真有这样的指示，偏偏是你父亲，愣把我当成了骗子！”他可知道怎么报复，达雷在回忆录中说：“博尔曼采取了特别绝情的方式打击布赫，他连格尔达的母亲也不让与外孙、外孙女来往。这一切的确击中了布赫夫妇的要害。布赫对世事，对希特勒，对党都感到迷惑不解。他越来越沉默寡言，脾气开始变得很奇怪……”格尔达从此再也没有踏进娘家门，仅仅偶尔给母亲打个电话而已。不让见那么多外孙和外孙女，布赫夫人非常难过。1936年，博尔曼夫妇已经养了五个子女：克伦齐（阿道夫·马丁）、伊尔莎、伊姆加德、鲁道夫-格哈德以及刚出生的海因里希·胡戈。新生儿的教父是大名鼎鼎的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就是他的“海因里希伯伯”。





那时博尔曼夫妇已经拆掉了位于普拉赫“阳光之角”的小房子，在原址上重建了一幢气派的新居。新房子既能容下他们这么一个大家庭居住，也能为党的事业派上用场。格尔达负责监督佣人们做好家务。身为女主人，她也知道珍视希特勒私人来访这一巨大荣耀，这是希特勒对其忠实助手表示嘉许的一种方式。博尔曼的家曾经成为重要的政治舞台。希特勒和里宾特洛夫 1938 年 9 月曾在普拉赫筹划与英国首相张伯伦会晤，同时还确定了“四方会谈”（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法国总理达拉第、张伯伦和希特勒）的指导方针。“四方会谈”做出的决定后来作为《慕尼黑协定》载入史册。这一协定试图以向希特勒让步为代价拯救和平——“一代人的和平”<sup>①</sup>，但最后以失败告终。

1938 年 11 月 9 日所谓的“水晶之夜”，大批犹太人的教堂和住宅遭到破坏和洗劫。这本来为布赫恢复自己在纳粹党内严重受损的声誉提供了机会，因为纳粹为了平息公愤，打算把几个参与抢劫的人送上法庭。“但是，如果元首不先处置戈培尔和几个省党部负责人，布赫就拒绝审理此案。布赫无非就是不愿意只打几个苍蝇，而让老虎逍遥法外。吵得很凶！”达雷在其回忆录中如是记述。格尔达的父亲这下彻底失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他痛恨的女婿施加了影响，布赫才没有受到更严厉的报复。由于博尔曼出面说情，布赫仅仅受到了冷遇。希特勒最终命令布赫以后审理任何一桩案子都得先征得女婿的同意。之后，布赫公开称女婿为“骗子博尔曼”。这位纳粹最高法官后来又公开表示，通奸行为不符合纳粹世界观，这便让这一家人的窝里斗达到高潮。

1940 年，博尔曼一家迁居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萨尔茨贝格山区，在此之前那里一直是他们的消夏之所。博尔曼搬家，是为了方便现场监督由他负责的一大片纳粹居住区建设。20 年代，希特勒在上萨尔茨贝格买下乡间小别墅瓦亨费尔德后，这个山间的世外桃源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人数从二百人剧增至五千人。眼见一大片建筑工地崛起，人们很难想像，那里曾经是个静谧的以清新空气著称的疗养地。多年来，上萨尔茨贝格的建筑工程一直在不分昼夜、不计工本地进行，直到战事发生才中断。希特勒的房子被改造成富丽堂皇的贝格霍夫，1936 年 6 月竣工。此后那里又建起了

① 张伯伦语。



纳粹达官要员的别墅、纳粹党部办公楼、党卫军营房、后勤人员驻地、运动场、宾馆、各种附属建筑、植物温室、公务用车停车场、剧院、影院，还有一个养马场。博尔曼被当地人戏称为“上萨尔茨贝格山神”。他起先住的是胡德勒公馆，后来家里人口越来越多，就又占用了以前的赛茨儿童疗养院，并花巨资对这座巨大的两层楼乡间别墅进行了装修。房屋正面朴素的木板外墙掩盖了内部的奢华，比如里面专供孩子使用的浴室，浴缸就有两米乘三米半之大。一个雇员曾经透露：“那些昂贵的地毯全是特制的。你可以放心地说，当地没有一个暴发户能买得起那种东西。”

格尔达带着孩子守在上萨尔茨贝格家里，丈夫则经常在外奔波。战争开始后，博尔曼时刻不离“元首”左右，陪他来往于各个元首大本营之间。随上司回家后，邻居又会看到性格暴躁的博尔曼冲孩子大叫大嚷，为一点点小过失也要踢打孩子。大儿子马丁挺护着父亲，他曾说：“父亲并不是个爱打人的人，他就是脾气不好，容易发怒。”某个孩子显出对宗教感兴趣，博尔曼也予以惩罚，不让他们再去上宗教课。他本人和太太已一道于1934年发誓不再信奉新教，私下里他也总是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做对，态度相当偏激。

1940年10月，格尔达给从前的一个女佣写信，描述了她当时的境况（供外人看的）：“……因此，我要给你说说每个孩子的一点儿情况。克伦齐（阿道夫·马丁）长成了个子高高的大孩子，已经在费尔达芬国社党<sup>①</sup>办的中学上学了。伊尔莎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公立小学上三年级，高兴的时候还能帮我不少忙。比她小一点儿的伊姆加德在上二年级……她喜欢帮兄弟姐妹做事，很乖。鲁道夫-格哈德是老四，过了复活节就要上学了，是个快活的小捣蛋……他后面是海因内尔（海因里希·胡戈）……大方得很，才四岁小嘴就能说得要命。1938年我们又有了小爱娃……小丫头活泼可爱，对每个人都友好，一点儿也不认生，大家都喜欢她。再就是刚生的格尔达小妹妹。如果我丈夫不在家，她就是家里的中心人物……一个可爱的小宝贝儿……”

1941年5月10日，“元首”的副手、博尔曼的顶头上司鲁道夫·赫斯独自一人驾机偷偷飞往苏格兰，自作主张想与英国进行和谈，结束战争。

<sup>①</sup> 纳粹党。

第二天，消息传到上萨尔茨贝格，希特勒暴跳如雷，立即怒气冲冲地召见了博尔曼。很快，谈话便涉及到一个尴尬而危险的问题：博尔曼身为赫斯的副手，是不是“这一疯狂行动的同案犯”？但博尔曼为自己排除了任何可能的疑点，并建议向公众解释说，赫斯的突然失踪是因为精神病发作。这件事在博尔曼家里也引起了激愤，因为赫斯既是博尔曼的上司，也是朋友，而且他和太太分别是博尔曼两个孩子的教父和教母。如今，这两个孩子还用着可憎的叛徒和他失宠的太太的名字。为表达对赫斯夫妇的蔑视，博尔曼夫妇立即给孩子改了名：鲁道夫改叫赫尔穆特-格哈德，伊尔莎改名叫艾可，他们家还与伊尔莎·赫斯断绝了来往。这一系列效忠行动很快就得到了回报。5月12日，希特勒下令：“以前党的副领袖办事处从现在起更名为党办公厅，直属我本人。你们的领导还是中央领导人<sup>①</sup> 马丁·博尔曼同志。”

格尔达的丈夫由此成了纳粹政权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博尔曼在担任纳粹党办负责人和后来担任元首秘书期间，主要是在幕后发挥作用。他从不发表演讲和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还自夸没有几个人认识自己。有一次，格尔达寄给他一本有关勋章和奖章的书，博尔曼在给妻子的回信中写道：“……勋章和名声一样，并不能反映实际成就。比如莱（罗伯特·莱博士，德国劳动阵线领袖），人人都认识他，但我有意不让自己像他那样出名……”博尔曼完全满足于作为“褐衣主教”<sup>②</sup> 操纵官僚权力机构，并在暗中悄悄地、阴险地要阴谋诡计。后来他权势越来越大，最终甚至操纵了希特勒本人。权力最盛之时，博尔曼就像一堵墙一样将“元首”与周边环境隔离开来。他掌握了“向元首报告权”，并有权决定谁可以面见希特勒。此外，递送给这个大独裁者审阅的文件也由他筛选。

像丈夫一样，格尔达也不去出风头。看起来她一心只管柴米油盐和教育孩子，从一开始就处处对丈夫百依百顺。希特勒本人对手下干将这位长相漂亮又从不惹是生非的妻子非常欣赏，格尔达简直是纳粹理想女性的完美化身。她经常应邀去贝格霍夫和希特勒及其亲信们一道共进晚餐，而且

<sup>①</sup> “中央领导人”是纳粹党等级制度中仅次于“元首”的二级负责人头衔，再往下分别是省党部领导人、县党部领导人、地方党小组领导人、基层党组织领导人和街区党组织领导人等等。

<sup>②</sup> 西方一些语言用“灰衣主教”一词指代幕后操纵者，因褐色是纳粹的标志色，故作者在此称博尔曼为“褐色主教”。



夫妻两人总是坐在那个固定位置——希特勒的对面。她给其他客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朴素、有点胆怯的家庭妇女”。纳粹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家只能在上萨尔茨贝格见到她。她经常和希特勒亲信的太太们一道坐在壁炉旁，整个晚上一句话不说，一副孩儿他妈的模样。她这样倒让希特勒特别尊敬地待她。”旁人总见格尔达身穿乡下女人的传统衣裙，大家还觉得，格尔达的丈夫并不喜欢她在客人们聊天的时候插嘴。

格尔达因此总是默不作声地聆听“元首”的独白，事后还满心钦佩地和丈夫讨论。博尔曼则时常问一些简短问题，还很会找机会插科打诨，引导希特勒发表那些他事后可以用做“元首指示”的言论。格尔达还能时不时地把孩子们也带到贝格霍夫去，参加“元首生日”庆祝或新年招待会。希特勒会拿出可可和糕点招待这些又乖又可爱的小家伙们。当然，他们也要充当理想的道具，让摄影师拍几张主题为“元首是德意志少年的好朋友”的宣传照片。

那些重大活动，比如纳粹首届党代表十周年庆典招待会，博尔曼大多是一个人去参加。人们不清楚是他有意不带太太还是太太自己不喜欢参加社交活动，反正肯定不是因为太太的长相。格尔达脸形端正，鼻子纤小挺直，还有一头华美的秀发，被视为古典美人。皮丹教授以自然主义和纳粹规定的艺术风格给她画了一幅肖像，甚至还在一次大型德意志艺术展览中展出，受到纳粹艺术爱好者的赞誉。这幅画后来挂在施卢赫湖畔博尔曼家中，至今仍为其家人收藏。当时希特勒甚至还打算将来在林茨建“元首画廊”以后，把这幅画放在里面展览。

博尔曼夫妇自己几乎不搞什么社交聚会，因为党办主任大人更喜欢自娱自乐。博尔曼家在普拉赫的那幢住宅，当时主要用来客人留宿，偶尔也供“元首”下榻。博尔曼经常在那里设宴，邀请希尔德·克拉尔、玛丽卡·勒克和汉西·克诺特克等电影明星跳舞、喝酒和欣赏音乐。格尔达则相当与世隔绝，仅与孩子们和佣人为伴。博尔曼在“山”上滥施权柄，动不动就没收别人的房产，因而相当不得人心。众人虽然没让他太太直接感受到这一点，但很多人都觉得，和博尔曼太太还是少打交道为妙。博尔曼和住在上萨尔茨贝格的纳粹要员们，特别是戈林，早就结仇了。虽然两家住得最近，博尔曼也不准格尔达与戈林的太太艾米交往。在征用挖坑道的工人

服兵役问题上，纳粹军械部长施佩尔与博尔曼也有很深的过节，两人的太太自然也不会交上朋友。身为积极、坚定的纳粹党人，格尔达一点都不喜欢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因为爱娃毫不隐讳自己对纳粹政治和目标的冷漠。格尔达比较欣赏女建筑师格尔蒂·特罗斯特，以及纳粹建筑师和雕塑家阿尔诺·布雷克尔的太太米密娜。她还带孩子到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情妇海申（黑德维希·波特哈斯特）那儿串过门儿。“海申”让小客人玩由集中营犯人手工制作的精美玩具，领格尔达参观自己的新居。格尔达对那里印象很好。她在1944年9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下午在施内温克一勒恩过得很愉快。那儿变得很漂亮，很实用……”不过，所谓实用的东西中竟然还包括人皮伞和用人的大腿骨刻制成的椅子。格尔达告别时，女主人送了她一件特殊的礼物做纪念：一本在人皮上印制的《我的奋斗》。小马丁·博尔曼还记得，母亲见到这件礼物大吃一惊。

住在上萨尔茨贝格的纳粹名流的太太们，就像博尔曼家在伊金和普拉赫的邻居一样，看不惯博尔曼虐待妻子。博尔曼恬不知耻，几乎就在妻子眼皮底下和年轻的电影女星们发生暧昧关系。其中和他最要好的，就是德累斯顿国家剧院美丽动人的女戏子曼妮娅·贝伦斯，她还主演过电影《浴室里的苏姗娜》和《胜过法律条文》。博尔曼与曼妮娅的风流史持续了几年之久。他把女明星领到普拉赫和上萨尔茨贝格家里，还为她定做了一个胸像，交给太太放在家里做摆设。

人人都同情格尔达，以为她不得不默默认命，一定痛苦不堪，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纳粹社交界的正统妇人们可能会感到震惊，格尔达的确不仅不反对丈夫有外遇，而且还鼓励他这样。博尔曼夫妇的私人通信（当时绝不会想到会公开发表）可以说明这段不同凡响的纳粹婚姻的内情。博尔曼在给太太的信里详细描述了征服曼妮娅的过程，格尔达不仅夸奖丈夫，还帮着出主意。她对丈夫这次和其他艳遇都感到由衷地高兴，同时又对丈夫爱自己深信不疑。“我真喜欢曼，所以绝不会生你气的。孩子们也都喜欢她。她做家务也比我强得多。上次她到普拉赫，帮我把那一整套白瓷餐具包好装箱，运输中一件都没有碎。”

博尔曼、格尔达和曼妮娅这三人简直可以说是心心相印。博尔曼有封信是这么写的：“我的小姑娘！我刚和曼（妮娅）通了话。她问你生产是否顺利，还一再说，她曾经怕得要命。我跟她说她真是个小羊羔。”



我让她早点儿再来我们家。如果她能在家多住一些时候，我回来时会见到她的！”

女明星后来不得不到兵工厂参加劳动，因此叫苦不迭，她情人的太太就专门打电话安慰她。格尔达在1944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我又给曼打了电话。我觉得参加劳动对她相当有好处。她就是有一点儿担心，怕自己劳累过度，剧院不要她了……我劝了又劝，说劳动劳动只会对她的身体有好处……”

格尔达觉得，表现非凡的大度是一个“正直”的纳粹党人应尽的义务。她早就对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纳粹政权的前景忧心忡忡，一直在思索德国人的未来。她坚信，只有彻底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才能确保德国人的生存，为此，她个人愿意做出任何牺牲。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这么好的姑娘（指博尔曼的两个情妇）不生孩子真是大不幸。你和曼（妮娅）可不能再这样了。你只须注意让曼在这一年怀上孩子，我在来年，这样，你身边就总能有一个行动自如的女人。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湖边的家里（施卢赫湖）一起照看，这样，我们两人中没怀孕的那个就可以一直在上萨尔茨贝格，或在柏林陪你……”

太太提出的这个革命性的设想，博尔曼很难适应。他觉得，还是和情妇姘居麻烦能少一些。他尤其怀疑，太太是不是真能和情妇和平共处。但是，格尔达已经在寻找合法的解决办法，要废除一夫一妻制，引进“大众非常婚姻”制度。这种想法的出发点是，战后每个“优秀”男人可以依法拥有几个太太。为将曼妮娅、博尔曼和她本人之间关系合法化，格尔达还设计了几份声明书的样本寄给丈夫看。其中一份声明是这样写的：“我，格尔达·博尔曼，婚前姓布赫，同意丈夫与曼缔结大众非常婚姻的决定，并承认这一关系与我们自己的婚姻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声明中还说：“如果妻子一方拒绝同意，有权控告丈夫通奸，并提出离婚——如目前法律所规定的那样，以便享有离婚妇女的所有权利，被告随即可与另一名妇女结婚。你觉得这主意怎么样？孩儿他妈。”

博尔曼后来起草了一份题为《保障德意志民族未来》的研究报告，并把草稿寄给太太，让她提意见。格尔达很快作了答复。1944年博尔曼正式提出，为国家利益考虑应允许重婚，每个健康、“可敬”的男性社会成员应有权拥有一个或多个配偶，国家予以承认，并制订有关规定，保证偏房

能与正室享有同等生活条件，有自己的家，先生每两周一次去探望她。

然而，格尔达又提醒丈夫考虑采取措施，防止有人以多生孩子为借口，滥用重婚的自由去放纵情欲。她写信告诉丈夫：“这只会带来不幸，而且这种情况下生的孩子对社会毫无益处！”格尔达还从伊斯兰教得到了一些启发，“孩儿他爸，我最近经常想到善于制订法规的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先知）。他真是聪明绝顶，我想，是不是可以以现代的方式借鉴一些他的想法？……他认为一夫多妻制绝对必要，否则怎么能有足够的人去当兵打仗？这再次证明，两个基督教会（新教和天主教）多么迂腐，它们认为一夫多妻是落后、野蛮的制度。”

博尔曼太太还主张让私生子享受同等的合法权利，并坚决反对任何歧视私生子母亲的行为。她本人心甘情愿与丈夫的女友生活在一起。此外，格尔达觉得，为了弥补战争带来的损失，多让前线士兵休假是个添丁补员的有效办法。她还希望文学和电影中禁用“通奸”一词，并认为很多父母对子女管教不力，应该由家庭式的学校代替父母教育子女，确保纳粹儿童教育的质量。

博尔曼夫妇没有想到，他们的私人信件有朝一日会公之于世。战后公布的博尔曼夫妇通信，不仅从知情者的角度给纳粹政策加了注解，而且人们还得以一窥这对夫妇私生活的内情。博尔曼给太太写信爱叫她“孩儿他妈”和“好姑娘”，太太则答以“孩儿他爸”。两人间的来往书信清楚表明，矮墩墩的博尔曼有多么喜爱身材颀长、面容秀美的太太，两人的婚姻生活多么幸福美满，这都是外人意想不到的。

1944年9月1日，博尔曼在一封信里写道：“宝贝老婆，你让我多么富有，不是说钱财，这不符合我的纳粹信仰，而是那些活生生的财富——你为我生的孩子，还有你的深情厚爱！我向你鞠躬，就像日本人对天皇那样！爱你！爱你！爱你！”然而在外人面前，博尔曼总是慢待妻子，态度之粗鲁让同事都尴尬万分。他经常用嘴巴打个呼哨命令太太快过来，“快点儿！”是他的口头禅。但私下里情况却完全两样。博尔曼曾充满感情地写道：“谁是我们的一切？谁是我们的至幸？谁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谁是我们最美的珍宝？孩儿他爸和孩子们都会说：是妈妈！”

在庆祝两人结婚十五周年的信中，博尔曼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一是因为我有机会能为元首效劳，二是因为我拥有你！”因为“目



前形势（1944年9月）很糟”，他期盼1945年8月早日到来。博尔曼本人坚信无神论，为了安慰太太，他只想起了一句话——“苦到极处时，上帝就显灵”。格尔达很少生病，有一次却因为感冒发烧卧床不起。博尔曼的反应简直歇斯底里，每天都给太太写信，说最温柔的话语：“我如果能在你身边，给你爱抚，喂你吃饭，照顾你就好了！说真的，我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你一生病，最亲爱的，我更明确感受到你的重要！假如我不怎么爱你，我就不会为你这样担心。我要是能守在你身边照顾你就好了，我要给你端茶倒水，及时为你披衣，以免你着凉，为你敷湿毛巾，让爱把你包得严严实实，以至病自己就好了！”还有一次，博尔曼又痴心地对太太说：“你要知道，你可是最奇妙、最棒的宝贝妈妈、宝贝姑娘，美丽如画，漂亮绝顶，简直棒极了！”

这么一副温存的丈夫形象，与那个对女秘书拳打脚踢，为防止量刑过轻而向“人民法庭”<sup>①</sup>派观察员的政客相比，不啻天壤之别。一方面，博尔曼关怀太太之情如此令人感动，另一方面，他又曾以“从事叛国颠覆活动”为由，将已被希特勒赦免的雷斯蒂图塔修女（海伦妮·冯·卡夫卡）改判死刑。

格尔达·博尔曼本人也是个多面的女性。同时期的人一致认为，格尔达秉性温柔，温雅有礼，感情细腻，接人待物周到得体，总是把周围人的甘苦放在心上。她从未大叫大嚷，从不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在朋友和熟人面前，她虽容不得别人对自己的纳粹信仰有半点怀疑，但很快又会转而聊起小孩的教育和家务琐事。格尔达死后，因为她曾是纳粹党人和希特勒秘书太太，非纳粹化法庭还是对她提出了起诉，但证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她的好话，有几个干脆称格尔达为“上萨尔茨贝格的天使”，让法官们目瞪口呆。

只有给丈夫写信，格尔达·博尔曼才放下矜持，向志同道合的伴侣袒露胸怀。格尔达是狂热的纳粹党徒，颇有政治素养，她为丈夫设计骇世惊俗的纳粹未来蓝图，与他讨论纳粹文学，悉心探究纳粹主义的原则性问题。和博尔曼一样，她本人也认为犹太问题应该用暴力方式解决。格尔达还很爱听贝希特斯加登县县长施泰德勒等人的政治报告，陶醉不已地记下

<sup>①</sup> 第三帝国时期的所谓法庭，一般由两名专职法官和五个从纳粹党官员、党卫军和武装部队中选出的人组成，审判通常秘密进行，判决不得上诉。





了以下这些幼稚的言论：“他将全人类划分为三种人：一种是终生以土地为伴的务农者，一种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再一种是过着寄生生活的商人。以土地为伴的务农者，代表是我们、日本人和中国人，只有这些人才有真正的文化，懂得要保护祖先的遗产，懂得自己的劳动将荫及子孙后代。他们把全部心思都倾注于播种和收获……第二种人游牧民族生存于广袤的空间，他们无意保留私有财产，将脚下土地充分利用之后，又会向别处迁徙，因此他们没有城市。对他们的男人来说，最宝贵的财产就是胯下之马。他们游荡于旷野之间，侵犯其他民族，洗掠一空便扬长而去……第三种人是那些商人，他们最初栖息于地中海沿岸。危险的就是那些犹太人，因为他们一心想统治世界……商人目光所及只有金钱和一切值钱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劳动是惩罚，他们只会剥削他人……如今商人和游牧民族缔结了联盟，想要奴役务农者，企图统治世界……我们必须站起来，像一道坚固的大堤一样拦阻这股洪水……”这番幼稚的谬论给格尔达留下了深刻之极的印象：“用这种观点看问题，人一下子就认清了整个历史。人类历史从古到今都是这三股势力的争斗史。”

纳粹党办主任平素沉默寡言，对太太却无话不说。希特勒总部一有什么爆炸性的政治新闻，他很快就会打电话或写信告诉太太。如果不便写信，他也会告诉她，以后见面再细细道来。整个战争期间，博尔曼一直利用特派信使给太太带书和他电传的复本。希特勒对其亲信事事都要向太太汇报的习惯毫不知情。1944年8月13日，博尔曼写信告诉太太：“亲爱的小姑娘！这已是过去二十四小时内的第三封信了！以后打电话我们得特别小心了！我们已经察觉，加莱敌方士兵电台播出的东西，正是二十四小时前我们这里打电话向柏林汇报的事情……”

有博尔曼不时通报内情，不引人注目的家庭妇女格尔达可算是第三帝国消息最灵通人士之一，有些事情她比希特勒知道得都早。在上面提到的那封信中，博尔曼还告诉太太：“戈培尔博士今天提出建议，先关闭所有的剧院，把那些演职人员派到军工部门从事合适的，也就是不太重的劳动。这些你自己知道就行了。我今天或者明天就会让元首就此事做个决定！”“除非万不得已，此事别人知道得越少越好。”希特勒常常这样郑重地叮嘱博尔曼，但后者每天都不把这样的命令当回事。有一次，他冒险把希特勒的秘密行程透露给格尔达：“……明天，他要和少数几个亲信坐飞



机去维尼察（乌克兰境内的‘狼穴’‘元首大本营’）。不要告诉别人……”

还有一次，博尔曼冒着极大的风险告诉太太，他真想把对希特勒表示不满的“亲爱的海因里希伯伯”（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的“衣服扒下来”，就是说，让人把他抓起来。博尔曼甚至向太太详细透露希特勒的健康状况：“不幸的是，元首的身体现在不太好。你可别告诉别人。因为生气，他又犯了痉挛的老毛病，胃部痉挛，疼痛不已。据他说，简直疼得无法忍受……他身体好坏干系太大了！”第三帝国各大员搞的阴谋诡计是博尔曼夫妇经常谈论的一个主题。“帝国元帅（戈林）大动肝火……他生我气的原因是，省党部头头们在他们的航空报告中得出了令人不快的结论。元首……得到了这些让他尴尬的报告……”

1944年7月20日，东普鲁士的“狼穴”“元首大本营”中发生了一起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博尔曼自然也向太太详细通报了这件事的内情。“你想不到吧，竟然有人敢对元首下手！早在1939年，格尔德勒和卡纳里斯等人就已在策划……在一个找不到钥匙的保险柜中，我们发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整个西线的进攻计划已被泄露，可以证实已被送到了敌人手里。”格尔达在回信中说：“孩儿他爸，一想到叛徒们早在1939年就开始密谋，我就不寒而栗……那个家伙（施陶芬贝格伯爵）居然能把藏有炸弹的文件包放到那儿，这怎么可能……但愿你们能把那些还在暗地里忙活的家伙们都揪出来……孩儿他爸，如果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你事先对人人钉梢，后果真不堪设想。”

格尔达对战争的意义确信不疑，她总是劝丈夫振作起来：“你说元首身体不错，这比其他任何重要消息都好。总是传来让人沮丧的坏消息，但是只要元首还健康，大家就应该有信心。如今居然有人并不满怀热忱和希望地看待我们的士兵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战争，这让我真无法理解，但不幸的是情况就是这样……”格尔达·博尔曼总是认真关注着战事进展和所有重要的政治事件。她曾写信问丈夫：“海军方面有进展吗？波森<sup>①</sup>还能保得住吗？那些野兽（指盟军）还在妨碍我们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他们是自己的掘墓人！”萨尔省纳粹党部头目约瑟夫·比尔克尔猝死后，格尔达问丈夫：“这人是正常死亡吗？”她怀疑比尔克尔是被人利用细菌干掉的。

<sup>①</sup> 波兰波兹南市的旧称。

只有一次，马丁·博尔曼对太太发表的意见没有进一步表态。那回他对太太的反犹思想只是简单地赞扬了几句。博尔曼经常把希姆莱的报告呈递希特勒，他本人也被希特勒视作犹太问题的行家，支持对犹太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按理说他完全能够对太太的问题发表很权威的评论，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原因是必须对当时正在对犹太人进行的疯狂的种族灭绝严守秘密。1944年5月，平常温文尔雅的格尔达在信中写道：“疾病和肮脏的环境也不会对这些害虫造成丝毫的伤害。”为了进一步表明看法，她进而问道：“怎么能让它们少一点儿呢？”

格尔达的想法与纳粹党的路线完全一致。希特勒本人在“狼穴”中就曾说过类似的话：“你们谁都不许对我说：我们不能把他们丢到泥坑里去！”这里所说的犹太人“永远不会到战场上去流血牺牲，而是藏在安全的洞穴里操纵着一切”。格尔达担心，“如果我们不保持警惕，不再与他们作斗争，我们整个民族就会丧失生命”。

格尔达这种担心犹太人会在国际上搞阴谋的病态心理，根源还在其父布赫，他总是不遗余力地要将子女教育成极端反犹主义者。此外，阅读有关纳粹文学，又嫁了一个仇恨犹太人的丈夫，这些因素强化了格尔达的反犹主义思想。她相信，必须一再告诫人们警惕“世界犹太人”势力的影响。1944年5月8日，格尔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必须反复指明这种危险，戳穿它的各种伪装。首先必须使这项工作成为学校历史课的基本要素。这是我们教育民众时的首要任务……”此外，格尔达还没有忘记提及另一个问题，“因为现在（1944年）德国实际上已不再有犹太人了，将来犹太问题会显得无足轻重，甚至被淡忘。但是犹太人却会一直等待时机，以消灭刻苦、规矩、忠诚、勤奋地按照法律规定生活的日耳曼人”，因此，“如果命运让胜利属于我们”，德国人就必须“保持强硬和警惕，否则我们的孩子们就会无可救药”。

格尔达认为，当时没有“用我们的观点看问题的”合适的教科书，而且那些“白痴教师”也没有按照纳粹的意愿去教学生，因此格尔达就自己教孩子们关于“萨克森屠夫”卡尔大帝的历史。她在1944年9月12日致丈夫的信中写道：“今天我给艾可讲了卡尔大帝的历史。从卡尔大帝时代的历史中真是什么都能学到。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他的政策的后果。因为他，基督教以及犹太教才得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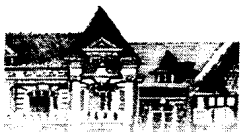
从1941年开始，博尔曼让他的副官、法律专家海因里希·海姆，把希特勒在最小范围内私下说的那些话都记下来。博尔曼把这本标有“机密”字样的“元首言论”集寄给了太太，并叮嘱她：“这些记录将来会极有价值，请务必妥善保存。”格尔达·博尔曼把这本让人能相当深入地了解希特勒心理和生活作风的手稿收藏起来，1945年逃亡时又把它打入包裹运往南蒂罗尔，手稿因此最终未被销毁。战后这本记录公开出版，书名叫《元首大本营里的独白》<sup>①</sup>。

在战争的第五个年头，博尔曼要求德国民众保卫德国的每寸土地，并且发布了鼓动德国人原地坚守的狂热口号。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着实为家人担忧，反复考虑如何把他们转移到某个安全的地方躲避战祸。后来，博尔曼委托他在上萨尔茨贝格的管家冯·胡梅尔，替家人寻找一个合适的藏身之所。1943年9月9日，他在致太太的信中写道：“我估计上萨尔茨贝格会遭到攻击。只有你们撤离这个头号危险区，我才会放心。”博尔曼给太太出了无数个主意，不断告诉她自己反复修改的计划，“你们住到黑森林去无论如何要比在山上安全。在山上每天都可能有敌机来轰炸。我真为你们担心，因为我们的房子在轰炸时绝对不安全。如果敌机投下汽油弹或磷燃烧弹，你们得赶紧跑出来，因为一旦中弹，整个木房子会一下子就变成巨大的火把……”

博尔曼夫妇在黑森林的施卢赫湖畔有幢从犹太人那里没收来的乡间别墅，当时他们在那里收留了很多从战区撤离的孩子。现在他们要迅速把这幢别墅改造成常住之所。“我们必须尽快把土豆、水果等东西运到施卢赫湖存起来。就上萨尔茨贝格的库存里拿！”格尔达一开始不愿意到乡间别墅那么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长住，但她丈夫却催她赶紧行动：“我不否认搬家会给你们带来某些不便……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得赶紧准备搬家……”

上萨尔茨贝格山上的地下防空洞早在1943年就已在全速扩建，博尔曼催促建筑队以最快速度施工。希特勒及其随从人员使用的防空洞建在岩石下面五十米深处，内有宽阔的通道和房间。博尔曼家和戈林家用的防空洞就设在隔壁，面积要小一点。博尔曼原计划这个巨大的地下防空洞系统能

<sup>①</sup> 英文版书名是《希特勒秘密谈话录》。



于1943年底完工，但建筑队告诉他，要到1944年圣诞节，他这个“上萨尔茨贝格山神”才能看到完成的作品。整个工程耗资巨大，中间又为修改很多错误设计花了不少冤枉钱，党内对此怨声载道，但是博尔曼借口“保障元首的安全”，根本不理这一套。

然而，最终博尔曼夫妇却弄到了一套面积达二百七十五平方米的豪华地下大套间，内设空调、厨房、大理石浴室，地上还全铺着木地板。当时德国平民百姓已明显感受到战争造成的供给不足。1943年4月初，随着第三十五个配给期的开始，德国人的食物定量再次被削减。然而，博尔曼的大家庭却未受到影响，因为战争一结束，人们就发现，纳粹党办主任大人家的地下室里，竟储存了粗略估计可供好几个人享用二百年的食品。

尽管如此，博尔曼还是认为孩子们健康的牙齿发育受到了影响，因此他总是在当时的“元首大本营”里孜孜不倦地搜集剩下的面包皮，装在所谓“面包头箱”里，派专人送往上萨尔茨贝格。孩子们成了父亲这种怪癖的牺牲品，为了坚固牙齿，他们必须啃父亲带来的这些硬邦邦的东西。

1944年10月底，格尔达失去了她敬爱的母亲。此前，由于丈夫禁止她与父母来往，格尔达只可以与母亲电话交谈。她给博尔曼写了一封报丧信，信中找到一点纳粹主义的矫饰，丧母之痛使她一改平常那种谦卑口气，字里行间透出的是淡淡的又明确无误的怨怼。信中格尔达也没有称“孩儿他爸”，而是：“亲爱的丈夫！……我妈去得太快、太突然了，我现在都根本没能回过味儿来……只有再过几个星期，几个月，我们才会真正体会到，母亲不在了意味着什么……你是不会承认的，但是她确实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亲爱的丈夫，如果我一辈子对你就像我母亲对父亲一样，那你就可以完全心满意足了。如果孩子们对我就像我们对母亲一样信任的话，如果他们爱我就像我们爱母亲一样的话，我就很高兴了……你想想，如果她总是在我面前抱怨既看不到孩子们，我又不去看她的话，我会多难受。而实际上，她一句怨言都没有……她默默地忍受了一切，因为觉得事情只能如此。”

1944年，格尔达这个模范母亲的功劳得到了表彰，纳粹党中央出版社在当年出版的年历上印上了一幅格尔达·博尔曼与其一大群孩子在一起的照片，还有一段内容相配的“元首”语录：“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如何不愿意限制儿童人数，相反，它决心提高本民族最自然的生殖能力。”



博尔曼夫妇是“帝国多子女者联盟”的成员。1943年9月18日生下福尔克尔后，他们已有了九个孩子。除此之外，有一次格尔达在上萨尔茨贝格山上的克尔施泰因茶馆，还因为大咯血导致流产。生了这么多孩子让格尔达很自豪，她也因此获得了“母亲荣誉十字勋章”。尽管如此，她还打算再生孩子，但这次准备选择更好的时机。1944年9月，第一批美军士兵已经越过德国边界，盟军已在制定战后对德国实施军管的方案。格尔达在当时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已盼着再有个孩子，一旦西线形势重新稳定，我就想再要一个。”为了将来生孩子的健康考虑，她还一再劝告丈夫戒酒戒烟。博尔曼可是个酒鬼和烟鬼，只有当着“元首”的面他才暂时放弃恶习。在向妻子解释为什么自己在希特勒面前不贪杯时，博尔曼编了个借口：“我喝一杯施泰因海格尔<sup>①</sup>，头就痛得要命。”

博尔曼的地位举足轻重，人们就想走他太太的路子。格尔达经常抱怨，自己家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女建筑师格尔蒂·特罗斯特就曾把她做的“贝格霍夫”扩建和整修设计方案送到了格尔达的手里。德国对美国宣战后，戈培尔下令禁演美国电影，为了这件事，甚至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都曾求到了格尔达头上。格尔达写信告诉丈夫：“爱娃打电话来说，如今没有戈培尔博士的允许就不许再发行美国电影。你能不能往柏林给他打个电话，请他还是给贝格霍夫送些美国片子。”

有一次，格尔达的一个熟人因为告密被盖世太保逮捕，格尔达也找丈夫为她求情。博尔曼这个搞政治的在德国遭人憎恨，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觉得万一自己死了，别人肯定会对他太太和子女进行报复，博尔曼自己就喜欢对别人这么做。害怕家人会自己受到株连，这种想法始终困扰着博尔曼，有时甚至达到了荒唐的程度。比如他就相信爱娃·布劳恩到时会切断他们家的蔬菜供应，而实际上格尔达与希特勒情妇的关系虽然并不亲密，但也还不错，而且爱娃喜欢说笑，又爱好体育运动，博尔曼家的孩子们也很喜欢她。1944年8月28日，格尔达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昨天孩子们游完泳兴冲冲地跑回家。他们碰上了爱娃和她所有的熟人，并搭上爱娃的船到湖上划船去了。爱娃对他们很好，她不让他们称自己为布劳恩小姐，让他们就叫爱娃，对她说话时也用‘你’而不是‘您’……”

<sup>①</sup> 德国一种古老的杜松子酒。

后来，博尔曼的孩子就叫她“爱娃阿姨”。

1944年9月，博尔曼提出建立“保卫家乡领土的人民冲锋队”的建议终于被采纳，他因此也负责人民冲锋队的招募工作，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掌管人民冲锋队的军事指挥。少年、老人和体弱多病者均被征召入伍。德国百姓编了句顺口溜对此进行了讽刺：“我们要这样等候着敌人的到来，元首的最后一次征兵……带着一家老小，带着阿猫阿狗，大家一起进坟墓，一起进坟墓。”然而，格尔达却因为“人民冲锋队的诞生”向丈夫表示祝贺。1945年，还不满十五周岁的大儿子克伦齐想自愿参加人民冲锋队，当妈的态度可就完全变了。她在1945年2月8日的信中写道：“克伦齐垂头丧气，因为不让他去当兵打仗，还强迫他学拉丁文。但是如果十五岁的孩子全都不想学习了，后果真不堪设想。等他们再长大一点儿，自然会被征召入伍的……如今这些孩子真能做不少事情了，实际上他们已不再是孩子了，成了小大人了，什么事情重要，他们明白得很……”格尔达想让儿子明白，“学习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们在科技领域不是第一，军事上的任何胜利对我们都没什么用处……”

1945年1月9日至26日，博尔曼夫妇在所谓的“北货场”最后一次一起度假。那里离柏林约有一百公里，住有一百多户农家，还有一座名为施托尔普的城堡和默伦贝格农庄。博尔曼计划在这么一大片地方为希特勒建一个新的“无忧宫”<sup>①</sup>。博尔曼和他太太非常希望希特勒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回报，把附近的克鲁姆贝克农庄赐给他们做“家族世袭财产”。

1945年3月18日，博尔曼最后一次赴巴伐利亚与家人团聚。由于预感到纳粹行将覆灭，他心情很郁闷，这在他后来写给太太的一封信中得到了反映：“我们要尽职尽责到底。如果我们行将毁灭，我们愿意自豪而不屈不挠地去死，就像从前尼伯龙根人在埃采尔的大殿里那样！”<sup>②</sup>

博尔曼虽然让人花了那么大力气在上萨尔茨贝格建了防空洞，他还是觉得不够保险。他在1945年4月2日的信中写道：“一旦萨尔茨卡默古特还有上萨尔茨贝格真受到了威胁，女人和孩子们要尽快躲到蒂罗尔去！请务必事先与胡梅尔好好商量商量，但要千万注意保密，一定要做好所有的思想准备和其他准备！”

① 德国波茨坦的一处著名皇家园林。

② 此处用的是古高地德语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典故。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上萨尔茨贝格这个“元首阿尔卑斯要塞”一直没有受到空袭。格尔达1945年4月5日还写信告诉丈夫：“我们山上的情况仍然不错，相对平静。敌方一再说要狠狠地轰炸这里，我们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在防空洞里虽然住得很挤，但可以保证绝对安全。惟一让我觉得遗憾的是不能让所有我喜欢的人都享受到这种安全……”

1945年4月25日，上萨尔茨贝格迎来了第一个晴朗的春日。尽管九百米以上仍有积雪，但是冬日的严寒看来已然消退。崇山峻岭之上是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这让住在山谷里的人备感忧虑。上午9时30分，第一次空袭警报拉响，转瞬间，又响起了紧急警报，不久，伦敦电台宣布的大规模空袭便开始了。三百一十八架巨大的英国兰卡斯特飞机向上萨尔茨贝格地区扔下了一千吨的重磅炸弹。一个小时之内，这片山间的世外桃源便被炸得黄雾弥漫，看上去就像在月球上一样。博尔曼这个“上萨尔茨贝格山神”并没有亲眼看见自己的毕生之作遭到毁灭。博尔曼家的房子和希特勒的贝格霍夫被彻底摧毁的时候，他正在柏林总理府地下室里帮希特勒起草遗嘱。1945年4月25日，博尔曼在日历上写道：“戈林被开除出党。上萨尔茨贝格首次遭到大轰炸。”家人命运如何，只字未提。

赫尔穆特·冯·胡梅尔在战争结束后声称，4月底他的上司从“元首”地下避弹室里给他打来一份不祥的电报。胡梅尔虽然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但却暗示，他不愿把那份电报的“可怕内容”转告博尔曼夫人。有人猜测，在这份电报中，博尔曼可能也像戈培尔一样命令家人自杀。

不管怎么样，格尔达和八个孩子在轰炸中安然无恙。第二天，他们和胡梅尔，还有格尔达的嫂子、汉克夫人（国务秘书卡尔·汉克的妻子）以及很多逃亡者的孩子一道，动身逃往奥地利南蒂罗尔。一行人途经因斯布鲁克时，为了保险起见，格尔达的行李被藏进了当地纳粹党部的地窖里。五个箱子里装有博尔曼夫妇最珍贵的东西：首饰、私人来往信件、孩子们的相册以及一个装有希特勒“席间谈话”记录的密封信使箱，此外还有希特勒的水彩画、秘密文件，还可能有一个装着瓦格纳总谱原件的小盒子。第二天，这一帮人又继续上路，混乱中忘了带走格尔达的行李。

这几个装有珍贵物品的箱子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销声匿迹，后来博尔曼夫妇的信件和希特勒的谈话记录突然面世出版。对格尔达来说，丢了几个箱子倒也罢了，最让她揪心的是大儿子下落不明。她一直没有得到马丁的





任何消息。没有人会想到，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十五岁的克伦齐在费尔达芬纳粹中学解散后被分到了为保卫蒂罗尔而设的人民冲锋队里服役。母子两人还差点遇上，格尔达·贝格曼夫人（博尔曼夫人当时用的假名）乘坐的公共汽车曾经过布伦纳山口施泰纳赫的那家名叫“波斯特”的旅馆。南部前线投降后，她儿子当时正好滞留在这家旅馆里，他因为患盲肠炎卧床不起。马丁知道与家人失之交臂后，曾经自我安慰地认为自己可以追上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但是战争刚结束的混乱使他最终未能如愿。

四天后，格尔达抵达格罗德纳河谷的圣克里斯蒂娜。但是她在那里的备用住处已被国防军办事处占了。不过别人还是为贝格曼夫人和孩子们在沃尔肯施泰因找了一幢漂亮的房子住，而且对此严守秘密。住下后不久，这位“元首秘书”的夫人因为下身大量流血而不得不在博岑的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出院后，格尔达·贝格曼向驻博岑的美军指挥官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且很快就受到了美国安全部门官员的审问。后来英国人从美国人手中接管了南蒂罗尔。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英国人于1945年10月10日把病得很厉害的格尔达送到了梅拉诺的战地医院。孩子们由当时住在南蒂罗尔的女佣保拉·帕尔胡贝尔照看。住院后，格尔达被确诊患上了癌症。

格尔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在这儿老得躺在床上，每天都要进治疗室接受汞或铬化疗，然后再回到床上躺着。流血一直不止，体温也忽高忽低。医生都说，不进行放疗就好不了。但是放疗得经过英国人的批准。申请10月底就递上去了，但至今没有给最后答复。所以我只好就这么躺着苦等。”

格尔达在医院长时间闲躺着的时候，脑子里想了很多。她的纳粹信仰丝毫没有动摇，虽然她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是我在这里也学到了一点，那就是并非所有正直的人都是纳粹，而且远非所有的纳粹都是正直的人。党内那些舞弊、逃避工作的行动和肮脏无比的阴谋诡计真让我感到害臊。好在孩儿他爸手下没有这些现象，他自己也的确是一直忙到最后……”

格尔达在这里所说的“最后”，指的是第三帝国的灭亡，因为她对丈夫的命运一无所知。1945年5月1日，躲在柏林总理府地下避弹室里的博尔曼，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最后几个字——“试图突围”，此后他就销声匿



迹了。当局认为博尔曼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隐藏了起来，并在媒体上刊登了对他的通缉令，要求他于1945年11月20日到国际法庭出庭受审——“魔鬼希特勒身边的罪恶的大天使”在法庭上可以自我辩护或请律师辩护。此时格尔达·博尔曼正隐姓埋名躺在拥有一千四百个床位的梅拉诺战地医院里。她的床房门上挂着“禁止入内”的牌子，有很长一段时间连医院的两名牧师都不许进入。

两名牧师之一，天主教神甫特奥多尔·施米茨后来写信向小马丁·博尔曼谈起了与他母亲第一次见面的情况：“1945年圣诞节，我和那位新教的同事到医院的各个病房向病人们分发圣诞小礼品……我们也到了妇女病房……1945年圣诞节与你母亲这次首次会面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时间不算长，但给我的印象却很深，我再也忘不了她了。你母亲当时情况还相当不错，气色很好，梳着长长的辫子，看上去几乎像个小姑娘，而且也很健谈……很快她就把住在沃尔肯施泰因的那么多孩子的情况告诉了我，而且她特别为你担心，亲爱的克伦齐！……”

格尔达·博尔曼很珍视两名牧师对自己的关心照顾。她在给女佣帕尔胡贝尔的信中写道：“现在这两名牧师是我的安慰。虽然他们很清楚我们究竟是谁，也知道我们已经退出了教会，但还是对我和孩子们非常关心，真让人感动……这儿的人都很亲切，对我也很好。大家，特别是两位牧师先生，都在帮我打听克伦齐的下落……”让大家惊讶的是，两名牧师中格尔达更喜欢和那位天主教神甫打交道。<sup>①</sup>不久，格尔达就受到了可怕的病痛折磨，于是她经常与二十九岁的特奥多尔·施米茨长谈。这位年轻的神甫很有教养，善解人意，而且精力充沛。他后来回忆道：“她很可爱，对我谈了很多自己和家人的情况，对丈夫没有说一句坏话。”

1946年1月5日，施米茨就跑到沃尔肯施泰因和佩尔夏去看望博尔曼家的孩子们。不久之后，这位牧师把艾可和格尔哈德藏在自己的车里，躲过大门口的盘查，把他们带进了战地医院。他还来回给格尔达带用铅笔写的字条，其中一张字条上写道：“亲爱的小保琳，昨天的来信中说你已经在孩子们那里了，你无法想像这让我心里落下多大一块石头。有你这么个差不多和我一样疼爱孩子而且孩子也很喜欢的人和他们在在一起，我就不再

① 格尔达本人原先信新教。



为这帮小家伙们担心了……我可能会被送到帕多瓦或米兰去，不过还没有最后定。最好不要离孩子们这么远。如果真得去这么远，他们（两名牧师）肯定会再去看你们的。你们有什么难处或某件事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告诉他们，他们会立即帮忙的。对他们来说，大家都是德国人。不管是来自东普鲁士，还是波希米亚、维也纳或莱茵地区，只要是正派的德国人，自然会相互帮助。这种同属感是别人破坏不了的，即使他们把德国搞得支离破碎。”

此后不久，格尔达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她再也下不了床了，而且不得不靠注射吗啡减轻病痛。终于，主管的妇科大夫告诉特奥多尔·施米茨，病人已经活不了多久了。他们也谈到了格尔达子女将来怎么安排，一致认为必须尽快有相应的对策。

1946年2月5日，格尔达·博尔曼立下了遗嘱。遗嘱上说，因为“根据新闻报道，我个人也坚信，我丈夫已经不在人世了”，因此决定请哥哥汉斯·瓦尔特·布赫担任未成年孩子名义上的监护人。让大家惊讶的是，格尔达还请天主教教士特奥多尔·施米茨，这位她生命垂危之际的忠实帮手和孩子们的伙伴，作为临时的但也是实际上的监护人。她请求他“照料孩子们，使他们身心健康，衣食无忧”。

为了下一代，格尔达·博尔曼抛弃了一切纳粹主义的想法，她把孩子们托付给南蒂罗尔的天主教神甫，从而为他们未来的健康成长铺平了道路。但是对于年轻的特奥多尔·施米茨来说，一个神甫一天到晚要照料八个孩子，这太不同寻常了。于是他向上司布里克森大主教求助。大主教不但赞成他收养这些孩子，而且还从个人积蓄中拿出了一笔钱，供这个“小儿国”日常开销。

临终前不久，格尔达·博尔曼又写信请保拉·帕尔胡贝尔帮忙：“……亲爱的小保琳！您现在怎么样？和孩子们在一起您还愉快吗？或许太让您操心了吧？……现在春季感冒又到时候了。请您对孩子们要管得严一点儿，别让他们天气稍一暖和就不戴帽子，不穿大衣和长筒袜……三个男孩耳朵都容易发炎……此外，我还有一个请求：注意别让福尔克儿中暑，早春的太阳厉害得很，让人吃不消。他们把我的床挪到窗边阳光下之后，我又发烧呕吐了。待在这个小房间里我有时热得要命，有时又冷得受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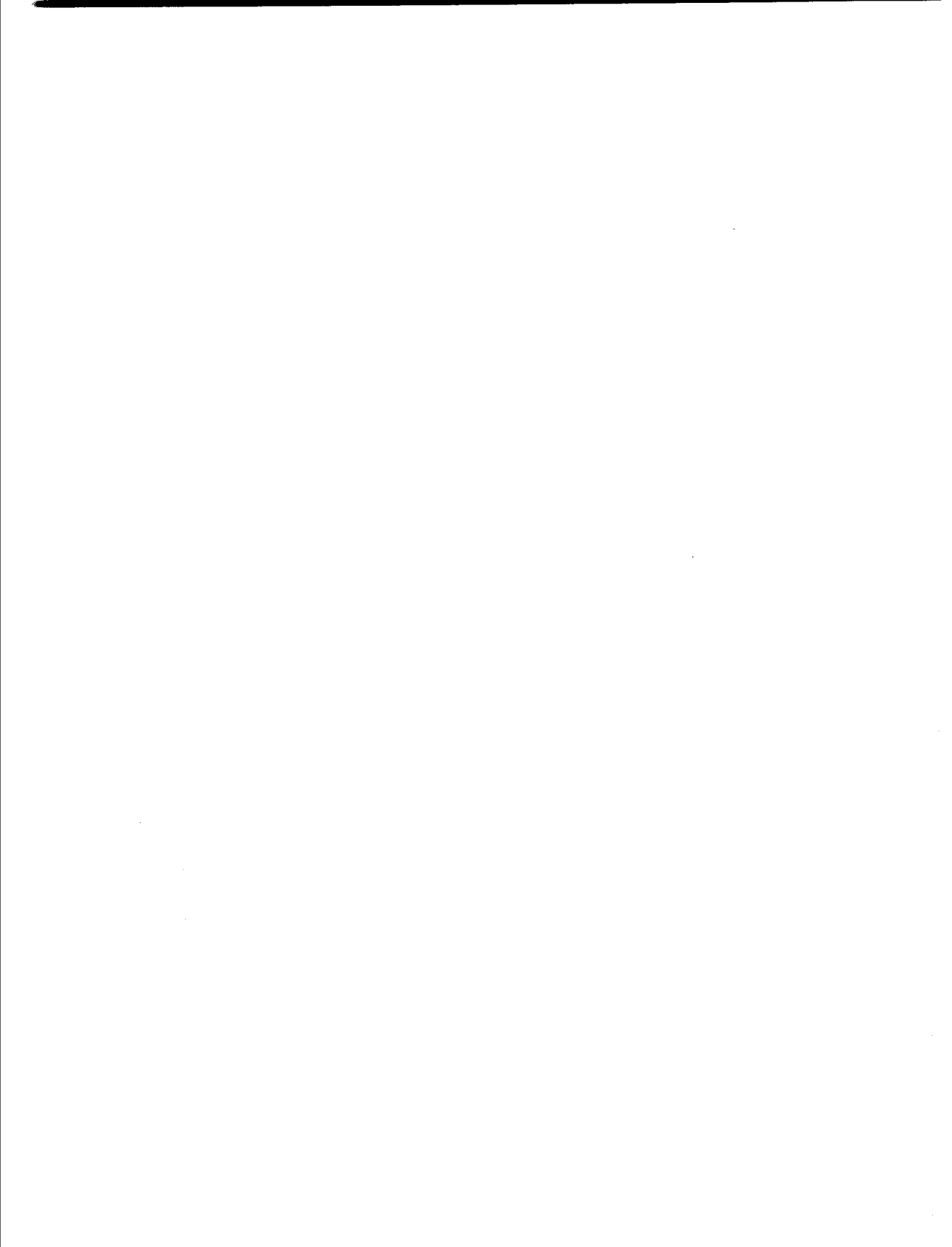


临终前几周，格尔达·博尔曼对宗教问题愈加关注。特奥多尔·施米茨后来与格尔达的女儿艾可在沃尔肯施泰因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她最后一份手写的东西——尼采的诗《献给未知的上帝》。施米茨认为，这是博尔曼太太回归新教信仰的表现。

1946年3月23日，格尔达·博尔曼去世，终年三十七岁。剖验尸体的结果表明，她的死因并非癌症，而是化疗造成的汞中毒。但正式的死亡报告中记录的却是：宫颈癌三期。格尔达下葬于梅拉诺的士兵墓地。战后法庭的司法调查确认，格尔达·博尔曼曾是纳粹党党员，还拥有金质党徽，但不能把她算做纳粹罪犯。监护人“特奥叔叔”在南蒂罗尔抚养格尔达几个孩子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在全世界受到了通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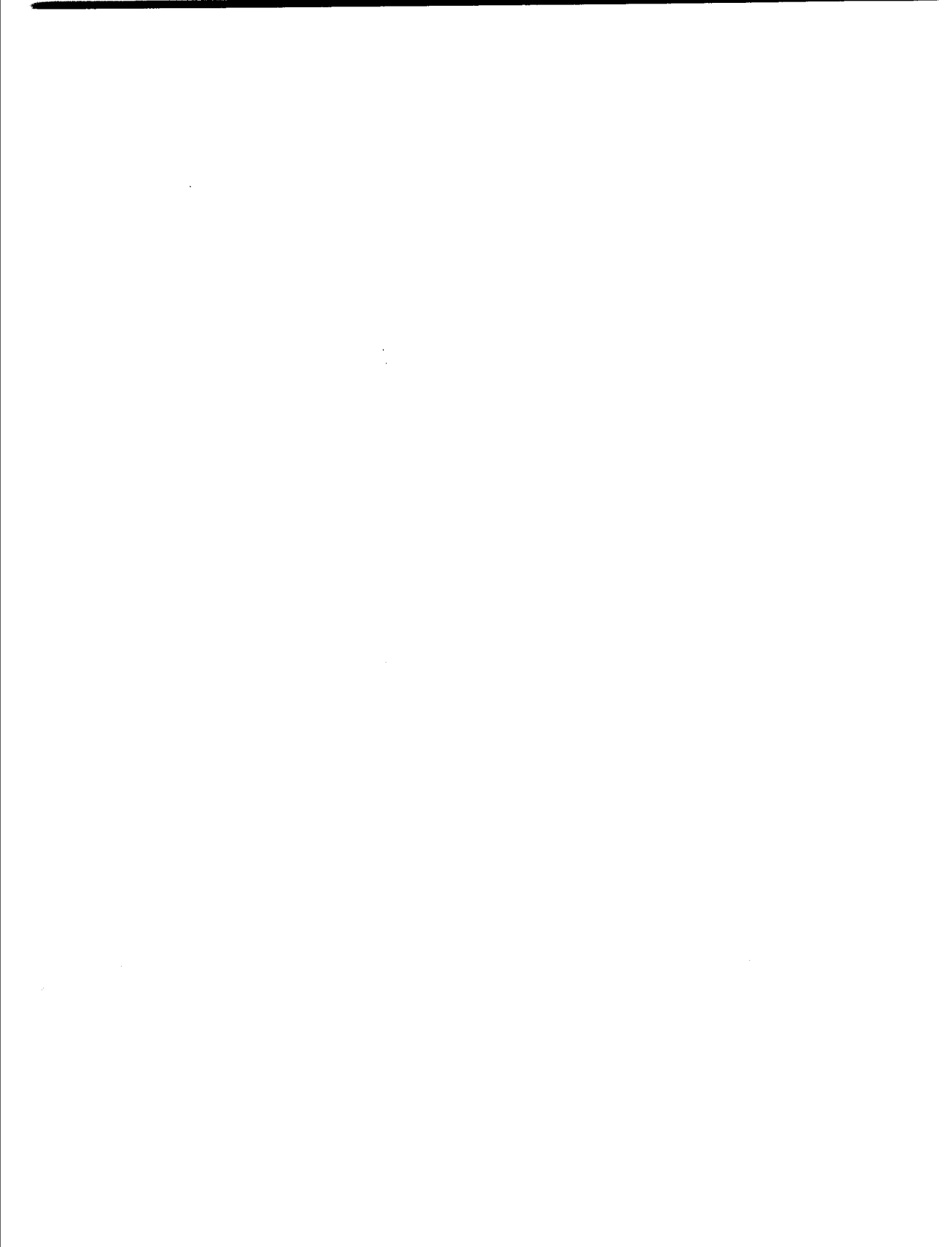
1946年10月1日，马丁·博尔曼被缺席判处死刑，其房产被认定已经毁坏。围绕施卢赫湖畔的那幢乡间别墅，原房主和博尔曼子女之间曾有过一场产权之争。1953年经法院审理，双方达成谅解。对博尔曼的追捕行动历时数十年，媒体一直对此大事渲染。“博尔曼在墨西哥？”“博尔曼其实在南美洲？”“博尔曼下落真相大白”，新闻媒体反反复复地抛出这样的大标题。十万马克的悬赏金促使无数记者想通过自己的独立调查查明博尔曼的下落。一些人声称自己已很接近目标了，但是按照线人的说法，博尔曼总是在“最后一分钟”失约。1967年，维也纳的犹太文献中心主任西蒙·维森塔尔声称，博尔曼正在与巴拉圭接壤的巴西边境某处过着富豪生活。还有人称看见博尔曼在俄罗斯当特工，或是见到他在巴西，与纳粹集中营的杀人医生门格勒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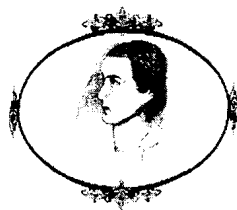
1972年，博尔曼的尸体在柏林被发现。法兰克福检察院以及历史学家约亨·冯·朗格进行的调查无疑证明，1945年5月2日，博尔曼已在柏林总理府附近自杀身亡。



盖世太保头头儿的妻子——莉娜·海德里希







1940年9月，英国皇家空军在英格兰空战的第二阶段，成功抵御了德国空军的进攻，希特勒的进攻战一向战无不胜，此时形势开始出现逆转。此外，空战造成的大量损失表明，在可预见的将来，德军很难掌握入侵英伦三岛必不可少的制空权。丘吉尔事后认为，当时英国的成功抵抗虽然不是纳粹覆灭结局的开始，却是纳粹全胜开端的结束。在德国，人们认为，各条战线上战无不胜的德军不过经历了一次暂时的挫折。莉娜·海德里希属于正确解读时代征兆的少数人。她预计战争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势必造成食品匮乏，因此，开始动手做应急准备，亲自掌管起家里的副食供应。莉娜先采购了几百只仔鸡和很多鹅，接着买了一个罐头封装机，最后便去杀鸡宰鹅，拔毛去腿，并按法式烹调术，将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很规范地制成了罐头食品。此外，她还经常回德国北部的老家费马恩岛，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到处大量采购，然后又自己开着卡车，将土豆、甘蓝和各种水果运往柏林。

莉娜如此大事操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感谢，她丈夫的反应是惊讶和不快。考虑到自己在第三帝国既重要又敏感的职业，太太的所作所为令他极为尴尬。1939年以来，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一直担任纳粹德国中央安全局局长，统辖着盖世太保、刑事警察局和党卫军保安处，权力极大。作为一个庞大的警察机构的顶尖人物，他被人畏惧地称为“帝国职位最高的猎犬”。他领导的机构在德国国内和占领区均推行前所未有的恐怖政策。

奇怪的是，在精力旺盛的太太面前，这个盖世太保头头儿说话就不管用了。据说，海德里希太太“嘴老是说个不停”，而且是个万事通，只要有她在场，海德里希就显得毫不起眼。他曾畏畏缩缩地恳求太太做事要考虑身份，要改掉一些老习惯，但莉娜根本置之不理，海德里希只好认栽。他将太太的肆意妄为归因于岳父母的教育，他们总是强调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

1911年6月14日，莉娜生于德国北部费马恩岛阿文多夫一个没落贵族地主家庭，闺名叫莉娜·冯·奥斯滕。其父有七个兄弟姊妹，是家里的二儿子，成人后被迫离开父母的农庄，想法自己挣钱谋生。于尔根·冯·奥斯滕最终当了教师，但他一辈子都梦想着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他的两个子女继承了这种想法。莉娜也毫不含糊地觉得自己是个贵族，与父亲不同的是，她后来真的实现了贵族乡村生活之梦，尽管只过了几年这样的生活。



莉娜的母亲出身于费马恩岛一个世代以航海和经商为生的富有家庭，娘家姓希斯。除莉娜外，她还给丈夫生了个儿子——小于尔根。做父亲的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原则教育两个孩子，要他们成为爱国者。在纳粹党身上，他看到了德国的希望。1927年，莉娜普通中学毕业，这可让不少教师松了一口气，因为莉娜太能说会道，经常在周围那些规规矩矩的女生中惹出不小的麻烦。应父母一再要求，莉娜回家待了一年，在母亲督促下接受“正规的”家政训练，包括学做正宗的费马恩丸子。莉娜当时虽然很不情愿，但后来不得不承认，在她接受的种种培训中，也就是这些家务技巧使自己终身受益。

1928年，伶牙俐齿的莉娜终于说动父母同意让她继续深造，于是她进了基尔职业学校。莉娜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所成就”，通过高级中学的毕业考试，从而有机会接受专业培训，成为一名职业学校教师。1928年间，希特勒来到德国北部为纳粹党做宣传。在埃肯弗德他也发表了一次演讲，小于尔根·冯·奥斯滕就是听众之一，同其他人一样听得津津有味，事后还在姐姐面前把希特勒及其“了不起的目标”大吹了一通。1929年，莉娜首次参加了“元首演讲会”，她觉得弟弟的话说得没错，后来又兴冲冲地跑去报名参加了当地的纳粹妇女联盟。当时莉娜最喜欢的读物并非姑娘们爱读的言情小说，而是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撰写的一本大部头历史哲学著作——《19世纪的基础》。大约三十年前，年轻的希特勒就曾啃过张伯伦这本书，并据此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有评论说这是一本“建立在种族论基础上的日耳曼文化世界史”，论及种族骚乱、犹太人世界霸权和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希特勒常爱在亲信们面前背诵该书片断：“所有创造力均来自北欧人种。我们当今世界的全部文明和文化都是一个特定人种的杰作：日耳曼人。”莉娜·海德里希也一辈子都很欣赏这本纳粹主义从中汲取了很多观点的书，经常仔细研读。

1930年12月6日，莉娜和基尔寄宿学校的几个女同事一道参加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划艇协会的舞会。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舞会上，“命运”化作一个高个金发的海军军官来到自己面前。这个有点拘谨的萨克森小伙子以军人简洁又不乏礼数的方式向姑娘做了自我介绍，他的名字叫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相貌英俊的海德里希中尉对莉娜一见钟情，当晚眼睛一直盯着姑娘，一再邀她跳舞，舞会散后还把她请到了家中。姑



娘也不是无动于衷：“我回到家后，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我遇到了某种神奇的东西……”随后便是一段北欧式的冷静的罗曼司。两人一起到基尔公园散了一次步，晚上又一道看了场戏，还到酒馆喝了一杯。海德里希当时二十六岁。有关两人的奇特约会，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卖弄风情，没有海誓山盟，也没有情思若渴。实际上我们总是默默相对。我对这个有志向但又内向的人很有好感。”两人相识仅四天，少言寡语的海德里希就在维克斯酒馆开口问道：“冯·奥斯滕小姐，您愿意嫁给我吗？”姑娘同意了，两人遂于1930年12月18日秘密订婚。此前海德里希有个女朋友，是个海军工程技术总监的女儿，但他觉得没必要把自己突然移情别恋的事告诉她。海德里希中断旧情的方式是：干脆避而不见。

得悉女儿订婚的喜讯后，于尔根·冯·奥斯滕向她那位海军军官发出了邀请，要他到家里来过圣诞节。他说，只要海德里希不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他就会对这个女婿表示欢迎。

莉娜向好奇的父母介绍了他们未来女婿的一些情况：赖因哈德·海德里希，1904年3月7日生于萨勒河畔的哈雷，出身音乐世家。祖父创办了世界著名的德累斯顿音乐学院，父亲是哈雷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和乐队指挥。按照父母的意愿，赖因哈德读高级中学的同时，还在音乐学院学钢琴、大提琴和作曲。而且他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小提琴了。当时听过小海德里希拉小提琴的人说，他的演奏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十八岁时，海德里希高级中学毕业，成绩优异，音乐学院的毕业考试成绩也相当不错，但他还是打破家族传统，离开了“总是调琴弄乐、故作虔诚的家庭”。（君特·德施纳，《赖因哈德·海德里希》）行囊中装着小提琴，他跑去报名当了水兵，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魏玛共和国海军舰队的第一批学员。1926年，海德里希通过海军士官考试，当上了海军少尉，两年后又升为中尉。他被分配到威廉·卡纳里斯舰长指挥的布伦瑞克舰上服役。后来，卡纳里斯担任德国国防军事情报局局长时，两人又成了竞争对手。海德里希当少尉时曾受过军事谍报方面的特殊训练。

莉娜坦白地告诉父母，她的未婚夫并没有多少钱，但他有种族观念、民族意识和军人风范。有一些让人不快的事情莉娜有意隐瞒了父母，比如海德里希这个多愁善感的艺术家刚到海军舰队时曾经很难适应，他很讨厌水兵们平时说话时那种粗鲁口气，还有，那帮舰队伙计们总是在半夜三更

凑在一起喝酒时，强迫他这个腼腆的学员来为他们演奏托塞利小夜曲。

海德里希为见莉娜父母事先做了很认真的思想准备。他在秘密订婚当天给未婚妻写的信，不仅反映了他直截了当的性格，还有他的生活态度：“……没几天就要过圣诞节了。我现在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坦白直率是我平时对自己提出的最主要的要求，坦诚地面对你父亲对我来说并不难。你会注意到，对我来说最要不得的就是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拐弯抹角和耍滑头。对那些卑鄙的家伙，我会毫不犹豫地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我真盼着星期六能快点儿到。到时再见，非常非常爱你的赖因哈德。”

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这个头脑冷静的海军军官才会真情流露。他曾在给莉娜的一封信中写道：“你收到我的音讯时我正在为即将启程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现在有很多活儿要干。但是只要稍一得空儿，我就会想念你。我发觉我实在太喜欢你了。真难以想像，我们曾经还素不相识。我以前真是白活了很长时间。正因为如此，我对未来生活愈加憧憬……”

1930年圣诞节，海德里希和莉娜正式举行了订婚仪式。当时莉娜和家人都极力劝说这个未来的家庭成员皈依纳粹主义。莉娜后来说，“那时候他对政治一窍不通”。

1931年1月，海德里希恳求岳父岳母早日定下婚期：“……求求你们允许我们在9月（17日！）结婚。10月、11月我们这儿舰队调动、演习、换防日程排得满满的，再往后拖对未婚夫妇来说就不太正常了。要是你们决定在9月份，我将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然而过了不久，婚礼被无限期推迟了，原因是海德里希海军中尉1931年4月“因为行为不检点”被免职了。

事件的起因是，海德里希未加任何解释就把自己的订婚喜帖寄给了一直蒙在鼓里的前女友。姑娘得讯后惊得目瞪口呆，进而精神崩溃。她的父亲告到了老熟人、舰队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那里。按照海军舰队严格的道德法典，海德里希抛弃女友被视作违背婚约，践踏“婚姻的神圣责任”。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四下流传了很久，事件本身被无限夸大。有人说，海德里希把一个快要分娩的孕妇给甩了。此事的另一个当事人莉娜以自己“一直没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为由，对这一变故没有明确表态。

在海军规规矩矩干了十年被无限期免职，这使野心勃勃的海德里希深受打击。“一看见穿海军制服的人，他就会立即把目光转到别处去”。（君



特·德施纳，《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海德里希一向性格内向，他虽然没有公开说过什么，但此后一直竭尽全力想洗刷这一玷污自己军人荣誉的污点。与海德里希不同，莉娜一开始虽感到震惊，但很快便冷静下来，开始面对现实，想法应付新的局面。向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求援失败后，莉娜坐下来仔细盘算了一番，未婚夫到底有哪些特长和兴趣爱好？

运动健将海德里希 1928 年曾获得德国北海帆船赛冠军，击剑也获过奖，马术和游泳很出色，小提琴和钢琴演奏技巧出类拔萃。政治上海德里希是个右翼保守派，在梅克尔自由团和哈雷自由团里干过。因为有这些优势，莉娜就鼓励未婚夫另谋差事。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希望并不大，而海德里希又拒绝回到父亲的音乐学院。未婚夫情绪低落，莉娜就替他四处寄信求职。家里人一致反对他们继续相处，两人的关系反而因此更加牢固。母亲劝她把那个“似乎到处拈花惹草”的年轻人打发走，莉娜断然拒绝；海德里希也不允许自己的母亲说未来的儿媳粗鲁、不文雅。

在随后的多事岁月里，莉娜时常自问，如果海德里希没被解职，自己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样的猜想当然不会有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莉娜为海德里希的新生奠定了基础。她曾为海德里希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军中谋个“体面”的职位尽了最大努力。希姆莱 1929 年被希特勒任命为“党卫军领袖”。“真正的精锐，绝对的军人。”几十年后，莉娜谈起党卫军时还赞不绝口。（莉娜·海德里希访谈，引自君特·德施纳编撰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

1931 年，世界经济危机达到高潮，海德里希此时面临两个选择：到汉萨狩猎学校当个收入颇丰的帆船教师，或是进党卫军供职。为了“挣几个钱”去教人驾驶帆船，海德里希和莉娜两人都觉得没多大意思，他们认为纳粹军事组织党卫军中的职位更值得追求。于是，他们求纳粹党的知名人士、海德里希的教父之子卡尔·冯·埃贝尔施泰因帮忙，安排海德里希去见希姆莱。

海德里希已经准备好到慕尼黑见希姆莱的时候，埃贝尔施泰因突然来电报说：“勿来，希姆莱病了！”是莉娜最终说服了犹豫不决的未婚夫，无论如何也得到慕尼黑附近的瓦尔德特里德林，去见那个身患流感的帝国党卫军领袖兼养鸡专家。希姆莱在家里穿着睡袍接见了海德里希。他告诉这个不速之客，他正找一个“搞情报的人”。随后，希姆莱退入隔壁房间，

让客人在半个钟头内起草一个工作计划。海德里希受过专门的情报官培训，当时他立即明白，纳粹计划建立一个秘密情报机构，而希姆莱本人却没有认识到这个秘密情报机构和党卫军有何区别。不管怎样，希姆莱离开后，海德里希立即忙活起来。他学着谍报惊险小说的样子，起草了一份相当外行的报告。这份报告，加上他的“专业知识”和“北欧人”的长相，都很受希姆莱的赏识。1931年6月14日，海德里希受命组建一个新的纳粹机构——党卫军情报和保安处。

事后才知道，另一个求职者差一点就抢在海德里希之前得到这个饭碗。因此，莉娜把凑巧又是她生日的这一天称为“我的，我们这一辈子的转运日”。

1931年7月1日，海德里希加入党卫军，立即当上了分队长。他平时身穿黑色的党卫军制服，但在特殊场合又会换上“传统制服”：褐色衬衫、黑色马裤、黑色卐字袖标、马靴和带有骷髅头和党徽的黑帽子。希姆莱的党卫军是纳粹精锐战斗部队，信奉狂妄自大的种族主义并崇拜战争。当时二十七岁的海德里希在这支佩有死亡象征性标志的日耳曼骷髅兵团阵营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8月1日，海德里希兴致勃勃地走上了新岗位。他在寄到吕特延布罗德的一封信中写道：“岳父、岳母：昨天，希姆莱正式授权我领导本部的工作，并立即任命我为分队长。9月1日起我将领到工资（一百八十马克）。我的职位和工作给我带来很大乐趣……尤其是因为有了这份工作，不管政局如何，我都可以成家了。我的全部工作过去是为了这一目标，现在也是……”

所有障碍都排除了，现在莉娜可以置办嫁妆了，与此同时，她的未婚夫也开始整合纳粹党的各种情报部门。通过大刀阔斧地砍掉很多相互竞争的情报工作，出身艺术之家的海德里希完成了这项任务。他因此深得上司赏识，开始在党卫军中飞黄腾达。

海德里希写信告诉莉娜的母亲：“……我按照自己的设想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它需要我投入全部的精力……我今天还得到了一大喜讯：希姆莱先生答应在我结婚之后给我每月二百九十马克的工资……”

1931年12月26日，自称“乡村贵族”的二十岁的莉娜·冯·奥斯滕和二十七岁的纳粹安全部门的头头儿在格罗森布罗德的新教教堂举行了婚礼。海德里希不喜欢穿便服，而当时冲锋队和党卫军又被当局禁止穿制



服，所以他在婚礼上穿的是燕尾服，戴的是大礼帽。为使婚礼具有纳粹特征，教堂的圣坛上挂上了一个杉木做的卐字标志。新郎新娘的结婚誓言选的是路德的格言：“即使妖魔横行于世，我们也必须成功！”海德里希的妹妹在婚礼上演唱了《圣母颂》，最后由海德里希的父亲演奏了一段自己的作品。教堂的走廊上站着一排穿着代用制服的小伙子。他们清一色的白衬衫、黑裤子和马靴，行纳粹举手礼。教堂的管风琴演奏着《霍斯特·韦塞尔之歌》<sup>①</sup>。教堂的牧师因为被这番纳粹表演搞得惊慌失措，后来被调离了。莉娜后来回忆道：“当时实际上没几个人认识新郎，但我在来客中还是小有名气。我弟弟是首批去埃肯弗德听希特勒演讲的那一万来人之一，因而也有不少人认识他。参加婚礼的宾客基本上是海尔利希哈芬的纳粹妇女联盟成员、格罗森布罗德和周围村子的冲锋队员。”

1932年1月初，海德里希在慕尼黑附近的洛赫豪森租了一套公寓，但太太并不喜欢新家，说那是个“木地板上的裂缝足有指头宽的危房”。从德国北部搬到南部，这不仅是莉娜长这么大首次远行，而且是首次踏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一次在参加集会时，有人冲莉娜喊：“闭上你的嘴，普鲁士娘们儿！”从此她就对所有巴伐利亚人没有什么好感。慕尼黑人性情开朗得让她不太舒服，他们用巴伐利亚方言表达的巴伐利亚式的幽默，她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当地人经常在既供做饭又供起居的屋子里无拘无束地围坐闲聊的习惯，一开始莉娜很不适应，但后来她又觉得这样很自在，很实用。渐渐地，莉娜也习惯了随便找家酒馆与朋友会面，而不是像北方人那样为正儿八经地会亲访友事先做大量繁琐的准备。当时莉娜已笃信纳粹主义，虽然在巴伐利亚人地生疏，但她和丈夫都有一种使命感。“我们的信念是，活着并不是为了个人幸福，而是为了帮助所有为生存和信仰而奋斗的人实现其崇高理想。”为了掌握信息，莉娜订阅了纳粹党的《图片报》。这份每周发行二十五万份的报纸不断报道纳粹运动的进展情况。除此之外，她还订了面向德国乡村居民的周报《纳粹乡村邮报》。1932年6月24日，刚过二十一岁生日不久，莉娜在慕尼黑加入了纳粹党。

莉娜的父母在女儿随夫迁居巴伐利亚之后，并没有对他们就此不管，

① 纳粹党歌。

这使得小两口在布置新居时不必过于精打细算，况且莉娜出嫁时已经得到了一份很丰厚的嫁妆。但是，1932年2月，正当这对新婚夫妇还在等家具公司给他们送最后一批家具的时候，海德里希刚刚开始の远大前程又突然遇到了危机。有几个纳粹党人在翻阅里曼音乐家名录时，发现其中有这样的记录：“布鲁诺·海德里希，原姓聚斯”。他们由此推断，莉娜的丈夫有一个“抹不掉的污点”，就是说，他有犹太血统。这几个人立即将这一发现报告了哈雷—梅泽堡地区的纳粹党头目，因为党卫军章程规定，只有能证明自己祖宗八代（上溯至1750年）都是雅利安血统的人才会有资格入会，这被称为所谓“大家谱证明”。纳粹对海德里希血统的严格调查还殃及了冯·奥斯滕家。莉娜不得不请父亲寄来自家的全部家庭档案。

专家对退役海军中尉赖因哈德·海德里希进行的血缘调查得出的最终结论是：“所有谱系表显示，（他）确系德意志血统，祖辈无人是有色人种或犹太人。”专家报告还进一步解释道：“有关海德里希家有人曾姓聚斯的传闻原因是，海德里希中尉的父亲曾被人叫做‘伊泽多尔·聚斯’，有人因此猜测，海德里希家有犹太血统。但此事的背景是：海德里希的祖母埃内斯蒂妮·威廉明妮·海德里希，娘家姓林德纳（见家谱第五条），在与丈夫离婚后，又嫁给了锁匠古斯塔夫·罗伯特·聚斯。据说她觉得，作为与前夫生养的一大群孩子的母亲，再婚后改姓聚斯—海德里希没什么不好。此外，调查还表明，锁匠本人也并非犹太人，海德里希家曾要求那本艺术家名录再版时删去那个有损名誉的表述。”

尽管如此，有关海德里希祖母是犹太人的传言并没有销声匿迹。连纳粹党内部都有人散布流言说，海德里希亵渎了祖父祖母墓，曾经趁天黑和大雾，把刻有祖母名字“扎拉·聚斯”的墓碑给挪走了。还有人说，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曾命人销毁了自家的家族档案。当时身怀六甲的莉娜倒是引起了党内一些好友的同情，他们叹道：如果她生下的孩子真有八分之一或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可怎么办呢！莉娜的长子克劳斯生于1933年6月17日，此后她又生了三个孩子。莉娜当妈后明显感觉到孩子们经常遭人白眼。

八年之后，谣言又起。1940年，特拉电影制片厂根据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指令，拍摄了一部旨在煽动民众反犹情绪的影片——《犹太人聚斯》。该片由法伊特·哈兰主演，群众演员是从华沙犹太隔离区里找来的正



宗犹太人。影片通过一个名叫聚斯·奥本海姆的征税人的形象，描写了“道德败坏的犹太鬼如何通过吓人的手段敲诈勒索”，并明目张胆地鼓动民众私自教训犹太人。这部电影不光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一炮打响，而且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再次引起人们对海德里希是否是犹太后裔的议论。像多年前那样，人们在谈到这个令人憎恶的盖世太保头头儿时，就叫他“伊泽多尔·聚斯”。

甚至在第三帝国灭亡之后，仍有人提起海德里希是犹太人的话题。例如，约阿希姆·费斯特<sup>①</sup>就声称，出身问题不仅使海德里希精神抑郁，而且使他很容易被人敲诈。历史学家赖特林格尔则认为，海德里希之所以迫害犹太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血统有一种病态的憎恶”。

海德里希的党卫军保安处迅速壮大，原先在慕尼黑蒂尔肯街的办公处很快就变得很拥挤了。1932年夏天，该机构就开始考虑搬迁了。当时党卫军保安处还属于非法组织，为了便于伪装，海德里希决定将办公处和住处合二为一。他在慕尼黑纽芬堡宫公园墙外一个背静的死胡同里租了一幢别墅，莉娜积极参与了将这幢房子改造为纳粹秘密警察总部的工作。“所有东西都被秘密改造了。这幢房子在改造时向公园内挪了一点儿，这样在有不速之客来访时，我们就可以及时把所有不利的证据转移走。所有东西的设置都是出于安全考虑。我的床也被改装成了一种可供藏身的“堡垒”……我们被迫转入地下。（对冲锋队和党卫军）的禁令取消后，赖因哈德将他的机构命名为PI局，PI就是新闻情报，我也就成了PI夫人……”（莉娜·海德里希回忆录，《生活在战犯身边》）莉娜当时还饶有兴致地学了伪造图章和证件。这一技巧战后对她非常有用，她制造的假证件使自己和一些党卫军成员得以逍遥法外。此外，1932年那时候，年纪轻轻的莉娜还做各种各样的杂役。当时雇佣外人风险太大，而且也缺钱，于是她这个纳粹秘密警察头头的太太，就亲自下厨为丈夫手下的非法特工做干菜汤和没有鲑鱼的鲑鱼色拉。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情况立刻好转。1933年3月9日，莉娜高兴地写信向父母通报了纳粹在慕尼黑夺权的情况。战后，莉娜声称，当时她才二十二岁，不可能意识到此事造成的影响。

① 历史学家兼出版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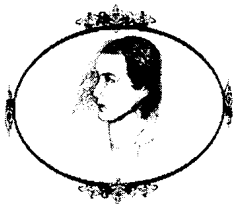




“爸爸、妈妈，生活真奇妙！你们一定已经从报纸上知道我们闹了一场小小的革命。赖因哈德告诉我的情况让我觉得那一定很有趣。现在我想告诉你们我自己的一点儿亲身经历。星期三早上，赖因哈德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巴伐利亚政府不愿就范。11点钟的时候，赖因哈德打电话让我马上把他的手枪送到褐色大楼去……”

冲锋队和党卫军在慕尼黑夺权的过程中，希姆莱当上了警察局长。莉娜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你们不要笑，赖因哈德竟然也成了政治警察局局长！”海德里希担任的是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局局长，该局总部设在维特尔斯巴赫宫，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帮所谓政治警察惯用的最厉害的手段是无限期的“预防性拘留”，被捕者无处上诉，而且要被送进集中营。那段时间，巴伐利亚内政部长施蒂策尔被捕一事让已经成为警察局长太太的莉娜特别开心。“你们想像不到，真是好玩极了。内政部长大人穿着袜子和睡衣站在厅里，周围站着一群冲锋队和党卫军的人，笑得都找不着北了。不一会儿，他们上前用大皮靴踩他的大脚趾，疼得他直哭，两脚来回直跳。你们完全可以想像出当时的情景。紧接着犹太人莱维（慕尼黑犹太人社团理事）被带进来了。对付他没用多长时间。他们用打狗的鞭子把他狠揍了一顿，接着把他鞋袜给脱了，由党卫军的人把他带到了自家住处。他家房子当时已是烟雾弥漫了……”（1933年3月13日莉娜·海德里希家书）

夺权之后，海德里希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迫害所有纳粹的敌人，不管他真是如此还是仅仅有此嫌疑。这其中既有女佣人，也有部长，有关索引卡片是早就整理好了的。海德里希干这件事时像魔鬼一样冷酷无情，因为他把热情都留给了音乐。白天，海德里希大笔一挥就把成千上万人送进集中营；晚上，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可爱的丈夫、操心的父亲和热情的音乐爱好者。在家里他经常举办小型音乐会，喜爱演奏海顿和莫扎特的古典音乐，而且演奏得相当出色，极富表现力。对太太，海德里希从不隐瞒自己的工作性质和规模。他告诉太太，自己是“德意志帝国职位最高的垃圾搬运工”，而莉娜对此并不反感。战后在接受采访时她曾说：“奇怪的是，他很清楚自己干的是刽子手的活儿，而且毫不觉得理亏。”海德里希时而以一个多愁善感、温文尔雅的音乐家面目出现，时而又作为冷酷无情的技术官僚去干他那门可怕的“手艺”，转眼间他又成了一名技压群雄的运动健



将。他身上这些自相矛盾的特性令很多人觉得毛骨悚然。希特勒与这个有用的刽子手总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想维护自己作为“德意志人民领袖”的理想主义形象。莉娜对老公的行当却毫不介意，只要海德里希不有意禁止她参与自己的工作，她便与他配合默契。她并不怕他，海德里希让大家普遍感到恐惧，对此她也无所谓。惟一让她失望的是，这个她认为在工作上“积极进取、顽强奋斗的”丈夫，一旦碰上家庭问题和需要维护个人利益的时候，就根本不顶事了。

1934年，患思乡病的莉娜带着儿子克劳斯回费马恩岛看望父母。她打算休段长假，但很快就发觉故乡闭塞得很，很难长待下去。她开始想念在丈夫身边的生活，认为这使自己“开阔了眼界”。

不过莉娜还想在费马恩岛为自家造一个夏季别墅，于是立即着手实现这一计划。莉娜很强的组织才能、办事能力和理财能力派上了用场。她自己筹集到了可以最迟到1952年偿清的贷款，在布尔格（布尔格-蒂夫）市附近买了一块地皮，并为自己的岛上安乐窝设计了蓝图。希姆莱也借给她一万马克。1935年春天就可以举行新房上梁仪式了。莉娜想早早把房子造好，好在丈夫夏天来度假时给他一个惊喜。但海德里希实际上直到深秋才成行，一开始是因为公务缠身，其后又去参加了纽伦堡党代会，这次党代会通过了纳粹《种族法》。连亲自为这幢房子作保的党卫军头头希姆莱，都事先通知他本人要来费马恩岛参观。莉娜知道希姆莱对园艺非常讲究，所以一连几天她都在忙着除草，连最不起眼的杂草也不放过。尽管如此，希姆莱来了以后还是像个学究一样吹毛求疵地教训女主人：“那个也得拔掉！”

莉娜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并不欣赏党卫军头头儿希姆莱。她觉得丈夫有这么个顶头上司只会限制他想做一番事业的欲望。“他（海德里希）总是把希姆莱推到自己前面。事情也只能这样了。因为还是希姆莱在老党员和希特勒那里有声望……所以不管自己喜不喜欢他，他必须打着希姆莱这块招牌……”（莉娜·海德里希访谈，引自君特·德施纳编撰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

海德里希干上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和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头头儿这两桩差事，决定了他们家经常需要搬家。在慕尼黑和柏林两地之间搬来搬去，每次都是莉娜一个人操办的。她觉得有海德里希在“只会碍手碍



脚”。海德里希夫妇先后搬了七次家，1937年才最终在柏林施拉赫滕湖畔相对稳定地安顿下来。

因为根本不需要搞什么应酬，海德里希夫妇有一幢小房子就足够了。房子的底层有三间房间，外面有阳台、厨房和地窖，卧室和客房在二层，顶层是他们家两个佣人住的地方。莉娜还从海德里希父亲已经解散的音乐学院弄来了一架钢琴，送给丈夫做生日礼物，让他大吃一惊。虽然地方有限，但莉娜在自家的小花园里终于有机会稍稍满足一下自己的务农爱好了：她栽了果树，种了矮树篱，还造了一个鸡舍，算是对城市生活的反叛。她觉得，生长在大城市里的孩子也应该有动物做伴。1934年12月28日，莉娜又生了二儿子海德尔。

海德里希和太太在柏林施拉赫滕湖虽然没几个朋友，却有个奇特的邻居——神秘莫测的德国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这两个相互竞争的情报部门的头头儿相识已久，外界盛传他们是对头，其实两人在工作上有良好密切的合作关系。尽管如此，这两个情报高手在惊讶地发现两家居然比邻而居之后，还是打算对这一巧合善加利用。海德里希是个冷酷无情、为强权服务的技术专家，卡纳里斯则脾气古怪，感情细腻，钻研人智学<sup>①</sup>是他的一大爱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两人逐步建立起了友谊，他们的家人也成了好朋友。海德里希的两个儿子比卡纳里斯的两个女儿虽小得多，但常在一起玩儿。两家人经常一起外出散步，相互登门拜访，一起轻松愉快地聚餐，关系越来越好。这种私交对国防军军事情报处和盖世太保与党卫军保安处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最终促使国防军和党卫军情报部门之间达成了一项“十点协议”，明确了双方的责任分工。个头矮小的卡纳里斯向以行事怪异出名，经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和豢养的几头矮种猎犬一起锁在屋子里面，对此，海德里希一家人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卡纳里斯这样做是为了和狗一道玩耍和聊天，他还把对它们说的话记录下来，整理成分析动物心理的文章。莉娜在回忆录里对这段邻里交往有如下记载：“两家老相约搞一些音乐晚会，埃里卡·卡纳里斯和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分别担任第二和第一小提琴手。那个冬季充满音乐，是一段美好安宁的时光。两家人带着乐器互访，男人们有时还一道骑马到格鲁内瓦尔德去

<sup>①</sup> 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施泰纳创立的把人类作为研究一切知觉中心的“精神科学”学说。



散心……”不过，更重要的是，有了这种家庭交往，互为竞争对手的海德里希和卡纳里斯能够经常有机会不动声色地相互摸底，窥探对方的意见和看法。有时双方也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比如，海德里希一次突然发现，卡纳里斯的女儿爱娃正在翻他的写字台。

1938年3月，莉娜看见丈夫一下子忙了起来。那时德军正开进奥地利，身为保安处的头头儿，海德里希匆匆赶往维也纳。当时保安处接到的一项任务是：“紧随进驻部队，参照国内做法，负责维护当地政治生活秩序”。海德里希对此早有准备，在德国和奥地利“合并”后，他立即动手拘捕了一大批奥地利的反对派。莉娜也随丈夫到了维也纳，住在雷吉娜饭店。她在回忆录中对纳粹占领的维也纳作了如下描述：“我们决定一起去看戏。剧院上演的大概是《蒂罗尔，我可爱的故乡》。演员穿着民族服装登台表演，几个人还唱起了阿尔卑斯山歌。气氛有些悲怆，有人甚至流了泪。戏演完后有人把一面卍字旗扛到了台上……”1938年4月1日，奥地利首批犯人被运往达豪集中营，犯人包括舒施尼格政权的干部、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海德里希忙个没完没了，莉娜开始不耐烦了。

莉娜坚信丈夫做的事情是为奥地利人好，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现在该劝赖因哈德回柏林了。应该让奥地利人自己去完成合并事宜……而且他们已经完成了。我还认识了格拉茨及附近地区几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

1938年，善于精打细算的莉娜租下了一个名叫帕尔洛的小狩猎场，紧挨着帝国狩猎事务主管赫尔曼·戈林家的绍夫海德林地。莉娜这下子如鱼得水。在一个森林管理员的帮助下，她认真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在猎区内开辟了一些小路，造了几个高架猎台，然后又通过了狩猎资格考试，成了一个狩猎迷。但是，帕尔洛的这段田园生活好景不长，因为帝国元帅戈林觉得受到了邻居的打扰。让莉娜生气的是，两家发生争执后，丈夫最终还是向戈林低头让步了，全家被迫迁出了帕尔洛。这件事让莉娜气得直骂：“戈林，这个臭无赖，大肥佬，肚子里撑得满满的还嫌不够，简直贪得无厌，完全是个疯狗！”（莉娜·海德里希，《生活在战犯身边》）依着莉娜的想法，丈夫应该“把那块地从戈林的嘴里夺下来”，但海德里希非但没这样做，听到太太把帝国第二号人物骂个狗血喷头，他还一脸尴尬。好在帕尔洛这段小插曲结束后，莉娜又开始了新生活。她在瑞恩附近又看上

了一个能打猎的好地方，把它买了下来。这块名叫施托尔普霍夫的狩猎场里有个废弃的农庄，有二十公顷耕地。不过，按照纳粹德国的农场继承法，这块地只能由专业农户耕种。海德里希执行公务时无数次践踏道德法则，个人生活中却处处循规蹈矩。但这难不倒他太太。莉娜觉得，这个农场给自己施展农艺方面的抱负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于是她开始孜孜不倦地学习农艺，通过了勃兰登堡省农业行会的务农资格考试，获得了“新农民”的称号。

莉娜对丈夫的事业发展深感自豪，而且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根据一个帝国领导人登记卡，1937年时海德里希已有多重头衔。他是党卫军中央安全局局长、保安警察头目、帝国刑事警察局局长以及国家秘密警察（即盖世太保）头头儿。一听到“盖世太保”这个词，不仅普通百姓，连老资格的纳粹党人都会不寒而栗。他们的恐惧是有理由的，因为保安处的保险柜里藏有各类文件，对国家敌人的阴谋活动以及自己人的不轨行为都有详尽的记录。此外，大家也清楚，海德里希干他那份刽子手的工作很卖命，一点私情也不会讲。冲锋队头头儿恩斯特·罗姆是海德里希的惟一好友，但希特勒以国家利益至上为由下令除掉罗姆时，海德里希根本没替朋友说情。而此前不久，他还刚刚让罗姆做了大儿子的教父。

警察头头儿朋友不多造成的后果是，他和太太在纳粹社交圈里成了众人避之惟恐不及的弃民。夫妻俩曾就自身的处境进行过长谈，对此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也谈起了我的孤独。他（海德里希）双手抱着我的头，盯着我说：我们一定要有朋友吗？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不需要和别人分享友谊。以后咱们还像以前那样！”他们自我安慰地认为，干“这份不讨好的工作”，本来就不能指望有什么朋友，两人还是相依为命吧。即使在官方社交场合，海德里希也要满腹狐疑地研究一下在场人员的名单，以便警告太太不要与所谓的“可疑人物”交谈。莉娜以特殊的方式适应了自己孤零零的处境，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说：“孤独已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和内涵。从此以后，我就以我丈夫的想法、愿望和梦想作为我生活的全部。”

莉娜对丈夫的认同是相当彻底的。她的余生一直为这个盖世太保头头儿的所作所为辩解；实在不占理的时候，她就极力歪曲事实。“罗姆事件”中，海德里希让人干掉了这个冲锋队的头头儿和其他八个冲锋队成员。但



按莉娜的说法，海德里希是奉“元首”之命行事，别无选择。此外，莉娜还称，对于1938年发生的帝国“水晶之夜”行动，她的赖因哈德事先毫不知情，听说此事后颇感意外。

“一天晚上，我们很早就睡了。后来，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问：出了什么事？施密特（在海德里希家担任警卫的党卫军小队长）答道……‘犹太教堂着火了！’……我把赖因哈德叫醒……他胡乱套上衣服就赶到办公室去了……几小时后他才回家……”按莉娜的说法，海德里希一进门就告诉她：“是戈培尔干的！戈培尔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呢？”

戈培尔的确是所谓“水晶之夜”的始作俑者，但海德里希向所有盖世太保指挥部和分支机构发出了一份电报命令，要求秘密警察“根据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按海德里希的指令，只有在不会危及周围房屋的时候才可以放火焚烧犹太教堂；只能抢劫，不能破坏犹太人的住宅；抓犹太人要挑既有钱又健康的男性，监狱满了就别抓了。

与许多纳粹精英人物的太太不同，莉娜不光对丈夫的公务感兴趣，本人还想干政。纳粹正统观念要求女人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在这一点上，莉娜常常反其道而行之。1939年，海德里希以帝国刑事警察局局长的身份，打算召集一次国际刑警委员会会议，莉娜觉得机会终于来了，于是提出要当会议的女东道主，负责接待与会代表的太太，这在第三帝国可是个新鲜事儿。莉娜最终以充足的理由说服了所有反对者。根据她的精心设计，大会要为与会代表的太太们专门安排活动，纳粹就此可以监听女人之间所说的知心话，以便了解她们丈夫的工作底细。由于二战爆发，会议没有开成，但莉娜的点子没有白出，“基蒂沙龙”就此而生。

“基蒂沙龙”是德国秘密警察在柏林开设的一家优雅的娱乐场所，那里有一帮经过他们专门训练的妓女负责套客人的话，这些客人一般是国宾和外交官，还有一些纳粹的党内要员。海德里希手下的技术人员躲在地下室里，任务是录下上面的所有谈话。

海德里希虽是个被解职的海军军官，1939年在帝国中央安全局局长的任上却是个大忙人。他组建了一支预防警察队伍，让他们到处打探，看看哪儿有“人民的害虫”，不管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都要想方设法挖出来灭掉。这么一个技术性很强的男性机构里面，当然不可能有莉娜的位置，她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抱怨海德里希的“公务”和身边那些有意思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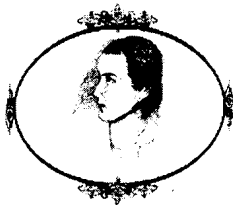


情和自己越来越没关系了。想当年丈夫刚出道，她这个勤奋聪明的女人可是他的战友。

海德里希夫妇当时已经过上了奢侈的生活。每年有两万帝国马克的进账，财政拮据的年代已经成了过去。他们在柏林和费马恩岛都有住宅，两处都有佣人照管。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农庄，有私家车和司机。而这一切的代价是莉娜的孤寂和冷落，她自己竭力想摆脱这种状况。她只能在周末偶尔见到沉默寡言的丈夫。海德里希业余时间爱好飞行，莉娜却不能参与，因为第一次坐他开的飞机她就头晕恶心。海德里希先后取得了好几个飞行执照，最后还通过了战斗机驾驶员考试。“家庭生活根本无从谈起。孩子教育、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联系……一切都得我一个人照管和负责。终于我忍不住开始对赖因哈特发牢骚了……”（莉娜·海德里希回忆录，《生活在战犯身边》）

后来，海德里希在家里的做派也和办公的时候一样了，于是夫妇间出现了婚姻危机。“……他那对靠得很近的蓝眼睛里总是射出冰冷、审视、怀疑的目光，还常常带有几分焦灼……说起话来也是只言片语，急急忙忙，盛气凌人……”（海德里希的部下维尔纳·贝斯特对其上司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莉娜想出了一个主意：为“盖世太保的女人们”专门办一个体育俱乐部。她找来一个体育教练，很快就有不少女人响应她的倡议，丈夫上司的太太发了话，她们不敢不从。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锻炼结束后，我进了淋浴室，我让别的女人也进来冲一冲。大家都站着一动不动。于是，就像我每天都会当众这么做似的，我脱下体操服，光着身子走到莲蓬头下面，拉了开关绳……没有谁敢率先像我这么做……”不过，渐渐地，其他人终于克服了羞涩，她们的晚锻炼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群雄心勃勃的女人有几个甚至参加了体操考试。莉娜为她们设立了“盖世太保女人体育奖”的金奖和银奖。俱乐部起初只是练体操，后来，一个前女舞蹈演员表示愿意教大家跳舞，于是俱乐部又新增了舞蹈项目。最后，俱乐部在柏林歌剧院举办了一场联谊晚会。晚会上，听从莉娜的指令，秘密警察的太太、未婚妻和女友们扮成歌舞剧舞女，跳起了活泼欢快的康康舞，莉娜自己则穿着黑丝袜、高筒漆皮靴和纱裙在台上领舞。

莉娜这番张罗虽然得到了丈夫的认可，但他后来还是很少回家与太太团聚，还为此找各种借口。他似乎并不理解太太的抱怨。海德里希在给太



太的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莉娜，我认为过去几周的日子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无比沉重，特别是你无端对我失去了信任，使我深受伤害……”

莉娜是绝不会置婚姻于不顾的。她另想了个办法，转而在一个名叫瓦尔特·舍伦贝格的人身上狠下工夫。此人是海德里希安全局里的工作人员，聪明、年轻、举止文雅，但有喜欢拈花惹草的名声。舍伦贝格婚姻不幸福，莉娜就去安慰他，和他一道出去，一个劲儿地与他调情。一天深夜，舍伦贝格与莉娜幽会后回到家里，妻子正在等他，一见面就把盐酸泼到了他脸上，两人于1941年离了婚。据舍伦贝格说，后来他的上司也导演了同样恐怖的一幕。海德里希把他和盖世太保臭名昭著的刽子手米勒一道约到了一家饭馆，仔细盘问他跟莉娜私下里都干了些什么。其间，海德里希还滴了几滴毒药到他酒杯里，不过舍伦贝格承认，海德里希用解药化解了毒性。

莉娜通过搞这次她称之为“舍伦贝格剧”的婚外恋大获全胜，逼得醋意大发的丈夫终于又回了家。按她的说法，两人的婚姻后来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最终变得很美满，1939年4月9日，她生下了大女儿西尔克。舍伦贝格后来去了巴黎，与时装设计师科科·夏奈尔发生了一段关系，此事虽然舍伦贝格在回忆录中只字未提，但却颇引人注目。

1939年8月，海德里希巧妙地策划了上西里西亚格莱威兹镇德国广播电台被袭事件。他让保安处的人扮成波兰人攻进电台，用波兰语朗读了一段号召与德国战斗的声明，并摹拟了枪战的响声。他策划这起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动，就是为了给德军入侵波兰制造借口。莉娜事后回忆道：“他认为这是一条妙计，就毫不犹豫地干了，甚至似乎还开心得要命。”不管怎么说，1939年9月1日晚，希特勒亲自向海德里希这个好帮手表示了谢意。不过，为以防万一，海德里希还是立即就写了一份遗嘱，拿他自己的话说，当时“被希特勒握过的那只手还烫着呢”。

“亲爱的莉娜！亲爱的孩子们！作为元首的战士和好丈夫、好父亲，我得考虑到所有的事情……明早4时45分德军就要开始进攻了，10点钟国会要开会。我不认为我会发生什么意外，但假如命该如此，我的财产就属于莉娜你。为了你自己和孩子们，你要好好照管这些财产……好好教育孩子，让他们相信元首和德国，忠于纳粹理想，严格要求自己，向善，对本民族的人要宽宏大量，对国内外的所有敌人冷酷无情，对子孙后代负





责。最亲爱的莉娜，我可能有种种缺点，在工作、道义和思想等方面都犯过错误。但实际上，我非常非常爱你，同样，我也非常爱孩子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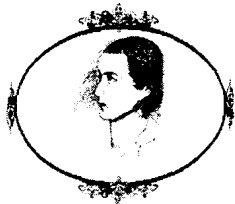
在纳粹要人的太太圈子里，莉娜不太招人喜欢。大家认为她对别人冷漠、失礼、盛气凌人，总是自以为是，动不动为一点小事就发火，还不尊重纳粹上流社会不成文的等级秩序。她经常犯上，与海因里希·希姆莱打招呼时，不尊称他为“党卫军领袖”；有一次她还命司机开车超过了前面希姆莱太太的车。不过，后来莉娜倒和希姆莱成了知交。尽管莉娜口碑不太好，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艾米·戈林还是年年都邀请她到卡琳宫参加圣诞节前的聚会，直到两家因为海德里希家的狩猎场问题发生争吵才作罢。

作为保安警察和国家秘密警察头目，海德里希是国务秘书级<sup>①</sup>官员，但他并没有面见希特勒作汇报的资格。种种迹象表明，希特勒成心要回避他。按照工作程序，他的所有请示都必须通过顶头上司“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呈递希特勒。海德里希夫妇并不算帝国显贵，所以他们只有在希特勒一年一度举行群众招待会时才会被请进柏林帝国总理府。不过，在这种场合，希特勒往往会张开双臂热情地欢迎他们，冲他们大声说：“多俊的一对夫妇啊，你们真让我羡慕！”希特勒每年都要邀请各国外交使节和为数不多的一些为他所赏识的人士，参加在拜罗伊特举行的瓦格纳音乐节，但海德里希夫妇从未收到邀请。其实，在纳粹要人中，海德里希这个秘密警察头头儿无疑是最懂音乐的。与众多在音乐会上听得直打瞌睡的贵宾相比，海德里希更知道如何珍视应邀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这一荣誉，而且其不俗的外表也会给帝国增色。这个盖世太保头头儿被认为是理想纳粹形象的化身，是党卫军所推崇的那种“齐格弗里德<sup>②</sup>型”的美男子。这等人物在希特勒的朝臣中很难找到。金发、高个、长颅，海德里希正是纳粹希望通过所谓“置换生殖”<sup>③</sup>繁殖出的那一种人种。出生于德国北部的莉娜长相也完全符合纳粹理想女性的标准。纳粹分子照镜子的时候都巴不得能看

① 即副部级。

② 瓦格纳乐剧《尼伯龙根指环》中一个英勇善战的传奇英雄。

③ 当时纳粹把欧洲人粗分三类：最优秀的北欧日耳曼人、最劣等的犹太人以及居于两者之间的拉丁语系民族如法国人、意大利人等。置换生殖，是纳粹试图通过不同基因的结合来弥补中间那一类民族缺陷的一种方式，如让德国人与法国人结婚。



到里面出现的是海德里希夫妇那样的脸形！很多纳粹党人都对“元首”的个人魅力着迷得不得了，但海德里希和他太太却没有这种感觉。莉娜曾转述过她丈夫说过的一句冷冰冰的话很说明问题：“那个老东西要是做什么蠢事，我就宰了他！”（莉娜·海德里希 1975 年在接受维尔纳·马泽尔教授采访时所说的话）

1941 年 9 月底，一直担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sup>①</sup>总督的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因办事不力被解职，而公开的说法却是因病去职。希特勒任命他的警察头子担任代理总督。鉴于捷克人在那里给纳粹占领当局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希特勒说他是派海德里希去当阿尔瓦公爵<sup>②</sup>。当天晚上，海德里希就兴冲冲地告诉太太，他“被元首派往布拉格去整顿秩序”。莉娜的反应很痛苦：“这对我来说太可怕了。他老是不在家，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儿，他回家就像做客一样。我和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结婚已经十年，但我想，这其中就有七年他不在家。除了忙本职工作外，他度假时又常跑到前线去开飞机打仗，此外还要参加那么多飞行训练，不然就是练击剑，每天上班前要练至少一个小时。周末又是这个比赛那个选拔赛的……”（莉娜·海德里希访谈，引自君特·德施纳编撰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

当莉娜提出要离婚时，海德里希恳求她把事情往好处想。谈起捷克人时，海德里希曾说：“我得让捷克人明白，他们是不可能回避从属和听命于德意志帝国这一现实的。”海德里希上任（1941 年 9 月 27 日）不久，莉娜就带着孩子们乘坐豪华列车抵达布拉格。在警察的严密保护下，他们被送往赫拉德欣宫。这座原哈布斯堡王宫的左翼就是他们的住宅。莉娜这个费马恩岛出生的教书匠的女儿和已取得证书的“新农民”，此时思想已发生了巨大转变。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把她征服了，现在别人和她打招呼都得称她“阁下”。与此同时，她丈夫已开始通过实施紧急状态、军管和宵禁，着手“解决捷克问题”。

据莉娜说，当她想布拉格附近找一个体面的住宅时，听人说有座环境优美的帕南斯科·布伦扎尼宫。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求赖因哈德去了

<sup>①</sup> 纳粹德国在捷克境内强占的地区，1939 年 3 月 16 日希特勒宣布成立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

<sup>②</sup> 西班牙历史上的著名军人和政治家，1567 年至 1573 年任尼德兰总督期间，对当地人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



解一下此事……复活节前（1942年）我们乘车去了，在一个大庄园内，我们见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周围是大片的草地和树林，一座梦幻般的宫殿。见到宫内有那么许多房间，我心里略感不安。共有三十间房，还有个七公顷的大庭院，我该拿它们怎么办呢？复活节时，我们成了宫殿的主人……”

实际上，原属于犹太糖业大亨费迪南德·布洛赫-鲍尔的帕南斯科·布伦扎尼庄园，早在1939年就被德国人没收了。因为环境优雅，建筑保护得极好，这里曾被选作帝国总督官邸。庄园内其实有两座宫殿，一座是巴洛克式的，另一座是复古主义式样的，周围有一百二十五公顷的树林和一个大苗圃。海德里希夫妇住进了那座白色的漂亮建筑，结婚十年后首次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家务有众多捷克仆佣照管。“每个仆人还有自己的仆人，这还是相当奥地利化的。”“简直棒极了！”莉娜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谈及此事还是兴奋不已。除了照管领地外，莉娜又添了一个爱好——收集旧瓷器。有一次希姆莱托副官沃尔夫寻一个合适的生日礼物送莉娜，有人便拍了封电报告诉他：“海德里希夫人会喜欢老维也纳瓷，古典主义时期带有蓝蜂房标记的那种。希特勒万岁。”为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身为党卫军二级上将的沃尔夫，不仅找遍了工艺品市场，还把众多博物馆的馆藏也查了个遍。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负责人遗憾地告诉他，他要找的那种瓷器馆里一件都没有。盖世太保的人也报告说，“维也纳的工艺品市场如今已被淘空了。市面上肯定已买不到这种东西。没收的贵重物品中同样也没有老维也纳瓷”。

海德里希夫人最后得到的礼物选自布拉格附近哈布斯堡王朝的科诺皮什捷宫，那里保存了奥地利王储弗朗茨·费迪南德的大量收藏。虽然海德里希夫妇在波希米亚并没有像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那样，恬不知耻地大发横财，掠夺价值连城的名画、首饰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但是，只要自己喜欢或布伦扎尼宫需要某个摆设，莉娜是毫无顾忌的。丈夫在这个国家平息叛乱期间，莉娜逛了波希米亚的各个王宫，不时“借走”几件瓷器、古玩和古式家具。

海德里希夫妇俩对所谓“犹太人问题”的看法有分歧，但对解决问题需要采取的措施，意见却完全一致。莉娜公开宣布自己是反犹太主义者，她还陈述了理由：“在我们看来，那么多跑到我们国家来的波兰犹太人是闯



人者和不速之客，他们和那些收获季节来帮我们收割的波兰人并不是一回事儿。那些波兰帮工住的是临时木板房，干完活后也就离开了。而犹太人却留下来了。他们会说某种德语，但却并不是德国人，而且他们不打招呼就拿别人东西……和他们共处就像强迫婚姻一样，夫妇俩见到对方就讨厌。奇怪的是那些犹太人并不明白这一点，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我们国家是外人，你对他们公开表示憎恶也没有用。如果当时有精神疗法医生就好了，他们一定会劝那些犹太人离开德国……”

海德里希的父亲对犹太人并没有偏见。在哈雷，他和几个祖祖辈辈就住在当地的有教养的犹太家庭一直有来往，听说别人把自己当做犹太人，他也就笑笑而已。他儿子赖因哈德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分不清城里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显要人物有什么区别，他曾经一直把犹太人敬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文化的民族。但是，受到纳粹种族主义论影响之后，海德里希认为，“生物学意义上的最佳人种素质仅仅存在于日耳曼—德意志人身上，而犹太人就像吸血鬼一样吸附在德意志民族的躯体之上”。（莉娜·海德里希回忆录，《生活在战犯身边》）

1941年6月30日，海德里希接受了一项任务，他太太认为这“后来成了他的最主要的罪状”。这项任务涉及“犹太人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此海德里希设计了从移民到灭绝的各种方案。在海德里希（以“筹备最终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专员”的身份）主持下，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召开了，会议于1942年1月20日通过了一系列必要的措施。莉娜在回忆录中复述了丈夫以讽刺挖苦的口气所做的一段讲话：“此事涉及组织所有欧洲犹太人移民到俄罗斯中部地区……西伯利亚并不是个吓人的地方……那里一切应有尽有：肥沃的土地，还有各种矿藏。他们（犹太人）充满智慧，他们需要重新开始。我们想一次性地彻底消除这一问题。目前的战事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经受不了这次迁徙，特别是那些年纪大的犹太人。必须考虑到自然减员的情况……那些被我们遣送到那里的犹太人会慢慢习惯的……”

按照莉娜的说法，海德里希当时已认识到这份差事需要自己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而他为了事业又不得不这么做。“在他陷入绝望的时刻，我曾劝他还是放弃吧。但他说，他既不愿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我没有任何负疚感。我可以出来卖命，别人尽管去追求私利好了。’”（引自《褐



衫精英》，罗纳德·斯梅尔策、赖纳·齐特尔曼编）

在波希米亚，新任帝国总督在故意公然实施一段为期短暂的暴政之后，又转而开始拉拢捷克各界人士。他改善了社会条件，让劳动人民住进了豪华饭店，对工人和农民大献殷勤。海德里希明显比前任会办事，因而得到了希特勒的赞赏。而盟军的情报部门则对当地人在政治上表现出的麻木不仁的状况深感忧虑，这样下去，组织有效的抵抗运动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海德里希还将布拉格的鲁道夫宫修缮一新，使其成为音乐中心。1942年5月，他利用布拉格音乐周的机会，为自己的父亲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音乐会上，一个四重奏乐队演奏了布鲁诺·海德里希的作品。演出的具体时间是1942年5月26日，星期四，地点在布拉格的华伦斯坦宫。帝国总督到场时，全体观众起立，以德国人的方式向他致意。海德里希及夫人神情泰然自若，显得心满意足。

1942年5月27日上午，海德里希在帕南斯科·布伦扎尼宫大门口向太太告别。他要去柏林向“元首”作定期述职。同往常一样，从自家住宅到布拉格的这段路，这个帝国总督和盖世太保头头儿是开着敞篷车走的。这次他连一个武装随从都没有带。三个年轻男子正在布拉格城边上等着这辆车。他们是前不久刚刚跳伞来到布拉格附近的。当海德里希在一个急转弯处刹车时，三个年轻人中一个名叫詹·库比斯的人扔出了一枚炸弹。炸弹在车底下爆炸，海德里希受了重伤，但他还能够跳起来用手枪向正在逃跑的袭击者射击。

这次针对帝国总督的暗杀行动是由爱德华·宾斯领导的伦敦捷克流亡团体策划的。海德里希在波希米亚实施的巧妙的安抚政策，让伦敦的捷克流亡者越来越不安。搞这次暗杀是为了让世人看到捷克人仍在与希特勒作坚决的斗争。莉娜每天都到布拉格柳博夫卡医院看望受了致命伤的丈夫，给他带去自己熬的肉汤。几次手术后，海德里希的状况看上去逐渐好转，但后来他突然不行了。死前他对莉娜说了一句话：“回费马恩岛去！”1942年6月4日，广播电台宣布：“党卫军上将、警察总监、国家秘密警察负责人、帝国中央安全局局长、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代理帝国总督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因伤不治，于今天去世。”

当晚，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狼穴”“元首大本营”对海德里希之死发表了一通冷漠的评论：“像海德里希那样有政治影响的人必须明白，他们



就像野兽一样会遭到伏击”，他们必须知道，“有无数人都在盘算着如何干掉他们”。如此轻率地开一辆敞篷而且没有防弹保护的车出行，“完全是弱智，对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无论如何，这只能被视作“愚蠢或纯粹的麻木不仁”。（亨利·皮克尔，《希特勒“元首大本营”席间谈话录》）不过，在正式致悼词时，希特勒还是将其情报头头儿赞扬了一番，说他是一个“具有铁石心肠的人”。

当时莉娜就快要生第四个孩子了，为海德里希举行的大部分殡葬仪式她都没有出席。纳粹帝国按照有关的礼仪规程，在布拉格城堡为海德里希举行了排场很大的国葬，莉娜的父亲、弟弟和婆婆代表她出席。葬礼上，希姆莱一直牵着海德里希几个孩子的手，哀乐选自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元首”献了花圈，随后大家行军礼。抓拿凶手的赏金高达一百万帝国马克。

纳粹当局并没有指望能抓到凶手，但却采取了极为残暴的报复行动，当地人因此更加憎恨德国占领当局，而这正是暗杀的组织者想要达到的效果。布拉格 936 临时军事法庭和布吕恩 395 临时军事法庭对三百九十五人做出死刑判决后，捷克人愤怒到了极点。此外，纳粹还仅仅出于怀疑，就使科拉迪诺地区的利迪泽村遭受了一场地震般的浩劫，他们声称“掌握了不容辩驳的证据证明，当地居民为此案的凶手提供了帮助”。该村的所有男性居民都被枪决，妇女和孩子们被送进了集中营。

在纳粹党内，海德里希被视作为国捐躯的烈士，莉娜则被认为是“帝国的寡妇”。党卫军领袖和所有集中营的总负责人希姆莱在海德里希棺材旁致悼词时承诺说：“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应该得到我们全部的爱和体贴照顾，他们在党卫军这个大家庭里应该像在自己家一样感到舒适和温暖……”希姆莱本人成了海德里希子女的监护人，对他们关怀备至。莉娜（她于 1942 年 7 月 22 日至 23 日夜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女儿玛尔特）也受到了纳粹德国的特殊优待，除了每月能领到一笔丰厚的生活补贴（大约一千九百帝国马克）外，她还得到了海德里希二十万帝国马克的人寿保险。在卖掉柏林的住宅和施托尔普霍夫狩猎场后，这个富寡妇在德意志帝国银行账户上存款已高达六十万帝国马克。此外，她还获准继续住在布伦扎尼宫里，不用交租金。纳粹政权本来已计划把这座庄园永久赠给海德里希后代，但由于莉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最终的决定迟迟没有做出。人们



总是尽可能满足莉娜的各种要求，而她还是总想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可是，纳粹当局是不会愿意容忍一个“干政的寡妇”的。后来，莉娜启程访问丹麦、法国和挪威，计划又要会见当地政要，又要发表演说，希姆莱忍不住发话了：“尊敬的海德里希夫人，我听说您除了访问丹麦外还有其他访问计划。请允许我非常坦率地告诉您，我认为这不合适……您曾与丈夫共同度过了一段丰富的政治生涯，而且也发挥了自己的影响。但我认为，现在您必须下大决心退隐了……我衷心地恳求您，明智一点，约束一下自己，还是养养花、种种地去吧！一个寡妇家，别再四处访问和干预政治了！希特勒万岁！”（1943年8月7日希姆莱致莉娜·海德里希的信）

做个纳粹所设想的那种模范妇女，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这让莉娜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散心，她于1944年春赴奥地利南蒂罗尔疗养，希姆莱的私人参谋为她安排了这次豪华之旅，替她弄来了外汇，并为她和孩子们以及一名女伴在梅拉诺的公园饭店租了房间。

1944年初，莉娜收到一封恐吓信。党卫军立即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但一无所获。事后党卫军派了一支特别行动队和几只警犬到布伦扎尼庄园保护莉娜的安全。当年夏天，莉娜以安全不能得到保障为由，不许儿子海德爾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没有其他人像她这样大胆妄为。莉娜给当地的希特勒青年团办事处写信时说：“……我觉得自己有理由在战争期间不允许儿子参加……既然帝国党卫军领袖都认为有必要派一名警卫时刻守护着我的几个孩子，那么我儿子就显然不能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值勤。本周六别人也要我去接受这么一次神经考验，您能理解，这连我自己都受不了。”

希姆莱此时已成了孤儿寡母的朋友和靠山，总是尽可能地帮他们一把。每年圣诞节他都会送一枝圣诞蜡烛，平时也经常送些玫瑰花。莉娜家林子、花园或地有什么活儿要干，或是家里有什么需要修理时，希姆莱也会派些囚犯去帮忙。

把集中营囚犯借给需要政府扶持又效忠纳粹政权的企业，当时并非罕见。因为战争，当时很多企业劳动力极为短缺，能得到集中营囚犯做劳力使它们获益匪浅，因为对那些人来说，既没有严格的工作时限，也没有各种麻烦的劳保规定。如何使用那些已被宣布为贱人的囚犯以及给他们什么待遇，完全要看企业主的良心了。残酷剥削和折磨，甚至劳累致死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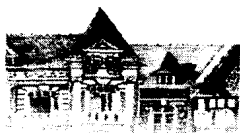


事，根本就无人过问。

1942年7月，八十名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犹太囚犯被派到布伦扎尼庄园。他们的住处被隔离开来，并且受到极为严密的监视。莉娜在回忆录中称，她的庄园中有集中营囚犯干活对她来说完全是意外，她事先并不知情。而这一说法严重歪曲事实，实在让人难以置信。莉娜称，她和孩子们在外地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到家时看到的情形令她大吃一惊：“……我们到家后，听到宫中传来阵阵鼓声，房前还有许许多多穿囚服的男人。出了什么事？……原来有一队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被派到布伦扎尼庄园来了。他们被安排在马厩里住。屋里铺着白瓷砖，很宽敞，还有自来水……刚开始我还没怎么担心。一年过去了，这些人还没走，我才开始认真考虑他们待在这儿的问题。”这批囚犯的负责人对莉娜解释说，这些人的饮食由党卫军照管，工资由当地市长支付。“一天早上，我看到有人正用鞭子揍一个劳工。我是站在窗前看到这一情况的，随后立即就跑下楼去了。”海德里希夫人称，她让人立刻住手，有人告诉她，那个打手也是囚犯，是集中营里的“犯人头儿”。“我请求党卫军领袖别让犯人们再在我们家干活了。”（莉娜·海德里希回忆录，《生活在战犯身边》）

但是，人们从海德里希夫人与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弗洛森比格两处集中营的通信中看到的情况，与她回忆录中的说法完全是两回事。从这些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强迫劳工到她的庄园里干活是莉娜·海德里希自己提出的要求，并得到了好友希姆莱的支持。1943年9月，当那批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囚徒结束了秋季劳作即将离开她家时，莉娜对损失这些便宜劳力极力表示反对，最后有关当局只好又从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给她派去了十五个犹太人和人数更多的“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男女教徒。同前一批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囚犯劳工一样，这些人一日三餐也由布伦扎尼庄园供应。此外，按说莉娜还得向犯人的主管集中营缴纳每人每天三马克的使用费。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部分囚犯的雇主总是认真按时向负责管理和看守集中营的党卫军骷髅队缴纳应付的款项。但是当集中营要求莉娜交规定的囚犯使用费时，她却气愤地说：“我得提醒你们，派那十五个犯人来这儿的时候已经说好了，这些犯人由我来供养。当时并没有提到还有其他费用……我想，你们的管理部门一定是弄错了……”（1944年7月25日莉娜·海德里希致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信）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双方书信来往不断，争吵十分激烈。海德里希太太一再坚持她只能承担犯人每天零点六马克的伙食费。最后，党卫军经营管理总局局长、党卫军上将、武装党卫军将军波尔只好让步：“……现在我不再要她交一分钱了……万一海德里希太太让党卫军领袖出面干预，可把这一情况告诉他……我会从其他资金中拨款来冲抵这笔开支……”

最终是由党卫军领袖私人参谋部管理处设立了代号为R的特别账户来支付这笔经常性开支的。此外，海德里希太太还可以要求再得到十名“耶和華见证人”教徒。战后人们开始探讨强迫劳工的待遇问题时，捷克驻西柏林军事使团拿出了有关文件和照片，指控莉娜·海德里希授意他人在布伦扎尼庄园虐待囚犯。

丈夫死了一年之后，莉娜再遭厄运。1943年10月24日，莉娜十岁的大儿子克劳斯一个人骑车出了布伦扎尼庄园的大门。他事先得到母亲的许可，因为庄园前的那条马路平时车很少，看上去不会有任何危险。克劳斯在大门口还遇到了“希尔德布兰特叔叔”，一个事先约好来他家喝茶的客人。但是骑出去没几米，他就被一辆载重卡车撞倒，车轮从他身上碾过。半小时后，克劳斯死了。拍给希姆莱的电文是：“十万火急，立即通知到人——克劳斯·海德里希今天17:15因车祸而死。”党卫军报《黑色军团》上也刊登了一小块讣告。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把儿子葬在了布伦扎尼园子里。万圣节时，我在他的墓上点了蜡烛，圣诞节时他得到了自己的一棵圣诞树。我简直都要疯了。”

1944年底，莉娜想把自己的庄园里使用集中营囚犯变为一种长期的安排，她想到了建立“奴隶营地”的主意。一次希姆莱来访时，她把的想法告诉了他。希姆莱很感兴趣地说：“您的设想真是一个心理学的杰作！”闻听此言，寡妇莉娜简直欣喜若狂，一幅“无比广阔的前景”展现在她的面前。她后来写信告诉希姆莱：“囚犯问题让我非常兴奋，我又重新规划了一番……释放通知书一到，我就会让他们穿着现在的衣服集合。我要先向他们宣读释放令，然后再发表一通讲话，让他们不得不感激党卫军领袖的莫大恩惠……其后，我要订出一些规章，让他们向布伦扎尼庄园效忠，既要忠心耿耿，又要勤劳。他们必须在这些规章上签字，然后才能换上普通人的衣服大吃一顿……再过上一段时间，我还想申请让他们的家属也过来。我觉得做到这一点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大多数家属仍被关在集



中营里。工作分工问题仍叫我很头痛，因为我想把这些男人调教成一帮靠得住的人，这样租约到期后在其他企业我还可以用上他们……哎呀，党卫军领袖，您瞧我乐得都晕头转向了……我还要再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养牛方面，看来我现在也有进步了……”（1945年1月9日莉娜·海德里希写给希姆莱的信）

在海德里希家庄园里干活的集中营囚犯，最害怕的莫过于重返集中营，他们也一再暗示不想再回那个以“通过劳动进行灭绝”为管理方针的鬼地方。莉娜觉得自己像个大善人，她根本没有想过，她胁迫犯人们签署雇用合同，既不道德，而且也不合法。1945年1月，莉娜这个女庄园主和忠于党的路线的女纳粹党员，在给希姆莱写信时，仍表现得对前途充满信心：“我们这儿的工作继续取得进展。苗圃年内还要扩大六公顷，用来种菜……同时还要开辟一块地用来培育树苗，特别是果树苗……因为铁路改线，我和福尔贝格<sup>①</sup>之间的牲畜交易计划已然落空，我不得不随便在本地收购一些母牛，这样下一年度就能有适合庄园使用的肥料了。发出此信的同时，我今天还给水果和葡萄种植协会寄了一份要求经销鲜果汁的申请……”

通过上述方式表明自己仍对第三帝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后，莉娜转入了正题：“……党卫军领袖，您知道我并不害怕……所以我想您会允许我在此向您提出一个请求：假如因为打仗我不能再留在这里，请您及时为我指点一条明路。目前还有其他德国人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不是只考虑自己和孩子们的安危，那样的话我岂不是个胆小鬼了吗？……”

莉娜在回忆录中根据记忆复述了这封信接下去的内容：“我听说元首大本营目前是一片大难临头的气氛。据说所有部门领导人都得到一小瓶氰化钾。他们想通过一死一了百了。党卫军领袖，我很想知道我们这些女人应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再也得不到保护的话，我打算想办法向西穿过波希米亚森林和巴伐利亚森林，逃回老家费马恩岛去……”

不管怎样，希姆莱还是对莉娜的担忧表示了理解。当时——1945年2月7日，他似乎也认为纳粹德国战败是不可想像的：“……我坚信我们首先能够挡住俄国人的进攻，进而转入反攻，收复失地。今年的战事将极为激

<sup>①</sup> 奥地利州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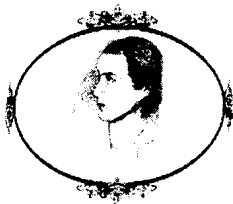


烈，即使时下看上去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年内我们一定能胜利结束战斗，因为我们是不可战胜的……”说了这么一番空话之后，他对莉娜的主要要求作了答复：“……您为应付最紧急的情况所作的考虑和计划采取的措施我完全赞同。”

1945年4月中旬，莉娜拿出一盒雪茄烟，交给当时还不满十二岁的儿子海德尔，要他自己一个人回费马恩岛去。孩子要用雪茄这种当时普遍承认的支付手段，来支付沿途的交通和食宿费用。莉娜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一番之后，便打发他上路了。四个月之后，海德尔果真回到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外祖母家中。沿途他得到了不少好心人的照顾和各占领国分阶段的护送。这段惊险漂泊给孩子造成的心灵创伤伴随了他的一生。

与儿子分手不久，莉娜带上女儿、女儿的女教师和一名司机，坐上一辆舒适的“房车”，也踏上了西行之路。这辆“房车”是由她的“囚犯”在一截卡车拖车的基础上改装而成的。莉娜一行到达暂时目的地泰根湖附近的罗塔赫—埃根后，躲进了党卫军上将卡尔·沃尔夫前妻的家中。在那里，莉娜把女儿托给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前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后者把她的女儿送到费马恩岛，交给了外祖父母。不久，莉娜巧遇了一名刚从艾布灵拘留营被放出来的年轻女子——莉莎·洪格尔。考虑到两人姓名缩写相同，莉娜主动与她结识，并毫不犹豫地趁机用一个煮老的鸡蛋伪造了一份艾布灵拘留营的释放证明，借此逃过了拘捕。此后，莉娜又先后骑自行车、搭便车和乘火车北上。从离开布伦扎尼庄园算起半年后，莉娜也逃回了家乡费马恩岛。然而她并没有高兴多久，因为她很快就发现，一些老熟人远远看到她便走到对过的人行道上，避免与她照面。大家提到海德里希时，也总说他是个大屠杀刽子手。莉娜非常生气。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并不是昨天才知道如何伪造证明。回到费马恩岛后我当然继续这么做了。比方说就有这么一个男人，是从埃尔萨斯逃来的，他在那儿被缺席判了死刑。侦缉队没抓到他。我不假思索地为他改变了身份。他一直没有受到惩罚，活下来了。干这种事甚至让我很开心，它是我对我们遭受的所有不公正待遇做出的一种反应。”

然而，这种“不公正待遇”却没完没了，莉娜并不能像原先设想的那样，以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身份开始新生活。不久，非纳粹化计划开始实施，据莉娜称，她本人也受到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掠夺”。她曾抱怨



道：“大家的财产都被抢走了，有些人失去了一切，我就是其中一员。”战后，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寡妇被定为纳粹政权的受益者，而她自认为是阵亡士兵的遗孀和难民，一再递交申请要求补助。申请总是被驳回，于是莉娜抱怨当局对她怀有敌意：“有关老兵待遇的131法对莉娜·海德里希这个德国公民和战时遇刺的警察总监的遗孀根本没有用处……别人总是告诉我，这一段对您不适用，那一段对您也不适用……”莉娜当时靠做黑市买卖维护生计，她还到奥地利做过短期女佣，她去那儿本是为了再找个男人。但是1946年4月，莉娜的未婚夫利奥波德·冯·扎内蒂与她断绝了关系，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控告莉娜在海德里希死后唆使纳粹屠杀捷克人，他们要求引渡莉娜。1947年，莉娜·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缺席判处终身监禁。

1953年，莉娜获准收回费马恩岛上的住宅。在另一桩有关寡妇养老金的诉讼案中，莉娜也在一审判决中胜诉了，因为保险总局认为海德里希在布拉格是“作为士兵阵亡”的。联邦德国劳工部立即提出了上诉，双方都拿出大量专家证词作为依据，官司打了好几年。最终，曾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当过首席检察官的罗伯特·肯普纳，帮莉娜打赢了官司。根据养老法，海军中尉遗孀莉娜得到了一小笔养老金。此时她已与芬兰的剧院经理毛诺·曼尼宁结婚。

196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十五年和海德里希死亡十八年后，柏林-维尔默斯多夫非纳粹化法庭开始处理海德里希遗产案，并最终裁定没收海德里希夫妇存在德意志帝国银行账上的那笔资产。1964年，吕贝克最高检察院也结束了对莉娜是否唆使或参与谋杀一案的调查，并驳回了布拉格“反法西斯抵抗战士协会中央委员会”对莉娜的有关指控。该委员会指责海德里希夫人在丈夫遇刺后唆使纳粹杀害了很多捷克人。

1965年，莉娜扩建了费马恩岛上的住宅，在那里开办了一个芬兰绘画展。此前她已在岛上的布尔格市办了一家名为英布里亚·帕尔瓦的膳食公寓。温妮弗雷德·瓦格纳那时曾到她家做过客。1976年，六十五岁的莉娜开始写有关自己与海德里希生活的回忆录。一家出版社表示有意出版，但考虑到作者满脑子都是纳粹思想，为谨慎起见，出版社决定安排著名历史学家维尔纳·马泽尔协助莉娜。双方还商定让马泽尔给莉娜回忆录补充些解释性的评论。出版时，书名是《生活在战犯身边》。出版前莉娜力图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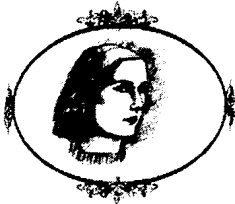
去马泽尔写的批评性注释，但遭到拒绝。但她最后还是想办法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她送给朋友和熟人的书中，她不想要的附录被删掉了。

1985年8月14日，莉娜·海德里希-曼尼宁去世，终年七十五岁。

希特勒的英国女武神——尤妮蒂·瓦尔基里·米特福德







“霍夫曼太太出于好意，毫不隐讳地告诉我，他现在又另有女人了，她名叫‘女武神’<sup>①</sup>，长得也像个女武神，包括那双腿。但是他就喜欢长得健壮的，就是说，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他很快就会把她气瘦的，除非她有本事受了气反而会发胖……”爱娃·布劳恩 1935 年 5 月 10 日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希特勒的情妇担心得很有道理。尤妮蒂·瓦尔基里·米特福德是个体态丰腴的金发美女，当时二十一岁，是里兹代尔勋爵的女儿。在争夺“元首”宠爱方面，她确实是个相当危险的竞争对手。一方是人称“小可怜”的霍夫曼照相馆店员爱娃·布劳恩，另一方是英国贵族小姐，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无声的、旷日持久的战斗，而她们只见过一面。两人的机会也不均等。尤妮蒂小姐常出没于英国和德国上流社会社交圈，而爱娃·布劳恩只能待在不起眼的地方，默默地忍受纳粹党内人士将那位英国小姐视作希特勒身边的“第一夫人”。把这两个情敌联系到一处的惟有死神——两个姑娘都试图自杀过。

尤妮蒂·瓦尔基里生于 1914 年 8 月 8 日。父亲是大卫·伯特伦·弗里曼-米特福德，即里兹代尔勋爵（1878—1958），母亲名叫悉尼。夫妇俩共生了七个孩子，其中有六个千金，尤妮蒂·瓦尔基里排行老四。“瓦尔基里”这个第一世界大战刚爆发时不太受欢迎的名字，是其祖父阿尔杰农·伯特伦·弗里曼-米特福德，即里兹代尔男爵（1837—1916）起的，因为他非常喜爱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本人也是瓦格纳家族的朋友。尤妮蒂出生时，他们家住在格洛斯特郡巴茨福德的世袭庄园里，里面有个都铎式<sup>②</sup>宫殿，还有一块面积达九千公顷的地产。后来巴茨福德庄园被迫卖掉了，一家人搬进了阿斯特霍尔庄园，1926 年又最终迁入斯温布鲁克公馆。这座奇特建筑的设计者是尤妮蒂父亲本人。“人们会猜想那是个军营、寄宿学校或是个疯人院……”杰西卡·米特福特在回忆录如是描述父母家的住宅。米特福德一家生活相当俭朴，孩子们的房间里都是清一色的白粉刷墙，即使最冷的冬天也没有暖气，冻得老式盥洗盆里都结了冰。

孩子们八岁以前，里兹代尔勋爵夫人一直自己教他们念书。此后，南

① 即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决定谁该阵亡，并把阵亡的英雄引入英烈祠的女神被称为女武神。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所作的乐剧四部曲《尼伯龙根指环》的第二部即为《女武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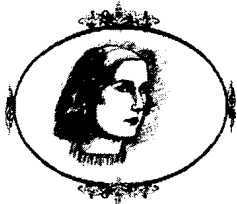
② 1500 年—1700 年盛行于英国的建筑风格。





希（生于1904年）、帕梅拉（生于1907年）、戴安娜（生于1910年）、尤妮蒂·瓦尔基里（生于1914年）、杰西卡·露西（生于1917年）和德博拉·维维恩（生于1920年）这些女孩便交给了家庭教师。没有一个姑娘在学校里长期念过书，只有里兹代尔勋爵夫妇惟一的儿子托马斯享有这等特权。按母亲的想法，在女孩教育方面花的钱不能超过由她亲自照料的养鸡场的开销。不过，对最野的女儿尤妮蒂·瓦尔基里，父母相对要开通些，他们把她送进无数个学校念书，但哪个学校她都没待多久。母亲还总护着女儿，一再强调尤妮蒂并不是被开除的，而是入校没多久就被人央求退学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大家都觉得里兹代尔勋爵夫人冷漠、严厉、拒人千里之外。她说话总带着尖刻的讽刺，她的冷言冷语和丈夫变幻无常的脾气一样令人生畏。里兹代尔勋爵脾气之大闻名遐迩，发起火来又叫又骂，咬牙切齿。据他的孩子们说，父亲因为爱发怒，每年都要弄坏两副假牙。孩子们平时叫父亲“法威”，叫母亲“母威”。夫妻俩虽然长相很好，但即使是英国贵族也认为他们极端古怪。举个例子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里兹代尔勋爵夫妇每两年都要横渡一次大西洋，到加拿大安大略省去淘金，一待就是好几个月，他们为此在安大略省买下了一块地。然而除了鹅卵石外，他们一无所获，和其他一系列的冒险行动一样，这项淘金计划也以失败告终。1913年至1914年冬，在里兹代尔勋爵夫妇最后一次在加拿大逗留期间，勋爵夫人在一个名叫“SWASTIKA”的淘金者聚居区里怀上了尤妮蒂，这似乎预示着姑娘的未来。

在故乡英国，里兹代尔勋爵喜欢过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瞧不起所有所谓的外来者，这包括他所说的“蛮子”（德国人）、“青蛙”（法国人）、美国佬、黑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只有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是这个爱激动的英国绅士真正崇拜的偶像。他最喜欢看杰克·伦敦写的《狼血》这本书，甚至终生乐此不疲，他常常吹嘘说一辈子再也没有读过别的书。平常勋爵一般只限于和几个“红脸膛、穿粗花呢衣服”的邻居交往，有时也能见到亲戚来访，其中包括丘吉尔一家。里兹代尔勋爵是1908年嫁给温斯顿·丘吉尔的克莱门坦·霍齐尔的表弟。对于不速之客，或是那些惹他发脾气的主儿，特别是女儿们的那些朋友，里兹代尔勋爵会抄起马鞭把他们赶将出门。这位贵族老顽固还认为自家的宅院完全可以满足家里人的任何需要。杰西卡·米特福德在回忆录中写道：“斯温布鲁克在许多方面很像一



中世纪的城堡，堡中的一切尽量自给自足，以至于住在里面的人觉得没有必要，一般情况也没有可能到外面去。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宅子里面都有。我们有自己的教室和家庭教师，此外还有几个马厩和一个网球场。我们七个孩子相互照应，形成了自己的小社会。我们的卧室需要时便会变成病房，甚至手术都会在里面进行；村子里的教堂则是我们寻求精神安慰的地方。总之，我们一般不用出门，最多也就需要走出去几步远，一切应有尽有。”有时这家人还会玩一种叫做“捉孩子”的游戏自娱自乐，女儿们扮作猎物四下逃窜，当爹的则带着猎犬在田间追，看得村子里的人目瞪口呆。有很多照片都逼真地反映出了米特福德一家的家庭气氛，照片上总有个焦躁的父亲和面色阴沉的母亲，一帮孩子中没有一张笑脸。

孩子们和父母不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斯温布鲁克公馆的顶楼，有佣人照顾。小家伙们自成一统，组成了一个实行严格等级制度的帮派。“戏弄和骚扰”是米特福德家这帮野丫头的座右铭，她们坚信，众多的姊妹是摆脱生活烦恼的最佳保证。家里人都叫尤妮蒂“鲍德”，她十二岁时个头就很高，成年之后身材像个卫兵。她总是和姐姐南希一道欺负其他姐妹。南希在回忆录中写道：“她长着一对蓝幽幽的大眼睛，目光直瞪瞪的，长胳膊长腿，行动起来笨乎乎的，再加上那一头淡黄的直发……看上去活脱脱一个北欧女海盗。家庭女教师都把她视作噩梦般的人物，很少有几个人能受得了她那副糟糕透顶的做派，因而没有一个人能在我们家待多久……”米特福德姐妹颇有文学天分，她们在回忆录中对孩童和青年时代都作了栩栩如生的描写，但各自的感受却大相径庭，南希和杰西卡觉得遭罪的事，戴安娜却称其为浪漫。真实情况可能还是像一个外人所描述的那样并没有那么极端：“应该承认，里兹代尔勋爵是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但我不认为他的孩子们有什么可抱怨的。在孩子们面前，他是杰基尔博士<sup>①</sup>，宽容，甚至有点唯唯诺诺。他允许他们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但是在外人面前，他又变成了海德先生<sup>②</sup>……”（托马斯·米特福德的朋友吉姆·利斯-米尔恩所作的描述）不管怎么样，古怪的教育方法并没有磨去个性很强的米特福德姐妹的棱角。她们与爹妈摩擦不断。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有时让她们很痛苦，但是多数情况下她们觉得很有趣。这几个大家闺秀很早就开始步

① ② 杰基尔和海德是英国作家史蒂文森名著《化身博士》中人物，常用来喻指具有双重性格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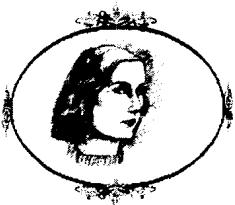
父母的后尘，时不时地干出些骇人听闻的事来，成为报上的新闻人物。父母为养了这帮野丫头叹息不已。做母亲的曾经说：“我在报上一读到‘某位勋爵大人的千金’这几个字，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准又是她们。”

1929年1月30日，尤妮蒂漂亮的姐姐戴安娜出嫁了。十五岁的尤妮蒂和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的女儿在内的其他十一个小姑娘一道做了伴娘。婚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旁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是英国“当年最盛大的婚礼”。新郎布莱恩·吉尼斯出身于英国啤酒和威士忌大亨之家，其祖父死后留下了一千三百五十万英镑的巨额遗产。布莱恩当时二十四岁，相貌英俊，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主修法律又爱好文学。在英国贵族社会，他被视为婚姻市场上最抢手的货色。布莱恩的父亲沃尔特·吉尼斯——莫因勋爵，时任英国的农业大臣，同时又兼管着自家的大产业。尽管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仍送了新婚夫妇一幢伦敦西区的住宅、一座带游泳池装潢奢侈的宫殿式乡间别墅和一辆奶黄色“本特利”豪华轿车，这还不算给他们的大笔生活费。出于对年轻男子根深蒂固的反感，里兹代尔勋爵对女儿结婚并不感兴趣。他也讨厌戴安娜和布莱恩·吉尼斯在伦敦上流社会的花花世界里大出风头。小报上报道戴安娜举办化装舞会，还有维多利亚式、希腊式、罗马式和美国西部风格的社交聚会，以及马戏表演、半裸的宴会和寻宝游戏等等，也让他很反感。听说戴安娜还搞过无聊的“宝宝聚会”，来宾都穿着婴儿服，坐着婴儿车，他厌恶得直作呕。1932年4月，这对摩登夫妻迁居切尔西，住进了泰晤士河畔的一座大宅。这幢房子还有一个巨大的庭园，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边。1932年7月，戴安娜夫妇在新居为快要十八岁的尤妮蒂初入伦敦社交界举办了一个引荐舞会。

戴安娜在自传中写道：“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每棵树都被下面的灯光照亮，园子显得特别得大。我还记得当时温斯顿·丘吉尔对斯坦利·斯潘塞<sup>①</sup>的一幅伟大的作品轻蔑地骂了几句……我穿了件淡灰色薄绸晚礼服，戴着网眼面纱和我所有的钻石首饰。我们尽情地跳舞，直到初升的太阳将河水染得一片金黄……”

初入社交界的尤妮蒂块头大得惊人。杰西卡在回忆录中对姐姐赞叹不

<sup>①</sup> 英国超现实主义画家。



已：超过一米八的大个儿，再加上那一头浓密的金发，使她在戴安娜的舞会以及引荐同龄女子进入社交界的形形色色的聚会上，看上去“就像高大的圣诞老人站在一群玩偶中一样”。“高大的身材与她超强的个性非常相配。在我们姐妹中间，她无疑要算是最难驯服、最不听话的一个……她穿着华丽的锦缎晚礼服，戴着假首饰，像只巨大的孔雀一样引人注目。她还从一个剧院服装师那里买了个冕状头饰，上面镶着假的珍珠和钻石，母亲见了吓了一跳。她总爱追求轰动效果……她曾在白金汉宫（被引见的时候）偷了一沓信笺，用它来给朋友写信……她还曾带着一只温顺的老鼠去参加舞会……”尽管尤妮蒂爱胡作非为，她还是受到了最有身份的家族的邀请，参加过罗思柴尔德、索尔兹伯里和沃尔多夫·阿斯特等勋爵家的舞会，到“表兄”温斯顿·丘吉尔家赴过晚宴，还时常能在报纸的社交栏目中露露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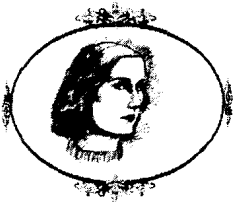
1932年夏天，戴安娜和布莱恩在比德斯登乡间别墅举办了一次化装舞会，米特福特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巨变。众多宾客中有一名百万富翁——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此公是个职业政客，政治生涯变幻多端，曾参加过保守党、自由党，后来这个富有的花花公子又变成了社会党人，1929年还在工党政府中当过部长。由于他提出的经济计划，即所谓的“莫斯利备忘录”，遭到拒绝，莫斯利于1931年退出工党，建立了自己的政党——“新党”及其下属的打手队“积极力量”。他还参加了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但只得了百分之零点二的选票。选举日当天他就解散了“新党”。莫斯利的楷模是尤里乌斯·凯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莫斯利曾去罗马见过墨索里尼，后者劝他信仰法西斯主义。他确实这么做了，并得到了漂亮太太辛西娅的大力支持。辛西娅是前印度总督柯曾勋爵之女，她在丈夫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忠实地站在他一边。但是莫斯利最终还是离开了她，因为在吉尼斯夫妇在比德斯登举办的18世纪风格的化装舞会上，穿着一身法西斯黑制服的莫斯利遇见了戴安娜·吉尼斯。

四十四年后，戴安娜在她那本取名非常贴切的自传《极具反差的一生》中还兴奋地写道：“他要什么有什么，相貌英俊、慷慨大方、充满智慧和情趣。我当然爱上了他，并决定和他一道生活。”戴安娜离开了丈夫，带着两个孩子搬进伦敦伊顿广场一幢雅致的小房子。她准备作为莫斯利的女友一个人单独过日子，因为这个英国法西斯头头儿根本没有打算

离婚。戴安娜对此并不反感，惟一让她烦恼的是，伊顿广场边的新居餐厅不够大，没法举办她已习以为常的大型宴会。听说女儿甘做一个比自己大十五岁的有妇之夫的情妇，戴安娜的父母大吃一惊。里兹代尔勋爵和布莱恩的父亲曾联袂到戴安娜住处，劝她回心转意，但未获成功。戴安娜和莫斯利这对情人态度极为坚决。那些街头小报如获至宝，竞相报道这桩丑闻，戴安娜和莫斯利对此一点也不担心。

1933年6月，尤妮蒂和姐姐的男朋友认识了。莫斯利见面就喊：“法西斯万岁！”立即引起了尤妮蒂的兴趣。和戴安娜一样，尤妮蒂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刚成立不久（1932年10月1日）的英国法西斯联盟（缩写BUF）。这个受到媒体大亨罗瑟米尔勋爵办的所有报纸支持的英国法西斯党，是个彻头彻尾的抄袭产物。党员穿黑衬衫是从意大利“全国法西斯党”那里学的，党旗则是对纳粹党卫军旗帜的拙劣模仿，党员们打招呼时喊“莫斯利万岁！”也是照搬纳粹的“希特勒万岁！”莫斯利自己也学希特勒的做法，让别人称他“领袖”。英国法西斯党党纲的内容，仅限于莫斯利所说的要大家绝对服从的那几句话。因此，在党总部黑色大厦里，大家根本不去制订什么纲领、党章，一切完全照搬德国纳粹政权那一套。该党还养了一支打手队——法西斯防卫军。英国法西斯联盟的领导层对法西斯很快能在英国接管政权充满信心，他们乐观地预计1934年夏天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英国法西斯党人相信，我们的领袖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有足够的个性、智慧和决心，把我们的国家从泥潭里……拯救出来，我们国家在泥潭里滚得太久了。很快黑色军团的脚步声将响彻大街小巷，很快我们会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先辈的灵魂在我们身上又复活了……”（1934年7月号《前卫》杂志）

然而，“黑衫党人”的总数一直就没有超过三万，在政坛上，该党就像其爱尔兰孪生兄弟“蓝衫党人”一样，一直无足轻重。早在1934年，罗瑟米尔勋爵就与莫斯利及其极端的党徒疏远了，因为他发觉英国法西斯联盟并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与保守党联合起来反对社会党人。他以英国的情况与德国不具可比性为由，撤回了对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支持。希特勒认为是犹太人在背后施加了影响。尽管如此，尤妮蒂仍对英国式的法西斯主义兴致不减。以前她总是以不感兴趣为由拒绝参加任何活动，但此时这位贵族小姐却走上街头，叫卖英国法西斯联盟党报《黑衫党》，而且莫斯利



让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她曾和一个女伴一道走进伦敦塞尔弗里奇斯百货商店，让人把她的一段喊话录了下来。她喊的是英国法西斯联盟的口号：“犹太人，犹太人，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

母亲以为尤妮蒂在参观艺术展或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她却穿着黑色战斗服在莫斯利六十岁老母（黑衫党妇女协会负责人）的率领下，在伦敦东区搞宣传游行。“领袖”莫斯利指望通过攻击犹太人，博得伦敦东区贫民窟里穷人的支持。尤妮蒂还身着黑衫，戴着法西斯徽章，手持橡皮警棍，到斯温布鲁克乡下参加过活动。她还用纳粹卐字旗和希特勒、墨索里尼还有莫斯利等人的画像装饰自己的房间。让父母来气的是，她动不动就行纳粹举手礼，喊几句法西斯口号。里兹代尔勋爵虽然表示过抗议，但就像他反对在家里摆那么多列宁塑像一样，根本无济于事。这些列宁像是杰西卡要摆的。她突然对共产主义发生了兴趣，成了家里的一匹“红羊”<sup>①</sup>。

英国黑衫党示威时经常会发生暴力。比如莫斯利曾于1934年6月7日租下有一万三千个座位的奥林匹亚礼堂。他在两排金发少年的簇拥下登上讲台，后面跟着一帮挥舞着旗帜的黑衫党党徒。他还把左手的拇指勾在皮带上，下巴高高翘起，右臂前伸，把榜样阿道夫·希特勒模仿得惟妙惟肖。连集会时发生的骚乱都让人觉得和德国纳粹早期在慕尼黑制造的暴力气氛差不多，在集会中间喊话的抗议者同样会被打倒并遭到虐待。

尤妮蒂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理论并不感兴趣。她喜欢的是激昂的进行曲，着迷的是打着小旗和骷髅标志闹哄哄地游行，高呼“万岁”和战斗口号，还有大家齐声高唱。她觉得通过参加这些轰轰烈烈的活动，平淡无聊的生活变得富有戏剧性了，传统的社会秩序也受到了挑战。她还非常喜爱那套极为合身的党员制服。英国政府1936年下令禁止政党拥有自己的制服时，尤妮蒂伤心不已。然而，这个贵族小姐很快就意识到，英国法西斯联盟只是德国纳粹党粗糙的翻版，难成大气候；莫斯利永远也赶不上希特勒。失望之余，尤妮蒂将目光投向了德国。米特福德姐妹喜欢玩“我们将来做什么”的问答游戏。尤妮蒂当时顺理成章地回答：“我要去慕尼黑，去结识希特勒！”杰西卡给的答案是：“我要离家出走，做个共产党人！”德博拉则宣布：“我要嫁个公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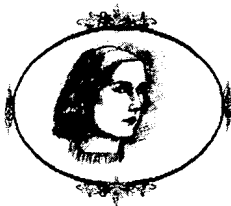
① 指与其他家庭成员格格不入者，西方谚语中原称其为“黑羊”。

1933年是德国纳粹的“夺权之年”，在这一年的纳粹党代会前夕，十九岁的尤妮蒂在姐姐戴安娜陪同下，首次前往德国。她们想通过纳粹外事新闻秘书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昵称“普齐”）的引荐，见到希特勒。人高马大的“普齐”与两姐妹并不陌生。她们是在伦敦一次社会聚会上认识这个天才的业余钢琴家的。戴安娜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他从钢琴旁站起身来，用无懈可击的英语大谈他的偶像。毫无疑问，希特勒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既是朋友，也是元首。”

汉夫施滕格尔对这次与米特福德姐妹重逢有如下记述：“……她们带着小奥托·冯·俾斯麦（德国驻英国大使馆参赞）的推荐信来到纽伦堡，而且是来找我的。她们长得非常漂亮，但眉毛上的化妆却与最近刚宣布的德国妇女的理想形象明显抵触。她们坚决要见希特勒。走在去他的旅馆‘德国饭店’路上时，路人对她俩议论纷纷。我不得不领着两姐妹躲到一个卖烤肠的售货亭后面，然后掏出大手绢说：‘亲爱的，这无论如何不行。如果你们不把脸上的东西擦掉，要见他根本没戏。’……我为两位小姐做了通报……但是赫斯（希特勒的秘书和副手）把我们支开了……”（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白宫与褐色大楼之间》）尤妮蒂和戴安娜觉得非常遗憾，她们虽然在公开场合曾三次目睹过希特勒的风采，但却无缘与他单独会面。

不过，1933年9月，尤妮蒂姐妹还是以英国法西斯联盟正式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列席了德国纳粹党胜利之年的第一次党代会（1933年8月31日至9月3日）。在当时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见她们穿着黑衫坐在纳粹德国电台英语广播主持人威廉·乔伊斯的旁边。纳粹党会上那番完美的表演，包括无穷无尽的游行方队，特别是扛着“闪闪发光的铁锹”的纳粹青年劳动服务队，让尤妮蒂姐妹看得如醉如痴。戴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出场时，人群就如遭到雷击一般！”尤妮蒂对《旗帜晚报》一名记者说：“我头一次看见希特勒便意识到，我最想见的人就是他！”里兹代尔勋爵夫妇气愤地给两个姑娘写了一封信，但是信来得太晚了：“我们大概不用告诉你，你母亲和我有多生气。你居然和鲍德一道接受了我们视之一帮凶残的害虫们的款待……”

1933年至1934年冬，尤妮蒂在斯温布鲁克，除了忙别的事之外，便是去整理一大堆希特勒的照片，再就是开大音量放纳粹党歌《霍斯特·韦



塞尔之歌》的唱片，震得整个屋子轰轰直响。此外，她还费尽心思地对父母说，到德国去读语言专业有怎么怎么好。里兹代尔勋爵夫妇误以为任性懒惰的女儿这回真的想去深造了，最后他们勉强同意了女儿的要求。于是尤妮蒂带上她那条名叫“造反派”的大黑狗和一群白鼠，于1934年春再赴慕尼黑，进了王后大街那家由男爵夫人拉罗什专为上流社会女孩开办的贵族女子寄宿学校就读。这仅仅是所语言学校，由于中学学历不够，尤妮蒂当时没有资格报名上大学。安顿下来后，尤妮蒂立即写信给希特勒，但没有收到回音。她还想尽办法打听到了希特勒的私人电话，但对方电话从来就没人接。后来尤妮蒂终于从理发师处获悉，希特勒和手下亲信中午经常到巴伐利亚酒店吃饭。这家慕尼黑老酒馆在施瓦宾门附近，舍林街和施劳道夫街拐角处，是艺术家经常光顾的地方。希特勒喜欢这家酒馆，是因为那里有个奥地利女厨子，菜做得相当不错。尤妮蒂不必像“元首”那帮歇斯底里的追随者那样，为了见到偶像经常在酒馆外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慷慨的父亲每年给她一百英镑零花钱，这使她能够每天两次到这家饭馆用餐。

亨里埃特·冯·席拉赫在回忆录中写道：“按照我的记忆，她个头很高，头发浅黄，穿着浅蓝色毛衣，白色褶裙，坐在酒店小花园里的一张桌子旁，这个位置刚好能让希特勒看见她。”认真研究过尤妮蒂生平的大卫·普赖斯-琼斯说得更富戏剧性：“希特勒是她生活的惟一目标……凭着英国上流社会的厚颜无耻，她最终达到了目的。换个别人可能就知难而退了，但她却不愿放弃……她是那种淑女型的婊子，总是等着别人主动与她搭讪……”（大卫·普赖斯-琼斯，《尤妮蒂·米特福德研究》）不管怎么说，尤妮蒂就那么一直坐在离希特勒常坐的桌子不远的地方，旁边放着一本德语课本。终于，后者于1935年2月9日向别人打听：“那可是个标准的日耳曼女人，她是谁？”最后希特勒请姑娘和自己坐到了一起。

尤妮蒂在写给姐姐戴安娜的信中，描述了此后的情景：“……我站起来，走到他桌旁。他起身和我握手，向我问好……我们谈了至少半个小时。酒店的女招待凑到我耳边悄悄地说：‘要我给您拿张明信片吗？’……他让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条上。你知道我不会骗你，当时我拿起笔手直发抖，然后写道：‘尤妮蒂·米特福德小姐，作为对德国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友好纪念。’我在此只能概述我们交谈的内容……他觉得，由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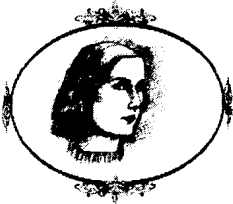


专门研究过建筑，他对伦敦还是蛮了解，根据他听说和从书上看到的……他认为伦敦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他还说，以后绝不能允许国际上的犹太人再在这两个北欧民族之间煽动相互敌对情绪……末了，他说他得走了。他把那张写有我地址的纸条揣在兜里……还把我的午餐费算在了他的账上。你可以想像，我究竟是什么感觉。我幸福得宁愿去死。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姑娘。如此殊荣，我实在受之有愧。”

希特勒本来就景仰英国上流社会，现在居然有个英国贵族小姐完全是为了见他而来到德国，他也受宠若惊。希特勒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国人和德国人这两个优等民族应该结盟，当他惊奇地发现尤妮蒂·瓦尔基里·米特福德也赞成这一想法时，他对这个名字独特、长相又漂亮的英国小姐就更感兴趣了。在希特勒看来，英国也有一批“了不起的人类精英，虽然仅限于贵族上流社会”。在希特勒的政治方案中，大不列颠本身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他早在《我的奋斗》中就有过详细描述。在30年代中期以前，他一直对德英联盟津津乐道。按照他的设想，双方应该对各自的权利进行严格界定，欧洲大陆应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势力范围，而大英帝国则是世界各大洋的霸主。

1935年4月初，尤妮蒂应邀到慕尼黑摄政王广场希特勒的私宅赴宴。一同受邀的还有另外两位有英国背景的女士——威廉二世皇帝的独生女、布伦斯威克公爵夫人和拜罗伊特的女主人温妮弗雷德·瓦格纳。英国法西斯头头儿莫斯利爵士当时也首次受到了“元首”的接见。莫斯利在尤妮蒂面前称赞希特勒是个“无所不能的家伙”。4月10日，尤妮蒂又与希特勒一道出席了当年纳粹最重要的社交活动——赫尔曼·戈林与女演员艾米·宗内曼的婚礼。

“元首”对尤妮蒂如此青睐，慕尼黑和柏林的上流社会家庭自然对这位英国贵族小姐敞开了大门。尤妮蒂成了贵客，成了纳粹德国在国外得到承认的象征，这是纳粹求之不得的。大出版商布鲁克曼家那幢富丽堂皇、满是古董的宫殿式住宅里，常能见到尤妮蒂的身影，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和纳粹外事新闻秘书的夫人海伦妮·汉夫施滕格尔，也把她视作朋友。一到柏林，尤妮蒂便应邀到万湖施瓦嫩韦尔德半岛，住在戈培尔家里，和玛格达·戈培尔一道泛舟湖上。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尤妮蒂和情敌爱娃·布劳恩一样，愿意待在慕尼黑，以防希特勒的副官来电话通知她们去饭馆吃



饭。对爱娃来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接到希特勒那边打来的电话了，姑娘绝望之余，于1935年5月28日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这已是她第二次想自杀了。尤妮蒂那些消息灵通、惟恐天下不乱的纳粹党朋友没过多久便告诉她希特勒已有个情人。她所敬爱的“元首”居然和一个女店员关系密切，这让尤妮蒂觉得很荒唐。出于怀疑和好奇，她终于耐不住性子，拿了一卷胶卷跑到霍夫曼照相馆去冲印，想借机亲眼看看情敌的模样。见对方也就是个害羞、衣着朴素的姑娘，尤妮蒂可以彻底放心了。但当她瞥见爱娃脚上穿的那双价格不菲的意大利皮鞋时，尤妮蒂立即深信所有有关希特勒情妇的传闻所言非虚。这个过惯了奢侈生活的英国小姐很识货，知道那是双佛罗伦萨产的费拉加莫<sup>①</sup>牌皮鞋，在德国可买不到。

为了巩固自己在纳粹德国的地位，尤妮蒂小姐给德国极右翼周刊《冲锋队员》写了一封信，希望引起广泛关注。她信中写道：“亲爱的冲锋队员们！作为一名英国法西斯，我对你们表示钦佩。我在慕尼黑已经住了一年，每周都看《冲锋队员》。如果我们英国也有这样的刊物就好了。大多数英国人对犹太人带来的危险一无所知……由于他们（犹太人）不敢抛头露面，所以我们无法让英国人民彻底了解他们的可怕之处……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变得足够强大，能大声宣布：英国是英国人的！犹太人滚蛋！致以德国式的问候！希特勒万岁！尤妮蒂·米特福德！”

这封信登在《冲锋队员》周刊1935年7月号上。尤妮蒂在此信的附言中还申明，作者无意匿名，她的全名完全可以照登，因为“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憎恨犹太人”。对杂志主编、弗兰肯地区的纳粹党负责人尤利乌斯·施特莱彻来说，这封读者来信来得正是时候。尤妮蒂欣赏的这份周刊发行量最大时有二百万份，经常刊登有关犹太人性犯罪和犹太人“杀人祭神”的报道，兼具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淫秽色情，内容之糟糕让许多对党忠心耿耿的纳粹党人都觉得恶心。党内一些颇有影响力的人士纷纷要求停办这份无聊杂志。

杂志能得到英国贵族小姐如此嘉许，施特莱彻很高兴。他赶紧跑到慕尼黑，与尤妮蒂见了面。看得出，这位漂亮的英国小姐和许许多多德国姑娘一样，心甘情愿为希特勒和纳粹事业服务。施特莱彻于是向这个英国法

<sup>①</sup> 意大利著名的鞋匠和设计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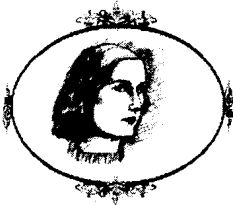
西斯发出邀请，要她参加由他主办的一年一度的冬至节，地点在被称为弗兰肯圣山的黑瑟尔山。在这个纳粹的传统节日期间，“觉醒的德国”先是对农民、丰收、乡村和上帝创造的原野颂扬了一番。然后尤妮蒂对两万五千人（纳粹新闻界宣称有二十五万人）发表了演讲，主题是英国与德国的团结。

尤妮蒂很快便与施特莱彻这个纳粹党内最狂热的反犹分子结下了深厚友谊。施特莱彻的女儿埃尔玛尔在接受大卫·普赖斯-琼斯采访时曾说：“她已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她能通过直线给我父亲打电话……我在假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总能见到尤妮蒂待在我们家……附带说一下，她特别高，比我父亲高两个头。她并不性感。《冲锋队员》编辑部的每个人尤妮蒂都认识，包括菲普斯（杂志的色情画家）。有时候我父亲和尤妮蒂一道出去……有一次他带着她一起到埃伯曼施塔特去视察青年劳动服务队营地。”（大卫·普赖斯-琼斯，《尤妮蒂·米特福德研究》）在英国尤妮蒂对人说，这个性虐待狂和反犹分子其实“就像小猫一样可爱”。

希特勒的亲信净是些稀奇古怪的人物。作为惟一的外国女子，尤妮蒂居然受到如此礼遇，并且在短时间内能在纳粹社会中占据如此显要的位置，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这个充满活力的英国小姐的出现，引起了很大轰动，她到处不知疲倦地宣扬英国人和德国人应该结成兄弟般的友谊，并且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德国与英国1935年缔结的海军条约就是她所做的民族和解努力的一个成果。这个协定是由后来担任纳粹德国驻英国大使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谈成的，它允许德国重建海军，规模可达到英国海军舰队的百分之三十五。希特勒对双方达成这一条约大加称赞，认为它标志着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新时代的开始”。

1935年8月，尤妮蒂已经能邀请到许多纳粹朋友参加自己二十岁的生日庆祝会了。当时戴安娜·米特福德也已迁居慕尼黑。1935年夏天，她与丈夫正式离婚，因为有证据表明“布莱恩·吉尼斯与伊索尔德·菲尔德小姐1935年3月在布赖滕一家旅馆有通奸行为”。布莱恩很绅士，他不仅将罪过全揽在了自己身上，而且还送给前妻一笔巨额补偿金，使戴安娜成了百万富婆。她因此得以体面地住进了慕尼黑一幢漂亮的毕德麦耶尔式<sup>①</sup>公寓

<sup>①</sup> 1814年—1848年风行于德国的一种艺术流派。



里，时常接待莫斯利的来访，还和尤妮蒂一道半心半意地上了慕尼黑大学为外国学生办的德语班。

戴安娜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她对希特勒的第一印象——按她的说法，她是站在尤妮蒂的角度看希特勒的：“希特勒当时四十五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不胖不瘦，眼睛深蓝，皮肤白皙，一头细细的褐发总是梳理得很整齐……他看上去十分干净利索，使周围几乎每个人都显得不修边幅……在巴伐利亚酒店里，他身着便装，一身灰西服，头戴一顶他称之为‘我的大礼帽’的软礼帽……他在这家小店里可以放松一下……在场的除了他的副官——常常是布吕克纳或绍布，再就是几个老朋友，大多数是男士，但也有几个女人……常来的有摄影师霍夫曼，还有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公司的韦林先生。话题一转到汽车上，我们就格外受不了。元首对汽车非常有兴趣，看来也很在行，我们却觉得乏味透顶。和许多政治家一样，他喜欢谈论政治……建筑也是他的一大兴趣所在……阿尔伯特·施佩尔常和希特勒坐在一桌……他（希特勒）吃的很简单。作为素食者，他只吃鸡蛋、蛋黄酱、蔬菜和面条，喝‘法欣格’矿泉水。酒店对他喜欢吃什么了如指掌。他对女士格外礼貌，总像在德国和法国常见的那样，弯下腰去行吻手礼。这些琐事本来不值一提，但报上有很多小道消息说希特勒不礼貌，举止粗鲁……还说他总是一个人滔滔不绝，不让别人插嘴。还有报道说他没有幽默感，一见到蛋糕便狼吞虎咽……从我本人亲眼所见来看，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些小事上做些更正。”

1935年，里兹代尔勋爵夫妇赴德国旅行，想亲眼看看女儿到底在干什么。英国驻德大使夫人菲普斯女士回忆道：“他们感到极度绝望，想到尤妮蒂已经不再要父母管了，他们实在受不了……”然而，尤妮蒂父母的绝望情绪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们来了，看了，最后被征服了。希特勒在慕尼黑家中请勋爵夫妇喝茶。他对被他认为是准军事性机构的英国“公学”<sup>①</sup>大加赞赏，还称赞英国雇佣军“训练有素”，英国士兵英勇善战，对英国的法制观念也满是溢美之辞，因而颇得勋爵的欢心。勋爵夫人则将素食的希特勒视为同道，向他详细介绍了自己怎么磨小麦、烤面包，希特勒听得聚精会神。平常无比冷漠、让人难以接近的勋爵夫人，看见希特勒听

① 一种贵族化的私立付费学校，实行寄宿制，常为大学的预科学校。

得这么津津有味，也禁不住得意万分。她称希特勒“和蔼可亲，很有教养”，并成了“元首”的狂热崇拜者。勋爵夫人一旦拿定主意就绝不会反悔，因此一直到死，她都没再改变对希特勒的看法。里兹代尔勋爵夫妇访德期间，希特勒还安排了一辆“奔驰”车供客人专用，对他们百般款待，大献殷勤。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他们也被安排在贵宾席上。“爸爸和一帮党卫军突击队长坐在一起感觉棒极了”，尤妮蒂写信告诉姐姐戴安娜。尤妮蒂·米特福德在纳粹自由全国党代会（1935年9月10日至16日）召开时就站在希特勒的身边，这在画报上和电影院放的新闻纪录片上都能看到，读者和观众都知道“元首”身边的女子是谁。相比之下，当时普通德国人对爱娃·布劳恩还一无所知，即使在她自杀未遂后情况也还是如此。

1935年10月24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在他（希特勒）家喝茶。在座的有米特福德母女，还有玛格达、玛丽亚和黑尔加（戈培尔的夫人和两个女儿）。元首谈到了德英关系。他的想法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访德归国后，以前一直以憎恨德国人著称的里兹代尔勋爵，在英国议会上院发表了演说，大谈希特勒如何爱好和平和他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还有第三帝国的社会进步。尤妮蒂对父亲说，为了为英德友谊做工作，她需要一辆车，里兹代尔勋爵就送了女儿一辆“莫里斯”跑车。尤妮蒂在车上插上了英国米字旗和希特勒送的卐字旗，然后穿上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战斗服，开着车跑遍了德国，为纳粹事业进行煽动宣传。

1935年底，尤妮蒂·米特福德小姐加入了德国纳粹党。希特勒亲手颁给她一枚背后刻有他签名的特制党徽。“元首”还把自己的一幅画像赠给了这名英国同志，银质相框上有他的亲笔题词。尤妮蒂把这个礼物像宝贝一样珍藏了起来。

随后数年，尤妮蒂·米特福德经常在英德之间往来穿梭，在“元首”的政治棋盘上充当了一枚小小的、但却很管用的棋子，成了希特勒个人的传声筒。她总是心甘情愿地随时为“元首”效劳，为纳粹政权做出无私、不计报酬的巨大奉献。在纳粹党集会和宣传活动中，她起到了点缀和装饰的作用。此外，由于这位小姐的亲戚遍布英国所有的贵族大家庭，希特勒还可以通过她，有目的地向英国最高、最有影响的社会阶层泄露一些机

密。希特勒知道，把尤妮蒂纳入自己身边最小的亲信圈，可以进一步提高这个泄密者的价值，这样，他的那些讲话通过她传递过去会更有效果。当然，军事机密是绝不会让尤妮蒂知道的。对她来说，纳粹德国“合并”奥地利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均属意外。

希特勒让尤妮蒂扮演了一个害人害己的角色，而这个幼稚又心高气傲的姑娘却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尤妮蒂自认为是个知名的、老练的法西斯政治家，她在各国媒体聚光灯的照耀下得意非凡，总是把从希特勒的深宫大院里得到的不管什么消息都大肆渲染地对外发布。希特勒常说，他最讨厌“搞政治的娘儿们”，但是对于尤妮蒂，他却网开一面，没有强调理想的纳粹女人标准。于是，这位英国小姐得以在1936年3月坐上陆军元帅布洛姆贝格的“奔驰”敞篷车，亲历了德军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场面。事后，正如希特勒料想的那样，她把她见到群众欢呼的情况告诉了英国人。

作为英国上流社会的一员，尤妮蒂在德国也保持着很强的等级意识。在社交场合，她不得不与纳粹党内人士有些必要的应酬，但私下里她又摆起架子，尽量避免与“中下层的人”打交道。后来，她总算找到了一个同阶层的人来往，那是她弟弟的一个朋友，名叫亚诺什·冯·奥尔马西，他们是在慕尼黑认识的。奥尔马西当时四十二岁，生于奥匈帝国贵族世家。他酷爱占星术、神秘学、蒙昧主义和纳粹党，这正对尤妮蒂的口味。而奥尔马西是个玩女人的能手，也很高兴有机会带这个年轻的英国小姐见识见识作为“帝国”的奥地利，并把她引荐给自己众多的贵族朋友。奥尔马西在奥地利布尔根兰州有座浪漫的乡间别墅——伯恩斯坦城堡，尤妮蒂很快便成了那里的常客。她还认识了奥尔马西的残疾太太艾什泰哈齐公主，婚后人们称她玛丽亚夫人。伯恩斯坦城堡里有个骑士厅，里面的布置希奇古怪，壁炉上面赫然写着“吸血鬼”几个字。尤妮蒂经常整夜坐在厅里与主人谈论纳粹主义的好处，还自命不凡地向他们聊起一些纳粹逸事。

尤妮蒂在伯恩斯坦堡还认识了奥尔马西的弟弟拉斯洛，家人都叫他“特迪”。此人游历甚广，是英国皇家地理协会会员和享有国际声誉的飞行和汽车先驱、探险家和撒哈拉沙漠学者。他曾经深入利比亚沙漠，发现了失踪的泽祖拉绿洲和一个绘有史前游泳者壁画的洞穴。1936年夏天，拉斯洛在格德勒为尤妮蒂表演了滑翔飞行。通过与他以及艾什泰哈齐、奥尔施佩格和埃尔德迪等几个快活的贵族交往，尤妮蒂认识了布达佩斯。她和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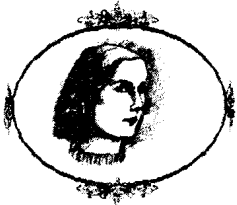
些人一道在小皇宫饭店聚餐，在奥斯滕德咖啡馆听吉普赛人奏乐，在亚利桑那酒吧喝威士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英国小姐。多年之后，蒂玛·奥尔施佩格忆起尤妮蒂时还说：“只要不和她谈纳粹，她还是挺单纯、挺可爱的。”蒂玛的姐姐汉娜·迈克斯则说：“我们叫她‘丹麦奶牛’，因为她长得又高又壮，又挺笨。”（大卫·普赖斯-琼斯，《尤妮蒂·米特福德研究》）

拉斯洛·冯·奥尔马西和他哥哥一样，都是纳粹政权的坚定支持者。1941年，拉斯洛参加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并利用他出众的地形测量知识，多次带领纳粹谍报人员穿越沙漠潜入埃及。1949年，拉斯洛驾驶单引擎飞机创造了远距离飞行的新纪录。1951年这个探险家因患阿米巴痢疾在萨尔茨堡不治身亡。五十年后，拉斯洛·冯·奥尔马西成了电影《英国病人》中奥尔马西伯爵的原型，他因此举世闻名。

1935年至1939年间，希特勒和尤妮蒂·米特福德之间共有一百四十次会面。这些尤妮蒂都用红笔在日记本上认真做了记录。每次会面都引起了猜测。希特勒的爱情生活，不仅在德国纳粹党内部，在英国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不久四下便盛传“元首”和他的英国女友之间关系已十分密切。人们总是问：“尤妮蒂是不是爱上了希特勒？”大家都说她就是未来的希特勒夫人。不断有谣传说希特勒与尤妮蒂很快就要结婚，里兹代尔勋爵对此矢口否认：“我女儿和希特勒先生结婚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报界却认为他态度并不坚决。后来他又借用戈培尔的陈词滥调说：“元首只是为他的人民而活着，根本没有时间过婚姻生活。”

然而，连尤妮蒂的几个姐妹都认为尤妮蒂有意嫁给希特勒。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军械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曾说：“……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彻底爱上了希特勒。她总是兴奋地注视着他，目不转睛，毫无顾忌。英雄崇拜，绝对没错。或许希特勒也喜爱有个年轻姑娘崇拜自己，因为她确实相当迷人……但对希特勒周围人来说，她却挺招人烦的。绍布<sup>①</sup>就挺恼火，因为他总要向她发出邀请。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万分惊讶，因为居然有个外国女人坐在希特勒身边，党和外交政策的一些情况都让她知道了。希特勒说话还是很谨慎的……当然她很可能和希特勒已经有了某种关系，她

<sup>①</sup> 希特勒的副官。



巴不得这样……但我怀疑他除了拉拉她的手之外不会干什么。”（施佩尔接受大卫·普赖斯—琼斯采访时所说的话，《尤妮蒂·米特福德研究》）

希特勒的陆军副官格哈德·恩格尔说：“她从没有当过希特勒的情妇。我不记得她曾和他单独在一起过。”（恩格尔接受普赖斯—琼斯采访时所说的话）尤妮蒂对别人说她要和希特勒结婚从未发表过评论。从她对希特勒过分热情的态度来推断，假如希特勒真的向她求爱，她恐怕不会拒绝，何况这也符合他们共同事业的利益。尤妮蒂的姐姐戴安娜在回忆录中为妹妹的名誉进行了辩护：“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我认为，她没有爱上希特勒。她极其钦佩和仰慕希特勒，但这并不是爱。就希特勒而言，他很喜欢她，她让他很开心。大多数女人在他面前都会神魂颠倒，语无伦次……除了‘是的，元首’或‘当然，元首’之外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尤妮蒂从来就不知道害羞。她心里面想什么就说什么……”戴安娜还提到，她妹妹在党卫军里有一个叫埃里希的固定男朋友，此外她在党卫军里还有很多相识……她与希特勒的关系完全是柏拉图式的，而且她也知道爱娃·布劳恩扮演的角色。埃尔玛尔·施特莱彻的观点是，尤妮蒂与爱娃·布劳恩不具可比性，因为她“作为女人与希特勒没有任何关系”。

不管怎样，希特勒对各种谣传无动于衷。一个周末，他把尤妮蒂邀到上萨尔茨贝格的私宅里，把她引荐给了贝格霍夫的秘密女主人爱娃·布劳恩。这两个相互早有耳闻的女人终于见了面。进晚宴时，两个女人让她们的“元首”坐在了中间。按规矩，爱娃像往常一样坐在希特勒的左边，而“贵宾”尤妮蒂则被安排在他的右首。

在英国，对纳粹德国极感兴趣的并非里兹代尔勋爵一家。实际上，希特勒接待的外国来宾绝大多数都是英国人。英国人到柏林或上萨尔茨贝格进行的所谓“朝圣之旅”始于1934年，此后一年比一年多，1937年至1938年间达到了高潮。在与英国政客、贵族、记者和企业家的会谈中，希特勒总是不遗余力地争取英国的好感，并兜售他的德英联盟设想。他也给英国客人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这些英国客人包括媒体大亨罗瑟米尔勋爵、历史学家汤因比、空军大臣伦敦德里勋爵、副国务大臣范西塔尔爵士、前首相劳埃德·乔治以及后来当上外交大臣的艾登。他们这些人到德国一方面为了探探情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勉励希特勒。很多人的想法与保守党下院议员托马斯·穆尔一样，他曾在给报纸的一封读者来信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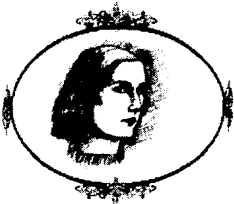
“为什么要对希特勒抱怀疑态度？为什么大家硬要从他的话里揣摩出某种可疑的动机？……英国所能给予的任何帮助都将对和平产生有效而持续的影响，所以我要说：给希特勒一个机会吧！”

英国前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于1936年到上萨尔茨贝格拜访了希特勒。事先他对记者说：“外国人只要到那里四处看看，就会大为折服。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能在某个欧洲国家看到这一切……以前大家都说美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国家。但目前应该说是德国。我现在也要说声‘希特勒万岁！’”（德国新闻办公室1936年9月21日报道）

1931年至1935年担任英国空军大臣的伦敦德里勋爵1936年一年内就曾四度偕夫人乘私人飞机赴德国。他参加了戈林的生日庆祝以及纳粹夺权三周年纪念活动。纪念仪式上，他就站在希特勒的身边。最终惹犯众怒的是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在位时间很短的爱德华八世，因为他号召英国人向德国人伸出和解之手。里宾特洛甫则称爱德华八世是“德国真诚的、真正的朋友”。当时，有许多英国人指望纳粹德国能成为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防波堤。此外，英国人还常常提出“谁会接希特勒的班”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的确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各种各样的鼓励，包括双方达成的海军条约。这些都让希特勒觉得有理由提出最大胆的奢望。他在写给罗瑟米尔勋爵的一封信中，一再强调德英合作的种种好处。

虽然英国法西斯头头儿莫斯利的太太辛西娅·莫斯利于1933年突然去世，但是莫斯利和戴安娜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不敢使他们两人的关系合法化。特别是在英国结婚，连他们这么一对并不守旧的人都不敢贸然行事，因为人们对莫斯利与辛西娅女士在卡尔顿王府举办的隆重婚礼仍然记忆犹新。当时连比利时国王乔治五世和玛丽王后以及英国首相都出席了婚礼。不过，这对第三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这个组织宴会和庆典活动的行家来说倒不是什么难事。1936年10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场的有米特福德女士。她姐姐与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今天在我家结了婚。此事务必严格保密。”

按照希特勒的指示，莫斯利与戴安娜婚前没有按规定对外发布公告。婚礼是在纳粹德国宣传部的一个大厅里举行的，对外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戴安娜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婚礼的场面：“我当时穿了一身金黄色的束腰长裙。外面阳光灿烂，树叶泛黄……整个过程短得很，户籍管理官员



说了几句话，我们交换了戒指，然后便结束了。希特勒的礼物是他本人的一张照片，外面镶着银框……”尤妮蒂做伴娘。然后莫斯利可怜巴巴地恳求大家要一辈子保守秘密。新闻界确实对这次秘密婚礼一无所知，虽然记者们大多紧跟在戴安娜和莫斯利后面缠问不休。据戴安娜说，那帮记者中最顽固的一个便是“表兄”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两年之后，莫斯利自己公开了这桩秘密。

参加完婚礼后，为数不多的宾客来到戈培尔家。孩子们向新人献了花，婚宴也准备好了。婚宴之后，希特勒和莫斯利退到一个房间里举行了会谈，只有一名翻译陪同。会晤时，希特勒沉默寡言，因为他希望给对方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他认为纳粹政体只限于在德意志帝国存在。几天之后，希特勒在总理府设宴招待莫斯利夫妇，随后两人前往柏林体育宫，听希特勒发表演讲，大谈西方民主如何之腐朽。当时在场的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几名记者说，他们看见莫斯利夫妇和尤妮蒂·米特福德不断从座位跳起来行纳粹举手礼，口中大喊“万岁！”

那时的尤妮蒂早已成为纳粹上流社会的一员，每逢大型的公开活动她必应邀到场。有几次“元首出访”她甚至在陪同人员之列，以至于希特勒的副官们不叫她米特福德，只叫她“随行人员”<sup>①</sup>。

希特勒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年轻、高大、有点阳刚气的“女武神”做点缀。他把她视作德—英优等民族理想女性的化身。他并非不知道尤妮蒂这个人稀奇古怪，但他觉得身边有她这个有用又有趣的奇人也挺好。希特勒为她安排了一个合适的角色，让她扮演宫廷小丑。就像中世纪君主宫中的小丑一样，有英国国籍保护的尤妮蒂在“元首”希特勒面前也是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没有别人敢像她那样毫无顾忌。连戈培尔对此都觉得很惊讶，他在日记中写道：“吃午饭时米特福德小姐也在。她没遮没拦地把墨索里尼骂了一通……我真搞不懂，元首居然由着她这样做……”希特勒面带微笑，一直等尤妮蒂说完，然后给她讲了盎格鲁—萨克森人亨吉斯特和霍萨兄弟当年如何瓜分日耳曼尼亚和大不列颠的历史传奇故事。

尤妮蒂在拜罗伊特认识的佐尔姆斯—布劳恩斯费尔伯爵夫人有一段回忆，很好地说明了希特勒与这位英国贵族小姐的关系：“尤妮蒂喊‘希

① 德语中“随行人员”的发音和英语的“米特福德”比较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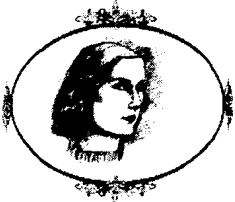


特勒万岁’的时候听起来很有魅力。她沉着自信，显然心里明白自己的价值。后来我在柏林的官方招待会上，还有阿德龙饭店和凯撒霍夫饭店以及慕尼黑的四季饭店里都遇见过她。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四季饭店的酒窖里喝酒，当时广播里正在转播希特勒在霍夫布罗伊豪斯啤酒馆发表的一个重要讲话。‘快走！’尤妮蒂喊道，‘我们能在街对面遇见他。’她飞快地跑上楼，我们也跟着她，然后便看见车队驶过来。尤妮蒂扯着嗓子喊：‘元首！’希特勒让司机把车开到她面前，问道：‘尤妮蒂，您好吗？’她答道：‘我要去柏林了。’希特勒说：‘到了以后请马上告诉我。’于是她立即便坐夜间特快列车走了。”（大卫·普赖斯-琼斯，《尤妮蒂·米特福德研究》）

尤妮蒂的“表兄”温斯顿·丘吉尔 30 年代早期还很佩服希特勒重建德国的能力，但是到了 1937 年，他早已开始主张缔结反德同盟了。然而，里兹代尔勋爵一家绝大多数都是纳粹和英国法西斯的支持者，连托马斯·米特福德看到纳粹党代会上游行队伍整齐的操练后，都变成了纳粹的同情者。

只有家里的“红羊”——共产主义者杰西卡·米特福德，是个例外。她看过《希特勒恐怖棕皮书》后，对尤妮蒂和戴安娜格外鄙视。两个姐姐回家时，她曾跟她们说起过那些逐步披露出来的纳粹暴行，但她们俩颇不以为然，说这只不过是共产党人的宣传而已。杰西卡还有过行刺希特勒的念头。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种可能性一再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可以假装突然皈依法西斯主义，跟着尤妮蒂到德国面见希特勒，然后掏出手枪把他打死。当然希特勒的保镖马上就会把我打倒，但难道这不值得吗？不过如果我没打中他，自己还是被打死了，那可就太不值了。这完全是个很合理的计划，而且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不幸的是我没有去实施，因为我太想活着了。几年之后，希特勒及其政权的暴行大白于天下，半个欧洲都给毁了，我对自己贪生怕死懊悔不已……”

应该说，杰西卡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要比其他除掉这个独裁者的密谋行动更有成功的把握。尤妮蒂的确是希特勒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她虽然暗中受到监视，但是和戴安娜一样，她可以不受检查地来往于德国和英国之间。作为一名贵族小姐和“希特勒的英国女友”的妹妹，杰西卡可能也会不受任何外交礼仪限制，受到纳粹的热情款待。



虽然没有去刺杀希特勒，杰西卡对共产主义还是保持着忠诚。她与出身贵族的志同道合者、丘吉尔的亲戚埃斯蒙德·罗米利秘密订婚，并和他一道跑到西班牙帮助共和派在西班牙内战中对抗佛朗哥。1937年3月1日的英国《每日快报》报道了这则消息：“里兹代尔勋爵的小女儿和丘吉尔的赤色外甥一道逃到了西班牙！父母非常伤心！可能是共产党密谋策划的！”尤妮蒂当时在日记中写道：“德卡和埃斯蒙德到了西班牙。我哭了又哭。”后来她去找希特勒，这个独裁者向她保证，万一杰西卡出什么事，他会出面干预的。后来杰西卡倒也没怎么样。

自打在慕尼黑巴伐利亚酒店与德国总理和“元首”首次见面后，尤妮蒂就受到了她的两个“祖国”的情报部门的监视。由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领导的德国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和英国情报局一样，都在研究米特福德小姐对希特勒的崇拜是否有更深的政治背景。希特勒的陆军副官格哈德·恩格勒说：“米特福德小姐到底想干什么？她是不是英国情报机关派来的？或许是与她沾亲带故的丘吉尔派来的？当时我们认定她是个间谍，所以一直在钉她的梢……”（卡尔海因茨·谢德里希，《米特福德姐妹》）

实际上，尤妮蒂并不具备当间谍的才能，也没有获悉任何军事机密。她所掌握的也就是一些个人情况：希特勒曾向她打听其“表兄”丘吉尔的为人，而后者则希望从她那里打探些希特勒的情况。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不久，尤妮蒂在查特韦尔曾与丘吉尔有过一次私人会面。她对他大谈奥地利人如何欢迎所谓的“合并”，把丘吉尔给惹火了。这位未来的英国首相相对纳粹德国兼并奥地利表示了最强烈的谴责。

纳粹党的高层人士也考虑过尤妮蒂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希特勒的英国政策施加了影响。在他们看来，尤妮蒂带来的干扰实在是难以估量的，甚至几十年后，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在施潘道监狱里还与阿尔贝特·施佩尔探讨过“尤妮蒂问题”。希特勒的副官弗里茨·维德曼在回忆录中指出，尤妮蒂在主张德英结盟的同时，又一再贬低自己的同胞，使希特勒对英国产生了错觉。纳粹外事新闻秘书恩斯特·汉夫施滕格尔在其回忆录中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他多年的老相识尤妮蒂是个有巨大政治影响力并有暗杀企图的无耻间谍。汉夫施滕格尔还为这一大胆的猜测找出了一个证据，说他有一次在施塔恩贝格湖上与尤妮蒂一道乘帆船游玩，在对尤妮蒂的身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当她的面把纳粹党骂了一通。尤妮

蒂听后生气地说：“如果您这么看纳粹党，您就无权再担任外事新闻秘书了……”后来汉夫施滕格尔怀疑有人想要他的命，于是仓皇逃离了德国。他认为这是尤妮蒂在暗算他。（汉夫施滕格尔，《白宫与褐色大楼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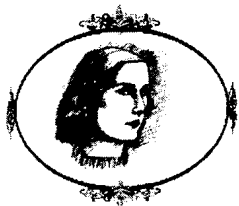
这位“元首的钢琴手”其实高估了尤妮蒂的能量。他所谓的“暗杀图谋”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帮纳粹大人物与他开的一个恶意的玩笑，想试试他这个媒体负责人的胆量。在尤妮蒂离开德国数年后，希特勒自己曾引述过她讲过的话：“1939年前好几年，丘吉尔就和同事在几个城堡里决定要对德开战了！我的消息来源是尤妮蒂小姐。由于与权威人士沾亲带故，她们几个姐妹消息很灵通……”（《希特勒秘密谈话录》）

从30年代中期开始，希特勒的对英政策慢慢发生了变化。德国轻而易举便与英国达成海军条约，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sup>①</sup>和德军进驻莱茵兰地区时，英国人又都坐视不管，这些情况，也许还要加上米特福德小姐对英国所做的负面宣传，使希特勒又有了新的自信。他认为以前自己高估了英国的实力，因此他说：“英国的总督们必须习惯与我们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行事……”（引自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政治日记）在1937年11月5日发表的一个外交政策主旨讲话中，他把英国称作“可憎的对手”，并且说他不再愿意像20年代以来一贯宣传的那样，与英国人一道实现其政治抱负了。在其敌视英国的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的影响下，希特勒已准备抛开英国行事。不过他当时倒没打算与英国为敌。

1938年3月希特勒实施占领奥地利的“奥托计划”时，尤妮蒂正在奥尔马西家的伯恩斯坦城堡里做客。一听到德军进驻的消息，她立即赶往维也纳。消息很灵通的英国《旗帜晚报》报道说：“希特勒今晚抵达维也纳时，他最狂热的崇拜者米特福德小姐会在那里欢迎他。”一周之后，尤妮蒂在伦敦接受《每日快报》采访时说：“没能亲眼见到他访问林茨附近的出生地的情景，我心都碎了。但他来到维也纳时我是在场的……我还到他下榻的饭店里和他聊了几分钟……真是棒极了。”

1938年4月10日，英国工党以“拯救和平！拯救西班牙！”为主题在伦敦海德公园组织了一次反对佛朗哥和西班牙内战的游行示威活动。尤妮蒂和一些法西斯分子一起站在主席台附近舞着旗子试图搅局，后来发生了

<sup>①</sup> 埃塞俄比亚旧称。



殴斗。尤妮蒂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了当时的情景：“……突然有人把我衣服上别的卐字徽章扯了下来……一个男人还对我破口大骂。我一拳打在他脸上，立刻便有一群人愤怒地把我围在当中，威胁着要揍我……一个女人咒骂希特勒，她也被揍了。不久，乱石横飞……因为身边有一个男人护着，前面有警察开道，我终于逃到了公交车上，身后还有人喊：‘滚回德国去！’”（卡尔海因茨·谢德里希，《米特福德姐妹》）有很多报纸报道了这次事件，有几家还像《每日快报》一样刊登了一幅描绘狂热分子尤妮蒂的漫画。读者还得悉，尊敬的尤妮蒂·米特福德小姐想申请德国国籍。纳粹冲锋队头头儿、群众骚乱专家弗朗茨·冯·普菲费尔从德国写信来把尤妮蒂夸赞了一番：“听说了您在海德公园的表现，正像人们对您期待的那样，您勇敢地参加了打鬥，我向您表示祝贺。希特勒万岁！”

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尤妮蒂在“第二祖国”德国也招致了人们的不满。戴安娜回忆道：“我们当时住在凯泽霍夫（柏林的豪华饭店）。尤妮蒂戴着她那枚非常特别的党徽。我们附近坐着几个讨厌的、打扮得挺利索的狂热女人。她们指着妹妹的党徽叫道：‘您根本不配戴这个！’还说，‘您那么油头粉面地站在元首的房前，真不要脸！’”

“向历史宣告奥地利回归德国”后，希特勒又开始着手实现进一步扩张计划。他在1938年5月28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正式提出了对苏台德区的领土要求。苏台德区住有三百五十万德意志人，1918年至1919年一战结束后并入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治鼓动家尤妮蒂把希特勒的讲话当做了行动的信号。她开上她那辆插着纳粹旗的车，只带了一个英国法西斯分子作陪，耀武扬威地在苏台德区四处巡游。尤妮蒂故意到处与苏台德德意志人接触，趾高气扬地炫耀希姆莱送给她的那枚党卫军徽章。在驶往布拉格的路路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部队把她截下了，并把这个希特勒的英国女武神送进了监狱。在她被没收的行囊中，捷克人发现了一些纳粹徽章、一柄党卫军的匕首、一幅希特勒画像、一架照相机，还有一些纳粹的宣传材料。“尤妮蒂·米特福德在捷克遭到了侮辱，被剥了个精光。哈哈，这下事情可闹大了。元首很满意。那个尤妮蒂小姐心中一定充满了仇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8年6月3日的日记中满意地写道。

纳粹宣传机器虚情假意地对尤妮蒂表示了同情，称那帮捷克贱民在大庭广众之下折磨了无辜的女游客，就像他们折磨受他们奴役的可怜的苏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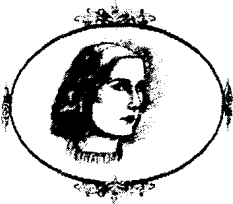
德意志人那样。尤妮蒂本人则多次接受采访，详尽描述了她的恐怖经历。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对德国新闻界提出了严厉批评。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把迪特里希博士（奥托·迪特里希，纳粹政权的新闻局局长）大骂了一顿，因为新闻界没有对捷克发生的事情大事渲染……这个臭国家必须消灭掉。”

尤妮蒂在希特勒那儿却更加得宠了。希特勒奖给这个忠实的追随者一架新的莱卡相机，并给予她更多的关注。1938年夏天，尤妮蒂成了希特勒身边固定的官方陪同。1937年至1939年间，“德国艺术之都”慕尼黑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庆祝游行。1938年7月，希特勒邀请尤妮蒂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德国艺术日”庆祝活动。亨里埃特·冯·席拉赫在回忆录中对这次庆祝游行作过一段描述：“在玛丽亚广场上大家随着华尔兹乐曲翩翩起舞，还免费供应啤酒和牛肉汤。纽芬堡公园里，四处点着火把，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的舞女们裸着身子在园内骑马驰骋，这是亚马孙<sup>①</sup>之夜……”

7月15日，希特勒和尤妮蒂一道在慕尼黑巴伐利亚酒店吃饭。7月19日，纳粹党办主任马丁·博尔曼在记事本上记道：“16:30米特福德女士来喝茶。”这天下午，希特勒和尤妮蒂在上萨尔茨贝格山上散了很长时间步，希特勒领着她从贝格霍夫一直走到普拉滕纳霍夫。7月23日，尤妮蒂和希特勒到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音乐节，观看了歌剧《特里斯坦》《帕西法尔》《莱茵黄金》和《女武神》，并于7月25日晚应邀参加了一个盛大宴会。7月29日晚，她乘“元首”专列赴西里西亚，陪同希特勒出席了德国体育节。随后，她又跟随希特勒乘专机去了纽伦堡，而后又返回拜罗伊特。她得到了一份特殊的奖赏：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尽管不太情愿——邀她住进了瓦恩弗里德公馆。

不久之后，尤妮蒂患上了肺炎，希特勒承担了她在医院豪华病房的住院费，并派自己的私人医生莫莱尔大夫去拜罗伊特为尤妮蒂看病。当正在发烧的尤妮蒂看到这个胖大的先生来到自己病床边时，她错把他当成了阿迦汗，因为她对这个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首领1937年10月20日对上萨尔茨贝格的访问仍记忆犹新。“她倒是放眼世界！”希特勒曾开玩笑地说。1938年8月底，里兹代尔勋爵夫妇到拜罗伊特来看望生病的女儿，但他们

<sup>①</sup> 亚马孙，希腊神话中居住在黑海边的一族强悍刚勇的女战士。



更主要的目的是来再次拜访希特勒。希特勒邀请这对纳粹政权的义务宣传员参加了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全国党代会（1938年9月5日至12日）。党代会上希特勒宣布他“无论如何”也要解决苏台德问题。里兹代尔勋爵高兴地注意到他女儿竟受到了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帮人的尊重。里兹代尔勋爵经常骂自己女儿无能，当他听到著名记者G·沃德·普赖斯说“现在全欧洲的命运都掌握在她手里”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有人曾问过尤妮蒂是否会发生战争，她自负地笑了笑，然后幼稚地说：“我想不会的。元首不愿意看到他新建的房子被人炸毁。”

希特勒在党代会上发表的好战言论在苏台德区引起了骚乱，布拉格政府意识到必须开始战时动员了，战争看来已在所难免。独裁者希特勒劝他的“政治宣传员”尤妮蒂离开德国。尤妮蒂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英国驻慕尼黑总领事，这下子希特勒的战争威胁听起来就更像真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首相张伯伦主动来德国见希特勒，暂时阻止了这个独裁者继续搞对抗，这让希特勒很恼火。在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政府首脑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展开谈判的时候，人们在街头巷尾聚在一起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做出是战还是和的重大决定。慕尼黑的各个教堂都安排了祈祷仪式。

在英国，1938年人们已开始大批量生产防毒面具，很多住户还在自家花园里修起了防空洞。而独裁者希特勒并没有把国际压力当回事。1938年9月15日，在有关苏台德问题的磋商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他竟有闲心在上萨尔茨贝格的克尔施泰因山崖上视察他新修的“茶馆”。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同意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区，同时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地区继续存在。

1938年的整个秋天，希特勒不断光顾克尔施泰因。10月23日那天，他还邀玛格达·戈培尔、尤妮蒂和她的弟弟汤姆一道去了。这个大独裁者的“茶馆”建在一千七百米高处，耗资三千万帝国马克，得开车走七公里的山路，穿过好几个隧道和一个很窄的急弯才能抵达。到了之后人们会看到开在岩壁上的一扇青铜大门，进门后是一个灯火通明的长长的过道，通向一个电梯。乘电梯上行一百三十米便是“茶馆”。站在“茶馆”的圆形大厅里，四下崇山峻岭一览无余。

这年冬天，尤妮蒂一直在伦敦家中深居简出。看到英国公众对德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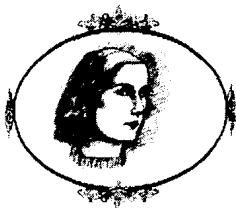
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她于1939年3月18日，也就是德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三天后，向同胞发表了一封慷慨激昂的公开信，为希特勒辩护。尤妮蒂在信中再次鼓吹德英友谊，并一再强调希特勒爱好和平，与现实相对照，尤妮蒂此言实在荒唐。《每日镜报》在刊登这封公开信时还附了一幅希特勒的照片，下面写道：“她想要我们做这个人的朋友，而他却刚刚入侵了一个无辜的国家。”总共有二千二百名读者对尤妮蒂的文章发表了意见，只有九十六人同意她的看法。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失败了，战争看来已不可避免。1939年4月底，英国开始实施义务兵役制。

当尤妮蒂不得不承认德英结盟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时候，她的世界崩溃了。5月底，她与希特勒见了一面，独裁者摆出了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对她百般劝慰，并且让她称自己为“沃尔夫”。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希特勒的女性崇拜者能享受这份特权。尤妮蒂大喜过望。不过，尤妮蒂还是不能和希特勒以“你”相称，这是希特勒对受宠者的最高奖赏。尤妮蒂写信告诉姐姐戴安娜：“见面时他几乎一直握着我的手，亲切地看着我，还说：‘真是个孩子！’英国和德国现在成了敌人，他是多么的伤心……星期四和星期五我都是和沃尔夫一起吃的饭，我很幸福……”几天后，尤妮蒂又写信告诉姐姐：“沃尔夫握着我的手，用充满魔力的声音对身边人说：‘这个可怜的孩子不高兴了。’随后他转过身来极其温柔地看着我。我的苦恼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我现在只想去把张伯伦给杀了。”

由于受到希特勒格外的恩宠，再加上对英国政府从1938年6月起要求入境的德国人办理英国签证很生气，尤妮蒂决定永远背弃祖国，彻底搬到慕尼黑住。希特勒办公厅亲自向慕尼黑纳粹党部下达了指示，要他们帮助这位英国同志找一幢合适的住处。纳粹党部提供了四处完全不同的房子供尤妮蒂选择，不过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刚刚从犹太人那里没收来的。尤妮蒂最后看上了施瓦宾区的一幢三室住宅，原房主是一对犹太老夫妇，当时还没有搬走。尤妮蒂带着一个女友，当着他们的面在屋子里面量来量去，商量房子该怎么布置。老两口站在一旁吓得要死。希特勒送了一整套家具，都是德国各家具厂的名牌货。

1939年7月底，尤妮蒂和已嫁给莫斯利的姐姐戴安娜像往年一样来到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音乐节。音乐节的最后一天，希特勒在他经常来住



的瓦恩弗里德公馆召见了她们姐妹俩。据戴安娜说，希特勒于8月2日告诉她们，“英国已决定要对德宣战了，战争看来已不可避免”。当晚在观看瓦格纳歌剧《众神的黄昏》时，尤妮蒂告诉姐姐，她不想看到英德交战这一幕悲剧。

1939年8月5日，尤妮蒂在巴伐利亚酒店同已被她称为“沃尔夫”的希特勒见了战前的最后一面，他们俩当初就是在这儿认识的。都到这时候了，尤妮蒂还指望自己的两个祖国之间能够避免交战。她在给戴安娜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已有三个星期没有见到沃尔夫了，但愿他能来。”

1939年9月3日，也就是德军入侵波兰两天之后，英国大使尼维尔·汉德逊向纳粹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递交了英国的宣战书。希特勒的首席译员保罗·施密特对希特勒对这封宣战书的反应作了如下描述：“……我站在希特勒的办公桌前，一字一句地把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翻译给他听。我译完之后，屋子里一片寂静……希特勒像个石头人似的坐在那里，木呆呆地看着前方……过了一会——我觉得已经过了很久，他转身对一直站在窗前发呆的里宾特洛甫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几个月过去了，德国一直没有遭到攻击，希特勒猜想，西方大国大概还没能从正式备战完全转入参战状态。

戴安娜·莫斯利在伦敦经历了二战的爆发。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广播听到了张伯伦宣布英德已进入战争状态的演说……一分钟之后响起了防空警报……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尤妮蒂。由于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我又有了指望。死亡的消息会传得很快，而且德国也有中立的记者……看起来她可能并没有做什么……”

事后的情况表明，尤妮蒂于1939年9月3日下午去见了慕尼黑—上巴伐利亚纳粹党部主席阿道夫·瓦格纳，把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了他。后者以为，尤妮蒂这个英国公民出于对自己前途的担忧，想把自己最重要的个人资料寄存在他那里。他劝了她几句，说他本人愿为她在慕尼黑的安全担保。几个小时后，瓦格纳才打开了尤妮蒂留下的大信封，里面有一张希特勒的签名像、尤妮蒂的党徽和一封遗书，上面写着：她没法忍受英德交战，因而要去自尽。瓦格纳向保安处报了警，而此时此刻尤妮蒂已坐在慕尼黑英国花园的一张椅子上，向自己太阳穴开了一枪。一名警察发现了她，但由于没找到证件，没能确认她的身份。他把昏迷不醒的尤妮蒂送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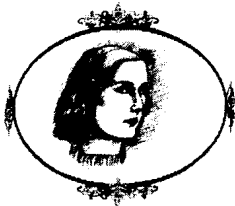
了慕尼黑大学医院的外科抢救。主治医生耶格尔大夫和马格努斯教授检查后发现，从右太阳穴射入的子弹还留在病人的脑后部。几天后尤妮蒂又恢复了知觉，但她面部严重浮肿，语言中枢已然受损。她还失去了平衡能力，四肢也完全瘫痪了。她不能自己进食，而且看上去精神错乱。

希特勒当时正在波兰前线督战，后来又视察了华沙。1939年11月8日，为了参加1923年纳粹“啤酒馆政变”纪念日的大型庆典，希特勒才回到了慕尼黑。“11点钟抵达慕尼黑。元首去医院探望米特福德小姐。”纳粹党办主任在日记中写道。马格努斯教授在医院门口迎接希特勒，并告诉他，病人的状况很危险，而且她一直不能说话。教授坚决反对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因为这样风险太大。希特勒给尤妮蒂带来了鲜花，并把党徽还给了她，但他并没有待很久。一见到敬爱的“元首”，尤妮蒂突然又会说话了，她表示想回英国，然后她当着希特勒的面把党徽吞了下去。

目睹这可怕的一幕以及同志和战友的悲剧命运后，希特勒虽然陷入了沉思，但他并没有说一句同情的话。他只是满意地说，通过这一举动，尤妮蒂驳倒了所有的谣言，他一直就认为她并不像人们怀疑的那样是个间谍。稍后希特勒又对其摄影师说：“霍夫曼，我都有点儿害怕了！我一对谁稍稍亲近一点儿，就会被对方误解。我不会给女人带来任何幸福，一辈子都是如此！”（海因里希·霍夫曼回忆录《我所认识的希特勒》）

11月8日是纳粹最重要的纪念日之一，每年都要隆重庆祝。1923年的这一天，纳粹在慕尼黑比格尔布罗伊凯勒啤酒馆发动了一起未遂政变，这次事件在纳粹运动史上被视作里程碑。政变虽然失败了，纳粹却把它当做一次英雄壮举来纪念。每年纳粹都要打着血染的大旗举行游行，纪念所谓的“11月9日进军”，向被视作“烈士”的政变牺牲者致敬，并在当年发生枪战的陆军统帅部旁的纪念碑前献花圈。纪念活动的高潮是希特勒晚上在比格尔布罗伊凯勒啤酒馆对“老战士”发表演说。

到医院看望尤妮蒂，把希特勒排得满满的纪念日日程安排给打乱了。时间之紧迫让他很恼火，直到下午他才得空为晚上的演讲做准备。演讲原定晚8点开始，但是希特勒到场后纳粹党徒不断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演讲被迫推迟了十分钟。21:07，希特勒突然结束了矛头主要指向英国的长篇大论。他没有像往年那样留下来和老伙计们聚一会儿就匆匆离开了酒馆。八分钟之后，格奥尔格·埃尔泽放置在酒馆里一根柱子旁的定时炸弹



爆炸了。这次不成功的暗杀行动共造成七人死亡，六十三人受伤。

在慕尼黑大学医院，医生们仍然没有给他们那位地位显赫的病人做手术，因为一旦手术失败，导致病人死亡，便会有人说这个敌国的病人是被他们暗害的，没有人愿意冒险承担这一罪责。尤妮蒂的崇拜者和好友亚诺什·冯·奥尔马西，从一个朋友处得知尤妮蒂出事后，迅速赶到慕尼黑，并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姑娘毫不知情的父母，还妥善保管了尤妮蒂所有个人证件。

巴伐利亚内政部把运送尤妮蒂回英国的手续办好后，奥尔马西主动要求护送尤妮蒂返乡。这次运送任务的总负责人耶格尔大夫在有关报告中写道：“尤妮蒂躺在担架上被运往此行的起点站慕尼黑火车总站。我们占用了一整节特快列车车厢，里面有张为尤妮蒂特制的床……旁边坐着护士……伯爵和我进了餐车……我们两人的开支均由我出……到了伯尔尼站后，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救护车把我们送往马蒂教授的医院。在那里我本应该能见到英国同行，但是他们没有来……我在伯尔尼一直等到1939年12月24日……最后我走了……光在慕尼黑大学医院的开支就超过四千马克。元首的副官处付了这笔账……”

在伯尔尼医院，尤妮蒂的状态大有好转，有时她还不知不觉地哼起纳粹歌曲和“元首”的颂歌。圣诞节和元旦之间，尤妮蒂的母亲和妹妹德博拉来了。她们看到尤妮蒂伤成这个样子大吃一惊：“……她面部深陷，都快让人认不出来了。一摸她的头，她就痛得受不了……由于两颊深陷，她的牙齿显得又大又黄，皮肤也是又干又黄。她笑起来很怪异，很空灵。看见我们来了，她很高兴。但对我们来说，一下子见到她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打击可太大了，感受就像离散多年后又重新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卡尔海因茨·谢德里希，《米特福德姐妹》）

为了把女儿运回英国，里兹代尔勋爵夫人从瑞士联邦铁路局租了一节豪华车厢，租金高达一千六百英镑。里兹代尔勋爵则在伦敦到国防大臣奥利弗·斯坦利那里进行了交涉，对方最终答应英国情报部门将不会把病人当做“敌方的线人”对她进行审讯。在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对“米特福德事件”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德国媒体对此只字未提。只有一些模糊的传闻传到了英国，但这已足以招致一大群缠人的记者在加来港等候尤妮蒂一行人了。当处于半昏半醒状态的尤妮蒂被人用担架抬向渡船时，这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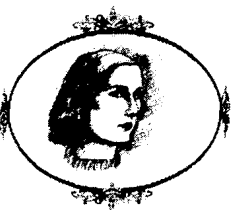


记者也一直跟着，一边还讥讽地说，这会儿这个女法西斯倒没像平常那样戴着纳粹党徽。当这艘渡船于1940年1月3日在几架皇家空军战斗机和一架直升机的保护下驶入福克斯通港时，又有一大群记者在码头上等着。在英国，这个年轻的法西斯党人竟然受到了通常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得到的接待。兴师动众的保安措施看起来就像军事演习，不过，这倒有助于排遣人们在英德“静坐战”中郁积起来的紧张情绪。此前，希特勒一直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进行他的波兰战事，因为与西方的武装冲突并没有同时发生。1940年1月初，纳粹德国与西方同盟国之间还没有交过一次火。

1940年1月4日的《每日邮报》报道：“……军人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通往码头的路口站岗，组成了一道军事警戒线，甚至海岸边也有人巡逻。苏格兰场的便衣则混在看热闹的人当中。有关方面已经下达了严格的指令，任何人都不得靠近米特福德小姐。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除了巡逻兵以外，还有军警和铁路警察……”英国人还把尤妮蒂返回英国的场面制成了不带评论的新闻纪录片在影院发映，更使此事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

从港口通往海威科姆的路上，仍有无数记者紧追不舍。海威科姆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小地方，里兹代尔勋爵一家已在这里租下了一幢名叫“老磨房小屋”的小农舍。爱看热闹的村民们见到已然残废的尤妮蒂时直喊“希特勒万岁！”《每日邮报》为独家采访希特勒的女友开出了五千英镑的天价。尤妮蒂的父亲当时财政已接近崩溃，他已被迫把斯温布鲁克公馆和位于肯辛顿的伦敦市区住宅拉特兰门给卖掉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了采访要求，并且要求警方给予保护。最终，尤妮蒂被送进了牛津纳菲尔德医院。著名的脑外科教授休·凯恩斯爵士对尤妮蒂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后，证实了德国同行的诊断。他肯定地说，连他也不能把子弹取出来。

1940年5月10日，在希特勒发起西线进攻后没几个小时，英国议会下院对现任首相阿瑟·内维尔·张伯伦投了不信任票，保守党人、海军部的丘吉尔勋爵出任新政府首相。丘吉尔极力反对张伯伦奉行的绥靖政策，他组成了一个由所有政党参加的战时内阁，宣布“静坐战”结束，并在他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中呼吁英国人站出来阻止希特勒的扩张行径：“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汗水与眼泪。我们还要经受极其严峻的考验……”



1940年5月22日，丘吉尔政府颁布了《紧急状态法令18B》。该法令允许不经诉讼和法院判决逮捕所有勾结纳粹者。第二天，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被投进了布里克斯顿监狱。不久之后，国防部没收了他的住宅。6月30日，刚当妈妈十一个月的戴安娜也遭逮捕，并被送进了霍洛韦女子监狱。《星期日快报》大肆渲染地报道说：“莫斯利女士终于被捕了！”戴安娜的姐姐南希在一封信中写道：“霍洛韦狱中会是什么样子？17:30熄灯以后，她可能会坐在木板床上想阿道夫。”（卡尔海因茨·谢德里希，《米特福德姐妹》）南希本人也积极参加过“黑衫党”的活动，如今她宁愿彻底忘掉这段往事。尽管里兹代尔勋爵夫人曾找亲戚克莱门坦·丘吉尔说情，但莫斯利夫妇在狱中还是一直待到了1943年。1943年至1945年，他们被软禁在家中，不得前往伦敦，也不得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里兹代尔勋爵夫人此时已将全部精力用来照料女儿尤妮蒂。在她的引导下，尤妮蒂在1940年间慢慢又学会走路了，但她在精神和身体上仍是严重残疾。她患有失忆症，只能模糊地记得希特勒，对二战爆发则一无所知。她需要别人不间断的监护。

到1940年夏天，希特勒已在很短时间内胜利结束了西线战事，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法国已先后投降。英法远征军的失败和随后英军侥幸从敦刻尔克包围圈中撤离，明确无误地向英国人表明，战争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德国国防军已经占领了英吉利海峡各岛，而且希特勒已然宣称：“尽管英国在军事上已陷入完全绝望的境地，但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准备与我们谈判。因此，我已下命开始为登陆作战做准备……”“海狮计划”开始实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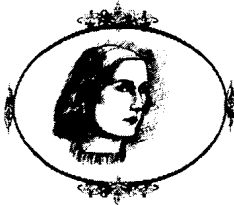
里兹代尔勋爵夫人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她称温斯顿·丘吉尔是个无耻的流氓，毫不隐讳地继续对希特勒抱有好感，并且向每个愿意听的人保证，“元首”是英国的朋友，他对英国人肯定要比对波兰人好。里兹代尔勋爵不同意妻子的说法，他早已公开疏远了纳粹德国。在希特勒是不是个好女婿这个纯属假设的问题上，老两口吵翻了。在一起生活了三十五年后，他们竟然分居了。在肯尼思岛问题上，两人也发生过激烈争吵。肯尼思岛位于苏格兰海域，是内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一个小岛，直径只有两公里，绕岛走一圈不用一个小时。小岛交通十分不便，没有定期的摆渡船可供上岛。出于一时的浪漫，里兹代尔勋爵于1936年买下了该岛。1940年，

米特福德夫妇的经济状况明显恶化，他们被迫卖掉了所有房产，惟独留下了肯尼思岛和岛上一个年久失修的修道院。在小岛的去留问题上，两人意见不一。最后勋爵大人决定自己一个人搬到小岛上住，问题算是解决了。

尤妮蒂并不喜欢在母亲照料下过那种寂寞的生活。虽然有时候还是糊涂健忘，但是她仍依稀记得自己原来的生活还是很激动人心的。1941年4月19日，妹妹德博拉结婚了，这让她非常高兴，单调的生活终于出现了变化。在当年备受瞩目的这个“战时婚礼”上，尤妮蒂脸上挂着灿烂但又很空洞的微笑，穿着一身她不常穿的便服，看上去鬼气森森的。时年二十一岁的德博拉·米特福德，嫁的是安德鲁·卡文迪什勋爵，新郎与她同龄。卡文迪什的哥哥在战场上阵亡后，德博拉以前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她当上了德文郡公爵夫人，并且成了查兹沃斯城堡的女主人。这座16世纪的巨型古堡坐落在巨大的园林中间，有大小一百一十一个房间。此外，园中还有一个巴洛克式的温室和一个举世闻名的画廊。这桩婚姻还让德博拉与后来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美国的肯尼迪家族成了亲戚。

有两个姐姐没有参加德博拉的婚礼：戴安娜，原因是她还在蹲监狱；杰西卡，因为她当时住在华盛顿，一方面大西洋上的潜艇战使她无法成行，另一方面，她早就与家人断绝了一切联系。共产党员杰西卡总是与左翼人士打交道，所以她一直没有把自己的家庭出身告诉别人。后来她的小女儿（父亲是埃斯蒙德·罗米利）生病了，女医生反复问她的家族病史，杰西卡才吞吞吐吐地透露了一些情况，包括尤妮蒂与希特勒的友谊和后来的自杀事件、戴安娜狱中得病的情况以及德文郡公爵夫人如何如何之健壮。女医生一脸反感地听着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然后便拒绝再为病人治疗，因为“病人的母亲既不愿也不能如实回答很简单的问题”。（卡尔海因茨·谢德里希，《米特福德姐妹》）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米特福德一家人对此反应不一。共产党人杰西卡很高兴，而法西斯分子戴安娜则为女友玛格达·戈培尔的命运担忧。纳粹同情者汤姆·米特福德则决心不参加即将举行的对德反击战，并自愿报名去了远东。只有被官方定为“安全隐患”的尤妮蒂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她根本不理解所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里兹代尔勋爵夫人已决定带病女移居肯尼思岛。此前政府曾把该岛划为军事禁区，禁止尤妮蒂踏



上小岛一步，但盟军诺曼底登陆后，这一禁令被解除了。听说夫人偕女儿要来小岛住，里兹代尔勋爵心甘情愿地逃离了这块自选的流放地。

1945年间，尤妮蒂的身体状况又有好转，她已经能够开车了。她非常喜欢看电影和去教堂礼拜。当时尤妮蒂的脑后部仍嵌着颗子弹，这一吓人的处境倒唤醒了她修行的意识。她到各个不同的教派那里寻求慰藉，四处表示她愿意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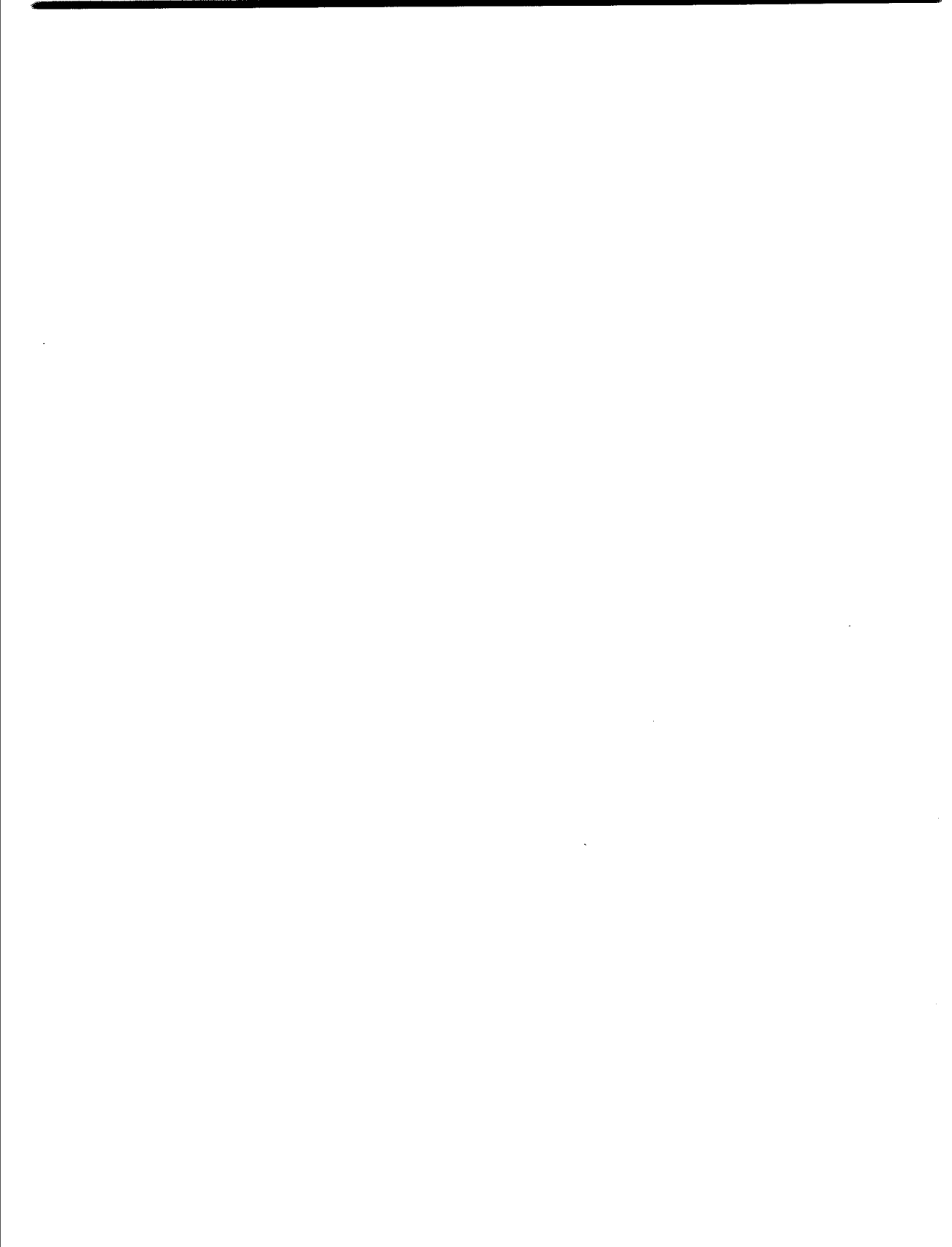
1948年春，尤妮蒂头痛得越来越厉害。是年5月28日，贵族小姐尤妮蒂·米特福德终因自杀后遗症病亡，终年三十四岁。姐姐南希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大家都很沮丧，很伤心。最近她似乎好多了，体重也减轻了，看上去又苗条又漂亮，对生活充满兴趣。然而，她真正的幸福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像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她是战争的牺牲品。”





第三帝国的传奇女飞行员——汉娜·赖奇







“我在此自愿报名担任载人飞弹驾驶员，参加自我牺牲行动。我明白，这次行动将以死亡告终。”以上是汉娜·赖奇和其他七十名志愿者签署的生死状。

著名女飞行员汉娜·赖奇，是所谓“SO计划”（SO代表“自我牺牲”）的坚定支持者。这项打算于1944年实施的计划，旨在通过使用V-1载人飞弹拯救德国。她多次驾驶V-1飞弹进行极为危险的测试飞行，并对那些报名参加自杀行动的十七岁的滑翔机飞行员进行了认真的训练。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登陆，使这一疯狂的计划告吹。赖奇机长懊恼地叹道：“太迟了！”然而，对于上述“神风敢死队”<sup>①</sup>式行动的意义，赖奇这个甘为第三帝国效劳的狂热爱国者一直到死都坚信不疑。时至1972年，她还在回忆录中说：“必须强调指出的是，那些报名参加SO行动的汉子当时完全是为了那个崇高的目标而活着。”（汉娜·赖奇，《飞行——我的生命》）

1912年3月29日，汉娜·赖奇生于西里西亚巨人山山麓风光旖旎的小镇希尔施贝格（耶莱尼亚古拉的旧称）。父亲是普鲁士人，母亲是奥地利蒂罗尔人，二人相识于因斯布鲁克。威廉·赖奇在因斯布鲁克大学眼科医院当过实习医生，并在那里通过了行医资格考试。酷爱拉大提琴的赖奇大夫想结交些音乐界的朋友，因而认识了黑尔夫-希特勒·冯·阿尔彭海姆夫人。冯·阿尔彭海姆夫人是个寡妇，带着三个女儿住在莱因内格城堡。大女儿艾米爱上了这个北方来客，两人于1908年在蒂罗尔的施蒂夫特维尔滕结了婚。后来希尔施贝格眼科医院邀请赖奇大夫去当院长，艾米便随他迁居下西里西亚，她也因此打破了做姑娘时立下的所有誓言：永远不离开美丽的蒂罗尔，永远不嫁新教徒，更不要说普鲁士人了。赖奇大夫与艾米的婚姻很美满，他们共生了三个孩子——库尔特、汉娜和海蒂。孩子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们身上继承了“普鲁士人的妩媚和蒂罗尔人的缜密”。

“我很小的时候就给父母出了一道难题，”汉娜·赖奇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母亲是蒂罗尔人，她对登山的向往在我身上似乎演变成了对飞行的渴望。否则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我在还不知道什么叫‘飞’的时候，就张开臂膀想从窗台和阳台上往下飞。”任何警告对当时才三岁的汉娜都不管用，家人得一刻不停地盯着她。父母总要为她担心，等她长大以

<sup>①</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空军敢死队，驾驶装炸弹的飞机撞击军舰等目标，与之同归于尽。

后还是这样。这个胆大包天的小姑娘后来成了“巾帼英雄”的象征，成了德国最著名的女试飞员。

一战的爆发打乱了赖奇一家优裕舒适的生活。赖奇大夫应征入伍，当上了海军少校军医。战争结束后，虽然形势仍是乱糟糟的，赖奇一家的生活很快又恢复了原样。根据汉娜最早的记忆，她家当时有幢十室的住宅，走廊之大足可以在里面骑自行车。家里有各种运动器械，还有一个大花园，孩子们可以在里面尽情玩耍。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让他们了解了什么是荣誉、忠诚和爱国，这些价值观念在汉娜一生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西里西亚大多数讲德语的居民一样，赖奇夫妇也自认为是普鲁士民族的爱国者，《凡尔赛和约》的签署让他们更坚定了这一立场。和约的缔造者在任意划定边界时，并没有考虑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波兰、捷克和德意志族居民的利益，因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波森省<sup>①</sup>被划入了波兰，这个新建的国家由此通过维斯瓦走廊获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同时，东普鲁士也与德国其他地区分离了。在上西里西亚，波兰族起义者和德意志自由团武装之间爆发了充满仇恨的宣传战和流血冲突。最后，有关方面无视全民公决的结果，把该地区一分为二，分别划归波兰和德国。赖奇夫妇对新的东部边界划界方案极为不满，他们指责魏玛共和国软弱无能，很快便加入了纳粹党。希特勒发表的复仇主义好战演说和散布的“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的谎言，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汉娜的母亲婚后已改信新教，但她每天还是要去天主教堂为家人祈祷。汉娜五岁以后便随着母亲去教堂，不过，她主要是去求上帝帮她实现飞的梦想。汉娜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的感受时写道：“那是一种渴望、一种向往、一种类似乡愁的深深的想念，扎根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赖奇一家生活很有规律。在温暖的季节里，全家每个星期天午夜之后便会去登巨人山看日出。上了山，大家会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举行一个家庭祈祷仪式，由孩子们演唱多声部的圣歌，母亲朗诵经文。孩子们从五岁起便接受了系统的音乐教育，库尔特学的是小提琴，两个女孩学弹钢琴。如果哪个小家伙老出错，身穿白大褂的父亲便会突然出现，要这个孩子额外做些练习：“把这一段再练二十遍，慢慢来。”孩子到了六岁，母亲开始

<sup>①</sup> 波兹南的旧称。



向他们传授她自创的一种修炼方法，目的是训练他们集中注意力。汉娜后来说，这种修炼让她这个当飞行员的受益匪浅。汉娜把自己的成就归因于幸福的童年、家人给予的大力支持以及自己与颇有修养的慈母之间的亲密关系：“成功的根源在我的家庭……”

还是孩子的时候，汉娜就常常跑到希尔施贝格附近的哈陶机场，兴致勃勃地观察滑翔机飞行员的一举一动。一战结束后，滑翔飞行成为象征爱国主义的体育运动，吸引了很多人参加。对于爱好飞行的德国人来说，当时没有其他的选项。尽管德国是飞行先驱奥托·冯·利林塔尔的故乡，但根据《凡尔赛和约》，战败的德国必须交出所有军用飞机，于1920年解散空军，并停止生产飞机。直到1922年，德国才获准在严格的限定条件下生产民用飞机，军用飞机仍然被禁。然而，协约国的政治家们却忘了还有滑翔机这码事。滑翔机的飞行员们自认为是传统的捍卫者，是忠诚的战士，他们“继承了老空军部队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憎恶周围一切让他们想起辉煌岁月的事物”。（保罗·卡尔森，《御风滑翔》）当时只有滑翔运动才为那些在其他职业中受到排挤的飞行员和技师提供了运用和扩展他们专业知识的机会。“德国青年腾云驾雾，自由翱翔！”这样的口号激励着爱好飞行的人们，他们一连数月埋头苦干，一点一点组装起他们那些不太牢靠的飞行器。他们还一起秘密策划，于1920年8月利林塔尔忌日的那一天，在“圣山”（洛恩山脉中的瓦瑟山）举行了首次滑翔飞行大赛。

“爸爸，我想当飞行员。”汉娜不满十岁就提出了这样的请求。父亲听后只是宽厚地笑了笑。但此后小汉娜每天都对父母纠缠不休，他们实在没办法，便耍了一个花招。他们对女儿说：“小汉娜，如果你能在大学预科考试以前，一个字都不提飞行的事儿，我们到时就让你去学飞滑翔机。”他们以为小家伙只是心血来潮，拖一段时间就会作罢，没想到，平时心直口快的汉娜却一丝不苟地恪守与父母的约定。为了锻炼意志力，她仔细研读了罗耀拉的圣依纳爵（天主教耶稣会的创立者）所著的《精神修炼法》，真就绝口不再谈那个敏感的话题，不是一时半会儿，而是如此坚持了好多年。

汉娜·赖奇在中学里是最讨人喜欢的一个女生，她爱交朋友，性格非常活泼开朗。193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当时，家里人早把那段“飞行小插曲”给忘了，父亲说要送给女儿一块老式金表做礼

物，但汉娜提起了他做过的保证，做父亲的惊得脸都白了。

1930年那时候，飞行还被人看做是一种即刺激又危险的勇士之举，笼罩着开拓精神、魔力和历险的光环。那时距查尔斯·林白完成其三十三小时单人驾机横越大西洋的壮举仅有三年，几乎每天都有胆大包天的飞行员不幸坠机的消息。各国航空公司相互竞争，急于开辟新航线，尽管采取了种种安全措施，还是发生了不少机毁人亡的事故。滑翔飞行运动当时是极为危险的，时至今日，情况还是如此。那时候，人们用橡皮绳把结构单薄的滑翔机牵引到空中；飞机又是单座的，没有飞行教练坐的地方，学员从一开始就得完全依靠自己。当时，坐在“飞箱”里主宰天空的主要是些胆大包天的男青年，滑翔飞行是男人的领地。

尽管如此，父母还是信守了诺言。于是，汉娜兴冲冲地跑到邻近的格鲁瑙，报名上了滑翔飞行学校初级班，成了班上惟一的女学员。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同学们都拿她这个柔弱女子开玩笑，劝她还是去学怎么做饭为好。汉娜首次模拟飞行训练犯了错误，他们更觉得自己的偏见得到了证实。当时汉娜耐不住性子，在该向下滑行的时候反而拉起了操纵杆，结果被从飞机里甩了出来，受到了三天不准参加训练的处罚。教练们私下里说：“咱们得把这姑娘撵走，咱们可不能要个死尸！”不让参加实际飞行训练，汉娜自有办法，她整夜在脑子里模拟飞行。通过这种方法，她竟然在初级考试中得了全班第一，因此引起格鲁瑙滑翔飞行学校著名的校长沃尔夫·希尔特的关注，希尔特后来成了她敬爱的“飞行之父”和良师益友。此外，汉娜还爱和一个同龄的飞行学员闲侃。课间休息的时候，她常聚精会神地听那个同学介绍自己不同凡响的未来计划。那个同学想造火箭，然后进行载人登月飞行。后来，汉娜与这个名叫韦恩赫尔·冯·布劳恩的青年结下了终身友谊。

相比之下，汉娜自己下一步的发展就比较大众化了。汉娜的父亲认为热爱飞行只不过是女儿的怪癖，只能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他希望女儿能继承自己的衣钵，当个医生。于是他的一些猪眼拿回家，开始向女儿传授手术技术的基本概念。汉娜心想，在非洲当医生肯定用得上飞机，于是公开表示，想到援非医疗队去做医生。

汉娜的父母把此话当了真，便把女儿送进伦茨堡的殖民地女子学校，让她在那里接受一年的培训，学习如何适应非洲前德国殖民地的艰苦生



活。学习课目包括做饭、洗衣以及补鞋、装玻璃和宰牲口等等。听这些东西，汉娜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她更愿意发挥自己的口才，给女伴们做有关飞行的精彩报告。汉娜根本没打算放弃飞行，相反，学校一放假，她就返回飞行学校继续接受飞行训练。

在三级飞行科目训练中，汉娜同样表现突出，因而获准驾驶学校的新型飞机，上天任意翱翔一番。汉娜终于会飞了。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终于，我无拘无束地飞起来了。终于，我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怀着满心的欢喜，我起飞了，乘着风开始滑翔了。我放开了歌喉，唱起了最美的歌。我对着天空尽情高唱，周围很冷，时雨而下，时雪而下，其实待在上天很不舒服，但我丝毫没有在意。飞了五个多小时，风力减弱了，我被迫返回了地面……”

汉娜降落受到了热烈欢迎，她一举就创下了不间断滑翔飞行的女子世界纪录。假期里，二十岁的汉娜从早到晚都在格鲁瑙滑翔机制造厂里义务帮忙，这样她可以从最基础的东西开始学习制造滑翔机，天气条件合适的时候，还可以免费驾机上天飞一遭。“我先是又创造了连续飞行六小时的女子世界纪录，后来又连续飞了十一小时。”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2年复活节期间，汉娜双管齐下，同时开始学医和学习机动飞机驾驶。本该为骨科小测验做准备的时候，她却跑去跟机师们学怎么拆马达。汉娜飞行班的一个同学回忆：“我还记得她第一次出现在起跑点的情景。小小的个子，浅色的头发和眼睛，说话清脆，总是兴冲冲的。她手拿一个四四方方的大皮垫子，有半人那么高，她开飞机的时候需要坐在上面，否则就看不到外面了。仅仅几天的工夫，她就超过了所有人，可以单飞了……这对我们这些男子汉的自尊心是个沉重的打击……”

相比之下，汉娜在学医方面却一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父母开始为女儿的前途担起心来。当时德国已深深陷入经济危机，本国航空业发展受到的限制造成飞行员过剩，很多人失业。少数几个女飞行员则被视为一帮仅把开飞机作为业余爱好，并不需要以此谋生的怪人。她们要加入职业飞行员行列，既不受欢迎，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航空公司真的还要雇人，也只会雇用男性。实际上，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当时已解雇了很多飞行员，飞机制造厂的雇员也裁减了一半。

父母的担忧使汉娜陷入了思想斗争。通过飞行员资格考试后，她在给





朋友的一封信中表露了心迹，从中可以深入观察她内心世界的活动：“现在我不得不放弃飞行的想法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受。自从考完试后，责任感和抑制不住的激情一直在我心中激烈交战，而前者必须占上风。我在生活中得到的一切以及学到的技能，都不属于我自己，我应该加以利用去帮助他人，做出奉献。否则，我学飞行便成了自私自利的行为，一种宣泄，一种享乐。除非，我能当一名秘密的空军飞行员为国效力。而在目前的形势下，这完全是无法实现的浪漫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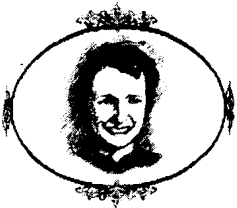
汉娜把参加一战的飞行员视作自己的榜样，尤其是那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红男爵”和汉娜一样，也是西里西亚人，公认是一战期间德国最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汉娜知道，曾当过里希特霍芬战斗机联队队长、得过普鲁士荣誉勋章<sup>①</sup>的赫尔曼·戈林，战后不得不在瑞典靠做特技飞行表演和卖降落伞为生，她觉得这是件很丢脸的事情。不过，1932年戈林已经当上了德国国会议长，汉娜高兴地注意到，戈林所属的纳粹党对发展德国的航空事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1932年4月起，希特勒本人每次参加竞选都要包租一架罗尔巴赫-罗兰德飞机或容克-52型飞机，为他主管宣传的戈培尔则为发展德国航空业抹上了一层英雄主义的光彩。汉娜并不太关心具体的政策问题，但她相信，惟有阿道夫·希特勒，才能为她的故乡西里西亚挽回名誉。

1932年，汉娜意外地得到了一条摆脱职业困境的出路。沃尔夫·希尔特在施瓦本格明德附近的霍恩贝格山新办了一家滑翔飞行学校，并聘请他的明星学员汉娜担任教员，这决定了汉娜此后的命运。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汉娜·赖奇和家人对此表示热烈欢迎。而冲锋队则借机在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波兰人的恐怖活动，这进一步激起了波兰人的反德情绪。赫尔曼·戈林被任命为帝国航空专员，不久之后他又当上了新成立的航空部部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事关德国在空中的平等权利，我将以纳粹党特有的热情和韧性为此而奋斗。”听了这个著名同行的这番话，汉娜·赖奇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强调德国应拥有“高质

<sup>①</sup> 普鲁士的最高军事奖章。



量扩军”的权利。虽然战胜国在日内瓦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德国不久便制订了一项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并开始秘密重建空军。1934年起，德国开始大力研制开发大型轰炸机、战斗机和俯冲式战斗轰炸机。所谓“业余飞行员”虽然仍归“德国航空协会”管辖，但体育飞行员已经得到了新制服，这种配有肩章的蓝制服，同以往德国空军的制服几乎没什么区别，这一设计颇有深意。

1933年夏，汉娜·赖奇驾驶新式的“格鲁瑙-宝贝”滑翔机参加了洛恩山滑翔比赛，收获可谓喜忧参半。她在比赛中得了最后一名，并在一帮参赛男人的哄笑中获得了一台厨房用台秤和一台绞肉机，什么意思就不用说了。汉娜虽然失败了，但她比赛期间做出的不懈努力受到了著名滑翔飞行教授格奥吉的关注，他已经花了一周的时间不停地观察汉娜的一举一动。比赛结束后，格奥吉邀请汉娜参加一次激动人心的南美远征活动。此行归来后，她被设在达姆施塔特-格里斯海姆的德国滑翔飞行研究所聘用。这家研究所负责研制新型滑翔机，同时还进行无线电通讯、遥控和风洞试验等飞行技术的研究。整个研究所后来并入了“德国劳动阵线”，直到第三帝国灭亡，汉娜一直是该研究所的成员。在那次南美远征行动中，汉娜又创造了距离滑翔飞行女子世界纪录（一百六十公里），这不仅是对她进入新工作岗位的最好的引荐，而且为她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后来，汉娜又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芬兰远征，回来后她进入斯德丁的民航机飞行员学校受训。不过这并不是对她的奖励，她是自己报名参加培训的。

在斯德丁，习惯与飞行爱好者友好、礼貌交往的汉娜，首次面对严酷的军事操练、教官粗声大气的喊话和公开的敌意。每天一大早她就得和一百五十个男学员一道排队集合，中间就她一个女的，显得很扎眼。她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上校教官来了……喊着口令……我迅速回头看了一眼，我还以为没被发现，但面前已经有人大喊：‘收胸！’‘向右看！’也许是‘看齐’，弄得我不知所措。”汉娜被罚加练。“任何人都能想像到，讨论课前这样加练意味着什么。”

刚开始，小个子汉娜身着肥大飞行服的那副模样把整个学校的人都逗乐了。但后来，她的飞行天才以及在上下翻飞的特技训练中表现出的那股不要命的劲头，赢得了众人的无限钦佩。尽管如此，汉娜还是体会到了第三帝国对女人的敌意。虽然她被选入国家滑翔队，并在奥运会上表现突

出，但报名参加1936年洛恩山飞行大赛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根据新规定，“妇女不得参赛”。最终还是戈林出面干预，汉娜才获准破例参赛。

早在1935年，汉娜·赖奇就开始从事危险的试飞工作，检测新出厂的飞机是否有某方面的缺陷。她一开始试飞的是“鹤”式飞机，很快便发现该机型的制动阀必须改进。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每天都进行测试飞行。我总是让人把飞机拖到四千米、五千米，然后慢慢摸索着进行各种测试，最后要进行的是俯冲测试……于是，我全身都紧张了起来，准备向下冲去。一千米、两千米、三千米，越来越逼近地面……离地大约二百米的时候，我把飞机又拉起来……”（汉娜·赖奇，《飞行——我的生命》）

汉娜勇敢地从事试飞工作为她赢得一项殊荣，1937年，她被任命为世界上首位女机长。不过，通过这种方式表彰她也是不得已之举，因为第三帝国为妇女而设的奖励，除了“母亲荣誉十字勋章”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了。然而这项任命确实打破了一切常规，一般只有那些在民航运输领域有六年以上职业飞行经历，并且至少有两千小时机动飞机驾驶经验的汉莎航空公司飞行员才能升为机长。能获得这一称号，汉娜感到无比自豪，它不仅使同行对她刮目相看，而且还对纳粹政权轻视妇女的风气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不过，这位明星女飞行员此后一直未能加入“纳粹飞行军团”，她在事业发展过程中一直游离于各种纳粹团体之外。一般来说，第三帝国的青年飞行员培训是按严格的规则进行的：“在德国全国青年领袖的密切配合下，希特勒青年团飞行员先要接受初级培训，然后到‘纳粹飞行军团’里正式受训，并参加劳动服役队，最后才能加入这支飞行员队伍。十四岁至十七岁的青年飞行员仍归希特勒青年团管辖，十八岁后才进入‘纳粹飞行军团’服役。”（孔茨，《纳粹飞行军团里的滑翔飞行》）

汉娜一直扮演着例外的角色，第三帝国总是为这个天才飞行员破例。“德国少女队”（隶属于希特勒青年团，参加者为十四至十八岁少女）曾请汉娜担任名誉会员，但她拒绝了。鉴于汉娜对第三帝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别人对她没有参加纳粹党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937年9月，汉娜调到梅克伦堡省米里茨湖附近的雷希林军用飞机试飞场工作，负责测试俯冲式轰炸机的新制动系统。第三帝国事先并没想到还需要妇女来从事军事工作。汉娜成了新建立的德国空军的首位女试飞员，这与她“当一名秘密空军飞行员为国效力”的梦想已相当接近了。在



1937年9月举行的一次大型军事演习上，汉娜看到俯冲式轰炸机、轰炸机和战斗机，产生了一系列感想：“德国又武装起来了。我们看到了，全世界也看到了。但是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与世界不同。战争？我们年轻人想要和平，不过，是那种公正的、能让我们生存的和平……我们的民族生活在其他民族的夹缝之中，只有狭窄的生存空间，并经历了多年的贫穷和动荡，如今终于看到了面包，看到了繁荣。我们由此认识到，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世界上其他民族如果也有类似的经历，难道不会感到自豪吗？”（汉娜·赖奇，《飞行——我的生命》）

在试飞场工作使汉娜亲眼看到了第三帝国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所做的巨大努力。她虽然很有技术头脑，但同时又很幼稚，容易盲从。古罗马格言说“想要和平，就得备战”，她认为很有道理，她还寄希望于希特勒一再做出的和平保证。汉娜曾驾滑翔机远征巴西、阿根廷、芬兰、匈牙利、利比亚、美国和英国，并在逗留期间受到这些国家飞行员的热情款待。她相信各国飞行员的友好交往可以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1937年，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德方向英国皇家空军展示了最先进的飞机 He-111, Ju-86、87 以及 Do-17，汉娜觉得自己的看法得到了证实。

当时德国还有几位女飞行员，但汉娜总与她们保持着距离。艾莉·拜因霍恩二十四岁时曾单独驾机完成了一次环球飞行，汉娜与她只是泛泛之交，两人在学驾驶机动车时同过班。梅利塔·席勒同汉娜一样也在希尔施贝格读的中学，而且在她被任命为机长后不久也获得了这一头衔。她被汉娜当做了竞争对手。

在工作中，被人尊称为“汉娜女士”的年轻女机长几乎只与男人打交道。姑娘既漂亮，又总是乐呵呵的，不少人都喜欢她。而汉娜对同事虽然很友好，也总乐意帮助别人，却拒绝与任何人深交，没见到她和谁有过亲密的关系。不管怎么说，她确实一直没有结婚。汉娜不与异性深交，但自始至终与母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坚持每天都给母亲写信。艾米·赖奇对女儿的情况了如指掌，女儿从事飞行工作虽然很危险，但做母亲的认为这是对祖国应尽的义务。汉娜还把自己要参加“自我牺牲行动”的高度机密告诉了母亲，她也表示赞同。有时候，汉娜在外出做报告前会给母亲打个电话：“你帮我想今晚该说些什么。”母亲便赶紧起草讲稿，立即把它交给女儿。汉娜的报告总是很振奋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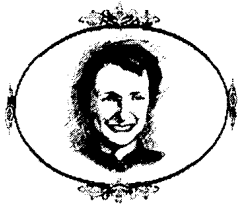


后来飞行设计师海因里希·福克实现了利奥纳多·达·芬奇的构想，造出了一架垂直起飞的飞机，是女飞行员汉娜驾驶首架直升机迈入了飞行新天地。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点点地均匀加油，奇迹便真的发生了！飞机从地面完全垂直地升了起来，就像有根看不见的绳子把它吊起来一样。”直升机表演给后来访问德国的查尔斯·林白也留下了深刻印象。1938年柏林国际车展期间，汉娜又在柏林的德国展览大厅里驾驶这种神奇的飞行器做表演，但很多观众认为这不过是个恶作剧。为期三周的车展期间，汉娜每天都要把那架“德国”号福克FW-61型直升机升到封闭大厅的半空中，供数千名观众瞻仰。在此之前小丑、空中飞人和舞女们做表演，汉娜开直升机是整场演出的高潮。很多飞行员听说要开直升机在室内表演，就吓得赶快躲开了，而汉娜却把它当做一项为国争光的崇高任务来完成，她也因此举世闻名。

1939年7月3日，希特勒在戈林、博尔曼和军界高层人士的陪同下，来到雷希林参观。包括汉娜机长在内的试飞场工作人员，向他们展示了德国空军的最新研究成果，当时离战争爆发已经没多长时间了。希特勒当场表示：“我们的空军将打垮敌人，我们的技术优势将撕碎波兰人的神经。”这次新战机表演给希特勒留下了德国空军已所向披靡的错误印象，后来的英格兰空战证明了这一点。

德国空军于1939年9月1日拂晓时分对波兰发动进攻之后，汉娜·赖奇对战争的爆发表示遗憾，但她又对整个西里西亚地区又在“大德国的范围内统一为一个德意志民族的保护区”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西里西亚人应该得到的“补偿”。希特勒1939年10月8日发布的指令不仅将但泽、西普鲁士、波兹南和上西里西亚地区，而且还将1914年前并不属于普鲁士的一大片地区也划入了德意志帝国，汉娜并没有因此而拒绝为已与希特勒密不可分的祖国效力。她仍然心甘情愿地为纳粹政权从事十分危险的试飞工作，甚至是争着抢着要这么做。没能当上战斗机飞行员，她已感到非常遗憾。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一项任务是做截断气球缆绳的试验。不少人还记得，德国空军对英国，特别是对伦敦进行空袭时，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干扰——气球阻拦网……因为用于固定气球的缆绳会把碰上它的飞机的表面给锯断……”（汉娜·赖奇，《飞行——我的生命》）汉娜首先用“Do-



17”型轰炸机测试用于保护飞机的所谓“转向器”，然后开始驾机飞向气球，想截断气球的钢缆，结果发生了事故。“缆绳把两个螺旋桨浆叶的下半部分给刮掉了。我关掉了发动机……想让螺旋桨停止转动。我能成功吗？转动失衡的螺旋桨随时都有可能把发动机拖出来，从而导致飞机坠毁。这是一场与死神进行的赛跑。”汉娜赢了这场比赛，并因此获得了二等铁十字勋章。

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报道说：“元首和国防军最高统帅授予著名飞行员汉娜·赖奇机长二等铁十字勋章，表彰她不断舍生忘死为研制空军装备做出的特殊贡献。”三天之前，空军部长戈林还举行了招待会，向汉娜颁发由他本人创立的飞机驾驶员和观察员镶钻金质奖章。帝国元帅戈林走进招待会大厅时，汉娜正站在几个将军中间。戈林四下张望着找她，发现汉娜后，戈林扯着大嗓门惊讶地说：“啊？这难道就是咱们著名的机长吗？您个头儿这么小怎么能开得了飞机呢？”汉娜对自己个子矮很敏感，她模仿着大块头戈林迈大步走路的样子说，“难道要当飞行员就非得这样吗？”

二等铁十字勋章的授奖仪式是在柏林总理府举行的。汉娜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的情景时写道：“希特勒热情友好地向我表示问候。他身边站着戈林，脸上喜滋滋的，就像一个有机会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家乖孩子的老爸一样……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希特勒对飞行员涉及的纯技术领域的了解，居然和专干这行的人差不多。他提问题思路惊人地清楚，直指问题的本质和要害……他举止朴实自然，透出一种自信，每个在他身边的人都会受到感染……”

1941年4月4日，希尔施贝格市向它著名的女市民汉娜·赖奇表示敬意。市长亲自来到柏林迎接这位女飞行员荣归故里，汉娜一到故乡便经历了英雄凯旋般的场面。下西里西亚各村镇都挂起了彩旗，人们站在街道两旁向汉娜抛送鲜花。在希尔施贝格市里，年轻人组成了夹道欢迎的队列。格鲁瑙滑翔飞行学校的学员们也在市政厅前列队集合，并一起奏乐向这位空中女英雄致敬。在市政厅，市长向汉娜颁发了家乡的荣誉市民证书，此外还赠给她一架“格鲁瑙-宝贝”型滑翔机。汉娜·赖奇成了众人心目中的偶像，而纳粹政权则十分注意对此善加利用，在汉娜没有试飞任务的时候，她会被派到各处发表演讲。1942年，汉娜兴高采烈地对两千名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队的负责人发表了一次引人入胜的讲话，鼓励他们为祖

国效力。在以后的几次演讲中，汉娜还谈到了自己从事试飞工作的一次英勇的冒险经历。有一段时间，汉娜负责测试梅塞施米特公司生产的 Me-163 (A 和 B) 型火箭飞机。这种飞机能在一分半钟的时间内一下子蹿升至一万米高空，然后所有燃料耗尽，飞机会以极高的速度滑翔到地面，这种急速俯冲可以驱散敌方的轰炸机编队。按照设计，Me-163B 型飞机应该在起飞后不久便要甩脱起落架，但有一次起落架卡住了。汉娜说：“我做了几次陡然拉平机身的动作，想借此甩脱起落架……但我很快发现并未奏效……起落架仍然挂在机身上，操纵系统部分受到了干扰。”汉娜根本没有考虑跳伞的问题，因为“绝没有一个飞行员会轻易抛弃自己试飞的这么昂贵的一架飞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会尽力争取让飞机完好无损地降落”。突然，汉娜感到飞机已在急速下坠，操纵系统完全失灵。“我尽可能地弯腰缩作一团。飞机撞到地面上，啪嗒啪嗒翻起了跟头……我一点都没感觉到痛……”（汉娜·赖奇，《飞行——我的生命》）尽管满脸淌血，只在鼻子处剩下一个洞，动一动就痛得要命，汉娜还是挣扎着用笔记下了事故原因，并画下了坠落过程的草图。考虑到营救人员看到自己这副模样一定会吓一跳，汉娜还把一块手绢绑在了头上，蒙住了脸，随后，她便失去了知觉。这起坠机事故，汉娜四处颅底骨折、两处面部颅骨骨折、一处脑挫伤，而且鼻子被毁。在医院一连躺了几个月以后，汉娜才康复。1943 年 3 月，汉娜获得了一等铁十字勋章，这种嘉奖一般只有前线军人做出了英雄壮举才能获得。汉娜这下子成了纳粹的民族英雄。

汉娜并不赞同纳粹的反犹太主义。她对“水晶之夜”发生的反犹骚乱表示了强烈的谴责，有关方面命令她在德意志研究所中不要与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同事约阿希姆·屈特纳合作，她也拒绝了。1941 年 9 月 1 日，纳粹德国内政部下令所有犹太人必须“在公众场合在外衣的左胸部佩戴醒目的犹太大卫之星标志”。汉娜和家人认为，“这种孤立措施决非雅利安人所为，违背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一致拥护西里西亚大主教管辖区新教教会监事会对此所持的反抗立场。

汉娜有个在德国驻瑞典使馆工作的同行，名叫彼得·里德尔，他告诉汉娜，在德国有关灭绝营。汉娜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去面见党卫军头头儿希姆莱，希姆莱称所有的有关传闻都是恶毒诽谤，汉娜便信以为真了。人们常在背后说“汉娜女士”挺幼稚。有一次德军要征用雅姆利兹这块地方修建



练兵场，当地居民要被迫搬迁。汉娜雇了律师想为当地人讨公道，后来希姆莱写了一封信，她便放弃了。

“现在，既然有党卫军领袖的最终指令确认有关搬迁计划不可更改，我自然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只能相信他们必须为元首、为祖国的利益而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了……”（1943年10月27日汉娜·赖奇书信）1944年年半之时的汉娜不仅对“元首”，而且也对海因里希·希姆莱钦佩不已。她在深受希姆莱感动之余，曾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亲爱的党卫军领袖，在我飞往下一站之前，我先要向您表示衷心的问候和感谢。您在1944年7月26日发表的讲演，鼓舞并深深打动了。我冒昧请求您，再寄给我一份您的讲演稿，我想送给我弟弟做生日礼物，他是个海军军官……上帝保佑您！最衷心忠于您的汉娜·赖奇。”

希姆莱看到信后，喜得让人一下给汉娜寄了两份讲演稿。

汉娜当时确实红得很，连冯·格莱姆上将都邀请她对俄罗斯境内的东部作战前线进行访问，因为像她这样一个佩戴“军人荣誉勋章”（汉娜自己这么说）的女人可以给正在打仗的部队提高士气。1943年深秋，机长女士满足了将军的愿望。然而到前线后，汉娜愈加感到，德国已经输掉了战争，“阴影已笼罩着德国”。早在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失利后，汉娜就有了这种感觉。看到一座又一座德国城市被盟军的空中轰炸夷为平地，她和许多军官一样都寄希望于希特勒时常提到的那几种“前所未有的秘密武器”。这些秘密的神奇武器中便包括V-1（V代表报复武器），这是一种遥控飞弹，带有大约一千公斤炸药。汉娜·赖奇赞成使用V-1飞弹，但她还极力主张开发一种由人操纵的飞弹，以便更准确地摧毁敌方阵地。1944年2月28日，希特勒在贝格霍夫山间别墅接见了汉娜，亲自祝贺她荣获一等铁十字勋章。会见中，汉娜谈到了她那个类似“神风敢死队”式的想法，此前她已与几位飞行员同事就此交换过意见。她所设想的是一种“自杀式行动，由那些明了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挽救危局并愿意做出自我牺牲的人参加”。（汉娜·赖奇，《飞行——我的生命》）希特勒反对这么做，第三帝国的其他大人物也持同样的看法：这种做法非军人所为，也不符合德国人的天性。然而汉娜·赖奇仍然固执己见，再加上有营救过墨索里尼的奥托·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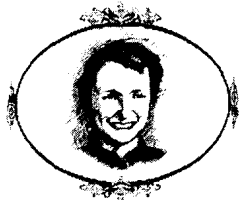
科尔兹内<sup>①</sup>帮忙说项，她最终获准搞一组试验。

这项计划启动之际，代号为“赖兴贝格”。不到两周，便有四种载人的V-1飞弹装配好了，样机中有带滑行板的，可以降落；也有动真格的，不带滑行板。尽管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有关“神风”式行动的消息仍然被公众知道了。不过，人们还以为会有一千名日本飞行员参加有关行动，实际上自愿报名参加自杀行动的是七十名德国人。汉娜亲自参加试飞，同时对她那群平均年龄十七岁的敢死队员进行训练。让汉娜极为恼火的是，计划一再受到干扰。戈培尔坚持要为这群“德国神风队员”授勋；此外，小伙子们还得接受体能训练和射击训练，汉娜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再者，那些教官作报告时虽然满口爱国主义，自己却不报名参加自杀行动，同日本人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愿意牺牲自己生命的汉娜对此鄙夷至极。她对这项事业的热情甚至超过了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后者曾建议让“厌世者、病人或犯人”参加有关行动，汉娜愤怒地拒绝了，认为这简直是侮辱。她说，希姆莱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一种光荣的爱国行动。她本人的想法是，只有健康男子，最好还是有家有口的，才有资格操纵“赖兴贝格武器”。实际上，这种载人V-1飞弹一直没有投入使用。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希特勒下令从1944年6月中旬起使用无人驾驶V-1飞弹打击英国。

1945年4月25日，冯·格莱姆上将紧急召见汉娜·赖奇，当时她正在基茨比厄尔地区<sup>②</sup>为一家空军野战医院挑选合适的地方做紧急飞机降落场。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将军收到希特勒一份电报，命他立即赶赴柏林，但又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当时苏联红军已将柏林彻底包围，苏军正向市中心发起进攻，柏林被攻克只是几小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突破重围见到希特勒的机会几乎为零。德国飞机几天以来一直就没能飞入柏林！战争都打到这种收尾阶段了，将军还是一刻没有犹豫，决定服从希特勒荒唐的命令。将军当时正驻扎在慕尼黑附近，他想，要进入被围的柏林总理府地下避弹所，他只有乘直升机才有一线希望。因此，他请求汉娜协助执行这危险的“特别任务”。这位传奇女飞行员并不受军令的约束，但出于“理所当然的同志之谊和责任感”，她立即答应了将军的请求，根本

<sup>①</sup> 党卫军中一名知识分子出身的冒险分子，曾于1943年9月13日乘滑翔机从意大利亚平宁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山顶上的一家旅馆里救出了被反叛者囚禁的墨索里尼。

<sup>②</sup> 奥地利地名。



没问这次有生命危险的任务有什么意义和目的。

4月26日，格莱姆和汉娜乘一架Ju-188飞机飞往雷希林，又在那里换乘FW-190飞机飞往当时唯一还掌握在德国人手里的柏林机场——加陶机场。FW-190上只有两个座位，没有汉娜坐的地方，她只能通过飞机的后舷窗钻进机腹中。“我头朝前蜷作一团，躺在飞机尖锐的金属骨架上，眼前黑黑的，什么都看不见……如果没人帮忙，我休想再爬出去了。”（汉娜·赖奇，《飞行——我的生命》）大约有三十架战斗机为这架飞机护航。快到柏林的时候，飞机驾驶员通过俯冲飞行才躲过了苏军发射的炮火。而在加陶机场，那架供他们换乘的“菲赛勒鹤”式飞机已被盟军炮火炸毁。直到4月26日傍晚，他们才弄到一架备用飞机，那是当时机场仅存的一架可供使用的飞机了。虽然此时已根本谈不上开直升机的课题，但汉娜还是决定陪格莱姆走一趟。于是格莱姆驾驶那架备用的“鹤”式飞机带着汉娜飞入柏林。当时的柏林已在双方交战中变成一片燃烧的废墟，四处鬼气森森。为了躲避敌方战斗机，格莱姆尽可能低空飞行，连端着冲锋枪站在坦克和装甲车旁的苏军士兵的脸都能看得一清二楚。飞机不断遭到炮火袭击。突然，格莱姆被炮火击中，瘫在驾驶座上失去了知觉。站在他身后的汉娜立即抓住操纵杆和加油杆，凭借着无数次训练飞行中所获辨别方位的知识，汉娜把飞机安全降落在勃兰登堡门旁边。以下是她描述的情况：“我把冯·格莱姆先生拖出了机舱，四周空无一人……虽然能听到炮弹的呼啸和爆炸声，但一个人影都见不着。冯·格莱姆先生被放躺在街上后苏醒过来。我撕下一只衣袖，紧紧绑在他的小腿上，想止住他脚部伤口的流血……我们等了一段时间……时间就像停滞了一样……终于看见一辆军用车来接我们了……”（1946年6月汉娜·赖奇写给哥哥库尔特的信）晚上快7点的时候，格莱姆和汉娜到达总理府地下避弹所。

一个亲眼见到后来发生情况的人描述道：“……那位将军受伤了，躺在担架上。陪他来的是女飞行员汉娜·赖奇……赖奇和希特勒以前认识，两人相互热情问候。大家讨论任何事情，她都谦虚地待在一旁不发表意见。这个娇小的女子以其活泼乐天的个性，赢得了地堡里所有人的充分尊重……”连希特勒都对汉娜公开表示赞扬：“您真勇敢！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忠勇之士的。”（格哈特·博尔特，《希特勒的最后十天》）此时的希特勒已经目光呆滞，双臂不停地哆嗦，显得苍老了许多。



格莱姆还躺在手术台上，希特勒就滔滔不绝地向他怒诉戈林的叛变罪行：“我什么失望都尝到过，什么背叛都碰到过，现在又加上这个……我已经下令逮捕戈林，革掉他所有的职务，把他从一切机构中赶出去。”其后，希特勒任命格莱姆接替戈林出任空军总司令，并把他的军衔升为陆军元帅。汉娜负责照料受伤的格莱姆，两人搬进了地下避弹所最底层的医务室。

希特勒和他身边为数不多的最后一班“侍臣”藏身的地下避弹所，在地下深处分为好几层。汉娜的回忆录记载，她当时见到的人主要有马丁·博尔曼、黑费尔大使、克雷布斯将军、飞行员鲍尔、爱娃·布劳恩、希特勒的几个女秘书、党卫军的费格莱因将军以及戈培尔夫妇。格莱姆将军不需要她照料的时候，汉娜便跑去和玛格达·戈培尔以及她的六个孩子待在一起。“我一进屋，迎面便看到六个孩子漂亮的小脸。最小的孩子才四岁，最大的十二岁，他们非常好奇地看着我。听说我会开飞机，孩子们幻想的大门一下子就打开了，他们围着我唧唧喳喳，一个劲儿地问这儿问那儿……我教他们唱多声部的歌曲，还有地道的蒂罗尔山歌，小家伙们很快就学会了。听到轰隆哗啦的爆炸声他们并不害怕，因为大人们都说，那是‘元首伯伯’正在让人开炮消灭敌人呢。有一次最小的那个还是害怕了，哥哥姐姐们又拿这番话去哄他，小东西很快就不闹了……”（汉娜·赖奇，《飞行——我的生命》）汉娜还唱歌哄孩子们睡觉：“明天早晨，只要上帝愿意，你就会被叫醒。”实际上，戈培尔夫妇当时已经决定带孩子们一起为第三帝国殉葬了。汉娜生性快乐，来到地下避弹所后，这一点也没有改变。其他那些在地下狭小的空间里已经待了很久的人，虽然还比较镇静，但情绪都很低落。

总理府遭到了不间断的轰击，炮弹的呼啸夹杂着空投炸弹沉闷的爆炸声，不绝于耳，闹得大家神形交瘁。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轰炸越来越激烈。最后，地堡最上面的水泥层被炸穿了，连地堡最下面的房间都被震得直掉墙灰。后来通风系统也停止了运转，地堡里的人很快便感到胸闷气短，头痛难当。再往后，不会再有大部队前来救援，希特勒又拒绝强行突围的消息便传开了，有的人陷入了绝望的沉思，有的人借酒浇愁。与外界的电话联系越来越频繁地中断，每个报务员都拼命在与柏林的部队指挥官联系，带回来的消息也越来越可怕。到处是一片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气



氛。然而，希特勒却仍要开会讨论对策。苏联人的坦克已经开到了离总理府一千多米的地方，希特勒还在讲要不要调动温克将军指挥的部队来解围。随着苏联人的迅速挺进，希特勒下令，放水淹没藏有几千逃难者的柏林地铁管线。

4月28日，应格莱姆的请求，希特勒把两小瓶毒药交给了汉娜。拿希特勒的话说，他这样做是不想让她吃亏。汉娜曾建议驾机突围，但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他一再表示，一旦温克的解围行动失败，他便要和爱娃·布劳恩一道自尽，他不想落到苏联人的手里。

和格莱姆一样，汉娜当时也做好了了却此生的打算。她认为自己绝不可能活着离开地堡，于是决定尽职到底，和“元首”一道去死。后来，汉娜在总结自己当时的立场时说：“德国飞行员以最勇敢、最光荣、最不怕死的方式出生入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祖国，是出于对‘元首’的信任，是出于对德国空军和国家首脑的自豪。国家的领导层可能做得对，也可能做得错，对此做出判断不是我的事情。然而一个人如果是领导层的重要一员，他就必须准备好和它共存亡。”（汉娜·赖奇，《巅峰和低谷，1945—1977》）

4月28日晚，又一个坏消息传来：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已答应西方盟军，所有与他们作战的德军将无条件投降。希特勒暴跳如雷，称这是德国历史上最无耻的叛国行为。当晚深夜时分，希特勒出人意料地来到格莱姆的病房。他命令受伤的格莱姆立即离开总理府和柏林，去查明希姆莱的下落，如果可能的话，立刻把他逮捕。陆军元帅和女飞行员请求留在“元首”身边，希特勒没有答应。于是两人匆忙与大家告别。玛格达·戈培尔从手指上退下一枚钻石戒指送给了新交的朋友汉娜。然后，她又把写给大儿子（哈拉尔德·克万特）的两封诀别书交给了女飞行员。爱娃·布劳恩也托汉娜带封信给自己的妹妹格丽特尔，爱娃的妹夫赫尔曼·费格莱因由于企图逃跑刚被处决。马丁·博尔曼托格莱姆把几份文件交给设在贝希特斯加登的纳粹党办公厅。在这之后，格莱姆和汉娜两人便走出地下避弹所，重新回到弥漫硝烟硫磺味的地上世界。

跛足将军由忠实女看护搀扶着走向勃兰登堡门，一路上见到的情景阴森恐怖。勃兰登堡门前一个所谓的防弹片箱中，有架阿拉多型教练机正在等候他们。不可思议的是，这架飞机居然穿过了苏联人密集的高射炮火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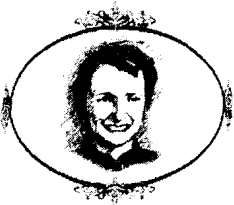


幸降落。虽然敌方的探照灯在柏林的中轴线附近来回照射，飞机还是冒险起飞了。午夜时分，格莱姆和汉娜升入空中飞往雷希林，此刻，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的婚礼正在元首地下避难所中举行，两人因此错过了，如果他们不走的话，肯定会受到邀请。婚礼办得一点都不马虎，有户籍官员和男女宾相，新郎、新娘大声宣誓，并按规定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随后举行了婚宴，餐桌上铺的是印有希特勒花押的雪白桌布，还摆着几个银烛台，很是隆重，葡萄酒、烈酒和食品均取自总理府丰富的库存。除爱娃·希特勒一个人显得格外幸福外，整个婚宴的气氛沉郁万分，看上去就像葬礼之后的聚餐。大家心里都在想的是，这对新婚夫妇马上就要去自尽了。新郎早早就退席去口授他的遗嘱了。

飞机在雷希林降落后，冯·格莱姆正式接管了德国空军残部的指挥权。随后，他便在驾驶员兼护士汉娜·赖奇的陪同下，乘上一架比克尔-181型飞机匆匆踏上了穿越德国和奥地利的漂泊之旅。按计划，他们此行将要会晤海军和陆军的高级将领。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我飞行时有意避开了公路和铁路线，因为它们是低空飞行的敌机经常袭击的目标。我尽量贴着地面沿着树林的边缘飞，树林投下的影子可以为我们提供保护。没有树林的地方我便贴着灌木丛和篱笆飞……有些路段我们还得换乘汽车。”

在维斯马，格莱姆拄着拐杖、打着简易绷带对德国空军进行了最后一次演讲。汉娜不愿意出风头，但她还是向在场的飞行员介绍了自己和格莱姆驾飞机去见希特勒的冒险经历。1945年5月1日，官方宣布了“元首”的死讯，汉娜立即带着正在发高烧的格莱姆赶赴普伦。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海军上将邓尼茨在那里建立了德国新政府。在普伦，汉娜亲眼看到格莱姆被确认为已经毫无战斗力的德国空军的总司令。七天之后，第三帝国便灭亡了。在邓尼茨的临时营房里，汉娜还见到了“叛国者”希姆莱。希姆莱带着一大群随从，从他驻扎的最后一个大本营（吕贝克附近）赶来向邓尼茨表示祝贺和效忠。当时逮捕希姆莱是不可能的，据几个目击者说，汉娜愤怒指责党卫军领袖不该偏偏在该与“元首”待在地堡里共存亡的时刻背叛希特勒。希姆莱对此反驳说，历史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他那样做是为了德国的利益。

不久之后，格莱姆的脚伤恶化。在汉娜的照料下，四天后将军的伤情又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于是两人重新上路。德国当时已陷入一片令人难以



置信的混乱，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四处流浪，大家都盼着德国早日投降。此时此刻，格莱姆和汉娜两人却在集中精力打听陆军元帅凯塞林的下落，想和他探讨如何在东线阻止红军的挺进，以便引导巨大的难民潮涌向西方盟军占领的地区。但他们俩一直没能找到凯塞林，最后只好放弃。

漂泊了近两个星期后，格莱姆和汉娜又回到了出发地。汉娜回忆道：“飞机载着我们飞越了阿尔卑斯山……真是一段奇妙的旅程。5月8日飞抵滨湖采尔后，我们获悉，德国已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了字。”

汉娜盼望能很快见到住在利奥波兹克龙城堡的家人。1945年2月，赖奇医生在苏联人进攻西里西亚之前逃往西部，几经周折后来到萨尔茨堡，最后经朋友介绍在利奥波兹克龙住了下来。

汉娜和还在生病的德国空军总司令在基茨比厄尔空军临时野战医院一露面，就被美军军官拘捕了。这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拘留，美国人甚至表示愿意通知赖奇医生他女儿已经平安归来。正因为如此，几天之后，当汉娜听说父母和妹妹海蒂以及她的四个孩子都已不在人世的可怕消息，她才愈发感到震惊。美国人告诉汉娜，由于听到传言说，美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打算把从东边逃来的妇女和儿童遣送回已被苏联人占领的故乡西里西亚，汉娜的家人在美军攻入的前一天都已自杀身亡了。汉娜当时已下定决心用希特勒给的氰化钾也来个自我了断。陆军元帅冯·格莱姆获悉自己将和德国空军的其他高级将领一道被送往英国接受审讯，也为自己选择了这条出路。不过，汉娜在死之前想去为家人扫墓，三个美军看守最终被她说服，开上吉普车陪同她前往萨尔茨堡。路上这几个年轻的美国人问汉娜，她怎么可能愿意为这么一个罪恶的政权服务呢？他们给她看了一些可怕的照片，照的是刚刚解放的达豪集中营里堆积如山的尸体。美国人还把在集中营里发现毒气室的情况告诉了汉娜。而女飞行员却认为，这只是天方夜谭和美国人的恶意宣传。为家人扫墓时，汉娜决定继续活下去，按她的话说，她想“为千百万正直的德国人辩护，并帮助查清事实真相”。（汉娜·赖奇，《巅峰和低谷，1945—1977》）

法国人占领基茨比厄尔后，美国人开始将那家野战医院的全部人员和资产转运到德国。在转移过程中，汉娜趁乱逃到因斯布鲁克，躲到了一个亲戚家里。要不是一个星期之后，她又乘火车赶往萨尔茨堡为家人扫墓，估计她能躲藏很长时间不被人发现。两个穿美军制服的男人把她押下火



车。其中一位沃克上校操着流利的德语对汉娜说，他是想防止她落入苏联人手中，苏联人对她这个试飞员所掌握的情况很感兴趣。沃克还告诉汉娜，自己也是个飞行员，是美国情报部门下属的美国陆军航空兵团情报处的负责人。他领着汉娜首先住进了利奥波兹克龙城堡，后来又搬到了特劳恩基兴的格兰岑比希尔别墅。沃克对汉娜以及她多年的上司格奥吉教授很友好，把他们奉为上宾。同汉娜一样，格奥吉教授当时也受到拘留。天真的汉娜以为和一个飞行员在一起自己便可以高枕无忧了。每天的伙食相当不错，吃饭的时候，沃克几个所谓的朋友便来了，大家在一起边吃边聊，谈得很开心。汉娜说什么美国人都感兴趣，这让她很得意。她有一肚子的故事可说，也非常乐意回答美国人提出的有关问题：关于她从事的试飞工作，关于驾驶飞弹进行自杀式袭击的计划以及她待在希特勒地下避弹所里的日日夜夜。沃克经常中途告退，他急急忙忙地赶往卫生间是为了把汉娜谈的情况赶紧记录下来。

汉娜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因为当时人们还不能肯定希特勒是否真的死了。几十年后，罗伯特·沃克回忆道：“有几个身份颇高的军人和文职人员经常在我们那里‘做客’，为我们解答一些战后尚存疑问的问题。我们是通过让‘客人’写报告或饭桌上聊天等形式了解有关情况的。有时候我的人或我本人也会对他们进行单独审讯。对汉娜·赖奇的审讯便是通过这种形式进行的……我称之为《希特勒防空地堡中的最后几天》的那份报告，或许就是从汉娜那里了解到的最重要的一份报告了。这份报告以及其他报告，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它使得法庭相信希特勒确实死了……汉娜（后来）否认我的报告中的若干段落出自她口，但是我报告的内容无一不是与她商量过并得到她确认的，这其中就包括她的以下观点：她认为，此人开始政治生涯时是想当德国的救星，最后又带着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特别是有意谋杀犹太人的罪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一次，当时天特别黑，她对我说，她对自己一直没有加入纳粹党感到很高兴……”（罗伯特·沃克上校 1999 年 2 月 19 日的陈述）

沃克高度机密的报告后来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公之于世，登在了《星条旗报》上。有人还把这份报告提供给了英国少校特雷弗-罗珀。此人曾经审问过很多希特勒最后地堡生活的见证人。

根据这些并不完整的记录以及 1945 年公开的不甚可靠的希特勒参考文



献，特雷弗-罗珀撰写了《希特勒的末日》一书，这是世人为再现希特勒末日景象所做的第一次尝试。这本书虽然粗线条地描绘了所发生的实际情况，但是作者为了弥补当时资料的匮乏和填补漏洞，也加入了不少庸俗的奇闻逸事。比如，有证人说，“希特勒吃完他那简单的饭菜——凉拌蔬菜和蒸馏水后，便站起身来蹦到餐桌上跳起舞来”，博尔曼也跟着跳了。特雷弗-罗珀便把此话当真了。此外，特雷弗-罗珀还轻信了施佩尔据说是在“很勉强”的情况下作的供词。施佩尔说，他当时曾打算把地堡中的整个纳粹政治领导层都给暗杀了。有关汉娜·赖奇的那份简单的报告，经特雷弗-罗珀一加工，便扩展成了一篇真正的长篇小说。他一次都没有见过汉娜·赖奇本人，居然对她作了长长的一段心理分析：“（她对希特勒）由好感发展到宗教式膜拜，从摆脱影响发展到神学意义上的憎恨。”这位英国少校在书中借汉娜之口说了爱娃·布劳恩不少坏话。他还称汉娜爱“夸夸其谈”，身上有种“幼稚的条顿精神”。书中还说在地下避弹所里曾举行过一次会议，“在这次可怕的秘密会议上大家仔细研究了她的自杀式袭击方案……还有一些感伤的细节：他们（格莱姆和赖奇）商定先将毒药吞下去……然后将绑在他们身上的重型手榴弹上的引线拉掉。想以一种追求轰动效应的方式离开人世的不光是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两个人。”按照特雷弗-罗珀的说法，身受重伤的格莱姆在周围气氛的感染下仿佛“返老还童”了一般，而其他则“歇斯底里般地拥到希特勒身边，乞求他允许他们一同参加死亡之圣事”。

由于是描述希特勒地下避弹所最后几天情况的第一本书——后来才有了比较可靠的描述，里面又有很多耸人听闻的故事，所以特雷弗-罗珀撰写的《希特勒的末日》一下子就成了报纸、书籍和电影争相攫取素材的宝库。然而，汉娜·赖奇却抱怨说，这本书把她的生活给毁了：“因为这本书，我一再被人拉到政治舞台上，而我所说的话却从来没有人听。时至今日，捏造事实的情况仍然存在，就像特雷弗-罗珀写那本书时一样，国内外的媒体和书籍仍然时常引述以我的名义发表的所谓《希特勒地堡中的最后几日目击报告》的内容……我在这里要强调，我从来就没有写过、看过和签署过那几份以我的第一人称撰写的《目击报告》，它们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不符合事实……”（汉娜·赖奇，《飞行——我的生命》）让女飞行员特别生气的是，除了在地下避弹所之外，她本人只与希特勒会过三次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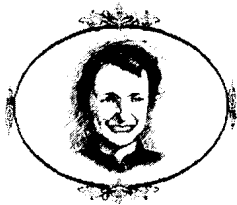


别人竟把她说成了“元首”的女朋友、爱娃·布劳恩的情敌。此外，还有人指责汉娜·赖奇侵犯书信隐私，私自拆看了爱娃·布劳恩让她托带的信件，称那里净是些“不知羞耻的废话”，并把信给销毁了。汉娜坚决否认自己干了这等事情。见过汉娜的人都承认，她行为“正派，无可挑剔，甚至有点贵族气”。

汉娜·赖奇的抗议，除了使特雷弗-罗珀的书在再版时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修改之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汉娜要求与作者面谈，他没有同意。特雷弗-罗珀后来当上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教授，长年从事第三帝国史研究。1981年，希特勒日记的出现引起一时轰动。作为该领域的专家，特雷弗-罗珀教授成了咨询对象。他对手稿进行了一番仔细鉴定后断言，这毫无疑问是真品。不久之后，柏林的联邦档案馆查明所谓的希特勒日记手稿其实是拙劣的赝品。一个名叫康拉德·库尧的专做纳粹纪念品买卖的商人伪造了这六十本日记，制造了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伪造案。此公因此被勒令出庭受审。

汉娜·赖奇战后在几个拘留营里（萨尔茨堡、弗赖辛和上乌瑟尔）共待了十八个月。韦恩赫尔·冯·布劳恩曾邀请她参加他的研究小组，为美国人工作，被她拒绝了。邓尼茨政府全体成员被捕，以及有关当局禁止她在公开场合佩戴印有卐字的铁十字勋章都被她当做是“丢脸的事情”。她自豪地佩戴着这枚勋章可是有好几年了。1947年12月15日，非纳粹化法庭颁布通告，根据清算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法，汉娜·赖奇被划入了“非涉案人”行列，理由是她既非纳粹党员，也不是其他纳粹组织的成员。汉娜说，这纸判决使她在所有“被无辜判定有罪的朋友”面前几乎都感到惭愧了，“……因为我和他们所有人以及千百万德国人一样，仅仅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职责而已。”（汉娜·赖奇，《巅峰和低谷，1945—1977》）

1949年8月，美国情报部门报告说，著名女飞行员汉娜·赖奇和其他一些飞行爱好者在瓦瑟山举行了滑翔飞行先驱利林塔尔的诞辰纪念活动，而占领军政府对这种类型的集会明令禁止的。1951年，有关限制被取消了，汉娜·赖奇又开始重操旧业。同时，她撰写了《飞行——我的生命》一书，充满自豪地披露了自己如何大力推动“自我牺牲行动”的内幕。1952年，她作为德国滑翔飞行国家队的成员，在西班牙夺得了铜牌。1955年，汉娜成了德国滑翔飞行女子冠军。1957年，她创造了一项飞行高度的



新纪录。1958年，波兰人拒绝让她参加在波兰举行的一项国际赛事，并且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德国国家队最终没有带她参赛，于是出现了争执，德国航空俱乐部也因此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汉娜·赖奇的支持者指责俱乐部主席哈拉尔德·克万特忘恩负义，汉娜曾冒生命危险给他带去了母亲的遗书，而他却在女飞行员遭遇困境时不管不顾。关于汉娜以及她曾经到过“元首”地下避弹所的议论长年不衰，而且发展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女飞行员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但又束手无策。她无数次对有关指责提出控诉，连有人开玩笑说她当年把由希特勒的牧羊犬和博尔曼的看家狗杂交而生的一条杂种狗也带出了地下避弹所，汉娜都公开发表了一封反驳信。人们讥讽和嘲笑她那显而易见的天真幼稚，同时又对汉娜出的书中某些段落感到气愤，因为她在其中一再为自己对第三帝国的愚忠辩护。

尽管在德国人们认为汉娜·赖奇既是个著名的飞行员，又是个纳粹的热心支持者，但在国外她却受到了尊重。以下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和她一道进行过一次滑翔飞行，并聚精会神地听她介绍了1945年4月在希特勒地下避弹所里发生的情况。尼赫鲁及其家人与汉娜的关系相当不错。1961年，汉娜的老朋友韦恩赫尔·冯·布劳恩邀请她到设在阿拉巴马州亨兹维尔的美国火箭研究中心做客。她在那里不仅见识到了一枚“土星”火箭的发射试验，还见到了很多老同事，其中包括约亨·居特纳， he 现在是韦恩赫尔·冯·布劳恩的得力助手、“水星-雷德斯顿项目”的负责人。1962年至1966年，汉娜在加纳担任一所滑翔飞行学校的校长，并赢得加纳总理的信任。后来加纳发生军事政变，汉娜遭到驱逐。此后她就自己在加纳的经历写了一本书——《我为夸梅·恩克鲁玛而飞》。1972年，汉娜在美国被评为“本年度最杰出的飞行员”，并成了美国“实验测试飞行员协会”的名誉会员。1975年，她在洛杉矶对一千两百名宇航员和试飞员发表了演讲，博得了长达好几分钟的掌声。

与此相比，在故乡德国，人们仍然指责汉娜美化纳粹政权。如此强烈的反差，促使她早在1974年就放弃了德国国籍而加入了奥地利籍。时至1979年，六十七岁的汉娜还打破了她本人保持的重返起发点的定点滑翔世界纪录。

1979年8月24日，这位世界上首飞直升机、喷气式飞机和火箭推进式飞机的女飞行员，因患心肌梗塞病故。



拜罗伊特女王——温妮弗雷德·瓦格纳







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改变了世界历史，因为它既对特奥多·赫茨尔<sup>①</sup>，也对希特勒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维也纳做记者的赫茨尔正是在《汤豪泽》<sup>②</sup>迷人的乐曲声中萌发了幻想：以“应许之地”迦南<sup>③</sup>作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家园。而对希特勒来说，瓦格纳的《黎恩济》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那是一切的开端，”希特勒曾向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坦白说，“听了这天才的音乐，我，一个坐在林茨剧院里的年轻人突发灵感，让德意志民族统一起来，我也必须办到这一点。”

希特勒对瓦格纳音乐这么着迷，对第三帝国影响不小。理查德·瓦格纳作为“杰出的德国大师”被纳粹征用，为纳粹意识形态充分发挥了作用。纳粹在党代会开幕时，在举行国葬时，以及在一年一度以“元首”名义主办的拜罗伊特音乐节典礼上，都要演奏瓦格纳音乐。相反，年轻的以色列国却并不像其国父那样热衷于瓦格纳音乐。鉴于瓦格纳音乐与纳粹政权之间有着令人痛苦的关联，理查德·瓦格纳的全部作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为以色列人所唾弃。

希特勒首次来到瓦格纳圣地拜罗伊特，是1923年9月30日。他到拜罗伊特来是为了在“德意志日”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讲。纳粹党的同情者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决定抓住这一机会，认识一下这个受人崇拜的政治家：“有人问我们是否愿意在集会结束后会会他（希特勒）。我丈夫没有去，我去了（安克尔饭店）。经贝希施泰因夫妇引见，我认识了他……我得承认，此人立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身上最有特点的是那对极富魅力的大大的蓝眼睛，一对富于表情的眼睛。我邀请他到瓦恩弗里德公馆坐坐，因为他当然对此极感兴趣，对瓦格纳的故居（瓦恩弗里德公馆），对瓦格纳的墓地，他愿意来这些地方看看……”（温妮弗雷德·瓦格纳1947年提交非纳粹化法庭的书面材料）

希特勒来到瓦恩弗里德公馆后，温妮弗雷德把他介绍给了瓦格纳家族的所有成员。希特勒和温妮弗雷德就在这天晚上结下终生友谊，两人后来便以“沃尔夫”<sup>④</sup>和“温妮”相称。希特勒经常夸赞说：“瓦格纳夫人将拜

① 犹太复国运动的创始人。

② 瓦格纳歌剧名。

③ 《圣经》中上帝许给以色列人的土地，指巴勒斯坦。

④ 德语意为“狼”。

罗伊特和国家社会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她伟大的历史贡献。”

1897年6月23日，温妮弗雷德生于英吉利海峡的海滨城市黑斯廷斯，父亲约翰·威廉斯是记者，母亲埃米莉·弗洛伦斯是戏剧演员。温妮弗雷德幼年生活相当不幸，一度进过“狄更斯之家”孤儿院。她后来在接受报界采访时曾说：“可惜我两岁时就失去了双亲，父亲在我一岁时就死了，母亲是我两岁时去世的，我成了真正的孤儿，没有兄弟姐妹，亲戚也没几个，他们虽然都照顾过我，但时间都不长。我小小年纪便这家过过，那家过过，直到……突然有一天，我被送往德国，那里有我爷爷的一个远房亲戚……”（温妮弗雷德1975年4月接受电影导演聚贝尔贝格采访时言论，《时代》1975年第18期）

温妮弗雷德在柏林的这个远房亲戚名叫卡尔·克林德沃特。他是个钢琴家兼音乐指挥，是李斯特的学生和瓦格纳的崇拜者，有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温妮弗雷德到他家时，克林德沃特已七十八岁，夫人年龄与他也差不多。两位老人亲切地收养了这个孤儿。克林德沃特后来写信告诉一位朋友：“我们年龄都这么大了还揽了一桩操心事——教育和照料一个可爱的十岁小姑娘。她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克林德沃特家热心音乐事业，他们“按照瓦格纳和拜罗伊特的精神”教育温妮弗雷德。每年，克林德沃特先生都会接到瓦格纳遗孀科西玛的邀请，去观看仅在很小范围内举行的拜罗伊特音乐节彩排。克林德沃特将此视为一种崇高的荣誉，一直都不带养女一起去。直到温妮弗雷德长到十七岁，养父觉得她思想已足够成熟的时候，她才首次有幸跟着养父去拜罗伊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举行的最后一次瓦格纳音乐节。1914年7月22日，由瓦格纳惟一的儿子齐格弗里德导演并指挥的大师名剧《漂泊的荷兰人》上演，当时观众已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听到巴伐利亚国王发布进入战争状态的通告后便匆忙离去了。

温妮弗雷德没怎么注意到周围弥漫的阴郁气氛，因为她爱上了齐格弗里德。姑娘和意中人的母亲一起在拜罗伊特御花园里散步，跟她聊自己的情况。用铁腕手段管理丈夫遗产的科西玛，利用这一机会，暗中考查姑娘的政治观念与自己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立场是否合拍。随后她便鼓舞姑娘向儿子求爱，她希望已经四十五岁的儿子终于能同意成个家。除政治方面的要求外，已在长期等待中操碎了心的科西玛对儿媳的要求极



低。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已经告诉他了，他找什么样的人我都欢迎，我不在乎她的出身，是哪国人，还有性格怎么样，只要善良就行。”

温妮弗雷德随养父回到柏林后，按她自己的说法，她的“理智与情感”都留在了拜罗伊特。她继续上学，此外，尽管已被领养，她仍被视为“敌侨”，因而还要定期去警察局报到。一个人待在屋里时，温妮弗雷德便会充满渴望地盯着齐格弗里德·瓦格纳一张年轻时的照片看。这张照片是1892年拍的，与现在那个矮墩墩的中年人只有几分相像，比真人看上去要帅得多。温妮弗雷德后来承认：“的确，第一次到拜罗伊特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我后来的丈夫。当时我爱得神魂颠倒，而且奇怪的是，是他说话的声音把我彻底征服了。”（温妮弗雷德采访记，《时代》1975年第18期）

1869年出生的齐格弗里德·瓦格纳是个很受欢迎的乐队指挥和多才多艺的作曲家，在欧洲各大城市都举行过巡回音乐会。二十五岁时，他就在伦敦的女王厅指挥过音乐会，并取得巨大成就。1899年，他创作的歌剧《懒汉》首演。1898年至1914年间，他不知疲倦地共创作了十一部歌剧；1915年至1930年，他又创作了七部歌剧（其中三部最终完成）。然而，他所渴望的成功并没有出现。因为有个伟大的父亲，齐格弗里德的才华总是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人们认为他创作的“童话歌剧”已经过时，而齐格弗里德则认为，自己遭到恶评是“犹太媒体”在暗中使坏，因为他们对他怀有敌意。这位“大师之子”临终前曾绝望地总结说：“二十五岁之后，我开始明白，自己在新德国注定是属于那种默默无闻之辈。”（彼得·帕赫尔，《齐格弗里德·瓦格纳——阴影中的天才》）在家庭中，齐格弗里德长期对母亲惟命是从，甚至在儿子外出巡回演出时，科西玛都要让人监督儿子：“……请您注意保证他在饭后能休息一会儿。”1901年，拜罗伊特举行了齐格弗里德独立策划的第一个音乐会。1908年母亲病倒后，齐格弗里德全面接管了拜罗伊特音乐节的领导工作。这份差事虽然给他带来了荣誉，但也严重妨碍了他本人在艺术方面的发展。

齐格弗里德平常在母亲面前很听话，但母亲一再劝他结婚，他至今没有照办。科西玛担心瓦格纳家族在拜罗伊特会失去影响。这个拜罗伊特音乐节女总监对让其他女人，也就是她两次婚姻所生的几个女儿接任总监的方案根本不予考虑，她还在遗嘱中写明了这一点。齐格弗里德与拜罗伊特





牧师的女儿有个私生子，但这也不能解决继承人问题。其实，非婚生育在瓦恩弗里德公馆这一家人是有传统的：科西玛本人就是私生女（李斯特与玛丽亚·达古尔伯爵夫人偷情的产物），而科西玛生的孩子——绮瑟、爱娃和齐格弗里德，也是她与瓦格纳婚外恋的“爱情结晶”。齐格弗里德（小名菲迪）则不顾母亲的警告，不断与一些女伴，更多的情况下是些男伴，勾勾搭搭。有人看见他与年轻小伙子关系暧昧，便勒索他，菲迪为此掏腰包是常事，而且一给就是一大笔。

1913年，连齐格弗里德的姐姐爱娃都极力催他尽快成家：“……你快为我们可爱的瓦恩弗里德带来点儿青春气息吧！”此后，齐格弗里德便向十七岁的温妮弗雷德求婚了。姑娘高兴万分地回信道：“最尊敬、最亲爱的大师，我该怎么领会您字里行间那些让我备感幸福的意思呢？如果我能按自己希望的那样理解，那我便是上帝壮丽的天穹下最幸福的灵魂了！大师，您看，我天真得简直还是个孩子，不过您还是让我这样吧，保持一点儿可爱。您的愿望早就实现了，是吗？我祝愿您一切梦想成真！晚安！”

两天之后，也就是1915年7月7日，婚事敲定了。温妮弗雷德在信中写道：“齐格弗里德，亲爱的，我无法描述我是多么幸福！……我全心全意地把自己托付给你了，指引我的生活道路，如你所愿塑造我吧！……千遍万遍地祝福你……”

科西玛·瓦格纳对温妮弗雷德极尽溢美之辞，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未来的儿媳虽然从小孤苦伶仃，却知书达礼。她还一再夸这个十八岁的“孩子”如何“美丽优雅”。事实上，不足为外人道的是，温妮弗雷德满足了她心目中理想儿媳的所有标准：她很穷，不会提出什么特殊要求；她没有什么有权有势的亲戚来插手拜伊罗特的事务；她很年轻，应该很听话。此外，齐格弗里德选中的人与“大师夫人”，也就是科西玛还真有点相像，简直就像她的女儿一样。1915年9月22日，齐格弗里德·瓦格纳与温妮弗雷德正式完婚。他暂时与同性恋朋友断绝了来往，决心为瓦恩弗里德和瓦格纳家族事业尽心尽力。齐格弗里德的生活常在其作品中得到反映。他给自己的第十二号作品取了个意味深长的题目——《爱情的牺牲品》，反映了他结婚时的复杂心情。

温妮弗雷德就这样嫁到德国最著名的、世界各地谦卑的崇拜者都趋之若鹜的艺术家王朝里来了。几十年来，瓦格纳的家人一直以近乎垄断的方



式守护着“大师”遗产，这也招致了严厉的批评：“拜罗伊特已经成了富人的瓦格纳剧院了……从来没有上演过德国其他大师的作品……从来没有为栽培音乐人才捐过款……从来没有举办过免费演出……那些遗产继承人对瓦格纳的作品可以说没有做出过任何贡献，但是他们从中得到的收入却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艺术家一辈子都挣不到的……你们尽可以愉快地经营你们可观的家族产业……但你们最终休想使它成为德意志民族的艺术中心和崇高的圣地，让大师在其巅峰显现他的意志……”（马克西米利安·哈登 1914 年 6 月 27 日在柏林《未来》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瓦格纳家族利用大师遗产确实获得了巨额赢利。1883 年至 1914 年间，他们仅版税一项就进账六百万马克；1914 年，瓦格纳家族的现金资产总计有七百万马克。

温妮弗雷德结婚头一年日子过得还是相当愉快的。小媳妇顺利地融入了瓦恩弗里德的等级制度，尽心尽力地为科西玛撰写书信，还经常为她朗读法国文学作品，因为“婆婆认为，我总得有点儿事儿做”。（温妮弗雷德采访记，《时代》1975 年第 18 期）在政治方面，温妮弗雷德受到了大姑子爱娃的丈夫、瞎眼的历史哲学家和作家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的影响。他写的那本《19 世纪的基础》后来在纳粹党内被奉为《圣经》。齐格弗里德年轻的太太非常热情好学，很快她便也加入了极端保守、崇尚泛德意志主义、政治上极右的拜罗伊特集团，科西玛和张伯伦也属于这个集团。

1917 年 1 月 5 日，瓦格纳家族企盼已久的继承人阿道夫·维兰德·戈特弗里德降生了。“小维尼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幸福的老爸欢呼道。他专门在家里为母子举行了音乐表演。温妮弗雷德后来又生了三个孩子，一年一个：弗里德林德（1918 年）、沃尔夫冈（1919 年）和弗尔伦娜（1920 年）。每生一个孩子，做母亲的地位就上升一步。

战争带来的供应短缺并未给德国最知名的音乐王朝造成太严重的影响。他们在屋前的花园里种了土豆和蔬菜；由于煤供应不足，一家九口人只好挤住在齐格弗里德单身时住的那幢小房子里；节日剧院也一直关着门；节日演出基金、战争债券和现金资产都在渐渐贬值。不过，瓦格纳一家在生活上并没有真正遭过什么罪。

1917 年 12 月 6 日，温妮弗雷德陪同丈夫参加了他的歌剧《一切都是小帽子的错》的首演式。符腾堡王后也出席了，演出后王后还设盛宴款待这对夫妇。尽管如此，齐格弗雷德当时还是相当颓废，不时想到要移居国

外。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在艺术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把自己不得志以及德国在军事上的失利统统归咎于犹太人。齐格弗雷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确一事无成。为此我痛恨犹太人！”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德国傻瓜倒在地上，犹太人和神甫们却在瓜分战利品！”与此同时，温妮弗雷德却越来越自信，逐步从丈夫的影子里走了出来。尽管身材已不再像以往那么苗条了，大家依然觉得她美丽动人。拥有无数崇拜者，着实让她得意非凡。

战争结束后，齐格弗里德强迫自己从事起繁忙而他自己又并不喜欢的指挥工作，但他抑郁的心情并没有因此好转。他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挣钱，我每年有十个月在各个糟透了的城市之间来回奔波，忙着指挥音乐会……”温妮弗雷德则一直待在瓦恩弗里德，一面教育孩子，一面沉醉于对政治问题的思考：“1918年，德国经历了倒霉的战争结局。对外，德国被彻底打垮了；国内，革命又是一浪接着一浪……每一个自认为是德国人的人心都在流血，他们感到无比耻辱……大家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盼望着一个新的帝国能在混乱中诞生……”（舍尔茨-帕雷，《温妮弗雷德传》）温妮弗雷德寄希望于德国工人党，它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sup>①</sup>的前身。温妮弗雷德是从音乐评论家约瑟夫·施托尔琴-塞尔尼那里知道有这么个党的，她还知道负责为该党搞宣传的人名叫阿道夫·希特勒，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1922年11月，温妮弗雷德及其丈夫已与在拜伊罗特新建不久的纳粹地方党组织有了密切交往。1923年1月28日，纳粹党在慕尼黑召开首次党代会之后，瓦格纳一家人便成了这个新党的积极支持者。1923年9月30日“德意志日”这一天，成千上万的纳粹拥护者涌到了拜罗伊特这座瓦格纳城。10月1日上午，希特勒本人来到瓦恩弗里德公馆。他参观了建在“绿丘”上的节日剧院，颇为激动地巡视了各个房间，一边还认真倾听导游的解说。导游告诉他：节日剧院计划重新开放，只是资金尚有短缺！希特勒在瓦格纳的墓前伫立良久，随后会见了瓦格纳的家人。他装腔作势地宣布，一旦掌权，他便会实现瓦格纳生前的愿望，下令大师的最后一部作品——宗教节日剧《帕西法尔》，今后只能在拜罗伊特上演（这一诺言并

<sup>①</sup> 即纳粹党。



未兑现)。大师的后人闻听此言非常高兴。希特勒给满头白发的张伯伦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与希特勒会面后说，自己失眠多年，如今首次能安心睡个好觉了，因为终于有了个可靠的人来掌握德国命运了。

希特勒本人曾经说：“第一次踏进瓦恩弗里德时，我是多么激动啊！”还有一次，他又说：“瓦恩弗里德公馆放射着光芒，它像磁石一样在拜罗伊特发挥着影响。”（《希特勒秘密谈话录》）后来，瓦格纳家族的所有女性成员都被他的魅力所迷，希特勒在那里就更加舒心了。当时的一份警方观察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拜罗伊特，尤其是瓦恩弗里德公馆的那些女性成员，非常崇拜希特勒……”

希特勒当然意识到拜罗伊特有巨大的宣传潜力。他觉得应对它善加利用，于是又开始运用他那种屡试不爽的方法接近瓦恩弗里德。就像他以往与贝希施泰因、布鲁克曼、汉夫施滕格尔、霍夫曼和布赫等望族打交道一样，希特勒在瓦格纳家族面前，又把自己刻意装扮成了一个寂寞而又有远大抱负的天才，身无分文且无家可归，渴望人间的温暖和有教养家族的庇护，以求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得到一些松弛。他故意让对方有机会宠着自己，做客的时候有意向主人请教一些着装和礼仪方面的问题。他对瓦恩弗里德的女主人大大加恭维：“连女人们都被科西玛迷住了。每个到瓦恩弗里德的人都被她的魅力所陶醉，即使她守寡之后还是这样……”（《希特勒秘密谈话录》）对温妮弗雷德他也大献殷勤。不久之后，瓦格纳夫妇赴慕尼黑参加一场音乐会，从而目睹了希特勒发动的那次未遂政变。政变之前，齐格弗里德曾满怀信心地写信对一个朋友说：“他（希特勒）一定能够成功！”然而，纳粹于1923年11月9日发动的这场慕尼黑政变却以失败告终，希特勒最终被捕。

许多纳粹的拥护者都认为，在慕尼黑奥第昂广场发生的那场枪战“已将纳粹运动打翻在地”，纳粹事业已告失败，因而他们彻底绝望了。当时二十六岁的温妮弗雷德并不这么想。回到拜罗伊特后，她在当地一家名叫利布的餐馆里站到桌子上，激动地向一帮志同道合者介绍了慕尼黑发生的情况。1923年11月12日，她又站出来说：“整个拜罗伊特都知道，我们和希特勒是朋友……多年来，我们一直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并赞赏阿道夫·希特勒所从事的建设性的工作。这个德意志男人，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为了实现一个净化、统一和民族主义的大德国的理想，甘愿牺牲

自己的生命……他的人格给我们，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而又感人的印象。我们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这么一个普普通通、身材瘦弱的男人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要坦率地说，我们也要站到此人的麾下，我们不光会在他走运的时候和他站在一起，在如今这个危难时刻，我们也要对他保持忠诚。”（1923年11月14日温妮弗雷德发表的公开信）

1923年12月1日，温妮弗雷德又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字，强烈呼吁释放希特勒。1923年圣诞节期间，齐格弗里德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表态支持太太的立场：“……巴伐利亚的现状真是令人愤慨……做假证者和变节者被当做圣徒，犹太人和耶稣会的人抱成一团，企图把德意志民族彻底消灭！然而魔鬼撒旦这次也许打错了算盘。假如德意志的事业真的遭到了失败，我相信复仇和仇恨之神耶和華会为我们做主的。我太太像一头母狮一样在为希特勒抗争！好极了……”

希特勒一直没有忘记这一切。“不光其他人，连齐格弗里德·瓦格纳在我最倒霉的时候都站到了我的一边。张伯伦在我被囚禁时还给我写了信！我和他们从此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彼此以‘你’相称。”（《希特勒秘密谈话录》）温妮弗雷德的思想导师曾给被关在兰茨贝格监狱里的希特勒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敬意，信中写道：“……德国在其灾难最深重的时刻创造出了一个希特勒，这证明了德国的活力。”不久之后，张伯伦又重申了瓦格纳家族普遍持有的一个观点：“……此人的出现在是上帝的恩赐……我们太需要他了。为了德意志祖国的利益，愿上帝保佑他！”

当时希特勒已被慕尼黑第一人民法庭判了五年堡垒监禁，纳粹党也于1923年11月23日被解散，希特勒这个煽动家重返政治舞台似乎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瓦格纳家族仍对希特勒忠心耿耿，这愈发值得注意了。

1924年1月初，瓦格纳夫人启程前往美国。此行的目的是为重新举办拜罗伊特音乐节募捐，为此总共需要筹款六百万至一千万。打着“拜罗伊特和瓦恩弗里德急需帮助！”的旗号，温妮弗雷德和齐格弗里德走遍了美国，四处寻找慷慨的赞助者。温妮弗雷德发表演讲介绍拜罗伊特，齐格弗里德则指挥了一系列上座率很高的音乐会，希望让美国亲眼看看，什么样的崇高艺术值得赞助。然而围绕这次募捐活动而展开的喧嚣的媒体大战，却使此行以失败告终。拜罗伊特游说集团颇动感情地夸大渲染瓦格纳家族的贫困，激起了自由派媒体的强烈不满。《柏林日报》刊登了齐格弗里德



的反犹主义言论，其他报纸却揭露了瓦格纳一家在政治上支持纳粹党的情况。许多艺术爱好者见瓦格纳家族是希特勒的朋友，便再也不谈捐款之事了。瓦格纳夫妇一番奔波之后的纯收入仅为八千美元，大大低于原先期望的二十万美元。1924年3月，他们踏上回国之旅，途经罗马时，结识了墨索里尼，并把他与希特勒做了一番比较：“总是意志、力量，简直有点儿野蛮。长着一对狂热的眼睛，但缺乏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身上的那种亲和力。讲拉丁语的人和日耳曼人真有天壤之别！”（茨登科·冯·克拉夫特写的齐格弗里德·瓦格纳传记《大师之子》）

回到拜罗伊特后，瓦格纳夫妇开始为重办音乐节组织排练。齐格弗里德采用了1911年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整套策划方案，不过他强调舞台设备必须达到最新的技术水准。温妮弗雷德全力协助丈夫的工作，但音乐节领导成员的名单上却找不到她的名字。她后来解释说：“我结婚十五年从来不愿意出风头。对外我首先是个家庭妇女，是个做妻子和母亲的；在内部我却是个秘书……他（齐格弗里德）让我承担全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所有的旅行我都参加，每次声部测试我都在场……还有在节日剧院举行的全部排练……”（1946年温妮弗雷德提交非纳粹化法庭的呈文）

中断了十年之后，拜罗伊特音乐节终于于1924年7月22日重新开幕，音乐节上上演了战前编排的《名歌手》、《尼伯龙根指环》四部曲和《帕西法尔》。齐格弗里德将本届音乐节命名为“拯救德意志精神音乐节”，并亲手升起了黑白红三色帝国国旗。属于德国右翼民族主义阵营的鲁登道夫将军也在嘉宾之列。音乐节所表现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主导思想在同时展开的媒体宣传攻势中也得到了体现。此番针对所谓“犹太共和国”的宣传攻势，使拜罗伊特在文化政策方面进入了一个进攻阶段，与后来的第三帝国时期衔接得天衣无缝。自由派媒体对齐格弗里德利用他的音乐节为已被官方取缔的纳粹党服务表示愤慨。而齐格弗里德则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干预。后来右翼极端分子的示威集会干扰了音乐节演出，《名歌手》演完后大家又紧接着唱起了《德国之歌》，齐格弗里德这才让人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上书：“此处只谈艺术”。

在兰兹贝格蹲监狱的希特勒“非常痛苦”地获悉，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对他来说只能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1924年5月5日希特勒写给齐格弗里德的信）温妮弗雷德虽然没有像许多女性同情者那样去兰兹贝格



“朝拜”希特勒，但她却向那些被捕纳粹党员的家属提供了帮助，送给他们衣物和食品。她送给希特勒的是他所需要的写字纸，希特勒后来就是在这些纸上写下了《我的奋斗》。

拜罗伊特当时已成了非法政党纳粹党的堡垒。希特勒于1924年12月20日被提前释放，让瓦格纳一家人特别高兴。温妮弗雷德立即赶赴慕尼黑去拜会希特勒。此时的希特勒已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温和的民主主义者，一再保证以后一定会规规矩矩，不再干违法之事。他通过这种方式笼络中产阶级阵营，很快便获准重建纳粹党。在党内朋友面前，他宣布：“要同使德国陷入苦难的邪恶势力做斗争，同马克思主义以及这场世界性灾难和瘟疫的精神代表——犹太人做斗争！”

应钢琴制造商贝希施泰因家族的邀请，希特勒出席了1925年的拜罗伊特音乐节，尽管这次音乐节并不特别成功。当时官方禁止希特勒公开发表演讲，于是他便利用参加音乐节的机会向党内同志宣布：“国家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一切都蕴含在瓦格纳的作品之中。”（汉斯·康拉德，《元首与拜罗伊特》）

后来，希特勒在二战期间还曾颇动感情地忆起了1925年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情景：“我晚上11点抵达拜罗伊特……第二天一早，瓦格纳太太便来看我了，还送我一束鲜花！……当时三十六岁的我还不知愁滋味，对未来充满了幸福的憧憬！”（《希特勒秘密谈话录》）

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此后有多年他都没有去。对此，温妮弗雷德战后曾做出过解释：希特勒每次公开露面都要伴随着追随者的大型集会，有时还会出现暴力场面。因此她恳请希特勒不要再来参加音乐节了。（1946年温妮弗雷德提交非纳粹化法庭的呈文）希特勒本人对此有不同的说法：“那次（1925年）我听了《指环》和《名歌手》。由犹太人朔尔扮演奥丁神让我非常生气，我觉得这是种族的耻辱！……此后多年我没有再去了，对此我也感到很遗憾。瓦格纳太太很伤心，她先后给我写了十二封信，打了二十五次电话！”（《希特勒秘密谈话录》）

从1925年到纳粹夺权的1933年，希特勒确实一次都没有参加过拜罗伊特音乐节，不过，他倒是时不时地到瓦恩弗里德公馆看望瓦格纳一家人。这个政客和瓦恩弗里德年轻的女主人关系相当不错，相互以“你”相称。他在瓦格纳一家的家庭生活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希特勒让温



妮弗雷德的孩子叫他“沃尔夫伯伯”，领他们去睡觉，还给他们念故事听。当时温妮弗雷德每天都要按自己订的计划完成大量工作，对音乐节的策划和组织工作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作为拜罗伊特的第一夫人，她考了驾照，当上了丈夫的“漂亮女司机”，经常开车送他去与艺术家们会晤或指挥音乐会。她还帮拜罗伊特德意志青年联盟做事，并参与了1926年在德累斯顿举行的齐格弗里德-瓦格纳音乐周的筹备工作。

温妮弗雷德非常忠于家庭，尽管她对自己的婚姻已不抱任何幻想。她早就听说齐格弗里德有个私生子，对丈夫仍与男宠来往，她也没说什么。白发苍苍的婆婆需要她悉心照料，而丈夫的两个姐姐爱娃和绮瑟又总是一有机会就批评温妮弗雷德的四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说做母亲的对他们太疏于管教了。在这种情况下，“沃尔夫”总是表现得非常善解人意，发生矛盾时，他总要出面劝两句，对“温妮”表示支持。他说的话在瓦恩弗里德公馆还是有分量的。希特勒曾说：“有一次吵架我在场……简直是疯了！照两个做姐姐的意思，什么事都该年轻的太太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做……做太太的给丈夫生了四个孩子，别人压根儿就没有觉得她有什么功劳。她对丈夫一直忠心耿耿，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从孩子们身上就能看出来。如果说哪家的孩子可以称得上体面的话，那肯定就是指这一家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

齐格弗里德和温妮弗雷德在经营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上都很投入，但是在政治上，他们看法并不一致。齐格弗里德尽管对希特勒和纳粹党抱有好感，但他并不愿意积极为纳粹事业服务。他一直没有加入纳粹党，也没有加入纳粹德国文化协会。丈夫对纳粹事业不热心，让温妮弗雷德很伤心。她本人是个受人尊敬的老党员，党籍号是29349。她还在创建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的号召书上签了字，这一联盟由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领导。希特勒把温妮弗雷德视为忠实可靠的盟友，谈到她丈夫时，他却说：“齐格弗里德，私下里他和我是朋友，政治上他太消极！”（《希特勒秘密谈话录》）

由于温妮弗雷德不知疲倦地张罗，瓦恩弗里德早在1926年就成了一个纳粹据点，除希特勒外，许多纳粹高官在这里都受到了热情接待。戈培尔1926年5月就曾造访过瓦恩弗里德，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瓦格纳太太亲自领着我进餐厅就餐……她对每个人都是这样，而且狂热地站在我们





一边。孩子们很可爱……她跟我诉苦。齐格弗里德是那么疲软，唉！在大师面前他真该感到害臊……他太太给我印象不错。我想跟她交个朋友……少妇哭了，因为做儿子的不及大师……”后来戈培尔又对他的看法做了补充：“齐格弗里德像只胆小的狗，匍匐于犹太人面前！”

戈培尔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齐格弗里德坚决拒绝辞退在拜罗伊特工作的犹太艺术家。为此，作为艺术节总监的齐格弗里德还给全德联合会主席奥古斯特·皮林格写了封信。皮林格是瓦格纳的崇拜者，深受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齐格弗里德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您让我们对所有这些人关上大门，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把他们拒之门外，这样做人道吗？符合教义吗？符合德意志人的道德观念吗？……我父亲在他写的文章中攻击、侮辱过犹太人，而他们仍然愿意帮助我们，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齐格弗里德这番慷慨陈词与他许多反犹言论明显矛盾。他态度之所以自相矛盾，也许仅仅是因为他要顾及拜罗伊特众多的犹太公众。

在温妮弗雷德看来，丈夫有相公癖是对她个人的侮辱，而她与希特勒之间亲密的但又是柏拉图式的友谊，则是对此的补偿。她狂热地崇拜希特勒，还时不时地邀请他在瓦恩弗里德公馆住一段时间。齐格弗里德见到家里有这么个搞政治的房客很不自在。看起来他甚至把自己的疑虑转化成了音乐。他的第17号作品《瓦拉蒙德》，有一段讲述的便是一头温顺的狼有一天突然现出了真实本性，叼走了一只小羊羔。

1926年，温妮弗雷德不断开着自家的“普雷斯托”轿车带着丈夫在德国四处奔波，寻找新的财源。齐格弗里德此时的日记牢骚满篇，不时地抱怨车出事故了，被拖走了，或是轮胎爆了。温妮弗雷德不仅自己能排除一些小的故障，而且一路上都在给丈夫打气，希望他不要气馁。1927年，瓦格纳夫妇终于凑足了钱，可以来实现他们长期的愿望——重新编排《特里斯坦和绮瑟》<sup>①</sup>。然而，重新加工《汤豪泽》却仍然是个梦想。温妮弗雷德的朋友“沃尔夫”领导的党，当时还微不足道，因此帮不上她的忙，但他安慰“温妮”说：“……我现在又开始相信命运会把我带到我四年前就想去的地方。你为有我这个朋友感到自豪，我非常感激。我现在虽然帮不了你，但是会有这么一天，我将报答一切……”（1927年12月30日希特勒

<sup>①</sup> 理查德·瓦格纳歌剧名。



写给温妮弗雷德的信)

温妮弗雷德仍然相信“元首”。有一次，她和齐格弗里德到上奥地利旅行，她不仅到林茨附近的圣弗洛里安拜访了奥地利作曲家安东·布鲁克纳的墓地，还专门绕道去布劳瑙参观“元首”的诞生地。那幢房屋1928年就成为了纳粹的神庙。1930年，齐格弗里德正在米兰指挥演出《尼伯龙根指环》时，他九十二岁的母亲、“拜罗伊特的女首领”科西玛去世了。温妮弗雷德和齐格弗里德参加了葬礼，葬礼之隆重，就像死的是一位在位的君主一般。随后，他们俩开车前往梅拉诺休养。途经慕尼黑时，尽管筋疲力尽，温妮弗雷德还是坚持要去拜访她的朋友“沃尔夫”，他当时已搬入了位于慕尼黑摄政王广场旁的新居，房租是别人赞助的。当时希特勒在瓦格纳家已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齐格弗里德不断找太太的茬儿，以发泄胸中的怨气。“温妮，别塞那么多了。”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这么对胖太太提出了警告，用词非常不雅。

不久之后，齐格弗里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因忙于导演、合唱和乐队的排练，劳累过度，导致心脏病突发，于1930年8月4日去世，死时不到六十一岁。根据他1929年立下的遗嘱，温妮弗雷德成了无可争议的“圣杯守护者”和瓦格纳王朝的首领：“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将成为全部遗产的第一继承人……我们两人的后代作为代位继承人……”齐格弗里德显然认为他死后太太有可能改嫁希特勒，因此他又在遗嘱中补充道：“……在瓦格纳夫人死亡或改嫁的情况下，代位继承人将继承遗产。”

这样一来，继科西玛之后，英国人温妮弗雷德便成了继承大师“王位”的第二位女强人。这位三十二岁的女总监，任由丈夫的作品逐渐被人忘却，她把他的房间布置成了理查德·瓦格纳纪念馆，并将她的全部精力用在了拜罗伊特音乐节上。她的指导思想简明扼要：“我惟一重视的是，按照我的想法上演它们（歌剧）！”

温妮弗雷德的独裁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她下的一着妙棋，便是聘请普鲁士国家剧院（分别设在柏林、卡塞尔和威斯巴登）总监海因茨·蒂特延担任艺术指导。蒂特延深得戈林的宠信，他的关系和财力对一年一度的拜罗伊特音乐节只会好处。担任音乐节指挥的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生性敏感，1930年他曾获得巨大成功，但次年他以“艺术理想破灭”为由离开了拜罗伊特。接替他的是威廉·富特温格勒，不久之后他也辞职不干



了，原因是音乐节女总管的独断专行让他干不下去。后来经温妮弗雷德一再请求，富特温格勒才回心转意，答应回拜罗伊特担任指挥。舞台布景设计师埃米尔·比勒陀利乌斯的确是第一流的专家，而且也没有闹什么别扭。温妮弗雷德还力排众议，设立了一个宣传处，并且剥夺了两个大姑子的权力，两人抱怨说：“我们在财政问题上一点儿参与的份儿都没有。”此外，温妮弗雷德还解雇了亡夫的私生子，他此前是音乐节的雇员。

拜罗伊特发生的巨变使音乐节的声誉下降，致使1933年音乐节的门票销售情况相当不理想。温妮弗雷德的女秘书兼四个孩子的家教莉泽洛特·施密特抱怨道：“……拜罗伊特遭到了暗算，一定是犹太人搞的鬼，他们什么谎话都敢说，什么下流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们遭到了极度的冷遇……”在这种情况下，“温妮”便向“沃尔夫”求援。很快莉泽洛特便高兴地报告说：“……他叫瓦格纳太太去柏林，她坐飞机去了，不到一刻钟，我们便得到帮助了。太好了！”在“元首”的示意下，冲锋队所有的头头脑脑、纳粹妇女联盟、纳粹教师联盟以及其他一些组织，纷纷成本儿成本儿地购买音乐节的入场券，并将它们奖给有功之臣。1934年音乐节期间，仅纳粹宣传部购票总额就达三十六万四千帝国马克，占音乐节全部预算的三分之一。此外，希特勒每年还从私人小金库中拿出五万帝国马克赞助这项在纳粹统治期间完全免税的活动。

五十年后，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对这一时期的局势发表了一通议论：“说真的，3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人知道整个局势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我认为，尤其是如果仗没有打起来，局势能逐渐趋于平静的话，人们一定会普遍认同国家社会主义的……”（温妮弗雷德采访记，《时代》1976年第18期）

“沃尔夫”此后一直是温妮弗雷德可靠的朋友，而且很快就被视作瓦格纳家几个孩子的干爹。温妮弗雷德督促孩子们定期给“伯伯”写信。大女儿弗里德林德埋怨母亲不该经常当众读她的信，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维兰德则获准为希特勒伯伯拍照，他把有“元首”亲笔签名的相片拿出来卖，这样零花钱便可以多一点。沃尔夫冈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希特勒伯伯总是彬彬有礼地弯腰亲他母亲的手，从不乱发脾气，“从不失态”。他姐姐弗里德林德对希特勒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她在战后回忆起希特勒时说，他总是“穿着他那一身乡下教师才会穿的蓝西装……指甲长得老长也



不剪，说话的时候还总爱咬指甲，不咬的时候则拿眼睛挑剔地看着别人”。

当时在拜罗伊特已有传言，说这个著名的寡妇很快便要 and “元首”结婚了。瓦格纳家的“小冒失鬼”弗里德林德曾信誓旦旦地说：“我妈妈愿意，<sup>①</sup>但沃尔夫伯伯不愿意。”温妮弗雷德本人在战后接受审讯时说有关结婚的传言不过是“报界的胡说八道”而已。“沃尔夫”和“温妮”此后的关系仍然是柏拉图式的，“拜罗伊特的女主人”后来与她的首席雇员海因茨·蒂特延过从甚密。此人是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物，他不喜欢希特勒，但却知道怎么与他很好地应酬。蒂特延总是在柏林和拜罗伊特之间来回奔波。有了他，瓦恩弗里德公馆里便又能见到一种家庭生活的气氛。温妮弗雷德希望她这位生活伴侣能和孩子们和谐相处，于是她便在他们之间扮起了中间人的角色。

1933年，“元首”和帝国总理以胜利者的姿态参加了拜罗伊特音乐节。此后他年年都来，身后就像彗星的尾巴一样跟着全部党内要人和各国驻柏林外交使团的官员。希特勒每次光临，看上去都像英雄凯旋一般，总有成千上万人聚在道路两旁向他欢呼，温妮弗雷德和大儿子维兰德则站在节日剧院的大门前迎候。剧院内每次都得向全场观众散发小纸条，上面写道：“剧院内不要有政治性的欢呼！”但这仍然不管用，于是便有了更明确的命令：“总理有令！元首请求大家在演出结束后不要唱《德国之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或举行政治集会。没有什么比大师不朽的作品本身更能明确表现德意志精神。党卫军中将布吕克纳、希特勒副官。”

在为期十天的拜罗伊特音乐节期间，希特勒就住在瓦恩弗里德公馆的配楼里，楼内设有厨房，专为他准备素食。他也经常与瓦格纳家的人一道吃饭。

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是“元首”的密友，也是拜罗伊特的常客。他在《我所认识的希特勒》一书中写道：“对希特勒来说，参加音乐节是一种放松和休养，因此他以为，邀请自己的随从到拜罗伊特来待上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他总是自己掏腰包为他们购买门票。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把接到希特勒的邀请不折不扣地当做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许多人并不情愿整天待在热得像烤炉一般的剧院里欣赏瓦格

<sup>①</sup> 指与希特勒结婚。

纳，他们更喜欢开车到山里或到海边去玩。有些希特勒邀来的客人并不是瓦格纳迷，如果某一天没有演出，这对他们来说倒是比听一场《帕西法尔》或《众神的黄昏》更有助于恢复疲劳。谁不得已要和希特勒一道穿着制服或礼服坐在瓦格纳包厢里看歌剧，那么他们在闷热难当之际时而打一个盹儿便怨不着他们了。不过为小心起见，大家还是注意相互照应着，一旦有谁发出了鼾声，便立即有人会把他们捅醒。当然，开幕演出还是很隆重辉煌的，但是几天过后，患上‘瓦格纳困倦症’的人便会在一两场演出中间偷偷溜出去……我们总是在演出快结束的时候又回到剧院里。从来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缺席，只是到晚上大家一起在‘猫头鹰’艺术酒家喝酒聊天的时候，我们有时会遭遇尴尬。有一次，我告诉一位演员，他的歌唱表演无疑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婉言拒绝了我对他的赞扬——他当天根本就没有登台表演！”

瓦格纳的音乐在第三帝国占据着统治地位，因为它特别适合渲染和烘托纳粹“神话”。瓦格纳音乐节则成了对德国伟人创造力和梦想顶礼膜拜的盛典。尽管如此，一些纳粹党内的知名人士仍希望能创作一些当代的、“纳粹的”音乐。1938年夏天，罗伯特·莱（德国劳动阵线领袖、纳粹党组织部长）就曾试图说服希特勒同意用一个当代作曲家谱写的乐曲作为党代会的开始曲。莱说，纳粹世界观也必须通过音乐形式表现出来。他还自作主张地向作曲家下达了谱曲任务。希特勒对他所参加活动的美学效果是很较真的。为此他亲自来到纽伦堡的卢伊特波尔德大厅，花了两个小时让一个交响乐队预先演奏这段新谱写的乐曲给他听。听后他说：“我希望在这一场合（党代会的开幕式）还是演奏《黎恩济》序曲。”（阿尔伯特·施佩尔，《施潘道狱中日记》）

拜罗伊特音乐节是“头儿负责的事”，因此不属于纳粹德国文化协会的管辖范围。保存下来的音乐节文献显示，音乐节重要的艺术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事情都是由“元首”本人拿主意。1937年，被希特勒确定为拜罗伊特继承人的维兰德首次参与了歌剧《帕西法尔》的舞台布景工作，这让他的母亲非常骄傲。希特勒对瓦格纳真是太着迷了，甚至在他当上总理之后，他还经常整夜地趴在那里，为《特里斯丹和绮瑟》和《尼伯龙根指环》的全部场景绘制彩色的舞台布景。他舞台布景知识惊人地丰富，知道旋转舞台的直径是多少和舞台升降设备如何操作，对照明技术也有详细的



了解，和帝国舞台布景师本诺·冯·阿伦特聊起纯专业性的问题来也是滔滔不绝。希特勒曾想把拜罗伊特的舞台布景设计师埃米尔·比勒陀利乌斯撵走，由富于激情、注重效果的阿伦特取而代之。温妮弗雷德反对这么做，但她表面上还是装着不知道“元首”的心思。（阿尔伯特·施佩尔，《施潘道狱中日记》）总的来说，她和希特勒还是意见一致的。两人在舞台设计方面思想都比较保守，主张严格遵照瓦格纳大师的指示办事，连很不起眼的创新他们都认为是危险的，因为它违背了大师的原意。难怪希特勒总爱夸奖温妮弗雷德。他曾在元首大本营里对人说：“我周围有四个女能人：特罗斯特女士（建筑师）、瓦格纳太太（瓦格纳音乐节主管）、朔尔茨-克林克女士（纳粹女政客）和莱妮·里芬施塔尔女士（女导演）。”

如果有什么令人尴尬的指示，希特勒是不会亲自告诉他的“女能人”的。从戈培尔1937年7月27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就第175条款（同性恋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元首在这一点上毫不留情。剧院里的同性恋者我们也得肃清，而且要彻底。”第二天，宣传部长就找温妮弗雷德谈了这个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宫廷歌唱家扬森牵涉第175条款。此事暂时还未受到处理。但是拜罗伊特要倒大霉了。我们在那里得动用‘吸尘器’。我找瓦格纳太太谈了。她对此感到震惊，但是她理解，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1938年3月，温妮弗雷德提出了建立理查德·瓦格纳作品德国研究所的计划。她对自己与政界出色的关系充满自信，于是便直接向希特勒的得力助手马丁·博尔曼求助。1938年5月22日，正好是“大师”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那一天，温妮弗雷德收到了“元首”的批准书。同时希特勒还向这个研究所部署了第一项科研任务：花几年时间证明理查德·瓦格纳确系纯雅利安血统。由于建立了这家研究机构，温妮弗雷德避免了宝贵的瓦格纳档案材料流失。她还曾建议让这家研究所有权审查所有在德国印刷的瓦格纳出版物，但遭到了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拒绝。戈培尔认为这一要求太小气、太极端了。

1939年希特勒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德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拜伊罗特节日剧院的正面也为此挂上了一幅以干树枝做框的希特勒巨幅画像。企业巨头们送给希特勒这个瓦格纳迷的生日礼物是一个装有大师作品原始总谱的大礼盒，其中有四卷本的《黎恩济》手稿、《莱茵黄金》和《女武



神》的总谱，还有《众神的黄昏》的管弦乐乐谱草稿，总价值达一百万帝国马克。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温妮弗雷德曾想说服希特勒同意将这批价值连城的手稿转移到拜罗伊特。但是希特勒却告诉她，他仍然能够妥善保管这些手稿。最终这些瓦格纳作品手稿，很可能是与希特勒的其他个人物品或与他有关的物品一道，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被运到了上萨尔茨贝格。据亨里埃特·冯·席拉赫说，1945年5月，纳粹党办主任的太太格尔达·博尔曼曾带了二十四个箱子逃往奥地利南蒂罗尔，瓦格纳的手稿可能就在这些箱子中。但是这些箱子此后不翼而飞了。

希特勒发动对波兰的进攻从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温妮弗雷德和海因茨·蒂特延都以为音乐节活动将不得不无限期中断，但是希特勒却授命举办所谓的“战争音乐节”。1942年，希特勒认定战争很快就要胜利结束了，于是又下令举办“和平音乐节”。民众中传播着一种说法，说希特勒已向瓦格纳太太预告战争行将结束了。他自信地说：“现在，虽然还在打仗，但我已能实现瓦格纳生前的愿望：让从民众、士兵和工人中挑选出来的人免费参加音乐节！”音乐节的公开售票中止了，分管娱乐活动的纳粹组织“通过快乐获得力量”接管了音乐节的营销工作。1940年至1944年间，“通过快乐获得力量”为音乐节共拿出了一百万帝国马克，瓦格纳家族获得了其中的百分之十七作为纯利润。虽然处在战争期间，但音乐节并没有遇到艺术家短缺的问题。根据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颁布的一项命令，温妮弗雷德可以让她所需要的人员免除兵役，或者在需要的时候让人用飞机把有关人员从偏远的战场接回来。音乐节女老板及其男友蒂特延，也并没有对音乐节这份家族产业失去控制。他们仍然主管着音乐节艺术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温妮弗雷德两个渐渐长大成人的儿子也在逐步努力参与进来。考虑到要当拜罗伊特的接班人，维兰德被免除了兵役。沃尔夫冈参加了入侵波兰的军事行动，但在一次严重受伤后又退役了。退役后他来到柏林歌剧院跟随蒂特延学艺。瓦格纳的孙子参与音乐节工作也造成了一些摩擦。维兰德和沃尔夫冈时常要请“沃尔夫伯伯”出面干预，而蒂特延则一再威胁要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温妮弗雷德漂亮的女儿弗尔伦娜，与主管音乐节组织工作的“通过快乐获得力量”组织领导人博多·拉弗伦茨结婚，证明是有好处的。不过，温妮弗雷德的大女儿弗里德林德却与家



庭断绝了关系。1940年她移居国外的时候拿走了前未婚夫（戈特弗里德·冯·艾内姆）母亲的首饰。她后来写了一本书，名叫《火的遗产》（德文版书名是《夜幕下的拜罗伊特》），她在书中毫不留情地与母亲、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算了总账。

1940年，希特勒视察法国战场，回国途中出人意料地命人停下专列，跑去观看《众神的黄昏》的演出。这是他最后一次到拜罗伊特。随着战事的发展，他再也没有看过话剧或歌剧，也没再参加过瓦格纳音乐节。但是每次戈培尔去“元首大本营”，他都得汇报希特勒最喜欢的歌唱家的近况。希特勒总是迫切希望听到那些来自戏剧界的流言蜚语。听到某个歌剧院被毁，他比听到整个住宅区被炸毁还要难过。当时曾有计划要按古希腊城市帕加马的神庙式样扩建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后来战事发展，希特勒和瓦格纳家族只好指望在战争胜利后再实施这项庞大的工程了。

尽管没有再去拜罗伊特，希特勒仍然没有放弃对音乐节组织工作的监控。温妮弗雷德·瓦格纳1942年2月12日给希特勒写的一封信就表明了这一点：“最尊敬、亲爱的朋友和元首！按照你的命令，今年夏天节日剧院仍然可以敞开大门，这让我们非常骄傲，我们对你深表感谢。我们希望能再次以我们的方式履行我们的使命！在酝酿将上演的剧目时……我们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我们愿意由你做出最终决定……我们现在的绝大多数观众都表示愿意看《名歌手》……我们想征得你的同意，今年夏天上演重新编排的《名歌手》……根据演员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再上演《特里斯丹》……我们盼望能很快收到你的决定，以便可以为演出做出安排。维兰德、格特鲁德、沃尔夫冈、弗尔伦娜和我本人向你致以最衷心的问候，祝你安康！对你永远感激和忠诚的温·瓦。”

1944年8月9日，拜罗伊特举行了第三帝国最后一次瓦格纳音乐节。此后，“绿丘”上的节日剧院便关门大吉了。不过，海因茨·蒂特延却不为局势所动，继续在为1945年音乐节进行策划。他在给温妮弗雷德的信中写道：“到那时候可能就不会像以前那样需要元首的命令了。”

拜罗伊特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遭到轰炸。但是，1945年4月5日，一颗炸弹将瓦恩弗里德公馆靠近花园一侧的配楼炸成了废墟，楼里有图书收藏室和理查德·瓦格纳生前的起居室。温妮弗雷德·瓦格纳直至战争的最后几天仍对希特勒保持忠诚。1945年4月20日，她还寄了一封信到





柏林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衷心祝愿“元首”生日快乐。而温妮弗雷德长期的艺术总监兼情人海因茨·蒂特延，此时却在为自己的未来做着打算。他写了一份名为《拜罗伊特的真相》的文字材料，强调：“没有人敢干涉我的工作”，希特勒从来没有提过要求，“我们俩相互极不信任，不存在什么‘希特勒的拜罗伊特’”。接下去蒂特延便表示愿为民主的新德国效劳。

温妮弗雷德后来也采取了与蒂特延类似的态度。她在1947年接受非纳粹化法庭审问时呈递了一份长达六十四页的申辩书。在这份文件中她强调：“……虽然可以说，通过偶尔的会面和几封信，我与希特勒保持了个人关系……但是绝不可以指责我曾经是该党的积极拥护者。”

温妮弗雷德被拜罗伊特第二非纳粹化法庭指控为“主犯和第三帝国的受益者”。但许多证人的证词和各种文件材料却有利于减轻她的罪责。这些材料说，温妮弗雷德曾帮助过很多被纳粹政权迫害的人，她还聘用犹太艺术家，允许在拜罗伊特按宗教仪式举行婚礼，并允许人们在犹太人开的商店购物。由于她出面交涉，历史悠久的瓦尔特古堡上得以挂上了十字架，而不是纳粹卐字旗。

相反，控方却指责她这个老资格的纳粹党员一直狂热、忠实地为第三帝国效劳。他们说，从1933年开始，温妮弗雷德就再没有聘用一位犹太艺术家，为她工作的只不过是一些“与犹太家庭联姻的人”，再就是那些忠于纳粹路线的歌唱家和指挥。此外，当时每个剧院不管怎么样都有一名所谓的“犹太名角”，他们背后都有自己的靠山。温妮弗雷德确实对一些可能受迫害的人提供了帮助，但她这么做是有目的的，事先都盘算好了此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控方在指控温妮弗雷德时还拿弗里德林德·瓦格纳写的《火的遗产》一书作为依据。弗里德林德后来拍来电报，禁止控方援引该书中有损其母名誉的章节，但控方对此置之不理。

1947年7月2日，法庭做出判决：温妮弗雷德·瓦格纳被列为第二类罪犯，即纳粹积极分子，其财产将被充公，本人被禁止工作，并将参加赎罪劳动（四百五十天）。控方律师和被告律师（弗里茨·迈尔）对判决均提出上诉。1948年12月5日，温妮弗雷德写道：“12月1日和2日，我不得不听凭法庭对我宣判。控方再次要求把我判为主犯（我对此完全不能理解）……我也得想办法不失体面地忍受这一点。”（舍尔茨-帕雷，《温妮弗雷德传》）



1948年12月8日，安斯巴赫非纳粹化法庭对温妮弗雷德做出了改判，原告被判为“轻犯”，工作禁令仍予保留。温妮弗雷德在拜罗伊特的支持者听到新的判决欢欣鼓舞，而纳粹政权的受害者则对被告这么快就被免于承担历史责任表示震惊。1949年1月，温妮弗雷德正式表示不再以任何形式参与未来的音乐节组织工作，“……按照我早已有的打算，我委托儿子沃尔夫冈和维兰德负责完成有关工作……”温妮弗雷德从此退隐，但她仍然拥有瓦恩弗里德别墅、节日剧院和理查德·瓦格纳档案馆的产权。此后多年，旨在排挤瓦格纳的孙子，以及继续举办瓦格纳音乐节并取得音乐节控制权的争斗和阴谋一直持续不断。1951年7月29日，拜罗伊特终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像1872年节日剧院奠基时一样，当时人们也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和希特勒时代完全一样，站在指挥台上的仍然是威廉·富特温格勒，有人对此感到高兴，有人则表示不满。

此后的岁月里，温妮弗雷德周围不乏忠实的崇拜者。她时而待在瓦恩弗里德或是上瓦门施泰因纳赫的家中，时而到博登湖畔努斯多夫在小女儿弗尔伦娜家小住。温妮弗雷德已经有很多孙子和外孙了，她总是不知疲倦地照看这些小家伙。不过，她也没有与旧相识中断联系。比如1965年，她就曾到德国北方去看望过莉娜·海德里希，此外，她还坐过汉娜·赖奇开的直升机。在瓦恩弗里德，她也时常接待旧时好友来访。纳粹艺术家阿尔诺·布雷克尔还为她做过一个青铜头像。她已经原谅了大女儿弗里德林德。在对弗里德林德写的那本书的看法上，纳粹主义的同情者和反对者倒是罕见的一致，大家都表示反感。对两个儿子在艺术上搞的那些新花样，年岁越来越大的温妮弗里德常常不理解。她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他们搞的那些越来越倾向于禁欲主义的策划，但从不公开发表评论，她总是尽力为拜罗伊特说好话。直到德国导演汉斯-于尔根·聚贝尔贝格要为她 and 拜罗伊特拍一部电影（《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和瓦恩弗里德公馆史》，斯皮尔博格的电影剧本，慕尼黑，1976年）的时候，快八十岁的温妮弗雷德·瓦格纳才自问：“为什么不呢？”于是她打破了保持了三十年的沉默。

她采取了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来解剖历史。跟英国作家史蒂文森塑造的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完全一样，她把阿道夫·希特勒也描绘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是瓦格纳家的故交，另一方面是政客。这么看问题她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自己与希特勒这个狂热的瓦格纳迷之间愉快

的交往完全当做一件乐事来看待，她也可以在希特勒死后继续对他保持忠诚。另一方面，这个老纳粹党员则试图与“海德先生”，也就是与希特勒邪恶的一面划清界线。她声称，希特勒的这一面她一点都不熟悉，她是个毫不关心政治的人，从来不与希特勒谈论政治和犹太人的问题。（温妮弗雷德接受聚贝尔贝格采访时言论，《时代》1976年第19期）

温妮弗雷德已决心通过这种方式寻求解脱，所以时至1976年，她仍对“杰基尔医生”忠心耿耿：“我绝不会否认我与他的友谊，我做不出这种事情来……把我所了解的‘希特勒’与人们如今一股脑把账算在他头上的那些事情完全区分开来，这我能做到……我的意思是，对其他所有的一切，我深表遗憾，是的，我表示遗憾。但是对我来说，这些对我与他的私人关系并不构成影响。他的另一面，就是说，我所了解的一面，我至今仍然敬重，同以前完全一样。而那个完全让人不能接受的希特勒在我心里并不存在，因为我了解的他并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我与他的关系完全是基于个人感受……”（温妮弗雷德接受聚贝尔贝格采访时言论，《时代》1976年第19期）

她还失望地说：“人们总是仅仅对我们与希特勒的关系很感兴趣。”然而，她还是提到了第三帝国的功绩：“您瞧，国防军得到了重建，德国在其他国家面前又有了自决权，而且总的来说，至少《凡尔赛和约》得到了修正，年轻人又有了目标，人们的健康也有人关心了。所以，的确还是有一连串的好事的。”（温妮弗雷德接受聚贝尔贝格采访时言论，《时代》1976年第18期）

1980年3月5日，温妮弗雷德·瓦格纳去世。1930年至1945年她是拜罗伊特音乐节的领导人，死前她是拜罗伊特市的荣誉市民。

温妮弗雷德·瓦格纳虽然死了，但她在那部电影里说的话却影响深远。它不断唤醒人们对往事的回忆，瓦格纳后代为使拜罗伊特音乐节走出第三帝国阴影所做的数十年的努力也因此遭到了破坏。沃尔夫冈甚至曾禁止他的老母亲踏入节日剧院的大门，因为她说：“假如希特勒今天突然又出现在门口，我会像以往一样高兴的。有他在这里多好啊！”（《时代》1976年第19期）

盗婴高手——卡罗利妮·拉舍尔







“谁认识作案者？”所有慕尼黑报纸上都出现了这么一则紧急启事：“1944年3月20日，有一个孩子在慕尼黑总火车站被人拐走了……拐孩子的女人至今未被抓获……”这个女人的特征是：“约四十至四十五岁，身高约一米六，敦实，长脸，头发淡黄，说话爱用书面德语，身穿虎皮纹的褐色皮大衣，头戴褐色帽子……戴着角边眼镜……为了掩盖面目，她还戴了一副一直罩到胸部的黑面纱。知情者请通知慕尼黑第一刑事警察指挥部。”

搜寻拐孩子女人这件事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连西格蒙德·拉舍尔医生都注意到了那则启事。这名医生因为在达豪集中营利用犯人做医学实验而颇受党卫军最高层的优待。当时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看到那则启事后，拉舍尔医生若有所思地对正在家照顾一个新生儿的太太说：“这上面对作案者的描述简直跟你一模一样。”拉舍尔医生的太太和那名因为拐孩子而被通缉的女人惊人地相像，这一点不久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很快，警察总督、党卫军上将冯·艾伯斯泰因便亲自下令审问卡罗利妮·拉舍尔。这位四个孩子的模范母亲非常生气，她暗示自己的男人可不是好惹的，并威胁要向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告状。希姆莱可是他们家的老朋友和靠山。卡罗利妮·拉舍尔虽然因此推迟了刑事调查，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很快，一个令人震惊的人间惨剧便被揭露了。之所以会发生这等事情，既与这个女人的心理不健康有关，也是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使然。

卡罗利妮·拉舍尔，昵称“妮妮”，1893年9月21日生于慕尼黑一个经济条件相当优裕的小业主家庭，父母开了一家生意不错的药店。十六岁的时候，她就嫁给了导演兼作家奥托卡尔·迪尔。丈夫让她接受了音乐会歌手的训练。两人一直没有孩子。1929年丈夫死后，妮妮·迪尔除了在家里忙家务外便经常受聘外出公干。她是一个痴迷而自信的纳粹拥护者，时不时地为海因里希·希姆莱做些密探工作。据她自己说，纳粹“创业时期”，她曾让希姆莱在她家藏过身，她与希姆莱的老婆玛加丽特是朋友。

受希姆莱之托，她经常利用参加音乐会巡回演出的机会，刺探天王教会要人的情报。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她很善于充分利用已故丈夫与梵蒂冈的良好关系。在慕尼黑，这位寡妇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过着不引人注目的隐居生活，直到1936年她四十三岁的时候结识了当时二十七岁的拉舍尔医

生。拉舍尔此前不久刚刚通过医学国家考试，拿到了博士学位。随后，他在慕尼黑大学医院当助理医生，但没有工资。这份工作让他很不满意，远远不能满足他想在医学研究方面干一番事业的抱负。

拿医院同事的话说，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大夫是个极讨厌的家伙——举止畏首畏尾、扭扭怩怩，但又虚荣心极强。他在下属面前高傲自大，总爱吹牛；对上级则低三下四，奴性十足。在旁人眼里，他是个爱发牢骚、爱打小报告的人。人们当时普遍认为他智力有限、缺乏判断力，还一门心思一鸣惊人。

对卡罗利妮·迪尔来说，这个年轻的大夫却是自己梦中的男人，她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搞到手。因此她没有告诉他自己的真实年龄，一开始把自己说小了十岁，后来甚至说小了十五岁。有一次，两人一道骑摩托去基姆湖游玩，双方关系得到了巩固。根据拉舍尔交代的情况，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卡罗利妮说了算。医生后来在法庭作证时回忆道：“当时我们第一次发生了性关系，事后我意识到，我再也摆脱不了这个女人了。我的青年时代过得很艰苦，大学时代也是苦熬过来的，我的钱有些是靠替人扛箱子挣的。后来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我和她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取得了完美的融合。和她在一起我有了安全感，她的话对我来说就如同上帝的福音一般神圣。”拉舍尔与这个个性很强、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简直难分难舍。他崇拜她，但又因为她的专横而害怕她。他无条件地听从她的一切指示。拉舍尔当时已经是纳粹党员，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冲锋队，因为卡罗利妮希望以此来促进他事业的发展。

1939年4月24日，通过卡罗利妮的安排，拉舍尔医生与希姆莱见了面。他对这个党卫军头头儿说，他希望得到一份从事医学研究的工作。希姆莱对伪科学的东西极为热衷，总是乐意支持种族生物学、神秘学和民间医术的研究。他让拉舍尔医生参加了他的祖先遗传教学和研究会。拉舍尔因此得到一些关于癌症早期诊断的小任务，并在女友的住处非常外行地从事有关研究。妮妮以及她那个总爱帮她忙的表妹尤丽叶·穆施勒（昵称“露露”）替他打下手，每天帮他到达豪集中营取来一些犯人的血液供他研究用。

1939年5月，拉舍尔医生又按妮妮的指令去找了希姆莱，请求加入王牌的纳粹骷髅兵团——党卫军。希姆莱在这次会面中也谈到了拉舍尔和女



友的私人关系问题。他说他很赞赏迪尔太太，但又对他与这个大龄女子相好是否能满足“纳粹主义精神”提出的要求深表怀疑，因为他们在一起很可能不会有孩子！

作为党卫军成员，西格蒙德·拉舍尔医生要想结婚，必须得到希姆莱的批准，党卫军的订婚和结婚条例就是这么规定的。数年之后，拉舍尔声称：“党卫军领袖考虑到年龄差别的因素，劝我不要结婚，他说的并没有错……我当时还点明我与年龄比自己大这么多的女人结婚很可能不会生孩子。我对他表白说，我将证明我们会有孩子的……”（1944年5月17日拉舍尔医生的供词）

希姆莱对拉舍尔与卡罗利妮结婚所持的否定态度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应。在此之前，卡罗利妮就因为纳粹对母亲的崇拜而备感痛苦，因为她自己不能生孩子献给“元首”。如今她又开始担心年轻又很有野心的拉舍尔会为个人事业的发展而把她蹬了。她想了半天，终于想出一个短期解决难题的办法：她宣布自己怀孕了。拉舍尔顿感自豪，也松了一口气。后来卡罗利妮又有了新的说法，她声称孩子又流产了：“因为党卫军领袖已经知道我们要有了孩子了，所以我才想到了那么个鬼主意：不把流产的事告诉他，同时力争弄一个没人要的孩子来，冒充是我自己生的。我写信把自己的不幸告诉了表妹（露露·穆施勒）……她答应帮我忙，因为她胆子更大，而且一旦事情办砸了，与她也不会有什么干系。于是我们便商定去弄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来。”（拉舍尔私人档案，1944年4月6日审问记录）

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一次是在菲拉赫，卡罗利妮做得太明显，被她选中当牺牲品的母亲有个女友起了疑心并报了警。另一次是在布拉格，妮妮“接管”了一个吃奶的孩子，后来又连忙把他送了回去，因为她觉得小家伙“人种低劣”。随后她绝望地通知表妹，她打算空手回慕尼黑了。露露于是决定由她来处理这件事。按卡罗利妮的说法，露露“好不容易又弄到了一个逗人喜爱的孩子”，并且在她在慕尼黑火车站下火车的时候把孩子交给了她。卡罗利妮见了孩子兴奋得要命。她给这个吃奶的孩子取名“彼得”（实际上他叫赫尔穆特·齐策尔贝格尔，1941年4月3日生）。他是个私生子，孩子的母亲还以为她已把小家伙交给了一个好人家的照顾。通过贿赂一名助产士，卡罗利妮假装孩子是她在布拉格生的，并找了一名认识的女医生给孩子做体检。女医生毫不迟疑就开具了一张出生证明。随后，





卡罗利妮便美滋滋地等着未婚夫归来，当时希姆莱派他出差去了，要过挺长时间才会回来。

拉舍尔医生回来后听说妮妮早产了，觉得很奇怪，不过妮妮所说的一切听起来又很可信，于是“彼得”便作为他们的孩子在户籍登记处注册了，登记时用的名字是“彼得·迪尔”。

但是，初为人母的车罗利妮却希望自己能像纳粹教条所指示的那样有很多孩子，于是她便私下里打听哪里有单身孕妇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短期或长期托给别人代管。鉴于战时生活条件普遍艰苦，有人表示愿意免费带孩子自然会引来很多人的积极响应。因此卡罗利妮频频收到来信，她与表妹两人忙得不亦乐乎。

正当“迪尔-穆施勒”小团伙打算宣布卡罗利妮又“怀孕了”的时候，她们的阴谋诡计差一点败露。“彼得”的妈妈因为想和孩子的父亲结婚，要求立即归还她的孩子。养母卡罗利妮这下慌了，还是露露有办法。她又高兴地发现了一个“彼得二世”（可能是约翰·施奈德，1939年6月10日生），长得与“彼得一世”“太像了”。他们利用拉舍尔医生又一次出差的机会把两个孩子调换了。看来医生并没有察觉有什么问题，于是这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便成了拉舍尔家的常事。经常有孩子被收养，又被送回去，再换其他孩子。什么时候发生这种事情，完全是根据卡罗利妮的需要或是一时的心血来潮，那些母亲要回的很少是自己的孩子。

1941年4月19日，“元首”生日的前一天，卡罗利妮觉得“生”第二个孩子的时机已经到来。这回她连助产士都省了，也没有去什么医院。露露宣布孩子是由她接生的。实际上福尔克尔（可能是弗朗茨·约瑟夫·马洛维茨，1941年3月12日生）是个单身缝纫女工的孩子，做母亲的希望把儿子托给一个好人家照管。就像“小哥哥”以前一样，这个所谓的新生儿也被送到了卡罗利妮结交的一名女医生那里体检，并且得到了给户籍登记处和食品配给处开的出生证明。女医生甚至还为福尔克尔开了一张哺乳证明。拉舍尔医生这次被告知刚巧又没赶上看到孩子出生。他给正在“喂奶”的母亲拍了一张照片，拿到希姆莱那里吹牛说，他还要生“半打”（六个）孩子。

见拉舍尔医生已经和卡罗利妮生了两个健康的儿子，党卫军领袖希姆莱便同意他们俩结婚了，卡罗利妮为此还拿出了她那张标明她生于1903年



的艺术工作者证书。希姆莱亲自参加了他们于1941年7月举行的婚礼，随后又送给这个模范家庭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比如咖啡、酒和巧克力等等。随着战事的发展，这些东西越来越不容易弄到了。妮妮·拉舍尔则把她那两个如今已合法化的孩子的相册送给希姆莱以示感谢。她还利用这一机会请求希姆莱帮帮她丈夫。

拉舍尔医生当时正在第七空军地区指挥部效劳，并且正在一个特种医学培训班学习。1941年5月15日，他写信告诉掌管所有集中营的希姆莱：“……别人很遗憾地告诉我，我们这里还一直没有利用人体进行过（高空飞行研究）实验。为此我想认真地向您提一个问题：您能否提供两三个职业罪犯来做这种实验？弱智者也行。”

当时曾经短期利用动物做过实验，但这却违反了纳粹严格的动物保护法。在帝国元帅、帝国最高狩猎事务官戈林的亲自干预下，动物实验不得不终止了。这么一来倒为进行人体实验扫清了道路，于是拉舍尔医生和他的同事便利用两百名达豪集中营的犯人，主要是神职人员、波兰人和德国犹太人，在可怕的“升天车”（减压舱）内做起了实验，目的是测试人在骤然升至高空和从高空骤降过程中的生存能力。这项实验共造成七十人死亡。拉舍尔寄给希姆莱的秘密卷宗充分体现了他那种肆无忌惮、以杀人为乐的施虐狂本性。这个极限人体实验的鼓吹者在其中一份卷宗中写道：“这次进行的是十二公里高空的持续缺氧实验，实验对象是一名三十七岁、身体状况良好的犹太人。四分钟后，实验对象开始出汗；五分钟以后，出现痉挛现象……三十分时，呼吸停止。每隔五分钟测一次心电图。随后，大约在呼吸停止半小时后，尸体被解剖。”拉舍尔详细描述了尸体解剖的情况，其中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尸体被解剖后，心脏还跳动了相当长时间。

希姆莱对拉舍尔寄来报告表示感谢，并请他向“亲爱的医生太太”转达问候。希姆莱同时还问拉舍尔是否可能把一些用做实验品的人再救活，当然，这些人最终是要回到集中营里待一辈子的。希姆莱这种几乎算是仁慈的感情冲动让拉舍尔觉得很难办：“最近的一个实验对象瓦格纳呼吸停止后，我又把他救活了。不过这个实验对象是用来做极限实验的……我又做了一次实验，这次他没能活过来……”（拉舍尔1942年4月5日提交的达豪集中营减压舱实验报告）

卡罗利妮饶有兴致地关注着丈夫的工作。她想办法为丈夫弄来了昂贵

的彩色胶卷，以使他的新鲜标本（新解剖的人体）能得到最佳的记录。她还留心让拉舍尔能从犯人身上发一点财，希姆莱送给那些意外活下来的实验对象的食物，都被这对夫妻贪污了。拉舍尔还做过名为“海上紧急情况”的冷冻系列实验，以检验“超低温状态对温血动物产生的影响”，以及被冻僵者能否再被救活。共有数十人在实验过程中被拉舍尔医生慢慢折磨致死。有时候，卡罗利妮还向希姆莱发出邀请，请他亲自来观看有关实验。拉舍尔医生有一个极令人作呕的特殊发明：他让一些裸体女人（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犯人）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被冻僵的实验对象，并与他们性交，以使他们复活。这种可怕的冷冻实验以及随后进行的充满兽性的回暖实验，为窥淫癖者提供了大饱眼福的机会。这种时候希姆莱总是特别愿意前来观看。上司对他的实验感兴趣并亲自到场，爱虚荣的拉舍尔医生得意万分。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这种“医学上的美味佳肴”必须保密，不能在任何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因而也就不能为他赢得他所觊觎的教授职位。

作为一个知名的党卫军中队长的太太，卡罗利妮有很强的责任感，为满足纳粹政权提出的多生孩子要求，她的确费尽心机。1942年，她再次冒充怀孕了。与此同时，她又在表妹的帮忙下开始寻找合适的孕妇。最后她选中了一名单身缝纫女工于1942年10月6日生下的男孩，女孩子她是不要的。11月25日，卡罗利妮为自己安排了一次分娩。孩子在户籍处登记的名字是迪特·拉舍尔（其实是乌托·兰帕斯基）。妻子又在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在家里生下一个孩子以及新生儿当时的模样——当时孩子已有八个月了，让拉舍尔起了疑心：妻子真有这么强的生育能力吗？此外，自己孩子的长相有时在很短时间内就会迅速发生变化也让他感到非常可怕。“我没有勇气去认真消除我的怀疑，我只能说，我害怕彻底毁了我的幸福。”拉舍尔后来解释说。（1944年5月18日拉舍尔医生的供词）除了温和地责备妻子不该不请助产士就把孩子生下来之外，他什么都不敢说。

1944年这一年，拉舍尔一家开局相当不错。尽职的拉舍尔医生因为在达豪集中营所做的实验工作，被授予“双剑十字勋章”，并且颇受希姆莱的恩宠。当时他又在卖力地研究各种止血药的效果，为此他不惜让集中营的犯人们受枪伤。

不久，卡罗利妮又声称自己有喜了。1944年3月20日，紧裹面纱的



卡罗利妮扮作“沃特米勒夫人”，从一名因轰炸无家可归的妇女手中接管了一个男孩，并向她保证自己在乡下会好好照管他。回家后，她让人告诉正在达豪集中营忙活的丈夫，自己意外地出现了腹痛。她用这个被叫做“赖纳”的孩子（赖蒙德·泰斯，生于1944年2月13日，后改名叫威廉·巴拉纳伊）导演了一次戏剧性的分娩，场面之逼真足以打消任何疑虑。拉舍尔医生回家后看到妻子抱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婴儿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地上也净是血迹（实际上是一种含铁的红色液体）。这一令人触目惊心的行动完全是卡罗利妮一手策划和实施的，因为她那个忠实的帮手穆施勒表妹已不能再帮她了。有一天，在宣布自己“不再参与行骗”之后，露露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个月后，人们才发觉她已从七十米高的前基尔希施泰因山（贝内迪克滕万德山）的北崖上跳崖自杀了。道德上的顾虑，四处奔波导致的极度疲劳，参与种种复杂的阴谋诡计所造成的迷惘，尤其是拉舍尔太太时常会突然变得不知所措的精神状态，导致这名同案犯走上了自绝之路。实际上，卡罗利妮在她第四个孩子“出生”之前，同时与五个孩子的母亲和两个助产士进行过谈判。她在慕尼黑总站火车站接管孩子时那种疯疯癫癫的举止最终导致报上登出紧急启事，从而引发了对她的大规模通缉，使她陷入了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她把“赖纳一世”交给了一个医院的门房，随后又弄来了个“赖纳二世”。

被捕后，这个党卫军中队长的太太一开始还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最终还是坦白交代了。在与刑事警官谈话时，她仅仅对未能实现六个孩子的目标表示遗憾。卡罗利妮承认“侵占”了那四个受到她精心照顾和喂养的男孩，这样一来，这个案子似乎可以了结了。然而，此后每天都有做母亲的来报案说，她们曾经短期或长期把自己的孩子托给这个不断更名改姓的拉舍尔太太照管。此外，调查还发现，出生登记处登记的情况与那四个生活在拉舍尔家的孩子情况并不相符。这下子调查人员便遇到了一个显然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依据推断，至少存在彼得一世、二世，福尔克尔一世、二世，迪特一世、二世、三世以及赖纳一世、二世。警察指挥部的一份报告称：“可以断定，除了那四个孩子外，还有五个孩子曾短期被领养，而且这些孩子时常被相互替换。”有一份分析报告试图解开这一团乱麻：“拉舍尔太太交给她（一位母亲）的并不是她自己的孩子，而是别人的孩子。也就是说，她接管了巴姆贝格太太的孩子，又把他交给了兰帕斯基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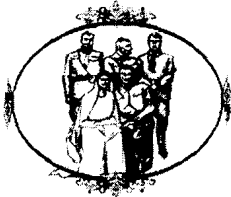
太。下一次兰帕斯基太太得到的又是迈尔太太的孩子……”卡罗利妮本人早就不记得整个过程了，但她知道自己总是不断地把那些长相难看的孩子送出去。所有有关的母亲和孩子都接受了血亲检测。但这种检测只能排除一些血缘关系，最终并不能明确判定身份。

由于受到希姆莱的保护，拉舍尔夫妇并没有受到法律审判。报界除了最初的传讯外也没再报道这桩丑闻。卡罗利妮曾打倒慕尼黑警察监狱一名女看守，企图越狱逃跑。此后，她于1944年11月29日被转移至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住进了一间单人囚室。希姆莱亲自下令让集中营当局善待拉舍尔太太，并让她享受一定的特权：她不必剪掉头发，不需要穿囚衣，可以读书看报和做针线活。不过，希姆莱也提醒集中营当局谨慎还是必要的：这名女犯人由于丈夫所从事工作的关系，对集中营的运作情况一清二楚，而且她还很狡猾，诡计多端。

卡罗利妮从狱中写信叮嘱丈夫：“亲爱的西格蒙德，现在我算完了。你还得活下去！请小心照料好一切，不要让什么东西被糟蹋了，这些东西可都是用你挣的钱买的。家里还得买些防蛀剂和灭鼠药，不然所有东西都会被咬坏的。不能和你待在一起我很难过，和你在一起的日子真好啊！好好照顾彼得和小福尔克尔。”她还给希姆莱和他的副官勃兰特写过哀告信，信中她否认丈夫事先知道她的所作所为。

拉舍尔医生在一次与调查人员对质时哭哭啼啼地说，自己“受骗上当”了。不过，他又承认，见到第一个孩子时他就怀疑孩子可能是拐来的。他为卡罗利妮担心，请求不要把她单独关起来。后来拉舍尔被党卫军开除，并被关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后，他又回到了以前工作的地点——达豪集中营，成了那里的“特殊囚犯”。1945年4月26日，在盟军到来三天之前，知道很多秘密的拉舍尔医生被处决了。

卡罗利妮也没能亲眼看到纳粹政权的灭亡。由于攻击一名女看守，她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绞死了。



## 译 后 记

接译本书之初，听说是奥地利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写的，心里颇曾犯难。德语是一门较晦涩的语言，日耳曼人性格又比较严肃，因而德语国家报刊杂志上的文章可读性就不强，更不要说是专家学者的著作了（美国作家海明威曾撰文挖苦德语文章难以卒读）。没想到的是，捧起书后却难以释卷。本书德文版封面简介称此书细节生动，扣人心弦，所言不虚。该书出版后曾上德语国家畅销书排行榜一年之久，后来又被译为多种文字在美国、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出版。

作者安娜·玛丽亚·西格蒙德女士在接受奥地利媒体采访时说：“可读性强是这本书成功的秘诀，为此我有时一页要改写近百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不过，作者轻松流畅的文风也招致学术界的一些非议，有人指责她哗众取宠。但是西格蒙德女士认为，追求可读性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并不矛盾。正是由于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档案馆里做了艰苦的研究工作，阅读了大量当事人留下的文献材料和其他档案，她才掌握了大量的生动细节，以飨读者。她告诉记者：“我想通过这本书填补第三帝国史的一页空白。我并没有虚构什么，也没有自己站出来妄发议论。我认为那些历史事实本身就比任何虚构更引人入胜。”

西格蒙德女士原先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世纪史，她将目光投向“纳粹女人”极其偶然。西格蒙德女士介绍说，有一次她全家吃午饭，聊到第三帝国时公公提到，对那些纳粹高官的女人，人们至今所知甚少。公公的无心之言引起了她对“纳粹女人”莫大的兴趣，从此她便着手在德国慕尼黑国家档案馆和科布伦茨纳粹党档案馆等处寻找线索。大学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后，西格蒙德女士在奥地利历史研究所接受了三年高水平的档案学培训，由于这一背景，她能够很方便地接触到所需的历史档案。作者在本书德文版的后面列出的参考文献目录长达三十七页，足见用功之深。

从西格蒙德女士所列的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以前写“纳粹女人”的书籍并不少，本书人物之一亨里埃特·冯·席拉赫所写《希特勒周围的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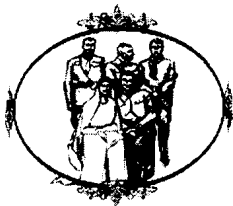


人》就是一例。但是，西格蒙德女士在本书前言中对这些书籍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媒体就对那些接受审判的纳粹名媛做了大量报道。但当时许多引起轰动的揭秘材料，以及当事人颇动感情的自我辩解，事后证明都是失实的。”

按作者的说法，半个多世纪的时空间隔使她可以“冷静从容地重翻历史”，“在参考了学术界研究第三帝国史的最新成果，查阅了事后公开的保密档案，并且比较了大量当事人和第三者的描述后”，作者完成了此书。

本书所述是否更接近史实，译者没有资格下结论。书中描述的是纳粹高官鲜为人知的私生活，涉及诸多历史人物微妙的感情世界，应该说作者选择了一个很“不安全”的主题，本书出版后引起很大争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书评认为，西格蒙德女士是一名“知道自律的作者”。她在书中对各个历史人物都尽力避免做出主观判断，而是摆出大量史料让读者自己去比较鉴别。西格蒙德女士自己说，本书引起争议并非坏事，她很愿意听听媒体以及当事人亲属和有关人士对本书有何反应，由此她可以获得新的信息。本书共写了十四个“纳粹女人”。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尽管纳粹政权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但在她们眼里，那些纳粹战犯乃至希特勒本人，仍然是好丈夫、好父亲或好朋友。她们对希特勒及其政策以及她们丈夫的所作所为或者认同，或者极力美化，或者干脆视而不见，绝大多数人对政治的盲目无知让人惊愕。译者曾作为新华社常驻记者在德国工作两年，所接触的德国人大多正直、守规矩，很难想像他们的先辈和希特勒犯下的滔天罪行有牵连。后人可以归咎于当时德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包括一战战败后德国人中普遍存在的失落感和经济大萧条。人们也可以说，在那种逆境下万不该出现希特勒这样一个极其善于蛊惑人心的大魔头。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恐怕是德国人的弱点——容易盲从和愚忠。对这一弱点，歌德、海涅和马克思等德国历史名人都做过深刻的反省。

读者在看《纳粹女人》这本书时恐怕会和译者一样有这样的想法：难道这些纳粹女人中就没有人对纳粹政权表示过怀疑或批判吗？至少本书中没有。原因可能是西格蒙德女士作为学者，依据的全是当事人留下的文献材料，而那些人当时是绝不敢在书信和日记中表露对纳粹政治的疑虑或不滿的，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战后这么多年，随着纳粹罪行的曝光，她们中肯定会有人幡然醒悟，希望将来有关情况能够见诸文字。



即使是德国人也未必全都熟悉第三帝国的历史，更不要说中国读者了。作者在书中提及很多第三帝国的人物和历史名词时没有附加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方查阅资料，加了不少脚注，竭力扫清这些阅读障碍。然而限于译者水平，疏误之处在所难免，祈望多方指教。

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德语同仁睦卫先生和该台德国专家的大力帮助，新华社译审李建鸣女士认真审阅译文并作序，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班 玮 曲俊雅

2003年8月



策划 隋丽君 责任编辑 马力 装帧设计 冉冉工作室 责任印制 吴凤兰

